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五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五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PDG

目　　录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 …………………………………………… (1)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
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 ………………………… 瞿秋白 (37)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 (43)
——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 ………………………………… (53)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 ………………… (58)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给李维汉的信 …………………………………… (62)
——关于湖北湘南工作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二号 ……… (66)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
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 ………………………………… (69)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 ………………………………… (91)
——关于全省总暴动与地方割据等问题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顺直省委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 ……………… (100)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中共中央给满洲临委的信 …………………………………… (107)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陈为人关于满洲工作的报告 ……………………………… (109)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复广东省委的信(粤字第四十号) ……………… (114)
——斗争的扩大与深入和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 ………………………………………… (119)
——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附: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 (121)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 ………………………………………… (137)
——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军运工作给许权中等的信 ………………… (145)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 ………………………………………… (148)
——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 (15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 (156)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史达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所提出之草案)

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 …………………………… 瞿秋白（163）
（一九二八年四月）
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 ………………………………………（173）
（一九二八年四月）
中共中央给湘东特委的信 ……………………………………（177）
（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 …………………………………………（184）
——五三惨案后的反帝斗争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中共中央反对日军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 ……………………（189）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 ……………………………………（196）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 ……………… 任弼时（199）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中共江西省委代转的毛泽东给中央等的报告 ………………（206）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 …………………………………………（209）
——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
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的信 ………………（223）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 …………………………………………（239）
——济难会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 ………………………………………（243）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莫斯科训练中国干部问题
给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的信 …… (245)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 …… 瞿秋白 (248)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 …… 瞿秋白 (251)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及任务 …… 蔡和森 (301)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现在革命形势的估计 …… 李立三 (305)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现时争斗形势的估量 …… 王若飞 (309)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 周恩来 (315)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革命形势和目前的任务 …… 瞿秋白 (329)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报告 …… 周恩来 (335)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 …… 周恩来 (353)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军事问题补充报告 …… 刘伯承 (363)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政治议决案 …… (374)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土地问题议决案 …… (403)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农民运动决议案 …………………………………………… (424)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职工运动决议案 …………………………………………… (434)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关于党纲的决议 …………………………………………… (449)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 (450)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 (451)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党章 …………………………………………… (470)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通过）
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 ……………………………………… (483)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关于共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 ……………………………… (491)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妇女运动决议 ……………………………………………… (497)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 ………………………………………… (506)
——铁路工人中工作大纲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
告苏联境内孙大及其他各校之中国学生（联共、苏联少共、中国少共的正式和候补的党员和团员）书 …………………………………………… (510)
（一九二八年七月）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 ……………… (516)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 …………………………………… (524)
（一九二八年八月）
中央通告第一号 …………………………………………… (528)
——秋收工作方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二号 …………………………………………… (536)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三号 …………………………………………… (543)
——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 (555)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 ………………………………… (563)
——分析政治和指示工运农运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的信 ………………………………… (567)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给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信 …………… (573)
——关于铁路工作策略与方法的错误及
今后的工作策略路线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等的指示信 …………………………… (579)
（一九二八年）
中共中央工作计划大纲 …………………………………… (597)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中央通告第四号 …………………………………………… (600)
——关于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 ………………………………… (608)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工作决议案 …………………………… (609)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决定）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毛泽东 (624)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选） ………… (631)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论口号的转变 …………………………………… 刘少奇 (640)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 …………………… (644)
（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五号 ………………………………………… (652)
——巡视条例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策略与工作路线
给陕西省委的信 …………………………………… (655)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中共中央给云南临委的信 ……………………………… (660)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中央通告第七号 ………………………………………… (666)
——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八号 ………………………………………… (680)
——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的运用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二号 …………………………………… (685)
——关于济难会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的信 ……………………………… (690)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 …………………………………… (697)
——关于军事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给贺龙的信 …………………………………… (701)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 (704)
——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
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 …………………………………… (709)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 …………………………………… (723)
——关于职工运动的策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井冈山的斗争 …………………………………… 毛泽东 (738)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 (762)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 …………………………………… (770)
——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党的
反帝与争取群众策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 (789)
——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反日保路运动给满洲省委的信 ………… (794)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 …………………………………… (801)
(一九二八年)
井冈山土地法 …………………………………… 毛泽东 (814)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
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阶级，同着农民、兵士、群众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一广州苏维埃，在三天英勇的斗争之后，竟被帝国主义及广州一切反革命的联合势力所摧残了。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期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苏维埃的广州之建立与奋斗及其失败，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应当研究的，应当收集这些历史事实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教训，而给一般工农、兵士、广大群众，解释其意义。

（一）广州暴动前之中国一般状况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沪粤的四月反动，武汉的七月反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都确定中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分析完全合于事实。背叛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军阀与国民党，自从和工农民众破裂之后，绝对没有能力去建立经济政治的稳定，他们是一无办法。国内各种经济——工业、商业、农业、财政、国际贸易，都起了很大的恐慌，这种经济恐慌一天天的厉害起来，简直有天崩

地陷的形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已经充分表现他没有能力保持他内部形式上的统一，更不用说实现中国之资本主义的集权了。广东汪精卫所领导的张发奎、黄琪翔政变之前，国民党领域之内已经爆发许多军阀战争和简单的抢掠。这种战争没有丝毫的革命意义，完全是为着抢地盘争地位，各省之间有抢夺，各县之间也有抢夺——这都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各派各军互相竞争的现象。资产阶级愈反动，对于被剥削阶级的恐怖政策也愈加厉害，他们的屈伏于帝国主义之前也愈加无耻，他们内部愈加不能统一而日益分裂纷争。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合并”完全是一出滑稽戏；这一幕滑稽戏之后，立刻准备了两个军阀的战争，南京政府和唐生智的战争，及广东派军阀和广西派军阀的战争。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反对李济深、黄绍竑的战争，不过是反动政治内部的纷扰和军阀混乱的总局面之中的一幕。全国之中现在有两个根本的阶级过程：一方面，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很迅速的与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相联合混一；别方面，无产阶级农民和极大部分的城市贫民在极艰难的条件之下，忍受着无数的牺牲，共同进于革命之更高的阶段——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合之联合战线，进于工农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阶级之联合战线。在前一时期，革命的旗帜是国民党，现在的新时期的旗帜却是苏维埃的工农革命，这革命要由共产党来领导。工农革命运动的生长，表现于最近半年来上海、汉口、广州的罢工潮，湖南、湖北、广东、江苏的农民暴动，以及河南、直隶、山东、江西的农民骚动，南昌的八一暴动及叶贺[1]军队的占领潮汕。这一过渡时期中，革命方面最大的弱点，便是革命正在进于更高的阶段，而中国共产党很幼稚，经验很不充足，又受着极严厉的压迫，他在政治上组织上指导一切运动的能力太薄弱，而其中又有人对于国民党及其

“左派”还存着种种幻想，由此而发生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土地问题及军事问题上；其最主要的缺憾是三种革命力量之间没有亲密的坚固的联络——这三种伟大革命力量，便是工人群众的斗争、农民的暴动和兵士群众的兵变。南昌革命军队的起来，没有能用自己的革命政策去发动工人和农民；暴动的农民没有得着城市的赞助（如湖南秋收暴动时长沙的不发动群众暴动）；城市工人也没有会吸引兵士群众到自己方面来。所有这些缺点，便发生叶贺南征时期的历次的失败。

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在十一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纠正上述的缺点，同时确定现时的总形势：虽然受着历史上的屡次失败（上海蒋介石反动，武汉汪精卫叛变，潮汕叶贺挫败），可是仍旧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的力量不但不减少，而且不断的生长，而暴动问题也仍旧是最近直接行动和规划中的问题。

（二）广东省内的情形

李济深的广东境内的国民革命军早已葬送了，广州的反动只在蒋介石公开反革命行动后的两天。叶贺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的时候，张发奎和汪精卫及一部分广东省内的资产阶级，便准备推翻李济深、黄绍竑及代表南京政府一派的豪绅资产阶级。十一月十七日，这一政变居然成功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起来夺着广东政权，自称“护党运动”，想号召一般民众来赞助他们，而达到反动的目的；同时这一派人也非常之残酷的压迫工农和共产党，比李济深的统治是有过之无不及。汪精卫领导之下的张黄政权，第一步的政策，便是取消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逐他们出公共宿舍，封闭他们的公共食堂等

等，逮捕大批群众的革命工人，开枪轰击徒手的示威群众，命令军警和反革命的“改组委员”占领工会会所，特别发布杀尽共产党的标语。张发奎、黄琪翔等对于帝国主义是特别的表示亲密和所谓“和平友好”，他们甚至于对于资产阶级的团体也严禁抵制英日货，他们那时便命令军警强占苏联领事馆的一部分房屋，对于苏联领事的抗议，完全置之不理。

广东全省完全陷于这两派军阀的混战之中，广州的市民遭着空前掠夺，在所谓“正税”之外，增加了许多的苛税杂捐，想尽方法的搜括民脂民膏，甚至于公开的盗用库藏。如此之战争，财政恐慌，钞票跌价，物价高涨，都使经济生活的崩溃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再加上屠杀搜捕的种种淫暴政策，到十二月初的时候，已经陷于完全破产的状态。汪精卫、张发奎等欺骗劳动民众的政策，完全失败。工人群众之中，充满了不满意于各派资产阶级军阀的情绪，这种革命情绪的高涨很快的变成公开的愤激。共产党的威信大大增高——虽然政府对于共产党的搜捕压迫非常之野蛮厉害，共产党存在于极严重的秘密状态之中，可是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却大大的增加。共产党日益成为革命民众反对反动的国民党统治之组织。

（三）广州暴动前阶级力量之团结

十一月、十二月之中，广东全省，也和中国一样，阶级斗争特别的剧烈。广东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背叛革命出卖工农之后，立刻便和一切反革命势力团结联合战线，他和封建的地主、香港的买办、反动的财政资本家、旧时的官僚、一切投机的军阀以及以前孙中山的死敌“纸老虎”的商团等等，还有英美法日的外交官侦探之帝国主义者，结合联合战线。汪精卫、

张发奎等的所谓“左派”在阶级的关系上，和李济深、黄绍竑一派是一样的。所谓广东派的军阀，他们勾结李福林，又因为李福林能领袖广东的地主武装的民团，所以他们又和民团联络。这两派反动的军阀，对于工农革命，都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他们这两派并不因此而能一致行动，并且互相冲突以至于公开战争。广东派与广西派的公开破裂，反映着英日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广东的资本家有亲日的倾向（广东派的张发奎因此想用攀附广东资产阶级的手段，仰承蒋介石派的鼻息——蒋介石是亲日的）；上海的资产阶级——英国买办却是亲英的（广西派军阀的亲英和他们与上海买办阶级密切联系，都是最近半年来明显的过程）。广州十一月十七日黄琪翔政变之后，广东全省的战事爆发起来，从汕头到广州、从江门到北江都打起来。然而剧烈的大战没有起来，而只有双方的调兵遣将和小的冲突，可是战事的影响已经非常之大，因此双方军阀的经济力量都已大大的削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都在非常的崩溃情形之中，因为准备大战的缘故，广州市内政府军队日益减少。

同时被压迫民众之中的革命情绪也增高起来，广州的工人，在四月李济深反动之后，受着极大的牺牲，被杀的工人在四千以上，此外还有一千多被拘禁；此后屡次对于革命民众施行屠杀搜捕的强暴政策。国民党政府的强暴政策，特别的是对于赤色的工会运动和共产党。但是在反动政府恐怖政策之下，广州的工会——工人代表会一直能按期召集秘密的代表会议，广州的党部，更能按期集会，努力的工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都有相当的程度，党部与工会确是工人在日常斗争中所团结的政治指导机关。九月间，南昌暴动的革命军队到达广东的时候，共产党曾经准备广州市的暴动。潮汕方面革

命军的失败，使这一口号没有能直接实现。虽然那时反动政府加倍的压迫，虽然叶贺的革命军队失败，但是工人运动的高潮，却继续增高起来。政府或国民党所派的工会改组委员，到处被工人群众所驱逐。有组织的工人，到处自己选举工会的委员。十月十四爆发海员的罢工，各业工人都起来援助，而举行群众的示威，极广大的工人群众不顾警察的禁止和拘捕，在群众大会之上公开的拥护赤色工会和共产党，当时工人群众便自动手夺回工会会所，驱逐警察和白党的工贼走狗，当场打死海员工会会所中的工贼。此后，立刻便有印刷工人的罢工起来。十月十九日汪精卫所领袖的反动政府对于这种工潮大施压迫，逮捕大批的工人领袖，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被解散，海员工会被封闭。那时工人之中便有主张暴动的，但是共产党威信足以纠正这种过早暴动的倾向。共产党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更加紧工人力量的组织，扩大政治经济日常斗争的要求，宣传暴动的必要和苏维埃政权。十一月初开始反对白色恐怖的示威——就是反对汪精卫回粤后的压迫政策的示威。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纪念日，广州工人开了极大的群众大会表示纪念，但被警察解散。黄琪翔、张发奎的政变之后，群众示威和部分的罢工继续不断的发展，省港罢工工人被张黄解散之后，自动的放火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房屋，共产党的宣传品有极多量的分布，群众热烈的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些现象表明阶级斗争更加剧烈。十二月初群众的愤激达到了极点，海员罢了工，公共汽车工人宣布了怠工，许多小企业的工人也开始罢工，邮务工人已经议决罢工。先进的工人武装起来，自己准备炸弹等等。暴动的主张，普及了一般无产阶级的群众。

至于农民方面，则四月间李济深反动后，曾经有一时期的农民暴动，叶贺军队到达广东时，九月间又起了秋收抗租的暴

动，最近农民在各县又重新暴动起来——这是一九二七年广东农民的第三次暴动了。各县农民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这次暴动的开始时，有叶贺残部很少的军力参加，这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的一师。这次暴动开始于十月底，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兵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这一农民暴动带着充分的革命性质，完全扫除了以前的机会主义余毒，一切乡村之中，随后便是一切区镇之中，以至东江许多县的县城之中，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切田界（广东所称为田茔）——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剥削农民佃户的田契、租约、借券等等，完全当众销毁。一切田地都归乡村苏维埃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一切当铺的财物完全没收，无价发还典质的贫民，一切反革命派豪绅地主的财产充公，作为苏维埃工农兵政府的费用，用来救济贫民，从事公共建设，扩充工农兵政府的革命军队，一切反革命派地主豪绅都公开处以死刑，他们的巢穴都被焚毁。邻近的乡村县市，都激起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暴动，和工农革命军共同围攻地主豪绅的巢穴，而能战胜他们，扩大革命的地域。县城的苏维埃，如海丰、陆丰、碣石、紫金、汕尾，以及后来的普宁等处，都由手工工人、农民、苦力等共同组织。海丰十一月七日开苏维埃大会到工农代表三百人，宾客一万人，选举苏维埃政府，管理东江的各县。十一月中旬暴动区域已经扩大有五十万居民的区域。新组织的工农革命军，是由各村选出的志愿兵组成的。雇佣军队的方法取消，代以团体（各业工人各村农民）的义务兵役。工农革命军的武装，大半是由敌人处夺来的，海

陆丰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派人向广州工人群众请求赞助，并发出告工人群众的宣言。同时海陆丰的农民将没收的地主财产之中，取出二万元来送给广州工人，作购买武装之用。海陆丰以外，其他的农民暴动虽然规模较小，但是也已经有许多处开始了：北江方面，海南岛，北海地方，沿广九铁路，潮汕附近……

兵士群众的生活异常痛苦，并且受长官的压迫侮辱，专门使他们当军阀战争的炮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及广州工人代表会，在十月间所发宣言上，便号召国民党及反动军队里的兵士起来反对军阀统治，起来反抗反革命的军纪，起来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起来力争自己的生活改良、政治权利和军纪待遇的改良，起来兵变而站到革命的工农方面来。张发奎、黄琪翔政变之后，他们号召群众大会来庆祝他们所谓“护党”的成功，这一“大会”实际上只能算是阅兵，大多数到会的人，都是奉上官命令而来的军警；这一大会之中，突然来了一群革命工人，高举红旗，写着“打倒国民党”、“苏维埃广州万岁”、“工农兵政权万岁”、“兵士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等标语，当时还散发许多传单给军警，工人高呼口号，当场的兵士都公开的表示对于工人的同情。尤其是广州的驻军（教导团等）的兵士，他们对于反革命的统治非常之愤激，这些军队要算是张发奎部队中最好的一部分，他们还保持着往年国民革命之热情的影响，而愤恨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军阀。十二月初在许多次秘密会议之上，这些兵士整连整营的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政策和举行暴动。

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内部，纠纷分裂争扰到极点，发生不断的公开的战争，而工农兵士方面却一日千里的兴起革命的高潮。城市的劳动小资产阶级、一般贫民及一部分智

识界之中，也开始不满意反动政治的表现，厌恶政治上的混乱和不能容忍的经济困难，他们对于欺骗民众的国民党，不能实行自己所应许的政纲的国民党，开始失望和怨恨。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方面，虽然只在找不着出路的动摇徘徊于革命反革命之间，然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已经决定的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这就是十二月初广东政治状况的具体情形。

（四）广州暴动的决定和日期

张发奎、黄琪翔的政变之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遵从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十八日的决议案和指令，讨论暴动问题，当日便一致议决坚决进行暴动的政策，可是暂时还不能决定举行暴动的日期，而先开始组织赤卫军，最高限度的加紧兵士运动，并且开始组织苏维埃。到十二月初旬，便已经有了可以胜利的无产阶级暴动的条件，列宁所指示的那种条件——阶级斗争的最大的剧烈已经成了事实；统治阶级已经不能保持政权；被压迫的阶级不能再受反动腐化崩溃的国民党之统治，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极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赞助共产党；广州驻军的兵士对于共产党的口号日益表示赞成，几万几十万农民联合到暴动旗帜底下来。同时如果再推延暴动，就算只推延几天，也必定是广州驻军的革命兵士被解除武装，极严厉的白色恐怖压迫广州工人，极残酷的屠杀来镇压农民暴动，西江方面的一切反动军队回来占领广州。

这些条件之下，只有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会认为这次暴动是过早的行动，是盲动，是军事阴谋。这种机会主义者在广东共产党党部之中是没有的，在中央委员会之中也是没有的。十二

月中旬的广州暴动，是阶级斗争整个儿的发展之客观条件的结果所必然要发生的，当时对于工人阶级没有别条路，只有直接起来夺取革命的政权。本党广东省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日期，是很正确的。

（五）广州暴动的准备和口号

暴动的直接准备与组织，经过下列的六种准备：

（一）确定暴动之总政纲；

（二）暴动之军事上的准备；

（三）广州苏维埃的组织；

（四）经过赤色工会动员工人群众；

（五）兵士中急进的工作；

（六）农民中的准备与联络。

十一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就公开的号召群众暴动，同时就提出下列的口号：

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工农武装起来，劳动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一切工会会所归还工人，杀尽一切工贼走狗和改组委员，立刻恢复省港罢工工人权利，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资，工人监督生产，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一切土地归农民，杀尽土豪乡绅地主，改良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反抗军阀，兵士委员会监督军费的开支，打倒国民党，打倒张发奎、黄琪翔、李济深、黄绍竑，枪毙一切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工农兵联合万岁，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众和苏联联合万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共产党而且联结这些要求，举出最主要的口号：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打倒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这些口号便能对一般民众表示将要起来的暴动之明确的政纲。

对于军事的准备，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十一月二十六日便决定下列的办法：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做总指挥机关；组织参谋部做暴动时军事技术的指导机关。暴动之军事方面的准备情形是：定出明确的举行暴动的战术计划，全体党员动员，组织二千工人的赤卫队，这赤卫队是极端秘密有极端严密纪律而按连组织的，又组织最可靠最忠实最有训练的敢死队两连（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一连，海员及手车工人一连）；准备运输工人汽车夫等，以及一切运输用具以备暴动时之用；秘密准备许多铁尺刀棍手榴弹炸弹炸药等，少数的手枪驳壳及许多冷器，如此武装了工人赤卫队及工人群众；吸收大多数的党外工人加入赤卫军，并担负军事的指挥任务，建立极广大的消息机关，差不多反动军队及政府机关参谋部等处都有共产党的消息报告员，每天侦察敌情报告党部；党部的工会的革命兵士及下级军官的会议，差不多每天召集，逐步讨论详细的暴动计划。

因为秘密状态异常严重，所以苏维埃只能在决定暴动日期时候才成立：工人代表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十人，革命兵士的会议选出三人，市郊农民协会上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三人（可是三人之中只有一人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广州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便由这十六个委员组成，此外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之中，工人占三分之二。举行暴动的最终决定，便在这苏维埃会议上通过，并且通过举行暴动的行动计划，所以能立刻调动工农兵的群众开始暴动。暴动胜利之后，即选出苏维埃政府的平民行政委员会（SOVNARKOM），

通过许多苏维埃政府的法令。

共产党能够在广州调动这样广大的群众，完全因为共产党在广州成年累月的工作，确能深入广州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而与广州工人阶级结合同生共死的密切关系，永久在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知道工人群众的一切要求，一直到极琐细的，并且能够替他们提出来，能够领着他们去力争这些要求，能够结合一切部分的要求，而综合于工农革命的总任务。再则保障暴动胜利的要素，就是共产党经过赤色工会，而在工人群众中得有非常之大的信仰，共产党能够切实的领导赤色工会使工会中共产党员及工会指导者的影响集中在群众身上。没有这些工会中的深入热烈的工作，决不会有如此伟大的暴动胜利，如此热烈的对于苏维埃政府的拥护，如此明显的实现革命政策。

兵士中的工作首先便在广州驻军之中发生影响。可是没有能够和驻在市外及外县的兵士，发生密切关系。市内所驻各种军队之中都能有自己的党员。广州市内的教导团，尤其完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他在暴动之中有很大的作用。这十二营的军队，其中极大多数是军官学校学生的智识分子，除少数高级军官是反动派外，其余一致赞成苏维埃革命。再则广州的警备团的大多数兵士，炮兵营一部分，有些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及其他，也都赞成广州的苏维埃口号。暴动的一星期以前，二百兵士的会议（其中有党外的普通兵士），一致决议誓死为工农革命奋斗。共产党所提出来的兵士口号，尤其是“土地归农民和兵士”，在兵士群众中遇着热烈的拥护。

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及广州市委员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们曾经组织秘密的农民训练班，他们与海陆丰的党部和苏维埃政府有经常的联络，不断的给海陆丰党部以指令，并且努力发展广州市郊的农民，一直到广九路沿线，东莞、宝

安等处，宣传极彻底的土地革命口号，经过秘密出版的机关报报告农民运动的消息于广州群众。

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竭全力反对一切恢复“革命的国民党”的幻想，因此暴动之前许久工农兵士群众对于国民党已经早已认清，非常愤恨。汪精卫、张发奎等想欺骗群众的滑稽戏立刻被共产党所揭破，所谓“左派”的真面目立刻揭穿，共产党拒绝张发奎的谈判提出先决条件（见广东省委会员宣言——《布尔塞维克》第九期），而张发奎的所谓“左派”政府，立刻便又施行白色恐怖。

群众的宣传曾经有很大的工作，有秘密日报《工农小报》、周报《红旗》及许多种传单。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的前一天便会同印刷工会商定，印布苏维埃政府的命令传单，这些命令传单日报印出七百万份。

苏维埃估计自己的力量，尽了所有的一切来准备，力求无产阶级暴动预先在组织上有保障胜利的可能。

（六）十二月十一日的发动

广东党部，组织指导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时的政策，完全是和马克思列宁所说一样，就是“暴动是艺术”。党部及工会在几星期以来，将全力都放在准备直接暴动之上，暴动的开始，恰恰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规定的时刻：十二月十一日午前三时三十分——工人和兵士同时发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长张太雷在营中去组织兵士。党及苏维埃，以及工人赤卫队都派代表，出席教导团兵士全体大会，他们演说之后，群众宣布国民党的政府已推翻，承认广州苏维埃政府，枪毙十五个反动军官，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定了

“暴动”两字的军中口令，兵士群众便从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开动，去攻占市内要隘，杀警察及解除反动军队的武装。同时同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用手枪炸弹进攻公安局及保安队——这都是反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那时运输工会已将一切运输用具及全部的加拿大公司的公共汽车几百部搬运汽车及普通汽车开赴战场，以便革命军力的移动。因此工人赤卫队及兵士群众能在一点钟之内便将公安局攻下。工人增加武装之后，立即独立占领保安队。公安局中所夺到的枪支、机关枪、铁甲汽车等，立刻用来攻取其他机关。过了几点钟之后，广州市内的重要地点，除长堤以外，都被革命的兵士和工人占领。反动派的反抗全被镇服。邮政，电报，无线电，兵营，公安局一切分署，政府机关，国民党省党部，全被苏维埃军队占领。二千政治犯立即释放，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赤色工会会员以及国民党真正左派黄埔学生。其中大多数立刻武装起来，志愿的加入红军。教导团的一营人，用突然攻袭的手段，解除两团反动军队，取得张发奎全部炮队之三分之二，一千支枪，还有很多的子弹。同时革命的市郊农民占粤汉车站及兵工厂厂库，在临近几个乡村暴动起来，广三铁路的车站也被农民占领。十一日中午除长堤及还在顽抗的反革命巢穴之外，全广州已在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之手。

广州暴动的胜利，完全是靠革命的工农兵士的联合力量。

（七）苏维埃政权的成立

暴动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了。这一胜利，便是一切国家政权都归到工农兵士群众，以广州苏维埃为指导中心。从此之后，广州苏维埃便从无产阶级暴动的最高机关，变成革命政权

的最高机关。对于一切人都非常明显的是：这一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移转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移转；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取得政权之后，在胜利的群众之前，立刻发生许多重要的任务：（一）组织苏维埃政权，（二）拥护苏维埃政权，（三）实行苏维埃的政策，（四）向反革命进攻，（五）打通与海陆丰联络的道路，使与农民暴动胜利区域相接，而建立巩固的革命基础。广州苏维埃存在期间很短促——尚不满三天，所以这些任务只实行了很小一部分。对于最后的两种任务，简直丝毫也没有能实行。

至于前三个任务，则平民行政委员会发布宣言命令，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成立，组织革命的军队，以及立刻消灭反革命势力的办法。平民行政委员会在暴动成功之后，立刻开始实行政府的职权，他签字并公布广州苏维埃所决定的一切命令和宣言。他的第一件政府行为，便是发布告中国工农兵群众及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苏维埃政府的文件，都在广州最大的一家印刷局中印发二十五万份。平民行政委员会之中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是苏兆征同志——一九二五年省港罢工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政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革命军力保卫苏维埃的广州，支配军械军费及食粮等。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根据海陆丰的经验，建立正式的革命军队，从工人赤卫队、国民党军队中暴动出来的兵士、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以及志愿投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成工农革命军。新成立的赤军，其中一半以上是工人和农民。工农革命军的连排长和营长大多数是能够使用枪械的普通工人。反动的雇佣军队方法，完全取消，代以志愿兵的制度，军队的一切需要，完全用集体供

给的方法（衣食住等等）。苏维埃政府存在期间，从兵士到最高长官都没有支饷，而只领取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征发资本家的种种物品食粮。新组织的赤军很快的便能有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纪律，因为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组织习性本来非常之好。广州的工人阶级，在革命军官同志的指导及兵士同志的帮助之下，开始学习军事，不但学着打枪，并且学着使用最近代的军事机械，如机关枪、铁甲汽车、迫击炮等。就是在最紧急的战事期间，赤军的每一部分之中，都进行极紧张的政治宣传工作，文字的口头的实验的都有，所以每一个赤军兵士都知道他为着什么而作战。甚至于在军事俘虏——解除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之中，也认真的做了宣传鼓动工作。因此有几百兵士和几个军官，自愿的加入赤军，努力的为革命而作战，一直到最后，他们之中并没有听见背叛革命的事实。

苏维埃政府因为反动派顽强的抵抗，不得不极严厉的镇压白党（国民党民团等）。苏维埃政府设立之肃清反动委员会，为歼灭反革命派、工贼、走狗、奸细等的机关。工人表现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努力歼灭并逮捕著名的剥削者、反动派、警察、奸细、走狗、工贼、官僚、反革命派国民党的军官。苏维埃政府尽他所有的力量去消灭资产阶级军阀的机关，毁灭警察，彻底扫除国民党在广州的军队。他围攻中央银行而占领了他——这是以前资本家的经济巢穴，他占领许多小银行征发许多金钱，为革命军事之用。长堤方面反动派极顽强的抵抗，革命区域中某几处街道也有些反革命巢穴顽抗不降。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几次要求他们投降，而得不到答复之后，决定无情的焚毁这些房屋，以免赤军方面肉搏的牺牲加大。

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

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

广州苏维埃政府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解除国民党在广州的一切党部，没收其财产，宣布通缉国民党领袖，一般劳动民众得以随处逮捕，就地正法，不论左派右派一律如此；并发布命令宣布国民党政府人员的死刑，严加通缉。

同时，苏维埃存在期间，实现了真正平民的完全民权主义，及革命的平民工农兵之完全的政治自由。

广州苏维埃的历史，自始至终充满了最高度的英勇热烈毫不犹豫退缩的精神，充分表现无产阶级群众深切的阶级意识和积极的群众行动。

苏维埃的每一举动：他的发展，他的政策之实行，他的武装斗争，一直到他的失败，始终是受几千万群众的拥护和一般贫苦民众的同情。

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中国共产青年团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青年，以及无产阶级妇女之革命行动的积极，暴动以前及以后都是如此。女共产党员和女工也加入赤军作战。军队供给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女工担任，他们帮助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传递消息机关，制造军用的材料旗帜，帮助运输工作，实行极广大的群众政治宣传，看护受伤的革命兵士和工人。苏维埃政府失败之后，有许多女工和普通妇女，因此而被白党所残杀。

（八）苏维埃政府的政策

暴动胜利之后，在占领城市与释放政治犯的时候，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指挥作战，一面苏维埃政府平民行政委员会立刻便进行实现工人阶级及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反对剥削者的复

辟。苏维埃政府就在新出版的《红旗日报》上，公布许多命令，他的内容便是完全实现暴动的口号：

对于工人阶级，便是公布命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手工小企业的工人也规定工作时间，恢复并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

对于农民便是公布命令，宣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杀尽一切地主豪绅，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一切田界，各村各区即日成立苏维埃政权。同时通电全广东及全中国，说广州苏维埃政府当以全力保障海陆丰的革命胜利，批准海丰的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并选任海陆丰暴动领袖彭湃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之农业委员长；号召一般农民以海陆丰为模范，武装起来，组织准备自己的力量发动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及工农革命军。

对于一般劳动民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则公布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对于贫民取消一切税捐，取消一切债务（尤其是新年的债务），对于贫民则更取消一切房租——全市房屋归市有，没收一切当铺，将贫民的质物无价发还。

对于兵士，则宣布国有的土地分给兵士失业人民自由耕种，各军部队之中组织兵士委员会；组织工农革命军。

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之下的工会为唯一工会组织，一切种种反动工会完全解散，他们的会员应当加入革命的赤色工会，资本家的走狗工贼组织（国民党的所谓工会等等）——白色工会的指导者和委员，应加通缉就地正法。广州苏维埃政府对于一般民众说明：白色工会中的真正工人会员也是被剥削者，我们应当亲密的提携他们，团结全体无产阶级来拥护苏维埃政府。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政策，极广泛的促起平民群众的觉悟，很快的增进阶级意识的发展，普及对于暴动的社会意义之认识，团结广大的群众，来誓死拥护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不但工农兵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城市的贫民，见着苏维埃政府的这些命令，都公开的来赞助苏维埃政府。赤军和白军剧烈作战的时候，工人群众热烈的参加，但是不大会装置障碍物，有一个地方的救火队员，自动的开出救火汽车以为赤军的屏障。满街都挂红旗，好几千普通市民挂起红星标帜，赞助苏维埃政府种种的工作。居民之中谁也没有帮助白党作战——只有法西斯蒂的机器工会是例外。一般积极的群众完全站在苏维埃方面，广州在这三天之内，真正是赤色的苏维埃的广州。

（九）广州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

虽然广州苏维埃政府实行直接的革命政策，虽然得着广大群众的赞助，虽然极勇敢的保卫革命的胜利，然而在三天三夜英勇的斗争之后，广州的苏维埃政府终究被敌人所摧残了。简单的说来，广州苏维埃政府失败的原因约有底下几点：

一、反动军队的数量很多，他们立刻调动三师人，从北方、西方、南方三面进攻赤色的广州；开始炮击广州的是海军军舰，于是河南的反革命军队得以渡河，而且调动武装很整齐的民团加入攻战。

二、赤军的大多数是工农，他们在军事上没有经验。许多工人苦力都是暴动之后才第一次开始练习放枪的。因为没有训练好的专门家，所以只有一部分机关枪能够使用。因为没有相当数量的炮兵，所以夺来的二十五尊炮，只能使用四五尊。再

则，工人没有知道巷战时架筑障碍物的必要。

三、各派军阀在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联合起来，拼死命的用一切方法来扑灭他们所痛恨的苏维埃政权。

四、帝国主义的列强帮助白色国民党的军阀，他们用尽了种种的方法。他们用许多军舰来反对赤色的广州。日本水兵在长堤登岸，开枪射击赤军，因此长堤的反革命军队更难肃清，使赤军费了一天的工夫，没有能把全力去抵御别方面进攻的白军。

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救出许多的反动派和豪绅资本家，运他们到河南或香港，使他们能从容集中力量来对付广州的革命。英国军舰“Moreon”及美国军舰“Sacramento”也派陆战队登岸。

中国的反革命军舰，完全靠着英美日法海军的掩护，而能运送白军，轰击广州，英国海军包围革命的海员加以逮捕。英国商船公开的运载白军。于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之下得以渡过河攻击赤军。

这些客观的失败原因之外，革命的指导机关主观上也有些缺点和错误：

（一）暴动很迅速的胜利之后，在军事的观点上看来，革命军事委员会费了太多的时间于肃清长堤反革命巢穴以及市内反动派的机关，而没有一开始便举行对于市外反革命军事中心的进攻，就是没有很快的进攻河南、黄埔以及石龙，以便与农民暴动区域相联结（海陆丰离广州有六天路程，经过石龙可以相联络），又因为占领东山太迟了些，而东山是广州的贵族区域，国民党的反动领袖大半住在那里，所以反革命的军阀及政客都没有能捉到，再则指挥作战的某同志，表现得非常之弱，非常之迟疑，后来弄得省委不能不撤换他。

（二）从外县来进攻广州的白色军队中的兵士，很少动摇的现象，很少很少转移到革命方面来的。这些白色军队居然很坚决的反对赤色的广州。这里看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最久的弱点——就是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非常之不充分。

（三）反动派在胜利之后，居然能调动一千个武装机器工会会员，来做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本党从前的工作之中，实在对于机器工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充分的去宣传吸引他们，使他们脱离那些法西斯蒂的首领。

（四）虽然暴动时候立刻有几千农民群众加入，他们有许多参加赤军的组织，参加革命的斗争，对于苏维埃政权有非常宝贵的赞助，然而没有能在广州市内暴动期间，立刻发动几十万市郊农民的暴动。这就表明党与农村的关系还不密切，农村之中简直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之中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

（五）因为赤军围攻中央银行中的白军的时候，不得不放火烧毁仓库，于是没收的几百万元，都没有能取出使用。

（六）敌军围攻广州的时候，赤军突围而退的行动，没有充分的规划。工农革命军的兵士，虽然能够很整齐很振作的退出，打破很多敌人包围，而退到革命的农民区域里去，然而工人武装队却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参加这种有计划的退却。

广州苏维埃，在光荣英勇的战斗之后，在努力反抗国内国外联合的反革命势力的战斗之后，竟失败了。可是无产阶级的暴动始终创造了苏维埃政府和赤军，最后还能实行有规划的退却：勇猛的攻打敌人的包围，而退到农民暴动的区域中去。

（十）共产党的策略

上述的许多缺点和错误无论是怎样严重，可是广州暴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上，实在有极伟大的政治上历史上的意义和成绩。

这次胜利的暴动的基础，无疑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历来政策之正确。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广州第一次起来夺取政权，这不是偶然的。广州是中国国民革命最初集聚力量的发源地，几百万被压迫的群众加入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也最深入最广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还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这些前一时期的政策给共产党以许多可能，得以公开的深入农民群众，促起农民的觉悟，领导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组织他们，训练他们，造成强大工会，创立农民协会，渗入军队里去，影响城市平民一部分好的成分，以及智识阶级，公开的传布布尔塞维克的思想。

广州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儿的说起来，实在也是这前一时期革命之中几年以来准备工作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说来，广州经验是共产国际前一期政策之正确的事实上的证据。这亦就是完全证明苏联共产党中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政策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同时，广州的经验也就对于中国共产党内过去抵抗共产国际策略的机会主义的余毒，给以致命的打击。就是八七会议之后，过去许多机会主义的成见，软弱懦怯和幻想，在这一次广州暴动之中，一点也没有了。这次在广州，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对于国民党的犹豫，对于暴动的畏缩；工农方面也没有表现不信任的态度，他们都是坚决的赞成革命的口号。广州暴动之

中有四个的主要要点：

一、本党考察当时国民党中两派的斗争、两系军阀的混战，确有双方削弱的趋势，能够认清并运用这一个时机，提出唯一革命的“第三力量”——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贫民群众，起来实行暴动夺取政权。

二、以前许多次暴动潮流之中，工农兵士的力量，各自不相联结，因而往往被压迫下去；这次广州的暴动之中，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三种革命力量能够很好联合起来，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和兵士暴动化而为一。

三、共产党在暴动之前，以及建立苏维埃之后，不但是能调动一切党员群众的力量，而且能调动一般党外的工农兵士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口号。

四、共产党对于暴动，真能像艺术一样，很有系统很细心的组织他，注意一切现有的条件，建立自己的政策于正确的估计各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估计一般的政治形势及当地的政治形势。

（十一）夺取一省政权的问题

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屡次企图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之上，但是中国之物质基础及其基本动力异常落后，在资产阶级脱离民众之后仍然是野蛮落后，自行崩溃。国民党此种腐败统治的基础本具有亚洲专制主义的特性，其政治现象之残苛剥削方法，仍然是“剥夺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任情破坏”。

现代西欧帝国主义正在很巧妙的利用这些方法把一切被剥削者钳制于自己掌握之中任意剥削（白色工会，法西斯蒂的组

织，精巧的欺骗民众，精致的警察技艺等）。中国及其他亚洲专制主义之下不能建筑真正巩固的政权及有组织的集中的行政机关，正是他的特性之一种。这些条件既已使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统一中国的企图通成妄想，则中国革命阶级便尽有可能于全国工农革命胜利之前，在几个较大的区域之内搏得工农暴动的胜利，建设苏维埃政权，继而保障其胜利，更进而扩大争斗使此政权扩展到其他区域以及整个四百兆人口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在相当具备的条件之下，在有二千万或四千万人口的省份之中，领导民众起来，夺取一省或几省，在暴动之后组织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使革命扩张于全中国。

广州暴动之客观目的显然不只限于在广州胜利便算了事，而在于推翻剥削阶级，建设广东全省的苏维埃政权。本党早已知道此种任务异常困难，但是终究如此决定者，正因为具有下列无可迟疑的具体根据：海陆丰有四十万农民的暴动，广东其他各县农民运动高涨，一般社会秩序异常紊乱，假使广州苏维埃政权能够保持较长，则运用此百万人口的赤色城市之政治物质力量，便能使苏维埃政权极形巩固。

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党的任务依旧是可以在一省或数省之中，领导工农兵群众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当坐待全国革命之最后胜利。

全国各部分局部的革命暴动要求共产党起而为全国被压迫民众的领导者，在暴动有些微可能的地方若用尽全力与以最积极的发动，便能使其成为暴动斗争的中心。

与广州暴动同时，在各地发生过许多重要的骚动，如上海之电车工人罢工、湖南之农民革命、长沙农民占据车站等。不过，虽有这许多事实，现时除却宣传鼓动而外，并没有任何行动上的对于广州暴动之赞助。

（十二）广州暴动之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

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虽然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牺牲了许多英勇的同志，而广州苏维埃的政治结果永远会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广州暴动政治结果如下：

一、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及受列强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双层剥削的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把压迫者及剥削者的统治推翻了，建设起自己的政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保持了三天，而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不是纸上具文，而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东方民众的伟大的力量与何种政权真正能解放他们。广州工农兵用自己的力量所争得的政权，告诉全中国每个工人、每个苦力、每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与被压迫的兵士说：假使你们想胜利，你们必须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奋斗。

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在一切困难争斗之中，勇往直前，俨然为一般争斗群众公认的先锋队。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国民党资产阶级之叛变引起了谁能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广州暴动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确实的答复：在苏维埃旗帜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便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上海无产阶级的三月暴动还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同盟的时候。现在广州工人暴动，则已经是在反对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之中，第一次博得胜利。参加广州暴动的无产阶级不顾生命的牺牲，表现出他们异常英勇的精神；他们在广州建设了苏维埃

政权，保持了三天之久，表现出他们伟大的政治军事力量，表示出他们在目前中国社会之中，真正是最富有独立性、最勇敢、最先进的阶级。

三、广州暴动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结为亲密的革命联盟。成千成万的农民暴动，以前都仰望城市工人群众的帮助，现在已经成为工人暴动有力的响应者。在工人暴动的怒涛之中转入了农民战争与兵士倒戈的巨波；在这一夺取政权的暴动之无产阶级确能领导起农民和兵士的力量。广州苏维埃的信用散布到全省最落后的一隅，传布到每个乡村，告诉每个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得到土地。

四、广州保卫团的兵士宣布不再作军阀战争的工具去蹂躏民众，破坏了反动军队的纪律，倒戈向资产阶级军阀进攻，在灿烂光明的苏维埃旗帜之下，走向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五、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暴动之中，的确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及无产阶级领导民族革命的主力军。本党引起了暴动，领导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指导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自始至终尽力保障苏维埃政权。党将一切白色恐怖给与的困难危险都负担起来。共产党在广州公布了苏维埃政权的政纲使其见诸实行，救助了工农民众，发展了中国革命，都是历史上莫大的功绩。

六、资产阶级与其国民党此次把他们的丑态毕露于全国，他们自就衰颓，他们是喋血的叛逆者，他们是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的死敌。

七、任何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任何复辟后的资本家与军阀的报复，任何屠杀上海与广州工人的企图，任何一派的刽子手，都不能把广州暴动这些简明而不可消灭的结果掩没起来。在热烈的战争之中，在无情的火焰之下，巩固的革命队伍受工

人阶级来领导，要在苏维埃旗帜之下，高喊着共产党的口号，奋勇直前与敌人决战。他们永远不至于磨灭。

（十三）广州暴动之国际意义

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奋斗自始至终成为国际阶级斗争之一幕。广州暴动之胜利预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之胜利。领导暴动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部分。指导暴动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支部之一。工农兵群众之夺取政权，不独反对国内的剥削阶级，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广州暴动已决定领导革命民众直接反对国际财政资本在殖民地之统治，苏维埃政权的政纲之主要一点，便是“与苏联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第一次宣言之中已经向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请求帮助。

帝国主义者对于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出现极为仇视。列强的驻粤领事都公开的帮助中国反动派，派船替他们运兵，以便进攻广州。英国在华出版的报纸鼓吹扑灭苏维埃的广州。

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残酷的白色恐怖之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指使者仍旧在香港与沙面之内。

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不知羞的完全降服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广州暴动之后不特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参谋部，而且是帝国主义的直接争斗机关。帝国主义希望得国民党之帮助，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国民党因为英帝国主义者帮助他镇压下了苏维埃的广州，便向英帝国主义者供献下列的报酬：无人道的枪决苏联广州领事馆之馆员，逮捕所有在广州之苏联国民，与苏联断绝国交，凡是在国民党地域之内的苏联驻华领事馆及商业机关一概撤销承认，驱逐出境，苏联政府

在中国所有之权利概被撤销。这些行动完全与张作霖一样。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在工农革命第一次露面之时，便破坏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而在广州暴动之后，更完全的投降了帝国主义。苏联是他们主要的仇敌，因为苏联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

为使叛徒们之屠杀有所借口，英国报纸大大的鼓吹，说苏联驻华领事馆馆员曾经指导暴动，发枪械给暴动群众。这真是天外奇谈，谣言惑众。苏联驻华领事馆正自知其外交官的地位，所有领事馆馆员不独未曾参加暴动，并且未曾参加广州苏维埃政府之任何行动。反动的国民党帮着英人的谣传，把广州苏联领事馆馆员及其家属尽行枪决，这不过因为他们是全世界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国家之代表。苏联领事馆馆员饮白色军官之枪弹，在镰刀斧头红旗之下慷慨而死，与他们同死的还有数千广州的工人与农民。他们是中国工农革命的死难者。中国民众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并且永远的纪念着几千死难的广州苏维埃的英雄。

（十四）中国革命之前途

最近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之总括的估计和观察，在广州暴动之后仍旧是正确的。

广州暴动的主要意义，自然不在于他们所创立的苏维埃政府只存在了三天，而是在于工农革命热烈的高潮与高度的成熟已经明显的固定。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最终破裂之后，开始了一个一切革命势力改组而变更其结合形势之很深的过程。共产国际估定这一时期是革命进于新的更高阶段之过渡时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一

日的南昌暴动，叶贺军队的南征，秋季以来各省的农民暴动和罢工潮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变更结合形势，及其指导机关之改组，凡此一切都是这一过渡时期的继续。广州暴动便结束了这一过程。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势，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独裁革命，这苏维埃革命又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最近将来的任务，而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成为实际的事实了。继续发展这一已经开始的事业，并加以领导——应当是现在政治前途之中心任务。

广州暴动之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稳定已经只有极小的前途，如今广州暴动之后，这种稳定的前途不但不增加，而且更要无限的减少。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府没有任何政纲和任何政治手段，只有实行杀戮成千累万工农的大屠杀政策，压迫一切种种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实际上与苏联宣战。一切种种反动派结合起来反对广州暴动的联合战线，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立刻解体，立刻分裂成许多派别，立刻开始互相冲突。现在看不见丝毫资产阶级军阀内部一致的现象，更不要说要在他们领导之下统一中国是万不可能的了。

中国的南方北方，四处都是军阀战争，白色恐怖，混乱纠纷。铁路航路大道海道，都是日益阻隔危险；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日益停滞；财政经济及货币流通，都是日益破坏，国内工业的很小的基础正在崩坏，以前所有一些工商各业之间的联系也在解体纷崩。每一件这种事实，都是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稳固没有丝毫极初步的前提。

同时，北方军阀与国民党军阀双方都在更加勾结帝国主义，更加要想绝对的剥削工农，自然要引起全国伟大的工农革命，革命已进于更高的阶段而日益卷入更广大的民众。国际革

命的形势，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又是赞助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力量，此外还有强固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苏联。而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矛盾又正在发展。

中国的总形势，仍旧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阶级斗争的剧烈非常之厉害。暴动的问题，在相当条件之下及有最小限度的准备——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都已经是目前工农革命中的实际问题。

一切暴动都应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不独工业城市之中应由工人代表会议、革命兵士委员会、市郊农民团体的代表会（苏维埃）为暴动的指导机关，就是农村之中的暴动，只要有广大群众的发动，也要组织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起来做暴动的指导机关。

（十五）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党的口号应当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中国共产党努力执行八七会议与十一月会议的决议时，应当以最大限度的力量注意下列的主要任务：

一、对于广州暴动之政治意义及经验，在一切党部及群众之中作各方面的详尽的广大的宣传。对于海陆丰农民暴动及广州工农兵暴动的经过与教训，作极广大的宣传。公布这些暴动的一切材料和文件。立即散布关于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暴动及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的机关报、杂志、传单、宣言、通告之中运用广州及海陆丰暴动的材料。

二、中国共产党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也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一切共产主义者密切的团结，铁一般的巩固自己的组

织，创造强有力的共产党，便能随时执行自己领导暴动及建立苏维埃政权之任务。任何妨碍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统一和团结之行动，在现时简直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罪恶。

现时所剩余的机会主义的遗毒和表面上革命的盲动主义，应当坚决迅速的扫除。党内的民主主义（选举党部机关，报告消息的普遍，政策在广大的党内群众中讨论等等），应当尽可能的扩大实行——只要在现在这种严重压迫之下是可能的。党应当立刻扩大自己的组织，立刻举行“广州暴动纪念征求期”——征求群众加入我党：使六个月内增加二万新党员，其中须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人，百分之三十的农民。

三、中国共产党应当十倍于前的努力于建立赤色工会；这次赤色工会在广州暴动之中对于组织工人阶级的作用，非常之伟大。此后应当更加努力使党部与工会在组织上分化，不相混合。应当要吸引有力的党外工人，使他们担负工会的指导工作。实行加紧工人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布尔塞维克式的结合工人阶级的部分要求与革命的主要任务。要能运用微细审定的罢工战术，估计一切力量及环境，当实行领导日常部分的斗争到群众的胜利的罢工，以免无计划的散乱的不顾环境枉然牺牲的罢工。要能切实引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到总的政治反抗的斗争。这就是总同盟罢工的口号，以准备群众，开展群众的斗争力量——而达到进于暴动的局面。

继续严厉的反对法西斯蒂的官办白色工会中的走狗工贼官僚。同时实行工人的联合战线的政策，就是联合一切工人群众实行反对资本家，不问他们是否暂时在白色工会之下（这决不是和这些白色工会机关联合），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会代表会议、总工会，发行工会的机关报宣传品；如在大城市之中尤其要组织工人纠察队。努力实行组织和动员失业工人及苦力之工

作。

四、因为在中国，尤其在广州、上海、汉口，都是极严重的白色恐怖，因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灭中国共产党，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杀戮几千几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所以无产阶级斗争的将来，就完全要靠共产党能用精悍的革命的方法，保护党和工会的组织，保存他们的干部，扩大他们的干部，继续实行严格的秘密的组织。

五、中国现在组织伟大的胜利的农民暴动之客观条件都有。组织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于彻底的土地革命口号之下，这在具备相当条件时，已是直接的实际问题。

海陆丰农民的苏维埃政权，他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仍在继续自己英勇的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之丰富的材料，他的胜利，他的经验，应当充分的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暴动进行的方法和兵士群众的结合，歼灭地主豪绅的果断，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苏维埃政策的实行，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各区各村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游击战争的经验，保障革命地域的英勇斗争）。

一切农民暴动都要在苏维埃的口号和旗帜之下进行，暴动初起可以由革命委员会指导。一有群众的基础和广大的地域，苏维埃便应当组织起来为暴动的指挥机关。

大城市四郊的农民中工作，应当特别注意。

实际举行农民暴动的时候，应当依广州暴动的经验，切实估计各派军阀的冲突和战争，尤其是他们双方互相削弱的形势，他们军力的进退及其相对关系，而利用相当的时机。

我们的一切政策，都应当注意到各地斗争中心的互相联系，都应当注意到工人斗争与农民暴动及兵士暴动的联合。

为实行这些政策起见，必须到处组织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支

部；在主要省份之中，养成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干部，吸引党外的农民领袖，建立农民团体的基础；联络城市工人及农民的关系（农民中扩大党的组织，派遣工人到农村中去宣布，工人组织代表团到农村中去，农民代表到城市中与工人联络）。

六、中国共产党应当立刻纠正以前轻视兵士运动的错误；应在一切反动军阀中进行积极的宣传，组织他们，使他们的群众和革命的劳动民众联络，使兵士站到工农方面来。积极的宣传，“土地归农民兵士”口号，提出兵士的军纪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组织兵士委员会，以反对反动政治，要求监督军费的开支。组织军队中的共产党兵士支部。在兵士之中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说明广州暴动之意义，广州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之意义，兵士在暴动的作用，工农革命军（赤军）的意义，海陆丰工农兵政权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目的等等。在兵士之中揭发资产阶级军阀的罪恶，国民党的欺骗兵士，把兵士当做炮灰等。吸引纯洁的革命的下级士官。

七、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在最初国民党叛党的时候，依附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如今他们只是受着战争恐怖穷困，而且对于腐化的国民党日益失望，他们就开始动摇到革命方面来。广州暴动之中，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智识界以及革命的军官，都赞助苏维埃政府。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下，经济上政治上都能取得小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因为农民的实力增加，海陆丰一带县城和乡村之间的贸易兴盛起来，甚至于中等资产阶级也中立了。汉口武胜门纱厂罢工的斗争中，学生有许多武装的赞助工人斗争，反对白色的工会官僚。

所以这些事实，都表明须要赶紧实际上去吸引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及智识阶级到革命运动之中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这亦是运用广州苏维埃的经

验：抗税抗捐，不还债，不付房租，没收当铺，银行国有，取消厘金，抵制帝国主义的货物……

八、实行极严厉的反对军阀的强盗战争，须调动一切力量，以求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这就是工农兵士暴动的胜利。所以宣传要求和平的口号，必须说明只有苏维埃政权成立而且统一中国，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要实行革命的反军阀战争之斗争，便要努力执行"失败主义"的政策——就是各地鼓动民众起来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这一口号通用于普遍的一般国民党各派的战争和国民党军阀与北方军阀的战争。我党绝对的拒绝与任何一派白党的军阀联盟和其他勾结利用的政策。我党在这一问题之上，不许有任何的犹豫动摇。

我党各地党部都应当以广州暴动为模范，经常的有规划的进行利用军阀战争——各派屠杀工农刽子手的战争，而最大限度的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力量。

九、国民党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民族问题不但不丧失了意义，而且比以前一时期更有严重的意义。力争完全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斗争，仍旧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种革命已经发展到最高程度。我党改变政策的头几个月之中，因为国内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非常之严重，所以一般政策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注意得不甚充分。列强帝国主义干涉苏维埃的广州，国民党则决然的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助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实际上的完全殖民地，这些事实现在更加使中国工农革命中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成为中心的问题。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就是反对强盗式的列强财政资本及其反革命的走狗。根据过去时期的一般历史的发展，很明显的是：要完全解放中国于列强掠夺奴隶制度之下，要解放中国

于国内各种属性的军阀统治之下，要真正统一中国，便必须中国平民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要解决这些任务，同时也必须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亲密的结合，与各国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我党必须发动群众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而使民众新的革命高潮有他自己的民族革命的政纲——对外的要求：归还一切割据地、租借地、租界，撤退列强驻华的海陆军，解散帝国主义的巡捕包探，没收帝国主列强在华的一切公司、工厂、银行、矿山、铁路、轮船等，禁止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学校教会，并没收其一切财产地产，立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赔款外债率息，关税完全自主，海关、税务、监务、邮政等的管理权立刻完全收回，立刻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立刻退出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

我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奸细，不使帝国主义有任何可能开始新的干涉和屠杀。

反对背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军阀与反对老牌卖国的北方军阀之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直接的一部分。

十、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苏维埃时期，比在国民党时候更加要百倍千倍的加紧与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结合巩固的联盟。这一事实应当在党的每次行动之中特别的注重。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声望，在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之中，更加增高起来。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越是无耻大胆的反对苏联及第三国际，劳动民众越是要拥护他们。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绝交，驱逐苏联的商业机关，杀戮苏联副领事于广州，中国几万万的劳动民众是要严重的反抗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这种反抗运动。中国共产党郑重的宣告于全世界：将来中国苏维埃政府的第一

步政策，就是与苏联结合巩固的革命联盟，而严厉的惩办杀死苏联国家代表的凶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

瞿　秋　白

本报第十一期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说："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篇社论没有经过编辑部主任看过。他的意义，用来解释世界革命中直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苏维埃政权，一般的是对的。但是，论到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那便不正确了。广州暴动在事实上组织起中国的苏维埃政府，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注意研究的。我们认为必须郑重说明中国现时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一

中国革命在广州暴动之后，的确进到更高的阶段，他已经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国民革命，而是工农群众的苏

* 这是瞿秋白为批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而写的，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十四期。那篇社论是当时在该刊任编辑的郑超麟写的。

维埃革命，这一革命是要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这苏维埃革命就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

苏维埃政府的意义是什么？

苏维埃政府，便是革命的民众自己选举出代表，组织代表会议，做一般群众斗争的指导机关。革命的高潮之中，这种苏维埃组织起来，必然要成为暴动的指导机关；暴动胜利之后他便成革命的政权机关。

广州暴动中的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是如此，现在正在奋斗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也是如此。所以苏维埃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中，最主要的意义是“革命群众的斗争指导机关”。但在革命胜利之后，生长而成革命的国家政权，具有一定的特殊的组织方式，与一般资产阶级式的国会是绝不相同的。

这种政权形式是否必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呢？

苏维埃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如果能组织起来，那就必然要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一、这种国家之中要组织苏维埃必须有下列三个条件：“（甲）一般工人、女工、兵士及普通劳动人民之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乙）经济政治的危机已经非常之剧烈，使政权开始从旧政府手中滑出来；（丙）而且在极多部分工人之中，首先是共产党之中，开始坚决的有系统有规划的争取政权之决心，已经成熟。”（见共产国际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之《什么时候及怎样的条件之下可以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议决案）二、这些条件之下而有苏维埃的组织，那就必须进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使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否则苏维埃或者是失败而被解散，或者是成为“变种的”苏维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或者有苏维埃，那就要建立起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权，或者是没有革命形势，那就根本不能组织苏维埃。

可是资本主义前期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上，是否可以组织苏维埃呢？是否这种苏维埃一开始是无产阶级独裁制呢？这一问题对于现在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说："一切民族主义的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因为落后的国家中的主要群众是农民，而农民却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之代表。"列宁又说："在半封建制度束缚之下的农民亦能很好的接受苏维埃组织的意义，而且在实际上去实行这种组织。一般被压迫的民众，不但受商业资本的剥削，并且受封建诸侯及封建式国家的剥削，能够运用这一工具，运用这种组织于他们自己的环境之中，这是很明显的。"如今中国苏维埃的组成于广州，尤其是在海陆丰，很明确的更加证实列宁所说的话。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既然已经从联合资产阶级的阶段进于反对资产阶级的阶段，中国的革命可以，并且必须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中国可以建立苏维埃。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条件，在一般农民暴动以及城市暴动中组织苏维埃的条件，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地方一样，就是必须有群众的革命高潮，必须统治权已经在治者阶级手中动摇起来，必须群众的先锋，群众的先进分子已经有争取政权的决心。所不同的，不过是在中国现时的革命中，所指的群众，除大城市中是工人外，对于一切农村外县，是指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及一般贫民而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或者有苏维埃，那就要建立起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或者是没有直接的暴动形势，那就还不能组织苏维埃。中国的苏维埃也是不能和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和平的并存的。这和纯粹社会主义革命之中，例如英国的苏维埃不能和英国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并存，是一样的。

既然如此，我们便可知道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

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必定是政权性质的组织，而不能是普通的群众组织。

二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何以还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

中国革命的发展，虽然已经到了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阶段，但是他的客观上的任务还有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中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并不仅是因为他曾经经过国民党的阶段，并不是因为在前一时期工农曾经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可以说：国民革命的时期过去，中国革命便已经变成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中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根本就是肃清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之代表”。现时农民的要求，如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土地给农民，以及一般兵士、贫民的要求，如没收豪富救济贫民（劫富济贫），分配土地给兵士等等，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是最彻底的最激进的民权主义的要求。甚至于土地国有的要求，单独的讲起来，也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例如列宁关于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对于土地问题党纲的解释）。如今中国农民暴动的怒潮之中，很明显的，革命中极广大的群众是这些农民、贫民、兵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革命，是现时革命之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肃清一切种种资

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极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的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镇压一切种种帝国主义走狗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等反动派的独裁政权。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意义。

中国现时苏维埃政权开始成立的时候，在极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地方，很明显的，主要的急切的任务是肃清豪绅地主的权力，没收一切土地，摧毁一切封建式的旧关系，甚至于部分的会开辟些资产阶级式的，就是自由贸易的发展（例如海陆丰农民暴动胜利之后，城乡的贸易大兴盛起来）。这种各县各省的工农兵暴动，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初步胜利的时候，客观上自然不会一开始便有直接的社会主义任务。所以也就不能说，中国现时的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权形式，因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独裁。必须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或者极大的范围以内胜利，有着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然后中国革命才从这一苏维埃的工农革命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现时这一革命的完全胜利，将要是民权革命的结束，亦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坚决斗争的开始。……当事实上已经不仅是革命，而且已经是革命之完全胜利，那时，我们便要以‘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独裁’的口号，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民权主义独裁’的口号。”（借用列宁所著的《两个策略》上的话）

中国革命，可以说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之模范。亦就是所谓“由民权主义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模范。中国现时的革命明确的证明：一般封建制度之下农民和劳苦民众，虽然不是无产阶级，却能很简单明了的了解苏维埃

之意义，而去实行建设他。苏维埃的红旗，已经成为全中国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不但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之旗帜。中国的苏维埃也就将要由这种普通劳动的民权独裁制生长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政权形式；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瞿秋白选集》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一、中央自从叶贺[1]失败之后，便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确定中国革命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直接革命的形势表现于：（一）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北方军阀的统治动摇而不能稳定，他们内部的纠纷冲突和混战日益发展；（二）民众革命的势力仍在日益生长——各省农村之中尤其有不断的自发的农民骚动；（三）各省的工商、农业、金融、交通在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不断的紊乱崩溃，形成全国经济的总危机，客观上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出路。

二、最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事实上更加证明了中央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同时，广州暴动更证明了中央扩大会议及中央常委历次对于各地党部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暴动问题必须发动群众之指示，是异常之重要的。广州暴动的胜利，主要是能发动群众，造成工农兵三大力量之结合；他的失败，主要的也是发动群众之尚不充分。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七期。

三、中央扩大会议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性；（二）努力使相互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广州暴动便是这种策略运用的尝试：海陆丰农民暴动的胜利与组织力量的表现，其他各县及广州市郊农民发动的尝试，以及广州斗争的发动与农民兵士暴动的联络。固然，广州暴动之中还有许多策略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的政治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他在策略上证实中央政策的正确。

四、广州暴动虽然失败，而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更加的明显，武装暴动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的问题。所以对于武装暴动的政策尤其应当有明确观念。根据过去的经验，各地党部在指导暴动或规划暴动的时候，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例如：

（一）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偏于军事投机主义，这就是只规划军事的力量，计划着如何调动某某部队、某某农军、某某工农讨逆军，勾结某某土匪首领的部队，组织几队几队的游击队，如此用阴谋式的计划发动“暴动”。这种所谓暴动完全与群众无关。例如湖南去年秋收暴动之中，北方玉田暴动之中，江苏去年十一月宜兴无锡暴动之中，江西鄱阳星子暴动之中，都只见军事力量的发动。尤其是去年鄂北暴动的规划之中，居然有联络农民所反对的樊钟秀之计划，而没有发动和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而达到武装暴动之计划。

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采取等待政策，这就是不相信农民群众的斗争和兵士群众的运动，可以从部分的斗争发展成总的革命高潮，可以从极少的武装力量，创造出群众的武装力量，因此只在幻想着全省定期的总暴动时，如何一致的同

时同刻的发动，或者先先后后用巧妙的战术步骤来逐地发动；于是采取等待政策，对于各地群众当时自发的斗争，反而不去领导。例如广州秋收暴动时等待叶贺，河南雒山四方山已有农民自发的斗争而不去领导，尽在等待全省总暴动之时期。

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甚至已经有了很大的群众起来暴动，到了最吃紧的时机，仍旧临阵脱逃。这就是在暴动起来之后，一切规划仍旧完全建筑在军事力量的估计上，不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不去领导群众向前进攻，而只根据于兵力不足的理由，骤然制止群众的前进，骤然去解散群众的队伍。如鄂南秋暴期间进攻蒲圻咸宁的停止，湖南秋暴期间暴动势力已从浏醴发展到株洲，而长沙九月十三日的暴动期却宣告无期延期。

凡是这种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都是根源于不信任群众的力量。这些倾向的背景，便是想象在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用阴谋政变的方法，推翻反动政治而替群众来立一个好政府。所以始终不和群众的斗争联结起来，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指导者，却只是这种军事力量的指导者，一切进退攻守联甲攻乙的计划，完全以这种群众以外的力量为标准。

（二）不顾群众力量——因为不顾到群众的力量，所以也是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去领导群众目前的斗争以求创造暴动的局面，而只是主观上认为“不暴动即是机会主义”，无往而不暴动，天天可以马上暴动，时时可以马上暴动，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亦都称之谓暴动，于是又成为“无动不暴”的倾向。湖北党及 C. Y. 一部分同志在十月底主张马上暴动；山东省委对于淄博矿工罢工的指导也称暴动等类，都

是这种实例。

因为顾不到群众的力量，所以在群众斗争并未发动到大规模的革命高潮，不但党的群众尚未普遍的自觉的要求夺取政权，甚至党内自身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都很薄弱的时候，立刻便号召“暴动已经实实在在的到来了”，立刻便发出“大暴动”命令。这就形成玩弄暴动的倾向。北方局在实际上只是勾结热河土匪，北京城内只有一千多学生同志，唐山天津都未能切实发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天津党的组织只有一百余人），那时便决定顺直的“大暴动”；江苏省委，在去年十一月间上海杨树浦纱厂罢工之扩大尚须少数工人持硬打方能成功的时候，却在号召全上海说“暴动实实在在已经到来”，便是这种实例。

凡是这种“无动不暴”、“玩弄暴动”的倾向，其根源都在不顾群众的力量，就是不去切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不在日常斗争之中去步步引导群众从部分的切身的要求，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这种倾向的背景，其实也是不认识群众的力量，也是无意之中以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英雄的力量，超过群众的超人的力量，脱离了广大的群众，可以“暴动的精神”代替暴动的本身。

（三）不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因为不认明本党的根本任务，是力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实现，所以在工农自发的暴动潮流之中，以前本党大有忽略职工运动之倾向。甚至于江苏宜兴暴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以为上海的工作应当以响应外县农民为政策。

五、凡是这些错误的倾向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及最近政治局会议对于《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的议决案，以及对于各地的指示都曾经指出，并加以纠正。现在则对于暴动政策之意

义更加以确切的解释。

不信任群众力量的各种倾向之表现：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固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然而不顾群众力量的倾向的表现，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亦是机会主义之另一方式的发露。总策略之中说“要努力使零星的暴动尽可能的成为大范围的农民总暴动”，而不顾群众力量的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恰好是使暴动成为零星散乱的。总策略之中说“要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相联络”，而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倾向，恰好是不去认真的准备并发动工人群众的力量，或者将城市工人的力量当做副力。

六、武装暴动政策的主要意义：

（一）中国各省农村之中，农民自发的暴动，如潮流似的生长起来，这些自发的农民暴动的根源，自然是农民所受的种种压迫：地主豪绅的政权，地租田税杂捐等等，重利盘剥，无往不是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问题。这些问题在群众之中时常可以引起激烈的斗争，虽然有时这些斗争事实上可以开始于比较温和的方式，如要求减租减税，甚至于请愿等等，但是很快的便急转直下到剧烈的斗争，杀死收捐收债……的人，引起群众的愤怒，激起群众的直接行动，而转入武装斗争——暴动。

党的任务正在于发动这些潜伏待发的斗争，或者引导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到武装暴动，因此党在农村之中发展支部，建立秘密的农民团体等是党的经常任务，而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并领导这种斗争尤其是中心问题。

（二）农村中群众斗争发动而进于武装暴动，则游击战争便成为武装斗争的一种最初的方式。游击战争只是农村中群众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的总过程中的一种斗争方式。暴动群众既

然开始了武装斗争，则他们必须创造自己的武力；农民的武装队，他们开始袭击反革命的军队（民团团防等），要采取游击的战术。这是说暴动的农民和反革命派作战的时候，不能采取正式军队的作战方式，而用少数武装力量袭击敌人，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种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斗争中发动出来的，至少也必须是发动群众斗争的。他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的。他仅仅是群众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决不能认为游击战争便是农民暴动的全部，或者认为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

（三）农民暴动中游击战争的胜利，其目的当然在于创立革命的地域。农民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就要组织群众于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暴动的指导机关（这是此次中央扩大会议更进一步的规定）。暴动的胜利，例如游击战争的结果，能够使暴动的农民战胜反革命派于某一区域之后，那么，这地方农民代表会议便要变成革命政权的机关。这种革命区域的创立（或所谓农民割据）自然有发展其他区域的农民群众暴动的前途——以进而创立一省或几省的总暴动的局面。

（四）城市——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在这种农民暴动自发的汹涌潮流之中，自然应当成为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这是扩大会议就肯定的指示出来的。城市工人的职工运动，因此成为更加千倍重要的动力。虽然城市工人除此次暴动前之广州外，其他地方的斗争，都还没有进于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但是广州暴动后，各地资本家的进攻更加厉害，反动政府更加公开的压迫一切工人运动，所谓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工人群众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要求真正群众工会的公开，反对白色的国民党假工会的斗争，要履行以

前的罢工条件等等，这些要求，都是群众日常生活中所迫切的问题。

党的任务，便是努力在这些日常斗争之中，去发动群众，切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于革命的工会之中。从经济斗争领导到政治斗争，努力去建筑群众的基础，不但要发动汇合这些斗争到普遍的群众的愤激，转入总的政治斗争，反抗政府的总同盟罢工，而且要在日常生活斗争中逐步领导群众一般模糊的愤激与反抗，更进于坚决的夺取政权的要求。

中央扩大会议，所指示的城市暴动的条件：(1) 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工人日常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2) 治者阶级统治的动摇崩溃的形势；(3) 一般商民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同情于治者阶级的颠覆；(4) 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的组织，技术上的准备——是非常之应当注意的。在日常艰苦琐屑的工作中创造这些条件，是本党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再则城市暴动之中必须在革命的高潮达到直接暴动的形势的时候，便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为暴动的指导机关，使暴动胜利之后，他便不但成为这一城市的革命政权，而且成为这一城市附近区域以至一省的革命政权机关。

（五）再则，武装暴动——尤其是夺取省政权的总暴动之中，兵士运动是非常之重要。革命的暴动和正式战争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异点：就是正式战争之中，两方战斗者的决胜负，差不多完全依靠军力和军事技术和战略的优劣，而且战区内的居民，实际上在军事方面是中立的，没有重大作用的；革命的暴动之中便不同：(1) 革命的战斗，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队，别方面是暴动的武装力量，革命暴动的胜利，全在于反革命军队的崩溃，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兵士群众），转变成革命的武装

力量；（2）一般民众加入革命方面，所以革命暴动之中，革命的武装力量及群众的数量应当是日益增多，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是日益减少，而且一般反对反革命的民众日益积极的在政治上精神上表现他们赞助革命的力量，因此暴动之中兵士群众的倒戈是异常之重要的。本党的任务，必须要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的暴动和工农的暴动联合起来。工农暴动发动之后，还要努力于吸引敌方兵士的种种工作，以拆散反革命的武装势力。

（六）中国的兵士，极大多数是贫苦失业的工农，被雇佣而为反革命军队的兵士，他们的生活是异常的痛苦，而且现在大半是欠饷很久，受军阀的奴使虐待不堪言状。党的任务，是要在唤起他们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要号召他们及一般贫民回到乡村中去实行土地革命，去分得土地，要号召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只有工农群众的政权能够保证他们和一般贫民的生活。

（七）总之，暴动的意义是要工农兵士的日常生活的斗争，由自发的斗争进于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从零星的发动汇合而成巨大的革命高潮，使群众自觉的坚决的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进于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方式——武装暴动。武装暴动必然是夺取政权的斗争——不论政权范围的巨细（一县或几县或者一省到几省）。武装暴动必然是群众的广大的发动。列宁说，马克斯主义和白朗吉主义不同的地方，便是马克斯主义发动暴动必然有下列三个条件："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须不依据于军事阴谋，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

动摇，此其三。”

（八）然而现时同志之中，对于武装暴动政策的观念，都恰好不注意这些主要的意义。

现在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一）对于农村中的暴动差不多认为游击战争就等于农民暴动的全部，而不去积极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游击战争几乎成了脱离群众的“游击队”作战，游击队作战又几乎成了简单的杀人放火。因此不但对于县城中手工业工人店员的日常经济斗争没有充分的注意，对于他的组织不去努力创造群众的工会，对于他们的革命意识不在斗争中去发展到夺取政权的认识，甚至于对于游击战争，当地的农民群众的迫切斗争问题，也不去发动和领导，如此单纯的放火杀人的游击战争，实在可以说“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能领导农民与非阶级化的贫民，却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被非无产阶级化的游民式‘策略’所领导了。”

（二）对于夺取一省政权的总暴动，不注意切实的准备广大的群众组织的力量，不发动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领导他们创造巨大的革命高潮，使群众意识发展到自觉的要求夺取政权，而往往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这不是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是玩弄暴动。

这两种危险的倾向必须完全纠正，这些危险倾向仍旧是继续中央扩大会议以前的种种不信任群众、不顾群众力量和不以无产阶级的政策去领导暴动之遗留。各地党部应当切实研究“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议决案中所规定的党的最近任务，

研究广州暴动中优点和缺点的教训，正确的和错误的政策之经验，而切实的利用到当地斗争的规划与工作上去。

中　央

一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

江苏省委：

在“中央告江苏省同志书”中，已指出江苏一般工作的缺点与今后江苏省工作的总方针。同时中央巡视员到上海视察之后，中央更决定改组上海各级党部。惟时已经月余，上海各级党部改组的工作尚未完全，而党与工会的关系的纠纷复起。此影响工作的进行甚大，中央特有下列的指示：

上海为全国第一个大的产业区域为无产阶级的势力最雄厚最集中的地方。应当是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地，党在上海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职工运动。在上海如果尚不能把职工运动做好，不能组织广大的群众的秘密工会，不能有计划的领导全上海的工人争斗，党便没有尽他应尽的责任，而在革命的责任上反是一种罪过。过去与现在党与工会关系不好的纠纷之来源，便是党在上海没有更艰苦更深入的工作，没有把群众的秘密工会建立起来，没有把党变成工人群众的组织，支部在群众中没有起核心的作用，没有很正确的策略，更具体的领导各厂各业的工人从日常细小的争斗去发展与团结他们的组织，去增长他们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工作的方法亦不具体实际，工会负责同志与党的负责同志的关系甚不密切，下级党部如浦东区委与上总特派员常因工作之分歧而

各持偏见。在这许多现象之下，自然要形成工会与党的关系不好，而且工会与党的组织将要愈益削弱起来。现在上海党与工会的组织都不是群众的，而且工会即党党即工会，党与工会都没有领导群众实际的工作，江苏省委应当在这些教训中去改变他的政策与组织的方针。中央特郑重的告诉江苏省委：要在上海极艰苦的工作，不怕麻烦不怕困难，要领导各厂各业的工会从日常细微迫切的争斗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要知道每个工人说的什么话，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一些什么。此时的工作，决不仅只一个政治分析，一个暴动的计划，一篇好的演说，一些简单的煽动，不接近群众的上层的活动方法，英雄式的个人的活动所能做到的，换言之，要切切实实的做群众初步的基础工作。有些同志以为要把上海的工作做好，要深入上海的群众，先要从党内做起，因此，要把上总负责同志以及下层的工运负责同志调回党内工作，有些同志以为上海的党根本是不好的，要经过工会的系统打入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之后，然后再改造党。这两种意见都是不正确的。没有健全的党固然不会有好的职工运动，但是没有工人群众不断的争斗（尤其是上海），党亦不能群众化，强固起来。如果只有单纯的工人群众的争斗，不能在这些争斗的过程中去改造党，去锻炼党的组织，去吸收新的革命的分子加入党，那更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党是工人群众的领袖，党的好的分子是在群众争斗中产生出来的。党的工作不好，工会的工作不好，党与工会在上海都不能深入工人群众。不是党根本好不好、工会根本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党与工会的策略正确不正确、工作的方法实际与不实际的问题。工会与党的关系不好，是党对于职工运动政策的指导与工会组织的指导好不好的问题，负上海职工运动责任的非同志在同一主义同一指导之下工作，照理根本就不应发生党与工会

关系不好的问题，如果有同志单纯的站在工会的立脚点，带一种偏狭的意念似的来攻击党不积极的设法如何去改造党与工会的关系，那是一种工会主义的错误，在本党的同志中绝对不应当发生。如果很近视的，只站在党不好，工会比较党好，便要把工会的负责人调回，因而工会的组织削弱起来，甚至使工会的组织不独立，那便是太狭隘的见解。上海目前党与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如何艰苦的深入上海的工人群众。江苏省委必须明白而且深刻的知道：我们党在上海的组织是日趋于削弱，群众的工会没有建立起来。党与工会都是与群众隔离。这样，是不能领导广大的全国最集中的无产阶级争斗，更说不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工会的组织必须要独立起来，党要有决心重视与扶助工会独立组织的发展。没有群众的工会，是不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尤其在上海没有群众工会的组织，党是不能群众化的。党只能在群众的工会中起党团的作用，支部只能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支部代替工会是最不好的现象，是要削弱群众的组织的。但如专重视与扶助工会独立组织之发展，负工运的同志便处处带一种工会主义的倾向，党应当随时纠正，这是不可轻恕的。为党与工会的关系以及以后对于工会工作的指导，中央更有下列具体的指示：

一、江苏省委对于上海的职工运动，不但要有每一时期的总的政策的指导，指出职工运动总的趋势，与争斗的策略，在每一时期之后有总的审查，更重要的是要定出每厂每业工人迫切微细争斗的纲领，领导各厂各业的工人艰苦的争斗。支部在这许多争斗中起核心的作用，在各厂各业的工会中按照这个争斗的纲领切实工作；

二、接到此信后十日内，省委常委须会同上总负责同志、各区委负责同志分头召集全上海各支部活动分子（最好是支部

全体会），讨论各厂各业工人迫切的要求具体的规定，俾支部与工会得切实执行。如无支部组织的某业某厂的工人，上总应召集该业该厂的工人活动分子规定。规定之后从省委通过，并报告中央；

三、即应开始正式组织各厂各业工人的工会（最好每一工会都有会址），工会的执行委员，非同志应尽量的多（同志至多不得过三分之二），支部的负责同志不应尽负工会的责任，当执行委员。这就是说要分一部分支部负责同志作支部本身的工作，分一部分负责同志作工会工作，支部只能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在每一次工会争斗的纲领决定之后，支部的全体同志要在群众中尽量的宣传、煽动、组织支部，区委指挥工会只能经过党员、经过党团的组织，不能取直接的形式；

四、上海与各产总的常委，亦应找勇敢的非党的工人参加，如果有同志认为这是困难的，便须战胜这一困难。如果有同志认为非党的工人可以参加上总与产总的工作，便可以加入本党，党不应当拒绝，而应当欢迎；

五、省委对于上总应当组织党团，上总每一次的重要的决定，党团事先要报告省委，党团对于省委，关于上总的工作应当有经常的密切的报告，各产总各厂工会也应当同样组织党团，党团须属支部或区委或直受省委之指挥，但上下级党团绝对不能发生指挥关系；

六、一切重要的职工运动的策略必须经过党的系统指挥；上总只能以工会的名义执行此重要策略，并命令下级工会；

八[1]、上总各区的特派员暂时不宜取消，但特派员制度不过是成立各区工会代表会议、各产业工人产总之前的一种过渡组织的指挥方式，不是永久存在的，而且在现在亦只宜于工人群众多的地方如沪东、沪西。同时上总更应努力使各厂工会充实能于最

短期间成立纺总或沪东西的分区工代会以取消特派员的制度；

九、上海各区委会议主要的应当讨论职工运动，上总在某区的特派员，如果是需要同志充当，省委应当指定该区委委员之一担任，某区的特派员对于该区的区委应当经常的作该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并与区委共同规定计划，上总给特派员重要的指令，该特派员必须与区委讨论之后执行，省委给区委职工运动的指令，区委亦必须使该区特派员参加讨论；

十、工会组织员要积极的设法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在业工人担任，变雇佣式的工会组织员为在业工人的勇敢的先进的分子。有同志以为要培养工人的首领，以为要经外面调一些同志去，这是错误的。工人的真正的领袖必须是土著的，必须是由群众斗争中自己产生出来的；

十一、省委应即速于上总党团外，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包含有非上总党团的同志，不仅切实计划上海职工运动并须注意到无锡、南通、南京等地以及沪宁、津浦、沪杭三线的铁路工作。省委与区委并必须定期的分头召集工运负责同志开会，报告党对于职工运动的策略和方法；

十二、接到此信后，省委与上总均应召集负职工运动责任的同志开会，具体的指明以前党与工会关系不好的原因，并按照中央的指示规定以后更具体的党与工会的关系，区委亦应如此。

中　央

一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八期刊印。

注　释

〔1〕原文无“七”项。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国民党的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李济深屠杀广东工农，已经有九个月了；国民党的唐生智屠杀两湖农民（马夜事变），汪精卫屠杀汉口工人（七月三十一日），也已经有半年了。国民党的宁汉两中央“合作”，宁汉两政府合并等类的滑稽戏也不知扮演了几多次了。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在这期间杀戮各地工农民众，摧残罢工，禁止抗租，严禁抵制外货……凡是一切反革命卖国的勾当早已应有尽有，应做尽做了。广州工农兵群众暴动失败之后，国民党自己宣布已经屠杀广州工人、兵士、农民到五千七百多人，并且对俄绝交，杀戮驻华的苏联外交人员。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宣布“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并“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国民党的反动事业，到此已经告了大成。

国民党的所谓反共清党，说是可以肃清恶化腐化，完成北伐，解放中国，改善民生等等。如今事实上怎样呢？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民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十五期。

征！这总算是反共清党的成绩！这种“成绩”的表现，不但使全国的经济金融陷于破产崩溃的地位，一般工农民众受着不堪言状的剥削压迫和屠杀，不但新旧南北各省大小军阀的混战破毁全国糜烂全国，甚至于国民党内的纠纷也是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已经是死尸，而且是早已烂得发臭的死尸了。

国民党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召集他的第四次中央会议，但是他召集了五个月，至今还是开不成，或是说不足法定人数，或是连法定人数也不能确定（究竟是十五人还是二十人）。形式上的理由多得很，但是实际上呢？——是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是甚么统一的党，他内部的政客派别军阀系统多得很；这些派别和系统之间，正在冲突矛盾战斗，如何能一致的开甚么中央会议呢！

最近伍朝枢、孙科辞职，汪精卫被逐，何香凝等所谓粤方委员被人提议通缉，胡汉民、李石曾、吴稚晖等声言“没有办法”，蒋介石自己说“民众怀疑”，说“党国威信日堕”。国民党自己以及帝国主义的报纸，都说：（一）国民党已经不是统一的党，国民党的统治和北方军阀的统治毫无二致；（二）北伐了两年，结果仍是四分五裂，各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及军阀的混战不已；（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都不能发展甚么革命解放中国，而是发展反革命破坏中国。这些情形是全国人民所共见共闻的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向中国一般劳动民众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与一切工农民众破裂，就是背叛革命，这种结果一定是使国民党变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新军阀的工具。这已经铁一般的事实了。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纲口号，已经完全拆穿西洋镜。国民党已经是赤裸裸的军阀、官

僚、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党了。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已命令自己的党员完全退出国民党，并且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反对这种背叛革命、卖国殃民的国民党；根据下列的罪状：（一）国民党是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的党；（二）国民党认为“粮从租办，租由佃出，是千古不易之定理”，压迫禁止农民的抗租和没收土地，他是维持地主封建式的剥削的党；（三）国民党禁止罢工，封闭革命工会，他是维持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党；（四）国民党认为“必须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他的政府，如蒋介石则与日本勾结，秘密向日本借款卖国，如李济深则向英国香港政府借款千万，作为他屠杀广州民众五千七百人的赏金，他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五）国民党北伐了两年，不仅没有打倒甚么军阀，而且是造成许多新军阀，这些新军阀就是国民党的主人，互相以救党护党的“理由”，实行争权夺利的混战。如今广东、福建、两湖、山东、直隶等省，到处都是这些军阀混战，战祸的蔓延，使一般工农失业，兵士牺牲，使一般民众受着苛捐重税、公债省债库券等的压榨或者不兑的纸币军用券剥夺一般贫民的生计——根据这些罪状，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是国民的公敌！国民党是中国一般工农贫民兵士群众的公敌！国民党和北方军阀已经是同样的反动势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

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众！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继续广州暴动的事业，创立苏维埃的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中国最大多数民众自己的政府，然后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后才能解放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于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才能消灭一切军阀的混战，

开始中国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李维汉的信*

——关于湖北湘南工作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迈兄：

（一）顷从C.Y.中央闻悉C.Y.湖北省委本月十一日来信谓："湘鄂战争已经开始，六、七、十三、四十四军俱已开到通城、崇阳、蒲圻一带，二、十九两军开到鄂西，武汉仅有由省防军改编之十八军两团。市面非常恐慌，宛似去年十一月十日左右唐生智军败退黄冈鄂城的形势，武汉的工人普遍的可以号召起来，群众已经自动的喊出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口号，群众已经普遍地起来，要求要饭吃，中小商人厌战的心理，可说是完全一致。外县农民已经大部起来，黄安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减低农民革命的情绪，四乡仍完全在我们的游击队和农民手里。黄梅、黄冈、汉川的暴动，正从夺据四乡公开的杀土豪劣绅围攻县城。鄂南党与团的组织已经恢复，农民对于秋收暴动及我党之信仰，都非常之好，杀土劣的工作，始终没有间断，鄂南公安、石首一带及京汉路孝感等县均可做骚扰工作。客观形势湖北已经到了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时候——统治阶级已经到了崩溃瓦解的时期，工农群众已经普遍的起来。省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

委已于十一日决定湖北全省总暴动的日期及一切具体的计划，决定于最短期内（日期已确定）爆发。这次暴动的目标，毫无疑义的是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分配土地，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这次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工人（武汉三镇都可以号召起来）、农民（汉川可来二千至三千武装农民来武汉，鄂南三千至五千，黄冈二千，其他各县如黄梅、黄安可各在本地造成割据的局面）、士兵（有三团人可以哗变倒戈），他们的估量胜利是很有可能的”。C. Y. 湖北省委来信如果确实，中央认为武汉现时确是发动群众争斗很好的时期。如能抓住这一时期，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及扩大一般市民反战争的宣传，扩大苏维埃的宣传，加紧农民群众的切身争斗，以至围攻县城，进于割据的局面，加紧士兵运动，深入到各军、各师、各团、各营中去，则准备湖北全省总暴动胜利的局面，是很有可能的。但中央反对即刻举行总暴动。省委总暴动日期之确定，中央惟恐仍是红色周不正确的精神之继续，且其全盘计划与兄未离沪时，中央对于湘鄂赣总暴动局面之布置的计划相反。就是湖北一省的暴动计划，亦不应在各县农民尚未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武汉附近各县农民群众尚未普遍的起来的时候，武汉三镇即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而他们举行总暴动时力量之估量，谓汉川可来二千至三千农民来武汉，鄂南可来三千至五千，黄冈可来二千，中央更不了解湖北省委对于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如何组织。此外关于党与团的组织情形，如何发动与武汉三镇工人群众发动的情形，武装暴动技术准备的程度，苏维埃组织的情形，这许多重大的问题，都轻轻的一字未曾提及，中央更是忧虑。中央考虑的结论，认为湖北省委总暴动日期之决定是错误的，省委总暴的政策与中央的政策相反。省委轻轻的决定总暴动的政策，根本倾向是错误的。省委好像不懂得如何准备武装暴动，

甚么时候举行武装暴动。兄抵汉后谅已纠正这一错误的倾向，按照中央指示的策略解释一切。但中央阅悉C.Y.湖北省委来信之后，非常忧虑。特致函于兄，希兄斟酌情形按照寄来之中国政治现状与本党各省最近工作的方针决议案，关于湘鄂赣工作的指示，督促湖北省委布置湖北的工作。至于中央认为仍须特别指出的为下列各项：

一、湘鄂战争期内武汉三镇空虚的情形为发展武汉工人群众斗争最好的时期。此时须特别有计划的发动各厂各业的工人经济斗争，汇合成总的争斗的形势，并宜即以总罢工发展争斗的口号，在群众中作普通的宣传与煽动。恢复原有的工会，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秘密工会，开工人代表会议，从各区各业，一直至全武汉三镇，杀改组委员，举行飞行的群众示威，发扬与鼓励群众的斗争，利用短时间的工会公开的时期，发展工会的组织，加紧工人武装队之组织与训练，加紧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与鼓动。

二、在一般市民中作广大的反战争，反苛捐杂税，反二五库券，要求发还现全集中时的八百万现款等的宣传，并为他们提出口号，使他们益厌恶军阀政府，而同情于工农群众的行动。

三、农村的工作，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切实造成全省恐惶与割据的局面，尤其注意武汉三镇附近各县的农民群众普遍的争斗。

四、士兵运动如真有三团可以哗变倒戈，如在武汉则须加紧政治宣传（在别处亦应如此）组织与秘密的工作，如不能保存则须设法开至农民可以造成割据局面的区域，参加与扩大农民群众的暴动。

五、党的组织之发展，与如何努力成为群众的核心，这一工作的计划，尤其望兄加以注意。

（二）接湖南省委寄来之湘南特委报告，虽然是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告，中央认为湘南特委主持之同志有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如他们的口号，有暴动起来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起来工人占据工厂自己管理，他们的暴动的战斗的决议案第十五条有马上恢复民众团体，工人占据工厂，农民实行分配土地等语，他们对于政治的认识与中国目前革命的时候亦不清楚，如政治决议案有“现在之革命环境已较好于十月革命前之俄国，十月革命已到我们目前了”；他们对于党的策略好像不太清楚，如他们暴动的总口号有“暴动起来打倒盗用国民党名义的一切新军阀”，好像仍认为有好的国民党一样，有“革命委员万岁”不懂得要以苏维埃为暴动的指挥机关。他们的方法亦有些错误，如宣传兵士利用娼妓，夺取豪劣地主富商的财产用吊肥的办法。此外他们对于会匪不取分裂根本消灭的政策，对于军事运动尚幻想长官的错误方法，这许多都是不正确的，继续这种政治的精神，自然不能深入土地革命而且有大的危险。原因虽是由于他们远处深山与中央的政策隔绝，但他们农民分配土地，工人占据工厂的倾向，确表现一分社会关系与广东同志之组织三 K 党，谓革命为大杀、大抢、大烧，广州工人同志要求提出没收一切资本家的财产纯全一样。附上他们的报告，希兄至湘时加以纠正。（下略）

中　央

一九二八年、一、二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二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自从八七会议以来，党与团的关系一天一天的复杂，纠纷的问题，常因关系不好而发生，虽然中央已经通告各地注意党团关系的整顿，但是还没有看到整顿的成绩。

最近几个月以来，各级党部与团部对于暴动的认识都还没能深切了解，在团员中更是流行“无斗争不是暴动”的错误观念。软弱的党的指导机关，往往容易受团的影响而不能有一坚定的政策（如湖北），甚至随着团的主张而决定极错误的政策（如江西团的省委与河南郑州的团曾提过早的暴动计划，都被党的省委通过），这样情形很可以影响将来的工作。

因此党与团中央认为上次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六项中之“在党的组织弱小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不改变放弃工农运动指导时，团可以并且应当站在党与团上级机关政策上联络党员群众领导当地工农运动争斗”，及团去年十一月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同样性质之规定，已经不甚适用于目前的环境。

虽然上列规定，还没有发生不好的影响，但是在目前复杂而且争斗紧张的革命环境中，党与团（尤其是下层组织）对于党的政策都没有极明确认识的时候，将来可以引起极不好的影响与结果，为预先防止这种危险起见，特暂停止上列规定之应

用。各级团部应服从当地党部的指导，自然这不是禁止团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与主张，但一经党决定之后即应遵照执行。

过去党团关系不好，在党方面确有一些党员表示消极怯弱腐化、指导机关政策表现动摇以及不重视青年运动，给团以不好的影响，这是党自己应当努力纠正的。但是团的同志往往站在一种似乎没有很多责任的地位来批评党的错误，这种不负责的批评，有些且是表现一种失败后急进的智识分子的冲动，并非代表工农群众的意识，也是极不好的现象。

当此争斗紧张，党与团正在脱离机会主义走向布尔塞维克道路时期中，应当尽量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广州暴动失败后，党对于一切革命策略问题都有更深一层的正确规定，党内改组亦在积极进行中，靠党领导的争斗一天一天繁重，此时任何增加党内纠纷违反党的政策忽视党的作用等都是妨碍党在群众中的发展，因此团应负责消灭团员中轻视党的错误观念，在一切训练教育工作中，应注意增加团员对于党的认识和信仰，纠正团员中及指导机关对于暴动的错误观念，在一切对外宣传中，应注意提高党的作用。

同时党应纠正轻视团的错误观念，事实上加强对于团的指导与帮助，与团建立亲密的组织与工作关系。尤其在争斗紧张的时候，党与团的关系应当更加密切，但是过去往往在争斗紧张时，党团关系愈加疏忽，如在这次广州暴动中各种指挥机关内没有团的代表参加，以致暴动日期提早，而团不能按时发动，这样的关系自然会促成团单独行动的错误，或者就是使团不能起一点作用，这是今后应当纠正的。

去年十一月团扩大会已确定加紧群众工作的方针，开始注意在青年工农与兵士中发展工作，党应随时扶助团来建立这种

工作的基础，在各级工农会执行机关及苏维埃组织中须注意青年代表的参加。

上次所发关于党团关系的通告除第六项如上修正外，其他各项，各级党与团仍须双方负责执行。

C. P.
C. Y.　中　央

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

1. 广州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之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虽然广州苏维埃的存在期间很短，但是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已经显然的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裁的革命）。只有这一革命的扩大和深入，达到全国的胜利，才能够解放几万万中国的工农民众，而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建立苏维埃的中国。现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已经明显的是除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以使中国脱离经济、政治、社会的总危机及新旧军阀的混战局面。

2. 当广州暴动的时候，全国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新旧军阀以及帝国主义，都震恐失措，疯狂似的施行白色恐怖的暴政。这次反动势力的惶恐动摇为从来所未有。这就证明中国的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已经觉得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统治，不能消灭几千万工农兵士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立刻提出对俄绝交和停止民众运动的两大政策，这又更表示他们为苟延残喘起见，不能不揭去一切假面具，而公开的降伏

于国际帝国主义之前，公开的声明他们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奴才（蒋介石宣言："必须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李宗仁、朱培德宣称"三民主义应当是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否则便有第三国际之臭味"）。

3. 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

（一）广东：广州的暴动军退出广州到花县、北江一带，又折到东江一带去，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已经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区域，包含海陆丰、紫金、普宁一直到五华。花县、清远、英德、东莞、宝安等处都有农民暴动，海陆丰的农民暴动更取进攻的形势，努力发展临近各县的群众。广州在白色屠杀六千人之后，工人的罢工斗争又立刻起来（鸡鸭行工人等）。

（二）湖南：十二月十一日晚上长沙与广州同日有工农暴动，占据长沙车站。衡阳有农民暴动发生，茶陵、攸县、酃县有工农军的占领，并且伸张到江西西境的宁冈、莲花。

（三）江西：万安的农民势力有很大的发展，万安一带群众都在跃跃欲试。

（四）湖北：黄安、黄梅、麻城农民大暴动，围攻县城，汉川、沔阳一带农民暴动杀土豪劣绅。武汉裕华纱厂罢工。

（五）江苏：青浦、黄渡、枫泾一带都有农民抗租暴动，杀土豪劣绅的运动。崇明外沙的农民也在最近起来暴动，杀屠豪绅。上海电车罢工虽然失败，而最近南货、估衣、酱业等的罢工又风起云涌，抵抗年终的资本进攻（开销工人店员）。

（六）浙江有奉化等处的农民骚动。

（七）山东有二千万的饥民运动，红枪会、大刀会的运动。

（八）河南红枪会、天门会的抗税捐的运动。

（九）直隶清苑有农民抗税，成千群众围攻县城的事。

（十）甚至奉天、通化等处大刀会的扑城，也树起红旗，这更加表明：一般贫民是反抗军阀政治的，普遍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是领导他们力争解放的组织。

这一些事实已经很明显的表明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

4. 反动派——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都在日益厉害的动摇混乱，自相冲突，自相混战。全国各省的经济（工商业以及金融财政）都在剧烈崩溃的危机之中。一方面，反动的军阀要更加增多各式各种的苛捐杂税；别方面新旧军阀的军队，因为欠饷日益加多，他们之中的兵士情绪都日益骚动，而倾向于愤激反抗反革命官长的兵变。现在军阀军队的崩溃现象之利害，实为从来所未有。广州暴动中有兵士群众参加，广州暴动的革命政府是有兵士群众自己的代表参加的政府，这一事实尤其推动广大的一向“无智无识”的一般兵士贫民之革命意识，使他们在事实上看见除忍饥耐冻、挨打挨骂、出卖性命以图一饱之外，还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和工农民众联合起来暴动，根本推翻这种吃人的统治。

军阀混战和资本的进攻，使城市工人和一般店员手工工人的生活一天天的更加窘迫痛苦。战祸的蔓延，一般的经济危机，使工人店员的失业日夜不绝的增加。再加以反动的各派国民党或旧军阀，争相表明自己能代表“资本家利益”，杀戮压迫革命的工人，禁止革命的工人运动，更加使资本的进攻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大批的开除工人店员，否认以前罢工胜利所订

条件，例如汉口总商会要求政府明令废除一切“共产党时代”所订劳资条件。

军阀混战和地主豪绅的进攻，尤其是农民的经济地位日益低落，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捐税重重，催租催债，招夫派粮，几千斤的压迫和剥削加到农民身上。各派国民党先先后后公开撤消他们的欺骗农民的改良政策（甚么减租二五等等），即使没有明令取消，事实上只有豪绅地主告发农佃抗租，而这些青天白日的政府下严令禁止，农佃的减租是绝对不能“和平”的得到的。

国民党现在广州暴动之后，更公开的实行白色屠杀政策，停止民众运动，他虽说还要用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和平建设的臭招牌欺骗，而工农民众甚至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于他们的信仰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共产党在极广大的群众之中信仰日益增高起来。

凡是这些情形，在广州暴动之后都有更深更广的发展，农民自发的暴动——抗租、抗债、抗税、抗捐、抗粮的斗争之剧烈，工人经济斗争的勇猛艰苦，尤其是兵士群众的开始骚动反抗，都超过以前的程度。兵士群众参加革命或者简单的不自觉的变乱，更是最近革命潮流中的新现象。

5. 广州暴动后苏维埃革命在如此的客观环境上，更加扩大和深入，更加摇动了豪绅、资产阶级、新旧军阀的政权，更加重他们统治的削弱形势，更加开展了他们内部争权夺地的冲突，更加扫除了一切改良主义的幻想，更加紧迫了反动统治对于革命民众的屠杀和压迫，更加使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及世界的革命势力，尤其是苏联的进攻。

广州暴动之前，国民党与资产阶级还想以改良主义欺骗民众，尤其是投降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代表中国之动摇卑鄙的上

层小资产阶级的一派。其时国民党各派还想开甚么中央第四次会议，想形成统一的反动统治，以找出欺骗民众的改良色彩的政纲，而来消灭与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

但是，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的冒牌改良主义之反动势力，便被桂系军阀所驱逐，以至于消灭。这证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到了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期，不能容许任何站在帝国主义工具与中国工农革命之间的“中间”力量之存在。国民党的党部及其所谓工会、农会等民众团体，不是实际完全消灭，就是要变成纯粹法西斯蒂的暴力机关；其他豪绅地主的组织和武装也在尽量扩充自己的力量，即所谓“无政府保产会”等欺骗工农的和平组织，也是要迅速变成公开反动的武装团体；九省商会联合会更是公开的进攻工农，主张扩充商团。同时亦就证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的总危机，已经是迅速崩溃不可挽救的情形，不能容许任何资产阶级式的“改良”、“建设”（例如广州暴动后上海所开的九省商会联合会，拟出许多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及召集经济会议等议案）。——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在这种总危机之下，客观上只有各派各系之间的冲突格外加紧而剧烈起来。

6. 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他的第一等的任务便是取得以前买办阶级之帝国主义尊崇的地位而代之。国民党的广西派军阀，经过香港政府的赞助（李济深），经过上海工部局的赞助（白崇禧），与英国帝国主义相勾结。桂系军阀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他的背景便是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多分的带着豪绅地主的色彩的资产阶级，买办化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蒋介石派军阀，经过蒋介石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他的背景却是上海江浙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是工业的资产阶

级。——所以英日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反映在广东与江浙两系的资产阶级的冲突与竞争（最近九省商会联合会中冯少山等广东派排斥虞洽卿等江浙派的现象是很显然的），并且亦就反映现时各省之内桂系与蒋系军阀的互相冲突，以至于国民党中的各派冲突（最近国民政府中孙科、伍朝枢等的下台和宋子文等的上台；国民党中央会议中西山会议派的失势，及蒋介石的许多新走狗的重新团结——都反映这种冲突竞争的过程）。英日帝国主义各自利用中国内战而扩张他们的侵略势力。

7. 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是客观经济环境的必然的结果，除此以外他们别无出路。所以虽然广州暴动的爆发，暂时激起各派联合施行屠杀及对于工农的进攻，而他们各派之间的斗争和冲突只有更加深入。蒋介石的总司令复职及最近南京的国民党会议，只是酝酿着更大更厉害的战争——桂系军阀对于蒋介石派的进攻正在准备着反攻。国民党和新旧军阀的统治，只是日益分裂中国糜烂中国，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一致不能调和。

国民党军阀与奉鲁军阀的战争，冯玉祥、阎锡山与北京的战争，固然已经使中国北部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极点，而且同时张作霖与张宗昌、孙传芳相互之间有冲突和纠纷，冯玉祥、阎锡山之间，他们与南京政府之间，又各自酝酿着许多争权夺地不可调和的冲突。国民党的所谓北伐，实际上只是南京政府之桂蒋两系及冯玉祥、阎锡山互相推诿、互相牵制的局面，而且即使他们能联合而打败奉鲁军阀一直到进据北京也决不能改良北方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职任是他们所不能担负的。

直鲁两省的大饥荒，一般交通商业的破毁，税捐的苛重，更是不堪言状。满洲财政的紊乱和破产，更有日落千丈之势。

而且东三省正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纯全殖民地。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陕西、甘肃、山西，一般经济的破产和工农群众的痛苦，更是和全国其他各省毫无二致。

南京政府之下桂系和蒋派两军阀的斗争，许多杂色小军阀的互相排挤冲突，都是显然的事实。江浙、上海的区域经济破产的程度虽然形势上比较和缓，但是广东、福建的财政破产与经济破毁达到很危险的地步；而湘鄂区域的危机，则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军事上则南京政府之下桂系与蒋派两军阀的冲突，直接的间接的已经表现于各地战争之中。

总之，在如此的经济崩溃和普遍的军阀混战局面之下，买办、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他们内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斗争之中，在他们受着自发的工农革命潮流的攻袭之中，很显然的有**一般削弱的总形势**。

8. 现在正在发展的湘鄂战争，实际上已经是桂系与蒋派两军阀武装冲突的开始。

蒋派军阀现时和唐生智系的军阀余孽互相利用，唐生智系想借此保存其实力与地盘，蒋介石则想借此压迫和屈服桂系——何键、周澜等首先通电拥蒋复职，助长蒋派在南京压迫桂系的声势。而桂系军阀却正在力图占领两湖，霸住两广以为自己之根据地，更极力拉拢湘系军阀程潜、鲁涤平、陈嘉佑等，以抵制蒋系军阀——而程潜等在现时形势之下也只有依附桂系以解决保持地盘及扩充实力的问题。固然蒋介石派的主要目标在于首先造成江浙（沪杭、沪宁以至津浦南段）的清一色的霸占局面，同时以北伐名义拉拢冯玉祥、阎锡山做他的外援。然而他一面必须勾结各种杂色军队，并且暗中或公开的帮助粤鄂湘等省反桂系的军队以伸张其势力。这种形势之下，虽然形式上蒋介石复职并占领南京中央政府是桂系与蒋派斗争的

中心问题，但是实际上则这一斗争的公开表演，却要先发现于桂系所主持的对湘战争。桂系虽然在中央及政府问题之中，暂时的屈服，如孙科、伍朝枢等的受排斥，但是他们不肯轻易放松上海的地盘；他们更要竭全力的去夺回广东：李济深、黄绍竑想与陈铭枢、钱大钧（蒋的势力）暂时妥协先肃清张发奎的势力，同时他们必须要夺到湖北的整个地盘，与杨森开战，而且必须进而夺取湖南地盘，以便两广和两湖的联成一片。所以争两湖、争广东、争江浙皖这三个斗争，是蒋派与桂系军阀之间所必不可避免的。现在最早发生的湘鄂战争及广东省内的战争，还不过是间接的表演这种斗争之第一步罢了。至于各省内部各小军阀之间的纵横捭阖，还在酝酿着更复杂更混乱的战争。

9. 总结起来：（一）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纪元；（二）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完全投降帝国主义；（三）工农革命的潮流正在继续的高涨深入；（四）工农兵士群众一般的革命化和暴动夺取政权的认识更加深入与普遍；（五）阶级斗争进展到最剧烈的短兵相接的时期，不容许任何改良主义幻想的存在；（六）帝国主义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益剧烈；（七）政治经济的总危机及反动统治一般削弱的形势；（八）尤其是蒋派与桂系军阀的内部冲突，已经开始暴露到武装的战争。

二

1.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就早已明显的确定本党的总策略，而在于领导一切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到武装暴动，达到尽可能的大范围内之胜利，建立苏

维埃政权。最近政治局决议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案大纲，更明显的指出领导工农、兵士、群众的武装暴动之任务，及在一省或几省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

照上述的客观形势之分析，全中国买办、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新旧军阀之分崩离析动摇溃散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自然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

固然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对全国而定的。全国各省的党部，都应当认真的执行这一政策——准备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从发动并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汇合革命势力，形成总的革命高潮，从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进于农民割据的局面，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获得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这种政策当然是适用于全国的。

但是从现时这种自发的革命潮流，进于决定胜负的暴动，必须有下列的条件：（一）治者阶级的政权极端的动摇，以至于把持不住这种政权；（二）工农群众革命高潮的总形势；（三）极多部分工农之中，首先是在共产党中开始坚决的有规划有系统的争取政权之决心，已经成熟；（四）在组织上、技术上之相当准备。现在中国一般的统治阶级之动摇削弱，工农兵士革命情绪之高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及信仰之普遍与深入的情形之下，各省之中哪几省在最近期间有进于上述的这些条件之可能呢？换句话说，就是哪几省里，将要首先爆发决定胜负的暴动呢？这是实行我党总政策的重要问题。无产阶级

在一般的直接的革命的形势之下，应当抓住治者阶级统治最削弱最动摇的关键，工农革命潮流及党的领导力量最强的地方，而开始革命的进攻。我党曾经抓住这种关键而发动于广州（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广州暴动虽然暂时失败，而客观上更加证明我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更加应当再进而规划胜利成分更多的发动——自然，同时反要对其他地方更加要加紧的扩大强固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广大群众的革命工会，发动并扩大工人的日常斗争，发动农民抗租抗税等的斗争，以至于群众发动的游击战争，组织革命的兵士，领导他们的斗争。总之，就是准备群众而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政策，是应当如此去执行的。

2. 照这种直接暴动条件的观察，中国可以分成几区情形相异的区域：（一）广东、两湖；（二）河南、陕西等省；（三）直鲁等省；（四）江浙。

两湖之中，尤其是湖南的情形，最明显的是豪绅、地主及其军阀统治，处于最动摇最削弱的地位，农民群众的力量与斗争经验，很大很多。湖北则经济破产和湖南仿佛，农民自发的暴动蔓延全省——尤其是湖北、江西边境暴动的屡胜屡败已经有很久的时期，只是武汉的工人斗争还没有广大的坚强发展，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也很差。广东则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存在已及三月，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已经延长到一年之久，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虽然受着很大的摧残，但是共产党及赤色工会的基础，始终是全国之冠。

河南、陕西等省，则本地军阀统治内部虽有纠纷，而他们的削弱形势较两湖稍缓。工人生活痛苦到极端，只是没有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赤色工会的基础薄弱。无产阶级政党也比较薄弱。农民的斗争，因为阶级分化上的落后，大部分还在小的

豪绅所领导的红枪会、天门会的运动之中，虽然革命意识比较模糊，客观上却是极广泛的抗捐、抗税、扰乱统治阶级地位的情形。

直鲁等省虽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南北战争之中奉鲁军阀固然日在崩溃，却给冯玉祥等以军事上的出路。这些省份之中工农民众的生活是最苦的，灾荒和战祸最延长。可是工农自觉的斗争却还发展的很小。农村中的斗争阶级分化也还模糊，却有大刀会、红枪会等类的原始农民暴动。这一区域的巨大弱点，便是天津、青岛、大连等无产阶级中心地点及铁路矿山工人没有工人群众斗争的广大发展，因此，也就没有广大的共产党的发展。

江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亦就是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经济的枢纽。江浙各县的农民虽然已经发动极多的斗争和暴动，而且必须广大的发动以摇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经济基础；然而无产阶级中心的上海，却因为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竭全力以镇压和破坏工人运动，至今还只在报告零星的日常斗争的阶段之中，上海共产党的组织还没有能深切的与广大群众相联络。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权力最大的根据地——上海与江浙，反动派自然要以全力来保持，即使他们有内部的冲突，他们始终是建立着最完密的压迫机关，来压迫工农群众。

这种观察之下，我们便可以答复上节所提出来的问题：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客观条件，究竟是哪几省最具备呢？——是两湖和广东，其次是河南等省。其他地域之中，则必须更加倍的努力，尤其是上海。我们必须准备工人群众的斗争力量，在日常的斗争中发展并巩固其组织，负起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斗争的责任，吸引崩溃中的军阀军队之兵士群众……以创造直接暴动的局面为目标。这一总的任务，在其他区域，比两湖广

东，要加好几倍的努力；而在上海、天津等处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大本营，则更须极艰苦的树立革命势力之基础，准备夺取这些巨大的工商业之中心，而有能制止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反攻胜利的多分的可能。——没有这些工商业的中心，将来苏维埃中国是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最终巩固的，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统治的。

3. 最近期间，因为广州暴动的失败，广东夺取全省政权——发展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于全省的时期，比较的延长一点，于是湖南便成为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最有胜利机会的省份。不过湖南与湖北、江西地域上的关系，与历来革命运动发展的相互关系，实成为一个不可隔离的系统，尤其武汉为全国的中心，武汉民众革命的胜利及湘赣边境农民暴动的胜利，同为湖南工农兵革命维持全省范围胜利的保证。因此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此中心区域的革命胜利，将要开始于湖南，而发展到武汉，并且与革命的广东相联结——这种发展是要负起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的历史使命的。这一发展的成败，关系于全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很大。我党对于这些省份的主要工作应当如下：

（一）利用桂系、湘系军阀与唐生智系军阀的战争，更坚决的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更广大的发动他们的斗争，发展到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进于割据的局面，群众起来解除溃兵或小部队的武装；发展唐系、湘系、桂系以至朱培德等军阀军队中的革命兵士运动，发展城市中尤其是长沙的工人斗争，引导一般贫民群众到总的争政权的斗争，以至于总暴动而夺取湖南的省政权。长沙的夺取，必须湖南总暴动的完成。武汉工人群众之团结与斗争格外重要，必须切实的建立工人的斗争组织，使他们与湖南、湖北各地的暴动农民相联络，使武汉的群众运

动能够切实准备以至于暴动，而完成湘鄂革命区域之胜利。这是总的任务，还可以分述如下：

（二）普遍的发展农民群众切身的斗争：抗税、抗租、抗捐、抗粮、抗债。杀戮土豪乡绅政府官吏军队长官，没收地主豪富的财产与土地，焚毁田契租约债券，夺取民团团防及驻军的武装，实行群众暴动中的游击战争，进而至于农民割据的局面。这些斗争发动群众之后，必须立即组织广大斗争的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以为指挥斗争及暴动之机关，进而至于当地的革命政权机关（苏维埃成立之后，以前的农民协会自然可以消灭，因为农民代表会议（或一村的农民会议）群众所选的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了指导的机关。即使以前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现在也不用再组织，而要一面宣传苏维埃，一面发动群众的斗争，以至于组织苏维埃）。

（三）农民割据的地域，尤其应当注意：（1）湘东、赣西一区——茶陵、攸县、酃县及宁冈、莲花等县；（2）湘南区——衡阳等处；（3）湘鄂区——监利、桑植、临澧、澧县及松滋、石首、公安、施鹤[1]；（4）湘鄂赣交界区——浏阳、平江、铜鼓、修水、通城、通山、崇阳等。长沙附近的十几县应当特别注意：发动广大群众的切身斗争，深入农民斗争的性质，建立巩固的群众的基础，使与长沙工人有密切的关系。这几区农民暴动的割据局面之造成及向长沙的发展以及长沙附近农民群众的发动与长沙工人及其四郊农民的暴动，实是湖南总暴动夺取省政权之重要条件。同时湖北割据区域还要注意：（1）鄂东：黄梅、黄安、麻城、罗田；（2）鄂中：沔阳、汉川、天门、潜江、京山。江西则赣西南万安等区域。再则湖南暴动发动或可联合湖北暴动时应当特别注意占据武长路一带，断绝敌人的交通，这一区域横梗在两湖之间，可以便于两湖暴

动的总发展，一方面屏障岳州、长沙的暴动，别方面则可以进取武汉。

（四）工人运动应当特别注意武汉与长沙及其他较大的城市和工业区，如大冶、湘潭、安源、常德、宜昌、沙市，以至九江、南昌、景德镇等。城市之中应当立刻开始积极的发动并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这些斗争之中，不但要发展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并且要努力创造群众斗争组织之新方式：如罢工时之罢工工人代表会，或简单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每次斗争之中，要领导工人群众去了解工农兵士联合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与意义，并要经常的宣传这种意义。无产阶级应当做到农民暴动与兵士暴动的领导者。应当以总同盟罢工发展暴动夺取政权的观念，宣传工人群众。因此，必须立即勇敢的领导工人的减时加资等斗争，反对反动的假工会的斗争，引导他们认识推翻现政府之必要。失业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作有组织的示威，以至劫夺富户当铺，实行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口号。对于店员亦应特别加以注意，提出他们的特殊要求，领导他们的斗争，武汉的失业工人、铁路工人尤其应当特别注意。长沙和武昌应即秘密组织工人武装队，为暴动的赤卫军之基础。

（五）兵士运动应当特别注意。要使一般工农普遍的向兵士宣传，告诉兵士以工农斗争的目标，兵士是最苦的贫民，他们只有和工农携手，反对军阀——克扣他们兵饷把他们当炮灰的军阀。党应当特别向兵士宣传，发传单，领导他们反抗军官，要求发饷，要求加饷……应当秘密发展兵士及下级军官中党的支部。应当组织兵士委员会。应当号召兵士回乡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应当号召兵士起来兵变转到工农方面来，编入工农革命军。这些工作应当在唐系、湘系、桂系以及朱培德

军队中普遍的发展。要设法使兵士与工会尤其是农民团体发生关系。在未暴动之先便要做到工农兵的联合组织。工农暴动之中，而贫苦的兵士群众照旧是“无智无识”的接受军阀豪绅的命令来攻打暴动的工农，这种工农暴动是很难得到胜利的，而且这种现象是革命之中不应有的。

（六）应当在发动与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斗争的过程中积极的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各级党部，不但工人的农村的支部，应当由工人或农民同志当书记，而且市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工人、农民至少应当占五分之三；至于工会负责同志应当做到纯全是工人，农民运动的负责同志至少要工农分子占二分之一，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使一般党的群众真正能讨论党的政策，了解党的政策而去坚决的执行。

（七）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共产党的策略应当是：

“当时统治阶级组织上多少已经有涣散的现象，当时群众是在革命的愤激状态之中，当时中间阶级向无产阶级方面摇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政党便有引导群众去直接攻击资产阶级国家之任务。要达到这种目的，便须提出日益激烈的口号，日益激烈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党的一切宣传鼓动都应以此为标准……这些斗争方式就是：罢工，罢工与示威相联结，武装示威与罢工相联结，最后总同盟罢工向着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之直接武装斗争的最高方式。这种斗争便须服从军事艺术的规则，须有军事计划（地点、时间等的确定），作战须有进攻的性质及无产阶级之绝对的忠实与勇敢。这种发动须要组织广大的群众于战斗的结合之中；这种战斗的结合之组织方式的本身，便是吸引并领导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参加运动的（就是工农代表的苏维埃，兵士代表的苏维埃）。再则，海陆航空军中的工作，亦是胜利的策略之前提。”（共产国际党纲草案）

这种策略方针一般的对于中国现时是非常之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湘鄂区域走向直接暴动——决定胜负的大城市中的暴动的时候。

（八）暴动的指导机关所以一定要是工农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乡村之中固然是如此，城市之中尤其非如此不可。苏维埃的组织，固然是要到群众的大发动，并且一般群众革命高潮之中“开始争政权的决心已经成熟”的时候；但是关于苏维埃的宣传，必须经常的扩大到一般工人、兵士、贫民、农民群众之中。

湘鄂区域之中的这些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自然一般通用于全国各地，不过各地依照当地情形而有应用程度的不同罢了。至于其他区域的特殊工作，也可以略举如下：

4.（一）广东虽经广州暴动失败的摧残，仍旧是革命的中心区域。各系军阀正在直接的混战局面之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应当乘机取绝对进攻的战略，完成全东江的割据局面；北江、西江南路农民斗争的一般的发动，各自造成割据数县或数十县的局面；广州市工人的基础，应当在最短时间内纯全恢复，利用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及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的信仰，从发动并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加紧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反抗白色恐怖的斗争，积极准备第二次总暴动局面的创造。加紧在军队中海军中的工作，香港的工人运动，应当加以极艰苦的工作，造成党的及工会的群众基础，使在广东全省工农兵总暴动的时候，能有牵制英帝国主义对暴动的广东进攻之伟大力量，以至于根本摇动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广西、福建是广东左右两个屏藩，也正是桂浙两系争广东的出发地和失败的退路，所以两省工作特别是梧州一带与闽南更与广东有密切的关联。我应加紧这些地方的工农斗争，走向暴动割据的局面，以扩大广

东暴动的成功并摇动敌人军阀的后路。

（二）河南的工作此时不占极重要的位置。党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京汉、陇海路上的党的及工会的群众的基础，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与沿路农民相联络；第二个任务是领导一般农民的斗争，把在中小豪绅影响之下的红枪会、天门会等广大的农民群众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本党领导之下，尽可能的造成农民割据的局面；第三个任务是郑州、开封等城市中造成党及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中深入并发展工人、贫民的革命意识（苏维埃的宣传等），使在两湖暴动胜利之际，能以牵制冯玉祥的进攻两湖，以至给他以致命的打击，汇合各县农民暴动的势力，进而创造河南总暴动夺取政权；第四个任务是开始并加紧的深入冯玉祥军队的兵士运动。陕西工作更多具有乡村土地革命的意义，全陕西省的农民都在极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我们应加紧领导农民的斗争，命令我们有工作的军队分裂军阀的力量，领导革命的兵士走回乡村中去参加土地革命。情形如有可能，更宜以城市工人的领导，造成工农暴动在陕北、陕南以至陕中部分的割面。陕北、绥远是与革命的蒙古交界的，苏维埃的中国与苏维埃的俄罗斯在陆路的联结，这是一个可注意的孔道。

（三）江苏目前是没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然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大本营，是江浙资产阶级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雄厚的地方。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工农的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争上海的斗争，因为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现时客观及主观形势之下，党在江苏的任务是：(1) 建立巩固本党在上海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巩固基础，建立并发展极广大的群众的赤色工会，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经济斗

争，发展增高他们的阶级意识，深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认识于一般群众，建立工人阶级中秘密的武装训练和组织，发展上海四郊的农民运动，并且使他与革命的工人团体相联络；（2）加紧南京及其四郊的工作，尤其是津浦、沪宁铁路工人的组织，使在紧急的时机，革命的力量足以给南京政府以致命的打击；（3）发展无锡、南通的工人运动建立党及工会的群众基础；（4）发展一般的农民群众斗争，以至于群众暴动中的游击战争，尽可能的实行农民割据。浙江、安徽等省的工作，也是发展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并且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尽可能的从抗租、抗税、抗债、发动游击战争以至于农民割据。这些地方驻军中的兵士运动非常重要，也应当立刻开始。总之，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艰苦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

（四）直隶历来是反动政府的中心，同时也有很广大的无产阶级组织，本党最大的任务是：（1）建立天津、唐山等处党及工会的群众的基础，在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中发展苏维埃口号的影响于一般群众之中；（2）努力去发动一般农民群众的斗争，取得其领导权，指导他们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游击战争的战略、农民割据、根本推翻反动政府、抗纳捐税等等；（3）特别注意铁路工人（京绥，京汉，京奉，津浦，正太）。

山东则特别应当注意胶济、津浦工人及淄博等矿工，青岛的工人，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在农民斗争之中更要能领导群众使他们脱离大刀会等领袖的妥协策略，并且要能领导饥民运动，组织饥民，发展党的影响于一般饥民及贫民兵士群众之中，普遍的提出本党的政策，号召他们积极的斗争。农民暴动

必须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杀戮豪绅，没收富豪的财产，没收土地开仓放米，这种群众斗争中发动游击战争，尽可能的实行农民割据。山东的党非常薄弱，尤其要注意在这些工农斗争之过程中发展并巩固党。总之，直鲁等省要在奉鲁阎冯等军阀混战及政权更迭之时，尽可能发展群众的力量，树立革命势力的基础，破坏奉鲁军队乃至冯阎攻入的军队，使国民党的欺骗政策完全失其作用。

东三省有很大的工业区，铁路，矿山，大连等无产阶级中心，然而党的组织非常之薄弱。同时东三省的土地关系是有极大的地主，而且地主、官僚、军阀互相勾结，压迫的形势特别明显；再则韩国的农民有很多的在中国的地主压迫之下，西境又和蒙古相联并且因中东铁路接壤的关系，与苏联有密切的关系。现时日本帝国主义尽力向满洲进攻，满洲几乎和日本的完全殖民地一样了。东三省的地域是非常之重要，而且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统治的大本营，本党必须艰苦的实行斗争，建立党在群众中强固的基础，在日常斗争之中建立工会的群众基础，领导农民的群众斗争，尽可能的发动领导其暴动。联合韩国、蒙古的农民，联合苏联的工人，联合日本的工人，联合奉系军阀的兵士，造成雄厚的势力——东三省是将来的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的枢纽。这种雄厚势力的造成，不但对于中国革命，并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有非常之大的意义。

城市贫苦的小商人响应，也都树起红旗，据东方社的消息，这次大刀会暴动之发展且有根本动摇奉系军阀在东三省的统治的危险，因此吴俊升亲率一千五百精兵，前往扑灭。这证明北方的农民与一般贫民反抗军阀政治，反对苛捐杂税（大城市）的自发运动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普遍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是领导他们力争解放的组织。

5. 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要看本党各级党部是否能切实执行这种政策而决定。治者阶级的一般的削弱与工农革命潮流之深入与普遍的情形之下，如果本党机会主义的遗毒仍未去尽，就是仍旧留着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领导群众斗争，甚至于阻止群众斗争，那么，因此而使革命势力再不断的挫折，这简直是对于革命的罪恶。同时在如此客观情形之下，不去认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不去认真的指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不去发动领导汇合群众的斗争及其革命意识，以创造总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力争政权之决心，而勇敢的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暴动的发动；却只有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在乡村中实行与群众脱离的游击以杀人放火，或者不问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轻易号召立刻在大城市暴动起来，轻易的脱离群众，实行少数党员的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这种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可以毁损党及群众的力量，不但不是增加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是要客观上帮助敌人毁灭革命的主观力量——这亦是对于革命的罪恶。

三

在执行总的政策与上面所指示的各省具体工作方针，各省委应当特别注意下列缺点之纠正：

1. 中国的革命运动，在现状之下，客观上好像农民运动超过于工人运动，这就是说工农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有不能领导农民争斗，城市不能成为农民暴动中心的危险。这固然：一由于中国是农业的国家，农民的数量超过于工人群众；一由于各大城市为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中的白色恐怖远过于乡

村，每一工人群众小的经济斗争都认为是共产党的争斗，施以无情的非人的压迫，因此工人运动难于发展。但是同时主观上还是各级党部有意的无意的放弃了工人运动，至少有些地方，没有把工人运动看得比发动与领导农民自发的暴动更为重要，因此无意的集全力于农民群众的斗争，而忘记城市应当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不知如何艰苦的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领导他们从日常细微的争斗中去发扬他们的阶级意识，去了解苏维埃政权之必要，去团结他们的组织，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秘密工会，组织各厂工厂委员会，以群众自己的力量战胜反动的压迫，这是一最大的缺点。各级党部应即按照最近中央扩大会议职工运动议决案的指示切实纠正。

2. 大的城市既为反动统治的中心，本党在各大城市中的工作尤其应当特别注意深入，不但要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把工人群众普遍的组织起来，同时要注意城市中一般贫民的工作，要切实的准备武装暴动的技术，要有计划的教育工人群众以巷战，要在警察与兵士群众中加以极艰苦的工作，要将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普遍于一般的劳苦群众。凡此一切的布置与工作是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与给反动统治以最后打击的先决条件。

3. 全国各省工农群众的斗争，大都是自发的斗争，党并没有充分领导与发动群众斗争，这显然是不了解发动群众的方法，放弃了许多过渡的斗争方式，因此党不能将发动的斗争汇合起来，如广州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广州的工人兵士群众已经起来，四郊以及其他各县不能同时起来，是广州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本党最好的经验，各级党部应当以后注意群众斗争平衡的发展，但这不是说某几个地方群众斗争已经起来，党不去积极的领导他们、去发展他们，而等待别处同时起来，

如此便犯了等待主义的严重错误，而是说在群众斗争不发展的区域，应当加以更艰苦的工作，如此才是切实暴动的准备，才能使暴动得到较大胜利的范围。同时本党一向不注意群众的宣传工作，亦是使群众争斗在政治上不能汇合起来，有更明显的政治目标的主要原因。群众的宣传煽动工作以及利用日常细微斗争的事实在工农群众中作普遍的苏维埃政权之宣传，以后当加以极严重的注意。

4. 党的组织从八七会议以后，并没有在许多工农群众剧烈的争斗中加以好多的改造，广大的工农革命分子并未吸入党来，党的指导机关仍然亦未加以多的改造，同时党员群众中发生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如广东潮阳同志之三 K 党（谓革命为大杀，大抢，大烧）的组织，各地同志一切解决于暗杀暴动等。如此 C. P. 本身将要发生极大的危险。倾向于纯粹无政府主义式的斗争方法。各级党部应当按照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议决案及中央关于组织的通告，加以切实改组，多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使本党更无产阶级化、布尔塞维克化，才能负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湖北省恩施、鹤峰一带。

PDG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

——关于全省总暴动与地方割据等问题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

江西省委：

接五日发的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赣西南工作两次决议案，八日来信，并听到×××同志的口头报告，惟所来各件洗出来均不清楚，特别是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大意都看不出来，兹就所见的并依据×同志的口头报告，特作下面的答复：

Ⅰ. 江西一省总暴动问题

江西在“八一”事变之后，财政破产已达极点，统治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工农及一般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已到绝端痛苦的地位，农民的暴动已经普遍全省，赣西南之万安、遂川、宁冈、乐安农民已经割据起来，其他各县亦有很大的农民群众斗争近于暴动的形势。在朱培德的武力所能镇压的十五县，农民的暴动一样的在乡村中发展，并未稍加遏抑。兵士群众已经开始动摇而开始自动的站在工农群众一方面。在这许多情形之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

下，江西确是一全省总暴动的局面。江西农民暴动之猛烈与范围之广大为江西历来所未有，如果不能抓住这时期，实行全省总暴动，诚如来件所说要失掉这一个革命的好时期。这就是说要切切实实的准备全省总暴动，你们的观察与努力是对的。但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下列的错误：

1. 你们认为蒋[1]桂两系军阀的武装冲突，很快的就要在江西爆发，江西已经成了蒋桂两系武装冲突的中心，你们所根据的事实很少，而且仅只就江西一省观察，同时你们又认为湘鄂战争已经告一段落，这是不正确的。A. 湘鄂战争并未告一段落而正在延长，唐生智残余并未根本消灭，而积极企图保存其实力与反攻，桂系军阀且有很大的损失，这是最近几天上海各报登载得非常显明的。你们在本月九日就肯定湘鄂战争已经告一段落，显见得不是事实；B. 蒋桂两系的武装冲突，不简单是江西一省的问题，至少是湘鄂赣粤四省的问题。不错，蒋桂两系现在都要拿江西，但这并不能说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马上就要爆发。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诚然是很严重的，但据各方的事实与观察，蒋桂两系都在切实的准备实力，准备一严重的武装冲突，尤其是桂系如最近李济深之让陈铭枢以广东省政府主席、白崇禧等之以湘省政权归湘系军阀等，都是应当加以考虑，除此，在湘鄂战争并未告一段落之前，江西成为蒋桂两系军阀冲突的中心，亦不能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在江西爆发，至少亦不是单独江西一省的问题。

2. 你们认为蒋桂两系的冲突马上在江西就要爆发，因此江西是一全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同时你们以为中央决定湘鄂赣三省的暴动区域，以湖南为暴动的中心，举行在湘鄂战争的时候，现在湘鄂战争既然告一段落，蒋桂两系的冲突，又在江西爆发，因此江西应当举行一全省总暴动，而且似乎以

为江西可以单独的举行全省总暴动，不顾湘鄂两省似的。这又是不正确的。A. 蒋桂两系军阀的冲突，不一定马上就爆发，而且不单独是江西一省的问题，在上面已经说过；B. 中央从未决定湘鄂赣三省以湖南为中心的暴动举行在湘鄂战争的时候，中央以广东与湘鄂赣为中国目前比较容易可以夺取政权的区域，是根据于一：革命民众本身的力量，二：统治阶级政权的动摇与全省的混乱及大小军阀不断的相互的冲突。中央只决定如何的在这许多省份切实的准备全省总暴动，如何的发动工农群众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从未决定在什么日子即可以举行总的暴动，即未定期举行暴动，暴动的时期是要看工农群众发动的情形、统治阶级崩溃的情形、主观的准备等等条件是否具备之后才能决定。中央以湘鄂赣为比较容易夺取全省政权的区域，是悬一这样的目标，要湘鄂赣的党按照这个目标做去。总之，中央的本意是：广东与湘鄂赣的客观情形与工农革命的力量，应当使我们坚决的确定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而湘鄂赣自成为一互相关联的区域——客观上湖南是一中心，由湖北、江西各处农民割据的发展，其势必须取得长沙，由武长路以达武汉。这便要成为全国的中心问题。我们的工作应当如此布置，这并不是说湖北或江西应当等待湖南然后再动。湖南与江西各区域应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以至各种可能的割据局面，即进展的方面应如上所述。以江西而论，如果只顾江西的一省暴动，只取得南昌，而不向湖南发展，则自然不能为全国中心。换句话说：如果事实上湖南先得，则形成江西响应湖南的形势，如果江西先得，则必须迅速发动湖南，迅速向湖南发展，然后才能巩固江西之胜利，而取得全国地势上的中心区域。

Ⅱ．江西总暴动局面的布置问题

你们分江西为五区发展农民暴动是对的。中央与你们没有不同意的地方，惟中央有以下的意见，希望你们加以严重的注意：

1. 南昌、九江、南浔路不定为全省暴动的中心。这些地方的工作现在非常薄弱，不讲为全省暴动的中心，连群众都不能发动起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你们似乎尚未看得十分严重，这是要迅速的改变的。

2. 赣西南割据局面之发展与完成为江西全省总暴动之先决条件，这个区域现在要切实注意，真能造成一全赣西南割据的局面，但同时要注意到湘南攸县、茶陵、桂东等县而发展，即要造成赣西南与湘南的割据局面。这一个责任在中央尚未更进一步决定湘鄂赣三省暴动计划的时候，赣西南特委可以管到与赣西南附近湘南各县的工作。主要的是：（一）应急速发展到泰和等县，瓦解来攻的敌军，而且与赣东发生关系；（二）应急速往北发展，向萍乡等处进攻，使湘军的部队瓦解，直接影响于醴陵等处——沿株萍路一带。

3. 江西农民的暴动，虽在全省普遍的发展，但在政治上与地理上，都未汇合与联络起来。这是一最大的缺点，现在要一区一区的将各县暴动的农民联合起来，同时，赣西南与赣东要打通关系，赣东与赣北要打通关系。

4. 省委要发表一宣言，提出具体的政纲，号召全省工农兵士群众暴动。

5. 工人与兵士运动要切实的工作。其方法详在下面。

Ⅲ. 赣西南割据问题

赣西南工作你们所规定的都同意，其割据的意义与湘南的关系在上面已经说过，现在要说的是：

1. 要赶快的把万安、遂川、宁冈、乐安打成一片，同时要向附近各县发展。

2. 在已割据的县份要铲除劣绅地主及一切反动的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各村各区都成立工农代表会议，为政权的机关。

3. 对于二十七师要采取进攻的政策，如能集中力量解决驻泰和的二十七师，不但能保障万安割据的局面，而且可以大发展农民的暴动。

4. 已割据的各县的苏维埃政府，须开一代表会议正式举出赣西南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为赣西南最高政权机关，与号召各县的最高机关，仍为县苏维埃，并须竭力切实组织乡区苏维埃（概称某某乡区工农代表会议）说明地主歼尽农民已得政权，无须农民协会，因由各村工农举代表会议，再选执行委员会，即为乡区政府。这些各级代表会议要常常开，要引导群众自己参加政府各种工作。

赣西南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应以革命政府资格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兵士、一般人民——（尤其对兵士）发出布告，要秘密贴到各地去。例如与驻在泰和战争时，一面即须做这种工作。

5. 赣西南革命委员会应当发表宣言及政纲，其政纲应当如下：

（一）铲除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

建立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

（二）完成全江西工农兵士的暴动，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新军阀朱培德的统治，夺取江西全省的政权，建立全江西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

（三）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四）实行耕地农有；

（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法；

（六）保护雇农的利益；

（七）建立工农革命军与革命的赤卫队；

（八）工农兵士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

（九）建立农民各种合作社，扶助农民合作事业，奖励合作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

6. 自耕农问题即你们所谓的富农问题。这是一最困难的问题。尤其在江西是中国自耕农最多的地方。这一个问题，在策略上我们的胜利尚未有全国或者几省的范围的时候，对于自耕农必须取联络的政策，不能大有害于他利益。但要在事实上做到以雇农失业的农民小的佃农为政权的中心。地主的土地必须分配给佃农、雇农与失业的农民。土地的问题，则须宣布苏维埃政权下的土地是属于国有，取消一切的地主所有权，实行耕地农有，以前一切地主所有田契宣布无效。各村（或乡）的土地，由当地农民代表会议自己决定分配。至于雇农的利益，有雇农保护的条件，切实保护。至于雇农委员会是否马上可以组织还须加以考虑。你们废除私人的雇农制度，是不妥当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问题。你们所定的办法，大体是对的，革命政府的布告应当说明实行这种政策。但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关系经济问题。

7. 经济问题的解决固然可以想出一些零星的办法，但主

要的还是暴动局面的扩大，即割据局面之发展，一县几县的割据是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

8. 工农革命军问题，据王同志报告可集中将近××××的新式快枪，必须将这许多武装编成正式的自愿的工农革命军。至其数量可定为××至××××。但须注意以贫农为中心成分。至于普遍的武装农民为自卫的性质则愈多愈好。这些武装必须能够受苏维埃政府调动。

9. 农民的政治宣传，除拥护苏维埃土地革命等普通的宣传加紧外，须特别注意提出向外发展、艰苦奋斗与敌人武装冲突之不可避免的宣传，尤为重要。

Ⅳ. 其他各区的问题

你们所规定的大体都是对的。中央必须要再三说明的是：要赶快将各区域中各县暴动的农民互相联络起来，才能成为一真实的暴动力量，否则便有被敌人随时容易击败的危险。游击战争在无军队的县份必须大大的发展。

Ⅴ. 南昌南浔路各大城市的问题

南昌南浔路各大城市的问题即是工人运动的问题——你们的来件说最近各县群众的争斗与暴动，完全是农民的，很少工人争斗的表现，这诚如来件所说是很不好的现象。但江西党目前的责任，就要挽救这一危机。中央的意思你们最近因为注意于农民暴动的发展，似乎对于工人运动未加以很大的注意，因此发生这种现象。虽然江西党人才缺乏，中央亦未有许多得力同志派去，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中央现在要你们特别注意这

一问题。要提出各种工人迫切争斗的口号，如加工资发现，发欠薪，增加工资，反对某一工头、包工等。这许多具体的要求要一业一厂的规定，规定之后，每个支部都要在群众中起领导与核心的作用。规定与领导工人小的经济争斗时，不要厌麻烦。工会要切实的恢复起来。工会的组织不一定拘于工会的名义，只要是工人群众的组织，直接建立在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面，任何名义都可以的。要指定大批的同志做工人运动。要在工人中注意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发展。要切实组织工人赤色自卫队，要设法教以巷战等。

Ⅵ. 兵士运动问题

我们须懂得中国现时军队尤其是南方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内部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和斗争。这就是说一方面由失业工农出身的士兵群众已开始接受了中国工农革命的伟大影响，一方面他们自己已由其阶级背景的反映开始向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利益的军官反抗。许多地方的兵变，许多地方兵士携械逃走，许多地方发生兵士反抗长官命令，或是兵士向长官闹饷闹伙食，这些事已不能再看做是一种普通军队的事变，而的确是这一新的革命阶段——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士兵群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新的发展。我们如能很明了地抓住这一发展，开始我们的士兵运动，我们必能在新政策领导之下创造士兵的革命力量与工农革命力量相汇合。

我们对待现时军队的根本策略是：破坏军队的组织和力量，扩大士兵运动，建立党的士兵支部使能分化并领导一部分士兵群众成为工农的武装势力。我们对现时军队千万不要存一点幻想，以为我们有人可以充为军官便希望他能在军队中“飞

黄腾达”，由下级军官而中级军官而上级军官，可以拿住这整个军队然后用之以掩护工农运动，甚至发展工农运动。如果有这样打算，显然是机会主义的企图，且完全在事实上行使不通，江西省委必须断绝一些在军队中同志的这样痴念。

固然能利用一些军官同志的地位和机会去发展士兵运动，建立士兵支部是很必要的。但最主要的士兵运动方法，还是有组织地派遣大批工农同志以及得力的非同志投入军队充当士兵，由日常生活小的煽动小的斗争反抗长官一直发展到兵变，或是联合群众携枪逃入农村散入农民群众中变为农民的武装，或是当着军队与工农暴动的群众决战时在内响应以消灭军队的力量。这一方法是目前江西最须要的，望省委切实计议执行。其次，以有组织的工农群众或是化装（或为卖吃食的小贩或为流氓）宣传分子影响兵士群众发展我们组织。至于文字的宣传在中国军队中还只能收最小的效果，其作用并不见大。（下略）

中　央

一九二八、二、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PDG

中共中央关于顺直省委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一）

奉系军阀的统治，加以对于晋阎[1]豫冯的生死战争，对于顺直民众的压迫与勒索，已是穷凶极恶，无微不入。苛捐杂税、军用票、军事特费、军用捐、拉夫封船，强占民房等等，是一般民众所受的痛苦。沿京汉线与直南的民众，因为系战争的区域，更直接受拉锯式战争的摧残，充当炮灰。战事的影响，交通阻碍，原料缺乏，销路减少，因此工商业日趋破产。资本家更加加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而形成最近资本严酷的进攻。工人群众日在任意开除、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加多、工资发军用票纸币，或者长期欠发、停工、失业，任意押扣花红储蓄金不发等等非人的虐待之下过活。农民群众除一方直接受军阀的剥削，同时地主豪绅又利用其乡村统治，对于农民百端的敲诈与勒索以至农民十九破产，流为乞丐兵匪。金融紊乱，财政破产，更是不可收拾，因此票价低落。物价飞腾而直接影响于工农，与一般贫民的生活。兵士哗变，军饷全无，或者八九个月十几个月不发，携械为匪者益愈众多。在这许多情形之下，造成直隶全省以及三特区的极端贫困、混乱、破产、失业，全省皆匪的局势。工农群众自发争斗的爆发，已经成了普

遍的必然的事实。不久以前京东玉田农民的暴动与最近天津裕元纱厂、北洋纱厂工人群众的争斗与津浦路工人要求发欠薪的争斗就是显明的事实。直隶全省工农群众争斗之广大的发展与城市贫民反军阀统治、反军阀战争的潮流汇合，将根本动摇奉系军阀在直隶的统治。顺直省委目前工作主要的任务便在深入到广大的工农兵士群众中去。以全力领导并发动工人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争斗，在争斗的过程中巩固与扩大工人群众的组织，并努力使工人阶级在一切的争斗中取得领导的地位，成为一切革命运动的领袖。领导并发动农民群众自发的斗争，进于抗租、抗税、抗债等争斗以至武装的游击战争到尽可能的割据。领导并发动兵士的兵变，并在反革命军队中普遍的建立本党的支部，或士兵委员会，赞助工农群众革命的争斗，提出一般城市贫民争斗的口号，领导并爆发他们反军阀统治、反军阀战争的争斗。如此切实的准备群众广大的基础，汇合工农兵士城市贫民的争斗，组织武装暴动推翻封建军队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路上走。这是顺直省委一般工作的总任务。

奉系军阀的统治正在崩溃。内有新旧派相互的冲突，与鲁张[2]的冲突，与孙传芳的冲突，外有与晋阎豫冯的战争。顺直省委应当切实准备利用奉系军阀的内部武装冲突，或是与阎冯的战争，或是奉系军阀根本战败，夺取溃兵与小部队的武装，积极发展工农与城市贫民的争斗，造成全省大扰乱、农民实行割据的局面，以缩短全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

直隶的工农群众，因为未直接受国民党军阀、国民党的屠杀，对于北伐、对于冯玉祥尚存有多少的幻想，以为北伐军进占顺直，或者冯玉祥军队打败奉鲁军，可以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一最不好的现象，同时即证明本党在北方势力之微弱，不

但在组织上未能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就是在政治上亦不能影响他们，使他们在我们的政治口号与纲领之下团结起来，觉悟起来。顺直省委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指明国民党军阀、国民党、冯玉祥在南方与河南屠杀工农群众，扑灭革命运动种种罪恶的事实于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面前，使他们对于国民党、冯玉祥等不存任何幻想，只有靠自己团结的力量，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与一切军阀的统治才是出路。同时顺直省委在一切的日常的工作中都要注意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之宣传。

（二）

工人运动为顺直省委主要的工作。直隶之天津、唐山、大沽、秦皇岛、石家庄等处为中国大的工业区，同时又有京汉、京奉、津浦、正太、京绥五铁路的工人群众为全国铁路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区域。集在顺直的无业工人群众约在五六十万左右。本党未能发动并领导他们争斗，这是本党最大的耻辱。顺直省委应有一切实的积极的职工运动的计划，从各厂各业去发动工人群众的争斗。这就是说要定出各厂各业工人迫切争斗的口号与要求，而且要每一时期每一时期的规定，如此才能真正深入工人群众的争斗。至于目前一般争斗的口号，应当是：工资一律发现金，发还欠薪，增加工资，工资按物价高涨，发花红，发还储蓄金，反对停工，救济失业，反对虐待工人，反对虐待童工女工，反对不良的工头，工人开会结团体说话出版罢工等自由。

经济争斗的策略主要的固然是要从各厂各业做起。但顺直的工人群众的争斗，从未有广大的普遍的爆发。顺直省委目前职工运动的策略，应当集中力量在最短的时期内在天津或唐山

爆发一较大的经济的罢工或是普遍的发展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以发展各地各种工人的群众争斗，造成北方职工运动的高潮。如此才能普遍的把北方的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使他成为一切争斗的中心，而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

铁路工作应当根本从下层，一地一地的做起。各路各地铁路工人群众组织好之后，然后再开真正的代表会议组织各铁路总工会，改组全国铁路总工会。这是北方铁路工作目前主要的方针。如果再继续过去工作的方法，只有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的工作，而无各路各地铁路工人群众的工作，便是绝大的错误。但这不是说现时不能以全国铁总的名义去号召铁路工人群众并组织他们。

工会的组织必须建立在各厂各业工人群众直接的基础上面。奉系军阀与天津唐山各地的资产阶级因为慑于南方工会之英勇争斗，预防北方工人群众工会组织之崛起，而施以绝大的压迫。此时仅以单纯的工会的名义，已不能组织广大的工人群众。此时应不拘束名义，不拘于一种组织的方式，而只要是工人群众直接的组织，例如津满铁路工人之生活维持会等。但各地已有的总工会（如天津总工会）仍应存在，与广大的工人群众不断的发生关系，领导他们作各种争斗，并要努力在宣传上团结各厂各业的工人。至于经济争斗与组织问题详细的策略，一般的可应用全国总工会最近扩大会议总任务的决议案。

（三）

农民运动为顺直省委主要工作之一，农民运动争斗的策略首先便是要领导农民自发的争斗。直隶农民早已形成许多抗税抗捐原始的暴动并产生争斗的组织，如红枪会、天门会等。顺

直省委过去未领导这许多农民自发的暴动，这是直隶农民群众未普遍的起来主要的原因。玉田的农民暴动虽在顺直省委领导之下，但因指导的错误即归失败，至今尚未恢复起来。顺直省委此时应用全力于玉田农民运动之复起，与玉田附近各县农民争斗之发展，在此地创造一直隶农民暴动割据的中心，而影响全省农民的争斗。此外，亦应集中力量于铁路沿线与各大城市及产业区如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大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等的附近。在这许多区域有计划的发展农民抗租、抗税、抗捐、抗债等的争斗，进于武装的游击战争，杀戮土豪劣绅、大地主，夺取民团的武装，分配土地。至于对于红枪会、天门会的群众应当取分化的政策，打入他们中去，提出下面争斗的口号，使他们在争斗的过程中在他们的领袖，实际上即是新的土豪劣绅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执行土地革命的工作。对于土匪亦应取分化与消灭的政策。如果某县某几县农民群众武装游击战争之发展，农民群众已经普遍的起来，而根本动摇乡村反动势力的统治，更应组织农民代表会谈。如此一乡一区的组织起来，进而至于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此种割据局面之创造与发展，尤其应当利用奉系军阀之内部武装冲突与冯阎的战争或是奉军败退出关的时候。京东之玉田以及附近各县，此时工作的目标，即应是割据局面之创造。

农民运动此时主要的口号应当是：抗租，抗税，抗捐，抗债，没收地主的土地，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保董、庄头，围缴保卫团武装，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政权万岁，打倒奉系军阀，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反对旗地变民。此外在遵化、宣化应特别提出夺回红椿地，其他各地亦应斟酌情形，提出农民在本地密切要求的口号。

为要切实的领导与扩大农民争斗，顺直省委必须派出一定的同志在一定的区域（即上所指的区域），艰苦的工作，才能得到工作的效果。

（四）

组织问题主要的便是要继续最近改组会议好的精神，实行从下至上的改组各级党部，多选举好的工农分子同志来党的各级指导机关负责，并在最短期内举行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省委改组的缺点，在组织上主要的还不是彻底的自下而上的改组，同时又不是直隶各地党部都有代表参加这次改组会议。因此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尤为重要。

一切组织工作的原则主要的是要根据中央最近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与最近中央所发出的三次关于组织问题的通告。顺直省委除努力的切实执行外，还应特别注意党员数量之增加与干部之培养。顺直省委当前的主要的组织的任务便是如何使顺直党部从小团体变为直隶广大的工农群众的群众的政党。这主要的固然是要发动与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争斗，但在争斗的过程中，应当切实注意党员数量之增加，要做到在每业、每厂、每个矿山、每个轮船、每条铁路、每一军队、每一重要农村中，都要有本党的同志，本党的支部，并起领导的作用，其次便是要有许多许多的干部人才，在各种革命势力中取得领袖的地位。在培养的方法应按照扩大会议后中央第三次组织问题的通告。

直隶的党开始从小团体过渡到大的群众的政党的过程中，党的力量与一切工作之发展，要集中于大的城市，大的产业区与各铁路。这许多地方就是天津、唐山、北京、秦皇岛、大

沽、张家口、长辛店、保定、石家庄与京汉、京奉、京绥、津浦、正太五铁路。在各军队中、兵工厂中，同样的要特别注意本党支部之发展。农民支部之发展，主要的是要按照上面所规定的农民运动区域。

根据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十四期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2〕指张宗昌。

PDG

中共中央给满洲临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满洲临委：

一、临委代表大会举出之正式执委七人，候补三人，批准。

二、东道之红须子暴动运动，现时不能举行。这纯全是一种不要与不贫农民群众的军事投机的倾向。即令海龙、金川、柳河等县能攻下亦纯全是红须子的抢劫的行动，无农民暴动的恶幕，因为农民群众既无广大的组织的力量，红须子是不会受我们指挥的。这议会要使一般的去深入与领导农民群众争斗的意识模糊，而变成纯粹的红须子的运动，对于红须子的政策只能在其中发展支部的组织，发生分化的作用，使他们在初期农民运动的时候，不妨害农民运动之发展，在某几种情形的条件之下，而相当的帮助农民运动。为要实行这一政策必要派大批的同志去工作。如他们硬欲攻城，果真是我们的领导亦只能采用游击战争的策略，而勿幻想组织什么政府与割据局面之实现。在农民群众尚未广大的普遍的组织起来的时候，这种局面是不会有的。临委现在要积极的发动这一区域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小的自耕农的群众的争斗，依照：杀土豪劣绅地主，官吏，抗租抗税，抗捐，抗债，抗粮，打征收局，没收土地，耕地农有，反对军阀战争等口号进行。普遍的组织农民委员会，

宣传苏维埃政权，进而至于武装的游击战争。不经过红须子不能打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是非常错误的观念。事实上东三省的红须子大部分是与日本人勾结在大城市中或城市附近抢劫，或是以抢劫为职业与官军勾结。这两类的红须子农民是非常痛恨的。至于反对官军而不十分扰害贫民的红须子为数很少。我们在农村中主要的工作是贫农群众的运动，而不是红须子运动。劣绅地主都住在城市的认识不正确。农民群众一起来，便要领导他攻城，更是错误的农民运动的策略，希望你们依照中央近三四月来发的各种通告，改正一切，铁路的农民运动必须大大的发展，占最重要的位置。

三、满洲临委政策的主要精神应当是深入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艰苦的领导他们作各种迫切的经济争斗，发动成为群众的组织，发展党的组织，成为群众的政党，积极的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准备一最后的最大的武装暴动。而不是目前即举行什么暴动，因为满洲事实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个地方暴动之举行是要发生严重的国际问题，而且必须在中国革命相当的成功之后。忽略这一认识，将要发生相反的结果。反日本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反军阀统治，反苛捐杂税等运动，一样的要积极领导与发动。在这许多运动中发动工农的争斗，逐渐取得领导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四、工人运动要特别注意铁路工人、矿工、兵工厂、各大城市的工人。从迫切的小的经济斗争做起去组织工人群众。组织的形式，不必拘于工会的名义，应当要是工人群众直接的组织，任何名义都可以的，甚至拜兄弟等方法亦必须采用。兵工厂的运动不是破坏亦不是暴动，而是要艰苦的有耐性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群众的秘密组织，作小的经济的改良待遇的斗争，建立一最深的基础。在我们总的政策之下需要动作时，

再决定何种形式动作。现时的破坏与暴动的工作，只有与我们不利而有利于蒋介石。大连码头工人罢工运动，事前要将要求的口号具体的规定，使全体工人了解，即要事前有普遍的宣传，要将新工的组织组织好，要能在罢工发动之后，经得起日本人之野蛮的压迫，才不会失败。这是要你们特别注意的。但这切不要误会是不要这一罢工的争斗，中央的意思是要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争斗。

五、兵士运动要与工农运动一样的艰苦工作，要打到各部分军队中去，不仅是学生军中的工作。

中　央

二月二十二日

附：陈为人关于满洲工作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我这次来沪，什么文件也没带，我今天的报告，只能择要与从略。

（一）最近一月来在满洲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件，第一是奉哈票仍继续跌落，尤其是奉票竟跌至四十五元值现洋一元，影响所及，单以奉天省城一地而论，倒闭的商店千余家。镇压省城的骑兵，竟由城内哗变而出城，同时一千八百余人的学生军亦全体以退出军营为要求，向其长官提出改良生活的条件。城内外马路上的市民，均相率不谋而同的说，“活干么，大刀会吗！”（即从大刀会而起事之意）。第二是东边道（即我们工作计划中的柳河区）佃农、半自耕农、采森林工人所组织的大刀会二千余名，以反抗苛捐杂税和官军的压迫，而攻破通化，

震动满洲全境，与吴俊升亲征之大兵血战二周。第三是日本强迫数百万鲜民降服日本，特勾结中国官厅压迫鲜民出境并夺其已开垦之土地。第四是阴历正月六号抚顺千余煤矿工人之流血暴动，被日军警枪决六人，伤二十余人。此外在关东洲附属地之南关岭百余名油篓工人暴动，以打死日本人三名而全数被捕。这些自发的工人的农民的革命的暴动，都使我们满洲省临委日夜想法去如何找线索和领导他们。

（二）我上次回满洲后，即由省临委派出三人分往北满、南满各县巡视各地党务工作，经过半月之久，各地的下级组织自支部起至县委始改组完竣，各地的工作亦已详细规定就绪（载在满洲通讯上三四各期），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亦已详细向同志解释。至阴历正月七号，始开全满代表会议从新改组省临委，到会的代表，计每三十人派代表一人，共计有表决权的代表九人，有发言权的代表五人，当日的议事日程，为（一）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报告及讨论，（二）旧临委报告及讨论，（三）中央对满洲工作计划报告及讨论，（四）改组。改组的结果，举出七人为执行委员，三人为候补委员，某等三人为常务委员，委员十人中，工人同志六人。

这次改组的意义与工作，第一，兴奋了四分之三的下层同志；第二，打破了满洲同志向来不相信群众只害怕张作霖的成见；第三，由形同无组织的个人英雄式的指导，而变成了有集体组织的指导；第四，使满洲同志由自己的组织工作中已引起相当的争论而得到相当的经验；第五，在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所指导之下，使满洲同志对于土地问题、政权问题、职运问题、党务改造问题，已得知其大概而明了自己的责任。所以自工作的发动不久，在同志的数量上，已由一百七十三人增至二百五十人，其成分工人占百分之七十，真正农民六人，知识分子与

自由职业者占百分之三十弱。县委三，即哈尔滨、长春、大连（奉天不在内）。特支三，即□□□等三县。特委一，即指导东边道之农运、军运、党务。

此外有一特别的现象，即知识分子的同志，脱党者多。而工人加入者多，农民才开始加入。

我们为了要发动各地的工作，十分感受着工作人才的缺乏，曾于最近四十日内开了三班特训班，每班平均八人，课程分：（一）马列主义概论，（二）中国革命问题，（三）中央新议决，（四）党的组织工作问题，（五）农运，（六）工运。现此二十四人均已分别调往各地担任农运职运与常务的指导工作。

（三）农运，一、沈辽区专派了二人去担任此项工作。二、关东洲区已专派了一人去担任此项工作，以上二地，已有农民同志的加入。三、牡丹区已有农村支部，现正从事秘密组织与煽动的工作，据此地农民同志的报告，此地的一般农民，已有跃跃欲动的意思。四、东边道区，已派出五人去组织特委，指导此地的农运、军运、党务。据负责同志的确实报告，此地金川、通化等五县，乡村中皆佃农、半自耕农与已破产的农民，地主豪绅等均早已避入县城，乡村中的政权为二，一是土匪的政权，一是官厅的政权。官厅的政权，只是有期的派大兵去收税，凡农民的一切诉讼、治安等，是没有力量去管理的。土匪的政权，可真说是与农民的一切生命治安有绝大的关系，农民如果不给土匪捐门牌（纳税）、抱信、守秘密，就有全家生命的危险。但农民之对于土匪，此较对于官厅的感情好，因官兵每月饷合现洋不过二元，甚穷，一下乡，即抢劫农民，打农民，吵闹农民，而土匪则不然，有理有法，同时因为历史上的关系，农民之视土匪，早已司空见惯，并不觉得讨厌。只要与

土匪有关系的人，可以住在农村中办理任何事业。这些土匪，共约一千五百人，每人一马一新式枪，各有子弹百余粒，其成分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余则为逃兵与已破产后流落的农民，其总头目是简易师范毕业生，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已由一很忠诚的奉天本地同志和他们大小头目结拜同盟弟兄，我们提交他们的口号，“杀富济贫”、“杀尽地主豪绅官吏”、“没收地主的土地”、“工农兵联合起来”，他们均愿意接受，提交改组他们的队伍组织与打破他们各股地域割据的形势，他们亦均愿意立即接受。我们满洲省委对于此项工作计划的决议，第一在原则方面要将满农村中的二个政权，变成农民的政权，领导土匪并组织农民加入作游击攻城的战争，杀地主豪绅官吏，同时取得城市中的物质，减免农民对土匪的纳税，提出停止向官厅纳税与没收土地的口号。如在攻城时取得敌人的武装，注意武装农民。第二在农运方面，派人在各土匪区域内组织村农会、区农会、县农会，实现农民的政权。立即组织农军，一方面土匪作攻城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作防卫自卫的斗争实行抗税与没收土地，同时努力建立党的农村支部。第三在军运一方面，联络大刀会，煽动县城中每月只现洋二元饷的兵变，立即调集土匪集中，编成大中小队，并改为委员制，须有农民代表加入。惟名称如何，我们没有决定。土匪对我们无要求，只要求我们设法找二尊小的山炮，作为游击攻城之用。我们终认为以上的事体重大，要请求中央指示以便工作。（五）在接近京东内蒙一带的农民区，此刻还没有找到线索与派人去。

（四）职运，职运唯一的出路，我们已规定各地组织秘密工会与作小的经济的斗争，抚顺本溪湖二大矿，已派了一人去，成绩如何，我不能报告。大连的码头工人已找到了头绪，自己有了支部的组织，并顺着群众自发的意见与要求，近在进

行谋大罢工的实现。吉长铁路秘密工会的进行一开始，不幸便发生长春县委完全被破坏，致中途停顿。中东路中国工会的组织，纳月费的会员已有六百人。惟兵工厂二万工人的运动进行甚难，省临委催促该厂支部同志组织秘密工会，与领导工人作经济斗争，该厂支部同志以工人工资高，工作八小时，待遇较好，军法森严等理由拒绝，说是该厂不是作组织秘密工会与作经济斗争或暴动的地方，而是组织党员与作政治破坏工作的地方（即烧毁工厂等行为），因此党内也就发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前一者，一是主张后一者，我们特请中央给我们一个指示。（下略）

二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十三期刊印。

PDG

中共中央复广东省委的信（粤字第四十号）*

——斗争的扩大与深入和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广东省委：

接到你们最近的工作方针，并参考立三[1]同志的报告，中央以为广东省委最近的主要任务如下：

一、最近广东的情形，虽然仍旧是李蒋[2]斗争的酝酿局面，然而：一则蒋派正在联络冯玉祥、拉拢小军阀等的准备工作中，蒋已指令自己一派停止攻击李济深，李亦似已遵命不再追击张发奎而任蒋调此部队参加北伐，将功赎罪；二则正因为广东各地农民暴动高涨急遽进攻反动统治，海陆丰仍在发展，所以两派军阀有暂时停止剧烈的互斗，而全力来扑灭农民暴动势力，尤其是海陆丰之势。

二、广东工农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搏战，因此进展到更加剧烈的阶段。现在决非单独的海陆丰的问题，尤其不是保存海陆丰的问题（战事形势上例如海丰城之暂时失去，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失去，决不能影响全省暴动的总任务）。现在是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十六期。

整个广东反动势力与工农革命势力的决战的问题；反动势力现在是进攻海陆丰，进攻各地的农民，对广州及各地工人的极高度的高压；工农方面应当采取猛烈的进攻，加速发展各地农民暴动，崩溃敌人的军队，消灭豪绅地主的武装，加速发展各区暴动的割据局面，加紧工人的斗争，加紧兵士运动。尤其是在海陆丰应取进攻的迎头痛击的办法——不但是不应以退走为策略。

三、具体些说：

（一）海陆丰政府的工农革命军，一部分已派到普宁方面，一部分派到紫金方面，而惠州、石龙这一方面似未布置，这是一个危险的状态，必须急速调遣一部和农军共同往一路迎头打去。在海陆丰之内应当尽量发展极大规模的政治鼓动，指出现在经济的困难，是由于全省政权尚在反动豪绅军阀之手，指出农民痛苦土地问题等至少必须广东全省政权之取得，工农解放的彻底成功必须全国革命的成功，所以不但一般海陆丰人民应当努力保卫苏维埃政权，而且要努力于发展全省暴动。在海陆丰之内，要组织工农群众，准备守卫海陆丰，尤其要将工人组织城市中的赤卫队，否则农民的倾向，在敌军逼近的时期，很容易发生过早的弃城入乡的方略。此外，自然更要尽可能的扩大工农革命军及赤卫军，调往各前线作战。总之，海陆丰的进攻与扩大是唯一的保卫海陆丰之策略，尤其要注意惠属方面的迎头进攻。各方面的进攻当然不应全是军事的，应当以邻近各县的农民群众发动暴动为主，应当派遣许多公开的秘密的宣传队到敌军中去宣传兵士倒戈，苏维埃政府应以政府名义多发告敌军兵士的布告、宣言、传单。

（二）北江南路海南西江各区的暴动，应更加加紧发动或发展，向广州取进取之势。并应有更加紧要的计划。特别应当

注意的，是要在每一割据区域取得较大的城市（商业中心）。所以省委应特别注意各城市的工人运动。一般的苏维埃政权工农革命的宣传要极其普遍；这些城市之中的一切日常经济斗争，都要努力领导，使工人群众认真的准备暴动。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这种割据的发展，必须取得各区内的较大城市的中心，同样，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所以广东在现时这种最紧张的斗争中，城市工人运动是十二万分的重要。

（三）尤其要注意的是省委对于中路的工作。中路有许多较大的城市，城市工人运动自然要加紧的注意，要发动工人的斗争。中路不能再取缓进发展的方针。应当在农民中发动极多极广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斗争。

只有如此才能在各方面，尤其是中路骚扰进攻海陆丰军队的后方。

（四）省委及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有政纲性质的宣言：说明工农革命所要土地制度的改革，暴动法的严格执行，大生产的工厂公司收归国有，组织工农革命军，改良士兵生活（兵士委员会参加管理军饷的支配），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统治等，谁是反对这些事的人，工农民众自然要加以铲除，加以严格的镇压。对于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加以痛切的描写，对于反动派造谣说 C. P. 革命就等于大杀大烧大抢的论调，加以痛斥。这种宣传应当极广泛，普遍到一般民众。

（五）广东省委的兵士运动开始的成绩非常之好。现时的问题，不但是在普遍发展这种比较经常的工作于全省，特别是桂军，而尤其要在军队中做极广大的反对打工农的工作。

再则关于组织上的问题，现在省委所执行的改组工作，无

疑的是党所亟须的，集体化的指导，工人同志实际开始做各级党部指导工作，去掉指导机关中犹豫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民主主义化，使党员群众开始实行监督批评党部机关——这个路线都是非常之好的。此后必须积极的坚决继续执行这种方针，但是，还要更正确的指导这种组织上的建设，使有健全的无产阶级的路线。

省委自从上次改组后，对于组织上的指导，也和对于广州暴动批评的态度一样，有一种过偏的倾向（关于广州暴动问题，中央将另有通告）。省委前此对于组织上的偏见如下：

认为因为党的指导机关是智识分子所组成，所以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种见解是不对的。党现在必须提拔工人（贫农）到指导机关中来，必须扑除许多犹豫动摇的智识分子，这是因为现在这些智识分子的确犹豫动摇懦怯，这是因为这些（有时也全是工人的）的观念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所以是机会主义的。这并不是简单的因为这些人是智识分子。

八七会议之后我们党开始新的生命，我们半年来努力的工作，改造党的组织是重要任务之一。现在各地改造工作的成绩，应当算广东是第一。但是广东的改组仍有这种缺点，中央认为必须速加改正。改组党部的过程，须使一般党员对于党的组织问题能够肃清旧的不正确的观念，同时便须给以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观念，省委的观念虽不是完全排斥智识分子，但确有“指导机关在智识分子手中，所以是机会主义的，只是指导机关在工农同志手中，便自然不是机会主义的了”之观念的倾向。这种观念便显然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无产阶级的观念。此后一般同志很容易因此观念，而以指导机关是否有工人或工人占多数的一个简单理由来做决定此机关是否机会主义的标

准——不问他的政策如何。这当然就不正确了。我党不但要指导机关有工人，而且要指导机关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因为工农分子也会有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如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

中　央

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李立三。

〔2〕指蒋介石。

PDG

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

——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目前统治阶级日益崩溃，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粤湘鄂赣等省农暴日益扩大，中央对此局面有如左之决定：

一、革命是高涨还是低落一问题的回答：

A. 易纨士及各国公使南下后，帝国主义之间愈表现互相冲突，而且使各派军阀都有后台老板互不相下。

B. 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逐渐崩溃，失业工人增加，改良政策不能实行，只能用白色恐怖镇压革命。

C. 城市工人对统治阶级严重的复杂的斗争，愈表现其对农民暴动的领导地位，城市统治阶级亦无力援助豪绅地主。乡村农暴高涨，尤其是粤湘鄂赣豫。

D. 因土地革命的深入，促成兵士的革命化，兵变响应农民暴动的事实渐多，因此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中国，此一帝国主义与彼一帝国主义，新军阀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此派与彼派，资本家地主与工农，其间各种冲突矛盾，继续增高，阶级斗争到了国内战争的程度。广东、湘、鄂、赣等省内，革命反革命已开始互争政权中心之大城市。革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

命是正在高涨无疑。

二、自从国民党四次全会后，借北伐名义，投降帝国主义，准备浙桂两系大战。南京的中央即是几派军阀的军事同盟，与别的军阀对抗，将使广东、湘、鄂的战争扩大到争取武汉、上海等重要城市的战争。

三、现在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同时加紧，都要夺取工商业中心的城市。统治阶级此时压迫城市工人必更凶，无产政党便更应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摇动反动的统治——在沿海各省和内地工商业城市更为重要。

现时我党的策略应是：

第一，特别加紧工人运动和准备暴动的工作，并扩大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第二，使自发的农暴在土地革命口号之下行动；

第三，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务普遍进行；

第四，加紧反帝运动，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

第五，党的彻底改造，肃清机会主义余毒；

第六，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与行动要更加紧。

从一般形势看，现有两个革命中心区域，第一是广东，第二是湘鄂赣及豫南，后一区域的布置应暂以湖南为中心，而武汉的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暴动的完成，并当使暴动的武汉变为全国的革命中心。

中　央

三月六日

按：附文是给各指导机关参考的，亦应尽可能的发到支部去，但正文必须发到支部去。

附：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一

中国现时的状况之下，革命是否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有些同志竟有怀疑革命高涨的意见，这种意见的论点是说广州暴动之后，各地的党，尤其是城市之中受着许多摧残，职工运动不能有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甚至于认为各地的农民暴动也只是失败中零星的奋斗，于是便“证明”革命是低落了，于是便说帝国主义驻华军队的撤退也证明中国没有革命的危险，便说长江轮船交通的恢复也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经济的稳定了。这种见解显然是不对的。中央认为有再简明的指出革命高涨的形势，大致的分析最近政治状况及确定党的政治工作方针之必要。

（一）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在国民党完全反动之后，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是否因而稳定呢？不能，因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依然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不能向中国资产阶级真正的让步（如关税自主等），因此，帝国主义绝不能施行任何改良方法以缓和中国革命。而且中国并不是某一强国的殖民地，而是英美日法许多强国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相互间的利益永是互相冲突，所以他们并不能有一致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在现代世界革命潮流之中，绝对不能用改良妥协的方法便能解决。帝国主义以最猛烈的手段（如炮轰南京、上海驻兵、封锁长江

等）胁迫中国资产阶级，使其成为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农革命的工具。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动之后，中国工农革命的潮流更形猛进，正因此，帝国主义便减少驻华军队，声明与国民政府合作，幻想着用这种手段帮助资产阶级缓和中国的革命潮流。同时，帝国主义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组织一强有力的统一政府，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买办豪绅资产阶级之割据局面对于他们是有利益的，所以他们现在的政策正想维持这种割据局面。最近易纨士之提倡关税会议，主张各口岸的地方政府分收关余及英公使蓝浦生之南下，都是无形中承认割据各地的地方政府。这种政策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易纨士主张关税增加到三五，由各地方政府分配征收，但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一便要求用此增加之关税去担保日本之借债，而且要求互惠的关税。因此对于关税问题，帝国主义相互间首先不能同意。

（二）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豪绅资产阶级需要军阀的统治以镇压工农，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这种经济力量维持如此广大的军队。抽交苛捐杂税为维持军阀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非常薄弱，而且势必趋于崩溃之途，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再则中国新旧军阀如此之多，而其经济力又如此薄弱，所以豪绅资产阶级又分出许多派别，地方的或职业的，所以他们便不能不互相吞噬，以自求生存。这是豪绅资产阶级之各派相互间的矛盾。三则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与中国资产阶级以任何让步，因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经济力量之非常薄弱非常急遽，非常紊乱，又以军阀之苛捐杂税与混战，所以资产与劳动、地主与农民之根本矛盾更激烈的爆发出来，而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不能施行任何改良政策以缓和土地革命，甚至于减租运动都不行，也不能施行任何政策使工人阶级生任何改良主义的幻想。

现在各省经济都在崩溃之中，豪绅资产阶级不得不公开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或无形的（如江浙）取消减租二五及“共产时代”的劳资条件，极凶猛的进攻工农。即使长江交通一时恢复，金融经济流通了些，但这不是说资本家地主可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给工农以某种改良政策的出路；这只有更加加增资本家地主“恢复原状”的进攻形势——事实上现在全是地主资本家要求一切回复去年革命运动发生以前的状态。这是地主资本家非完完全全消灭工农运动，而实行绝无限制的剥削，便不能经营自己的经济——经济恐慌的程度，使地主资本家不但不能实行改良政策而缓和工农革命的斗争，并且不得不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更谈不到甚么发达经济等等。而且这种地主资本家的进攻政策，事实只是更加破坏他们的经济，不但武汉有十万以上的失业工人，甚至上海的失业最近也成了日益急剧的问题。各省的财政恐慌日甚一日，军阀大半不能维持自己的军队，这尤其是显然的事实。

（三）工农运动的趋势。城市工人群众在这种严重的资本进攻与白色恐怖之下，虽然不能立刻发动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但是他们的确需要斗争，他们的日益进于武装的方式，他们急迫的需要群众的组织，需要新的斗争和组织方式，需要认真的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指导，职工运动中新的群众斗争。即使城市工人之中，有一时或一部分倾向于轻率的个人恐怖行动或过早的脱离群众的暴动，或者多数群众畏惧斗争，这只是更加证明革命的剧烈。豪绅资产阶级受着工农革命暴动的威胁，他们尽全力集中于主要的工商业中心，来勉强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的权力在许多省份之中不能达到乡村以至州县，因此一方面是城市中反革命统治加紧压迫，别方面就是工人斗争更加显出对于农民自发暴动的领导地位。现在是革命斗争进到了

残酷的剧烈的国内战争状态，一切白色恐怖的残酷，工人斗争之武装冲突（杀工贼走狗）的继续不断，农民游击战争杀戮豪绅、收租人、收税人、债主等运动普遍发展，都是这种状态的表征。同时现在也是革命斗争进到与反革命决战的趋势：不是革命势力从割据乡村州县进而发动城市群众暴动夺取工商业中心，便是反革命势力从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与压迫工人运动进而举行“清乡”的企图。现在工农革命运动的趋势可以说是开始国内战争，部分的（尤其是广东、湘、鄂、赣、豫）已经进到争城市争工商业中心的斗争。

现在的事实是：甚至于天津、唐山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已经重新开始，上海在严重的恐怖之下，在工统会工总会的工贼扰乱之下，工人、店员的斗争仍是日夜不绝，苏州、扬州、镇江、宁波等处工人自发的斗争也继续不断。武汉的工人虽在桂系严重的摧残之下，武胜门外曾有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罢工，工人群众对于政治的认识和夺取政权的要求比上海工人还要进步，在去年阴历年底群众在暴动的口号之下很热烈的有组织的起来参加。现在在组织上已经改正了支部工会之缺点而有工会四十余个，严格的组织在工会之内的虽只有八千人，但能在工会号召之下的有八万人，都是占重要部分的群众。总之，除开广州而外，武汉工人的斗争力量和政治意识都比任何一地工人进步。广州工人在暴动失败、党部受摧残后亟亟的找党要求加入。这些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的斗争，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巨大的爆发，而实际上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搏战最紧迫的枢纽。

农民斗争的高涨，那就更是显然的事实。固然，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以及豫北等处，还有许多地方是偏于农民原始暴动的性质（天门会、大刀会、红枪会等），一般抗捐抗

税的斗争，还不免有小豪绅的领导。但是这在一般农民暴动的土地革命时期，日益寻找无产阶级的领导。奉天通化大刀会失败之后，有一部分来找共产党；河南红枪会中发生分化，他们的群众表同情于共产党，甚至有些地方分出“光蛋会”（贫农的组织），公开的反对红枪会领袖。至于南方各省的农民暴动，经过历年的斗争，尤其是去年秋收暴动的许多经验与斗争，都在日益深入：从农民群众的斗争（有些地方直到秋收暴动期还经过初期的减租减息运动——如江浙），直接进到游击式的暗杀豪绅债主地主，更进到群众的游击战争，再进到农民割据的局面，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政权，自己成立正式军队——工农革命军。

广东海陆丰的苏维埃政府，发动四周的农民暴动，与进攻海陆丰的反动势力相搏战，海陆丰之东惠来、普宁一带，其北五华、紫金一带，其西三多祝、惠阳一带，都有农民群众陆续的斗争。现在农民群众都正在暴动起来，海陆丰的红军都往外迎头袭击进攻的反动军队。北江、仁化、乐昌一带，农民也已经暴动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海南岛内农民暴动日益深入，最近已经有海门暴动的消息。广东南路西路都有农民斗争的爆发。江西的西南与湖南的东边几县，农民势力已经占领乡村，而在遂川、万安等处也已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虽然，最近万安县城被敌军夺去，但是乡村仍在农民之手）。湖南醴陵及沿株萍路一带，都有农民斗争。湖北的东部、西部以及南部的农民斗争则更为深入，群众都起来与反动势力搏战。河南南境信阳一带，也有农军的暴动与杀戮豪绅的斗争。

这种革命运动的趋势，在每一农民斗争的区域、每一割据区域、每一省以及几省范围以内，都同样的是争得工商业中心、县城以至大都市的斗争——就是工农与豪绅资产阶级争政

权的严重的长期的斗争。同样，这些斗争必然日益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极鲜明的树立民众真正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这种斗争决不能说是普通的中国古代式的农民骚动。这种斗争是很明显的在日益归纳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很明显的要汇合起来，成为中国工农革命胜利的开始——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夺取。

（四）兵士的革命化。同时反革命军队中兵士不但因为欠饷及生活的痛苦而开始逃走、骚动，而且广州暴动之后，尤其是在广东有许多公开的转到工农方面来，江西亦有这种事实。北方军阀之下兵士骚动最近也时常发现。湖北的“西征军”中兵士有自动叫出“打倒不发饷的官长”之口号的。湖南现在的各种军队尤其在崩溃之中——其中本省兵士大批逃回家去。这种崩溃现象是向来所没有的。在无产阶级积极的领导农民、兵士、贫民的革命进攻的过程之中，这种“兵变”、“骚动”不会是简单的“军纪紊乱”、“兵队抢掠”的普通现象的。

军阀兵队是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兵士群众，从有组织作零星斗争，普通的要求改良待遇，要求发饷加饷……一直到革命的兵变，兵士反对军阀的混战而投到工农方面来，回到家乡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崩溃豪绅资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中国之矛盾，帝国主义列强自身之间的自相矛盾，新的军阀与豪绅资产阶级的矛盾，军阀及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相矛盾，资本家地主与工农的矛盾——都在继续增高的剧烈起来，没有丝毫改良式的暂时延缓革命之进程的可能。革命的阶级斗争，剧急的到了公开的国内战争的程度，到了某几省内革命势力互争政权中心——工商业中心的斗争之开始。这种状况之下，革命当然无疑的是高涨。

固然不错，广州暴动是失败了。但是，第一，广州十二月

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序幕，各地的农民暴动恰好继续着更加猛进，各大城市的工人虽然受着极艰苦的斗争、极严重的压迫，然而他们的勇气并未摧残，他们的决心正在增长，他们正在积聚团结自己的力量，准备着起来斗争。第二，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农民不但没有离开无产阶级，没有离开革命（例如一八四九年时候的农民），而且空前的迅速广泛的站到革命方面来，实行革命的斗争。第三，广州暴动之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不但没什么工商业的发达、渡过经济恐慌的希望，而且豪绅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正是更加恶化，财政更加破坏，混战更形复杂，甚至于引起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失望，不要说工农更加受着巨大的压迫剥削了。第四，广州暴动给了全国以工农联合兵士群众暴动的开始，给全国以大城市暴动战术的经验。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革命显然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不但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更加紧迫起来。

二

最近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很明显的表示：一方面豪绅资产阶级最后的完全公开的抛弃一切假面具，完全投降帝国主义，请求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合作，完全取消一切所谓“共产党的”方法与理论，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完全要恢复豪绅资产阶级无限制的剥削，完全宣告国民党的死刑；别方面便是蒋派排斥广西派，拉拢冯玉祥的把戏，种下了更深的战祸。

所以国民党中央会议后，虽然表面上讲甚么北伐，其实，一切布置，如冯蒋徐州会议等等，无不包含着内部斗争，和蒋桂战争的酝酿在内。

北伐的南北军阀混战和蒋桂两系在南部各省的冲突，这是现时军阀统治的两大问题。国民党的军阀自从公开的开始反动——上海屠杀之后，正式与工农民众分离，将豪绅资产阶级独裁制，在这种国民党军阀式的统治形式中表现出来。从此之后，阶级关系的形式，完全变更，国民党不但不能再得到工农民众的赞助，以反对北方军阀，而且国民党自身更加完全的军阀化。事实上，上海屠杀之后南京下的军阀在北伐中至今没有得着任何胜利；武汉反动之后——武汉政府根本消灭，冯玉祥的反共，亦就是他断绝一切北伐胜利的开始。国民党反共后北伐战线上的斗争，完完全全变成买办豪绅资产阶级之各系互相争权夺地的斗争。这种斗争之中，国民党的总名义（例如蒋冯同称国民党），不过是一种几派军阀的军事同盟的别名。现今蒋介石把持到了南京的政府及党的中央，他要用北伐的名义来压迫桂系；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结合，亦要用北伐的名义得着蒋派暂时的帮助以抵御奉鲁军阀，同时依赖蒋的中央名义牵制河南境内反冯杂色军队。现在的所谓北伐，也不过是国民党内部许多派军阀互相操纵牵制暗斗明争的名义，北方军阀的内部也是如此情形，所以北京方面有宣言和平停止战争的倡议，这是表示北方军阀的内争以及财政军队的溃崩，同样是不能梦想“南征”的任何胜利。

蒋介石派与广西派的斗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于湖南的战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现在以北伐的名义，步步实行压迫桂系，例如南京早已高唱湖南战争应速停止，全力北伐，说白崇禧与程潜两人之中至少应有一人出来北伐。最近，陈铭枢在广东又大唱其拥护南京的北伐政策，说李济深应当出发北伐，同时桂系便提倡地方建设，肃清“共匪”为首要的议论，说广东此时不能急进北伐，说北伐前线上已有充分的军队。现在这一

蒋桂斗争的实际行动，则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已经开始的各省州县之间的间接斗争，二是各大都市的地盘之斗争。这一斗争的背景有英日帝国主义冲突之影响在内，同时，对于蒋桂两系，这都是争财源的斗争，亦就是争工商中心的斗争。

蒋介石除浙闽及南京津浦以外，他在广东有陈铭枢，江西有王均，并有从广东退出之方鼎英，他还可以拉拢败退赣边的张发奎。湖南的叶开鑫是他的暗中的同盟者，唐[1]部军队他也可以拉拢。两湖的中心他利用谭延闿勾结陈嘉佑、鲁涤平等压迫桂系。他固然联络冯玉祥，但他同时拉拢方振武、岳维峻、孙岳等——这些军阀刚在占领河南南部的地盘，蒋介石所借为声援的，大多数是杂色军阀，大多数是占领着各省的外县。这些军阀的反对桂系战争，是蒋介石所利用以摧残桂系的。

广西派的军阀呢，却仍旧占着几个工商业中心，如上海、汉口、广州。蒋介石排斥桂系势力的斗争，势必至于从这些小军阀的州县战争，发展到争夺大都市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已在暗中酝酿发动，日益加紧起来。例如蒋介石曾经有派谭延闿到汉口去做政治分会主席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企图，陈铭枢不肯就名义上的广东省主席而要求广东省的财政统一在他手里。

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各派军阀混战互斗，是他的统治不稳定而动摇的直接表现。而这种动摇在全国范围内看，已经是开始崩溃于这种外县的小战争之中，尤其是湖南最近的战争。

这种斗争之中，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实：就是一方面桂系所有的地盘如两湖、两广都不是清一色的，到处都有杂色部队，别方面蒋介石所能运用的反桂势力，也是同样不能做蒋介石靠得住的“自己”部队。因此，蒋桂斗争的开展，必定日益混乱复杂，而要演成无间断的混战。如果说这种蒋桂斗争会有一种

"总"爆发，那么，他的形式要表现于几个大都市争夺的结果，或者再进一步而成为南京政府的变更组织。而这种总爆发，是与现时各省内小战争的前途，各派军阀地盘财源争夺的结果，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主要的具体的形势，现时对于工农阶级有切近关系的，还不是这种将来的总爆发，而是现在正在发展的各省省内的战争。

论到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便应当见着：（一）如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尤其是湖南省内的军阀战争，急速的更加摇动豪绅的统治，促进军队的崩溃；（二）因这种关系，客观上工农的势力往往在这些反动统治脆弱而崩溃的地方爆发起来，尤其是广东——海陆丰及琼崖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存在了四个月，其次便是湖南；（三）这种工农革命势力的伟大的伸张与爆发，可以促起豪绅军阀各派的联合一致来企图"肃清共匪"，这种情形如广东反动军阀进攻海陆丰，如两湖的反动派也在高唱结束湘战，协力肃清两湖"共匪"。而工农势力在这几种阶段上，都将要更加猛进，革命的斗争将要更加剧烈；在敌人削弱的地方，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起来袭击正在崩溃的反动统治；在敌人恐慌到不得不暂时"团结"各派来反攻的时候，更加要勇猛的迎头进攻，更加要团结组织敌人后方的工农起来袭击反动统治。

三

总之，现在的形势是有两种最复杂最剧烈的国内战争：一是新旧南北军阀内部互相的战争，一是工农贫民和豪绅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两种国内战争，都是已经早已开始，都在从争夺各省外县的政权，进到争城市工商业中心的过程之中。尤

其是工农贫民与豪绅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方式上进到极残酷的肉搏（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与暴动地域的杀戮豪绅地主），在发展形势上，广东各暴动区的倾向于汇合，而夺取省政权。湖南南部七八县及江西西南几县已经在农民势力范围之内，从萍乡到株洲，从醴陵到平江也是如此。江西其他各县，尤其是湖北的各县，以至河南南境，农民暴动及游击战争大大的发展。凡是这些革命势力都要求汇合联络，而事实上走到夺取几省政权的局面。这种局面的日益接近，也就使江浙（江阴无锡江北），甚至北方的农民的自发斗争，更加进于有力的情状。这种局面的日益接近，不但使广州、武汉等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地位更加吃紧，并使上海、天津等处工人阶级斗争更加要千万倍的努力认真的准备暴动的工作。

革命高涨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在进到更加紧张的过程之中。

同样，在革命敌人方面，他们的政权，已在广东三分之一的县份之中动摇而丧失，湖南、江西的许多县份，湖北的，甚至河南的南境认真的动摇起来。革命敌人的军队开始崩溃，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在南京最近会议之后，在一年来日益紧张剧烈的阶级斗争之中，以至公开的国内战争之中，完完全全暴露，他在群众之中的“信仰”可以说没有丝毫，群众对他的毒恨日益扩大深入，同时共产党的威信更加深入日益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共产党的旗帜变成一般革命的广大民众的旗帜……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军阀在现时仅仅保有政权的地方，在一般城市之中，在拼命的压迫，以求苟延残喘，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区域（工商业中心——如上海等处），他们要加紧十倍百倍的压迫，用极恐怖的手段，禁止工人的革命行动，不但是罢工，甚至发一张传单，也要

杀头。

大城市中的这种状况，使工人斗争一时不能有大规模的暴露。表面上的现象，可以说是大多数的工人似乎畏缩而不能斗争，或是少数勇敢分子要求立即武装暴动。“如果现时是不能暴动，那么，一般的日常斗争也不能做”。

这种状况显然是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更加加紧领导，更加认真的准备群众力量，使群众在日常斗争之中团结自己的力量，认识达到暴动的正确道路。

可是有些同志，例如上海，却说现在这种状况，不但是上海革命潮流已低落，就是全国的革命潮流也已低落了，这应当采取保守策略了。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显然是陷入机会主义的观点。

现时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应当是：

（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既然日益紧迫的要进到夺取工商业中心的斗争，所以城市中认真的准备暴动的工作应当十二分的加紧。这就是说，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发动和领导，群众的赤色工会的建立——都要注意新的方式的找着与运用，尤其是自下而上，从各厂各业自身的干部活动，形成群众中的核心。这种斗争过程中，加紧的切实的宣传全国斗争的总策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与道路。失业工人中的工作日益重要起来，不但要组织他们于工会之中，要组织他们的群众，去为“复业”而斗争，并且要尽可能的领导他们，以群众的示威，要求政府发给津贴，开办公共食堂，宣传失业工人有受社会供给的当然权利。这种示威的要求与运动必然要进到剧烈的斗争方式。同时武汉、广州、上海、天津，都应当有系统的准备工人武装，训练工人的暴动战术，组织赤卫军或工农革命军等等实际工作。

城市职工运动的策略，决不能认为应当是退让的或是保守的，而应当是勇猛坚决的有步骤的领导并发动群众斗争。只要真正能团结群众起来，不论是极小的斗争或广大的罢工，都应当坚决的发动。虽然在斗争方式上有时有采取“无党群众”方式的必要（如普通的某厂工人代表团等），但其实际上，本党及赤色工会的宣传与组织，都应积极的进行。

在目前国民党四次全会发布停止民众运动封闭工会的命令之下，不但可以引起革命的工人群众的愤激与反抗，且可以引起素来蒙蔽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的群众的愤激与反抗，因此在这个机会之下，统一工人战线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不单是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下才可以作起来，而且可以在反抗禁止说话、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的口号之下作起来。

（二）农民斗争的一般自发的暴动，都应当去领导，尤其要努力去联结各个零星区域，使扩大而形成农民割据的局面。第一，在农民群众中要广大的宣传土地政纲的意义，要使群众了解这个意义。农民斗争一起来要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行动，不致将这个斗争变成简单的武装冲突的形式。第二，是要发动群众的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等的反对豪绅政府的斗争。第三，是要领导从上述斗争而发动的一般杀戮豪绅的零星的少数人秘密的游击战争，使进到群众的公开的游击战争。第四，是要领导这种群众的反抗暴动使进于有组织有指导机关的斗争——乡区的工农代表会议的建立，及农民武装的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五，是要因此而创造割据的局面，联络几县的势力——尽可能的联合广大区域的群众的发动。一般的要注意城市的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使县市工人群众中的党的基础确实巩固，不但能与四乡农民运动相联络，而且能成为农民运动

领导，能汇合农民的斗争势力，夺取县城的政权，使现在自发的农民攻取县城的倾向能更进一步。同时就必须纠正现时各地党部事实上对于县市工人运动忽略的倾向。

（三）兵士运动应当在各省各县甚至各区委各支部都积极开始。一般的兵士运动的组织上鼓动上的方针，都应当切合当地兵士群众中的要求，同时要指出工农兵联合的总意义——工农兵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与大生产，而使成为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的国家公有。兵士和贫民只有如此，才能解放。

（四）在目前阶级斗争愈加剧烈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近的事实表现出来不但是北方旧军阀始终是帝国主义最驯服的工具，南方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两系近亦与日英帝国主义作亲密露骨的往来，这般国民党忠实同志很快的变成了帝国主义新的忠实的工具。在这种新的事实之下，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工农和城市贫民的阶级仇恨与反抗情绪，一般小资产阶级亦将不满于国民党军阀的这种卖国行动。因此我们注意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从革命的工农贫民群众一直扩大到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身上去。这一工作在北方固素具其可能性，而在南方新的事实之下我们亦应想出种种新的方法来扩大这个运动，宣传小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豪绅资产阶级的卖国行动，来破坏豪绅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五）现时革命的一般斗争过程之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造党的任务。因为改造党的没有彻底进行，所以新的工农指导人才没有提拔出来，旧的一切自上而下的组织及工作方法都有许多保存着。群众的斗争及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已经急剧的前进，而旧式的指导机关还是落后，机会主义的余毒还是随处发现，不能代表真正群众的情绪，反而将自己的悲观恐惧和旧

方法中无出路的低落情绪，去影响群众。所以现在只有在一般斗争的过程中努力执行改造党的任务——党内的民主化，提拔工农的指导人才，刷除机会主义的成分，党的指导之真正的集体化……在工人、农民、兵士之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群众的基础。同时还要注意秘密工作，一切疏忽而被破获都是对于革命的损害。

这些任务是现在我党全国各地党部，所必须注意的切实去执行的，现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剧烈到国内战争的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在事实上趁着反革命军阀自相混战的时机而日益扩大爆发，日益进于争夺工商业中心的斗争，夺取一省以至几省政权的斗争，更加紧迫起来。

所以，第一是广东，这些任务的执行，早已到了更深的程度。广东农民暴动的发展及兵士运动的猛进，虽然广州工人阶级及党部受过很大的摧残，然而一般形势的发展，显然使广东的革命中心地位，更加明显——尤其是反动军阀联合反攻海陆丰，更表示广东工农兵群众暴动夺取全省政权的局势事实上日益接近。

第二，湘鄂赣以及豫南最近的形势也更加成为一个革命中心的区域。在这一区域里，湖南南境农民自发暴动的事实，湖南反动军队崩溃的急遽，湖南与广东的毗连——两省暴动区域实在已经日益连结。尤其是湘赣边境沿线直达鄂南之农民暴动势力的澎涨，萍乡以西沿株萍路直到长沙的工农革命势力的伸张——凡是这些，都使这一区域的暴动布置，应以湖南为中心。湖北的武汉暴动，应当是这一区域的完成，而使暴动的武汉变成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现在湖北各县的暴动，已经是治者阶级十分恐慌动摇，而急急乎要结束湘战调兵回鄂清乡，而这些湖北各县的暴动割据的发展，是武汉暴动胜利的要素。尤

其使湖南暴动的广大发动和有规划有指导的联合起来，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　央

三月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唐生智。

PDG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

——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中央于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土地，于秋收暴动后提出苏维埃政权。盖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主要的任务是要实行彻底的民权革命，即绝对地没收土地以消灭封建的政治基础，以肃清封建的社会关系。同时，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需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在革命的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极急迫的需要。去年十一月的中央扩大会议对此曾有极明晰的决定，扩大会议以后，中央更曾给各地以不断的指导和督促。可是各地党部在其所领导的不断的暴动中，对此种根本任务——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任务，执行得异常之迟缓，而且充分表现出来各级党领导机关没有决心。除开海陆丰以外，各地农村暴动，大都只做到杀豪绅、烧地主房屋，进一步做到烧田契、债券，而于没收土地的工作，则一点没有做。湖南之醴陵事实上在我们手里，江西之万安，已经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湖北之黄安曾建立了二十余天农民政府，但是土地依然没有开始没收，甚至江西党部对此还有一种解释，说万安自耕农占农民百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十四期。

分之八十不便没收土地。河南省委亦以河南自耕农占多数为理由，不敢提出焚烧一切田契的口号。就是海陆丰对土地的分配也还延迟没有执行。至于苏维埃的建立，在广东只有海陆丰和琼崖的一部分建立了，湖南省委才开始命令醴陵执行，湖北的农民暴动可算是比湖南更深入了，但除开黄冈两个区苏维埃之建立外，一般还没有开始。就是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也有两个重要的缺点：第一，苏维埃代表中工人的成分过少，因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微弱而农民原始的意识对政权的影响极大，简言之，就是带了不少的农民政府的精神；第二，许多乡村苏维埃，只是从原有的农民协会换过一个招牌，因此他的内容也就是旧的农协的内容，甚至有许多乡村苏维埃与农协的组织同时并存。海陆丰苏维埃的两个缺点在别的地方也显然是不可免的症候，譬如湖南、江西、河南的党部最近在宣传苏维埃的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农民协会的宣传和组织，这就是表现在这重要省份的党部也还没有了解苏维埃的对面不容有农协存在的意义。不过这个缺点是容易矫正的，只有头一个缺点，在各省斗争发展的局势上面，已经是一种很严重的危机，就是在斗争发展的省份，如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同样只是创造了农村势力而没有城市的基础，换言之就是只有农民的基础，没有工人的基础。这样一旦暴动发展到占领城市，即使名义上不如黄安一样把政府正式叫作农民政府，事实上也会成就一个工农兵其名而农民其实的苏维埃。所以造成这种非工人领导的农民政府的原故，固然也有客观的原因，如城市工作较乡村难于发展，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各地党部没有争城市的决心，而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如果这种主观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迅速的纠正，那么暴动的发展，只是造成了代表小农私有观念的“平产”政府而已。例如湖北的汉川县，在那个地方党的组织

比较普遍而具有组织的形式，斗争也比较普遍，游击战争，已经从黑夜的斗争渐次发展成为公开的群众斗争，但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观念则代表了落后的农民的意识，如要烧城市（系马口烧去半边），如杀豪绅则注意要分配其财物，甚至党不将没收之现金分给群众则有些同志表示革命于个人没有好处……等等。这种现象一方面告诉我们是由于汉川的党没有注意城市（甚至主张根本焚烧城市），另一方面则告诉我们是由于汉川的党仅仅把斗争停滞在杀豪绅焚屋子的游击战争中，而没有领导群众进一步的实行分配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总之，各地党部在执行暴动策略的当中，对于暴动的根本任务，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般的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也没有充分的决心去执行。同时主观的放弃了城市工作，减少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因此各地斗争，除了极少的地方如海陆丰而外，一般的还停滞在杀人放火的游击战争状况而不能有更广大更深入的发展，造成深厚的革命基础，而且这种迟慢的发展，还有受农民均产观念所支配的趋势。因此中央特训令各级党部更有决心更正确的执行中央暴动的策略，主要的是对于没收土地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执行。同时中央对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决定下面的纲要，为各地执行时的根据：

关于没收土地

（一）没收一切地主祠庙等土地，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由苏维埃支配——凡是能耕种的都可以分到土地。

（二）一切土地于实行共有后，从新分给农民耕种，由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给土地使用证（县苏维埃未成立时由当地最高苏维埃发给）。旧时田契佃约一概宣布废除，土地不能买

卖，并打破耕者有其原来耕地之观念，即从地主没收土地交给原佃和自耕农土地不摇动的观念。

（三）土地的分配以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多寡为标准。以年满十六岁能自耕种的人为一劳动单位，每一劳动单位平均使用土地（酌量各地情形决定亩数），其余的土地按照各劳动单位所属的四岁以上的人口之多寡平均分给于劳动单位使用。

（四）赤军之现役军官和兵士之有家属者其本身亦为一劳动单位，分给之土地得雇人耕种。

（五）雇农愿意自己耕种者必须分给土地。

（六）颁布雇农保护条例，以保护继续受雇之农民，主要在增加工钱、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等，比例于农民没收土地后所得之利益。

（七）增加手工业工人及苦力之工钱并改良待遇。

（八）土地之分配暂以一乡为单位，由乡苏维埃自己分配，区苏维埃指导帮助之。

（九）土地没收后，凡无倚靠之老弱残废孤儿寡妇而不能从事劳动者，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

（十）土地使用人须向县苏维埃缴纳农产品百分之十至十五国税（由县苏维埃以所收入之税额，百分之二十缴国家苏维埃，百分之三十缴省苏维埃，百分之二十津贴乡苏维埃，百分之三十归县苏维埃支配——区苏维埃用费由县苏维埃津贴）。

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

（一）苏维埃的组织在暴动以前为暴动指挥机关，在暴动胜利以后为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建立，所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等机关一概取消，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

（二）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代表中须尽可能的引进非同志参加。凡年满十六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选举权和被选权。

（三）在一个乡村中（旧日乡农协的范围），一有群众起来，即须从群众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可观望其他邻近乡村是否起来，因而有所等待。

乡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其中须尽可能做到有兵士代表和工人当选。执行委员之外选举候补执行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会互推常务委员三人（内主席一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并须推选财务委员一人（必须由常务委员兼）、文化委员一人（管教育宣传等）、裁判（裁判群众纠纷）兼肃反（肃清反革命）委员一人、粮食委员一人、赤卫委员一人（管赤卫队）。

执行委员中互推三人组织土地委员会，受理分配土地事宜。乡苏维埃常委每两天开会一次，执委每周开会一次。

（四）一区内（旧区农协之范围）有二个以上之乡苏维埃时，即须召集由群众直接选举之代表会议（农民群众代表大概每五百人选一代表，赤卫军或赤卫队选举人之单位则不能至五百人而须斟酌情形减少，有工会组织的地方须有工人代表参加），选七人至九人组织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候补五人），其中须尽可能有工人和兵士代表当选。执行委员会之组织除常务委员可扩充至五人外，与乡苏维埃之组织同。执行委员会之下还须组织经济委员会，以执行委员一人为主席，计划本区范围内之经济建设事宜。

区苏维埃常委每周开会二次，执行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

（五）一县之内城市工人运动有相当基础，并且乡村有了两个以上之区苏维埃时，须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十一人至十七人组织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候补七人）。代表会议代表数目，按照当地斗争发展情形和环境决定之，代表成分工人代表至少须占百分之三十，兵士代表至少须占百分之五。

如果没有城市工人代表参加，只有乡村二个以上之区苏维埃联合起来组织之县苏维埃，只能称为临时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互选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五人至七人（执行主席在内）组织县行政委员会，县行政委员会之主席，即由县执委之主席任之。县行政委员会之下，得组织财政、经济、文化、裁判兼肃反、土地、赤卫等委员会。各种委员会之人数三人至五人，以县行政委员一人任主席（如财政委员主席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主席文化委员会）。

县苏维埃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二次，执委每月开会一次。

乡村中重要的市镇可独立成立镇苏维埃，直接于县苏维埃。

（六）凡省会所在的城市或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在经常的工人运动中，须运用种种机会，召集各种工人代表会议（如罢工工人代表会议，失业工人代表会议，某业工人代表会议，某厂工人代表会议，全市工人代表会议等），以发动工人斗争而提高工人群众的指挥能力，并且设法使附近的士兵和农民派代表参加，促进工农兵的联合战线。一旦全省的斗争发展成总暴动的局势而该城市要事实上成为总暴动的中心枢纽时，即须召集全市各厂各业的代表和近郊农民代表及士兵代表开全市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暴动的指挥机关。代表人数按照当地实际斗争情形和环

境中定之，但代表的成分，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七十，农民和兵士的代表各占百分之十五。

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上项代表会议选举十五人至二十一人组织之（候补委员七人）。组织法与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同。

（七）一省斗争的发展快要达到全省总暴动的局势时，如现在之广东、湖北、湖南，应召集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组织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全省总暴动的指挥机关。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人数按照当时斗争的发展情形和环境决定，至少须满四十人。代表的成分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四十，兵士代表占百分之十，农民代表占百分之五十。

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代表会议选举二十一至二十七人组织之（候补委员十一人）。

由省苏维埃执委互选七人至九人组织常务委员会，省苏维埃执委之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由省苏维埃执委会议选举之。

常务委员会之下，设海陆军委员会、外交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裁判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各委员会以行政委员一人兼任主席（如海陆军委员任海陆军委员会主席，外交委员任外交委员会主席）。

全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每月开全体会一次，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

省会之外之重要工商业中心而非县会所在之地（如湖北之沙市），可独立成立市苏维埃，直接于省苏维埃。

（八）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须议决一切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各级苏维埃一经成立，即须正式议决一切、公布一切、执行一切，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下级苏维埃绝对服从上级苏

维埃之指挥。

（九）全县境内之赤卫队归县苏维埃指挥调遣，全省境内之赤军（工农革命军）归省苏维埃指挥调遣。为指挥作战之方便起见，于海陆军委员会之下设总司令、指挥等职，指挥调遣作战军队。

（十）各级代表会议有撤换该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权，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有撤换该执行委员会之常务委员或行政委员之权。

中　央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军运工作给许权中等的信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权中同志并转旅[1]委及全旅各同志：

陕西省委负责同志来，得知你们的近况，中央对于你们今后的工作有下列的指示：

（一）关于党的一般军运的原则与策略，现在节录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致朱德同志信的几段，你们详细读阅，即可明了。（略）

（二）根据这些原则与策略及你们特殊情形，你们现在应注意与执行者有下列几点：

1. 你们现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的不是你们的出路。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争斗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陕西的军队无论他是属冯玉祥、岳维峻或李虎臣以及一切一切的杂色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你们有了革命的倾向和表现，不仅是李虎臣并且一切的反动势力都会要来包围你们解决你们，所以你们自现在起时时要特别戒严，以防人来包围和解决。尤其时时要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发动群众的斗争，作工农群众暴动的副力。至于脱离的日期，可根据实际环境与你们的布置与省委协同决定。但从今日起，必须下决心的脱离，若是犹豫妥协，终会要被他们解决的。

2. 目前要做的工作：第一，肃清内部，一切军官应尽量换成我们同志，有反动倾向的，应不姑息的解决之。第二，发展组织，党的组织应大大的发展，尤其在士兵中要尽量的发展。第三，扩充军队，你们既有一千八百支枪，至少可扩充到二千五百多人，可要求各地党部多介绍同志及好的农民来当兵。第四，加紧党的训练，至少要使一般同志都明了党的新的政策、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并有决心为新政策来奋斗来牺牲。

3. 你们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现驻地三要农民运动及党的力量都没有基础，又在敌人四方包围之中，恐不能久驻。据我们现在想到你们的出路：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预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哪条路，要看动作时的实际环境来决定——由陕西省委决定。我们在那里有人，且邓[2]近又说我们办教导团，你们到时，可互相策应地帮助发展豫南及鄂北农暴，形成一支大的军事力量。

4. 万一不幸而遭失败，可将各种武器交给有争斗地方的农民，同志可到农民中去秘密训练农民。

现在整个的革命的局面，是很可乐观的。敌人内部自相冲突，各地工农暴动风起云涌，敌人的士兵都动摇起来，拿起枪来帮助工农暴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没有哪一个能有一时的稳定。他们的政治经济均到了绝境，毫无办法。革命潮流，一天一天的向上高涨，只要我们能努力干去，胜利是要归我们的。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

〔2〕指邓宝珊。

PDG

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

——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

现在国内的局势，还是如第三十六号通告所说，革命潮流高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而且最近两三周的发展，证明这种形势更趋紧张。

新旧军阀的冲突，愈趋于复杂混乱，同时他们的力量愈趋于脆弱。不仅在北方军阀与南方军阀的斗争之外有北方的奉直鲁内部的斗争、南方的蒋桂两系的斗争，即就各系内部或各省内部的大小军阀而言，也是分崩离析，各自占据几个城市截留税收，谁也没有力量统治谁了。蒋桂两系的主要战争现在还不能立刻爆发，因为两方面的兵力财力都没有积聚起来，都没有战胜对方的把握，加之南方革命潮流高涨，工农暴动已将湘粤鄂赣等省的乡村及多数小的城市从他们的手中取去，势如狂风，北方军队又企图反攻，孙传芳整顿队伍且补充了外来精利的枪械，其势亦不可轻侮。有这种种原因，他们还感觉得有暂时妥协的必要。不过同时还是各自积聚其军事力量于几个重要城市，抓住这些财源，以准备未来的激烈斗争；而且还继续不断的以政治手腕争取各大城市的政权，如陈铭枢之于广州、蒋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七期。

介石之于上海。在这种分崩的形势之下，即各省小军阀也同样努力缓和他们的内部冲突，保全他们各自的仅有的兵力和财源，防御工农军的进攻，如湖□征西军与唐[1]部的妥协，广东张黄[2]失败后陈铭枢与李济深的妥协。

可是南方各省的乡村及许多小城市已经不是军阀所能统治的了。反动政治中心的南京，其附近江北有十五县在土匪势力之下而不能解决。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省更显然的有十分之六七的地域为暴动工农所割据。军阀的“清乡”政策，完全成了自己哄自己的废话。军队清乡开拔时，向豪绅地主索取开拔费，乃至开拔费到手，他们即离开暴动区域而去，一般豪绅地主至于甘愿逃亡不敢请兵清乡。假使军阀冒险的派遣军队下乡，其结果必促兵士的叛变；所以军阀只集中其军队于城市，甚至还只能集中于极重要的城市，如湖南程潜派兵两团到醴陵镇压暴动，在暴动军自动退出醴城时屠杀几个农民随即开回去，仍让醴陵归于红军。一般豪绅地主只得努力建设其自己的武装如挨户团、民团之类。这种武装组织已比军阀的军队更为弱小无力，而且其士兵在当地工农革命影响之下更易摇动，所以万万不能抵挡暴动的攻击。

即在城市之中，军阀的统治也是异常危险的。苛捐杂税的繁兴，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一切自由的剥夺，使一般市民莫不怨愤不安，工人群众因为以前“共产党时代”的劳资条件的取消与政府资本家的严重压迫愈加愤恨不可遏抑，虽在武汉那样的白色恐怖空气之下而工人斗争仍然发展，工会组织仍然扩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只有乞灵于白色恐怖以维持其残局，然而白色恐怖是不能镇压城市的革命潮流的。

农民暴动的形势，在广东东江虽然海陆丰县城已让给敌军占领，可是乡村仍然在我们统治之下，附近各县如紫金、惠

来、普宁、潮阳，则更有新的暴动的爆发，尤其是惠来、潮阳一带暴动的主力军完全是农民，比较由军队发动起来的海陆丰群众更为坚决有力。湘南二十余县都被工农割据，衡阳兵工厂的数千枪械，都被红军夺去，赣西万安、遂川、宁冈、莲花一带仍在工农之手，安福、分宜也已占领，并已发展到了赣南的雩都、信丰等县。湘东醴陵、平江，虽累经长沙军阀派兵进攻，而不能动摇暴动局面的丝毫。

工人的斗争，在新的工作方式之下，已迅速地起来，如上文所说。

兵变成了全国普遍的情形。奉鲁军、晋军累次兵变。南方兵变多，且多加入了工农的暴动。尤其是湖南等处曾经加入过农协的兵士一开到暴动区域，即热烈的参加暴动，特别痛快的屠杀豪绅。一般兵士都不愿参加军阀相互间的战争，更不愿向工农开枪。他们一致要求发清欠饷及增加饷银。杀死军官携枪逃亡的事十分普遍。红军兵士月饷二十元，而军阀部队连欠饷都没有发，军阀的军队怎能够不动摇呢？广东的兵士运动所以异常的发展。

新军阀既不能统治乡村及许多小的城市，革命势力又将进而夺取大的城市，他们异常恐慌，他们除开集中军队外，还要解决财政问题。他们财政的出路，只有加重苛征杂税和卖国。现在的鸦片税、盐税、煤油税、糖税、卷烟税、二五库券、流通券、军事特捐、烟苗捐……种种新兴的捐税，如雨后春笋的发生，强迫一般商民或靠月薪生活的人出钱，间接加重工人农民的担负。卖国的勾当，不仅桂系向英帝国主义拍卖广东，即南京政府也公开卖国，如对于去年南京惨案及新发生之新大明惨案、厦门日人自由逮捕韩人案、平潭惨案等事，不仅不敢对帝国主义提出严重的交涉，反而自己认错，禁止民众的抵制示

威运动。

这样的情形，使一般市民小资产阶级也动摇起来，反抗苛捐杂税（如各省商联会，江苏商联会、商协会，上海商联会、商协会以及其他种种商业团体都有表示，甚至有罢市者如芜湖），反抗帝国主义（如厦门、福州、泉州等地的示威抵制），已经不仅是工农的革命口号，而是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来参加的运动了。在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任何言论的自由都被剥夺（如封闭《幻洲》等事），使一般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都不满意于反动政府。现在是国民党反动以后革命最开展的时期了。小资产阶级厌恶新军阀统治，且为工农斗争的声势所慑服，而开始动摇了。换而言之，一年来跟随着豪绅军阀幻想太平局面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动摇而厌恶国民党了。

帝国主义因为中国革命形势紧张，一方面努力维持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政权以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又撤退小部分驻华军队，提议增加一些儿关税以和缓革命潮流。可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没有方法免除。即如关税会议，日本便不能和英国一致。对于国民党的扶助，英国帮助桂系，日本帮助蒋系，更成了激烈斗争的形势。南京政府虽卑辞厚礼迎接英公使来解决南京惨案，而英公使还大怒而去。日本却主张单独解决。

由以上所说看来，现在革命潮流自从广州暴动以来，显然日益高涨。所以新军阀不能不力谋互相妥协，不能不加重白色恐怖，总之积聚所有的力量以图最后挣扎。唯其如此地紧张，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猛烈地进攻以破坏他们最后的阵线。

一、我们要以新的工作方式积极领导城市的各种斗争，反对城市工作的失败观念或取消主义（我们只有改变从前机关工作的方法而努力群众化，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

二、我们要领导全国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反对新旧大小军阀的战争，并以阶级的战争消灭之。

三、我们要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用各种方式的宣传揭破国民党卖国的罪状，引进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行动，工人尤其要领导这些斗争。

四、我们要领导一般小资产阶级要求民权自由、反对苛捐杂税等运动。

五、我们要将已经开始的士兵运动，更普遍的深入的发展起来，务使每一部反动军队之中都有兵士委员会和党的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政策，实行继续不断的兵变。

六、我们普遍的在农民中宣传土地革命，领导他们的一般斗争（抗税、抗租、抗债等），领导这些斗争到群众的暴动。在农民暴动已经起来的地方，要遵照历次的通告，领导他们建立苏维埃，进行土地革命，尤其重要的是结合他们的力量，尽可能的形成大区域的占领，而与城市的工人兵士斗争相联合。

中　央

一九二八、三、三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唐生智。

〔2〕指张发奎、黄琪翔。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余毒。党只有在这种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履行自己的重要任务：组织并教育劳动群众，以造成革命斗争之胜利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之必要的条件。

现在，争取群众的工作，建立城市乡村的群众组织，以及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以与白色恐怖奋斗，是最重要的工作，

是斗争胜利的必须条件，亦就是准备工农总暴动的胜利之必须条件。党在城市之中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更切实的找着新的真正群众的工作方法，改造党部的组织方式，以至机关布置的适当秘密工作，都是极重要的任务。政治局特别决定要常委在最短期间定出适当的工作计划，各地党部尤其应当特别规定适合当地具体条件的办法而切实执行。

赤色工会的工作，是城市工人中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之根本工作，必须切实运用各种无党工人群众的组织方式。至于加入黄色工会的问题，则必须是真正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方能加入，而且尤其要有确定明晰的目标：取得其群众而打倒其欺骗群众的领袖之信仰（例如广东的机器工会）。至于国民党的官僚工会（如改组会或上海工统工总，整理委员会等），凡系纯粹的官僚机关而没有群众者，则宜领导群众去反对他们，明显的提出："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反对任何机关的委派工会"之口号，努力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建立秘密的群众工会，不断的暴露国民党官僚工会及黄色工会机关的罪恶。

乡村及外县的工人运动，中央曾经屡指示其重要。各地党部必须切实的进行组织城镇以至乡村手工业工人、乡村的无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政权的乡村，并应组织雇农工会。一般在暴动之前，必须努力组织农民，使暴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些群众组织（乡村手工工人，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等）能够迅速的联合起来组织代表会议（苏维埃）而为指导暴动的机关。

再则，兵士运动是异常之重要，必须加倍的努力，去破坏敌人军队，以至更多的吸引兵士群众到革命的方面来。

现时反动势力虽然联合一致的反对工农及共产党，然而不

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之内部有许多矛盾冲突，而且财政上、经济上很明显的趋于更大的崩溃（许多工厂停闭、新的税捐、内外借款的无着和困难等等），所以反动政权是不能稳定。同时工农斗争极普遍的发展，扩大到许多新的省区，引进农民中的新的成分，日进于更高的阶段（土地革命之深入）。军阀军队的崩溃现象，亦就明显的指出劳动群众中之新的成分（兵士）日益引进于革命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认为，不但要切实的准备城市与乡村之间邻近省区之间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要加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加紧的执行城市工人中之群众工作及宣传，加紧的执行兵士运动，使这些斗争相配合相适应起来。客观上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在发展，是在艰苦的奋斗，一开始便不能不很快的转入武装的斗争。必须要努力增高农民运动政治觉悟的程度。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联合农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

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则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无间说”认为“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确是要跳过民权革命的阶段（工农民权独裁制）而直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如果移到中国革命上来，是显然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只是要指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

中　央

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史达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所提出之草案）

（一）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级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的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革命为“无间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无间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杀，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二）

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大致都在共产党的口号并且大半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者，已经过去。第一个浪潮的终了，是在革命运动的几个中心地域，工农受着极厉害的历史失败，一部分共产党及一般革命的工农干部受着极残酷的

屠杀摧残，社会阶级两极端极剧烈的发展，互斗的阶级各自确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国民党军阀之指导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得着极大的革命经验，最后，使中国群众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进于新的苏维埃的阶段。自然无疑的，因为社会阶级的联合变更，而有相当的反动势力之结合(Consolidation)：资产阶级不但进而与封建军阀结合完全的反革命联盟，而且事实上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帝国主义者不但表现攫取中国经济权利的高度的积极性，并且增高自己对于中国的政治势力。反革命的这三个主要力量，协同的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同时这反革命的营垒之内，也有极剧烈的内部斗争，一方面表现于中国互斗的各派之利益自相矛盾，别方面也反映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

（三）

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不但英勇的广州工人之暴动，而且许多省区农民运动的开展(广东各县的暴动，湖南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及江西、湖北、河南，甚至山东、满洲北部诸省)，再则军阀军队中兵士群众的愤激而倒戈也日益发见，这些都指出革命的高涨——走向新的高潮。经济状况之急剧的恶化，财政的紊乱，军阀混战的破坏，空前的政治压迫，都必不可免的推动群众到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去。

（四）

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他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他至今的发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现时的形势是：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在极厉害的白色恐怖之下，表现相当的挫折。

（五）

这一切形势，可以确定主要的党的策略路线，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的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如果他不能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

（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特别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他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并且（为反对黄色工会的警察式的国民党式的机关起见），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必须同时永久抛弃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这是对于党有非常之大的危险的。必须最坚决的反对以强迫方法举行罢工。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同样，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的工作（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等），特别注意贫农之中的工作，特别组织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有系统的日常不断的执行提高群众阶级意识的工作，指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这在现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七）

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不做工农的群众暴动，而去玩弄暴动，这是消灭革命的“正确的方法。”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

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Coordinated）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必须经常的不动摇的去组织农民的发动，党应当预先便注意中国各省区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条件。这些不同的条件，首先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区域之内估计到。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渐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军。

（八）

革命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竭全力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干部，巩固他影响之下的团体及党的中央。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八七会议之后，大致纠正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这在共产国际以前的议决案就已经说过，可是他还没有完全适应现时形势的新条件，表现策略上的动摇（看轻盲动主义的危险，职工运动中之恐怖方法，沉溺于乡村中的游击主义），以及组织上的动摇。巩固党部组织，吸收新党员，巩固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联络，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正确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反对“左倾的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应当是党的当前任务。

（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反对组织新的仿佛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或者所谓“劳农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有些过去的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等）是有组织这种新党的企图，其实这种新党，将要是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蒋介石或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反对工农运动中的右倾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而这种斗争，将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愈加坚决的战胜“左倾的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不对机会主义余毒有任何让步，而愈有成效。

（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

之资格的。

（十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应当实行自己的天职：严厉的反对社会民主派及托洛茨基派的造谣，他们说："中国革命已经消灭了"，这种造谣诬蔑，不过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工作更加容易，帝国主义本来只想完全镇压中国的工农运动，而中国的工农运动却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各国共产党都应当竭全力赞助中国革命。现时这一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干涉中国加紧的时期，所以各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赞助尤其必要，尤其重要。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更加要力争撤回驻华海陆军，反对割据中国领土，瓜分中国领土，反对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世界的工人首先便是共产党员，要努力执行无产阶级团结之天职，实行帮助中国英勇的无产阶级。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

（一九二八年四月）

瞿　秋　白

中国革命的过去，其实已经说过了。但是，革命的事实之中，还留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过去没有说。

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是一九二三年夏天的第三次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发端，还在一九二〇年，这显然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发端。辛亥革命之后的真正第二次革命，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革命作用”。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组织也开始了。当时的形势，显然是在“革命快发动了”的一般的预觉之中。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在团集准备自己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之形成，便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团聚的开始。

中国革命果真发动了，他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这从五四运动直到现在的革命事实，表现得很明显的。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在这“民权革命”之中取得领导权，这

* 这是瞿秋白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第二章第一节。

一革命的前途是什么，是否中国的民权革命将要造成欧美式的民权政治而告一段落，然后再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所谓两次革命的理论），当前这一革命的主要的社会内容是什么，革命的斗争方式是如何的运用等等问题，都摆在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面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客观上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总答案。但是，主观的策略与总的战术路线，是模糊的笼统的，因为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甚至直到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共产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没有明显的观察的。因此，对于上面所列几个主要问题，实际上都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策略，客观上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革命的初期，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初期，这一策略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得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是如何观察呢，第一种意见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苟且偷安”的，他的发展将要使他革命起来。无意之中，这是承认资产阶级应当要领导革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意见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于零，所以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革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共产党且“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说法中间，含着很明显的矛盾，但是，同样也很明显的承认：现在之国民革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方能给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第三种意见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劳工阶级的方法来行国民革命；劳动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

于领导权。……到国民革命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可是，当时虽然有三种意见，第三种意见是并没有传播，甚至等于没有存在，因为第二种意见仿佛是第一、第三两种的综合，即实际上不自觉的成为党的正式意见。

第二问题是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究竟是为去争革命的领导权呢，还是去到国民党里送领导权给资产阶级？国民党中有资产阶级参加是无疑义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很弱，没有自己的政党。改组的国民党是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方能变成革命的政党，如此，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而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是可能而必要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前途既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对于领导权的问题自然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参加国民党是否为争领导权的问题，结果是模糊的。当时对于如何争领导权的问题，也有许多不同系统的意见。一是说：只要国民党能听从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便可以说实际上的领导权在共产党之手；因此说国民党的左派是有的，不过不对他们有过分的奢望，革命口号要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才能提出去，如此可保领导之权；因此，国民党党部的委员与职员，共产党也不可多占，以免惹起左派反感而蹈“包办”之嫌。对新右派也不必抱尽行排除的目的，因为反正国民革命是要有资产阶级参加的（五卅那年十二月间，中央和西山会议的“退伍派”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的上海谈判，应允国民党中央中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等的条件）。二是说：要争领导权，无产阶级的工人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不要用国民党来集合革命势力，因此不必排除国民党的右派，因为反正国民党是各阶级混合的，无产阶级不必去争国民党的领导权，甚至说：“一般小资产阶级已由本党领导到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时期”，国民党领导权可以交给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但也不

必“梦想国民党成为纯粹左派的政党”。三是说：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政治联盟，无产阶级既然参加，便应当取得其中的领导权；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实际是不存在，必须无产阶级实际争取国民党，一直到排除资产阶级的右派至于净尽，这就必须扩大国民党，使广大的群众加入形成左派，尤其是无产阶级要勇敢的领导左派，这最后一派的意见，客观上必然要发展到变国民党为纯左派的政党。这三种意见，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史上，是极端混淆交错的：广东方面，大半是偏于第三种意见，中央是以第一种意见为骨干，而掺杂第二种意见的，因为这两种意见的性质是很相同的。国民革命之中争领导权与国民党之中争领导权，事实上是很密切的关连着。但是当时的中央政策，虽然时时的提着共产党要独立的积极行动，要批评国民党的左派（这点是上述第三种意见中所不甚明显的缺点），然而实际上这种“独立”，并非积极的去争领导权，却倾向于让开国民党，使“左派”去领导，自己退出对于国民党的领导，做“极左派在野党”，美其名曰国民党外的“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而将当前之国民革命领导权让给“纯国民党”。

第三问题是政权问题，亦就是两次革命的问题。两次革命的意见是：这一次革命由国民党取得政权，下一次革命才是共产党可以取得政权。中国共产党当时这种意见，当然是跟着革命前途与领导权问题上的答案来的，所以后来的参加武汉政府，事实上便不是去领导革命向前发展，却去帮助国民党“纳革命于正轨”的办法，对于革命的民权独裁之观念的忽视，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最早，对于这一问题就有不同的意见：一、共产党不可参加国民政府，以免国民政府之太赤；二、共产党员不可参加国民政府，因恐党员的腐化；三、共产党应当力争

参加国民政府，以发展革命。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客观上必然要进于国民政府内的政权之斗争，因为国民党日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

事实上随后革命的发展，从资产阶级的党权运动，进到小资产阶级的党权运动，国民政府的左倾已经是工农群众自发的伟大斗争的结果。湘、鄂、赣各县民众团体，尤其是农民协会以及工会，以至于国民党党部，日益成为地方政权的权力机关。上海暴动更将政权问题直接提到中央委员会面前。革命发展的前途，早已将政权问题的答案指出来，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党部政权等等）。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的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然而中国共产党，更不用说国民党了，对于国民会议、省民会议等的政权问题始终是模糊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必然的将自己团体权力筑成地方政权，亦就是国民会议政权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发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有一个通告（七月中央扩大会议后的第一号通告），决定以“一切政权归民众团体联合会议”的口号，作为北伐中的政权问题的方针，但是这一决定虽然经过党团而通过于十月十五日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始终是被一般同志所忘却，确切些说，被中央所忘却。于是，自发的群众的革命行动，扩大国民党党权成为民众政权，事实上成为共产党员加入武汉政府之基础的要求与中央的指导离开了。中央对于国民政府的参加仿佛是不注意的，对于地方政权，则走到赞成武汉国民党中央限制民众团体及其地方党部的道路。

第四问题是土地革命问题，亦就是革命主要的社会内容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机会主义最深的祸根。中国共产党当初对于农民问题差不多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主要的联盟者是农民，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必须是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这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土地革命的党纲。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到五次大会。五次大会之前，对于农民运动的意见有许多：（一）最早有说“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难成功”的；（二）有说“谁能真正打倒军阀，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农民便跟着谁走”的；（三）有说“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但是关于土地问题，谁也不曾说起——认真的说起。后来农民运动事实上大大发展，农民政权与土地的问题成了事实的问题，中央才一步步“落后的”追着农民群众走。总之，当时有一个一般的倾向，便是认为农民运动是日益重要起来了。无论中央主观上如何的讲“乡村联合战线”也不能拉得住农民了；无论中央如何认为“不应当空想出地主问题来讲土地问题”，也不能“劝醒”农民或乡村中的“共产主义的实行家”了；于是对于农民运动，不得不认为他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动力，但是对于土地革命始终怀疑。中国革命只被认为“反帝国主义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认为土地革命。一切“耕地农有”直到“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之激进的或妥协的决定中，都没有坚决明显的对于革命内容之认识在内。所以对于以土地问题来决定国民党左派是否真正左派，始终是不赞成的。

第五问题是革命斗争的方式问题，亦就是民众动力与军事动力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中资产阶级以及豪绅地主阶级，以军事战争为自己主要斗争方式，利用兵法部勒已经组织好的军队（破产失业的农民群众），去打北洋军阀。这种斗争已经是

早就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发动极伟大的群众的运动，罢工抵制，示威游行，领率着一般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的斗争，工农、学生、妇女甚至小商人的群众团体迅速的发展扩大，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这亦是成了事实。这两股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一是说：军事动力绝对要不得，如果劝国民党不听，让国民党去胡闹好了，我们且“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二是说：军事动力可以用来反帝国主义，国民党会联络，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去联络，借此民众可以得些自由，同时，民众的武装要有些限制，以免冲突；三是说：革命既然全仗兵力，我们自己也可以弄些军队，联甲反乙，帮助民众；四是说：无产阶级农民的罢工、减租等斗争方法，必然要转到武装斗争以至于暴动，如此，军事动力与民众动力势必至于由“合作”（初期的“合作”是可能而必要的）而至于冲突，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必须争取军队中的兵士。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实际上第一种意见是归于消灭，或者应用到民众武装斗争，以组织尚未完好为口实而延迟斗争；第四种意见只在上海暴动之中得着部分的表现；一般的情形，都是第二、三两种意见的错综参杂的执行，结果，虽然极大多数甚至全体的工会、农民协会，一部分革命的学生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以至大多数的国民党下级党部，都在中国共产党党团影响之下，然而工农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及劳动童子团等并无战斗的准备。武汉政府之下，民众的武装组织之政治的认识，可以无疑义的说：他们估计自己的任务只在反对“徒手的反动派”了，至多只在对付反动派的“秘密武装”了（如所谓蒋介石的奸细、地方上豪绅雇用的打手）。至于“国民革命军”，这些尚未公开反动的正式军队，就要靠中央去联络，要靠政治部同志去游说，要靠

应付得好，可以联甲制乙的牵掣，可以联络整个儿的革命部队去打倒整个儿的反动部队。民众的武装组织，什么自卫军、纠察队是不能和他们打的。兵士——破产失业的农民，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注意的，即使有“兵工联欢”等等运动也只是浮面的，没有提出兵士的切实要求，没有去宣传兵士，没有将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的要求联合，只有对于军长、师长的注意联络，只有注意政治部的点缀工作，政治部是装饰丑恶的师长、军长的反革命鬼脸之脂粉，“政治部是姨太太”。政治部最好的成绩，只是使豪绅性的军队变成资产阶级性的，如果群众之中自发的讨厌这些军阀，那么，往往直接表现于厌恶丘八——十五六年来的“军民恶感”的旧方式。兵士群众也就很容易受军阀的蒙蔽，听他们说工农共产党专是反对军队，“妨害军食”，“捣乱后方”。

总之，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主要问题的答案，客观上是违背革命的路线，其结果，根本上无形之中要走到限制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就是承认中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领导权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创造民权的革命独裁制，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还是要国民党成功的，政权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决不可以参加或掠夺”。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彻底领导民权革命到底实行土地革命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便是反帝国主义的，不是土地革命，因为国民党中有赞成反帝国主义的左派，而没有赞成土地革命的左派”。加入国民党，是要争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争取革命军队中的兵士群众，并且发动工农的阶级斗争以至于武装

的夺取政权或保障政权，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决不可破坏国民党的军队，而只能利用之造成好军队——资产阶级的军队，而使民众得些自由，以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如此当然到了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关键，中央要认为“危险”——危害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了。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既然有如此的模糊而不正确的观点，机会主义就隐约的成为系统的思想，虽然许多负责同志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倾向，然而没有能逃出这个系统的。于是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变成妥协政策的护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远从第五次大会之前，甚至于从第三次大会起就有机会主义的根源。机会主义策略的原则，就是“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就是留恋着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直到不可能的时候，还要留恋；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土地问题、豪绅政权问题之重要，直到农民群众自发的发动伟大的斗争，还要加以阻止；误解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将店东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甚至于“正绅”作为联合的主要对象，而要“调节”店员、手工工人及农民之阶级斗争。凡此一切，自然只是大概的说来，便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关的状况。这当然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不幸有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者组织，来做自己的指导机关，中国那时没有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

这种小资产阶级性的机会主义，遇见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剧烈的发展，便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领袖大大的动摇起来。动摇与犹豫是党的政治路线。这是由于畏惧群众。对于中国革命之内容与性质误解的党，如何能不畏惧群众，以至怨恨群众呢！自然，如此的党想出许多法子来“管理”群众或者

“帮助”群众了。所以第五次大会期间，革命到了最剧烈的战争期间，机会主义的各种“药方”都显露出来。一种是最旧的中国式的“革命书生”的对党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的党，变成“党的拜物教”的观念，认为一切革命须由治国平天下的党以命令诰谕来训练并指挥民众才可以成功，如今“不但国民党下级党部不听他中央的命令，甚至共产党的也是如此”，那就糟了，必须以党的议决及命令制止群众的某种行动，才可以保障革命。一种是中国式“革命将军”的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想象成军队式的政变，政变之后，或许可以保护民众的阶级斗争，政变之前，且请民众等一等。一种是“革命的回忆家”，就是回忆到五卅时期的“革命蜜月”，以为阶级斗争发展得太单纯了，如果现在再有“五卅”时的反帝国主义高潮，“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那么，亦许阶级斗争的危险不至于如此之大了。独有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斗争的策略，以组织群众发动工农兵士及一般贫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坚定的领导他们往前进攻，而扩大深入革命，运用这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使革命发展的策略，是没有的。列宁说：“要帮助动摇的人，先要自己不动摇”，而事实上，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后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时不是运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去革命，乃是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所束缚而不革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瞿秋白选集》刊印。

PDG

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

（一九二八年四月）

一、士兵工作

我们须懂得中国现时的军队尤其是南方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内部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和斗争，这就是一方面由失业工农出身的兵士群众已开始接受了中国工农革命的伟大影响，一方面他们自己由其阶级背景的反映开始向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利益反抗许多地方的兵变，许多地方兵士携械逃走，许多地方发生兵士反抗长官命令或是兵士向长官闹饷闹伙食，这些事已经不能更看做是一种普通军队的事变的确是一新的革命阶段——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士兵群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新发展，我们如能明了的抓住这一发展，开始我们的士兵运动，我们必能在新政策领导之下创造士兵的革命力量与工农革命力量相汇合。

我们对于现时军队的根本策略是：破坏军队的组织力量，扩大士兵运动，建立党的士兵支部使能分化并领导一部分士兵群众成为工农的武装势力。我们对于现时军队千万不要存一点幻想，以为我们有人可以成为军官便希望他能在军队中“飞黄腾达”，由下级军官而中级军官而上级军官，可以拿住这整个军队，然后用之以掩护工农运动甚至发展工农运动。如果有这样的打算，显然是机会主义的企图，完全在事实上行使不通而且结果必致上大当而被解决。固然能利用一些军官同志的地位

和机会去发展士兵运动，建立兵士支部是很必要的，但最主要的士兵运动还是从下层作起，打入士兵群众中去从煽动日常生活的小斗争反抗长官起一直发展到兵变。

士兵运动亦应与工农运动一样自军队中日常生活的斗争做起，促进军官与士兵的阶级分化，现在任何军队中欠饷扣饷、给养不够、服装不全、零用无钱、待遇恶劣、生活痛苦、阶级悬殊，都成为普遍的现象。故发兵士斗争只要我们有人有组织有办法打入士兵群众中去，军队的破坏，是极易着手的。做士兵运动的最好分子是工农，有组织的派遣大批工农同志以及得力的非同志投入军队充当兵士，由日常生活小的煽动、小的斗争反抗长官，一直发展到兵变或是联合群众携械逃入农村、拆散军队散入农民群众中变为农民的武装参加土地革命，或是当着军队与工农暴动的群众决战时在内响应以消灭军队的力量，其次以有组织的工农群众或是化装（或为卖吃食的小贩或为流氓）宣传分子，影响兵士群众发生我们的组织，也是士兵工作的好方法。

与士兵运动同时须要工作的有下级军官运动，但须万分谨慎宁缺勿滥。上级军官运动除一二特殊情形须另议办法外，均宜断然打消利用他们的观念。

士兵运动中党的组织，应以每连为支部单位，但每个单位中不宜过事广大的发展，防泄秘密。最好注重质量，每排能成立一小组不超过五人，在一连中便很有力量。如是一连中有十五人的严密组织，任何行动都必能发生影响。小组与小组之间断绝往来，支部与支部间亦然。组设正副组长各一，支部设正副书记各一，会议只限于小组宜万分严密。支部书记与小组组长宜个别来往，不必取会议形式。支部上设各级正副特派员，如一营驻在一地而有两连以上之支部时营设特派员，如一团驻

在一地而有两营以上之特派员时设团特派员。两营或三营之支部在三连以下者即设一团特派员即足。驻在某地军队党部之支部书记或最高级特派员直接受该地党部士兵委员会主任或该地县委或市委区委书记之指挥。反革命的武装组织中党与团的支部不分，直接受党的士兵委员会指挥管理，其组织系统，亦经过兵委到组织科。

军队中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可用以作宣传的号召，但实际不必组织防泄露党的组织秘密转碍破坏工作。党的士兵同志在群众中特别在杂色军队中可利用拜把换帖等社会习惯以拉拢群众借便号召。

二、工 农 革 命

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宜采用黄埔军队三三制的办法。惟特种队只侦探、卫生、特务三队必须设立外，余则斟酌实际需要定其设立与否。凡有工农革命军的地方必须采用志愿入伍定期退伍制以防止赤军雇佣职业化的危险。工农革命军的饷银制应取消，改为一切给养由公家供给，另发零用费。

三、赤 卫 队

赤卫队宜广大发展。在未暴动时亦宜去工农群众中秘密组织、秘密训练，发动后更宜广大组织，务使工农群众都能受到武装的训练，都能履行武装保卫的职务。赤卫军的编制工人方面如纠察队，农民方面如农军。

赤卫队的指挥权暴动前属工会农会或乡村苏维埃，暴动后属乡区县苏维埃。工农革命军有县苏维埃的地方，即宜受县

苏维埃指挥，有数县联合的地方即宜直接受最高级苏维埃的指挥。

四、军委与兵委的组织

有工农革命军管辖及有广大的军运的省份宜设军委。团应派一人参加。有工农革命军管辖的特委，亦应设军委。军委不仅有建议讨论权且应在各级党部常委军运政策之下负指挥管理军事工作之责。凡有军队驻扎的各县市各区均须设立兵委，普遍的作士兵运动。有军委的各级党部兵委不另设以军委兼，党与团的兵委合组不分设。在工农革命军中党的组织系统亦经过军委到组织科。党与团的组织，可分开组织，赤卫队中党与团的组织各自直隶其所在地之党部团部，在秘密时甚至须与其所属工厂作坊商店农村支部在同一组织之中。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湘东特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

中央听了陈××等同志的报告以后，对于湘东工作有下列之批评与指示：

最近湖南革命发展，特别是在湘鄂（“西征”）战争的过程中，得了一日千里的激烈发展。农民暴动的激烈，反动军队中士兵的倒戈，城市的白色恐怖的严重都证明湖南总暴动的局势日益明显。在总的发展局势中，醴陵、安萍、浏阳、平江、茶陵、攸县、湘潭、衡阳、耒阳、安仁等县工农兵势力已经逐渐得到联结而形成了湖南总暴动布置的中心区域，换言之即湘东一带的斗争局面成了全省暴动布置上的中心区域，而可以立即成功事实上的割据。

数月来醴陵乡村中的斗争，特别是在西乡南乡更为深入，确实发动了极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动手的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肃清乡村中的封建关系，建立苏维埃政权。最近与反动军队血战数次，充分的证明农民势力的伟大。现在农民与豪绅地主反动军队每日都在对垒之中，他们死守县城一隅，作最后的挣扎，绝对没有力量能彻底的实行清乡，以镇压和肃清乡村中的农民势力。因此，在事实上醴陵确成为湘东割据的中心区域，党和群众力量在湖南以醴陵为最有基础。

我们在醴陵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深入，但是疏忽了向外的

发展，没有能运用醴陵农暴的经验，积极的发动各县的斗争，形成醴陵孤立的局面，已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在目前一方面要继续深入醴陵的斗争，更加发动东北乡的群众，准备夺取县城与敌人作最后的决战；另一方面还须注意向外的发展，才能巩固我们在醴陵既得的胜利，万不宜有意无意的采用保守政策，死守在醴陵一隅，回避敌人的进攻。

安源的工人有极丰富的斗争经验，附近农民在安源工人领导之下起来斗争。攸县、湘潭与醴陵交界的乡村以及平浏一带的农民，都已有激烈武装斗争。毛泽东部队早已由遂川、万安退回攸县、茶陵、酃县一带，朱德部队据上海报载亦有经过安仁与毛部结合的消息，似此湘东已有这样伟大的军事力量做农暴的副力。现在反动军队虽然向湘东进攻，但是要消灭我们的势力，确是非常困难。目前我们应当以醴陵做中心，发展湘东一带的暴动，以造成湘东的割据——东至萍乡、安源联络莲花、宁冈，北面至株洲、湘潭与长沙联合，东南至攸、茶、安仁，西南至衡山、衡阳，东北至浏阳与平江联合。

湘东特委必须坚决的执行这种决议，在安源、醴陵调大批有经验的工农同志往平江、浏阳、攸县、茶陵、安仁、衡山、衡阳、湘潭一带工作，积极的发动各地的斗争，使分散的隔离的湘东各县的暴动，更加有组织的联贯起来，在政治上打成一片，总汇而成为湘东的割据，这个割据局面的创立，它的发展路线应当向着政治中心的长沙，同时要注意打通与湘南和赣西南的联络。

关于醴陵工作，特别有如下之指示：

A. 苏维埃问题　醴陵党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执行的非常迟缓，同时对于苏维埃政权尚缺乏明确的观念，以致有农协与苏维埃并存的现象。苏维埃是乡村中唯一政权的组织，

"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因此在苏维埃之外，不得再有第二个政权机关的组织，如现在的农民协会。醴陵党部应极快速的根据中央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通告，立即在各乡各区组织苏维埃。苏维埃一成立，农协已失去作用，须立即取消。凡尚未组织苏维埃的乡村，可限期由农民协会准备组织，但须纠正只是将原有的农民协会换一块招牌，而且仍旧保留农协的内容的不真确的观念。各乡区苏维埃须容纳非党的工农分子，党只是在其中取党团作用，不得由党员完全包办苏维埃的工作。我们要吸收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实际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生活，热烈的拥护苏维埃的存在。豪绅地主的子弟，在现在虽然有许多已投降到工农方面，与农民一样的参加各种斗争，但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绝对要防止他们势力的浸入。苏维埃对于参加斗争的豪绅地主的子弟，只能给他们以土地耕种，绝对不能允许参加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以前农协时代十人团的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乡村中实行五家联结的办法，以肃清反动派在乡村中潜伏的势力。在醴陵目前斗争的情况之下，须立即组织县苏维埃，以集中指挥力量。

农民群众还没有认识农协应当取消的地方，我们须一方面普及政治的宣传解释苏维埃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事实上充实苏维埃的作用而提高其信仰，使群众了解农协是应当取消。农协的取消须经过农协群众会议的决定和宣布，不可机械的以苏维埃命令行之致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B. 乡村经济与土地问题　现在醴陵分配土地的形式，各乡不同——有的是分配给农民自己耕种；有的是由农民共同耕种，共同分配；有的是更进一步的共同耕种共同消费。当此农忙与战争之时，不必一定要变更形式，很机械的重新分配，仍旧根据各乡的情形，由乡苏维埃自己去决定。苏维埃应即公布

雇工保护条例，以保护继续受雇的农民手工业工人苦力之利益，增加工钱，改良待遇。各乡区苏维埃须鼓励农民耕种，以增加收获的数量。决定缴纳农产品的条例（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维持苏维埃的收入。各县苏维埃应颁布贸易条例，在某种限制之下提倡并保护小商人的营业，经过他们与境外及县城发生商业关系，使必需品能够输入、农产品能够输出，并流通金融。在割据区域内可以发行有限的苏维埃政府的纸币以流通金融。此外在各乡区可由苏维埃组织合作社，抵抗小商人对农民的剥削。

一切财政绝对集中于苏维埃，由苏维埃支配，各民众团体和党部、青年团、军队等不能自由提用。

C. 军队问题　现在有的工农革命军应加以积极的改造，过去县委决定解散军队把枪完全交给农民的办法不甚正确，一方面在斗争上必须有正式作战的工农革命军，一方面机械的执行解散也会发生意外的损失。因此改造的办法应当是一方另行组织成分健全的新军队，一方面对于现有军队逐渐淘汰腐化老弱残废的分子，代以积极勇敢的农民（同志、非同志都要），并充实兵士政治工作、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使旧有缺点从政治组织上改正过来。再则工农革命军是正式作战的军队，须严密的加以组织，按照枪支的多寡，决定军队的数目，徒手兵不必过多（至多不要超过战斗兵一倍以上）。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教育，万分重要，军队中的党部须有计划的进行这种工作。军队中的党部，可照旧日国民革命军中党的组织法组织之，立即成立军委员会与支部的组织，经常的召集会议，加紧军中党员的训练。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归县苏维埃。军队与农民群众须发生极亲密的关系，苏维埃里面要有兵士的代表参加。由各乡区苏维埃经常的发起召集工农兵会议，增加他们中间的关系。现在乡村大都还是作战状态，各乡村可实行抽兵制

度，自动的组织赤卫队，以十人团做基本单位，维持乡村治安。

D. 教育问题　目前一般的宣传比较识字运动还重要。各乡区苏维埃须经常的开讲演会、游艺会……等，扩大革命教育的工作。目前教育的目标主要的要使群众了解革命的前途，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在乡村中尽量的开办俱乐部，增加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各乡区苏维埃应即出版壁报，印刷各种必需的宣传品。醴陵县委最好能出版一种“小日报”，传翻各种消息。多召集各种群众会议，每逢各种纪念节多开大会。普通的识字教育，亦应开始进行。如开办小学校，容纳农民子弟读书，完全实行免费教育。

E. 进攻县城问题　进攻县城成为醴陵一般农民的迫切要求，党部亦应当有争取县城的决心，要有严密的准备，必须有胜利的把握，然后进攻，万勿轻意尝试，而自招打击。中央认为在下列条件之下，才能进攻县城：1. 株萍铁路及城内工人能积极的参加斗争，与农民一致行动；2. 醴陵东北乡及附近农民群众的斗争都已起来；3. 军事上有了相当的把握与准备；4. 浏阳、湘潭、株洲、安萍、茶陵等邻县的农民斗争已经广大而深入的起来，事实上割据大部分的乡村。全备了这样的条件，进攻县城一定可以胜利的。

F. 对于反动军队问题　对于反动军队我们须加紧破坏工作，扩大宣传，运动兵士哗变。在这工作中我们的基本任务在于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当地党部应派同志加入军队当兵，进去活动。在军队驻扎的地方和军队经过的区域，张贴各种标语与宣传品。部分的零碎的缴反动军队的枪械。兵士下乡，只可缴其枪械，不应随意屠杀，以引起兵士群众的反感。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在醴陵成为最必要的工作，兵士群众的倒戈，可以促进我们的胜利之速度。

G. 党的问题　醴陵党的组织形式，异常紊乱，指导机关亦不健全，最近必要依照中央通告，从下而上的改造。支部的组织应以乡做单位，不应当数乡联合组织支部；区委的组织以区苏维埃为范围，成立区委。召集支部和区代表大会，由群众选举指导机关。在各种会议上须尽量的充分的讨论各种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乡村经济问题以及党内问题等。这种改造的工作，一月内必须完毕。目前先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选举县委；待改造完毕后，再召集代表大会选举之。党部应严格的纠正党员的腐化现象——如怠工、奢侈、赌嫖……

党的支部和党团须经常开会，切实实现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尽量减少负责同志个人包揽的现象。

以上各项，望即执行！并将此信公开，在各级会议中讨论！

此外，中央指定下列数同志组织湘东特委：

常委：杨福涛，廖保庭，毛泽东，鸣呵[1]，农民同志一人。福涛为书记，未到前由保庭代理。

委员：朱德，醴陵书记，潘心元，李涤生，醴陵农民同志二人。

特委管辖的区域：

醴陵，浏阳，萍乡，安源，茶陵，攸县，安仁，株洲。

特委应派人到各县乡村实地巡视，特委所在地经常至少留两人或三人。

附苏维埃组织通告[2]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即李鸣珂。

〔2〕原文无附件。

PDG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

——五三惨案后的反帝斗争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五月三日，日本军队在济南屠杀蒋介石部下之中国军队及士民，死伤千余人，又捕杀交涉员蔡公时及其他外交官吏，焚烧外交官署，搜索黄郛之办公处，黄郛仓卒逃避，又在胶济路及青岛也有同样之暴行。蒋介石不敢抵抗，将军队调离济南，声言继续北伐，同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以示“镇静”。但日方仍继续派遣青岛、满洲及国内之陆军、兵舰、飞机，纷纷出发山东以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并拟退长江各埠之日侨齐集上海。七日又对济南攻击，占领各机关。日帝国主义有计划的给中国南方军阀以重大打击，显而易见。

此次济南屠杀，当然和北伐有关。但北伐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意义，蒋介石出兵之际还特别声明保护外侨，并对宁案为退让的解决。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尤其和日本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北伐，不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走狗争宠罢了，不过想获得与帝国主义交涉之唯一地位罢了。可是带民族资产阶级性的蒋介石政府，在帝国主义眼中，还不如纯买办阶级性的张作霖政府的驯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六月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九期。

间的矛盾，始终不能免除，如收回关税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虽然以和平方式提出，都不是帝国主义所能真正容许的。所以这次屠杀，是帝国主义认为必要的。其意义，一方是在保持张作霖在北方至少在关外的势力，另一方是对新军阀示威，使他们打到北京后，完全屈伏于帝国主义，丝毫无别于张作霖政府，而且在日本名义上交还胶济后，必须有此一举动，才可以表示山东仍然是日本的所有物。

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潮，也是促成此次事件之一动力。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民政党联合在野各党同以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友会内阁，正到了紧张的形势。政友会的田中内阁于是采取对中国出兵以至屠杀的政策，转移国人视线到对华外交的问题上面。

中国国民党久已抛弃了他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为欺骗民众起见，在日本出兵山东的开始，即假意通电反对，不过同时禁止民众的反日斗争，取缔厦门福州的反日运动。到了济南屠杀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更软弱了。五月五日致函日司令福田，声称“严令所属官厅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区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于本日出发”。这是完全屈伏于日帝国主义威力之下的可耻的表示。六日通电，要取缔民众反日运动。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口口声声要忍耐退让，专心北伐，但日帝国主义之压迫一步加紧一步。国民党领袖之屈伏软弱，已经为国民党的群众及一般小资产阶级所不满。如南京各团体反日大会中决议“请求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上海学联除有这个决议外，还决议“请中央罢免丧权辱国之黄郛”，可见群众是有左倾的趋势了。

这一反帝斗争，现在开始萌芽了，但是如果我党不积极发

动群众参加，不久必然在国民党“忍耐”、“镇静”口号之下消沉下去。其实日本这次对山东军民的屠杀，完全是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屠杀工农的结果，在国民军北伐刚达到长江流域时，无产阶级领导武汉市民可以直接以群众的力量收回汉口英租界，假使工农革命潮流不因国民党的反动而遭受严重的压迫，国民党北伐的反帝国主义的意义能够随着工农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发展，换言之，就是现在所谓北伐如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含有比未达到武汉以前的更高度的民权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有广大的工农势力的拥护，则日本帝国主义决不敢公然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内施行野蛮的屠杀。无如自蒋介石、李济深在上海、广东残酷的向震动帝国主义的领导“五卅”高潮的工农阶级开刀以后以至武汉的叛变，国民党已经完全投降了豪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谓北伐只是一丘之貉的军阀混战，因此帝国主义便可以无顾忌的施行此次空前的屠杀和侵略了。因此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是工农为主力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厉行广大的宣传和对日经济绝交，一方面便是要以民众的力量从反日运动进而到反军阀战争、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和屠杀反帝国主义主力工农群众的刽子手——国民党蒋介石张作霖以至一切大小军阀等等。

再则自从国民党屠杀工农更进一步的停止一切民众运动以遂其卖国卖民的阴谋，全国范围内城市平民一点公开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都被剥夺尽净，特别工人阶级之被压迫被屠杀已经达到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残酷程度，因此这次反日运动的另一重要的意义，便是要借此机会由民众自动恢复一切民众运动，取得城市的集会结社的自由。党与团的一切支部更加深入群众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的宣传，发展工会组织，恢复工人群众中的基础，扩大在学生群众中及其他小资

产阶级的影响，以进而到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学生的教内运动、小商人的减税减捐运动……等。

又这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我们须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如果仅仅是普通的反日运动，则我们不但不能在此运动中取得若干群众，谋得若干发展，而且简直是替我们的敌人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摇旗呐喊。

自从工农武装斗争以来，同志们对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一种不甚重视的倾向。或以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帝运动，我们参加了徒然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或以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工农参加又将回复旧的联合战线而蒙蔽阶级意识。其实这些显然都是误解。国民党所领导的反帝运动，完全是假的，正要工农参加进去，把反帝运动弄假成真，才可以暴露他的假面具，否则由他去欺骗，真是提高其地位了。至于小资产阶级正在厌恶国民党，我们正要乘机争取这一部分群众，工农参加反帝运动，可以使小资产阶级同情于工农阶级之革命运动。旧的迁就小资产阶级或尊重小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当然是岂有此理，但目前将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拉开是我们的任务。而且对于反帝运动，小资产阶级是只有一时的兴奋不能持久的，非无产阶级参加领导，决不能扩大、不能彻底。

因此，中央决定我党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参加到公开的反日团体）。青年团更应在此一运动中打入学生群众中去。党部及党领导之团体发布宣言及其他宣传的工作，指出帝国主义险恶的阴谋及其残酷的屠杀，国民党新军阀甘心投降的辱国行为，提出对日绝交，实行经济绝交，要求撤退帝国主义军队，解除日军武装，对日总罢工，惩办福田司令，赔偿损失，驱逐日领，立刻撤退日本的海陆军，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复活民众运动，释放“五卅”

以来一切政治犯，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压迫民众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国民党，中日被压迫民众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世界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反对投降日帝国主义的卖国政府……等口号。并经过罢工、罢市、罢课以发动广大的群众，厉行经济绝交等实际斗争，以扩大反帝的浪潮（只有实行经济绝交，才能扩大并继续这一高潮）。

各地特别是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济南、青岛、天津、北京、开封、郑州、武汉、九江、南昌、长沙、芜湖、安庆，接到此通告后，须立即制定当地行动大纲执行之，并将执行情形，报告中央。

中　央

五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反对日军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全中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日本帝国主义竟乘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机会，派兵占领山东省会济南及胶济路以至青岛了。他又派遣军舰多艘至中国沿海各口岸，并谋侵入长江各埠，以图威吓全国反日的民众，使之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面前而不敢反抗了。五月三日济南事变的爆发，以及随后的发展，明白证明，这次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定的计划。

全国民众现在已为日本在山东的炮声所激起，各地反日运动已经先后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已经普遍全中国了。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先锋，是中国唯一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党——中国共产党敢以何以造成此次日本侵略决心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反对此次日本侵略，敬为全国反日的民众告。

是国民党的反革命造成日本的侵略

这次济南事变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定的计划，但日本何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十期。

PDG

以恰于此时实现此武力侵略中国的计划呢？归根一句话，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反革命。乘欧战机会占领青岛及胶济路的日本，迫于“五四”爆发的中国民众的民族革命运动，不得不将此侵占的利权交还中国（虽然是形式的交还，日本仍握有大部分的实权）。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巨潮一天天高涨，二十一条件式的露骨的对华侵略，各帝国主义者不特不敢再为尝试，而且相当的给中国革命的民众以部分的让步，譬如汉浔租界之交还等。在这民族革命高潮期间，虽然也有一些机会可以为帝国主义侵略借口的，但帝国主义者迫于民众革命的声威，丝毫不敢尝试：譬如去年英兵布防上海及南京事件等，虽然可以给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的借口，然而当时并不发生如此次济南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这都是因为民族革命潮流高涨，使帝国主义有所顾忌。如今不同了！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已经背叛了中国的民族革命，他残酷屠杀中国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最彻底的工农阶级，他杀戮、拘禁、通缉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民众领袖——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的分子，他——国民党的中央会议明令宣布“停止民众运动”，即压迫一切民众的要求，剥夺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亦即禁止一切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的革命，经过豪绅资产阶级背叛压迫以后，虽然更扩大深入到工农群众去，准备一新的更有力量的爆发，以推翻此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在帝国主义者眼中看来，却以为国民党的反动已经消灭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停止民众运动”了，所以重新运用其义和团及二十一条件时代之武力侵略政策。而开始用此旧政策者，仍是对华侵略最露骨之日本。于是而发生此次五月三日济南事变。

张作霖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

此次日本出兵是借口中国混战来保护其山东侨民的。这次混战是残民以逞的军阀争地盘的战争，丝毫没有革命的意义。张作霖和蒋介石同样是代表中国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同样是压迫、剥削、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同样是逮捕、拘禁、屠戮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领袖的凶手。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关系，则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李济深的广东政府及一切桂系军阀的统治固是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何尝不是分头向英日美法各国帝国主义屈服投降“亲善”呢？此次济南事变，固然对于蒋介石的所谓“北伐”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字林西报》甚至说这次事变发生就是蒋介石北伐的末日，但我们切不可以为日本帝国主义是帮助代表反革命势力的张作霖而打击代表“革命”势力的蒋介石，如近日国民党之所宣传者。在蒋介石的“北伐”中，我们闻也闻不出一点儿革命的气味。此次日本发动济南事变，其主要的作用乃是乘中国混战机会，占领山东的利权，其附带的作用：（一）田中内阁要造成严重的“对支问题”以转移反对派的视线而打消国会的不信任案；（二）张作霖究竟是驯养多年的老走狗，究竟比较蒋介石更容易驱策些，借此亦可以保持张作霖的一部分的政权；（三）给国民党军阀一个下马威，使他们即许“北伐”成功，也须承认日本在华既得的权利。不过如斯而已！

国民党禁止反日运动

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此次只是对于山东民众及无辜兵士的大屠杀，只是攫取中国民族的利权，占领中国民族的土地，威吓中国人民，侮辱中国民众，而并不是与蒋介石及其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有何等根本的冲突。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在国民党及其领袖看来也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反动以后，对于真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向来是禁止的。我们姑且不提李济深怎样欢迎港督金文泰而毁灭沙基的六二三纪念碑，厦门的国民党政府怎样禁止民众的反日运动，即许有些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也不过是纸上的，一旦民众稍为发生一点行动，国民党的军阀马上下令取缔禁止，说是"防止共产党乘机捣乱"！此次五月三日济南事变发生，已经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完全暴露了，然而国民党及其领袖仍然是让步屈服并禁止民众真实的反日运动。济南事变发生那一日，在济日兵只有三千，而北伐军有四万之众（《字林西报》说），蒋介石竟无耻的屈服，制止兵士抵抗，以致被日本屠杀民众数千，被其缴械无数，被其杀死并侮辱外交官员，而蒋介石自己亦被其迫退泰安，兵队完全离开济南。蒋介石以外其他国民党的所谓党国要人谭延闿、宋子文、何应钦等，也纷纷发出投降屈服的议论。他们这样的屈服还不够，还要禁止民众的反日运动。国民党中央一再决议要民众"镇静"；南京卫戍司令部禁止检查日货；上海警备司令部布告禁止反日民众集会游行；蒋介石通电只说是与日军发生误会，并声明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各省政府也都禁止民众积极运动，福州且宣布戒严……等。国民党一方面禁止民众反日，一方面乞怜诉

苦于国际联盟及美国帝国主义面前。国际联盟是什么东西呢？他只是资本家列强分赃机关，他何能替中国民族去反抗日本？至于美国帝国主义，则他对中国侵略的野心何尝不如日本？近日报载有美国出兵太平洋之说，这事如果确实，不过是为日本侵占中国利权太多，所谓“破坏了太平洋的均势”，因而危害美国在太平洋的发展，而绝对不是美国的仗义执言。国民党的乞怜于美国，简直是拒虎进狼！这些事实，明白向民众说明，所谓国民党及所谓国民政府，不仅不能够领导民众起来积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的武力侵略，并且禁止民众之积极的反抗运动。民众如果信任所谓国民党及所谓国民政府，则不久，民众反日运动将在“镇静”及“防止共产党”二个口号底下被镇压下去，济南青岛及胶济路将确确实实为日本所占据，此次损失及侮辱将永无昭雪报复之一日了！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被压迫民众的运动方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我们若依靠国民党及其政府来抵抗日本侵略，只有跟着他们去投降日本；我们要彻底抵抗此武力侵略，并谋为济南死难之数千兵民报仇雪恨，只有发动工农及被压迫阶级之广大的民众斗争。这是有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上海、粤、港、汉口、天津工人及各地被压迫的民众之广大的群众斗争做成的。汉浔英租界是怎样收回的呢？这是汉口、九江工人苦力群众亲手夺回来的。只有这些大规模的民众斗争，方能折抑帝国主义，使之稍示让步。而这些斗争，显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手领导起来的。如今，民众运动已为国民党明令“停止”了，白色恐怖

已经普遍全国，压迫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及一切革命民众的领袖了，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已被国民党剥夺净尽了，连反日运动也不许做了。在这时候，我们为避免亡国的惨痛，为根本解放劳苦的民众，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我们必须复活前次之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有反日运动无国民党，有国民党无反日运动

我们必须推翻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及其政府。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是与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背道而驰的，彻底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也是国民党所不愿意的。有国民党，即无积极的真实的大规模的民众反日运动；有民众反日运动，即无国民党及其政府。事实显然，无用说明。这次五三事变，是比那次五卅事变更严重几分；而这次五三运动将比那次五卅运动，更加艰苦——因为我们积极反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尤须反对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

全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我们在这艰苦斗争面前是不退却的，我们为自己谋解放，同时为全民族谋解放，我们必须不畏一切的奋起作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一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铲除民众运动的障碍物——国民党及其政府。

撤退日本驻华一切海陆军！

收回青岛及胶济路！

对日经济绝交！

断绝对日邦交，驱逐日本使领出境！

复活民众运动！

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反对新旧军阀混战！

打倒压迫民众运动的国民党！

打倒丧权辱国的南北军阀政府！

释放“四一二”以来的一切政治犯！

中日工农联合起来反对各自的政府！

世界无产阶级、农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顺直省委：

中央在接到你们“国奉战争政治任务”决议案后已有详细答复，指出决议案精神之错误。和森[1]同志来此报告北方情形之后，中央对于顺直工作有下列意见与指示。

A.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虽然受了很大的压迫不能积极的向北进攻，但冯阎[2]北伐军胜利的发展仍然非常迅速，奉鲁军阀内部既不能一致，显然是没有力量与冯阎抵抗，只要冯阎能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日本不再加以强烈的军事阻碍，京津必能于最短期内变成青天白日的反动统治。

B. 据和森同志报告，北方工人群众中的某种成分，表示要干就须拼命的孤注一掷，不然就只有让北伐军来了以后再图活动，起初顺直省委接受了前一种的影响而定出割据暴动杀人放火的计划，后来感觉自己力量薄弱，而又接受了后一种的影响而觉一切工作没有办法，甚至省委同志表示消极！

这两种倾向若是不能在党内纠正，结果都足以阻碍本党在这次军阀战争中一切工作的发展！省委应当坚决的与之奋斗。

C. 国民党势力一入京津之后必定用尽欺骗群众的方式去与我们争取群众，若是此时我们不加紧经过争斗去抓住一部分群众，将来的工作必定比现在更感困难，因此顺直党部必须抓

住这个时机竭全力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组织。

上次中央来信已指出，顺直党部在这次军阀战争中的主要任务，不是在与国民党争取政权的总暴动前途，而是如何争取群众的领导，充实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准备将来能够夺取政权。

在这一原则之下顺直党部须切实努力下列工作之进行：

一、北方民众对北伐军还抱有不少的幻想，因此我们须加紧在群众中反帝与反国民党及军阀混战的宣传与鼓动，解释国民党与其政府对于济南惨案无耻的退让与接受日本卖国条件等投降帝国主义的黑幕，和国民政府苛捐杂税压迫民众的罪恶，打破群众幻想北伐军到来的心理。这一工作不仅应当深入工人群众，并须扩大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民众中去。

二、这一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必须建筑在群众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提出较高的政治经济要求，发动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大小争斗，方才容易揭破国民党压迫民众的黑幕。

三、城市工作须由零星的、部分的准备发展到整个的较大规模的行动，当奉鲁军阀败退时工会可以公开起来号召群众的示威与争斗，但须同时准备须极力扩大下层的组织，并准备秘密的机关，因为我们的工会在国民党统治下是绝对没有公开存在可能的。

四、农村党部必须在五抗口号及土地革命政纲宣传之下，发动农民起来与豪绅地主阶级的争斗，进到夺取反动势力的武装、杀土劣、没收财产与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斗争，但乡村农民争斗没有广泛发展的基础不应攻取城池。

五、当奉鲁军阀败溃时，党应领导工人与农民有组织的起

来夺取收缴溃兵的武装（须知这是获得武装的最好机会），省委应详细规定夺取与收藏和分配武装的计划。

六、在这次争斗的过程中须特别注意党的发展与整顿，并须指导顺直的 C. Y. 积极参加工作与争斗。省委应在以上方针之下动员各级党部起来活动。

中央认为目前顺直工作非常紧张，省委扩大会议应暂缓召集。正定县委对省委的行动是由于省委与他们的关系未能密切而致有许多隔阂，省委应派人去解释并纠正其错误。因为目前工作紧张，中央提议藻与仲[3]两同志间须留一人在常委工作，望你们斟酌决定，并指定奇[4]同志参加常委，希望常委能积极起来战胜一切困难领导当前的争斗！

再望省委速指定一人脱离党的工作专门作济难会工作，受难总委直接与济总发生关系，并望速将此人的名字及地址交来，以后转知济总为要。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蔡和森。
〔2〕指冯玉祥、阎锡山。
〔3〕指王藻文、王仲一。
〔4〕指刘少奇。

PDG

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任　弼　时

一、在最近几月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本党组织曾遭几次重大的破坏，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江苏、河南相继破坏，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亦于上海被捕枪毙。

过去遭遇这些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但是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破坏的重大关键。

二、在这种严重压迫之下，各地党部往往失掉领导斗争的力量，甚至屈服白色恐怖之下而不能与广大群众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的同志反因是 C. P. 分子而不敢活动，不若非党分子的勇敢积极，以致放过许多群众斗争的领导作用，尤其表现于这次因济南事件之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运动之中。即是比较有斗争经验的上海党部，竟表现没有能力发动工人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全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几乎完全是一种国民党

*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这是他为中央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

领导的上层机关活动，看不出本党领导的群众斗争。这确是我党工作没有深入群众的危机。

三、这些现象的来源，就是由于平常没有注意运用公开可能去团结广大群众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须知秘密工作之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密党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坏。所以，运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是白色恐怖下的党部最重要的任务。

四、因此，在这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党必须有更严密的组织，庶几不致于脱离群众，并且可以防范敌人的进攻。但是，本党过去的组织，并没有能按照环境的转变而有新的改造，大多数还是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主要的现象就是：（一）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所以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二）没有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极容易被敌人探悉。这样情形的结果，不是脱离群众生活、毫不起一点领导斗争的作用，就是一动作便遭破坏，而致干部损失组织瓦解。这种现象尤其是在城市中的党部容易发生。

五、以上许多事实，应当引起本党严重地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务必坚决地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无论何时何地的党都不能夸其不至于遭遇破坏。列宁曾说，领导全党的艺术，不独在怎样有组织地向敌人进攻，在斗争一时不利之际，并且能够有组织地暂时退防。列宁这种教训告诉我们的，就是在目前直接革命形势与白色恐怖之下，一方面如何保障革命的先锋队，同时又能积极地领导当前的斗争。

六、中央根据这些教训，特别通告各级党部注意下列几项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

（一）在秘密环境之下（尤其是城市的党），每个党员必须成为群众中积极活动的分子。因此，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部，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出席会议，按月缴纳党费。凡是不遵守或是故意违犯这些条件的分子应当驱逐出党，吸收新的党员也必须按此原则。只有每个党员都有一种工作，才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作用，只有这样的党，方才能够担负白色恐怖下的繁重的艰苦的使命，使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一切投机者或是敌人的侦探分子不容易混入，消极、叛变的危险也可以减少。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俄国一九〇五年后白色恐怖也是非常严厉，当时党员的数量并不甚多，但质量非常优良，确能领导当时的斗争。如彼得城（现称列宁格勒）之某工厂支部仅有同志五人，完全能够领导全厂一万七千工人群众，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在秘密环境之下，务使党的组织适合于这一环境，使敌人不易破坏党的机关与组织，或者破坏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的部分。因此，以后凡超过五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分部。在这白色恐怖厉行的时期，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全体大会。如此则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如支分部书记超过六人时，亦须分组开会，开会时务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支部书记须设正副二人，干事会亦须有候补委员，以备一旦发生破坏能有人继续工作。

（三）城市街道支部，务必使之更能适合于目前的工作环

境，过去的形式显然是不能起重大的作用。以后街道支部之组织与作用，务须依照下列方式改变：

1. 每一街道支部或邻近街道合组的支部，必须按照党员职业区别而分成支分部，超过五人之支分部须另分小组，不满三人同职业的同志则编入某一支分部，平时只开支分部或小组会议，以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代替支部会议。

2. 每街道支部中的某职业支分部，必须负责发展该支部范围内本职业的工会支部。在上级工会与党的指挥之下领导该职业工人群众的斗争，由全市各街道支部中同职业的支分部负责强健并发展该职业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平时可召集这类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工会全般工作之进行。

（四）为健全指导并卫护指导机关起见，以后区市县省委须各预备一候补书记和一二内部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应少与普通同志发生关系，不出席执委以下的各种会议而偏重于内部工作。庶几在书记被捕或平时向外活动委员发生问题不能继续工作时，他们能够代替前者的工作。再则县执委委员必须轮流到所属县区党部巡视工作（广东、湖南等省须有五六个巡视员，其他省份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巡视员），常会所在之地至多留三人已足。只有这样才可以加强对各地的实际指导，同时又可避免全部被破获之危险。以后当地上级对下级的指导非十分必要时不应用书面形式，执委委员的姓名不必向普通同志公开，出席各种会议时只是代表机关，不必宣布个人的姓名。

（五）各级执行委员尤其是区委委员须尽量地找在业的工农同志担任，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秘密工作的困难，同时又更可以了解群众的情状。城市区委的机关应当建立在工人居住的区域，支部及支分部的会议须设法在工农同志家中召集（过去有些地方的支部会议都要在交通机关内召集，这是非常之坏而危

险的办法）。区委的执委会议也要尽可能地轮流在同志家中开会，这样必定可以减少许多机关被破坏的危险。除指定收藏文件之机关外，其他机关与负责同志居住处所不应储藏文件，无论任何机关不应保存同志名单与地址。

（六）各地普遍的现象就是在某次斗争失败或是执行机关被破坏之后，引起同志畏惧，消极甚至成为瓦解的状况，平时支部或支分部甚至区委会议没有上级代表参加便不能开会，这种现象非常不适用于秘密环境，其根本原因由于同志缺少教育训练和单独活动的能力。补救这一种现象除加紧同志的教育训练外，须特别注意干部分子之养成，自区委以下的各级党部须养成在党的一般政策之下独立活动的习惯与能力，庶几在某种困难情形之下（如与指导机关一时断绝关系）仍然能够继续活动，不致成为完全崩溃的状况。

（七）过去许多割据区域的党部与负责同志常常忽视秘密工作，以为“既然被我们割据了便永远是 C. P. 的天下”，因此把党的一切机关都公开起来，负责同志常常把自己的“官职”章帜公开悬挂胸前，惟恐人家不知道他的地位，一至反动局面临头便全部被敌人破坏，负责同志及干部全不能立足，或遭捕杀而受极大的损失，以致全部瓦解。以后应特别注意纠正这种现象，在割据区域的党部固然应当公开一切党的活动，但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活动。

（八）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地扩大。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但同时必须遵守集中的原则，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

（九）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否则秘密则与群众斗争也隔离起来，那便是极大的错误。为使党可以影响并领导广大群众，则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因此每个支部必须找出许多公开组织群众的方法，如上海之弟兄团、姊妹团、堆金会、读书会、平民学校等等，在自己的领导与影响之下去结合周围的群众，并且要抓住每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将我们秘密的工作与其联系起来，以吸引广大的群众，扩大党的影响。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各支部应讨论详细的具体办法。

以上所指各项，各级党部应即切实执行，绝不能丝毫疏忽，致使党遭受破坏的损失。须知因疏忽而引起的破坏与同志告密反叛因而被破坏的结果是相同的。

七、除上述各项外，关于党的发展，中央特别指出下列现象与办法，深望各地注意。

在这半年以来本党的组织确有极大的发展，改造组织也有相当成绩，但是发展的阶级成分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同志，城市的发展非常迟缓，这种现象极有动摇无产阶级指导的危险性（如盲动主义、只杀人放火等都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农村发展虽然迅速，但下层支部组织非常松懈，在斗争失败之后，党的组织便随之崩溃或消灭。因此，强健党的无产阶级指导（尤其是农村）与巩固农村党部的组织应当特别注意。

除城市党部须继续努力提拔工人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外，农村党部须注意下列工作：

（一）党的发展须以雇农、佃农及农村手工业者为主要对象，上列成分应占农村党部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自耕农及农村知识分子的吸收必须特别谨慎，并须有候补期的限制。

（二）党及群众组织的指导机关必须以农村无产阶级为中心，省市县委应经常地准备工人同志派赴农村党部工作，以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

（三）农村党部必须特别注意培养干部分子，每一支部或每一区域必须有一部分中坚同志，经过他们去强健支部工作。这些干部必须从雇农、佃农及手工业工人中去挑选，庶几在斗争受挫、指导机关遇害或不能工作时，农村党部还能在干部领导之下继续工作。培养的方法，就是多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或开办短期训练班。

八、关于提拔工农分子与改造党的问题，虽然有些成绩，但是各地发现许多缺点，多半偏于敷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如河南省委常委委员中虽有多数工农分子，但均派地方工作，实际上最高指导机关仍为知识分子包办。广东某处常委委员虽全系工农分子，但开会时一切问题完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秘书长。湖南省委常委则有每隔几天又另换一新的工人同志之现象。如此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的结果，就是由多数非工农分子的指导机关变成少数甚至一个非工农分子的包办。这一现象绝非中央提拔工农分子的本意，各地必须纠正。以后应注意：

（一）提拔的工农同志必须是干部而能担任指导机关一部分工作的，不应很形式地以为只要有了工农同志便是满足。

（二）指导机关以内的知识分子或有工作经验的工农同志必须帮助新进的工农同志工作，注意告诉他们各地及上级来件，推动他们发表意见，并须使之学习起草通告、决议案及复信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中共江西省委代转的毛泽东给中央等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

中央：

兹将吉安县委转来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录报于下：

玉林[1]兄：

兹接着泽东同志给你们和中央的信，你们阅后希即转中央为要。今录泽东同志报告如下：

（一）我们失败后——在湖南（军队无甚损失，不过是湖南政权和茶、酃政权被破坏了）退至赣边，岂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人在这里。

（二）占领的地方是永新、宁冈、遂川三县，不久将有扩充地盘。

（三）近击毛部之杨如轩师，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部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2]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兵的溃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支。

（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

农政权，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工夫来做这些事，比较的有意义的多。

（五）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机关炮略备。以朱师二十一团、毛师三十一团为较有战斗力，马马虎虎的军队来很可一打。

（六）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大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善。

（七）党则师委军委团委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情形日益良好。

（八）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日除米除三小洋外，所以不消说不上。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

（九）两省边界距离十余县，两省省委历来管不到手。因同志的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不良之现象。去年十二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请另派得力同志来做书记，事实上毛同志任军中工作很难兼职。……

（十）我们的永久通信处是宁冈袁文才、大小井遂宁界荆竹山王佐。

（十一）政治分析，党的重要文件请时时寄来。

（十二）请将别区不能立足的暴动分子大批的送来，不论军事、政治、技术的，愈多愈好。

前委之揽事做无骂词又骂受不办呢？睡不觉，现未免是罪

恶。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以为如何？仍听兄处明示。组织一定应组织，这比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之一。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久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从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但并非省委明示。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已核定的话，并毛同志任书记的话，仍非省委明示，这等办起来呢？又怕接无味的骂。完了。

敬致拳头敬礼。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毛泽东

五月二日书于永新城内。

吉安县委转来

江西省委代转

五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舒玉林。

〔2〕指朱德。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

——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军事运动的一般原则

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深入建立割据区域，争夺城市的一阶段。在这时候为要建立无产阶级城市的领导权，消灭敌人在城市的武装势力，党不但应在消极方面纠正已往军事投机的错误，并且必须在积极方面对于如何打入敌人的武装，如何扩大工农群众的武装，建立红军，与其他关于军事的问题，要能够有整个的规划与指导，所以军事问题现在占了更重要的位置。

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已经因农村破产而发生动摇，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经济基础，又因工农不发达而不能稳定，如是产生了广大的长期脱离生产的游民无产阶级，而形成今日军阀制度下的军队与民团商团土匪。这都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但并不受地主或资产阶级的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

直接指挥，而在介于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军阀手里。工农革命要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他亦必须破坏这一反革命武装，消灭军阀制度及依附民团商团等武装势力。

破坏一切反革命武装，在目前有最大的可能性，军阀制度的本身，已表现出许多的矛盾。兵士与长官间阶级的冲突，是有军队以来便反映着社会阶级的矛盾而存在的。现在因为游民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大，非地主阶级的经济能力所能赡养，军阀为图自身的生存，自己相互间，以致他们与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间又发生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爆发，使军阀制度继续的削弱动摇，而且加剧了兵士长官间阶级的冲突。南方新军阀自背叛革命以后，取消了初期革命的宣传，屠杀工农，虐待兵士，为权利地盘之争斗，驱遣兵士自相残杀，兵士因此受了更大的剥削与牺牲，对于官长蕴蓄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他们又恰好受了土地革命的与各地工农暴动的影响，分土地给兵士的口号将他们军队内部本身利益的斗争与社会上工农斗争联系起来，于是表现出反革命军队的普遍的动摇。陈济棠、蔡廷锴、徐锦棠部在广东，西征军在两湖，均甚为恐慌，在这时候只要我们有发展兵士运动的决心，破坏消灭敌人军队是很有把握的。民团商团的武装，多半在被雇佣的农民工人手里，在此工农革命的剧烈斗争中间，他们离开地主资产阶级更是容易的事。

要破坏反革命的武装，一定要从挑拨他们的兵士与长官间阶级的仇恨与冲突作起来，兵士容易感觉的是自己受长官的压迫，兵士能够起来杀压迫他们的官长便可瓦解军队，破坏地主资产阶级所依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自然军队中单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容易和缓下去，一定要工农斗争愈发展，才可以促进兵士的阶级斗争，并使此斗争能够愈加有意识

的走到与工农会合的总暴动路上。

在破坏反革命武装的过程中间，同时要将工农自己的武装建立起来。工农赤卫队应当尽力扩大，在暴动区域中并且要挑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与觉悟的兵士组织红军。红军的主要部分，一定要是脱离生产不久的工农分子，而且应当有定期退伍的规定。兵士参加红军的应当给予土地。反革命军队中的兵士流氓化的成分很重，他们在兵变或暴动以后，不一定会愿意参加红军。兵士运动的主要目的，亦只在破坏敌人的军队，不应存改变此等军队为红军的空想。

八七会议以后的军事运动，虽然中央曾经尽力纠正各地军事投机的错误倾向，而且逐渐感觉到破坏敌人武装、扩大自己武装等工作的重要，但因为缺乏军事问题整个的规划，而且各地的暴动都只是承袭旧的军事运动的遗产，每表现出军事运动的政策不能与土地革命的深入相应的缺点。例如广州暴动时工人群众的要求武装，只是旧时罢工纠察队时的影响，工人群众在夺取武装以后，并不能迅速组织起来，党亦没有建立红军的计划，教导团的叛变只是旧时的党的工作所造成，叛变以后其本身对于暴动的观念及任务并无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军事运动的新政策，至于以前没有党的工作的军队，更是全无破坏工作的计划。各地暴动中的农军，多半是脱离农民群众集中城市的驻防军性质，所以在暴动后始终不能成为农民群众化的武装。农军职业化的弊病一直存留到现在。琼崖暴动则由小地主、自耕农、贫农等联合反抗驻防军的运动演化而成，国民党反动以后，其领导权虽转移到本党手里，但红军的成分仍旧以小资产阶级分子居多而不能群众化。此外各地暴动只依赖有枪农军。这些实例，都证明对于军事问题现在急于需要有一个整个的规划与指导。

以后的军事运动应遵守下列的原则：

（1）工农群众的军事化。暴动不只是需要少数人的武装，更不是只有某一种人或某种武器方能参加暴动的组织。应当使工农群众都有军事化的决心，要加入敌人军队中去瓦解敌人的武装，要以任何武器铁棒木梃乃至于破坏敌人放火等应用的工具参加暴动。军事化的意义只是要工农不仅注意宣传煽动，而能够以实际行动破坏敌人的统治。

（2）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职业化的军队制度必须废除，军队要定期退伍，逐渐改为志愿兵制，以至于征兵制，极力减少军队中的机械生活，废除薪饷等差制度，方能除去军阀制度的遗毒，而成为真正工农群众的武装。

（3）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现在已经不仅是混合战线的乡村斗争，而且要有计划的夺取反动统治的政权，有些被我们割据区域以内的更是要巩固与扩大我们的政权，军事上非有坚强的组织与集中的指挥，不能达到目的。

（4）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这是暴动能够获得胜利的保障，敌人军队的组织多散乱，各种技术均差，如我们能注意军事技术，胜利是有把握的。

（5）注意与敌人战斗时的战术。例如黑夜袭击、游击战争、巷战、野战等方法，要能够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对指导这些工作的同志给与明白的指示，方能加增胜利的希望。

二、破坏反革命武装问题

现在反动军阀、民团、商团、土匪内部，均多矛盾冲突，易于破坏，一般工人农民对于民团、商团、土匪情形尚多明了，认为无足畏惧，惟对于军队则多隔阂而表示可惧，实则现

在内部腐败崩溃，统治阶级财政既不能维持军队，军官一定克扣军饷，而且要包烟包赌，争夺地盘，以保持其自己的利益。全国军队警察多六七月不发饷，索饷辄被拘禁扣留，病兵伤兵亦无优待办法，兵士每发饷后即图逃跑，不愿当兵，军阀下的兵士大抵皆如此。他们又有各种矛盾冲突，使自己的势力继续的削弱动摇，在工农革命高潮中，兵士运动遂成了比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更容收效的工作。这些实际的情形，必须向工农群众切实宣传，以打破他们畏惧兵士的心理，而且要领导他们参加破坏反革命武装的工作。

要破坏反革命武装，第一要接近兵士群众。接近兵士群众的方法，或派人加入军队，或设法与士兵发生关系。派人加入军队，以特殊技能，如能代人写家信，或能玩弄乐器者为宜，因为他们容易与许多兵士往来。亦可以借当伙夫、当号兵与兵士接近，伙夫、号兵皆可以出入比较自由，便于工作。在军队外面与兵士发生关系，又可借小贩或洗衣补衣等事，有时亦可冒充兵士出入兵营，其军纪懈弛者可借茶楼接洽一切。中国现有的军队可分为三种：（一）土匪散兵改编的军队，与多老兵的部队，其流氓化的成分很重，军队的纪律甚宽，以土匪运动方法对付之便自然有成效；（二）新兵部队，此项新兵，以前未尝过军队生活，易感痛苦，然而畏惧纪律不敢反抗，这以派人加入军队工作为宜；（三）外省的兵离家远生活上痛苦多，易于煽动，然每感于无出路。这须有能说普通话而了解兵士生活的人前往工作为宜。宣传上适用月饷二十元之口号，因这些兵士得饷可以有回家的希望。

煽动兵士之目的，须注意在夺取敌人兵士之信仰，破坏敌人兵士与长官间的关系。所以提出来的要求，要不使反动军官能以小利引诱兵士和缓破坏下去。要以各种方法，利用各种间

题，煽动兵士，所用的标语图画，对于临时事件提出有理无理的反对长官的主张，只要能鼓动群众破坏长官的威信，便都是适用的。惟宣传的口号传单，则应是非常正确的。宣传应从兵士痛苦说起，然后说到工农兵联合，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以至于暴动的组织及其他技术问题。宣传的方法通常是用口头谈话式的，然而有时文字的宣传亦非常有号召的力量，所以小的宣传有时是须要的。尤其在少数军队单独驻在一地之时，能以一种传单给全部兵士，可以增加其动摇与恐慌的程度。

兵士运动的组织问题，除兵士中少数进步分子介绍入党外，应当有兵士联合会之名义以为号召之用，兵士可酌量介绍其人兵士联合会，但不必编组开会，各省委对于兵士运动应当更有计划的进行。敌人军事中心的城市，必须有专人负责兵士运动，能得兵士同志负责更好，能够确定这样的计划才能使我们兵士运动不受敌人军队移动的影响。

兵士运动必须注意军队中的斗争，要经过一次斗争，方能增高兵士阶级仇恨而提高我们的领导权。但兵士的斗争比工农更易走入武装的冲突，使我们的组织归于破坏，若是准备兵变或暴动，须注意斗争的方法，不可过于激烈，只以兵士能受我们的影响为标准，例如闹饷须用要求发饷等形式，使兵士对官长失信仰，不能得饷时，应用消极手段宣传破坏长官的威信，而不即刻采用积极的行动。利用待遇问题如伙食或惩罚等引起斗争，亦是好的。斗争的方法是鼓噪，请求长官，包围长官，罢操等。

兵士自身单独的兵变，应当加以提倡，必须有兵士为本身问题发动的兵变，才能逐渐成为工农兵汇合的暴动。兵变是没有夺取政权之意义的，但为破坏敌人武装，兵变是对于工农革

命有利的事。兵士受着工农革命潮流的影响，尤其是本省军队或由土匪散兵改编过来的部队，容易走到兵变的路上。自然党必须尽力使一切兵变在党的指导之下进行，尽力使工农的势力影响兵士或准备解除其武装。

兵士暴动是有夺取政权之意义的，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在兵士暴动时，工农愈有力量，方愈能抓住兵士群众。再则兵士暴动之时，党必须注意组织一部分基本部队，以收拾其他部队。暴动以后，老兵或土匪散兵分子多会逃走，彼等亦有意见纷歧或发生其他野心之弊，此等部队不可选举长官，应由苏维埃派出长官去，其不服从的应即坚决的解除其武装。新兵部队可酌用选举长官及组织各种委员会的办法，由党以苏维埃名义派政治委员监督之。

关于兵变与兵士暴动的各种实际方法，由军委编秘密小册子以便给作兵士运动同志之参考。

兵士运动的口号：1. 兵士月饷二十元，2. 发清欠饷，3. 按月十足发饷，4. 反对克扣军饷，5. 军饷公开，6. 反对长官打骂兵士，7. 有病不出操，8. 病兵伤兵要有疗病零用费，9. 反对剥削兵士的自由权，10. 杀压迫兵士的长官，11. 兵士不打工农——穷鬼不打穷鬼，12. 杀屠杀工农的长官，13. 兵士参加工农暴动，14. 打倒财主老分银钱土地，15. 兵士要田地房屋，16. 不替军阀当炮灰，17. 打倒不发饷的新军阀，18. 打倒屠杀工农的新军阀，19. 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20. 一切兵士加入革命兵士联合会，21. 中国共产党是工农兵自己的党。

三、扩大工农群众武装问题

组织赤卫队的目的，在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军事化。此所谓军事化，不仅在使工农群众能够与敌人战斗，并且是要在刚夺取政权之时，使一部分参加暴动的群众能够有组织的进行消灭敌人的工作，如肃清反革命势力，没收、征发、运输、交通、侦探、救护等这些工作，都是赤卫队工作的一部分。

赤卫队的组织，城市方面可以适用广州罢工纠察队的组织法，即以十人为一分队，每分队分二小组，三分队为一支队，三支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此种组织须适合于街道区域，如对付资产阶级的联街自卫团，街道区域的组织原则，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自然赤卫队下层的组织如小组分队乃至于支队依各街道区域以内之各业工人分别编制，但上层组织如大队中队应按街道区域而组织有指挥该区域以内各业工人赤卫队之权，如此方不至在暴动前后发生行动上的困难。乡村方面的赤卫队可适用以前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法，即以十人为一分队，每分队分二小组，二分队至四分队为一支队，二支队至四支队为一中队，二中队至四中队为一大队，二大队至四大队为一团，乡村每区有区苏维埃之赤卫队委员会指挥全区赤卫队的工作。大队中队均须按照地方区域而组织，中队以下可按各乡武器之种类，如尖串、大刀、粉枪、子弹枪，分别编制，以便于战争时之指挥。各区并应组织常备队，以供集中调遣。赤卫队的成分，城市方面最好能包含一切秘密工会会员，其未参加工会而愿军事化的，亦应使得加入。乡村方面凡愿参加暴动的分子，均应酌量使加入赤卫队，农妇亦应当有大力量参加。尤其是青年的佃农雇农分子，应当是赤卫队主要的成分。赤卫队必

须减少流氓分子，虽然他们能够比较勇敢能战斗，但他们在失败时容易有抛弃乡村的倾向。

赤卫队的训练指挥人才，必须由同志中训练一批人担任，指挥必须与队员言语相通而能了解军事。乡村赤卫队可用一部分农军人才，在城市赤卫队办理有成效时，可派城市队员负乡村训练的责任。赤卫队的上层指挥须由工人农民领袖担任之以资号召。如此领袖不懂军事，可派军事人员助之。上层指挥不可用流氓分子，因这种人每不了解组织训练的重要，而且对于反革命方面易于有姑息妥协的倾向。

赤卫队所应受的训练，包含暴动一切须要的技术，不仅是如何用枪，并且学习如何夺取敌人的枪，如何使用各种木棍、铁器以及一切破坏的训练。例如破坏电线交通放火等，侦探的训练，例如侦查消息报告等。城市的赤卫队并应学习巷战，乡村的赤卫队则应学习黑夜袭击游击战争野战等。关于赤卫队所应学习的事项，军委应编小册子供给其材料。到训练的方法，通常应以每五人为一单位，在室内秘密行之，分队长支队长的会议，应随时召集，研究训练事项，但有时亦可酌用野外训练，尤其是在乡村中有更多的野外训练的机会。

暴动时无组织的群众的抢劫行为是不可免的。在乡村中这种情形更甚。但在抢劫的紊乱状态中，易使敌人逃走或反攻过来。所以赤卫队必须迅速封闭没收大的仓廪商店，征发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尽先分配给赤卫队，其次便分配给贫民，使赤卫队不至因抢劫而忽略了他们作战的责任。乡村赤卫队为继续作战，并须注意给养问题，不然农民便会为了吃饭而解散离开他们作战的地点。

暴动时对于有枪支不肯取出的农民，应当加以积极的劝

导，在劝导以后不取出的，应没收其枪支。富农多有枪支而不愿取出，为革命的利益，此等强制手段，有时亦须毅然采用之。

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应确定由苏维埃指挥，成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党应帮助团发展少先队的组织与工作，在战争时他应受红军指挥机关指挥。不能单独作战。其中勇敢的分子，应继续不断的转到红军中去（城市不应有少年先锋队的组织）。

在暴动以后，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应当大批的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中心成分。

四、建立红军问题

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

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惟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团的，仍可听其存在。

红军之编制，须依武装及作战需要而定，暴动的群众既不能有多量的武器，在作战时必须参用旧式的粉枪、大刀、梭标、尖串等，其作战亦多系乡村战争，故暂决定试用三五制，即以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五排为一连，五连为一团，五团为一师，每师共四千五百人。每团五连，用步枪者二连，用粉枪者一连，用大刀、尖串者二连（此外尚有侦探、交通、军医、特务各种组织，至其他各特种组织，则依所有武器决定之）。此系采太平军制的精神而求适合于游击战争的需要。各

省割据区域，即可试用此制，以便依实际经验，而为最后之决定。

红军之成分，须极力减少小资产阶级之成分，或旧式雇佣之兵士，因为这容易使红军的基础动摇，而归于消灭。红军须有广大之工农分子参加，先选拔赤卫队中勇敢分子，尤其是同志加入红军，工人赤卫队分子尤须有多数加入。红军的干部学校，应挑选城市工人去受训练。

红军应当定期退伍，每六个月退伍三分之一，外省兵士退伍后不愿回去的，可酌留为下级干部之用。红军的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训练以战斗时必要的，一切形式的不必要的训练应当尽量减少。机械的纪律，更应当取消。红军虽应比赤卫队较为严肃，但一切礼节，只以表示亲爱与整齐为主。必须尽力改今日雇佣军队的机械生活，红军方能成为真正工农化的武力。关于红军的训练，军委应规定操典礼节，以适用下级军事工作同志之需要。

五、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

军事问题既因暴动的发展而趋重要，党的军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军委必须有负职工运动之责的同志，或负工人赤卫队之责的同志，与农民或农民的武装同志参加。同时亦须有熟练军事技术的同志参加。此外能得一熟悉社会情形的同志参加更好。军委的工作不但限于计划建设，并须分科掌管兵士运动红军赤卫队调查及其他特务事项。

省委特委与暴动的市委均应有军委之组织，重要县市应有军事特派员参加县市委，在军委特派员下和无军委之军事中心

地点，均应与团合组兵委，多引导C.Y.参加士兵工作。军委须有团的代表参加。各级军委，发生直接的关系，同时对于同级之特委县市委发生关系。上级军委之指导，与同级特委县市委有不同之意见时，须服从上级军委。各级军委及兵委均应有工作大纲，受上级军委与同级党部之审查指导，军委根据此项工作大纲得独立进行其工作。

军事之指挥系统，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由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赤卫队由县或区之苏维埃赤卫队委员会指挥之。此委员会即为党的军委或军事特派员。在作战时红军总指挥有权指挥赤卫队。红军之调遣，须服从割据区域苏维埃之命令，各县苏维埃有权调遣全县的赤卫队，但不能直接调遣红军。

六、军队中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

在反革命军队中为保守秘密，党与团应合并组织，受军委或兵委的指导。反革命军队中团设支部，连设支分部。每连党员人数不可过多，且须有严密的组织，支分部书记只与各小组组长发生关系，同志只与所属小组组长发生关系。

赤卫队除常备队应有党的独立支部组织外，其余不须有党的独立组织。

红军党的组织亦应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分部，惟在目前红军战斗尚多以连为单位，每连同志人数如较多时，得暂以连为单位，设立支部，惟红军兵士不应均被吸收为党员，因如此将使红军不能进步，反生腐化怠工之弊。

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红军兵士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最好由工农分子充任，能了解军事的更好。政治委员在党内属于师委，同时即为支部或支分部党的负责人员，对党员应有秘密特殊之训练，但对外不得用党代表名义，应代表苏维埃进行兵士群众的政治教育。利用红军兵士集中施行政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可使红军兵士的政治认识与宣传组织工作能力增高，而且在退伍之后，乃至于在偶尔失败之时，均能使他们回到乡村中成为群众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

政治委员应负责改良红军兵士生活，办理体育娱乐事项。

红军中政治工作大纲应由省委详细规定，以便下级负责同志遵照施行。

七、其　　他

全省工农现有的武装应有详细的调查，对于子弹之制造、枪支的修理，均应设法进行，尤其是补充子弹的办法，应当注意。兵士运动之同志，可设法从兵士中购买子弹，尤其从兵士出发时购买子弹甚为容易。

红军经费，每师兵士以六千人计算，每人伙食、服装、医药、零用平均每月十五元，即每师每月须经费九万元，此项经费，尽力由没收征发等方法解决之。红军应设立经理委员会，兵士选举代表参加。

侦探调查工作亦应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应设法派同志到反革命军政机关作各项工作，以获得各项秘密文件材料。

军医人才与设置，亦须由军委加以注意。

此外有关于军事的各种特务工作，军委须随时注意计划进行。

中　央

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德润二兄并转前敌诸同志：

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中央在这数月中也曾努力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党外的反动势力奋斗，经过了去年八七紧急会议及十一月的扩大会，直到现在党内的情形的确已有很大的变化，党的工作亦较前有进步，这是可以告慰于转战数千里的同志们的。同时全国政治也有很多的变化，只可惜这些材料不能达到你们，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委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中央甚为欣慰！除将中央最近的重要文件设法送给你们外，还有此信的指示：

目前全国的政局是北伐军已快达到北京，这次的北伐已经完全失掉了革命的意义，因为国民党已经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党，已经投降了帝国主义。在此北伐的过程中，发生了日本占据山东济南、青岛的事实，日本之所以敢于如此的是因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威胁国民党军阀，使之达到北京后更加驯伏于帝国主义的肘腋之下。同时可以进占

满洲、济南、青岛，期于二十一条之实现，扩大其势力。因此国民党在此次事件中，他的外交政策已经充分暴露于群众之前而完全逐渐失掉民众的信仰。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山东的事件，不单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单独行动而是与英帝国主义有所协调，而给蒋介石以严重的打击。英帝国主义要借此机会来扩张其在南方的势力，桂系素系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也要借此来灭杀蒋介石在南方的势力，冯玉祥则欲借此机会而取得山东，事实上对日外交早已为冯玉祥的王正廷所办理，山东亦已入于冯玉祥的手中，蒋在这次北伐中已减低了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次英日的协调予他在太平洋以不利，因而极力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调膀子，也大开其兵舰到中国来。由此可知，在此次事件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军阀没有帝国主义的背影，而帝国主义间虽然不至于马上爆发一个世界战争，但其暗斗已经增高。同时在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党因为是采取一种投降的政策，即日本帝国打击蒋介石的条件如要蒋介石谢罪、撤销高级军官贺耀祖及北伐军退出离济南二十里以外等。国民党军阀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蒋介石亦致不能在山东立足，国民党军阀一致在这种投降的外交政策之下，北伐乃有达到京津的可能。

虽然这次所谓北伐实有达到京津的可能，但他们达到京津后军阀的统治并不会统一，反动的统治仍然是在继续的崩溃，国民党军阀之间开始了更剧烈的更复杂的冲突，反动统治始终不能稳定，其主要的原因有五：第一是帝国主义间在华的冲突；第二是豪绅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第三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之间的冲突；第四是军阀之间的冲突；第五是工农革命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须要一个统一的政府，他要利用中国各派的冲突来维持扩

大其在中国的地位。因此每个帝国主义都要扶植一派军阀，英帝国主义几月来已经与桂系军阀勾结上了，日帝国主义则有不同的主张，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在野派则主张勾结蒋介石军阀，而代表豪绅地主买办的田中政府派则仍继续其维持张作霖的政策。冯阎打到北京后，将形成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三派军阀互相向日本帝国主义争宠的形式，蒋介石则将继续与日本在野派吊膀子或完全倒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怀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出路也便是要各自维持一部分军阀，利用军阀来扩大其市场、扩大其政权。因此在豪绅资产阶级之间也形成了很明显的派别，最显著的如江浙豪绅资产阶级之拥蒋；广东派之拥桂系，同时各省之内的豪绅资产阶级也有很多的派别如江西土著派与客籍派之争都是重要的事实。但军队雇佣制一天一天的扩大加重了豪绅资产阶级之负担而又不能不维持军阀，于是豪绅资产阶级对军阀也一天一天地厌恶起来，增加了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因为上述各项原因，每派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都要利用一派军阀来维持扩大其地位，于是军阀间的战争更加容易促成和爆发，同时各派大军阀之下又包含着许多小军阀的冲突，因而全国大小军阀间的冲突更会一天一天的加剧而无法停止。现在全国军阀割据显然划分成五大派：蒋介石的江浙皖闽、桂系的两湖两广、冯玉祥的陕甘豫鲁天津、阎锡山的山西北京一带和内蒙、张作霖的东三省。此五派军阀必要在一种互相利用互相冲突的形式之下生存着，蒋桂两系的冲突近一年来没有一天停止，开始是桂系与西山派联合倒蒋，继则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派倒桂系，继更发生间接的军事冲突，广东之张李[1]战争、桂系对湘战争都是这一间接冲突的表现。及至北伐战争开始时，蒋以力量之弱而不集中，于是又以高唱北伐的招牌来抵制桂系的进攻，但在北伐中蒋桂两系的明争暗斗并无

一天停止而且加剧，现在的情形则是桂系联冯以制蒋，而蒋则会联阎以对冯的局面。同时蒋更将在北伐军达到京津后，利用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的地位，来玩一些军事统一、财政统一、政治统一等等把戏，这不但是一些笑话，而且会更加促成军阀间冲突之加剧以至于部分的或巨大的军阀战争之爆发。

目前每派军阀本身的力量均非常之削弱，其主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不断战争的损失无法恢复起来；第二是由于工农暴动的影响；第三是由于兵士的倒戈。兵士叛变的原因，是由于工农暴动的影响及军饷积欠太多生活非常痛苦，工农暴动没收分配土地的宣传和事实对兵士的影响非常之深，使兵士倒戈跑到工农方面来，加以工农暴动减少了甚至断绝军阀的税收，财政上发生困难，增加了兵士的痛苦和动摇，因了上述原因使各派军阀的势力日趋削弱。现在的事实：冯的主力军在这次战争中已损失十之六七，虽然现在他在表面上有甘陕豫鲁四省的统治，然而其力量之所能及的实在不过是在几条大道和沿铁路，其他的县份仍在杂色军阀的手中，这些杂色军阀时时刻刻都是他的肘腋之患；阎在这次的损失亦不下于冯，现存的主力非常之弱；蒋在江浙须有相当的巩固，然他的实力不过一、九、三十二三军，此次的损失亦甚大，近因桂冯之排挤会将一、九两军由前方调回，至于皖闽江西虽在表面上是倾向于他的，然均为杂色军队的统治且内部异常动摇；桂系则在历次斗争中遭了极大的损失，广东的陈铭枢、两湖的许多杂色军队都是他的敌军，地位亦极不巩固。在这种各派军阀削弱状况之下，他们的唯一出路仍然是继续准备战争以期扩大其地盘、扩大其收入以及加紧向城市乡村残酷的剥削，于是各派大军阀无日不在进行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之争夺，即每省的小军阀亦在努力于各小城市之争。因此在这种全国混乱状况之下，不但工农

已忍受不过痛苦不断的斗争起来，暴动起来，即小资产阶级虽在国民党开始背叛革命时倒到国民党方面去，然到现在已经渐渐觉悟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欺骗，而开始动摇起来，尤其在济南事件之后更增加民众对国民党之愤怒，即国民党中的下层党员亦多表示不满，于是国民党也由此而起了分化。

工农的革命运动现虽尚未到一个全国的高潮，但是一天一天的在继续高涨，许多城市的工人斗争虽然因为过去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之影响以及国民党叛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致未达到一个公开的高潮，但各地都有不断的大小斗争。如广州暴动完全在工人阶级斗争之下而爆发起来，许多城市如武汉、长沙、九江、北方都有不断的斗争，武汉的工人还曾起了几次的大的群众斗争，他们不单有经济斗争的要求，而且对于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亦甚迫切，上海的工人近年来无一日不在与反动工会工贼作艰苦的奋斗，在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独能违反国民党的命令而作单独的反抗斗争，北方的铁路矿山也起了一些零碎斗争，最近的工作更有进步，许多地方都有赤色秘密工会的组织。农民暴动更是普遍的事实，在北方已由反抗苛杂的运动而转入于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在江浙有不断的乡村斗争起来，在河南的豫南、豫中都曾有很大很剧烈的斗争，现在还有几十个乡村苏维埃的组织，至于湘鄂粤赣更已是一个深入于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的内容。兵士运动历来我们党只作一些政治工作即所谓姨太太的工作，在工农暴动的过程中，中央已明显指出士兵运动之重要，现在在好多地方虽然主观上未能切实执行中央这个指示，但客观上仍然爆发了不少兵士叛变的事实，特别是湘鄂赣更有一个很好的士兵运动的环境，广东则更在各军队发展了士兵的组织和党的支部，随时可以响应到工农暴动方面来。小资产阶级在各重要城

市中因为国民党的较旧军阀尤为厉害的苛捐杂税，而起了许多零碎反抗苛杂的斗争，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斗争推动起来，则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更容易受我们的影响。

现在特别说到湘鄂粤赣四个重要省份来。广东自广州暴动后，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没收土地建立工农民主独裁苏维埃政权的新的阶段。从广州暴动中我们更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教训，特别是认识了城市工人运动之重要；认识了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认识了工农武装和士兵工作之重要，在暴动中没有敌军士兵的叛变单靠红军的作战是很困难的。同时在广州暴动后广东更是有计划的作全省总暴动之布置，在东江、西江、南路、北江、琼崖造成几个中心区域的割据，加紧广州四郊的深入的工作，现在海陆丰我们在城市的占领虽已退出，但在乡村仍然是我们的势力，红军现在并无大的损失，各路的农暴以及大小斗争仍在继续不断的爆发起来，各重要城市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基础，广州的工作也已逐渐恢复起来，兵士工作亦有成绩，党的组织也比较有好的改造。湖北从秋收暴动一直到现在，乡村中杀豪绅地主占领城市等等激烈的暴动从未停止，而且在继续的发展着，武汉工人在秋暴时期中，以及在西征军到两湖时，曾起了几次大的政治经济的罢工，党在不断的斗争中也淘汰了一些不好的游移的分子，现在武汉三镇虽然高级指导机关因为内奸的关系而遭了严重的破获，但群众工作依然不难恢复起来。湖南在西征军时许多兵士同情于工农的暴动，在湘南醴陵、平江等处亦有不少的工农武装，此时在全省范围内本可造成一个很大的很深入的革命局面，湘南更有割据的可能，可惜当时省委遭了严重的破获，以致中央的指示亦未能达到前敌和下级党部，以致未能

充分运用此一大好机会而造成一个胜利的局面，但现在湘南、湘东、湘西仍有不断的群众斗争在发展，醴陵、平江更有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湖南的工作只要我们主观上有办法不难发展起来。湘西贺龙有枪近两千支，农民武装亦有百余支，多数县份农协已经公开，群众斗争日益激烈的起来。江西在万安失败后不但未消灭江西的局面而且更加发展起来，赣南赣东北都有许多斗争；自你们的军队占据永新、宁冈后，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万安亦已从新起来。这几省在全国范围内是处在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现在反动统治的所谓清乡因其内部的冲突并未能彻底的执行反而更增农民群众之愤怒和剧烈的反抗，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工农革命潮流是日益高涨而深入的。

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任务一点还未完成，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自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整个的国民党都成了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也失掉了在革命中的地位，此时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直接的来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但此一革命的性质虽是资产阶级民权的，然而他发展的趋势是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中央自八七会议以后直到现在，认定了这一革命的阶段决定了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这一策略因为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形不同以及交通上等等关系，全国革命的发展各异，故虽然这是全国一个根本的整个的策略，然而在各地的运用和工作布置上不能机械的一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应随各地工农斗争的情形，党的力量、统治阶级的强弱、士兵工作的好坏等等主客观条件来决定布置不同的工作方式，湘鄂粤赣四省现在是一个工农斗争最高形式，统治阶级经过了长期混战后自身非常薄弱，

豪绅资产阶级在乡村的势力也因为工农暴动的发展而打得粉碎，党也比其他省份更有力量，士兵工作亦有相当的基础且有相当的红军组织，因此中央认定在这几省有暴动夺取省政权的可能，广州暴动是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应根据广州暴动的教训来完成四省的总暴动。

在十个月以来全国的党部虽然都在那里作了不断的英勇的斗争，然而亦表现了不少的错误，主要的是：一、对于革命性质之误解，以为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了民权革命的阶段而是社会革命，在表面这种误解不关重要，而在实际上如果我们已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则我们会在革命进程中失掉许多群众特别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二、是玩弄暴动亦即是妄动主义，这完全是不顾主客观的暴动条件，而又不注意群众的工作，用种种方法去发动群众的高潮来创造一个暴动，而是凭一种小资产阶级情绪拼命的冒险的干一下；三、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就是依靠一部分军事势力或勾结一部分会匪以之为暴动的主力来攻城夺地，而不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造成以群众为暴动的主力，其结果，此所谓暴动必因军事的失败而失败，不以群众为主力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至少是一种变形的军事机会主义；四、是忽略了城市的工作专门去干农民的暴动，这样不仅不造成城市为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还要根本毁灭城市，以致在许多地方暴动的发展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意识一天一天地低落，而农民的意识一天一天地发展，许多地方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五、是不注意士兵工作或者只幻想敌人的动摇的军官而与之妥协，须知在工农暴动中没有广大士兵的倒戈是很难成功的；六、是在一县的各乡之间或一省内之某几县间，我们没有注意各县各乡互相工作的联系以及城乡的联系，以致有许多地方的暴动之起来，

多成为孤立的地位而易于为敌人各个的击破。为要暴动能够成功，并且暴动的胜利能够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则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如果暴动是被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所领导，如现在有许多地方只专门作一些烧杀的工作并且主张烧毁一切重要的城市，不去彻底执行没收土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不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苏维埃政权，而只挂一些上层的苏维埃的空招牌，或者不仅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甚至农民群众也未广大发动起来，而只靠一部分单纯军事力量的东征西讨，暴动是不会成功的，即使偶然的胜利也是暂时的，至于一省的暴动夺取政权必须是到阶级斗争的最高潮；城市的工人不仅到了一种普通的经济斗争而且是到了一种政治斗争的高潮，事实上成了暴动的领导者；在敌军中的士兵工作有相当的基础能在暴动中倒戈过来；工农武装也要有相当的准备，全省范围内的几个重要区域事实上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向全省暴动中心区作包围的发展；统治阶级在极端动摇崩溃的当中，一般的城市贫民已表现异常的恐慌和动摇；无产阶级的政党确实成了暴动的最高指导者。在这个时期才可以执行全省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动，如长沙、广州、武汉，一定是全省暴动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动的开始。

至于一县的暴动，也必须是先从城市的工人运动、士兵的工作以及四乡形成了事实的割据，城乡有了相当的联系然后才能暴动夺取县政权。

再则一省的总暴动或一县的总暴动不仅要根据一县的主客观条件来决定，而且还要根据邻省邻县的革命条件来决定，因此我们对于暴动的布置，常常不是一省或一县单独的孤立的布置。

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布置上，广东自然可以单独成一中心，而在湘鄂赣三省中，则湖南成为暴动布置的中心，因为他与广东连接，党的基础和士兵工作的客观条件都比赣鄂好一点，尤其是在最近几月来，三省暴动发展的形势是湘粤的大道赣西南湘东北，如此，在湖南境内的湘粤大道以及粤汉株萍沿线、湘赣边界已经成为三省暴动发展的枢纽，更加证明湖南应为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

你们的队伍几月来都是在三省枢纽内履进履退，现在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的暴动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可是你们几月来因为与中央断绝了关系并有许多客观上的困难，你们在工作中不免有许多的错误和缺点：第一[2]，你们几月来所到的地方未能尽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在你们所经过的地方，土地没有没收、没有分配，苏维埃的政权亦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群众选举的基础，因为你们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所以你们的军队一旦退走，革命的胜利亦多半随之而失败，尤其是在湘南的时候，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在你们军队的本身上说，现在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你们，但我们必须了解这种缺点和错误是很危险很严重的，因此中央特向你们郑重的指出，同时对你们今后的任务和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一、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以你们现在的环境在赣西、湘东的边界，就是现在你们占领的永新、宁冈及

湘东一带，如果地理上比较利于你们的进攻和退守，在这一带本来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你们便可割据这一个区域。中央前此依江西省委的提议，主张你们向赣南发展占领赣南夺取吉安为屏障，这一计划如果在事实上有胜利的把握，那当然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响，而且可以与广东的北江联系，但如无胜利的把握而且在地理上如果不及赣西湘赣边界之可进可守，那么，你们仍然是以选择你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为根据地为适宜。

你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占据了永宁遂三县，你们便须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改造整理你们的军队，同时向四周发展，特别注意于群众斗争已经起来的地方联系起来。如果不注意当地的深入则革命的基础是永远不会建立的，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扩张你们也必归于孤立的失败。这是你们工作的总方针。

二、怎样深入？就是要彻底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现在你们所占领的县城，就应由高级的政权机关或临时指挥暴动的[3]颁布没收土地的法令作广大的宣传。在政权方面，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政权，苏维埃是群众直接的政权，因此必须经过群众或群众代表的选举，禁止党部或军队委派苏维埃，党对苏维埃的关系必须经过党团作用，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无论哪一级的苏维埃一经成立，必须事实上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群众了解苏维埃是他们的政权而绝对的拥护。当几个县的苏维埃从下至上的建立了的时候，可以召集各县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当然是以已经割据的县份为中心，但附近的县份群众已经暴动起来的乡村和城市工作有基础的地方，皆可派代表参加），成立割据区域的最高苏维埃。

三、怎样扩大？这里所谓扩大不是要你们调动单纯的军队

以机关枪和大炮向外扩大，而是要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的暴动。主要的路线是：赣西要向萍乡、安源、醴陵、茶、攸发展，把这些地方与你们所占领的地方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个的割据区域。赣南各县特别是吉安、赣州、兴国、南康、信丰、雩都等县已经有群众斗争起来，你们必须派出许多游击队伍，以很大的力量帮助那一区域的群众的暴动而与你们形成犄角之势，再则向赣西北必须派遣游击队帮助修水、铜鼓发动群众的斗争，同时向东帮助万载、宜春、安福、分宜、新喻以至樟树镇群众斗争的发动，特别对于萍乡、安源、赣州、吉安、樟树镇的城市工人以及沿赣江的船夫码头工人须帮助他们发展组织及斗争。你们必须以很大的力量依上面的路线发动四围广大的群众斗争和农民暴动，才可以保障你们割据局面的胜利。

红军的调动须避免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敌军作最后决胜负的战争，因此我们的作战必须与广大的群众在一块，对于力量薄弱的敌军当然应当以我们的主力迅速地解决他，但对于大队的比较有优势的敌军，我们必须有广大的群众与红军在一块，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四方八面包围抄袭，切忌以单纯的军队与敌军鏖战。

据报载六军部队有被逼退到赣西以图与蒋介石勾结的消息，如果程[4]部与朱[5]部会合来围攻我们，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你们更要注意赣南的发展以牵制敌人，同时在必要时还可以打通赣南而占领之以为退步。因为在四面来攻时，如果死守宁永一带或退到湘东南都是很危险的。至于程部我们已派人去工作，要他们与省委发生关系。

四、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组织上现在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在

成分上亦不能说很健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为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军队的，而且在军饷上如果是雇佣军队将来扩大是很难维持的。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使兵士和长官都得分配土地，在服务时由苏维埃替他耕种；在成分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分，减少流氓的成分；在编制上应行太平天国式的编制；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这个时期，因为你们转战千里，七八月来未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个机会做改造和整顿的工作是有必要的。

除正式的红军之外，必须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使男女老少都能担任赤卫的工作，利用一切的民间武器武装群众，惟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保卫乡村的政权，群众的军事化是暴动胜利的保障，望你们特别注意。

红军由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赤卫队由县苏维埃赤卫委员会指挥。

五、几个策略的问题：第一，我们势力所到的地方当然要彻底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但以佃农及自耕农之比较的多少，我们的步骤也有不同，在佃农雇农占多数的地方以群众的需要我们可以不顾忌的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亦实行重新分配，但是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如万安自耕农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乃至百分之七八十，我们不宜于一开始便重新分配自耕农的土地。在苏维埃的政权必须容纳自耕农参加，但实际仍须做到以工人贫农为中心的政权。第二，在乡村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的时候亦应开始组织“雇农工会”，并且由县苏维埃颁布雇农保护法。第三，增加农民暴动及区乡苏维埃的工人意识的领导，现在应在各县乡间以市镇为中心组织工会，团结乡村的手工业工人，这样的

工会应派多量代表参加区苏维埃的选举，同时区乡苏维埃须尽量的有急进的工人分子当选。第四，在你们现在的区域自耕农数量比较多的地方，为防止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影响的发展，应在一切斗争中间充分增进工人的领导力量。第五，对暴动还未起来的地方，我们在宣传上还不宜提出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单独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祠堂庙宇公地的土地。第六，对于尚未占领的城市，我们应当提出每个城市的政纲向群众宣传，这个政纲当然以解放工人为主体，但必须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在过去烧毁城市的不好影响之下，这样政纲的提出是更有实际的意义的。第七，在我们占领的区域，在某种限制之下，必须保护小商人的贸易，以维持城市与乡村及各区各县之间的经济的和必须品的流通。第八，对于外县暴动的布置必须注意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及这乡与他乡的联系，使暴动的发展不致因孤立而失败，又暴动尚未起来的乡村须发展农协的组织，使暴动的组织能够有组织的进行。

六、对于你们所占据的县份和已发生关系的县份，你们应决定单独的工运工作计划和专门的经费，派出有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去工作，同时你们须有专门指导职工运动的机关，你们一定要坚决的信赖职工运动在革命中的意义和重要努力去工作。

七、关于党的组织问题，除中央最近的组织通告送给你们外，此处还须特别给你们指明几点：第一，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分之增加，对于富裕的农民非真为阶级觉悟的不可吸收以保障党之无产阶级化。第二，彻底的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这种参加不是形式的而要指

导他们实际的负指导工作之责任。第三，对于城市的支部特别要注意于质量的健全，做到每个同志都能积极的担负党的工作，对于乡村要注意干部的训练，要使每一个支部都能训练出十至二十个干部成为党及群众的中心。第四，在占领的县份要多开各级党部的代表会议，讨论党的策略，选举党的指导机关。第五，无论在城市或乡村要注意党的秘密，各级党部也要有担任秘密工作的同志，即使暴动的胜利遭受暂时的挫折，党的秘密组织和指导机关仍不至以此而受影响。第六，在你们占领的区域要经常的开办党的训练班训练干部。第七，随你们逃跑的各地党的干部分子应适当的分配他们的工作，可以回到原地方工作的仍须派遣他们回原地工作，特别是由湘南来的须将名单开给湖南省委，他们即使不能回到原地去，在湖南现在需人的时候也可派到旁的地方工作。第八，安源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许多工人同志要有很多斗争的经验和党的训练，你们应与湖南省委商量调一部分活动分子到各军中担任政治及党的工作。

八、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为书记，军委及工委的名单由前委决定。对于前委，如你们觉有增加某同志的必要，可以提出名单交来中央批准。

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

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下略）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发奎、李济深。
〔2〕原文如此。
〔3〕原文此处缺字。
〔4〕指程潜。
〔5〕指朱培德。

PDG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

——济难会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土地革命的高潮，天天加紧，各地暴动的行动，日益剧烈，就是大小的经济斗争，也不断的起来，这个一定使反革命派的统治阶级由发抖而转移用全力镇压，严厉的施行白色恐怖，拼着命希望消灭此种力量来巩固和维持它的政权。

所以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在各地不断的施行历史以来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此过程中，工农阶级的被杀、受伤、被捕……盈千累万，尤其是在暴动起来被反革命派击败和受暂时挫折的地方特别厉害，将工农阶级枪毙和斩首不算是一件事情。虽然工农阶级的牺牲和家属的流离，或未有牺牲而失业、失耕、被捕、受伤的群众，实在不少，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丧失其勇气和决心，反之更迫他们再走到暴动的道路。

固然本党应继续领导他们斗争，但同时我们对于受伤被捕的战士及牺牲的家属，不能置诸度外，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和救济，使他们更能继续与增高勇气和决心起来奋斗。

所以赤色济难会，在此时期，它的任务，它的工作，何等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

重大，同时它不但在物质上的消极救济，而要将敌人的残忍手段和屠杀的事实及牺牲的战士的勇敢情形，积极的对国内工农阶级和国外的无产阶级作广大的普遍宣传，而暴露敌人的面目，和鼓动工农阶级的革命热情。中央过去对于这种工作与任务曾经发过数次的通告，但是过去各级党部有意和无意中而忽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虽然在秘密时期中济难会的工作比较困难，同时还采用旧的组织方法，而没有变更，固然组织不能发展，这都是过去工作的缺点。

现在济难会的组织与发展，当不能与公开时期一样的方法与手续，应要在每个工厂、工会、作坊、农村、学校……等的地方与团体，鼓动他们组织甚么共济会、互助会、救济会……等小的组织，由他们自己选出人负责管理及收费等一切事情，但要他们加入济难会的组织单位和接受济难会的指导，但是他们所收的会费不必要缴给济难会，只要他自己保存，如有斗争会员被捕、受伤等发生便可拿出来救济，如必要时该地的济难会须要尽可能的援助一切，这样的组织，一方面可使加入的分子不会只看见白缴会费而看不见甚么作用与济难会的灰心，另一方面可使不同以前只挂名加入会不能收会费的空洞组织，别方面在秘密时期减省许多麻烦手续如收会费手续，同时可不使大部分同志的工作力量去办理，而使群众自己办理。

各地济难会的组织，必须根据以上的原则去建立和发展它的组织，才能达到救济工作得着普遍。

所以目前济难会的任务必须做到：

第一，救济能够普遍，不使如过去一样甚至连同志也得不着救济的工作缺点。

第二，应有经常的宣传工作，某地如发生白色恐怖，不论他是否已有组织，当要尽量的去救济和调查经过情形报告济难

总会，一方面向各地已有组织或未有组织的地方尽量宣传与煽动，可提高济难会在群众的信仰与同情，和发展他的组织。可惜过去各级党部没有这种工作，同时更有很多的错误。现在根据济难总会党团的报告及中央观察所得的情形，各地对于济难会有以下的倾向：

1. 认济难会为一个单独救济机关，能对被难同志或非同志发给一点救济费便算尽了它的任务，其至主张取消其组织，由党内设一个救济部而代之，因此原就有将救济费拿来充作党费用去的事实，前者全不了解济难会组织的意义，后者便将济难会的工作和任务缩少，甚至简直毫无。

2. 以为现在秘密工会农会还不能广大组织起来，甚至未有，济难会更没有组织之必要与可能；或说有些工农群众头脑过于简单，以为加入了济难会就是加入了工会的组织，所以会费只能缴纳一个，或嫌麻烦或简直不愿缴纳二个团体会费，因此觉得济难会在群众中发展组织有妨碍和影响秘密工会农会的发展，遂有主张停止它的工作，全是因噎废食的思想。

3. 党与济难会在工作上的纠纷，各级党部对于负济难会工作的同志任意调用，或由党方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去兼任，使济难会工作结果等于零，只有向济难总会拿救济费和特别费，工作的情形没有半点报告，甚至钱的用途如何亦没有预算交来。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工作，可见各地党部对于济难会的工作缺点，因此使救济工作不普遍，使斗争的战士被捕或受伤失业及其家属流离者得不着相当的救济，致使有些同志受了很大反感，种种缺点使济难会的工作前途受了莫大的打击。

中央根据以上的事实特郑重通告各级党部即速执行以下的工作：

1. 各省如有领救济费的，省委应决定一人专负责任这种

工作，及与济难总会直接发生关系。

2. 济难费由五月份起完全独立，不能拿来充作党费用。

3. 每月至少将工作情形及预算向济难总会报告一次。

4. 在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省份须派负责济难会的同志来沪，才能领取五月份以后经费（湖北、直隶、河南等省已由济总派出负责人，故不赘）。此外，如山西、陕西、福建、四川、云南、安徽、山东等省，因经费不多，工作较少，不必派人与济总接洽，只须由各当地党部指定一人负责，报告济总便可。

5. 以后负责济难会工作的同志，要调往其他工作必须得济难会同意。

以上各项希望努力执行。

中　央

六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

湘赣省委转中央：

一、此间争斗已到很剧烈很阔大的时候了。敌人以十团之众（杨如轩四团、吴尚六团）向我们进攻，地主的挨户团当然在外。茶、酃两县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压下。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茶陵的好些勇敢做事的同志被杀，酃县县委负责人被害。第八军最近与我作战四次，一败三胜，但敌人顽强抵抗，已占领之茶、攸只得完全退出，湘南已无寸土。最近有一次军事胜利[1]，五月杨如轩七十九团及二十七团一营，工兵，大炮队，机关枪连，师部，卫生队，输送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虏获颇多，杨已逃吉安（一说负伤），刘团长（二十七团）死，夺获迫击炮七尊，山炮二尊，光洋二十余担，但敌精锐两团仍是在附近永新县城一带，不敢穷追。此间军事布置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但目前数日按兵未动，俟查明敌情再行决定。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才把他们勉强的制止。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 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

* 这是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连续“进剿”期间，写给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的一部分。

难攻。B. 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 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

二、吉安来信，始知江西省委已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陵、攸县、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2]，议决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选举负责人（工农分子占多数）。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1. 普遍发展六县之党。2. 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 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 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5. 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三日一次。取报纸在高陇牺牲营长一、连长二、兵士五十人以上，最后因朱德会攻才获着胜利。6. 四军军委书记今日开始负担。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次“进剿”期间的草市坳战斗和重新攻占永新县城的战斗。

〔2〕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关于在莫斯科训练中国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的信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

关于在莫训练中国干部的问题，中共中央有下列的意见：

（一）列宁学校中国部必须进行一度的改造。中共中央认为列宁学校中国部应执行训练中国党较高的干部的任务，因此范围不需要照目前这样扩大教员，学生和课程亦须改变，适应这个要求，在教职员方面，我们认为董亦湘同志绝不能再当中国部主任，俞秀松、周大明两同志亦不能再充教员和党的指导员，原因是董同志留莫虽久，但他的能力和政治发展都远不够担任这种任务，而且几年来他的工作经过，已经充分地证明他即作一个教员也没有好的成绩，至俞周两同志，理论和实际工作的经验，也是很幼稚的。中国党在坚苦的革命工作中，深刻的感觉到干部对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薄弱，因此增加中国党走向布尔塞维克化的困难。为迅速地克服这一困难，只有请求国际和联共中央选派理论经验充实的老布尔塞维克（最好是地下党时代的老同志）教育中国后近的青年干部。上述三位同志自然不能执行这个使命，中共中央认为应马上将他们派回中国，担任实际工作。在目前转变的时期中，我们十二分的需

要干部，万不要再留这些同志，致使两无所得，徒费光阴。在课程方面：我们认为须加深理论的研究和专门工作的实习（如宣传、组织、职运和苏维埃等……）最好能在派回以前，使同志们有半年以上的实习，真正参加工作，使他们在原则以外，能学得许多实际办法。在学生方面，我们以后将派遣党籍较久，工作经验较多的同志，数目最多不超过三十人以上。

（二）我们认为仅训练这样少数的较高干部还远不足以应实际的需要，因此中共中央认为除在国内，特别是在苏区内，自己要尽量加紧训练外，还要请求国际和联共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完全同意国际取消中大[1]的办法，但是我们认为仅以列宁学校中国部来代替中大是不够的，而且实际上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列宁学校的学生主要的是欧莫同志，一般的设备和课程自多偏于一般的性质，无法注重于中国化的问题。这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志，还无大妨害，但对于教育程度低落，甚至于不识字的同志就极感困难了。同时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学生，最多不能超过七十人，这个数目本已不少，可是最近革命的发展，实在还感觉此种数目不足以应付客观的需要，因此我们提议东方大学仍须设立中国部。过去东大的教训我们认为只是学生成分与办理不善的问题，绝不是东大不可以设立中国部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东大设立较大的中国部比较过去中大和列宁学校都有他的优点。首先在性质上说东大专门注重的是东方问题（中国问题亦是他们主要对象之一），所收的学生都是东方弱小民族，这些革命战士特别是环绕中国的蒙古、新疆、高丽等民族对于中国问题均有极大之兴趣，在办理和课程上都经常注意东方化和中国问题的研究，最近听说该校所设东方问题研究社和东方学院（中国问题研究院亦在内）亦有集中改组的消息。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对东方大学抱有很大的希望，以为

此等教育机关，在责任上应给中国党以直接的帮助，同时在学生数量和程度上说，我们认为如在东方大学设立东方部，程度一定比较其他任何学校都能更适合中国党新近的工农干部的要求，数目我们认为亦可扩大至一〇〇或一五〇人不等。学习的时间可以较短一点，这样与列宁学校中国部有相互的分工，不但对于中国党有绝大的帮助，即在办理和实行上亦减少许多困难，更能取到实际的效果。

以上两个提议经我们再三考虑认为是很切实的，务望国际和联共中央加以特别注意，以便迅速促其实现。是所至盼。

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PDG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瞿　秋　白

我今天是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第六次大会致开会词。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革命在我们党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中间，转变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自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工农的刽子手蒋介石，公开宣布叛变革命以后，先后在沪、粤进行大屠杀，使革命遭受重大的部分的失败。嗣后武汉政府的叛变，革命的队伍由南昌暴动而到广州的暴动，更牺牲了很广大的革命战士，这算是第二次失败了。其次则由广州暴动的失败而转到一个更为严重的状态里，一切反革命力量，无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都是一致的行动，来压迫我们，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这算是第三次失败时期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团结于自己的周围，与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的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是含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当前中国的革命，进展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中，阶级的冲突，益加显明，因此，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不能不先后叛变革命而变为反革命。国民党更为一切反革命的中心和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在这种大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曾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与敌人奋斗，而

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可惜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党的中央不但不能领导群众加紧这种英勇的斗争，解决当时的重大任务，并且自己陷入了机会主义的前途，使革命受莫大的打击。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中国革命失败原因，并不像顾孟余、陈公博、邓演达等所说的跳过了时代的要求，而是中共中央走了机会主义的道路。好在我们在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和中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情绪高涨中举行了“八七”会议，得在组织上极力纠正机会主义的根基，在工作上开始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现在到了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到了完全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使本党走上很健全的地步了。

目前敌人虽然还是很强的向我们压迫，可是我们却能从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上、工农密切的关系上、国际正确的指导上，坚决的英勇的与敌人作继续不断的斗争，而期达到完成中国革命，进而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们党不但能够是中国革命的担负者，而且要是一个国际革命的担负者。所以这次大会的意义，不仅关于中国革命是很重大的，关于世界革命也是很重大的。因此，希望大会全体同志都能充分的发表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党，而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倾向。

此外，还有一点要重复说明的，就是中央在前天会议上，提议向大会要求追认“八七”会议，及在“八七”会议所接受国际的指正案。尤切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固然“八七”以后，已逐渐将机会主义肃清了，但事实上政策上一切主要问题上，尚有许多不正确的倾向，如盲动主义、先锋主义之类。这些也是妨碍党的工作的进行的。因此，大会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一切变

形的机会主义，使党完全布尔塞维克化。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觉悟者，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定能够将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只有如此才能在国际的指导下完成中国革命，进而完成世界革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瞿秋白选集》刊印。

PDG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瞿　秋　白

诸位同志：

我今天报告关属问题很多，时间较长，但我已写成一本书面报告，因此今天讲的是报告中未展开的意思，未尽说的意思，书面报告中已说过的，不详细说。我的报告分五段来说：1. 中国革命问题，说到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阶段和革命失败的原因；2. 过去教训，说到党的机会主义；3. 现在阶段，说到盲动主义的危险；4. 革命形势；5. 党的任务。

Ⅰ. 中国革命问题

1. 革 命 性 质

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我在书面报告写过，同时各同志来这里已看到许多国际方面和联共方面同志关于这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要比较详细的说明中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革命。昨天布哈林同志说中国党对中国革命有二个意见：（1）以为中国革命既然是反帝国主义的，那一定是世界革命的

一部分；（2）中国革命的本性就带有转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向，因世界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这两个意见都是对的，现在要更进步说不但这二个意见都是对的，且可应合为一个意见，那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这是什么意义呢？第一，中国革命是使资产阶级的中国（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这意义上，中国革命很明显的不但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那么我们应可即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亦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像布哈林同志所说是帮助欧美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将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推翻！这个意义是什么，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在世界革命开始的时代。中国的革命不是欧战前各种民族革命一样，不像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时，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如意大利的统一、德国的统一；这样的民族革命运动在世界民权革命时代，民权革命是世界民权革命的一部分。到现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开始，不论哪个民族革命，蒙古也好，印度也好，高丽也好，在本国是资产阶级民权性质，同时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两方面的意义都是反帝国主义的。中国反帝国主义革命本身在初期发展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另一方面，既帮助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那必然的生长而成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第一，现在中国革命大家知道，社会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虽然在第五次党大会以前，大家都不愿承认，好像这是共产党的左倾说法。现在不成问题了，不但同志，即每个工人都承认现在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但有些同志把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相对立，有反

帝国主义不要土地革命，有土地革命不要反帝国主义。这样说法是不对的。土地革命现在非常清楚。事实上中国革命经过几个阶段与过程。反对帝国主义即要反对军阀、地主、豪绅，因帝国主义是以地主、豪绅为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真正彻底的反帝国主义，非"五卅"、"省港"所能做到，亦非现在反日抵制日货，经济绝交所能做到。在五四的抵抗日货运动，一点没有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真正要动摇帝国主义的基础，只有把军阀、地主、豪绅根本铲除。他们帮助帝国主义刮削农民膏血，如果旧势力不去，帝国主义统治永远不能推翻。土地革命的意义到底是民权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布哈林同志很通俗的说过，土地革命实行到很普遍彻底，到分配土地，国有土地，本身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表面上土地革命到分配土地是很激烈的。土地分配后每个农民都企望着他个人生产扩大，这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这就是所谓最理想的资本主义，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农民本身是小生产者，她是立足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土地革命本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别的阶级能指导农民的土地革命，除无产阶级外，找不到其他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是力量薄弱，并且中国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譬如中国同志平常认识的朋友，与他们每天是在一道的，许多自己是地主，自己又是资本家。这种原因是很复杂的，姑不细说。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反对封建的力量，中国没有激进的资产阶级。中国最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要算是孙中山，但是孙中山的土地政纲，是全世界所有的土地政纲中最右、最坏蛋、最空洞的政纲。他所采用的办法是叫地主自己定土地价格报告政府，政府按价格收税，如果估定价格太低，政府得随便收买；估定价格太高，政府收税亦重，地主必

然估定相当地价。孙中山以为这是天下为公的办法，不知道孙中山是否于一万、二万年之后给农民土地。此外，“耕者有其田”，并非孙中山想出，是某一共产党员，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向他建议的，今天不详细说。总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彻底的中国革命，必须一定要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领导三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反对地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日渐扩大的运动，将来要从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要求，发展“极可怕的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剥削基础的革命，确定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趋势。但是列宁说，革命动力能影响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转变而向社会主义革命，亦与中国的及世界的革命动力有密切关系。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简单地说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社会内容主要的，在现在阶段，是土地革命，有确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

2. 革 命 阶 段

现在讲中国革命的阶段。中国革命的阶段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看来非常清楚，这是无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的过程。今天不详细说这个问题，因在书面报告已有说到。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阶段，可以说五四运动开始前的准备，如新文化运动、文字改良（白话）、自由恋爱新思想的各派、反日运动等，到五卅运动便将以前积聚团结的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而奋发起来。经过五卅到广东政府北伐，大致说，第一个阶段明显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在这个时候对中国无产阶级有没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呢？的确有的！有三个条件在当时存在着：第一个条件是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参加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第

二个条件是民族资产阶级如它的代表者不但不能反对工农独立的宣传与组织，且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第二个条件的内容，是组织工农群众之可能。所以加入国民党是对的。我们在国民党的地位有没有可能自由发展工农运动呢？有的。但是我们自己让步，自己限制自由，亦是有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后，上海执行部，北京执行部，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时时和我们一道反对南方和北方军阀。虽然两者反对的观点不同，他们与当时的右派不同。当时的右派不但防范共产党，且反对共产党。第三个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有完全独立性，批评性，这条与第二条有关系的。在客观上工农运动有发展可能，国民党亦不能不受我们批评。我们是可以保持阶级的独立性的。当时张国焘在《向导》报上第一次骂国民党为革命否认论者，因国民党人反对北京政府是用否认北京政府在法律上的存在的态度。我在《新青年》季刊二期有一篇骂国民党的文章，当时胡汉民答辩虽然暗暗驳我，但大致不能不代我与当时的右派辩。随后的问题便是“卖国”。老实不客气说，对国民党可以公开说，C. P. 加入国民党是要有完全独立性，批评性，与党团作用的存在。在客观与主观上说，在当时的确加入国民党是为争领导权的。此外，第四个条件，要特别注意革命组织的策略问题。或者有的要这样问说：“与民族资产阶级取联合战线，可否不加入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取党外合作呢?”我们可说事实上国民党比英国劳动党的组织更坏，更散漫。实质上国民党没有什么组织，爱加入就加入。任何人说自己是国民党员，也没有什么，在客观上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党。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没有坚固的完全的自己政党组织，国民党是可以变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的，可以变为特殊的政党组织，无论职工会可整个加入，农会可整个加入，其他民众的团体亦

可整个的加入，我们在国民党起党团作用。在这四个条件之下，可以造成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在第一个阶段中，掀起中国大革命浪潮，从五卅、省港罢工、广东政府北伐，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收回英租界，广大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国民党下层党部的发展、左倾，共产党的影响增加，群众的力量，工人和左倾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在发展状态中向前进展着。在别一方面，五卅运动一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即表现背叛革命，怕惧革命的发展。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条件，上海总商会却减低条件，主张让步，停止罢工，退出反帝国主义战线。在第一阶段中，就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取联合战线的阶段，一开始即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它回头来反对我们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中国革命开始的发展是便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之表现。如果我们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各种力量，群众在我们方面，群众力量在我们方面，即蒋介石叛变也与现在不同了。

第二个阶段是蒋介石公开的叛变时期。一九二七年北伐开始，当时确有广大的群众参加，使北伐于最短的期间，得到很大的胜利。于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跑到南昌，要以统一军权的口号，来抢夺这一切的胜利都归自己，要国民政府建都南昌。其时，湖南、湖北，尤其武汉方面形成了很伟大的反蒋斗争。这种运动的组合，包含有很广大的成千成万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这种斗争是在所谓国民党的党权口号下发展的，同时是一个民权的很热烈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一个领袖，就是我们的党。由这时期到武汉政府还未叛变时期，是一个革命最高涨、最深入的时期，最主要、最明显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与武汉的工人运动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高涨阶段；农民的组织与总工会及所谓党部形成了第二政府，形成了工农、

小资产阶级很坚固的联盟，去反对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及最大敌人帝国主义。这阶段的争斗，是能够保证胜利的，虽然是一方面反封建地主、豪绅，一方面反民族资产阶级，使阶级联盟的变换，在革命方面减少了一个阶级，只剩下三个阶级；反革命添了一个阶级，添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由四个阶级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战线，变成三个阶级联合战线，但那时的工农的发展特别高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也特别浓厚，都可以保证这种斗争要得到胜利的。但是后来斗争结果到底是谁胜利呢？但是帝国主义力量是反革命的最高组织者，他们的力量还比革命大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武汉政府不久就叛变革命了，它投降到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了。从此革命也就转入第三阶段了。本来第二个阶段的斗争，完全是争领导权的争斗。这个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是失败了。她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是中央放弃了领导权争斗。这样放弃的结果，很明显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甚至农民也离开我们。很奇怪的，农民并不是为了我们太过火，为了我们跳过时代，而正是为了我们太温和，太落后，为了我们不但不能领导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而且直接、间接帮助了压迫他们的国民党。我想关于这一点的许多事实，每一个代表，无论从湖南、广东和各地来的，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实。这是证实什么，这是证实斗争由中央的机会主义所断送了。可是这当然是暂时的失败，而且革命依然要继续进展的，因为资产阶级并不能解决革命的任务。像帝国主义的压迫，例如不平等的条约、租界以及关税和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等，都是资产阶级所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汉口的英租界已由无产阶级从帝国主义手里拿还了，也要失掉的。那末，资产阶级又怎样能够解

决什么中国革命的任务呢？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暂时失败的时期。为了以上所说的缘故，一切革命的任务都没有解决，所以依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我们的争斗形式却完全改变了，从前革命的队伍和阶级组合至此已完全改变。也就是说，从前旧的形式，完全不能中用；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也完全要毁掉了。我们已进到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苏维埃的革命。因为我们说这个阶段的革命性质，虽与第二阶段没有大的区别，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革命的争斗形式，则完全变动到一个新的斗争形式，就是苏维埃革命之争斗的形式。

以上是说明革命的几个阶段的转变意义。

3. 中国革命之失败

现在要说到失败的原因了。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客观的。武汉失败的原因除了主观的党的机会主义外，还有客观的原因吗？如果党没有机会主义是不是保证可以不致失败呢？我想答复第一个问题是说有的，答复第二个问题是说不可能的。要解释这种答复的理由，我们不能不说到客观的失败原因了。俄国党的反对派说，国际给了中国党一些不正确的指导，结果中国革命失败了，所以中国革命的失败，第三国际应当负责任的。他们的意思，如果国际方面仍是季诺维埃夫、托洛斯基等，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他们的路线去指导中国革命，是不会失败的。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在此地当然不能很详细去辩证反对派的观点，但我们一定可以找出许多客观失败的原因，来说明当时革命的一些困难条件。昨天布哈林同志曾说过，俄国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指导，然而终于失败了。这就是说，当时革命的失败，一定有许多客观的原

因。武汉失败的原因——客观的，第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加强，这一点，在武汉是如此，在广州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虽然有十四国联军来攻打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但那时正是大战的时候，或大战初终，许多国家都由大战产生了很多的危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〇年都没有能力来完全破坏俄国的革命。就是到一九一八和一九二三年，虽然是各国派兵来包围苏联，可是西欧的工人运动因为世界大战后的影响，非常高涨，甚至最不觉悟的英国工人也起来反对本国出兵干涉俄国革命。但是中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恰恰是所谓国际资本主义当着稳定的时期。中国一九二五年开始了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也曾扩大了东方的民族革命范围，像摩洛哥、印度、菲列宾、叙利亚等先后起来，发生很伟大的革命，都是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发展的，但终被帝国主义镇压下去了。到了武汉时候，日、英帝国主义更能够很从容的派许多兵舰来。他们时时准备着以机关枪、大炮向中国的革命民众扫射，企图压迫革命，而且他们压迫革命的方法不仅限于大炮、兵舰的政策，他们还有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威胁中国的资产阶级由革命的营垒转变为他们的新工具。他们对资产阶级说，如果你们反工农，反共产，那么，我们可以同意你们打倒张作霖、孙传芳。自然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在它的阶级背影上始终要背叛革命的，但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条件下，益发促短其叛变过程了。所以我们在当时，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张作霖、蒋介石或者汪精卫，而是狰狞无比的帝国主义。第二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保持了封建基础，他们利用以保持封建基础的工具的士兵没有参加土地革命。中国的地主、豪绅本身也可以说是“参加了”革命的，不过他们的“参加革命”，总是写在括弧以内。他们是有地域冲突的，他们分作什么广西派、

广东派、湖南派，甚至广西派也要分桂林派、梧州派，……湖南派也要分醴陵派、湘乡派……以及许许多多的派别。中国本来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不统一的国家。这些各种地域的派别，也就是这种国家的社会内容。我们常常看到中国的币制、交通，都是各地各地的不同。这些如果是在西欧的国家，就完全是两样。我们常常看到广东、上海或者武汉、长沙以及北方各地的钱，小洋、大洋、铜元都跟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也就按着地域的不同而割治，甚至于垄断各地的小市场。我们看到上海的小菜场，卖菜的有的卖三个钱，有的卖五个钱，我们买菜也可以听便选便宜的买就是了。但是广东或是其他地方乡村的大交易，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有什么“大先生”、“二先生”，也就是所谓“买办”。帝国主义者要收买原料，就完全由他们经理。他们的收买原料，完全不像上海的小菜场了，他们常常以垄断的手段，来收买一切原料，所有由农村生产原料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谁能逃脱他们这种利害的剥削。地主对农民却更利害极了。举一个例子：前年在江苏有一个农民向地主借了一担谷。前年是饥荒年成，谷子是十六块钱一担。去年收成很好，谷子是比较便宜多了（四元）。你们想想这地主是怎样向农民索取呢？他说现在的谷子是四块钱一担了，——农民，借我的是十六块钱的，应当还我四担谷子。这一个小小例子，就证明到中国农村中剥削压迫的利害。假使在前清的时候，自然地主是有的，但那时他们是服从官僚、贵族管辖的，因为那时中国是一个所谓亚洲式的统一国家。自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以后，使中国产生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投机到北京做了总统。袁氏本是代表北洋军阀——北方的大地主阶级，当然袁世凯的背后，是有帝国主义做后台老板的。可是南方的陆荣廷，也同样有自己的后台老

板。他为自己的利益，要反对袁氏，都挂起护法招牌，打出什么革命的旗子。我们说地主、豪绅参加革命，就是这样投机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的“参加革命”要写在括弧以内的意思。大战时，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商业化更为明显，所以当时各省区益发形成一种更混乱的局面。各地的督军代表各地的地主、豪绅，分割各省地盘。各省的土地完全成了军阀的私产，千万、百万的税捐，任他怎样抽刮，可说农民的生产都是供给军阀的了。他们还常常借着很大的帽子来作反对其他军阀的工具，借此来做自己割据的理由。其实他们是革命吗？一点革命的意义也没有，他们所有的不过是层层的压迫人民罢了。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大帽子常常给这些军阀所利用，在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等，拿到孙中山的招牌来压迫工农，这是很显明的例子。那时候，代表地主、豪绅的军阀在孙中山革命旗帜下就有杨、刘的反工农，那末到了武汉土地革命时代，他们——地主、豪绅要反革命是毫无疑义了。所以马日事变的爆发，当然是酝酿很久的。他们的利益不仅是与土地革命相冲突的，就是一点很小的事件，如剪发问题、放足问题，都是他们看不惯的。但是他们的工具，军队中的士兵，并不是与土地革命有冲突的，他们没有参加这种革命，实在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自然这是很大困难复杂原因的。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杂志曾说过中国革命是进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了，一方面要保障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之军队，一方面又要变更阶级的组合。事实本来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要北伐，要北伐就不能破坏军队；一面又要夺取士兵来反对直接利用而压迫他们的军官，因此这中间是发生最大的困难了。第三点是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了。我们首先举个例子说：长沙酱业工人要求增加十六倍工资，我们的外国同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要求加

大的例子。其实虽然加上十六倍，也没有多少钱（只有十五元），而且当时生活程度非常的高。另一方面酱业主是一方面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锁的，另一方又要增加这样大的负担，当然是要闭门歇业的。因此这问题在实际上是不容易答复的。中国革命当时本来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时本来可以将大生产没收，设合作社，来调剂失业的劳动者。列宁在二月革命时提议没收糖业新提加[1]，这并不是社会革命，农民也是赞成的，虽然是与私有制有冲突的，但是对农民是有利益的。我们在汉阳没收六个工厂，在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是不是要反对的呢？在理论上当然不会反对的，但是他们必然要动摇。我们指导机关又跟着动摇。再，这一问题与兵士问题是有关联的。我那时初到武汉，常常听了许多同志说过唐生智的兵士，骂农民协会是混蛋，说共产党在后方捣乱，他们当然是受了反动宣传的。但我们如果做士兵运动，自然我们不仅是对他说空话，而且要给他以物质的利益。关于湖南的兵士，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以土地；至于外省的兵士，尚不能说到给他们以土地的话，因为其他各省尚未进到土地革命，离得很远。此外还有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当时还需要打仗；要打仗就一定需要兵；要兵就要饭吃。这样一来就不能不影响于小资产阶级了。当时我们本应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资产阶级的财产、企业来解决这些兵士的生活问题，但这又被唐生智、汪精卫所反对、阻止了。以上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没有方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成了失败的三种原因。这种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看作过去的问题，在将来革命的前途上也一定要发生的。譬如帝国主义的威胁是会有的，假如在广东暴动起来，就马上与香港冲突了。第二、第三个问题也是必然发生的问题。从前在海陆丰时，敌人都跑了，商业也停歇了，各方的武装敌人都包围起

来了，于是经济起了大的恐慌，生活必需品都缺乏，工人都失业，小资产阶级及兵士问题，都成了不易解决的困难问题了。第四是无产阶级的本身薄弱，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非常大。在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要比俄国一九〇七年要小，总数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万以上（纯粹产业化的真正无产阶级）。同时她是非常幼稚的，因为许多刚刚脱离农村，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带有小生产者的习惯。例如广东代表说的，在广东会议上讨论广东暴动时，有些同志提议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原则上似乎是对的，因为他们说土地革命农民可以得到土地，工人却没有得到什么，如果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工人也可以得一些财产。但这种说法在事实上就证明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而非无产阶级的心理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的机会主义都是无产阶级本身薄弱，非无产阶级的心理和行动得以反映到革命的路线上来的结果。

4.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现在要说的，就是目前阶段需要怎样的政纲。在国共合作时，我们失去了独立性，有人说反蒋迎汪……这就是我们的政纲。我现在来说目前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在这阶段上我们也要有政纲，要使民众知道我们要干些什吗，不仅要工农知道，而且还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商人、兵士知道中国共产党要干些什么。为节省时间计，所以在此不必多讲，因为我在给布哈林同志的信上，已经说及或已解答。

第一步所说的革命性质和阶段，及其失败之原因，这就是说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它动摇了帝国主义，对世界上无产阶级说来，它有世界的意义。我们在中国革命中，与国民党资产阶级联合打击封建阶级，可

是在资本家的工厂中的劳资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矛盾也是要解决的。因此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意义是要解释的。这个问题不管是与资产阶级联合，或反对资产阶级，甚至第三阶段——苏维埃阶段——也可说是国民革命（或许有人反对我这种说法）。阶级斗争问题也是要解决的，此问题也不是孙中山那种说法，也不是国民党所能解决。民族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主要问题，现在只有暴动民众是能解救中国。民权就是解决土地，打倒封建阶级。民权不是国民党党权，也不是共产党党权。所谓“民生”，就是小资产阶级与劳动者的问题，切实的说，要说没收大工厂，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这许多是否已得到了呢？国民党之所谓民族、民权、民生，一切都未达到。所以只有苏维埃革命才能达到解决，也可以说这才是彻底的国民革命。要知道以前主要的机会主义，是以国民革命的大帽子，阻止阶级斗争之发展。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是没有冲突的，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还促进了国民革命。不管资产阶级怎样的挂起民族主义的大招牌，然而这一切只有工农能够解决。

过去因为对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观点不明的原故，数遭机会主义的失败。

Ⅱ. 机 会 主 义

1. 机会主义之理论

现在讲到第二部——就是过去的教训，也就是对机会主义的研究（大家都笑起来）。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他说革命的群众斗争，教会了无产阶级，证明只有革命能引起农民力争民权。革命并且把无产阶级的政党，更巩固起

来，刷清了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告诉他们：到大资产阶级（自由派）方面去找他们的同盟者和领导者，完全是枉然的，因为大资产阶级怕群众斗争，比怕火还利害。此外列宁在别的地方也说过，资产阶级怕革命比怕反革命还要利害。在从前的俄国，它是讨厌俄皇的，因为俄皇不好，所以需要一个立宪制度，来缓和民众的革命运动，它并不是为了民权。这几句话对于我们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有很大的意义。我们的党也和俄国一样，要刷清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武汉反动时，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是退出，便是开除。在八七会议以后，反革命的同志如任卓宣辈，从前在莫斯科是旅莫支部书记，旅莫支部的首领。他不但不革命了，而且帮助反革命屠杀工农。他公开在报章上发表宣言，说共产党是怎样的不可信任。这些分子，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中最出名的，其余的当然不少。在八七会后，机会主义的成分和政见也很坚决的刷清。关于机会主义，我们应当知道，它不是发生在某时期上，而是一位工人同志最清楚、最明显、最正确的回答："机会主义不管什么时候，有争斗的时候，它就暴露"。例如在上海谈判，即令机会主义不发于此，亦会发生于其他问题上。我们的党成立于一九二〇年，至今八年的历史，在革命之根本问题上，均始终无正确的答案。党的群众作了很多壮烈的、英勇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可是在指导机关中，早已潜伏了机会主义。

我们党的发生，可说是五四运动的支派。当时学生有许多派别，如安那其、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社会主义等派别。这时也产生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自然是工人斗争影响的结果。做职工运动的同志应当明白：从前总是说先有党然后有罢工（直到五次大会时，深印于我脑），可是现在被资产阶级发现了。在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的经济月刊上，证明在我

们的党未形成之前，就有罢工了。所以我们说党不是在于有智识分子跑出来才有，而是工人斗争的反映的结果。当时小资产阶级的背景，一定会发生像孟色维克的倾向，因此就发生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之不了解，如革命性质、革命领导权、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土地问题、革命斗争方法问题。从第一次大会到第五次大会，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意见，就是很浅薄占党少数人的意见，也是不存在的。即令是存在的，然而也没有哪一个人，哪一派有一贯的主张。第一次大会至第五次大会后，有某一人意见是布尔什维克的，或是彭述之，或是某某，实际上多数主义与少数主义的倾向，都包含在内，并没有某一人代表孟色维克，也没有人完全代表布尔什维克，各样一半的很含糊的凑成。然在政治路线上能不能说："亦许并无机会主义，仅仅在于大家不懂得"呢？不能的。譬如说孙大学生在课堂上，教员问他关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题，而学生答错了，就说学生是少数主义，这当然太过火了。然而在政党，这是不能容许的。政党不是小学生，机会主义的倾向，虽没有一个人、一派能负全责，然而机会主义是有一贯的路线，这在客观上是如此的。

中国机会主义，最主要最有趣的倾向是：1. 实际最右；2. 表面最左；它俩凑成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除去上述五问题，革命性质、革命领导权、革命后政权、土地、革命方法等问题之外，在组织问题上也是有的，自然不是单独表现在组织问题上。

现在我很简单的说，因为我在书面报告中已经说了许多。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有许多人是不明白的。在最初讨论加入国民党时，有一种观点表现最左，以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我们不应该加入。又有人力争说，国

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以便自己的党可以加入。大家都怕加入资产阶级的联盟，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在与安那其派争斗中，别派主张不要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主张学俄国一样的马上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讨论会）。当时大家以为资产阶级这名辞是骂人的，是不好的，殊不知资产阶级是经济关系和科学上的名辞，并不是骂人的。这些都是唯心的表现。所以这一派人主张不加入，最后又“妥协”：工人不加入国民党（现在用不着管这意见是谁主张的）。再则，亦有主张南方加入国民党，夺取它的群众，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就加入夺取群众，无国民党的地方，则直接由我们去拿。

右倾的主张是完全加入国民党，专做国民革命，缓和阶级斗争（也许在决议案上，写得巧妙一点）。在第二次大会之后，许多同志有这倾向。这是观点不清楚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譬如俄国的孟色维克，在一九〇五年他们反对加入临时政府，他们说，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所以，无产阶级不愿参加。也主张作经济斗争（工会运动），不作政治斗争，因此也有主张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属于资产阶级，所以不要参加。中国的机会主义至少有些相像，虽然中国没有马尔托夫，没有仆例哈诺夫。关于这点不详说了，请同志们看我的小册子，就会知道。

因根本问题的观点不清，自然就有机会主义；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不会用到实际上，仍旧发生机会主义。这是有可能，然而决没有理论完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实际行动上却会成为“百分之百”的非机会主义，天下决不会有如此的事。如果是这样，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完全是多余的了。

列宁说：“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始终是要破产的。”在事实上，我们的党是破过了产了。所以不能说机会主义仅仅发

生于对于政治形势估量之不确。

2. 党的历史上之几个问题

其次我所要讲的是党的历史概略。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中，我们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这问题上，有许多同志有两种主张：有一部人的主张，一切党员都可以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对这意见是不同意的，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在主张加入的方面，也无一致的意见，也无一定的主张。后来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他们倾向于否认斗争，于是使他们在一切马克思理论的根本问题，都发生了疑惑。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曾讨论过党纲问题。对于党纲草案，曾经有几个字的修改，但这几个字之中，就含着机会主义：对于农民及资产阶级作用之不正确的见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会议，又决定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的第四次大会，才决定了产业工人应加入国民党，同时指出了过去的错误，提出领导权的问题（不过不正确罢了!）。

如今应当再说到几个政策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北上的事。许多人反对中山北上，同时在这北上前我们在广州同国民党开了一次谈话会。当时国民党的右派，冯自由、张继他们在这次会议之前，极力出来反对 C. P. 在国民党的党团。张继他得着了我们一本决议案做“罪证”。直到廖仲恺到了广州，我们才公开的提出争党团的问题。当时与国民党的谈判，是我负责的。（国焘：——当时有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党团在国民党中公开存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中央开会，通过一决议案，承认共产党是一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何人不能企图消灭他；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只能以一般的国民党的纪律对付他们，不能消灭他。后来国民党要求

设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参加这会的应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国际代表，以便解决所谓党内纠纷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党内纠纷问题，那时还只是国民党的纠纷问题）。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过此决议案后，中山便将冯自由开除去了（一九二四年八月）。当时我党中央，一则反对北上问题，一则骂我擅称代表，决定那一决议案。我被调回上海。（国焘：主要的是国际联络委员问题，你为什么不说?）国际联络委员会，中央当时认为是国民党束缚我党的工具。我是认错。后来这一委员会未成事实。至于那一议决案，国民党可利用它来束缚我们，我们也曾利用它来反对戴季陶的右派。我的外交办的不好，这是应负责而受处罚。现在再说北上问题，我是赞成的。中央之和森[2]、述之等竭力反对，我的文章也不登《向导》。同时北方也是反对的。中央它说我犯了政治错误，于是调动我的工作，说我不应该反对中山北上。和森他是反对我的，我气得关于这事还作了一篇文章，是在别的刊物上登的，当然这种反对中央的文章他是不登的。

反对北上的方针是什么？是怕国民党发展？或者如述之、和森当时替孙中山划策，要他做科学革命：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要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中山自然是没有听这种忠告，他是北上了。北方区委仍是反对。当时国焘同志出狱，在北京曾反对北方区委之意见，随后中央对此问题是变更政策了。

第四次大会时，最初提及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述之首先提出的。固然第三次大会之后，一九二三年八月我就在《新青年》季刊上第二期做了一篇文章，其中论及领导及民权独裁。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了，谁也不去管它。彭述之虽用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见来提出这领导权问题，然而他们的“功

劳”，是在适应党内客观情形提及这一问题，方才得着党内高级干部之注意。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发生之后，廖仲恺被刺时，我们也发生过两种的意见：一种是主张极力的去打击右派；一种是主张不可以太过左倾。其次就是国际代表伍庭康在他回国上船之前，忽召集我们（独秀、国焘、秋白）去和孙科、邵元冲、叶楚伧一次谈话。说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上，决不要三分之一以上之中央委员等等。汪精卫是左倾的，而我们偏要把他向右拉，给国民党让步。这是很错误的。三月二十号广州的事变就是这种让步中形成了。

再就是关于北伐的事。中央在上海扩大会议时（一九二六年七月），陈独秀同志有一篇文章反对北伐。反对借北伐来增加苛捐杂税，这是对的，在广州则亦大致同意；然根本反对北伐是不对的。广东同志的主张一方面扩大左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主张北伐。后来我同国焘到广州去了，我们是去开国共联席会议的，结果被他们拒绝了。这次在广东，我们同延年、太雷[3]等与鲍罗廷、伍庭康等讨论。鲍罗廷提出“社会政纲”包含土地革命问题；伍庭康主张只要民主政纲（除去土地革命）；国焘则主张一个“社会民主派政纲”。（国焘：——别开玩笑呵！）这不要紧，你当时的确是主张他俩的政纲应合为一，说笑话，所以说“社会民主罢了”。我当时与你同意的。土地政策是鲍罗廷先提出的。从这时起，中国革命发生了土地革命政策，发生了土地革命；但并没有了解土地革命，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才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五次大会前，我是主张北伐的，并且用通告的形式，通知各地应帮助北伐，使北伐成为群众的力量。北伐中以群众团体政权为号召，要求北伐胜利地域立刻实行“民权”。事实上，当时渐渐已经发生党权问题。党

权运动是反蒋的，是对的；但大多数同志不知道怎样法子，怎样用群众的力量去争党权。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讲他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很脆弱的，只是我可说有不同的意见的，可说我的意见是由书本上找出来的，说我没有坚决去主张。然而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它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总之，从此革命斗争形势日益严重，党内各种不同倾向，不能不分化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极明显的提出与民族资产阶级破裂的问题，使大家，使各人不能不给以明确的答案。

此后就是上海暴动的问题。这暴动的试演就是二月暴动。三月暴动的成功，亦就由于二月总罢工时的党内讨论，使大家更进一步的认识。其时对于上海之政策问题，我曾竭力反对联络虞洽卿等。然而实际上，上海暴动后的政策，始终不能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

上海暴动之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汉口的特别会议，觉得群众左了，政府右了，我们应把政府拉左些，群众坐右些（座下大笑）。这真是莫名奇妙，这或者是太互辩法了。

再说到第五次大会的情形。我可以说第五次大会是接受了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决议，但它是一个形式的。在这会上的情形，表现的是我也骂人，彭述之也骂人。“我们要和气一点好吧!”五次大会后，中央没有整个的路线。鲍罗廷、鲁易与中央又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鲍罗廷向来是主张土地革命的第一人，他也是主张阻止土地革命的第一人。鲍罗廷的错误，中央是应分负其责的。因为中央实际比他还右。自从汪精卫回汉后，我党中央的政策便开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时代。汪精卫是有他的社会背影，阶级关系的。鲍说不要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所谓小资产阶级，是除买办阶级外直到乞丐都是

小资产阶级。鲁易他没有告我们一定的主张，一定的方法。他仅仅接受国际的训令——他不是机会主义者。不过主要的不是在他，而在我们对实际问题不能解答。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完全与国际决议（第八次扩大会议）相反的。我们五次大会，我们觉得估量时局有不正确：在蒋叛变后，仍用蒋叛变之前七次国际议案，这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不详说，有我的报告看就知道了。关于武汉时代我不能详说，因为时间太占多了。

在湖南的马日事变后，中央秘书处满天飞，随后便是“散伙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再说我们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八七会议，我们开始正确的指出，但在组织上，我们还有许多没有深刻去了解它。

3. 中国式的机会主义

中国机会主义的形式，如果将它来和俄国少数派（孟色维克主义）相对比，是很有趣的。俄国的少数派主张：“革命既为资产阶级，领导权自然属于资产阶级”。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将领导权送于资产阶级，可是它的最初表现，却是说：“革命领导权，自然是无产阶级的。”俄国少数派一切劳工运动，革命暴动都是过程——自然的，都不能以人力去组织的。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不会组织并指导群众，但是它的最初表现，表面上的观念是一切都是党去造成的，一切都要群众去遵守它画面式的计划、政客式的谋略。俄国的少数派是以民权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以至去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但是中国机会主义最初的表现，却是高呼防止无产阶级的腐化，害怕工人受国民党影响而模糊了阶级意识，主张工人不要

加入国民党。俄国的少数派是主张党的作用太少，要组织“无党之党”（所谓无党工人大会）方算有群众。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忽视党的作用，党与群众的关系（经过党团之作用，至今不明），但是它的表面的表现，仿佛是过于“提高党权”……完全是命令主义，党成了军官党，事事命令，暴动也好，罢工也好，一切不为群众，只要党的命令。俄国少数派是反对列宁的职业革命论的。中国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不能为革命而牺牲市侩生活，但表面上的表现，却是工人都在做革命职业家。其实是雇佣革命，例如武汉反动后，许多同志因为党不能供给他的生活费，他便离开党，退出党了；而在党内的，八七之前之后都有许多是把党的生活变为市侩生活。俄国的少数派是主张要宽容智识分子，“智识分子必定是反党爱自由”的理论，其实是给少数“书记老爷”……更大的自由。俄国少数派是重理论而轻实际的。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表面上的表现，可是太重实际，“实际”“群众工作高于一切”，谈理论者亦皆是“反党”者。俄国的少数派是主张党内的绝对民主化，反对“个人专制”、“机关专制”等的，反对民主集权制。中国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它的最多的表现，却是党的铁的纪律，天高皇帝远的书记老爷，变成党的化身，谁反对他，谁就是反对党，反对纪律。总之，不要群众，不顾民众，不知群众，不管客观情形及敌人势力，一味的书生计划，政客谋略，却要群众去服从他。中国的与俄国的机会主义，同样是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

Ⅲ．盲动主义与暴动政策

1．八七会议

现在说到第三部，就是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的时期。大家都承认八七会议是本党的重要关键。如果没有八七会议，那么我们的党现在不知成了个什么东西。武汉失败后，八七会议后，党有了新的生命，虽然是八七会议对一切的问题还有不彻底明了的成分，但它战胜了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八七会议后，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同志是参加的。在八七会议之前，已决定了三件事：a. 南昌暴动；b. 发表告国民党左派同志书，在这个同志书里，还说到我们的政纲；c. 是七月三十一号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杀了三个工人，我们发表了宣言反抗，号召总同盟罢工。

决定暴动的前后经过及其内容，因为我不在那里，所以我不能多说。但是当时中央所决定的加深土地革命，决定四省的秋收暴动的经过，这与八七会议后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固然八七会议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给与一个党纲及政纲的决定，然而它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错误，是在（1）不明白革命转变的阶段；（2）根本在方法上不信任群众，而且离开群众，甚至阻止群众；（3）抛弃独立性与批评性。因此，就形成了党最后的，最利害的机会主义。八七会议刚刚用了全党的同志注射在群众的身上，在“向着群众”的口号之下，就注意了秋收的暴动、武汉的罢工、海陆丰农民的继续斗争、指导广东武装暴动的准备、群众运动的发展等等的重要问题。固然，八七会议有其缺点，如：（1）关于土地问题，

在武汉政府时代，国际就有命令说：现在应当自下而上的实行土地革命。这就是说：要赞助农民自动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而革命军人及小土地主，甚至中等地主，在不可能的特殊范围内，可以不没收。这是否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呢？我的意思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一种策略口号。当时武汉时代，党内对土地革命有两种意见：（1）陈独秀的意见。他说现在不应该讲土地革命，我们现在要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后，才做土地革命。鲍罗廷当然是同意这种意见的。（2）是湖南的同志如毛泽东等。他们是主张立即没收一切的土地，因为当时在湖南的农民已经自己动手了。这两种意见各走极端，而中央及国际的代表应该立即给以答复的。但给与答复了没有呢？没有的！当时我自己也有一个错误，或者不是错误而是事实。我说：必须没收土地，至少大地主的是可以没收的，可要有两个条件：a. 要与湖南国民党左派群众共同去做，b. 要不涉及军人的土地。当时也有其他的意见，我不必多说了。国际的决议案及命令说不没收小甚至于中地主的土地，这是一种策略，是不错误的。这是说，中国共产党这个政策告诉全国说：我们是赞助并领导你们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但是如果农民自己动手去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那末，国际的决议案及命令，并非先告诉我们说，如果农民要太过火了，要抢夺中小地主的土地，你们要用法律的第几条为根据去治他们的罪，去枪毙他。并没有这样说呀！八七会议是继续了国际的议案及命令，然而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而非制裁革命的。如果农民的没收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土地，则按法典的第几条去制裁他，这是不对的。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却又引起了这种“误会”。南方局等总是想法去自上而下规定多少亩土地以上的地主土地方可没收。这是一个大缺点。（2）《告国民党左派同志书》。武汉政府叛变了，我们是说

明只有共产党能够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国民党客观上所要解决的任务。这完全是唤起左派的群众来推翻武汉反革命的政府，这是最后的尝试。南昌的暴动的确有左派的国民党参加的，贺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但是在别的地方就没有了。这种错误是过分估量国民党“左派群众”。唤起他们来反对宁汉的反动中央，这是对的，但说国民党仍旧可以做群众暴动胜利后之政权形式，那就错了。但我如要用政客的手段，完全是利用某部分去反对某部分（军队等等），这更不对。因此，江苏省委员、国民党的党团书记王若飞同志就在这种观念之下主张国民党革命同志欢迎汪精卫。你看这如何讲得通。

（王若飞——并不是我主张的，你讲话要负责任。）

（瞿秋白——共产党在武汉驱逐汪精卫，而共产党又在江苏欢迎汪精卫，这又如何讲得下去呢？

不是若飞同志主张的，这是若飞同志赞成的，他是党团的指导者！）。这难道也是由于估量时局不正确吗？

或者有人要说，由于对国民党的政策而来的“误会”。武汉反动这是全国的失败，然而我们的党曾加入过武汉政府的，亦加入过国民党的。因此，工农群众一定要问，你们本来是在拥汪，而现在又来反汪，那么，工农的被惨杀，共产党是要负责任的。若果你要否认，那么，他定要要求我们答复的。因为这是很有理由的问题。因此，八七会议决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总方针与任务，这并不是“盲动主义”的来源，若果有人说这是“盲动主义”的来源，那末，我就不明白了。

南昌的暴动还是在“八七”以前就决定了的。它是一个武装的政变，而并不是一个在街上的群众暴动。这是否与对革命

的政局估量有关系呢？谁能断定说，武汉失败后，也如俄国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一样，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动呢？假若这样，那末，就不决定暴动了，而使叶挺、贺龙的军队散在民间去了。然而革命的党不是这样的，她绝不愿轻易放弃武器的。当时决定暴动，国际也是有电赞同的。国际仅仅电讯有无胜利可能。当时事实上是否有胜利的可能呢？我们都知道，它到汕头随后方才失败的。这与秋收暴动，同有发动群众的目的。湖南的马日事变，谁都知道对党与革命有非常大的损失。当时为了党的前途起见，为了为革命找一条新的道路起见，就只有决定赞助发动“秋收暴动”。至于它的好还是坏，这已很明显的答复了。以前在国民政府时代，我们阻止暴动，而现在我们是赞助领导暴动了。所以中央始终是认为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不过如对于时局估量的不详细，及其他的错误，如：宣布什么没收什么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不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等，这都是以前受着“机会主义”的余毒。这在理论上是如此，而在事实上也是如此的。至于南昌的暴动，固然指导前敌的同志，未曾参加八七会议，然而如果这不是一个革命暴动的军队，而是日本或法国陆军部治下的一师人，那么师长可以回答，我未接陆军部命令，故未没收二百亩以下的田地，未坚决与张发奎破裂等，所以我们不负机会主义之责任。这是一种法令式的说法，这等于说：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关于东方决议案并未说革命前途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我现在同布哈林可以这样说，请你看罢！你以前并未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可以使它向非资本主义发展。如果如此，那末，共产国际共有六十余支部，它不能个个国家都单独的指示出来。同样，中央也不能指示你们说，你们应该在某日某时在广州暴动。党并非一副死机器。问题的重心，是在原则上，而不在小的地方。若

果你是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若果国际对中国的消息很模糊，它不知道中国的工人，到底是一千万、八百万，或一百万，那末，我们就应该供给它材料，应当自己有些判断力。同样各级党部对上级党部也须如此。每个党员都是自觉的参加革命，他并不像一个简单的兵士一样，长官使他打东，他就打东。

关于八七会议政治纪律未取得执行的问题，也要说一说。陈独秀不服从国际的命令，不愿到莫斯科来。其余的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是中央全体。但是党并未开除他，并未个个同志惩罚。在各国的共产党对待其犯了纪律的同志，如苏联共产党对待反动派（有人说：反对派！）（瞿秋白：——反动派同反对派差不多。）他们的政治纪律是如何执行的呢？托洛斯基自一九二三年即在党内捣乱，按事实的本身，比独秀严重得万倍。但是我已屡次说过，纪律非若法典一样，他们先用宣传、训练……等等的方法改正他，并主要的目的，使群众认识他的错误，并不认为只是几个人的事。假若我们因为陈独秀不到莫斯科来就开除他的党籍，这对于党员无多大帮助的。我以为八七会议后，政治纪律已经执行得很严厉了。

“八七”后，党走上了新的道路。由“八七”到十一月，是一个农民时期。当时如鄂南、鄂西、醴陵……等地都有暴动。武汉的反动，是反革命的胜利。南昌的暴动及许许多多的农民暴动，是反抗反革命。不错，反抗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失败了，而就说这是错误的。当时的形势，无论如何是要领导暴动的。当时的暴动口号，空气，自中央，自下级党部到群众都是如此。这是否是“盲动主义”。这其中有许多是各个的事实做错了，不估量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了，但不能说这都是“八七”反机会主义过甚的原故。

这又可助我们解释一切的事实。有人说在八七会议上面，

我们放弃了工人运动斗争，而只注意农民运动斗争。这非事实。当时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案，是苏兆征同志所起草的。他是很具体的，也许他太多注意武汉一方面。至于他说农民暴动后，城市工人运动应该起而响应，这只是局部的而非原则上的问题。中央对秋收暴动并未决定立即推翻武汉政府，在武汉来一暴动。再则农民运动是明存在着，工人阶级对它要有一明确的态度，这是事实上的问题。凡此一切，我们以为都是为的争回以前的胜利，以上是“八七”前后的事。

湖南秋收暴动，在党的指导机关是有错误。而两湖的革命情势和经济危机，仍是继续着武汉政变以前的情势。客观情形是表现农民要起来暴动，并且党的机关是应当去领导它。湖南的所以提到夺取长沙的问题（长沙暴动的问题），是因为客观上的形势，从平、醴等处的发展，应当有如此的目标。当时省委彭公达的报告亦不确实，而且终于不去做群众工作。这是莫大错误。如果“八七”后立刻去找马夜事变以来已失链锁的党部和群众，那末，一切政策的决定与实行，决不至于如此之糟。

北方区当张作霖失败退兵时，亦曾决定双十节暴动。中央对于这些行动亦认为是非多数党的策略，而是盲动主义。因为北方军阀虽在混战，但他们仍有很不小的力量，以之压迫无组织的工人暴动它是有力的。所以不顾主观客观力量乱动，便是盲动……。

其次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八七会议后至九月十九中央便决定变更决定。南昌暴动的革命委员会内的许多左派，已经登报声明退出。同时，特别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分子亦脱离我们。现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对国民党的估量，是不正确，特别是国民党左派视察之不正确。

至于组织上，“八七”很具体的提出党的机关工人化的口号。可是，因此引起一种反的倾向，就是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如广东各地），但这已经是以后的事。我们当时提出改造机关的口号，因为我们既没有办法进行党的工作，所以不能不吸收工人分子参加进指导机关来。可是，八七会议的组织问题中并没有坚决改造党的决定。

2. 军阀混战与十一月会议

宁汉战争起来，更早些北京已有奉晋战争。这是中国混战的激烈时代。中央在十月十日，我党即发一宣言，提出“变军阀混战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口号。不久，中央便对于各地有所指示。指示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工农应当利用混战争取**革命力量的阵地**。这可以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可以是从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还可以是游击战争或简直的抗税抗租，可以是暴动。但是，宣传的目标，应当明显的指出共产党所指的道路是革命的，是武装暴动的推翻统治阶级。各地应当照着当地情形，并决定斗争的方式。例如，江、浙，当时并无总暴动的前途，最初中央便反对无锡农民攻城的建议——农民斗争剧烈而走到游击战争，我党是应当去领导的。至于上海暴动则根本上谈不到。江苏省委当时的紧急决议案，也就只指出准备的工作，指出江南的“骚扰”之可能，及江北所谓“割据”某几县之可能。过分的估量，只在认为上海这些斗争或者很快的便要转到整个的暴动。例如湖北，中央只是认为唐系军阀崩溃，两湖，尤其是湖南，将有日益造成暴动条件之可能。

十一月会议便对于暴动的概念，更加弄得清楚。其中指出必须有城市暴动——工人阶级为指导及中心，革命方能真正胜

利。并指出城市暴动——总暴动之条件是：第一，统治阶级之崩溃；第二，暴动要在中间阶级的动摇时期；第三，要群众真正有了暴动的决心；第四，要有暴动的准备工作。这决议可谓反对盲动主义的开始。其次关于工人日常斗争工作的问题也有指示到，但并没有说从此就不准备暴动了。

以后党的政策，是反对军阀的内战，号召民众自己起来以阶级的斗争消灭军阀的战争。在广东尤其有切实的指示。尤其是广东，自从扩大会议后，有详明确切的指导。至于广东暴动是否就是盲动主义？是否广东暴动会有胜利的可能？自有广东代表来说。（“谁说广东暴动是盲动？”——国泰）当然，就是中国同志没有说，也有外国同志说的。（“广东暴动中央知道否？”——若飞）这里有恩来[4]起草给广东党部要它准备暴动的文件可查。

中央十五号《通告》内有说在目前适应中国特殊的政治局面：第一，我们应号召农民起来作减租抗租运动；第二，在可能时号召工人起来罢工；第三，号召群众起来作反军阀内战的运动；第四，甚至有些地方可以暴动；第五，已暴动而存在的苏维埃区域，应扩大成割据局面。

在当时，上海有些同志用手枪强制工人罢工、强制暴动的事，中央立即制止，并指出这种错误的倾向。

亦农[5]同志曾在党内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曾领导数次暴动，但他的错误还是很多的。他现在死了。现在暴露他的错误是很难过的，但为着政治上的明白起见，就不得不说。他在湖北指导工作，估量唐生智还有两三日的寿命，甚至可以战胜南京。这是他唯一的错误。然而他制止湖北省委的盲动，这是他对的。湖北省委定期几次罢工，暴动还没有暴动成。这种指导当然是不好的。其时湖北 C.Y. 同志，尤其有这些盲动的

倾向。

其次当时广东已准备了暴动。两湖农民亦好几处爆发，占领黄安。沔阳等处都有骚动，而且有渐次扩大形势。湖南从那时唐生智军队溃散，至今蔓延十余县、二十余县的农民骚动。在北方也不能说是没有斗争，天门会、红枪会的反抗军阀也是很严重的事件。

八七会议后，党的政策改变，伤痕缓缓恢复，尤其是南方一带具有直接革命形势。当时，南昌暴动与汕头失败，张发奎军队入广东赶李济深时，中央曾有指示于广东的委员会，指明党在广东目前的任务。在广东政治上的纠纷，经济上的恐慌，工人运动的高涨，与海陆丰暴动，苏维埃政权的成功，都是客观直接革命的形势，应当加紧广州暴动的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这《通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的。广州暴动在十二月十日发生。虽然暴动的日期不是由中央决定，但实际上交通困难与客观事实，日期问题是不能由中央预定，而应在斗争的形势中决定出来。广东那时还不能打电报责问中央，说明哪一天想暴动，或某日某日可以暴动。这回的暴动虽是遭了很严重的失败，但这是不是盲动主义呢？不是的。

那时，党里，特别在团里，发生有盲动主义、先锋主义的开端，如江西打电告中央预定哪日大暴动之类。此外前前后后，如北方局六大区暴动计划、江苏的以上海响应无锡的计划等等，盲动主义非常利害。中央都立刻开始纠正这种倾向。

广东暴动的意义是开始了中国苏维埃的阶段。此后中央有各省工作的计划，特别注意说明广东暴动失败的教训，及统治阶级反动的进攻形势，有使工农运动更加艰苦而深入的可能，须为决定胜负的暴动之准备，尤其不能玩弄暴动。中央这种指示晚了些。我们工作的中心，是在大城市工人运动的斗争，与

黄色职工会的斗争，并在反帝运动中吸收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及其他群众。如果说中央没有注意到群众工作，这是不对的。或者这样说，中央在省委之上，不能有更好的指导，但大的政治方向完全对的。

3. 广州暴动之后

广州暴动的政治方面发生新的现象。这现象是革命上升呢？还是下降呢？这情形就各方面观察起来，好似在长期决战状态中。在各地不绝的发生新的暴动，又造有新的失败。开始“争城市的斗争”——城市中工人运动的被压迫，党与群众的隔离，都使这一任务更加加重。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使用它斗争的方法，企图去摇动统治阶级的基础；同时，统治阶级亦尽力压迫赤色职工会及共产党。阶级斗争到了极激剧的时期。

党在这时期寻找新的工作方法，取得群众。在武汉破坏之前，党在秘密工作中恢复了职工会与一万多的党员。就是最落后的北方，也渐渐活动起来。上海也开始自下而上的工会与党的组织群众工作。

以前党的政治教育没有充分的注意，这是很大的缺点。以前党员很少讨论政治问题。八七会议后，党尽力引导同志作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这是八七会议后的进步。

现在谈到党的组织与纪律上的问题。以前在组织上反对八七会议及不执行新政策路线的同志，最少应该给他严重处罚，以至开除党籍为止。同时用教育的方法纠正理论上的错误。当然，找小的事情攻击同志是不应该的，但组织上的纪律必须执行。不然，我们可以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吗?！所以十一月会议的执行党的纪律是必须的。

同志们，我们不要怕，大胆说出来。在第五次大会时，我指出彭述之同志的错误，有同志以为我攻击个人。然而，为着党，这种举动是必须的，只问他是否有这错过。有错过是否应开除！如谭平山的开除，当然是应当的。

至说改组，决定工人成分几分之几的参加，智识分子几分之几参加，这不能说是中央的机械主义。机械式的改组是各地自己引进工人之后，请他当菩萨，而不去帮助这种新的指导者。有人说工人同志不能做事，因为智识程度太低。但如果能帮助他，教育他之后，自然就不同了，如苏兆征、向忠发同志是否会在中央做菩萨呢？在组织上，广东、山东均有过错误的倾向，如山东不给十元以上工资的工人入党、广东排斥智识分子的理论、北方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等等。这些错误，不论是在指导机关或在同志之中，都是应当纠正的。忽略工人运动的倾向也许有些地方是如此。有些同志以为反帝国主义一来，又会使阶级斗争麻痹起来。这都是错误的见解，我们都应坚决的指正其错误。

最后，我可以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党主义的余毒。国民党以为打下北京，列强就会承认南京政府，革命便可告成功。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表现（机会主义也好，盲动主义也好），是和这一倾向有关联的。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之中，表现大多数军事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须知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经“八七”后，这些幻想大致改正。并且，现在革命动力改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理论破产。但“八七”以来得相反危险倾向。“八七”后说“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

多，放火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余毒，是有思想上的系统的，是整个人生观宇宙观，是不正确的。这种观念不高深，即平常工人农民都有的。我党缺少理论，有如布哈林和史达林同志所说的，革命的党要有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我党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同志，都要训练。要有党的理论才能使党充实。这并非说单一个理论便可以革命。我党在八年中，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本理论缺乏，是党的弱点之一。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说来一大堆，并非上半天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下半天即能肃清。党经“八七”以后虽到现在努力在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不能说，现在没有机会主义了。中央渐次肃清了少数主义、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尚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中央反盲动主义以来，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昨天布哈林同志说党天天要暴动暴动，全党变成傻瓜党了。这点请布哈林同志放心，一到大会，一切的傻瓜不知怎的都变成不傻了！

Ⅳ. 革命形势

第四部分讲到中国革命现在的形势。这次大会主要任务，是反机会主义余毒之盲动主义斗争。可惜这次大会继续五次大

会之后，五次大会未开始反机会主义斗争。“八七”前许多问题，说来占时候多，为节省时间起见，在讨论时多提书面意见。关于武汉时期分析，马日事变分析，不重说，有书面报告。我很快的进到第四部分的报告。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现在进展形势，究竟革命潮流向下低或是向上涨更或是已达高潮。根据问题解决的总方针，首先应说明广州暴动后应注意经过国民党进到苏维埃的新阶段。究竟进到苏维埃阶段，是不是革命新阶段基础上发展呢？这点须特别指明，必定要特别指明，不然，会发生错误观念。第二个问题就是革命高涨或低落是什么意义？这个问题说明究竟是不是革命在客观上缓慢的向上发展？在客观上敌人能不能有立宪会议或改良主义的出路，来取消革命，消灭革命的基础呢？一定要说明这二个问题，才可以明确的估量。是不是中国革命还没有大的高潮，如五卅、省港罢工时期的高潮呢？或者像布哈林同志所说，现时全国没有广东省广州暴动前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后，一星期或一二天可以暴动呢？如果没有革命高潮，很高的潮流，结论是不是下降？是不是有新的潮流来？单解决一问题，就是有没有高潮或将近高潮，是不够的；必须要三个问题：广州暴动后革命是否已进到新的阶段，客观上高潮是否可能？现时是不是高潮？或是现时比较低潮？这三个问题共同一块说明。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说过。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的中国政治情形。当武汉反革命政变到广州暴动期间，武汉反共，我们争领导权失败，一直到广州暴动失败，是不是群众离开共产党？是不是群众在政治上不信仰共产党？是不是群众有立宪会议、改良主义的幻想？就是说除了革命以外有其他的方法呢？武汉反动到广州暴动失败，群众散漫，主观与客观形势使革命形势重新整理。从前试一试反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几次都遭失败，

证明敌人力量比我们大。但广州暴动失败后，客观形势使革命方面更认真积聚自己力量，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广州暴动虽失败，但有几个特点：（一）广州暴动之失败不是全国的失败，非如各处罢工、示威，经半年、一年之久而以广州暴动失败为结束；或为全国中心之失败，如在柏林、巴黎，严重失败决定将来命运。广州失败，不是如此。武汉反动后与广州暴动失败后，群众情绪比较怎样？广州暴动失败有没有像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失败呢？没有，是绝对没有。（二）是不是像一八四八年巴黎失败、柏林失败，农民离开工人，因农民停止革命而失败，或失败后农民离开革命？广州暴动失败后，农民亦有此现象没有？没有的，且适得其反，苏维埃旗帜飘扬于穷乡僻壤，农民更自觉地与不自觉地参加革命。固然这不能说是革命高潮，但亦是新高潮的象征。（三）广州暴动失败给整个军事经验，与上海三次暴动不同。上海暴动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守中立，打奉军和鲁军。广州暴动是在国民党完全叛变后，要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暴动，在军事技术和党的准备都是第一次事。经过失败，使党得无限经验，尤其是工农与兵士的联合，证明新的巷战战术中革命努力是可以胜利。一八四八年巴黎暴动，是旧的巷战战术之结束，世界史最后一次的旧战术的失败。广州暴动，工人有大炮不会开，有机关枪不会打。武器拿到手里不会开，怎样去打敌人？但是他能得着兵士的帮助。这是全国的新的经验。它将成为全国模范。（四）广州暴动失败后，是不是全国有经济兴旺的前途？不是的。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无论经济、政治、工业的恐慌，没有可以改良。这与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暴动失败后情形不同。一八四八——四九工业兴旺，一般经济改善，脱离危机。在中国情形如何？看全国除满洲以外，全国处在经济恐慌中。在满洲张作

霖同地主、豪绅还可能出资本建立奉海铁路。五月初，大连豆饼出口数量增加。这样满洲之经济当可维持，但财政紊乱，奉票跌价，小资产阶级破产。除满洲外，其他各地，在工业方面，长江流域重工业完全停顿：汉冶萍煤铁公司久已亏本停顿工作，减工；汉阳兵工厂，因原资本缺少，工人减少很多，单是我们被开除八百——一千。大家知道，兵工厂工人技术非常高，不易得到，近年大批开除工人，使生产减低。同时，他们没有材料。此外，大冶矿产大多停顿，三万工人减至一万人。及各地重工业有什么东西？实没有什么，当然广东机器工厂非重工业，自罢工以来，停闭八月之久。

纱业在汉口于武汉时期，即发生危机，许多厂停工。等到唐生智倒台，长江交通恢复，稍有起色，像一个人受重伤大病后，忽然胃口好一点，要多吃东西，但病的根源未好。所以有人说最近武汉纱业增加纱锭及机器。其实因一切机器破坏，因而买大批机器来补充。上海纱业无统计材料，只去年九月到十二月纱业有很大危机，现在和缓些，而中日资本家冲突很利害，市场减低，危机正待爆发。上海织丝厂一大半关门，市政府提向南京政府请求帮助，亦无办法。香烟工业在反帝高涨时，抵制外货，南洋太烟草公司销路大广。现在不同，与外资烟厂冲突甚烈。糖业也大低落，南中国香港等地，糖业衰弱更利害。豆业在满洲出口虽增加，而主产是并不增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说，中国资本的工业大的衰落，英国资本缺乏，只日本资本较好。再讲到交通。京汉路欠薪九月未发，津浦、京奉等路亦同样欠薪，只沪杭、沪宁是“天堂福地”。国内战争停后，交通比较活动，但是交通依市场而兴衰。关于市场只要看日本对中国输人的低落，便可以证明中国购买力是日益低落：

时间	占总数
一九一三	百分之二十
一九一七	百分之四十
一九二五	百分之三十一
一九二六	百分之二十九

日本对中国输入，逐年减低，受抵制日货影响尚少。看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高涨，长江农民参加革命运动，受战争的损失，使民众的购买力一年减少一年。其他各国除美国增加甚慢外，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货物一年减低一年，从香港到输入中国货，百分数一年比一年减少：

时间	从香港输入的百分数
一九一三	百分之三十
一九二三	百分之二十七
一九二五	百分之十八
一九二六	百分之十

所以这样降低，固然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的全国反英运动，有一部分成效，而民众的购买力减少、商业衰落是根本原因。再则关于财政统计材料少，但只要问各地来的同志用什么钱，不难了解大概情况。全国除江、浙外，无论广州、两湖、奉天，市上通用的不是无价值的纸币，即是跌的纸币，或是国库券、二五库券。看去年武汉国库券、中央票，从几天内从五角减到四角、三角，价值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各地的财政恐慌，几乎影响到上海。南京政府铸的总理币，在云南、广西、福建不能通行。外埠来上海运现钱，他们还不要总理币，愿用袁老头钱。固然上海市面上“总理”比“袁世凯”便宜。这在上海虽只有两礼拜的金融动摇，但很可表明全国财政概况。军阀们统治的各省，财政都是他们的大问题。反面看军阀制下的

兵变，也许是无领导的，不自觉的，无革命意义的；但在客观上表示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无力维持，无力解决其矛盾。南京政府的官员有一时期发半薪，冯玉祥军队一年未给饷，只有吃饭。虽然今年在南部农业收成好一点，但在反动高潮下，地主会想："武汉时期，这般农匪把我游街，戴高帽子，现在武汉倒台，我们要算总账。"江苏在去年比如借一担米，价值十六元，今年因收成好，每担值四元，那今年要还四担。这把豪绅、资产阶级的乱刮削农民、工人更加利害。固然，我们非精确统计材料，然大体上已看出经济恐慌的情形。经济发展的趋势，决非兴旺的上升，而是日益低落的。况且，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经济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虽然世界经济自大战后有暂时稳定，但不能与一八四八年后资本主义初期有新的发展可比。从五卅运动到广州暴动，革命经过大高潮，亦经过大失败，但革命在客观上是向上形势。广州暴动失败后，当然没有高潮，决不能失败后明天又来一暴动。敌人虽被农民游击队的打击，自然也还不能说是高潮。但是只知中间时期，不知新的高潮之来到，把上面说的高潮可能与高潮象征，新的苏维埃阶段，完全轻视。只说无高潮，结果是发生怀疑。在政治方面，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是统一？是不是能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帝国主义不放任中国统一。客观上形势，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瓜分中国，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看日本在北方的侵略，英国在南方的优势。瓜分会使军事冲突，现在他们拿去军阀做工具，来瓜分中国。帝国主义对豪绅、资产阶级，利用军阀斗争，利用地方性。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与豪绅、地主有冲突。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极弱，但倾向中国统一。蒋介石在广州暴动失败后，知道豪绅、资产阶级无肯捧台，所以提出出师北伐。完成北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

益，想以外交手腕，打倒北京统一中国后，再与帝国主义讨论。但是帝国主义说南京政府虽有，唯不能统一。西山派要人张继常常说："只怪自己不好，自己要争气，打下北京，再来对外"。最近北伐完了，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说什么修改不平等条约，但同时必说努力肃清共产党，否则无颜面见帝国主义。京、津《太晤士报》登载主张中央政府应在北京，因津奉路有辛丑条约保护外人安全，且北京气候适于外人居住。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真让步，他们正要利用这个东西。所谓国民政府从反北京政府的武汉政府变到蒋介石式的南京政府，列强却还要从南京政府变成北京政府一样的东西。什么关税自主，都不要提出来；什么取消不平等条约，根本不要真正提出。那时，国民党政府或者会被承认。统一中国呢？难道打下了北京就能统一吗？从打下北京起，张学良与张作相争关外督办，阎锡山与冯玉祥争津、京、海口，白崇禧从河南抢徐州，蒋介石辞职。现在把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放在一块，真能组织成统一政府吗？帝国主义找地方性的资产阶级给以一部分的利益及工具，最近上海公共租界增华董三人，从"五卅"起到现在方得到。英国洋大人说以前中国人像疯狗似的，所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公园，现在狗虽然不得入公园，华人可入，真的啊！中国人到在帝国主义眼中看来，已比狗高一等了，比疯狗驯服些!! 日本于济南事件后，占领胶济路全部及济南等地，为的要勾结贿买中国资产阶级。它宣言日本所占区域，中国政府之税捐一律废除。日、英帝国主义不但要将南京政府成北京化，而且要竭力把中国全部领土变成南满洲和印度啊。南满铁路车上买小瓶茶要一角钱，卖茶亦是南满铁路会社专利。铁路两旁的苹果都是铁路公司所植的，南满洲的经济又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固然资本主义

本身的矛盾、冲突现象仍是存在的，革命新的高潮的来到，必须准备着帝国主义列强要更残暴的联合一致来反对革命，但是对中国侵略一天比一天利害。中国革命现在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是要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农民要土地，兵士要土地，土地革命正是现在革命的主要社会内容。俄国革命（一九〇五）英勇的十二月暴动失败后，俄皇取改良办法：

（一）立宪政策，召集国民会议，安慰一般小资产阶级。

（二）斯托雷平政策，将一部分土地经过银行卖给农民，它使农民赞成守秩序，而不要革命。

中国的土豪、劣绅，则不能自己牺牲些封建特权。资产阶级亦不愿解决土地问题。革命虽受广州暴动的失败的打击进于长期的鏖战，我们本身的力量比敌人弱，受着大的打击，但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现在的革命是上升的，而不是低落。如果不上升，怎么我们可以说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呢！

总之，革命形势的答案应当是如此：

（一）广州暴动开始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的阶段。

（二）革命客观上是走向高潮，是向上涨而非低落，亦非停滞。

（三）现在革命的高潮还没有，但是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

V．党的任务

这里我们应当讲到目前我们的任务：

（一）我们要准备总暴动方针，但这并不是说“明天”

我们就要暴动了。这一个意见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我们就已经这样指明了。至于如布哈林同志所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们要决定，今年秋天的时候，要举行总暴动。”这是很明显的，这一次会不能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

大家都同意于这样的一个意见：现在在大城市之中，虽然群众的运动又有重兴的现象，但这仅仅是刚才开始，没有把握说它能“即刻”成为“高潮”的前途。这正是因为中国的不平衡的特点。这一个特点，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中国经济状态的表现，中国经济的状态，只以金融的情形来看就很明显，没有一张纸币能走遍全国，各自有各自的地域。不仅如此，就是现洋也是不划一的。上海的“中山”币曾经受到这种待遇——比“袁世凯”更贱些。因为在汇兑上的关系，外路客商在钱庄银行调款子的时候，他们不信任“中山”银币。再如果我们拿一块大洋从上海带到满洲或北京换成铜元，又从北京带到武汉兑换银币，再从武汉到别的地方轮流转辗的兑换，换到后来在我们手里的就剩得不多了，或者没有什么了。这一块钱就一无价值的消失了。这种经济发展程度的现象很可以给中国“不平衡”的状态以确当的解释。资本主义是能在不平衡的情形之中发展的，因此也没有谁说过世界革命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可以同时起来。中国的经济不平衡的情形，好如整个的欧洲，譬如从比利时到巴黎，比之于由从北方到上海或到四川要容易得多。这种条件各不相同的状况，不能如此规定：“今年秋收时全国都要举行总暴动”。这种话中国同志是没有这种意见，是不是有哪一个俄国同志说的尚不知道。

第二，我们要说到我们的中心工作问题。在说这一个问题

之前，要先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既不能说秋收时一定要暴动，也不能说秋收时一定不要暴动。可以肯定的说的是不可规定秋收时全国都要总暴动，但在不平衡的状态之下，或许某几县亦许要暴动的。我们过去已经上了当，如关于在策略上说了暂时不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于是就不去帮助农民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并且还去阻止了这种斗争，因为国际并没有规定没收小地主的问题。可是到国际代表到武汉的时候，又说这是不对的。所以秋收暴动的主张，不可以的仍依前例的解释起来，那就会变成了如果湖南某县农民今年秋收时要暴动（游击抗租），那么，那地的同志亦许会对农民说："不许暴动，因为这是国际的命令，我亲耳听见布哈林说的。"这也可以拿来解释总暴动方针这个问题，就是不是说决定总暴动方针这个问题即是直接暴动，同样也不是说既不是直接暴动，就一动也不动。总之，我们在新的高潮之前，必须以准备暴动为总方针。

中心工作，是争取群众。八七会议之前我们是背向着群众的，八七会议之后才转到群众一方面来。现在我们应该要更进一步，要深入到群众之中去。

在工人群众之中，我们要用新的方式去团聚组织群众。在以前，武汉刚反动之后，上海四月事件之后，我们是用上总及湖北总工会的名义，作为直接的反抗运动，在那时候是对的。在那时候，工人在那时候知道上海总工会是我们——共产党，知道湖北总工会，知道向忠发——共产党员。他们要我们的答复；我们答复他们"要反抗"，在上海应在总工会旗帜之下。现在，这个时期过去了。现在，因为过去工作的关系，再拿这样的名义为号召，就等于用共产党的名义，因此党与群众组织没有区分。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固然我们不是要取消上总

或其他的名义与组织，但在另一方面，工作方法上，再不能用什么特派员、组织员等，而要组织新的各个工厂支部，在这些新的基础之上，从下面建设起新的真正的是群众的组织——上海总工会、湖北总工会……等等。要想法子于很小的微细的事情上，为了打人，为要开水吃，为扣了一毛钱的工资，为了……工人群众最切身的问题，去引起群众到争斗里面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对国民党的政权。从最日常的争斗之中领导他们到政治的经济的大的斗争之中来，要求自由与组织的公开，以此种种团聚工人群众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来能争取获得广大的群众，这是走向总暴动、准备总暴动的最主要的工作。

对于农民群众，中央对北方局的文件中，曾经指明过。不可以抗租与抗税相对立，如北方红枪会与天门会之中有一部分是主张租是抗不得而只抗税，更右的主张是抗苛捐杂税而不抗正税。我们对这些运动是应当赞助的，决不应当说这不是土地革命我们便不来。而应当去领导他们到土地革命方面来，应当使这些群众明确的知道我们的口号。主要的，我们在目前革命的性质上讲，是领导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可是我们同时要组织雇农、贫农，不可以预先恐惧及怕得罪了富农，不然将要如像武汉时代，以及以前与国民党合作时代的同样的错误——阻止群众——政策。可是我们也不是向另一极端。我们要指出农民的平分一切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更明确些说是理想的资本主义的。我们要赞助游民、失业的农民的无情的、彻底的、暴烈的破坏封建的斗争，但是我们不可以变成了它。我们要仍旧是我们。如其在政治上允许讲这样一个名词——“平产党”，那么我们可以说“共产党”可以与“平产党”联合，可是不是要我们成了他们的尾巴，而是要我们成为

他们的领导。我们不摇动我们对目前革命最主要的目标——地主阶级，封建制度——的视线。至于土地问题，在上面我们已经很明显的讲出来了。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因此他在湖南反对八七会议的决定。最近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通告上又说到这一点（土地党纲草案中，也说到了这一点，不过对这草案，我没有功夫详细写，我所早已有的意见，这次大会上要决定）。我不同意而将它修改了。在我们的党里面，对于土地问题的见解，一切的倾向都有——左倾的或是右倾的，可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已有了几个苏维埃区域，是不是可以说已是革命的高涨呢？是不是就能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呢？不是的也不能的，也还不是全国政权的建设。并且我们应该指出来，它们不能单独的保存，它们必须要向外发展。在不可能的状态的时候，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引起周围的其他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的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即“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城市的工人阶级要在这些争斗中，用自己的领导力量，运用这些机会来建设红军，助我们来完成革命——领导农民完成土地革命。这些红军应该使她发展，或者在不得已的时候就向别处移动。这许多，在地方工作中采用了中央的政策或许仍然是会失败的。况且海陆丰是没有照中央指示，于是来批评中央这一点

没有具体写或是那一点没有具体写。是的！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的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有他自己的认识。我们在农民运动中，最低限度都要使各省都有广大的宣传。这当然不能说，我们要每县、每乡都派人去领导，然后能说是我们的领导，而且这所派的人一定要姓共名产的去指导，才能说是我们的领导。这当然不是的。而是我们的政治宣传，能够引起农民，作为他们的思想。总之，我们在土地革命之中，告诉农民土地革命如何才能达社会主义。我们要去参加一切甚至和平的农民的斗争，去领导他们，但是要在运动中去批评指导他们，不要跟了农民的尾巴跑。不然，这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是农民的意识了。

反帝国主义——在新式的方式之下，又重新的抬起头来。小资产阶级已经有些起来，他们正在脱离国民党的领导。在这次济南事件之中，反日运动委员会里很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是禁止这种运动的，他们下训令说要依据“国府”五月八日的通令，停止反日运动。在这样的反日运动之中，我们应当参加而去领导他们。中央已有通告，现在当然不是如五卅的情形了，没有那样广大的群众的联合战线。然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应当有更大的作用。再则，如果那时是反帝国主义作为导线以引起高潮，现在则具体的可以从反对军阀而直接引起，这是劳工的主力之大。中国尚没有过直接的真正主张反军阀的运动，除了“二七”。但那是工人运动的开始，偏于经济的要求，而没有领导农民。一直到上海的三次暴动尚是如此，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反对北洋军阀而已。现在则将与过去的反军阀的形式不同了。以前的反军阀只是用爱国的口号，因为军阀是帝国主义

的走狗而反对他。现在将不一定是以爱国的口号来引起反军阀，而直接对军阀本身的制度了。布哈林同志在昨天的报告中曾说到将来如何发起高潮的问题。我想也是一种方式，而且是新的方式。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斗争，我们应该去领导，并且我们要去直接的反对军阀，就农民的抗捐、抗税，军队为了欠饷而哗变，小商人的抗捐等等。许多的矛盾在革命之中暴露出来，战争、罢工、封锁，使经济恐慌或者是混战。小商人、兵士、农民，反对军阀，一直到要与他们争政权，这是高潮的火药线，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在党的组织上——要使党在思想上、策略上，有很明显的、很确定的、布尔什维克的、切于事实的对革命的估量。对于各种任务的决定，工农的日常斗争、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等等，要知道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此其一。要知道客观上，革命是在往上升（如果你们不愿意说高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此其二。要知道革命力量还很大，高潮还没有，不能过早的大发动，应当准备，认真的准备，认真的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备快到来的新的高潮不使我们陷于无准备的状态之中，此其三。再者，要知道现在已经有许多地方，农民的革命区域已经建立，工人阶级对这现象——高潮的预兆，全国苏维埃的雏形——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以至一省至几省之胜利之政策，此其四。这四点是我们的总方针。总之，新的阶段与客观革命上升的形势，使我们要急速争取群众，以一切准备总暴动。一切的工作组织方式，不能和前相同。

就是妇女问题，现在也不能如以前一样，只是弄些妇女协会，打打通电。现在女工和童工成为很大的问题。在殖民地用刮削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是最利害的手段。妇女问

题现在不是讲笑话，而是如何去组织这些女工，如何去领导她们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得到她们的解放。要能够真正的做工作。

在大会之前还有许多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绝对的民主主义……等等各个的错误，这是要用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来解决它们。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使组织方面的问题，不要使它偏激的向于一个任何方面。

组织上的技术工作、秘密工作，也成为我们的严重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工作“美国主义化”，很精密，不要如过去一样忙得起居不安，但是工作上仍不能按时候，没有秩序。

我们今后的工作：

（一）在政治的路线上，要有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二）在组织上要有“美国主义化”的秩序，迅速整齐的精神。

（三）从小小的技术工作起一直到整个的政策问题，都要好好的做。

最后我有一个声明，就是我的报告，不能占更多时间，马日事变，武汉时期，未重复说及，因我的书面报告已有。对这些问题，本应个个讨论，为节省时间起见，只好写封书面报告，在特种委员中讨论。对过去事件，不要花很多时间，多注意革命形势，如何去准备暴动，去争取群众，怎样组织工人武装，领导农民斗争，领导工人斗争。关于过去的事，或者说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作相比。

（国焘：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秋白：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

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新提加，是法语 Syndicat 的音译，即联合组织之意。
〔2〕即蔡和森。
〔3〕即陈延年、张太雷。
〔4〕即周恩来。
〔5〕即罗亦农。

PDG

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及任务*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蔡　和　森

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及任务。关于目前阶段估量，在国际代表同志报告里，在秋白[1]同志报告里，在国焘[2]同志报告里以及忠发[3]同志报告里，大概有三种不同的估量的样子。现在要把问题首先弄清楚。我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要问什么是革命高潮？革命高潮有什么条件？第二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我以为革命高潮有四个条件：第一，有全国普遍性，比如五卅运动，五卅在上海爆发，即影响到长江流域，而两湖、四川、珠江流域，而广州、香港及北方各省，而京津、满洲里，所以五卅运动是革命高潮，因它是全国的普遍性的，非局部的。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有相当持久性，就是说不是运动今天起来，明天就会打倒，或者上星期起来，下星期就打倒。像五卅运动，坚持三月之久，不是三天或一礼拜的运动，以地域来说，非是这里起来，那里被打倒，非是某一地的单独运动，比如五卅在上海起来，香港即发生总罢工，天津组织总工会，一直影响到满洲里，在长江流域运动更加普遍，运动爆发非三两天的事，持久

* 这是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的第一部分。

到三月之久，非是上海打倒，香港起来，非是香港打倒，北方起来，而是有相当的连续和持久性，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二个条件。第三，运动发动于大的城市，而且是城市工人的领导，非是单独爆发于乡村，比如五卅时上海起来，于是广州、香港、武汉、青岛以至天津，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最稠密人口的城市亦起来，不仅有乡村运动，主要的城市成为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三个条件。第四，我们力量在阶级关系上可以对敌人维持优势，使敌人不得不取相当让步，比如，五卅运动是取得相当胜利，虽然帝国主义有大炮，有陆战队，可以继续屠杀，但是我们广大群众，有广大群众的力量，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不能进攻我们。对敌维持优势，这是革命高潮第四个条件（同时又可引俄国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二月与十月以至法国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诸大革命来证明其具有这些条件）。现在拿上面四个条件有全国普遍性，有相当持久性，运动发动于主要大城市和我们力量对敌维持优势，来观察现在中国局势（注意：这种仅是说拿上面条件来观察现在的局势，而不是要相机的用这些条件去推测将来的高潮），是不是革命高潮呢？这是说是不是存在有上面的形势呢？即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近各处膨胀的农民运动而论，是不是革命高潮呢？这显然还不是的。第一，没有全国普遍性。如果广州暴动胜利，那一定是全国性，那一定南方各省农民运动更强大有力，那一定有五卅的形势，那一定有北伐的形势。第二，没有持久性，广州暴动胜利只维持三天之久，没有如五卅运动维持三月，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第三，没有各大城市发动，虽然广州是大城市，但只有广州，无别的城市之继起，无别的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城市起来。第四，在势力与关系上，我们没有对着敌人维持相当优势，可迫得敌人失败或让

步。广州失败后，全国反动力量一致团结向我们进攻，虽然这次暴动取得相当结果，是不可否认的。从上面所说来看，“八七”以来不能说是一直高潮，只是旧的高潮趋于结束的过程；另一方面看，既不是高潮，是不是低潮呢？从武汉政变和国民党决裂到现在，是不是革命潮流低落呢？这里首先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是低潮？看中央十一月会议决议说革命低潮的条件，在于（1）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2）改良政策之得以实现，就是说统治阶级、南京国民党新军阀的政府能解决社会矛盾、阶级冲突；（3）革命群众的分裂和失败。就是说群众失败，工人离开，农民离开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如已离开我们，要它再起来，是困难事情，有些条件是革命潮流低落的表现。在秋白同志报告中对低潮条件中曾指出：

（1）广州暴动失败非全国失败，非最后一次失败；

（2）广州暴动之后，不但农民未离开，工人未离开我们，且相当的跑到我们这边来；

（3）广州暴动取得新的军事经验；

（4）广州暴动失败后，非仅全未脱离暂时经济恐慌，且长期经济恐慌，不能用改良方法来和缓革命。

上面所指的不是什么新的，与中央十一月会议所指低潮三个条件，内容无大变化，拿这些条件来看现在状况，是不是革命低潮呢？据中央政治问题报告和秋白的分析结论说：仍是“一直高涨”，这种分析，我觉得不妥，是没有明确的观点。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和秋白同志有这种分析呢？这种分析是从不间断革命的理论来的，什么是不间断革命论和其对党的影响以后再说，其实十一月会议所指出的三个条件和秋白所指出的四个条件，只能用以论证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和高潮有再来之可能而不能用以论证现在是一直高涨，从这种分析论证革命不会停止

且继续前进，用这种分析去反对取消派的观点是对的，这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假使以此为一直高涨之论证，是非科学的，非列宁主义的。我以为应如国际代表同志所说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这样分析，是非常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对于革命潮流估计大意是如此。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即瞿秋白。
〔2〕即张国焘。
〔3〕即向忠发。

PDG

现在革命形势的估计*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李 立 三

关于现在革命形势高涨或低落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的优点弱点及其矛盾的现象与发展的前途，加以详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得一个明确的观念。

现在先分析反动方面。反动势力是不是比以前加强了!?的确加强了。他的内部是不是有矛盾？他有很大的矛盾，并且这种根本的矛盾正在往前发展、加剧。

反动势力的组织者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们首先要分析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正在互相谅解，企图瓜分中国，如日本之在北方、英国之在广东，所以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加紧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他这种加紧对殖民地的压迫，正是他的将就灭亡的表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得一个相当的稳定，正是因为他的稳定，更加紧了生产过剩与市场缩小的矛盾，更加紧了互相间争夺市场的矛盾，更加紧了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更加紧了本国阶级对抗的矛盾。帝国主义现在虽然看到自己的危机了，想用互相妥协——瓜分的办法来避免互相间的冲突，但是这是在他的经济的基础上始终不可能。帝

* 这是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的第二部分。

国主义这些根本的矛盾，到了中国更加严重爆发出来，所以一方面，可以说对中国的压迫更加强了，另一方面，却是帝国主义的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从这样的结论，或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在中国爆发，完成冲破世界帝国主义的环锁。还要注意的，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消长，与革命的结合有密切关系的。武汉收回英租界，为什么帝国主义不敢干涉，因为革命群众的阶级结合正在发展，革命正在高涨。为什么到了南京，帝国主义便敢开炮，因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已在开始叛变，革命势力已在减弱。所以假定现在革命群众的阶级结合，又开始了新的上升，那末帝国主义的力量将要开始下降。

关于豪绅资产阶级的暂时联合，尤其是在对付工农群众的时候，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许多同志举了许多例来证明，我不必多说。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他内部的危机，在他的内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很大的矛盾，无法消灭的矛盾。我的观察北伐达到北京便是他们的结合达到了最高点，过此后便要开始他们的崩溃了。现在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想迁都南京、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来欺骗群众，掩盖自己的矛盾，但决没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南京政府的倒台必不远了。

再说到革命势力方面，的确有一个新的阶级团结的发展，另一方面，的确还有很多弱点。这个新的团结中，第一个力量就是工人阶级，他是革命势力中的领导者，他有许多弱点，同时他有许多新的发展。在广州暴动后，广东的工人阶级表现得更明显，他的政治的认识更提高了，他的阶级的觉悟更加深了，对黄色工会的影响更离开了。尤其在反日运动复兴以后，各处的工人斗争，又渐次复活起来。农民斗争的深入与扩大，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的加强，更是无须多举例证，便可十分明了的事实。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

向，以为这是中国几百年来便有的不断的农民暴动，这就说这些农民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的革命运动没有甚么大的关系。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最近兵士已走上了自觉的革命道路，并不如前此的原始的兵变运动。第一个原因是土地革命的深入影响到了兵士群众；第二是许多工人的投入到兵士中去；第三是士兵生活的更加痛苦。这是苏维埃革命阶段中的新的力量。同时苛捐杂税的剥削使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反动的势力。这样，新的团结实有日渐发展的可能。

再看革命势力内部的弱点：第一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削弱。这是由于：（一）白色恐怖的厉害；（二）资本进攻，失业恐慌的加紧；（三）过去职工运动的策略及工作方法的错误，如命令主义、强迫罢工、个人恐怖等，这是脱离群众工人运动减弱的主要原因。第二是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第三党的组织削弱。但是这些弱点就现在的趋势看来，不是往前发展，而是有一天一天减轻的可能。我们分析革命的形势，不单是要注意已经摆在我们目前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他的发展的趋势。就现在的形势很明显的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革命走上高潮的趋势，就是很明显的在前进在上升，如果只看一方面的形势，必然要走到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所以现在革命形势，在两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他超过他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弧线。

革命不平衡的发展，我同意和森[1]的意见。不平衡发展的原因，是有他的社会经济的背景，政权的不统一。因此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可能的前途，这是我们

万不能忽视的。

说到党的目前任务。新的革命高潮的来到，就是要积极准备，实现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在目前准备中的任务，就是要夺取成千成万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口号的周围。

怎样夺取群众的问题，许多同志都没有说到。国焘[2]同志的说话更只有消极的批评，没有积极的主张，找不出他的策略路线在那里，和森也很滑头的不说出来。但在国焘的消极批评的反面可以找出来他很有立宪运动、少数运动的趋向，他说在反帝运动上就不应同时去打击国民党，方能抓住少数群众。同志们，少数运动是在反动的改良得到多数时的策略。我们看中国黄色职工会有没有力量？是不是占了多数？所以少数运动是放弃群众的政策；立宪主义更是革命的取消主义，他的大前提是中国革命已经死亡了，当然是绝对的错误。再有另一方面的倾向就是先锋主义，他不管群众的力量，也不管群众要动否，我们动就是了，这必然要得到脱离群众的结果。我的意见一定要用非法的运动方式去取得群众，去发展群众组织，去发展群众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要极力暴露国民党的反动，使群众更深切的了解，只有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即蔡和森。

〔2〕即张国焘。

现时争斗形势的估量*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王 若 飞

列宁主义的最利害的地方就在以辩证的观点（动的观点）来观察革命的发展。阶级争斗愈激烈，阶级分化愈明显。昨天我们还可同资产阶级联合革命，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反革命了。昨天联合战线的策略，今天便变成不适合用了。假使今天仍执着昨天的策略，便会陷入机会主义的错误。列宁主义的观点就是在要求我们在革命发展到某一阶段时能抓住这个时期的特征，决定出适合于这时代特征的政策。中国党最大的缺点就在革命转变时期认识不清楚，找不出正确的政策。

固然八七会议以来，已经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阶段已经到“工农苏维埃”革命阶段，已经要我们采取“武装暴动”策略，但是要如何才能实现武装暴动策略呢？就需要我们对于现时争斗的形势，对于敌人新的结合与压迫情形，对于革命群众的革命情绪与组织力量，对于党与群众的关系均须正确的观察与估计，才能使目前工作路线走上正确道上。

“八七”以来中央对于现时争斗形势的估量是不正确的，中央指出现在中国所包含的五大矛盾（1.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

---

* 这是王若飞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的第二部分。

盾；2. 帝国主义与中国之矛盾；3. 豪绅军阀之间的矛盾；4. 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的矛盾；5. 农民和地主、工人与资本的根本矛盾），一天天的增加和发展，我们是不否认的。但若认为这就是革命一直高涨的形势，即刻暴动的形势，只赤裸裸的提出暴动口号，而对于敌人新的结合与压迫情形，对革命群众的革命情绪与组织力量，对于党与群众的关系，没有详细计算清楚，对于如何准备和组织武装暴动的方法，没有明白的指出，这是在实际工作要发生危险和困难的。现时争斗的形势是怎样呢？

1. 资产阶级完全离开革命后和豪绅地主、帝国主义有新的结合（如K. M. T. 反共后各反动派之联合，上海中外资本家有许多联合的事实），并找到许多新的压迫、进攻方法（如上海中外官厅联合压迫革命运动的方法较前更为亲密进步。豪绅地主在乡村的争斗中也得到许多新的压迫群众经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方法，从日本出兵山东问题已露出新的瓜分现象）。在反动势力中间自然包含着很大的矛盾，他们互相的冲突是非常激烈，但须知他们对革命势力的压迫是一致的，尤其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不容我们对于敌人的力量过于轻视（客观上我们过去几次革命的失败与现时大城市中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 城市群众的组织，尤其是工业中心的上海、汉口、天津等处在几次革命争斗的失败后，多半溃散了，甚至完全溃散了（如武汉三镇），一时没有恢复起来。

3. 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后，一切争斗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皆不适用了。

4. 新的武装暴动“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尚未普遍深

入群众，新的工作方法与新的组织形式正在创造中。

5. 在这革命转入新的阶段当中旧的政治上错误的影响（K. M. T. 的影响）及失败的影响，在群众观念当中尚未完全转变过来，旧的组织形式与旧的工作方法已经不适用，而新的又尚在创造中，于是表现党离开了群众，同时党在组织上也表现极大的削弱（斗争成暴动中组织之解体及干部之牺牲）。

6. 农村争斗虽然很发展，但城市工作不起来，失了城市的领导，是伏着很大的危险。

固然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指出敌人统治之摇动，这些事实，中央及各同志说得很多，用不着我再重复。不过在我们计算争斗形势的时候若果：

（1）忽视了敌人新的结合与新的压迫方法及一致反对革命势力的情形。

（2）忽视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尤其是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否坚强。

（3）忽视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党是否还能在群众中亲密的领导他们斗争。

（4）忽视了乡村争斗与城市的关系，忽视了一地方争斗与全国的关系，忽视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关系。

我们或只片面的看到敌人统治的摇动，或只看到群众有革命的要求，或只看到乡村争斗的发展，或只看到一地方争斗之急进，便认为全国革命潮流是一直高涨，可以即刻暴动，这是错的。上海工人有几句话很简单明了的表示出在革命转变时的群众心理，他们说：K. M. T. 死了，将来一定是 C. P. 的，现在不是动的时候。

在我上面的分析，绝不含有丝毫取消暴动政策的意味，并且我坚决的认定，在中国不会有反动势力长期的稳定，新的浪

潮之高潮一定是很快的，然而这新的浪潮之高潮是需要我们从争斗中去达到。假使我们在决定目前工作路线时，忽视了客观上种种实际现象，虽想这一武装暴动的前途是没有办法的去实现的。

江苏省委过去执行八七会议的政策发生了许多盲动主义倾向，从乡村的争斗与城市的工作中，碰着了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一个很努力的区委同志说，现时工作做不起来，中央主观的鞭打说省委不好，省委主观的鞭打说支部负责同志不好，支部同志说现在群众不革命了（如组织工会不肯去，组织示威不肯来）。在这实际群众工作的困难中，迫起我们对于现在争斗的形势要重新估计一番，要适合现在争斗的实况，找出新的工作方法。于是在今年二月间省委改组时便提出了"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当时我的意见从历史上争斗的形势来比较（现在不是如五卅运动、北伐时期革命高涨状况），从敌人联合进攻的事实，从长江交通恢复后经济的转机，从城市群众组织的溃散与党的削弱及脱离群众现象，从乡村争斗之脱离城市、暴起暴落情形，证明现时革命性质虽深入了，转入了工农苏维埃革命的阶段，但从历史上来比较，现在一般的革命是现象，革命是低落了。我们的前途要"武装暴动"，而目前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创造新的工作方法与新的组织形式，去接近群众，去组织群众，去团聚群众于党的口号周围，才能走到暴动之路。当时别的同志说，敌人的进攻（资本进攻）与我们许多的失败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绝不能简单从历史上来比较说现在革命潮流是简单的低落。要注意现在革命内容（工农革命）是改变了，所以争斗形势当然不同，而且群众争斗的要求仍是客观上存在着的。若说低落，恐生不好的影响，于是有的主张说"消沉"，或"转变的消沉"，或"转变的低落"，或

“潜伏的发展”，但没有一个人说是高涨的。对于目前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如何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组织形式，去接近群众、团结群众，才能走到暴动之路。我们接受中央致江苏同志书的一句名言：“上海工作方针应该是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当时中央以为我们说革命潮流低落，恐给群众以不好影响，说革命潮流或者要“取消了暴动政策”，便分批的召集上海负责同志谈话，坚决的指导出现在争斗形势是一直高涨。最后，我们不愿再继续讨论此问题，很切实的跑到群众中去找下级干部谈话，找支部同志谈话，找简单工人谈话，努力去了解他们对于现状的认识，努力追求工作做不起来的原因，努力去创造新的工作方法与新的组织形式，及至于中央三十六号通告出来后（三月六日）说：“上海同志怀疑革命潮流高涨，因而主张采取保守政策”。我们绝对否认省委政策有采取保守政策的倾向和事实，这是可从我们实际工作中去检查的。当中央代表到省委报告时，我的结论还是说：现在革命的阶段已经到了苏维埃革命阶段，暴动政策是对的，但是现在斗争的形势，绝不能说是高涨，只能说是革命是向前进展，敌人的统治固然不稳固，乡村的争斗固然是在发展，然而若是城市的工作不起来，兵士的工作未充分，党与群众的联系未恢复，是没有方法实现暴动的。

在此次大会中听见布哈林同志的分析“革命潮流低落与高涨问题”，是比我更科学更恰当。他的意见现在旧的革命浪潮已经过去，革命转入新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但是现在并没有全国普遍的革命高潮，敌我双方均各自在积聚力量，准备更厉害的争斗。敌人统治虽不稳定，并未是最后崩坏时期。革命势力虽遭受许多的失败，□□□不能起来新的高潮之征兆（广州暴动），已经发现现在这个时期可称为中间时期。新的浪潮之高

潮是要我们切实从夺取群众工作中去争取的。国际代表同志不简单的说现在革命是自然的向上涨，而指出“争取”的作用非常重要的。立三[1]同志说：“现在中间时期已完，已经开始向上的路线”。这还不是正确的解释。

总之，现在革命的内容，已是进入新的苏维埃革命阶段，然而现在争斗的不是自然的向上涨，而是要争斗去向上涨，我们的中心政治口号是工农苏维埃政权，我们的中心策略口号是“武装暴动”，在现在走到武装暴动的中心工作口号是“向着群众”、“夺取群众”。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即李立三。

PDG

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　恩　来

我要说的话大概是同志们说过了的问题，或者是说了后在群众中发生了误会或反对的影响，关于这些我都要说出来。因为大会讨论的目的，为的要使同志回去不再发生错误或误会，在工作中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原则是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得到明白的解答，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我们是要使大会得到好的结果，群众都了解正确的路线。这就是我今天要说话的原则和精神。几天来常常听到同志出来声明，这就是证明说了话后发生误会，或其他影响，我所以要根据大会讨论的精神和原则将各个问题说明，可是时间短促，只得简单一点罢。

我说话的程序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是革命的性质；

第二是革命的形势；

第三是机会主义的教训；

第四是几个必须解答的问题；

第五是党的任务。

过去我们对于革命性质，大概是没有那个弄得清楚。在开

始，我们就听到两次革命的理论。这当然是由于不懂得革命转变而产生下来的。就是在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这样，自然不能把革命性质弄得清楚。所以当时有的是说社会革命，有的是说工农民主革命，可是这些名词，也只限于指导机关谈谈，群众是从没有得到讨论和了解。后来革命的进展，一天一天的扩大，群众前进的精神益发增长，革命的阶段深入到土地革命。因此，革命的转变时期到来。一般人的认识，对于革命转变认识又都缺乏，所以就把土地革命认为社会革命；占领工厂，也认为社会革命。这种观念的结果，就产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一切超过革命阶段的观点。当时是群众既然不明白，党的决议也模糊得很，甚么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次大会一定要好好的弄清楚，一定要使大家都得到一个很正确的解答。

"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党的解释，是用以说明由民主革命可以进展到社会革命的意义。当时除了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外，其余中国同志没有一个是有固定的认识。所以我在此特别否认和森[1]同志扩大的说话，将甚么盲动、暴动一切不正当的事件都扯到上面。我以为在我们的辩论中，不应该有这样的逻辑。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这问题替我们完全解决了。把罗米那兹的错误完全指出来。可是我们在那时是不懂得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对法国的大革命说的，当时是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领导的革命，较之中国的阶级关系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地民主革命当然不同。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也拿这个"不断革命论"来分析当时革命性质，在他的本身上就犯了超过阶段和忽视农民作用的错误。于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

给托洛茨基应用得犯了历史的错误。在另一方面，所谓不断革命论，是一个革命转变的理论，这个理论，列宁把他应用到具体的方法上（工农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去了，这样一来，不断论也就成了一个不必要的革命术语。固然，国际将罗米那兹应用到中国革命的不断论取消，这是很对的。因为一方面很容易与托洛茨基的错误相混，另一方面，也为了这不仅成了不必要的东西，而且没有具体说明目前革命阶段上的特质。可是这些，我们在过去是不懂得的。我们并不是像这样的来应用这个名词——只是用以说明中国革命可以生长到社会革命去，但是不是现在就生长到了社会革命，这当是另一个问题。和森拿许多事情都放在上面，我却不同意。我以为国际将这名词虽然取消了，可是中国革命可以生长到社会革命的意义是完全承认的。

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联系。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虽然是两件事，但完全是紧相联系的。在土地革命中含有反帝国主义的经济性，在城市工人日常斗争中也含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在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整个农民斗争中都含有反帝国主义性质，因为这些都是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代替的统治者。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反帝国主义没有他的直接行动。反帝国主义运动，我们要看另一方面，就是说反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也有这样主观要求，不仅限于无产阶级的。但资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前途是妥协的，因为他们不如是就不能夺得统治权，不如是就不能不受无产阶级威迫和压迫的危险。所以他的前途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却完全不同，他是一直贯彻到底的。惟此，有了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有了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也一定没有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当

然，在这里很显明的，现在的反帝国主义直接行动不会像“五卅”，还有甚么几个阶级的联盟，而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职员和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反帝行动。这就是说明民族运动是要在阶级斗争中才特别表演出来。因此，我们在这次大会不能把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分割起来，更不能像“八七”前甚至“八七”后这样弄不清楚。

现在我们是很明显的知道，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可是与从前所谓工农革命有没有冲突的呢？这是没有的，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个东西。所以工农革命的口号依然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很知道革命已深入到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广东的暴动已成这阶段的开始。但这就是工农革命实质的意义。

第二部分要说到革命形势。这里首先要说明统治阶级结合的加强，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在结合的另一方面发现了矛盾的加大。过去中央对敌方的估计，对这一点是忽略的，因此未尝不偏重乐观一点，这当然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说吧。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是显然的加强，例如，日本对山东问题、东三省问题，都采积极的军事行动。英美帝国主义也正在设法如何来共同染指。这证明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快要实现的样子。当然我们不仅看到这一点，我们还看到帝国主义在分割殖民地的问题中，在争夺太平洋的权利中，在帝国主义相互间许多经济的、政治的矛盾中，都充分表现世界大战成熟期的日相紧迫。关于这一点，我们对国际形势，可惜搜集材料太少，我们还要请求布哈林同志详细的告诉我们。然而我们仅仅拿这点也可说明帝国主义的结合向中国进攻，无论如何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不会得到稳定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的破坏和军阀的混战，使帝国主义没有方法来巩固自己统治的

基础。第二，豪绅资产阶级从蒋介石叛变后，的确得到了逐渐的胜利。同时，他们的阶级觉悟，的确也跟着斗争的过程而增强。但这里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他们的觉悟是自“五卅”一直到“北伐”为我们所教训得来的。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是不是可以稳定呢？当然他们在那儿天天这样梦想，但这不过仅仅是梦想。军阀的割据是不会避免的，军阀的混战以及消长也是不会避免的。李宗仁可以自便的扣留程潜解职，蒋系桂系的相互仇视和监制，以及蒋阎[2]中间的问题，蒋冯中间的问题，冯阎中间的问题，都由酝酿而进到爆发的程度。我们可以断言形式统一中国之时，就是新军阀开始大战之日。况且他们各自无限制的扩充军队，财政早要破产，这些都使他们只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工农，更进于无数倍而已。第三，是资本家的进攻与白色恐怖的加剧。资本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地主增加地租剥削农民，并且都以极残酷的白色恐怖做压迫的唯一手段，这当然是事实。但这里已证明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了。自然我们不否认他们是有改良倾向，譬如浙江政府的减租办法，较之武汉政府的减租政纲，确也有不同，他们确有企图将农民的斗争情绪和缓下去。可是做不做得到呢？是不可能的。因为改良办法是要具备条件的。我们再说到浙江罢，他们为了农民斗争，决定减租，但地主不能执行，这就是地主与资产阶级中间产生冲突。而资产阶级又向农民增加苛捐杂税，这都是改良政策不能实现的原因。他们打到北京以后，也许还要加劲的谈谈改良政策，我们自然不可只是说他们不可能就罢了。也许蒋介石主张党权，冯玉祥与桂系要号召国民会议，借重民权来反对他，但是他们终于借着民权做做幌子，绝对不能谈到甚么改良的结果。在这里我们是要指出敌人在主观方面，的确有改良的倾向，而在客观方面，他们只有异途同归到资本

进攻、白色怖恐的一条路上去。

其次要说到革命形势的方面。我们对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应该一方面指出经过了严重的失败，另一方面我们要说明，从严重的失败当中进到了重新整理与结合。这里我们特别指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都失败了，都遭了很大的损失。但在这些失败当中，我们得到了甚么？我们的答复是得到了新的阶级结合。广州暴动苏维埃政权虽然是三两天失败了，虽然在此短期之间没有引起各地的响应，可是各地，如上海、天津、唐山、武汉等等的工人和各省的农民，都认识了这是他们反抗统治阶级的第一声，都承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宝贝，他们认为只有继续这种精神向着这条道路永远的前进。于是，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南中国的呼声已震动了北中国。敌人队伍里的兵士，大家也都承认他革命化了。至于说到直接行动的领导者——工人队伍，也接受了暴动的口号，虽然组织没有扩大，自觉的斗争却是增长的。不过我们领导的作用不够，所以在两个对垒的斗争中，发生黄色工会、兄弟团，这都是无适当的领导而产生的，这就是证明党的领导弱。不过也不是说一点领导也没有，上海、天津都渐渐的恢复起来，武汉、广州则更比较的好。本来在迭次失败之后，丧失了很多有组织的群众和有经验的干部，但工人阶级总是向前猛进的，他们已完全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他们快要在这口号下重新的结合起来。

游击战争得不到城市工人的领导。这是海陆丰失败最主要的原因。琼崖和湘南以及各地失败，都包含有这个主要原因的成分。因此，游击战争充分的表现农民意识，到处烧毁城市，直接损害工人或手工业者，这是工农的矛盾。尤其忽略了将游击战斗变成为有组织的红军，这完全为一种农民意识所支配着。

广大的兵士、土匪、流氓尚握在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完全失掉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他们做了反革命的工具，他们在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指使下分途来反对我们。这种千万的群众我们将怎样夺取过来？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做到的任务，而更是我们目前所必要做到的任务。

小资产阶级，我们的工作也太缺乏了。他们对统治阶级固然不愿意，但是对共产党也非常怀疑，他们还只是相信他们的总理。他们的动摇与中立，也就是证明我们的领导过于薄弱了。

党的改组是革命势力重新结合的一个总表现，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自然，目前尚谈不到健全，许多不好的分子出去，新的工农分子进来，在工作上经验都不能说充分的满足，但也只可以说薄弱，而不能说削弱，虽然是新的基础尚未巩固，并不由旧的基础而减削啦。

总结我们的分析，要说到革命的高涨与低落了。从敌人一致进攻我们得到胜利，和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来看，当然我们不能说是革命的高潮。同志们常有把高涨与高潮的分别说了又说，我以为是用不着的，这种字义的抽象分别，我想工农是不会容易明白的。其实高涨也罢，高潮也罢，我们总是可以认为现在不像“五卅”或“北伐”时代那样的高潮或高涨。自然，我们不能不认清敌人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危机——世界大战，军阀混战，经济政治无法稳定，改良政策的不能实行，我们更不能不承认革命的重新结合，继续前进，的确不是甚低落、停顿、消沉或消息，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是向高涨或高潮方面的前进，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深信无疑的。

附带的要说到上海的讨论情形。当时我们对低落与发展是有很多怀疑处的。上海同志有些话是对的。自然，王若飞同志到现在说的进了步，但当时的确有几点使中央不能不注意的。第一是区委联席会议讨论的经过，有些同志认为是低落的。第二是国焘[3]同志与我讨论革命形势问题，我说敌人队伍的兵变已带革命进展的历史意义。国焘同志说，这是老早有的事情了，我当时还说他是机会主义。这些都使中央不能不特别注意。因为如果认为革命低落，革命前途是要受很大影响的。在这里我也要承认中央有语病的。

第三部分是说到机会主义的教训。

首先要说明机会主义的来源，这问题同志说得很多，概括起来不外三点：第一在组织大半是知识分子"占领"指导机关，党的生活整个的不是群众化、无产阶级化，同志们说天子式、家长式的是对的；第二是没有党内的民主化，什么问题都不交下级党部讨论；因此又来了第三个原因了，就是工农群众不认识党是他们自己的，工会农会都是派人去组织的。其次是机会主义在政治生活上的表现，这一点布哈林同志说得很明白，例如党失了独立性、批评性，不明白革命阶级的转变，不能领导民众斗争，这些我都很同意的。最后是机会主义责任问题，很多同志不是说你多我少，就是说我们大家有的。我以为我们不应这样去说，因为我们是要从过去中得到教训，不是为□过去的责任。机会主义已经完全肃清了吗？未必。我以为我们对于革命的转变，到现在还没有弄得太清楚，就是说将来尚有机会主义发生的危险，因此我们对机会主义问题，主要是对将来革命进行的正确指导问题。

第四部分是几个必须解答的问题。

第一是上海谈判。中央是错误的，广东也有错误。广东把

左派提在前面，结果甘乃光他们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是广东对争领导权认识的模糊。

第二是上海暴动。这是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斗争，事前我们没有多的准备，我们是动摇的，将要失败的时候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联合进攻，我们是没有方法应付了，连枪支也不能收藏。

第三是马日事变。当时群众力量是可以征服敌人的，党不但不能领导群众进攻，而且禁止群众进攻，这是中央与省委都要负责的。

第四是南昌暴动。这是含有土地革命意义的反抗。当时我们的宣言是明显的提到土地革命，对张发奎问题我们只是一个连络他的政策问题，而不是迁就他的问题，他来不来是随便他，我们干不干是早决定了，虽然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可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领导。至于国焘同志说到可不可延期到广东去暴动，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不是撤换几个军官的问题而是全部都要受影响的问题。当然，要向湖南进展与土地革命的农民取联系，未尝不有理由，但这是另一问题。如果必须待到广东才发动，这就犯了配合均匀的毛病，这就根本要在南昌瓦解。南昌暴动自然有许多错误，中央的批评是对的。

第五是八七会议在党的根本上有伟大的改造意义，是从机会主义开始走向布尔塞维克的第一步，但对土地问题没有弄清楚。秋白[4]认为没收一切土地，李维汉通函湖南同志也是这样主张，我却怀疑动摇，莫衷一是，对国民党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和认识，土地问题不清楚可以说一直到现在。

第六是秋收暴动。是从新团结工农力量的一个正确的反抗，两湖广东都能发动，可是布置上是有很多错误的。

第七是广州暴动。是中国英勇无产阶级团结力量企图推翻

统治阶级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声，它含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他的政策应用是正确的，他告诉了中国革命群众一个新口号——苏维埃政权。他将中国革命推进到新阶段之口——苏维埃政权，自然他在组织上工作上是有很多错误，我们在决议上还要说明。

第八是宁汉战争和中央的十五号通告。当时提出“变一切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的口号，这是很正确的，但过分估量给了各级党部一些影响。

第九是十一月的扩大会议。这时对于暴动是弄清楚了，但政纲没有写出，对革命的转变没有弄清楚，尤其是没收工厂的口号，遗害无穷。

第十是暴动政策与盲动主义。暴动条件不清楚，就产生了军阀混战中的暴动必然论，这是很错误的。因此发生了湖北C. Y. 的盲动主义，各地无组织的游击战争，湖南的黑夜团，广东潮阳的三K团，海陆丰分配杀人的办法，以及所谓先锋主义。这是忽略了一切困难坚苦的组织工作，忽略了群众，看重了个人的英雄万能。在城市中发生了命令罢工，上海武汉都有这种实例。还有什么占领工厂的口号，武汉提得最高。我们不懂占领后怎样办呢？这表面上像夺取群众的口号，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口号，等于骗人。此外，红色恐怖，我们本来要领导的，但如果依赖个人恐怖，那就不对了。兵变运动也不是简单的逃兵偷枪问题，要能够摇动整个的部队或与游击战争、农民暴动、城市工作互相连锁。又有什么逃避观念，像广东湖南的军委大半放到乡村，这点对于城市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样一定不能将城市与乡村配合。

第十一是四省暴动计划。广东在当时是有割据的可能，我们对广东当然不能不有一个配合的计划，就是说不能不给他一

个割据的前途。我以为现在广东还有这个前途。湘鄂赣三省，在那时都有直接的形势。湘南、赣东各地革命的高涨，可以逐渐发展到一个割据的局面。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配合的计划，也就是说一个割据的前途。当时本应该计划京汉路和武汉的工作，使得趋于适合湘赣的计划，如果武汉和京汉路不能起来，是不可妄动的。可是当时太乐观了，没有布置一个中心工作。这是不对的，这是可以批评的，但不可为了这点就完全反对这种割据前途的计划。关于各省配合工作计划，中央当时也都说过了，不过没有国际指示那样详密罢了。

第十二是职工运动。我们在职工运动中间，是有一个短的沉闷时期，上海是有的，广东也是有的。在广东，店员为了裁减烧毁房子以后是沉闷的；在北方取消了十月暴动，也是有的。只有湖南不同一点。那时我们对职工运动都表示没有出路，实际上就是组织没有办法。现在要好一点了，各地同志都开始找到了新的办法，广东、浙江、武汉都逐渐重新的扩大，北方也是如此。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法时期了。

第十三是反帝运动与城市工作。反帝运动我们是减弱了，可是这与城市工作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城市中学生、小资产阶级都没有了，只有很少的店员，这于反帝运动自然是会减弱的。但将来我们对资产阶级并不是争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争群众的问题。然而争群众的具体方法怎样？我们都反对合法运动，但事实上只反对还不够。福建同志说国民党在福建也做反帝运动，将来第三党也要出来了。如果也做反帝国主义运动，我们对这些实际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答？

第十四是军事运动，夺取兵士运动。过去忽略了军队内部的斗争，同时我们更忽略了工农群众和党员军事化，游击战争

不能组织红军，大家都为了八七后反对军事投机，以为一说军事就是机会主义（罗亦农同志曾提过）。史达林同志说土地革命中由游击战争而建立红军是一个主要的任务，这一句如果是一个中国同志所说的，一定要被人骂为机会主义了。

第十五是夺取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我们要夺取广大群众，我们不能不夺取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是有危险性，他们惯于烧杀式土匪主义的。我们到底怎样去领导？怎样才能领导？

第十六是改造党的问题。我对这问题大概与王仲一同志同意，我们是吸收工农分子，同时我们反对形式主义，不教育工农分子。所谓党的改造，是带有教育性的，但教育是双方的，工农同志一定要在工作中学得经验和理论。我们知道各地都有形式主义，结果做不通，所以定期改组不能机械的说不对，有时是可以帮助的。此外我们又要反对绝对的民主制，因为目前是极严重的秘密时期。反对知识分子的观念是不对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简单的整个反对，另一方面也是要从训练中使他完全无产阶级化的。综括言之，我们要从各种斗争中训练同志，改造党，推进党。

第十七是党的政治教育。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很明确不易的遗训。我们如果没有理论，我们谈不到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同时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来夺取群众。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总没有离开报馆，这就证明理论的重要。这是我们的先决问题。

第十八是第三党问题。第三党在莫斯科也闹过一下子，在福建也有活动的消息，最近中央的来信更说得明显。我以为对第三党的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以下几个问题：对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对兵士、对农民的问题。他们是不是要另外一

个政党来领导？当然是不可以的。在此，我们对第三党前途的估计和我们自己应付的策略，是不能不有所预定的。

第五部分是党的主要任务。

第一，暴动的定义。暴动的定义在过去我们是没有弄清楚。布哈林同志等说：暴动是会有全国性的，但中国情形不同，各地农民零碎的暴动，到底叫为什么暴动呢？可不可以叫为大暴动、小暴动或农民暴动、工人暴动呢？我们的回答，一是全国性的总暴动，一是地方性的暴动，由地方性的暴动可以汇合成为总暴动。同时我们要明白革命行动与武装暴动两件事，一切革命的个别工作，都是革命行动，而武装暴动是夺取政权的策略。我们为什么要组织群众呢？目的就是要发动武装暴动以及推翻统治者。国际第九次扩大会已明显的指出来革命的中心任务，我们要怎样具体的准备武装暴动，推翻统治者，建立苏维埃，则我们要怎样夺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到来，我们要以城市工人领导农民的自发暴动以至于组织他与工人配起来，并且组织红军，这些都是我们目前一些中心任务，必须解决的任务。

第二，准备工作，主要是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同时要领导农民的斗争和暴动，并且要发展游击战争到最高度的组织性和可能的配合，在暴动成功区域要建立红军广大的组织。

第三，根据以上的分析，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加强与不能统一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都证明中国革命是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这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连。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的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

我的话要完了。我希望大会对每种危险性和不正确的观察，都要指明出来，我们要一致的为主要正确路线而奋斗。这样，我们回到中国才会产生好的结果。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二〇〇八年第三期刊印。

注　释

〔1〕即蔡和森。
〔2〕指阎锡山。
〔3〕即张国焘。
〔4〕即瞿秋白。

PDG

革命形势和目前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瞿　秋　白

现在军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尽他们的能力来压迫中国的革命，而革命的工农兵士依然是向革命的方面。固然反动势力很大，可是他们是不能稳定。但是我们是已被击破，他们“平行的”压迫我们。我们以马夜前后汪、蒋、张、黄[1]的冲突到南昌事变、秋收暴动后，他们又重新团结起来，因为在此时广州暴动的预兆他们已经知道是不可免的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知道得清楚，《字林西报》天天骂南京政府如何的不好，是在为俄国制造机会，或许他们估量我们过于大了一点，可是，这就是他们的明白。这种事实是明显的“两极化”，马克思曾经说出了这一现象，现在反革命的团结，正是因为革命危机暗示的结果，他们为了压迫革命而团结起来，可是决不能因此而消灭革命，稳定下来发展他的新的资本主义。有人说世界革命也是低落的，这实非正确，听布哈林报告听错了。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指出世界革命在第三个时期中有工人的右倾及激烈的斗争，依据客观环境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统治阶级的稳定是不可能，而反革命又有平行压迫革命

---

* 这是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第四个问题的一部分。

的形势，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革命的压迫，一面在争瓜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投降于帝国主义，要想用妥协方法取得让步，但他不能得到，资产阶级在地主豪绅的同盟之内，然而他成了尾大不掉的领袖，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冯[2]、奉、阎[3]、蒋、桂、湘、皖）一面压迫工农，一面互相争斗，武汉反动之后，革命聚集了一个时期的势力，党到了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其失败开始了长期激战的形势。"所以：

1. 客观上革命的"走向高潮"（所谓高涨）——布哈林报告中说的。

因为农民正在起来，并未离开革命，因为工人阶级正在团聚自己的阶级力量，因为兵士参加革命已开始——开始新的战术的可能。因为无产阶级的党正在巩固而与群众相联起来，革命是"走向高潮"的（废除高涨的名词，本来分成了四个名字，高涨、低落是表示动状的名词，高潮与停顿是表示静状的名词，很明显的各自有其意义，同志们既然弄不清楚，就不用这些名词，都是说错了），"我们是在很大的革命危机之中"……"我们在新的浪潮之前，我们在新的高潮的山脚下，许多征兆已经指出：我们是在走向高潮。……我们之前就要有新的巨大的全国的革命高潮，这是不能延迟多久的时间的"。（布哈林报告）革命是在上山坡的路上。

2. 但是高潮尚未来到，因为虽然瓜分进攻中国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开始裂痕，而仍有强力，豪绅资产阶级虽然斗争，但仍能保持重要城市的反动统治，因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小资产阶级兵士的反抗虽已开始动摇统治阶级，而尚未加入革命的整个的大队；因为农民虽然起来暴动、游击战争，而尚未能与城市或其他乡村配合，有大范围内之胜利；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虽然已经深入，然而尚未能爆发广大的斗争（经济

的、政治的、反帝国主义的、反军阀的），以成总暴动开始时的领导，新的高潮没有来，但是它快要到来。（国际决议）

3. 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与反动统治的不平衡是相关的，粤、苏、湘、鄂……等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条件不同。如果否认这一个事实，就不能了解列宁所解释世界革命之不平衡，及俄国革命的早成了，革命的发展将要先发动于某一总暴动条件的成熟之省份或区域，因为中国经济分成若干半独立区，因为军阀（国民党）的割据更加发展分小。

4. “割据”发展之前途。但是，不但客观要配合现在已有的苏维埃区域，使他尽可能发展而巩固胜利，同时要采取“红军的游击战争”，以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客观上的发展形势，而且要求配合大的城市中心（工人阶级争夺城市）与乡村，以领导地方暴动，而走向有全国意义的大高潮的一省或几省总暴动，这是有可能的。“暴动要开始在一省或几省之中，要转到别省或别几省，在一个地方要失败，在别个地方要胜利，要有长期的争斗，要日益推广起来，现在要以全力来准备暴动，暴动决不是一击而中的。”（布哈林报告）在不平衡的中国，是有可能在一省或数省中先有暴动成熟。

……

我们现在讲目前的任务：

（一）总暴动的方针：但是并非立即暴动，并且注意大城市的工作。

（二）一切组织政治任务集中于争取群众以准备暴动：

（1）广州暴动开始新的苏维埃阶段——苏维埃政权。

（2）取消“高潮”名词，用“走向高潮”。

（3）高潮虽然尚没有，但新的高潮是要来到，必须认真准备，勿使党陷于无准备状态之中。

（4）工人阶级应当用农民的力量、红军及地方苏维埃，积极发展其力量，配合其发展，领导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

高潮是快要来到，但要用斗争去决定。有的做农民运动的同志说，中国的革命犹如苗之生长，你不管他，他也要长，你加以灌溉，那么他长得快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他快些长，不可以阻其发展或放任，不然就会弄得糜烂不堪的。

（三）职工运动——争取群众在日常经济政治争斗的过程中，从下而上的切实建设群众的赤色工会，利用各种公开形式及秘密组织（如群众自己的兄弟会等）、党与工会的区分（无党群众之争取最重要点）、黄色的及政府工会机关的分别对待，注意赤色恐怖的运用法及其恶倾向，工人日常经济的政治的（反帝国主义民权的要求）争斗的发动与领导，以至于极小极小的斗争；失业工人问题要特别注意，失业工人中的工作日益重要起来，不但要组织他们于工会之中，要组织他们的群众去为“复业”而争斗；并且要尽可能的领导他们以群众示威，要求政府发给津贴、开办公共食堂，宣传失业工人有受社会供给的当然权利，这种示威的要求与运动，必然要进到剧烈争斗的方式，同时武汉、广州、上海、天津都应当有系统的准备工人武装，训练工人的暴动战术，组织赤卫军或工农革命军等等实际工作。

（四）农民运动——依据各地条件之不同，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抗租、抗税、抗捐、抗债等的群众斗争（暴动前之群众组织与党的关系），至于减租运动则不能用为党的口号，然而党应该努力赞助并领导这类初步运动。当群众有自发的要求的时候，游击战争的领导，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土地革命之实行，红军之建立，苏维埃区域之向外发展红军的游击战争，再依各地条件之不同有各种程度之策略。总的策略是领导一般农

民反对地主阶级，以至于领导贫农反对半地主，农村无产阶级之独立组织，一般农民运动的有组织化与政治觉悟的提高；纠正对于土地问题之错误。

（五）兵士运动——党的兵士支部之发展、兵士革命团体之建立与发展；使工农渗入军队；为兵士切身利益之争斗及其领导以至于与土地革命联络，工人阶级与士兵之联络，这许多工作必定要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要去活动，茶楼酒馆都是工作机会的场所。

（六）反军阀问题——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的及兵士之直接反军阀斗争与工人阶级之联络，工人阶级要去领导这一切斗争——抗捐抗税等，一切城市平民的要求，都要去领导他们起来争斗——建立新的高潮是不能的比以前不相同的新的斗争形式。

（七）反帝国主义问题——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之卖国日益暴露，党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这种争斗要加以严重的注意，在这种争斗的过程之中要暴露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妥协，以争取并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无以反对帝国主义”。

（八）党内问题——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怠工将一切责任推卸掉，不帮助训练工人同志；另一方面，反对所谓“机械的改组”。这都是最大的缺点。党内倾向则很明显的可以看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勾结在一处，我们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扫除这种倾向，我们要改造与发展党内争斗过程之中工人化的指导，民主集权的指导，反对“老爷党”的倾向与知识分子的怠工，反对双方的工学界限，同志的政治理论与技术之教育，准备武装的训练，职工、农民、组织、宣传人才的训练与准备人才。

（九）配合联络问题——一般的争取群众中心工作之下，

以“地方暴动”（游击战争）之领导与发展等等，去准备总暴动（有全国意义的暴动）之下要有城市领导的一省或几省取得政权之前途。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指汪精卫、蒋介石、张发奎、黄琪翔。
〔2〕指冯玉祥。
〔3〕指阎锡山。

PDG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报告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周　恩　来

在没有报告以前，应该要说明几句。第一，这个大纲是在组织委员会报告过的，有些地方经过了修改，但就全部说我的意见居大多数。第二，报告的材料是比较的少，因各地送到的材料不多，大会事先又没有好好的搜集。而且搜集的材料或许不能完全与各地相适合。

我的报告分作四部分：

Ⅰ．政治环境与社会基础；

Ⅱ．过去的组织状况；

Ⅲ．组织上的基本问题；

Ⅳ．今后的组织任务。

第一部分：

第一段要说明敌人的压迫。过去的一年，从蒋介石在赣州枪杀陈赞贤以后，顺流而下，在南昌、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一直到上海，到一处屠杀一处的工农，解散一处的组织。不久，李济深也在广东叛变了，对我们群众的组织，也杀的杀了，赶的赶了，捕的捕了，以及改组的改组、解散的解散了。

于是蒋李所经过的势力范围，一切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学生团体等，都打得东跑西散，我们的党也为了摧残的残酷而转入到秘密的状态，逐渐失了组织的基础。两湖赣豫从夏斗寅叛变到马日事变，以至于武汉完全反革命时候，经过了长期的摧残和屠杀，一切工会农会及其他民众团体，都像蒋李压迫下的情况一样。不久，宁汉战争发动了，我们在这时机，比较是有活动的机会，两湖的农村确有发展的情形。广东张黄[1]冲突，也还有左倾组织开始活动，但没有多时，这些又被消没下去了。但琼崖海口，尚有些活动。到了国民党完全取消一切群众运动，甚至广东机器工会的领袖也被通缉，广东总工会的委员长也被杀掉，这样灰色的、黄色的、不革命的尚被杀戮被通缉，革命的当然不要谈了。就是两湖的改组委员会也可以不必要了。这时，他们只有以枪弹压迫民众罢了。因此，我们的民众组织，除了江浙有很少的部分外，其余都被破坏无存了。北方情形，自张作霖开始讨赤、搜捕使馆以后，我们的秘密机关被破获后，公开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存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和冯玉祥的统治下，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党也同样破坏摧残。我们不仅受尽统治阶级的破坏摧残，我们还遭受了帝国主义的重大打击，自从炮击南京以后，最显明的是解决省港罢工，一直到去年十月，李济深、张发奎完全宣布解散。我们在组织上，这是最严重的打击。后来广州暴动不能得到省港工人参加，完全是组织破坏的缘故。最近北方济南案发生，各地反日运动都有些发展，如厦门国民党尚有小的民众组织，其他各地如上海等，都在反日旗帜下渐有组织群众之趋势，可是国民党知道对他不利，虽在这瓜分的严重时期，也尽量的摧残。

资本的进攻。自从蒋介石到了上海，上海的总商会就开始杀了汪寿华，这是资本进攻对工人屠杀的第一个。上海商会并

且进一步的要求恢复商团。从此除了国民党御用工会或黄色工会外，其余革命组织就再也不能公开了。

农民减租。在广东、在武汉都先后明白取消了，浙江虽然实行一点，在实际上还等于取消，因为农民在另一方面又增加苛捐的担负。而且浙江所以能实现一点，也因为那里的斗争尚未剧烈。特别在湘鄂赣，组织清乡民团，按家联保，使革命组织完全不能存在。

最后要说到白色恐怖。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我们按时计算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是由陈赞贤被杀到东南遍地的大屠杀。在这时期大概死了十二万以上。

第二是从夏斗寅叛变到马日事变，以及武汉政府叛变、冯玉祥叛变和其他各地大小的屠杀，统计被屠杀的约十七万以上。

第三是由广州暴动到现在，这是最后的一幕。全国民众运动取消的当中，被屠杀的约在五万以上。

总括的计算，被杀的有三十一万到三十二万左右，此外在监禁的尚有四千六百多人。这里的数目，虽然不能完全正确，可是总可以证明我们损失的巨大了。

第二段要说明革命的反抗。自然在革命失败后，我们遭了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也曾做了不少的英勇的革命反抗。武汉叛变、马日事变，我们都曾尽力反抗，不过终于失败了。在这种失败中，湖南的组织完全破坏。秋收暴动，也是革命势力重新起来反抗，也失败了。除了三次大暴动外，还有各地的游击战争，也是失败的次数居多。在这些失败当中，组织上受的损失也很不少。所以总括来说，我们是长期的反抗，我们也遭了残酷的失败。但是在这些反抗中，难道只是失败吗？不是的。我

们在这些英勇的长期的反抗中重新得到新的力量的结合。很显明的，广东失败后，渐渐的依然恢复党的组织，各地的工农都认识我们的党。自宁汉战争后，我们曾领导四十七次的罢工，参加罢工的群众有三十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人，失败的次数为多。在农村斗争我们也领导九十四处，广东不在内。参加的群众有四十万人，以湖北为多。在广东只海南一处共八十万人，参加斗争的有六十万。在九十四处有二十六处夺取了县城，建筑了苏维埃，其余是在乡村建设苏维埃。现在乡中还有四十个苏维埃。在群众中我们可以领导参加实际斗争的有百多万，当然合全国计算我们的力量尚是薄弱。

第三段要说到社会基础和革命的营垒。无论何种组织，都要看他的社会基础。中国在人口数量上是农民、流氓、工人居绝大的数量，他们所分布的地域非常的宽广。我们虽然受了大的摧残，依然保存着基础，海丰经过了四个月，海南一直继续到现在。其余各地如四川也很快发展党员的数量。现在我们把组织的成分分析一下，才可以看得到组织的注意点。

第一是无产阶级。这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者，但终是幼稚，与西欧不同。可是在我们党内外，总算是很健全的基础，不过只有这点比较健全的基础，其余的却更比较薄弱了。

第二，农民的组织性。农民的意识反映到党的组织上来，这一点是各同志所说到了的。农民中有种种不同的倾向，有的是富农，有的是贫农，他们在经济上是很冲突的。所以农民的内部尚有分化的作用。

第三，小资产阶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没有受过资本主义的洗礼。资产阶级叛变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也跟着叛变了，中下层的也动摇起来，反映到党内，也有分化出去的第三党。到现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尚很显明，还含有一些

封建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危险。

第四是流氓无产阶级。农民本是保守性的，农民失业的流氓，加上了流氓性，所以他们是破坏一切的。这当然要影响到组织上来。在工人中也有被资产阶级利用的，如青红帮、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等是。在乡村中、在城市中都要受他们的影响，尤其在秘密上受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是有他们的秘密，他们的秘密是不利于我们的秘密。

总之，在组织的社会基础上，除建筑在比较弱的无产阶级上外，还有许多阻止组织的条件，这是客观方面的一大弱点。

第二部分：

一、党员的数量。现在我们有很夸大的数量，但没有法子保证是正确的。我们的总数有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农民居多数，但海陆丰、醴陵一定要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总数是不能正确的。成分大概是：工人百分之十点九，农民百分之十七点六，士兵百分之零点八，知识分子及其他百分之六点九。农民与工人数量之比为八比一，工人数量也不甚确定，比较可靠的是香港广州有一千人，上海约有一千人，武汉约两千至八千人，北方不到一千人，比较可靠的数目约三千人，南洋有八百人。在海陆丰的性别，男百分之六十点七，女百分之三十点三[2]。

我们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到：1. 以农村为中心，矿山、铁路、城市比较少。2. 在地域上、数量上失了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在广东发展于琼崖，不发展于港口。在各地各省各县发展于乡村，不发展于城市，而乡村中又常常有所谓共产村或反动村。

还有一个弱点，没有收到党费。在省港收过一点，南洋收

过一万元，其余却极少了。因此使群众对于组织的联系更为减弱。

二、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第五次大会执行委员三十一，候补委员十，监察[3]，死的十，开除的一，叛党的一，受处分的五，现在二十一。

五次大会后的中央，他的工作是很混乱的，各部都是独立起来，常务委员会从没有开好，中央本身工作也毫无头绪，尤切是从汉口搬到武昌，完全成了一个“满天飞”。

中央与各省的联系，更为混乱。各地区完全由各地区自行处理，中央是没有指导的。广东方面，中央从没有管过，北方彭述之逗留各地，中央也不管，政治指导更说不到了。湖南虽相接甚近，也是调遣混乱，毫无指导的系统。四川、河南也没有联系，就是上海也无经常的指导。总之，中央与各省可以说完全表示断绝，除了武汉以外。后来到了武汉变叛的时候，鲍罗庭提议散火政策，一切负责，一个个东跑西溜，中央要搬到甚么地方，当时竟没有方法决定，有的说搬到九江，有的说搬到上海，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到此完全破产了。这时候国际代表已到了武汉，召开八七会议，选出临时政治局委员九个，候补委员五个。临时政治局负责一直到现在开大会。在这期间的工作，我们可以分别说明主要的几点。

南昌暴动在组织上形式上还要做国民党左派运动，这运动是交给谭平山做的。他曾在九江召集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但是他利用在国民政府党团书记的资格，完全由他自己干，他是不理会中央的。当时的前敌委员会，他也可参加。八七后设立南方区、北方区、长江区，北方区由蔡和森、王仲一同志负责，南方区由张太雷同志负责，但南北两区到十一月扩大会议后都取消了，因为都在工作上做了错误。

中央从此才开始找到工作的头绪，从前是与各地如南北两区的联系完全断了。八七设立的长江区，共八省，由罗亦农同志负责，最主要的事件是改组湖南省委，派王一飞前去主持。关于湖南问题，另设专门委员会讨论，这里不能详说。十一月扩大会议只限各个主要的省份，因为那时是很严重的时期，有些地方是无法召集。在扩大会议改变了常委，由九人改为五人。组织局下分设各科，各科有联席会议，这时中央的工作算是就绪了。其主要的精神，一是尽力吸取工农同志到党中负责工作，二是建立秘密工作。关于组织方面曾发了三个通告——十七号、二十号、三十二号，这三次通告可以说是代表八七会议后的精神，因八七后各种下层组织尚不知道，如湖南、广东甚至上海的下层党部都不知道。第十七号通告，本是规定了改组的工农同志的名额，在当时是必需的。后来各地都发现不好的现象，所以三十二号的通告，详细指出改组的毛病，如太机械、太形式了，如上海的集体而不分工，以及北方和各地的反知识分子，凡组织上一切的弱点，都包括在内。但有些同志对这三号通告的批评说，为什么前二号很坚决，后一号又这样软弱呢？其实这种批评是错了的，现在大会上证明了，第一二号是当时需要急进一点，后来已发生毛病，也就要从当中得到经验，就是说要纠正这些毛病的，这完全是客观事实所要求的，在原则是先后一致的。

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对各地的工作要派人去经常直接的指导，在湖南、广东是曾做到了的。在浙江虽然没有派人去，但也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不过派到各地的指导者，都是偏于政策的解决，没有做到实际问题，只有派到广东的得到一些实际材料。其次是查办湖北省委，中央决议，指湖北省委动摇，调负责同志往他处工作，自然特委也有错误。各省负责同

志对中央的联系也比较好了，在接触上是多一点了，但接触的事件，大半是限于政治问题，对组织方面是很少的。尤切是对暴动问题，各地都来建议，甚至南洋、云南、四川、山西都主张暴动，其次是来向中央要钱。

三、第一段，广东改组。广东改组是很可以帮助党的，他们加紧的吸取了工人，他们已从下级党部甚至到乡村都改组了。但也有错误，第一是反知识分子，这是李立三要多负责的，他曾写信给海陆丰说知识分子虽拼命，也是为小资产阶级而拼命。好得在下层尚未受多大影响。第二是处罚，广东处罚问题，也是做不合当。

第二段，北方改党。北方党对下层机关离开了，非改组不可，但下层群众，也没有基础。第一次改组，只改省委，没有下层的群众参加，这是一大弱点。第二次又改组，中央没有得到音息，觉得他们改组，未免太儿戏。后来得到报告和王仲一同志来到中央，才知道这是进一步的办法，是需要的。中央批评顺直的决议，犯了极端的小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错误，虽然是因为过去党太家长式了，但现在却纠枉过正，尤其是决议做得不正确。

第三段是湘赣鄂三省。三省省委都没有改好，除湖北开了一扩大会议外。但下层党部却都改好了，湖南、湖北、江西都是由下层自动的改组，结果都很好，但也走得太左一点。

第四是上海改组。从支部一直到省委，那时正是强迫罢工失败，有些支部尚能开会，本来是可以改组的。可是我们没有方法，组织了改组委员会，一方面讨论方法，一方面又要实行改组，那末就益发迟缓了，因此一直延到一月底。中央感觉这样一定要影响下层，所以有令限期二月十五日以前改组完竣的办法，上海同志觉得做不通，一切新的同志没有经验，中央于

是又把命令限期改延了。当时本来有所谓秘书专政的事实，有一个同志说，改组如果不提高教育，结果要使党务停滞，这完全是对的。南市改组后的扩大会议，全场没有一个人说话。这使我们一时没法改组，所以不能不再行延期，但不久省委被破获，改组就不容易办好了。

在其他各省改组，有许多不好的现象。有好几省，他们把农人工人同志依然派到外县工作，使他不能够参加常委，如河南、浙江等地。

各省党的组织状况，总共省委十六，外南洋一临委，特委三十七，县委四百，市委三十六，区委四十一，特支一百三十八。省委指导机关成分，工人百分之三十四，农民百分之十四，其他百分之五十二（这内面包含知识分子、店员等）。常务委员会，工人百分之三十一，农民百分之七，其他百分之六十二。我们可说在这样的改组情形之下，我们只能算做一个初步。

四、支部与党团。我们的许多地方支部只能算做一个形式，不能发生作用。

海员。许多的海员都失业了，在长江流域很少，上海到北方的船，我们很少的发展，好一点的要算从上海到广州的。

铁路支部。数量很少，武汉、天津、广东、浦海、上海等地有过我们的组织。

矿山支部。这支部数量也很少，唐山、安源、大冶，大冶现在有组织没有，我还不知道。

纱厂支部。纱厂支部当然要以上海、武汉为中心，天津也有我们的支部。从上海罢工失败后我们的支部渐渐减少，武汉失败后我们的支部也很少。我们听见湖北代表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了。

金工支部。数量很少。

兵工厂支部。广东是有支部，上海也有同志。武汉、天津过去是有支部，现在怎样还不得而知。

邮务支部。现在我们还不大清楚，有的有，有的无，浙江现在还有几个邮务工人是同志的。

印刷支部。这是我们产业工人中最先的支部，但他发展的情形不好。

苦力支部。他们因生活不定，支部也是不巩固的。

手工业店员支部（街道支部）。这种支部在湘很早就有的，上海也是有的，现在还是存在的，他时常是一个平静的状况，没有大的发展。街道支部，广州现在才有，他在工作上、斗争上是方便多了。

农村支部。他发展的形式较大，而尤以有苏维埃的地方更多。但乡村手工业支部很少。

兵士支部。这支部很少，只是广州较好，如武汉、浙江，过去都有过支部，而作用很少。

在这许多的支部中，党团的作用很少，因此形成支部的作用也是一样，上级的党团是一个包办的形式。

五、工农会及其武装组织。全国工人由七百三十四减到八十一个工会了，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虽说是一个密秘的工会，而实际上是一个工厂支部，也没有工会的会议，现在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黄色的工会较有群众的十四个，挂了牌的有六十九个，这是广州的，其余的地方一定还有；在上海工人群众中，有一种弟兄团姊妹团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党的作用去组织的。在农村中过去是农民协会的特派员，现在呢？现在是暴动特派员。若是此地暴动成功，那么我们党的组织就有个大的发展；若此地暴动失败呢，那么我们党

的组织也会倒台。农协是动摇的，不稳定的。武装工农过去做了，但没有好的训练，农军使他在失败后不致失败的也很少。

六、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学生会问题，学生支部他们现在只能做一点空洞的工作，从反动后我们与学联无关系了。

七、青年与妇女。八七后党团的关系不大密切，省委是比较好点，下层的关系更不好。团的先锋主义从八七到十一月扩大会，在这中间有团代替党的事。有一个时期，党团共同发过一次通告说，在没有党的组织地方，或党的组织弱的地方团可以去自动工作。在这当中发生了许多的错误，后来又发过通告纠正这些错误。妇运干部人才缺少，同时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工农妇女的实际生活情形。

八、党的损失与济难工作。在中国许多的地方，我们的党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知道干部的损失也是很大的。这是表示我们的党从中央到下层组织都没有遇过密秘的生活，而下层支部比较要好一点。在党的破坏上表示出一种贫民状况，在农村中的不知进退，在城市的离开群众，因此而死的也不少。在这种情形之下，过去济难的工作是不好的，现在秘密时期更成问题了。过去济难会的宣传工作很少，在群众中也不能留下一点影响，对世界上的宣传更谈不上了。他的工作也不能群众化，因此他变成一个党的救济机关。

九、纪律问题。纪律问题在八七前是一个死的纪律办法，错了就开除或察看，以后更有不好的现象。上层的政治纪律，在十一月扩大会上说出了我们过去没有政治纪律，党的指导机关应有政治的纪律，党的指导机关没有政治纪律是不对的。但是后来许多的地方用的一塌糊涂，成一个混乱的形式，有的很机械式的去运用。在广州暴动失败后把许多军事的、政治的、技术的混在一起，去用一个政治纪律的处罚。在武汉问题，武

汉还未回答中央，而北方就先讨论了，对中央来了一封信。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想在许多的地方用法并不正确。在湖北省委破坏后，刘白章之逃回上海，本来他在湖北很难站脚，但他忘了他的责任，中央给他一留党察看，各地觉得使他没有工作做是狠一点。我们过去没有带教育性的纪律。

十、宣传教育工作。中央的宣传工作真成问题。中央的宣传品，文字上都不能使群众明白。刊物共有六十九种，十四省有刊物。在上海、广东，他们有一种小报，这种小报的效果是比较好些。训练班各省是有的，并且有专门分部训练班。支部教育工作更谈不上了。

第三部分：组织基本问题

我们党的组织，在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之下，使我们的组织发生了大的危险与困难。

一、党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在党的成分，过去是知识分子在党中占多数，产业工人很少。在“八七”后农民加的很多，这是暴动加的，但是没有中心的农民群众。过去上海说党的上层机关应是一个暴徒才能够充当。山东加入党员，十块钱工钱以上的不要加入。党内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工人吸收又没有好的宣传教育，使他不知道党是自己的。

指导机关离开党的群众。工农分子没有实际工作，这是八七前的情形。八七后对工人同志又没有好的教育宣传，又没有注意在斗争中找工作人才。

民主集中制。过去机关一切是以群众选举的，后来他又没有正确的执行。

二、支部生活。支部成了党的命令传达所，同时他做了党的一个宣传机关。党对支部也只作作报告，这样使他本身的生

活，他也不知他在群众中的工作。大产业支部不健全，农村中的支部在暴动失败后也是很成问题。这种情形在八七后是表现出来了。同时在工厂中支部即工会，他没有独立的工作。在一个罢工或一个暴动失败后，支部也受了影响。这样的结果使群众也不知道党的生活，干部人才因此也缺少。因为没有好的支部生活，同时在一个秘密到来也使支部减少。我们的党过去他没有真正从群众中、支部中找出工作人才，往往是由外国回来的，用到上层指导工作上去，我们的理论又少，他们工作经验也很缺乏，支部生活又不好，这也是发生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原因。

三、组织上错误的倾向。（一）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影响。以党治国啊！党权重于一切啊！这种口号在中国有几个地方提过。（二）尾巴主义与盲动主义。（三）极端的民主。真的民主集中制倒没有执行，倒走到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制上去了。（四）批评问题。我们中国人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封建倾向，一切会议上怕去批评，总是以机关批评机关，这样可走上一个不好的路，发生一种不好的现象。（五）选举。我们不是随便何时何地都随时选举的。（六）指导机关信用问题。我们决不是把小的一切问题都要拿到群众中去，告诉群众。（七）纪律问题。我们没有用带教育性的纪律，没有用说服的方法去说服同志。（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九）雇用工作问题。我们过去在工农的工作人员是派去的，我们决不能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在一个组织将开始，我们一定要人去指导，但我们没有注意提出群众工作。（十）反对改组。我们知道党内有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的存在，就有这种倾向来左右我们，我们若不去改组就不能纠正我们的错误。

四、地下党的组织条件（秘密党的条件）。（一）机关的建立与躲避主义。我们过去没有密秘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建立一个好的秘密机关。在现在的反动形势之下，在城市中工作简直没有，城市中不能建立，因此发生了逃避主义，向农村中跑，甚至农村中失败——暴动——同军队一起走的就有。（二）秘密的会议与接近群众。我们接近群众是要自己到群众中去，并不是把群众招来开一个会议就是我们接近了群众。（三）工作人员的准备。若是我们的支部工作好，我们一定有工作的人才。工作人才我们过去是没有准备过，今后我们一切的组织都应有准备工作的人才，使党在一个破坏后依然能工作。（四）旧工作方法的淘汰。我们许多的工作方法都是由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一件小的事也应注意。（五）宣传品的分布。我们虽说理论少，我们宣传品不能传到群众中去，就是我们把最好的理论，甚至把布哈林搬到中国去也是无用的。（六）调查统计工作与不正确的报告。我们在秘密时应有好的调查与统计，并且要是实际的。过去有许多不正确的报告，因此上级的指挥也会错误。我们若没有这几条存在，我们决不能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很有组织的党。

五、党与群众的关系。（一）我们党与群众的断绝原因是过去由派人工作所传下来的。（二）我们有时依政治势力来解决一切问题，若政治力量反革命了，我们也没有法了。（三）党与群众的断绝，这是组织上的缺点。我们今后应有实际的口号去夺取群众。若不是这样，会使一个反动来就会失去群众。固然我们过去应派人去工作，但没有注意提出群众工作，这样把工会变成了党的行动机关，使他的独立性失去，这样使城市的工会与党断绝。农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工农会有这许多的隔离，同时我们对小资产阶级也隔绝了，我们过去对学联也是

取占机关的形式。农村中的流氓若没好的联络，也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受困难。宣传工作更说不上。我们若在武汉时期夺取了政权到手上来了，我们组织是混乱的，也是无法的。红军工作过去也未做好。这许多的条件及情形，是我们过去党的情形，我们应提到同志们面前，望同志们由你们的工作斗争经验中的实际情形来讨论。

第四部分：今后组织任务（这一段，因时间的关系，报告人对以上的问题没有解释，他依照他的原稿读过一遍，我现写的也是照原稿抄的——记录者注）

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A. 建立无产阶级党的主要条件

一、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大的企业模范支部。

二、在广大的农民同志中建立中心的干部。

三、尽量的用教育方法使工农同志加入各级指导机关。

四、实行党内民主主义，防止机会主义的复活。

五、在秘密党中，各级指导机关的选举或指派须视当时的条件如何决定。

六、严格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实行自我的批评。

七、肃清组织上的一切错误倾向。

八、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特别是大工业中的工作。

九、巩固党的集体的指导力量。

十、党的纪律和指导，要使一般党员做到自觉的、真实的接受和遵守。

十一、加强城市的党的组织。

十二、训练积极的干部人才。

十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使通俗化。

十四、执行地下党必须具备的秘密条件。

十五、建立支部的生活和巩固地方党部的组织。

B. 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

一、党不但要发展已领导的工农团体，并且要创造在更广大的群众中的非党团体，不拘任何形式。

二、党要极力纠正派人办工农会及其团体的传统观念，使其能表现自己的独立的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我们从中起党团作用，消灭党代工农会的现象。

三、党应注意把产业工人和以贫民为中心的工农团体组织起来。

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应加入活动。

五、党应不放过任何机会的偶发的工农群众集会的参加和指导，即使是游艺会、募捐救济会、体育会也应扩大地去组织，使之能由临时的变为经常的组织。

六、每个共产党员在工农群众中，为便于工作起见，不定要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七、党员参加到敌人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团体中，其目的是揭破敌人欺骗群众运动、出卖革命的阴谋，而领导群众走在我们的革命旗帜之下，非企图作少数运动和合法运动。

八、党应改变旧的一切命令群众、压迫群众的方法，而坚决的去执行说服群众、引导群众的实际工作。

九、党应尽可能的派遣得力党员在工农群众中做教育工作。

十、党应注意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特别是学生组织中党的工作，使之真能领导城市贫民走向革命方面。

十一、在军队土匪民团中，党均应发展自己的支部以取得其群众。

十二、在游击战争中建立红军和乡村苏维埃的工作，党的地方党部应加以极大的注意。

十三、在群众中的宣传品特别是在工农中间的宣传品，应力求其通俗而易于使工农群众了解，并须注意其分配方法。

十四、济难工作务须做到宣传化群众化的目的，不仅仅只限于救济。

结　　论

各位同志所发表的意见，有很多具体办法，补充我的报告未尽之意。有几点说到主要精神，同我的报告稍有出入，这些都提到组织问题委员会去讨论。现在我把各同志所提出关于组织的根本问题申说一下。

组织削弱问题。在讨论政治问题时说盲动主义影响党的工作，但党整个削弱，不能专看这一方面。比如北方发生盲动主义；在顺直省委改组前，党与群众关系发生裂口；对国民党关系，由开办到官办一直转到推倒，使群众莫名其妙。

政治影响及群众与以前不同，党的组织在新时期没有创造出来。这是对的。

党用旅莫支部的教育方式是严重问题，这亦是事实。党的削弱根本方面，由于党非从群众中产生出来，党的指导机关非

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所以中央坚决主张提拔工农分子，提拔积极分子。我们要肃清小资产阶级的用感情的根性，党的组织从群众中产生出来，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成为战斗的党，这是全部主要点。至于程度伸缩、具体办法等等，在委员会中详细讨论。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八年第三期刊印。

注　释

〔1〕指张发奎、黄琪翔。
〔2〕此处男女比例有误。
〔3〕原文此处缺字。

PDG

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周　恩　来

我们承认新的革命高涨快要到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我们有这些军事工作，再加上政治、组织、技术方面力量，才能保障武装暴动实现。军事工作主要条文，分九方面工作：

兵士运动

（1）兵运口号——不但与工农运动相联，且与土地革命相联，提出日常生活反对长官压迫、恶劣待遇等斗争口号，使军队反映出阶级斗争，更为切要。

（2）军队中宣传方法——非是说文字宣传要不得，印小张传单、厕所写标语反对长官，引起兵士注意，但仅靠文字宣传不够，应有个人谈话、接触，利用旧时通俗小调，比文字宣传力量更大。

（3）兵运中士兵组织问题——以革命士兵委员会为代表，类似的如革命军人同盟、兄弟会、弟兄团等都可。兵士组织形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军事报告的第四部分。

PDG

式，以能吸收士兵参加，非但在每个地方可应用，即如党在兵士组织有广大支部，亦可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组织须绝对秘密，找住中心发展，不可无计划、无系统扩大。如在广东有一团军队，只一营有二十余同志，其余二营一个没有，机关枪队没有同志。无中心工作，是最大缺憾。

（4）党的组织问题——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以连为建立支部单位，人数多则成立支分部，组织须绝对秘密。支部书记二人，一正一副，副书记预备在正书记被发现时补充。每小组同志只认识组长，各组不发生关系。发展到营以上，设特派员制，营、团或师负责同志得设临时干事会。

（5）兵运工作人员与通信处——兵运工作应有专人先做，与兵士打成一起，不能等工农同志入伍而后去做。兵运工作人员应是极秘密，且知道兵士心理，能接近兵士。在军队驻扎地、参谋处、军部、师部地方，有通信处，知道军队行动，使在军队工作同志与党发生联系。

（6）工农分子入伍问题——对工农分子入伍，应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有训练地大批入伍，然后方有作用，不是再使去送死。

（7）兵运工作方法——兵运工作方法在中国军队比较外国军队容易，困难的只文字宣传方法。在西欧有大量文字宣传品送到军队中去就会有大成效，不过送进去是困难的。中国不同了，一般兵士不识字，但接近兵士非常便当，差不多兵士每星期有几次可出外，伙夫、号兵天天可出街。接近方法以通俗为好，如装小贩卖东西，到茶坊酒店去闲谈，或以同乡关系去接近。

（8）军队中兵变问题——兵变是兵运的目的。兵变大概有四种形式：①在部队中发展兵士同志，如果兵士同志被发现，

要清查，那时我们的策略应是：被发现的同志尽可能地影响别的带枪潜逃，跑到农民那里去；②在与敌军作战，两军混战时，取两方失败立场，失败是最主要，在作战时容易调动军队并分化出来；③有计划地把军队兵变能与工农武装暴动相配合，或仅与乡村农民游击战争相配合，或与城市工人暴动相配合，这样形成工农兵武装暴动，或工农暴动，有计划的暴动是最要紧的；④对兵士自发的斗争，我们不应袖手旁观，应去领导，斗争的目的使军队兵士训练组织力，不要怕长官，兵士团结可以威吓长官。例如，在广东陈济棠的学兵团，工人同志很有力量，所影响的一连亦甚有力，无机会对长官示威，恰巧有一天上级命令全团兵士种牛痘，本来种牛痘是好事，我们同志乘机向士兵宣传说，“种牛痘把手刻下记号，使我们不能跑脱”。果然有影响，全体士兵一致不种牛痘，结果长官被屈服，使兵士得到训练。也许斗争做得多，不易保守秘密，对兵士自发斗争，应积极去领导。

(9) 对下级军官工作问题——“八七”前太注重下级军官，无目的造成军官干部。“八七”后对下级军官无大工作，主要的是士兵工作。但下级军官与兵士站在两方，不能同工人与资本家对垒可比，中国下级军官很多从士兵中提拔起来，因此生活与士兵差不多。下级军官亦有从小资产阶级出身，富于革命情绪，比如在黄埔军校毕业学生，有的欠薪几个月，生活很痛苦，容易走到革命方面来。团长以上的军官生活优越，同情革命的很少。同时，要创造下级军官干部，从游击斗争中，从工农红军中训练出来，或者从敌人吸收革命的青年军官成为革命军队的人才。

(10) 兵运与工农运动关系——①工农运动与兵运发生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工农斗争很能影响兵士群众，用各种的方法

使工农群众和士兵接近。②在其他反动武装组织里工作——警察，不能说与革命一点作用没用。在城市中警察压迫革命运动，有很大活动力量，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军事情形，暴动时可取得武装。如上海三次暴动和广州暴动首先打警察局取得武装。商团，亦是一种反动武装组织，现在改为人民自卫团，由城市各商店共同组织，团员多半是店员或小商人、小资产阶级分子，武装在店员和小商人手里，至少对我们守中立，有时与我们共同行动。在乡村地主的武装组织有民团、保甲，成分是贫农、流氓，本身带革命性，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湖南马日事变前，民团转到农民协会里。广东南路有几县，民团可以同化。土匪，依过去经验，我们可利用，是有帮助的，不过须取得群众，推翻领袖，根本加以改组。

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工作

（1）只有一次上海工作经验，我们用文字宣传得成效。欧美军队防守甚严，不易打进去。尤其是海军，如果在军舰中发现一张革命传单，舰长至少要受处分。水兵大多数是工农青年，只要宣传工作做得好，很易受影响。过去印度兵到上海，受我们宣传影响撤回去。

（2）游艺宣传。在上海有外国水兵青年会。咖啡馆、跳舞场、球场都是外国水兵常临地方，我们用通俗切当材料印成传单，以各种方法落到外兵手里，多少总会受一点影响。

（3）宣传品材料。最主要写中国工农痛苦和他本国工农苦况，同时说明他本国政府利用他来牺牲等实际情形。外国兵当中，美国水兵生活太好，日本兵多半来自农村，对他们工作较难。宣传品最好要外国同志写，用各国口头语通俗文字使外兵

容易了解。

（4）组织宣传队。学生比较得用，在游戏场中容易做，或教工人卖小吃，以发宣传品。

（5）最主要的要兄弟党帮助，如对法国兵须法国党帮助，对英国兵须英国党帮助，成效更大。

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

（1）工人武装组织主要的在夺取敌人武装，不必每个工人自己先有武装而后行动，要以很少武装夺取敌人武装，平时工人群众要有计划地受武装训练。

（2）武装组织问题。武装组织须非常秘密，有工会的地方，附属在工会之下，如上海在没有暴动前，有广大的工会组织，工会之下有秘密的武装训练和组织。在工人原有武装组织中，无论用何方法打进去，使广大工人受武装训练。每个工人要受武装训练，但倒不一定在工会有组织时如此，亦可利用工人自己组织，如拜弟兄、兄弟团、打麻雀等方法，当然这些组织应有中心，尤其要注意产业工人工作。

（3）训练人才问题。刚才说军官打进去工作困难，在莫斯科受军事训练的人才很少，以后要尽可能地训练工人同志成军事干才。

（4）训练人才和训练方法。如果训练人才是很广大的，连开步走都要学，那么每人学一月还不好。训练材料应规定主要的，如巷战战术、武装组织方法、夺取敌人武装注意哪几点，同时教育方法，每次至多五人。在广大工人区中，每月要训练多少人，工作计划中应规定好。

（5）武装练习。不是说赤手空拳受武装训练，如果有枪，

遇到小的警察局，只十几支枪，交通不便地方，工人可练习夺取武装，主要条件是懂得武装训练意义；在农村中更不用说，除非在交通便利，敌人有侦察，那不易下手。

（6）工人中红色恐怖。这个问题回答分二方面：①反对个人恐怖，但群众的红色恐怖是需要的；②暴动时，个人恐怖是需要的，用以镇压反革命派。关于红色恐怖一条，在职工运动决议不能写，在军事运动决议中可写上。在行动时，在某种条件之下，以个人恐怖打工贼是需要的。

（7）城市中会或帮的工作，如青红帮、三合会等。在城市武装团体中，中国工人很多入青红帮、三合会、哥老会，他们本身迷信，有武装训练，能打拳，拜老头子，有武装组织，与我们武装训练有帮助。如果领导错误，不改造其分子，同时亦有妨害。

（8）工人赤卫队组织问题。工人武装训练，目的在工人群众组织赤卫队，有武装组织，才能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为将来真正红军的基础。

（9）工人武装与职工会。在有职工会组织地方，工人武装训练应在工会系统之下，绝不可与工会无关系，如果离开工会将成为青红帮，拜老头子观念将发生。

农民武装运动

（1）农民武装的最初形式是在地主领导下的红枪会等。在南部有农军建立，很快地插入我们组织中，武装有快枪、粉枪等。

（2）游击队与游击斗争，我们应去领导。游击战争不一定是农民自发斗争，也许是红枪会改变的或土匪分化出来的，应

使转变为有组织有次序、各地相配合的联合行动，不是散漫无组织的。

（3）农村秘密武装训练与组织。无论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亦无论有无农民自卫军的地方，应积极去活动；秘密的武装组织，不一定要由农民协会组织，即迷信组织下亦可以，吸收贫农雇农分子加入去受武装训练。

（4）农民武装应尽量达到和游击战争相配合。不管红枪会、大刀会，还是农民自卫军，都应有组织地比较好地配合游击战争，并发展这些斗争。

（5）对工商业城市近郊农民武装训练。特别要注意帮助城市暴动，并成为暴动的有力同盟军。

（6）各地工作方法的差别。不能用死板的形式普遍地应用于各地工作，因各地武装数量不同，工作方法不同，工作对象亦不同。

（7）对农民武装训练要派定专人，同时要找群众的指挥人，设巡阅制，巡视各地工作。

（8）对农民亦应组织赤卫队，变游击队为赤卫队，把游击队中最进步的贫苦分子成为赤卫队。赤卫队组织应直属在农民协会系统下，有苏维埃政权的直属于苏维埃政府指挥之下。

建立红军问题

（1）红军的来源有：①游击队扩大的；②军阀军队倒戈来的。由游击队扩大过来的占多数，一定要有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方能有红军组织，否则是游击队形式。红军建立，必须在地方苏维埃指挥之下。

（2）工农夺取政权后建立红军。红军的成分应是工人做主

要成分，尤其是指挥官，须工人占多数。

（3）建立红军原则：①把雇佣性改变，开始采取征兵制，经过宣传，再采自愿兵，从作战中渐渐改变而成。红军长期采取征兵制，非自愿兵，但退伍是有定期。②军官须无产阶级化。军官不一定要工农分子，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③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最高机关。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

（4）红军移动问题。建立红军的目的非保守在一地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常在一地不同。红军是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有移动条件。红军成分须注意，雇农、佃农不愿去，因红军要移动，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免不了要有，主要的要有无产阶级做领导。

（5）红军分配问题。对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曾提出过，虽然现在实现几省割据，红军应分队在各地，但仍有关联，在发展农民暴动时，可分几队，使能发展。

（6）红军组织。不能死板规定一定要有全国编制。现在还没有全国总暴动形势，各地作战，需要不同，红军组织须以适合当地需要为原则。

（7）工农与红军关系。海丰农民看红军如神圣，或天外东西，与敌人作战时有农民参加，反而红军死伤数少。但有的地方，因言语不同，红军被打死无人料理，因此，教导团反感，得出相反的意见。这表示红军与农民没有打成一片。在城市工人与兵士没有打成一片，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8）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在党东委[1]指挥下，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这应改正。

党员军事化问题

党员军事化应成为大会的口号，在革命新的高涨将到时，实行各地成熟的准备好的暴动。在乡村领导广大群众武装斗争，党员军事化是根本的问题，应在决议上明确规定，同时应成为大会主要口号。在秘密条件下，存在工农武装，党应起中心作用，或领导作用。群众都懂得军事，党员是群众的先锋反不懂得，岂不是笑话。俄国红军始终在党掌握中，政治部主要的是党员。

党的军事部组织问题

（1）军事指导的集中原则。军事指导集中应成有系统的原则，所谓集中指导，非集中到个人而是集体指导。

（2）政治组织与军委，军事技术应到中央成一系统，政治归各地党部。

（3）军事工作计划应有全国的和各地的。

（4）须有好的调查和统计，增加军事判断能力。

（5）军事工作人员统计，军事力量分配和调遣。在过去没有统计，亦没有计划。有一时期，集中这些是非常需要，尤其到城市暴动时候。

（6）军事宣传非常重要。应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军队士兵宣传。

（7）特务工作。在过去做得不好，今后应注意改善。

兄弟党的帮助

兄弟党的帮助是非常严重工作，但是不容易的，尤其在经济、物质、精神方面，需要他们帮助。

总结起来，在革命新的高涨将到来时，我们应加紧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定出详细的工作计划，经常地来实行。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

PDG

军事问题补充报告*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刘　伯　承

同志们！

恩来[1]同志的军事报告非常周详，我今日所要报告的，是偏于在军阀军队工作方面的情形，照着以下的次序来说一说：

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

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和必然的崩溃；

三、军阀军队的成分与其一般的情形；

四、对军阀军队的工作；

五、党员军事化。

一　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

中国式的豪绅封建军阀制度，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建立如网一般的收买原料的买办制度，输入多量的工业制造的日常必需品……，这种经济侵略，使中国经济落后而不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封建势力，它多不是与封建豪绅地主经济有

* 这是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

极端密切关系，帝国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式的贸易侵入中国的农村，这种现象，使中国的豪绅地主更加商业化，更加重剥削去作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农民血汗的中介，同时也就作军阀统治的支柱。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扩大会议议决案说，从劳苦群众的观点看来，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蒋介石、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都是一样的，所以北洋军阀代表高等官僚及商业高利贷资本，而南方军阀是地主高利贷者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种反动势力，对于工农的仇敌关系完全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二 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和必然的崩溃

二十年来中国的大小军阀互相吞并的战争者，现在急于都完全隶属于国民党旗帜之下。秋白[2]说这些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队，来听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领导，是尾大不掉的；又说国民党虽然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事联盟，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冲突的。这样分析，从资产阶级所欲消灭杂色军队、统一中国而言，豪绅地主则各自不断地扩充武装，从小小的民团以至军队，他们都日趋急烈地相互吞噬，亦就是相互反对别人的侵犯。一般资产阶级受着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之苛捐杂税重重压榨，而经济财政急剧的破坏，这是根本的矛盾点。从这类事实看来，是正确的。米夫同志关于国际执委九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之决议案的文中说，中国军队逐年增加，数目现达两百万，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军费支出七万万元以上。这种逐年增加惊人的军费支出数量，当然落在工农劳苦群众肩上，所以结果破坏了中国的经济。首先破坏的就是农村经济，于是群众的缺乏文

化、乞丐化之过程加速，毫无疑义的了。这些条件使中国新的、更有力的革命高涨如农民暴动到处爆发不用说了。而这种影响不仅是军阀财政日趋于绌竭，军饷的无办法，而兵士暴动之发展进一步与农民斗争贯串一起，必然地使军阀制度趋于崩溃。

三　军阀军队的成分与其一般情形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与军阀混战局面之下，农村经济破坏，其中破产农民，除到城市做工与当土匪而外，就到佣兵制度的军阀军队当兵。城市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工业不发达不能稳定，甚至工厂倒闭，又产生了广大的长期脱离生产的游民无产阶级，也是往军阀军队去当兵。这是军阀军队中一般的成分。

中国雇佣军队，它的组织系统，军事纪律，军队脱离人民而孤立的状态，这是中国军队一般实际情形，也就是我们在军队中工作困难的地方。但是，军阀制度的本身，已表现出许多矛盾，兵士与长官阶级冲突、下级官与上级官权力斗争是跟着社会阶级的矛盾而存在的。现在既有了这样广大的军队，资产豪绅阶级无力维持它，而各军阀为图本身生存与其发展，他们自己相互间，及其与一部分豪绅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者间又发生许多新的矛盾，这些矛盾足以使军阀制度继续削弱与动摇，而且加剧了兵士的冲突。其冲突之焦点就是在经济上，因为它是雇佣制度，其表现于经济上之冲突是必然的。军阀的财政困难已如上述，而军官为增收入计，就发生了包烟包赌、争地盘、克扣其微小可怜之饷（四川二等兵月饷六元六角，还八折发下，广东二等兵月饷毫洋十元另五角），或甚至于久不发饷，

士兵索饷即被扣留，偶尔发饷，便有逃兵，病者伤者均无优待办法。运动士兵，借着些病兵、伤兵之口，以向其他兵士宣传，极有效力。

官长与士兵生活相差天远。官长任意挥霍，居住饮食以至嫖赌，千金撒手即尽；而士兵则衣不暖身，食不饱肚。相形之下，士兵对长官之心理，可以想见。因此，官长防范士兵拐枪潜逃之法日渐严密，下级官以亲信者马弁或骨肉任之，兵士出入，由下级官集团领导，下操后集武器于一室内，由下级官看守，所以下级官之作用大。但是因他的经济背景关系，我们为士兵运动容易入手，及将来暴动时利于指挥起见，不可忽视了他，在可能范围内须吸收之，但须慎重。至于望下级官而中级官，带其整个队伍来革命，又是幻想。总是要十分注意下层士兵才是。

至于南方的新军阀，自背叛革命后，取消了初期革命的宣传，屠杀工农，虐待士兵，为权利地盘之斗争，驱遣士兵自相残杀。兵士因此受了更大的剥削与牺牲，对于官长蕴蓄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他们的饷，一月只有十元零的毫洋，常是几月不发。恰好受了土地革命与广州暴动的影响，红军月饷二十元与分配土地给兵士的口号，以及他们本身的阶级斗争，联结到社会上工农斗争的关系，于是表现出反革命军队普遍动摇。民团商团的武装，多半在雇佣的工人和农民手中，在此工农剧烈斗争的期间，他们必然的要受影响。他们同警察的武装、组织、训练、技术都较薄弱，是我们容易夺得武装的所在。

四　对军阀军队的工作

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议决案说，党应准备对付新的扩大的

革命高潮之高涨，党对这新的高涨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任务，是用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才能解决。据此，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即要夺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共产党及其口号之下团结起来。在实行夺取工农的中心工作时，同时马上就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保证最近的将来工农群众反对大批军阀军队斗争的胜利。在这工作当中，对于军阀军队军事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地运用在军阀军队中发展他们的阶级斗争，即是兵士与其官长的斗争（能拉他们的下级官与兵士同一战线时，即照上述意义办理，但非主要的事），这样才能把军阀的基础，根本地动摇它，推翻它。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仅用军事政治工作的方法，我们不能破坏整个的军队。或使它来参加革命，或是使它中立，其某部分军队，必永久是忠实地服从反动军官，积极地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则我们只有以我们的赤卫军为中心，同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对它进行酷烈的血战，才可以破坏它们。列宁在一九〇五年莫斯科暴动的一篇文章写了以下的几句话：我们过去已经准备而且还须更坚决的准备改造兵士的思想。但是我们不会变成可怜的老先生，假若不会忘记在暴动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用血战的方法以夺取军队。这是我们预先该知准备的，决不可再演出南昌时对蔡廷锴那种不坚决的态度。

军阀军队中单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容易和缓下去，一定要工农斗争愈发展，才可促进士兵的阶级斗争，且使斗争能够愈加有意识地走到与工农会合总暴动的路上。

无论当时的政治情形如何，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个首先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海陆军警察中进行政治的与组织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熟悉军

事的军队与警察有新的攻守器具为它的武装，以军官为特别的指挥人才，又有帝国主义者到中国军队之助，它们真正来与革命斗争，则虽具有革命胜利的条件，但它们也有消灭革命的可能。虽然如此，但是军阀军队和外国派来中国的军队，因阶级成分关系，上面曾经说过，在一般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会不受革命影响的，在这时候，士兵群众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种动摇能够引起部分的军队变到革命方面来，我们党在革命准备时期，尤其在夺取政权积极斗争时期，在士兵中有系统的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愈做得有力，则士兵动摇与倒戈，将亦愈有力而常见。

因此，破坏军阀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上百万的兵士群众都参加工人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严重的任务。

上述工作具体形式：

1. 在士兵中做群众鼓动工作，使士兵群众接受党的口号，为此必须有军事煽动员特别组织，并出版关于日常便于士兵群众阅读的刊物、传单和小册子等。煽动之法，须视其部队来源与成分，如部队是匪成的，就以运动土匪的方法对之。如是新兵，他们极感生活困苦，与不忍官长的惩罚，则派人入其部队为宜。如是外省军队，思家之心必切，则说明以月饷二十元回家是有路费有出路的。煽动军队之目的，须注意破坏敌士兵与官长的关系，而夺取其信仰，所以提出来的要求，须不使反动军官能以小利引诱士兵和缓，要以各种方法，利用各种问题煽动士兵，如厕所标语、图画，只要能鼓动群众破坏官长的威信，便都适用。惟宣传的口号传单等则应非常正确，宣传从士兵痛苦说起，然后说到工农兵联合，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以至于暴动的组织与其他技术问题。宣传的方法，通常是

用口头谈话式的，然而有时文字的宣传亦非常有号召的力量，所以传单小册子等有时也是需要的。尤其是在少数军队单独住在一地之时，能以一种传单给予全部士兵，可以增加其动摇与恐慌的程度。

2. 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我们在军队中党的发展，必须普遍地注重于质量，因为兵变多是少数人发动，组织此处与彼处绝缘，恐其一处破坏，牵连全体。

士兵暴动是为夺取政权之意义的，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在士兵暴动时，工农愈有力量，方愈能抓住士兵群众，再则士兵暴动之时，党必须注意组织一基本部队，协同我们的赤卫队——中心部队以打破其他反动军队。

兵士自身单独的兵变，应当加以提倡。必须有士兵为本身问题发动的兵变，才能逐渐形成工农兵汇合的总暴动。兵变是没有夺取政权之意义的，但为破坏敌人的武装，兵变是对于我们革命和武装工农有利的事。士兵受着工农浪潮的影响，尤其是本省的军队，或由土匪散兵改编过来的军队，容易走上兵变的道路。自然党必须尽力使一切兵变在党的指导之下进行，尽量使工农的势力影响兵士，而准备能除去其武装或改编之。此种单独的兵变，在敌人部队移调防地，而我们工作有放弃之虞时，可实行之。在军阀互相吞并战争时，无论何方都要使它发生兵变，即是打败仗主义，这是极易收效、以其武装拿来武装工农的最好办法。因为佣兵作战，胁于官长命令，看见战场上官兵极悲惨之事，于本身毫无利益。倘若我们党在他们战地有组织，一面断绝前线军队与他们的高级官的联系，一面运动士

兵导以出路，没有不成功的。

3. 用各种方法帮助和发展士兵与长官的经济斗争，设法建立士兵和水手（海军）的群众组织。此种组织之适当的形式如“士兵联合会”和“水手联合会”等都可，其任务在保护士兵和水手（海军）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其生活上最切身的利益。

我们的士兵运动，必须估计到雇佣军队的特点，提出于士兵有切身利害而且容易了解的口号，以启发他们的经济斗争。例如：

(1) 兵士月饷二十元；
(2) 发清欠饷；
(3) 按月十足发饷；
(4) 反对克扣军饷；
(5) 军饷公开；
(6) 反对官长打骂兵士；
(7) 有病不出操；
(8) 病兵伤兵要有疗养零用钱；
(9) 反对剥夺士兵自由权；
(10) 杀压迫士兵的官长；
(11) 士兵不打工农——穷鬼不打穷鬼；
(12) 杀屠杀工农的官长；
(13) 士兵参加工农暴动；
(14) 打倒财主佬，分银钱，分土地；
(15) 士兵要田地房屋；
(16) 不替军阀当炮灰；
(17) 打倒不发饷的新军阀；
(18) 打倒屠杀工农的新军阀；
(19) 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

（20）一切士兵加入革命士兵联合会；

（21）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兵利益的。

像上面那类口号，是从他们物质生活的痛苦，说到了他们的出路，利用一切机会燃起和发展士兵与长官之冲突。我们要知道在军队中，要经过斗争，方能增加士兵阶级仇恨，而提高我们的领导权。但兵士的斗争比工人、农民更易走入武装冲突，使我们的组织易于破坏。假如我们未准备兵变或暴动，须注意斗争的方式，不可过于激烈，只能使兵士受我们的影响为标准。例如闹饷，须用要求发饷等形式，使兵士对官长失去信仰；不能得饷时，应用消极手段宣传破坏官长的威信，而不即刻积极地行动，利用待遇问题如伙食或处罚等引起斗争，亦是好的，斗争方法是鼓动请求官长、包围官长、罢操等。

4. 必须在各部队和参谋部成立通信的组织，其目的在时时侦察军队的情绪，并研究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之最适当的对象。

敌人军队的历史，军官成分（上级官、老军官），过去的斗争力，军官财产的来源与状况，人数与武装，营房生活条件，以及关于思想情况等，如能确切知道，我们一切工作才有正确的发展。其通信传达的方法，无论各部队或参谋部，可以利用我们的人在其中当号兵、伙夫，出入比较自由，至于借做小贩、洗衣、补衣亦可。

5. 军阀军队的招募：（甲）自愿的，（乙）按县征募的，（丙）强迫的。在这些时候，从军的分子，按其阶级并不一致，中农、贫农、流氓分子都有。本党在自己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种士兵成分的特点，使自己的工作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

6. 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

在中国一般人中，同样的在工农群众中，散布着反对军队的心理，不能不是工作困难之一。这种心理的来源，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旧式军队对于人民残酷地掠夺与蹂躏。“好人不当兵”成为农家的一种流行陈语。最近几年的实际经验证明，这种心理已有极大的变化。工农群众已经了解，军队是一种力量，统治阶级应用这种力量，可以残酷地压迫劳苦群众。工农群众已经相信，只有破坏军阀的武装力量和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才可以根本消灭旧有的强盗式的军阀军队。所以以前工人不当兵的（工资多于军饷金而且较自由），现已入军队当兵了。

派人加入军队者，以有特殊技能，如能代人写家信或能玩弄乐器者为宜，因为他们容易吸引许多士兵接近与来往。

五　党员军事化

中国一般人都有反对军队的心理，这种心理的来源与不好处，上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共产主义者，要不相信考茨基的信徒说的革命不一定要暴力与流血，要不相信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的不要拿武器吧，那么，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

苏联现在是已经革命成功的国家，我们看，他们在常备军中，一般工农群众中，以至于儿童中，尚且都是非常注意军事设备与训练，自然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更应注意到暴动前之武装工农，乃至暴动后之建立红军。在需要军事人才，若不就此时急急的利用中国军阀军官学校、国外兄弟党及其他公开或不公开的军事组织，以学习军事，则将来革命前途必蒙大多的不

利。我们学习的对象是：

1. 使用武装方面。广州暴动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会打枪，甚至自己打死自己人，得着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从这次可以看出使用现代武器的重要。我们对于射击以至手榴弹自然该学习，就是旧式的刀矛，我们也要利用它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也是应该学习的。

2. 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如巷战如何设置障碍物、壕沟，如何侦探、救护、征发以及战地宣传等，都应充分地训练与学习。

3. 技术，如造炸弹、复装弹药、修炮等的学习。

4. 暴动的策略非常复杂，与常备军的通常策略不同，这种学习必须长期刻苦地研究才行。我们要知道，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刘伯承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
〔2〕即瞿秋白。

PDG

政 治 议 决 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一）中国与世界革命

一、世界革命之发展

一、苏联十月革命时为世界革命发展之第一期。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欧战——帝国主义大战之结果，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独裁制胜利，世界革命之第一阶段，就从此开始。那时西欧各国也有激剧的革命危机（德国、意大利、奥国、匈加利等）。

二、西欧各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革命失败。因为共产派——无产阶级的先锋当时还很幼稚薄弱，没有团结巩固的共产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奸细，工人阶级的极大部分，仍旧在他们这种改良主义的政党的领导之下——所以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受着创巨痛深的失败。只有苏联的革命是胜利了。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失败却仍然能够压迫工人阶级，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暂时的局部的得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

三、世界革命时代的第二期及资本主义之部分稳定。世界革命形势的第二阶段之中，便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的稳定：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世界金融贸易生产额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线，资产阶级广大的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产机关急剧的实行节省主义（Rationalization），根本上是更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取消劳动者在前一时期所争得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的增加、政治的自由等等）。

四、国际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主要矛盾却在剧烈起来。虽然如此，一方面固然世界资本主义有稳定的过程，使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然而别方面，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关系日益险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生长起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深入，以至于引起许多直接的武装斗争及暴动（中国、爪哇、印度、摩洛哥、叙利亚等）。再则，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

五、世界革命的第三期便是帝国主义的新旧矛盾一齐紧张起来。所有这些矛盾的剧烈，便使世界革命的第三阶段开始。世界革命第三期的特点是：工人阶级的左倾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更加成为摇动资本主义稳定的强有力的动力，更加成为各国工人运动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心。

六、革命、暴动、反苏联的战争以及列强大战，是这一期的前途。世界革命的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的暴动，同时，反对苏联的武装战争会有实现的危险，也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巨大的冲

突之可能。

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一、世界革命形势使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估量现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必不可免的：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他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他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他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比现在民权革命的阶段更加要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爪哇、高丽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日本、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给北美合众国的资本主义以巨大的打击。

因此，中国革命的完成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的序幕。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一、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他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二、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

（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暴动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苏维埃的工农民权独裁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后才能够解决这两个

任务。

三、推翻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都必须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农独裁方能完成。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最好的方式。

四、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

一、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中，他的主要口号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

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五、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前途

一、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已经能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便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他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的。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生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只有斗争，只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三）过去斗争的经验

六、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一、民族联合战线时期进到左派国民党时期后，武汉中央也反动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到第六次大会之间，中国革命之中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北伐的胜利，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的革命化，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之下广大的发展和勃兴，土地革命的开始深入……这些事实，接下去却来了中国革命几次严重的失败，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共产党受着摧残，群众运动受着压迫。

中国革命发展，便发生阶级力量的分化，这就将中国资产阶级吓退，使他投降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到了这个时候，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营垒，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之后，因为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的武汉中央，便一天天动摇起来，一天天的反动起来。武汉中央的动摇，日益暴露，尤其到长沙许克祥反动（马夜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的反对土地革命，到马夜事变就已经公开的向工农民众宣战，开始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同时，革命又在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于是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事业便完成了。

二、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暴动，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大，同时也因指导机关的策略错误。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

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三、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中国革命虽然最初有很大的发展，始终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

一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的分裂民族联合的战线，用贿买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的最严重的困难之一。

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他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

三是地主领导的军队力量很大。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的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的军官都是豪绅地主的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薄弱。当时军队还是豪绅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的驯服的工具。

四是工农发展的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月暴动时）。中国工人阶级本来组织太弱，又是很分散的，他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的舞

台，首先受着反动的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豪绅的反动，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

五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到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中里去。

七、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革命性质的误解和联合战线策略的谬解。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指导机关，就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

的失败。

二、无独立性、无批评性只知让步政策，阻碍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竟是自愿的断送革命中之领导权。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争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尤其是马夜事变时的政策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表现。

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他便使英勇斗争的工农，竟致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承认：当时共产国际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的党员群众，要求彻底变更党的路线，改变党的领导机关——的确是对的。

八、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

一、八七会议是布尔塞维克化的开始。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分，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二、“八七”对于国民党问题的错误与土地问题的不彻底并不能减少他的意义。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

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可是这种缺点决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

三、十一月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但对于盲动主义未能充分预防。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要更加详细深切的确定土地问题的策略，提出苏维埃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坚决的决定改造党的组织及引进工人同志来负指导工作的职任。同时，第六次大会认为：十一月会议指出准备好的、联络好的武装暴动之必要，是非常对的。但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的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于是解释革命为不断高涨之可能，就可以发生由此而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暴动政策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成为盲动倾向的根据。因此，没有严厉的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九、南昌、秋收及广州暴动之意义

一、这些暴动决非都是[1]盲动，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

二、南昌暴动指导机关的错误。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

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

三、秋收暴动政策取得农民群众，但是机械的运用这一政策亦发生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但是，秋收暴动政策之机械的应用，亦就发生有些地方的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的行动。

四、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的时期，但他的失败使他成为“退兵时的一战”。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广州暴动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暴动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障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客观上广州暴动在革命失败过程中成为“退兵时的一战”（Ariergard Fight）。

第六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很正确的指出暴动时的错误：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暴动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第六次大会认为这些错误，也是暴动不能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五、广州暴动后党的政策没有能及时转变，反盲动的斗争未能充分，这是由过于估量革命敌人的崩溃。广州暴动，客观上是革命失败的过程中“退兵时的一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的指导机关没有估计到。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的方向，必须坚决的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

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必须集中注意于战胜盲动主义的倾向，更加加紧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更加要消灭对于工人阶级及一般群众的命令式的强迫方法。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充分看清这一点，他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办法，很明显的是不够的；……因为对于帝国主义及反动力量看得过小，相当的过于重视了农民运动的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在这种关系上不估量环境的两湖暴动等计划，就是错误了。

（四）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

十、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

一、革命高潮过去。工农运动的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都遭着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丧。

二、现时没有革命高潮与工农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农民的游击战争此起彼落的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打击最重。

三、帝国主义实行瓜分政策。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暴动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

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四、帝国主义现在比中国革命的力量大。瓜分政策的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的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即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大战，但是现在列强之间还没有如此剧烈的冲突。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的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的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的关系。

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的反对中国革命的。

六、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之间虽有矛盾，仍能一致压迫革命。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的势力，因此也就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的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十一、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之意义

一、中国反动统治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革命的新的高潮不可避免。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进攻：（一）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能解决了的；（二）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的抛弃自己的对华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工业经济的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的价格不断的高涨，劳动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富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的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二、国际形势能够帮助于高潮的生长。革命潮流生长的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起来，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的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生长以及中国邻近的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印度）。

三、新的高潮的征象已见，但不可过分的估量。第六次大会认为：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征象，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自动的从下层组织起

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的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分。

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

四、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而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从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

十二、争取群众的任务

一、新的高潮中要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二、现时全国范围内只要宣传武装暴动的必要，以准备新的高潮。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

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使群众了解，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那就决不能改良群众的生活状况，并向群众进行不断的宣传。

三、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的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的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四、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长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小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号召武装暴动起来），扩大群众的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一开始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的唯一指导者。

五、准备武装暴动正要争取群众。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须的必要的前提，亦就是将武装暴动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十三、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

一、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其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

恐怖主义），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二、盲动主义是不顾群众、不顾敌人的力量少数人的军事冒险。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的实行武装战斗，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坏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暴动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无往不是“暴动”，否认日常经济政治部分的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的暴动，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暴动，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

三、盲动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分子：乡村的及城市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智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的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

四、党应当使贫民、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加入革命。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的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

应当日益加紧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

五、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也要反对。盲动主义之前，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的一部分，就是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误认平均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内这些倾向都应当严厉的反对。

六、命令主义使群众离开党。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的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七、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的任务是不能并存。甚至职工运动之中也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络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

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的

完全的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

八、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之正当可以使党不再受机会主义的危险。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却仍旧可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

党的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党的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争，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群众的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又要阻止工人及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联合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

九、联合小资产阶级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但是同时要知道领导劳动者反对一切的剥削者。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相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

十、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阶级关系已经与五卅时期完全不同。革命的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将来广大下层群众的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

途——这是极大的错误。

十一、对于农民革命作用之忽视，亦是极大的错误倾向。再则，阶级斗争激烈的分化过程之中，彻底的土地革命的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

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十二、反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斗争都是反机会主义的继续。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及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的这些危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别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

（五）党的任务

十四、党内工作问题

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

（二）积极的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

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

（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

（四）肃清党内一切纠纷、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内的统一，减低他的战斗力。取消所谓“惩办”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

（五）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时期的经验。

（六）加紧宣传武装暴动策略的正确观念，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的总任务。

十五、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问题

（一）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自己积极的赞助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的接受党的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人，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二）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自己之中最觉

悟的最先进的一部分。

（三）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强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的。

（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是反动的，党员也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

（五）有系统的各方面的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的脱离国民党的幻想。详细的对于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

（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实现，[2]要十二分加紧的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

十六、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

（一）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二）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三）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结（To Coordinate）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斗争。

（四）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

可能而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

（五）加紧注意农民的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的秘密结社等等），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

（六）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的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

十七、苏维埃区域中之党的任务

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

今后的任务是：

（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

（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三）彻底的实行土地问题的党纲。

（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

（五）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的阴谋，彻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主等等的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的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

（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

（八）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底的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的使工人群众积极的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的领导权。

十八、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

（一）积极的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联结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的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的斗争。

（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无所畏惧的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的实行这种自由。

（三）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

（四）赞助店员、手工工人、艺徒、苦力的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组织上与无产阶级直接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

十九、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

一、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

完全赞成中央十一月会议及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他们代表买办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系各派，还有一部与统治阶级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左派、张发奎、陈公博等，也是一样的反革命。在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期间，这一派完全变成法西斯蒂派。他们表面上左派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投降豪绅资产阶级而实行对于工农的屠杀压迫政策。

二、准备推翻国民党的各派是党的总目标。党对于国民党主要的任务，是要准备推翻他的政权。现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就要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罪恶，不断的尽量的攻击，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权，尽可能的要加以打击。“要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足以损丧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就是准备推翻国民党的现时的方式。

三、反对第三党等类蒙蔽工农阶级意识的党派。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两极化poliarization）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形之下，这一类的“政党”，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例如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和工农政策”等等，他们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二十、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

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暴动的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

党的任务是：

（一）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的生活和待遇”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

（二）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

（三）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

（四）训练党的军事人才，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五）加紧与军事有关系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

（六）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

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第六次大会认为必须：

（一）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

（二）中央委员会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他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的提出讨论。

（四）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与之共同一致的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共同进行破坏驻华的日本军队的工作，鼓励日本兵士转到革命方面来，并且共同决定实际办法以进行中国境内日本企业（如南满铁路之类）的职工运动。

（五）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行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阴谋。

（六）此外，关于安南的职工运动与法国安南共产党的关系、南洋群岛中国工人运动与印度纳支（马来群岛）共产党（爪哇共产党）的关系、蒙古问题与蒙古的革命党关系等等——都应当要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实际的互相联络的办法。

（七）经过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济难会，加紧与各国工会及世界一般的劳动群众联络，使他们能够加紧对于中国革命及群众组织的赞助，尤其要扩大反对中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宣传。

二十二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

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议决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在编印《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铅印本时，决定删去“都是”二字。

〔2〕中共六大通过这个决议案时，此处增加“纠正忽视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倾向”一句。

PDG

土地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一　中国的土地关系

（一）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

一、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乡村阶级斗争正在深入。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时期，并没有使农民得着胜利。不但如此，封建的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暂时胜利了，他们的力量暂时团结而镇压农民，所以乡村里的统治阶级更加凶恶的压迫农民。同时，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与深入之中发展。

二、农民的斗争是要求得着土地。最近几年的经验之中，可以看见：中国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反对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而斗争的主要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力争乡村社会制度的完全民权主义化；这种斗争，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着土地——土地对于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二）农民的种类和土地关系

一、中国是小农式的农业经济，几乎没有欧洲封建地主式的农业经济。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极大部分（至少在二分之一以上）尤其是肥沃的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民。农民之中，又可以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的多少，分为几种小阶级（富农、中农、小农及最小农）。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而小农经济占着优势。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经济单位，由几百万户的农民生产者的群众，用中国式的农具耕种。

二、农民之中分为佃农、半佃农、自耕农。中国几百万户的农民群众，大半是极小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可以分为：（一）绝对无地的农民（佃农）；（二）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半佃农）；（三）小农自己有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的不足的（自耕农）。

三、土地集中而农民受地主束缚日甚。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的结果。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同时就有土地集中在非农业的阶级（“金钱资本家”）手里去的过程。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的减少，因此，农业生产者（亲自耕种的人）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天天更加受地主阶级的束缚。

四、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使用关系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问题。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

（三）中国土地问题的特点

一、中国土地制度之特点有四项。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互斗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再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条件，因此，最近几百年来，土地制度之中发生出许多特点。其中最要紧的是：

（1）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已经占着优势，这种优势日愈发展（土地大半可以买卖）。

（2）“物产地租”仍旧是很广泛的现象（有时仅只是表面上用金钱的形式）。

（3）地主阶级之中小地主比较大地主更占优势（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剧急）。

（4）各省地主的大小关系是不平衡的。

二、中国的小地主剥削得格外厉害。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较好，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强度”的（中国的农业在较少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的田亩分割得极小，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于是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便非常厉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

三、中国农民受封建式的和资产阶级式的剥削——两种方式混合着。最可注意的是：中国之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着。一方面，土地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别方面，农民（佃农）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还是存在；再则农民受地主的束

缚，甚至丧失身体自由，要卖男鬻女；至于地主方面，用“非经济的”方法，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民，那就更有许多方式，实行得非常广泛。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都互相勾结着，互相混合着。

四、中国农业因此而衰落。农民的破产（农民的“穷困化”——Pauperiyation）土地的缺乏，更使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的剥削，使他们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不能恢复自己的成本（生产资料）——就是不能实行“重复生产”，因为没有重复生产的根本条件。因此，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而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要活活的饿死。

五、所谓公地是豪绅的私产，豪绅地主阶级是村中代表官僚封建制度的。租田制度的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的出租，而且有所谓公地的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的收入，其实都是豪绅的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的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成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再有一种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团防，由办团防而割据地方，转变而为军阀，更利害的剥削农民，掠夺农民的土地，变成更大的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

六、军阀课税等于收租，军阀并且实行一种封建式的军事

徭役。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还有另外一种的剥削：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还是军事封建式的赋役），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并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军阀强迫的拉夫、抽丁当兵、征发牲口食粮等等，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军事的徭役”——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

二 高利贷与商业资本

（四）中国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作用

一、高利贷者与商业资本家往往兼是地主阶级而剥削农民。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几千万农家经济破产而穷困，使农民遇着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简直要成千成万的饿死；再则，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的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的格外需要金钱。因此种种，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中国商人豪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他们也是放账，加上极重的利息，再则，商人买办收买原料（丝茧、茶、米、棉、麦、豆、烟草等等）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先付价钱，扣算利息并且预先抑低原料的价格。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压迫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

削农民（出租田地），互相联络着，勾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上的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便是债主，拼命的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变成了农奴似的奴隶和“卖男鬻女”还不清债的债户。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的土地——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当，结果变成佃农。丧失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就是租的自己原有的田——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亦往往要出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商人、官吏）耕种自己原有的田。新的地主自然仍旧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民。总之，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的剥削农民，有钱的是在变成有地的，有地的变成有货的（收取农民劳动的出产品的），甚至于变成“占有农民的”（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当还债）。

二、资本家利用半封建式的剥削，同时豪绅恶霸更是公开掠夺土地。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仿佛石磨上的两片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商业高利资本，既然加紧的“没收”农民土地，加紧的集中土地于货币资本家之手——同时，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的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于是这种束缚更加广泛起来。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事实上没收农民的私有土地。同时，没收农民土地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公开的掠夺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

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简单的“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侵占土地”等等。

三、农民的生产品因此极大多数被人剥夺而日益破产。几千百万受剥削的农民，生产很多的农业生产品，其中极大部分被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所掠夺。掠夺他们的就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及其代表——官僚与军阀。农民生产者自己所剩的，只有非常之少的米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至于立刻饿死罢了。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死灭的道路上。

三　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斗争

（五）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之意义

一、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是半封建制度。中国土地关系，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现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的特点，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的是半封建制度。

二、中国土地制度的特点并非完全的亚洲式生产。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

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之物质基础；（三）公产社制度之巩固的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联合的现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

三、中国的土地斗争是无地的、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之间互争土地的斗争。许多欧洲国家之中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与中世纪式的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土地斗争就不同。中国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土地斗争之中，几千百万的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大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地少的小自耕农）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

四、这是客观上争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农民的革命斗争，在某种程度之下，虽只是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斗争，但是，客观上是在力争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要使自由的农民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

五、农民同时力争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同时，因为地主与商业高利资本混合而纠缠着，而且大半都是合一的“兼差的”，所以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商业高利资本的压迫，他们是不能得到巩固的革命胜利的。

六、然而主要是反对地主。虽然如此，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在现时这一阶段，还是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之斗争——这一阶级是中国社会之中经济上最有力的主要的封建余孽。

七、军阀实际是最大地主，自耕农因赋税之重而实在不能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农民力争使用土地的自由，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军阀的，因为军阀不但在经济上和乡村中的统治阶级地主、豪商、高利贷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许多省区之内军阀实际上是全省土地的主人。他们用收捐、收税、派款等等的办法直接榨取农民的地租。例如北方有些省区，小自耕农居多数，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军阀，他们可以按亩随意抽捐，使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

八、农民运动发展还要反对半地主的富农。革命的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照过去经验看来，不免要发展到反对“半地主”的斗争。中国富农有许多是半地主，因为他用雇农而剥削雇佣劳动，比他出租田地而剥削佃农劳动的程度是相差不远的。现在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这种斗争有些地方是很剧烈的。

四　帝国主义与中国土地问题

（六）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农村的经济

一、帝国主义握有管理中国全体经济之权。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他。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关税管理、银行垄断、一切重工业、大商号等）。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的管理权。

二、外国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相勾结。外国资本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经济上封建制度的余孽。帝国主义便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

三、中国农村输出的原料多，收入的代价少。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征服中国的封建余孽，间接的收刮农民的膏血，利用中国的一切积极的寄生虫阶级，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商业高利资本得着帝国主义强有力的经济帮助，所以农村里的价值（原料、利钱等）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代价，整个的农村是支出超过收入。

四、外国资本还有其他种种剥削中国的方法。外国财政资本这样掠夺中国（中国是他商品销售的市场是收买原料的地方），但是除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种剥削中国的方法（中国是他可以投资的市场）。帝国主义还自己开办工厂，剥削便宜的中国劳动；帝国主义还投资到中国——放出许多“外资”，还有在中国的租借地，都可以得着异乎寻常的利润，攫取中国的收入的主要机关，以保障掠夺来的利钱（关税、盐税的管理），甚至公开的侵占掠夺，还要求军事赔款。外国教堂更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农民。

五、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开始小小的资本主义式的土地集中，而主要的是使中国农产受国际市场的监督。同时，中国还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这种情形，使钱业的投机商大大的掠夺农民。此外，还有许多无价的纸币库券。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金钱的作用一天天的大起来，而且因为帝国主义采买原料，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工商

业植物”的种植增多，发展了所谓“商业的农业”。于是得着两个结果：一、是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种桑等等——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也开始了，不过这在中国现时还非常之少；二、是中国农产市场受着世界农产市场的监督。帝国主义要需某种原料，他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所以农村经济的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中国便有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这种倾向是很明显的。

六、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但他始终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中国的剥削制度，完全是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别一方面，帝国主义资本的侵入，却在一天天的增高货币经济的作用，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加强“商业的农业”，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又必然要使许多原始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渐渐消灭，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七、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农村有极大的人口过剩。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力，促进农业里宗法社会关系的崩溃及一般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一方面完全消灭了落后的农民的家庭工业，别方面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的各种方式的家庭工业出现，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分裂与衰落来得很快，而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慢得多。于是农村之中便出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的多，土匪、流氓、劳动后备军一天天的增加，工力的价值一天天的低落，同时又是中国雇佣军队的来源。

八、中国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推翻帝国主义，然后才能得到解放。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同

时，中国农民不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的束缚，不彻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不消灭农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人翁——地主豪绅阶级，也就决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

九、积累起的资本不流入工业而流入高利贷与农业。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量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

五　土地关系发展之前途

（七）社会主义的前途之斗争

一、中国农村受着资本主义的一切坏处，却没有他的好处。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勉强的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维持封建制度的余孽，而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变成寄生虫似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同时，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农业中相当的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够使金钱和市场的权力加强起来，商业的农业发展，土地买卖的过程增加。中国农业发展的途程，在这一点上说来是和各国一样的。但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有许多遗留的特殊状态，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化，有特殊的性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在一般的经济停滞状态之中，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停滞。这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不同。再则中国没有大农业经济，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农经济，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且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全国一般的破产状态之中。

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平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破产失业广大的穷困等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

的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增高）。

从中国掠夺去的资本，极大部分是用在中国国境以外，而中国所得到的是群众的破产、失业、死亡、屠杀。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艰难畸形的半途而废的，尤其是农业。自然，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之困难的，非常之畸形的，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形，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的共同的特点。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首先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农村之中发生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经济。自然，这种富农经济现时很少的。

三、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可以分为富农、雇农、最小农、小农、中农。中国农民阶级分化的总过程之中，可以看见富农的经济有资本主义的成分的。阶级分化的过程，是因为金钱的作用和商业的作用而发生的。这一过程的表现：一方面是中国农村之中发现刮削雇佣工人的小小的农村资本家，而别方面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发生出来，所谓劳动后备军，日益增加。因而增多城市里苦力工人的数量。农村之中所谓短工长工的雇农，也日益增多。所以开始造成资本家经营农业的条件。农民中的富裕分子，便能雇用工人（雇农）而成为富农。

四、富农的主要特点是刮削雇农的劳动。于是刮削雇农的方法，便开始成为富农的主要的经济特点。然而中国经济的一般条件，使生产力的生长十分停滞，对于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碍，对于农民上层分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因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旧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

经营商业和高利盘剥。再则，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绝无政治权利的，农村之中一切强暴侵占的现象是常见的。

五、一部分农民用强抢的方法变成富农。在如此特殊的状况之下，一般农民之中强有力的人，便能不用经济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夺，占侵田地，强抢财产，如此而变成富农。不错，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至今尚是含糊的，不纯粹的，但是在这个分化过程观点上看来确是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民资产阶级——富农，别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此外，一般农民之中，又有许多过渡阶层：中农和贫农——通常所谓贫农之中阶级的分析上，还可以分为“最小农”及“小农”。“最小农”是最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

六、农业工人是被雇的劳动者。至于农业的工人阶级则为雇用工人（长工、短工、日工），此等工人被雇佣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及与农业相联系的工业（油车、茶厂、糖厂等）中以维持其生存。

七、最小农的特点是以兼做雇工所得工资为其主要收入。最小农的特点，是他还有最小数量的田地可以自己耕种（或者自耕农，或者佃农），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每年亏空，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兼做雇工的收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这种农民非常之多，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最小农的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之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

八、小农是通常不用雇农的小耕作农，勉强可维持贫困的生活。至于所谓的“小农”，就是小耕作农，他们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种，勉强供给一家人贫困的生活，而不用雇农。即使雇用短工，同时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那也大半是带亲友宗族之

“劳动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这种雇佣关系也渐渐的进到资本主义的雇佣方式。

九、中农是有余裕的可能而且有时能用雇农的。“‘中农’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小土地私有者，不论他是自己的私产，或是租来的土地，都只是较小的土地，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般而论，这种田地不但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而且可以得着些余钱剩米，年代好的时候，可以变成小小的资本，他们常常要雇用雇工。”（列宁）

十、农民分化的程度随着金钱关系及商业发展程度而不同。这些分析，可以看见农民经济之中大致的几种经济形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尤其是农业经济之中，实际上可以看见许多过渡的中间的形式。农民的这种分化，因各地金钱作用及商业作用之发展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也不同。金钱和商业之愈发展，农民的分化亦愈利害。况且天灾战祸，使一般的农民生活程度降低，而加紧农民的阶级分化，穷的更加穷，而极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

十一、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是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的进展。富农经济虽然很少，可是小农经济在中国占绝大的优势，农民自己的土地上也是小耕作的经济（出租给许多小农耕种）。除农民经济外，差不多完全没有其他经济（其他耕作营业的方法，如地主的大经济，包括几百亩田地以上的农场，或者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在中国是很少很少）。因此，历史上中国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资本主义式农家经济的向前发展，这是战胜封建残余的一定的形式。

现在可以说，中国农业之中小的农家经济，是统治着全国，不过被封建余毒、强暴压迫等所层层束缚着罢了。

十二、大地主经济变成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之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很没有可能，因为中国没有大地主经济，而且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小地主没有充分的资本来改良生产技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理论上还有别一种的可能（因为工业发展得很小，生产的资本不够，所以欧洲式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发展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国不会有一方面保存地主经济，别方面又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现象），所以第二种可能，理论上可以是："大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经济变成大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但是，这第二种可能是很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完全没有地主经济。即使认为佃农所耕的地主土地是"地主经济"，那末，要将佃农都变成雇农，使用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如果要如此办法，先就要有农业生产方法上技术革命。必须要农业的技术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应用机器、改良家畜的应用方法等），然后才能真正运用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制度，否则，仍旧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现在中国这种农业技术，那末在经济上看来，地主不出租田地或用多数的雇农，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术，先就要在农业里投一大笔资本，中国的小地主是没有这样的大资本。

十三、如果现在政治情形继续不变，则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很难变为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如此，即使中国地主有这么多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革命的农民运动非常之利害，必须先将农民都镇压住了，才可以投资，否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政治制度要有极大的变更，否则国内战争不停止，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都不确定，土匪都没有肃清，这样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这种情形不改

变，封建式强暴的刮削农民，永久是农业经济中的一般现象。

所以，这第二种的可能，客观上是很少的，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地主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刮削者，只有极少的可能。

十四、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还有由外国投资的第三种可能。但是革命深入这也很难了。现在，中国的殖民区域（满蒙等处）也有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村经济，农业公司，而且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式居多（仍旧参用出租制度）。这些农业经济的发展，遇着许多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所以非常之慢，他在全国农业之中的分量是很小很小的。然而理论上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式的进化，还有第三种可能的道路这就是外国大资本家投资在中国农业，组成很大的农业公司，例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集中）以及其他方式。

这种道路，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加强，生产力的增高加多。但是中国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也不能有多大的范围。因为，这是保存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是更加加增这种压迫，简直要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而要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现时却更加困难起来，因为现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到更高的程度，已经不是轻易可以压下去的了。

十五、只有革命的方法能彻底痛快的推翻封建剥削。如果假定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那么，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是非常之慢、非常之痛苦的。要在几十年之中继续现时的状态，中国的农民还要受着更残酷的压迫、束缚、饥荒、灾害、亚洲式的屠杀，以及其他封建的余毒。

十六、土地革命是开辟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余毒相矛盾的表现。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肃清土地关系里的封建余毒，完全消灭一切压迫束缚的方法，完全消除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才能开辟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比较快的发展——将中国农民（如佃农和农奴）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

但是，中国与当初的美国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式小农经济，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发展的模范。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时代，他的农家经济能有长期的开发，中国的这种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可能，他的前途与美国不同。

十七、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肃清封建余孽绝不应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只是将走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步。中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既然很低，资本积累的速度自然比较的很慢。然而当革命胜利，而要开始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时候，他却要碰见一个极大的阻碍，就是帝国主义。革命胜利推倒了西欧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的工具——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军阀等，使帝国主义必然要找新的方法来剥削中国。那时候，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即使只想得到半分的独立性，亦必须与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而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这些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亦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自由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非常困难的。

在革命之后与帝国主义作这样剧烈的斗争时，必然要把已经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提得极高，但这是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很有妨碍的。取得政权的工农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

展的碍障？他所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说要赶快准备各种条件去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代以有组织的经济。局部方面，要准备条件，使工人政府能够去没收大工业生产机关，而在国有的城市大工业领导之下，去进行集体的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经过合作社而使数千百万农民经济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相联合，但这却就已经不是准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了，这是准备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

十八、社会主义前途的有利条件，资产阶级领导之破产与无产阶级觉悟之进步。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完全破产的条件之下，在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必然胜利的前途之下，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突飞猛进。不讲别的，单有这一件，已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容易得多。

中国的革命农民，除开与已经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与各先进国家和中国本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一同前进去建设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解放得自己。

因此，中国民权革命得着胜利，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革命的过程里，他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中国现在具体的环境，使他必然这样走。

十九、中国农村半无产阶级以及苦力雇农如此广大就能造成转变的一个基础。就是现在，中国农村里面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已经很剧烈了。以后只要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有一个初步的胜利，这冲突一定会更加剧烈。因此，就是现在中国农村工人已经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同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去与乡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以求前途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至于这个前途是否一定能够胜利，这当然要看将来的实际环境。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断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要用斗争来解决，是要领导中国革命向这条路线上发展。

二十、目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中共产党的土地党纲。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以下的方针：

（一）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

（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

（四）各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工农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

（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

（六）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

（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

（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

A. 办理土地工程；

B. 改良扩充水利；

C. 防御天灾；

D. 国家办理移民事业；

E. 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

F. 组织消费及生产的合作社；

G. 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

（九）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

二十一、苏维埃政权巩固后，即当实现土地国有。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共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方法。

二十二、商品经济不消灭，被剥削的农民群众永远不得完全解放，须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为彻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争斗。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论什么情形之下，在民权土地革命中不论什么状况之下，总是一定不变的力求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要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是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永远互相冲突的，要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认清一天商品生产存在，农民群众一天还是穷苦的，要他们知道惟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够消灭一切的贫困、一切的剥削。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农民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一）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

一、农民群众生活的日益痛苦。现时农村情形，是广大的农民群众生活日益加坏，一方面因军阀间不断的战争与国内经济的恐慌停滞，另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得到暂时的胜利，对乡村农民直接压迫剥削越发加剧。因此乡村中的阶级矛盾越加利害，农民运动进到更深入更高的要求与更剧烈的斗争。

二、农民运动的高涨与发展的不平衡。最近几个月来，许多省份里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都证明农民运动很大的高涨（如许多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消灭乡村统治的地主豪绅等）。其范围也愈加广阔，蔓延到中国北部与满洲。现在特别显著的情形，是农民运动的带地方性与不平衡。一方面有它的客观原因（如地方的辽阔、交通的不发达与经济情形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群众的散漫与缺乏组织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缺乏集中的指导机关。

三、各地农民斗争中表现的要求也有差别。在最近斗争中，全国各地农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要求亦显有差别。在中国南部与中部一带，无地的农民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其斗争的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主要的方向在于反对地主阶级，夺取土地与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北部（如河南、山东、直隶、满洲等处）则大半为小的自耕农，其斗争的方向，大都反抗军阀、官僚与豪绅等的苛捐杂税、拉夫的剥削和打倒军阀政权，这就是破坏封建土地关系的另一方式。当然，同时在北方还有佃农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不过现在主要的还是自耕农保持实际的土地所有权的斗争。

（二）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与共产党的策略的路线

一、农民斗争愈进展阶级矛盾愈暴露。过去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一切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全体农民还可以结成政治上的统一的战线。但是进到比较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乡村无产阶级与农业资产阶级，贫农与富农，其阶级的矛盾表现得非常之快，尤其是到了暴动胜利，平分土地的时候。

二、中国富农的特性与对于富农的策略。富农在农民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常表现消极、中立或仇视的态度，最后常更快的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这是因为中国富农一种特殊的性质。他具有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形式，他往往是农业企业和工商业企业的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或者同时又将其土地的一部分出租，以通常残酷的形式来剥削佃农，或以高利贷来剥削一切贫农。党应当预先看见：农民必然继续分化与富农的走入反革命营垒也不可免，所以应当在农民运动初发展时，即准备着下一阶段的斗争。

凡富农现在已成为反动力量的地方，那末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

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受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摇动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成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但贫农与雇农的斗争应同时进行，决不能因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所让步。

三、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之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必能得到广大的中农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农群众也是受地主阶级各种封建剥削压迫群众中的一部分。

四、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共产党的策略的路线。在现在革命的阶段，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至中农止。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要特别注意于贫农中的工作，防止富农的夺取农民组织的领导权，并须在农民组织中，巩固贫农与雇农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

（三）平分土地问题

一、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应加以批评。在有很多失业和贫困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

制度的。

同时这个口号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党必须加以批评，使农民完全了解，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决没有真正平等的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

二、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能强施“平分土地”。在中农和小农私有制占农民人口多数的地方，“平分土地”必将触犯广大中农的利益，尤其不能强使施行。

（四）农村无产阶级

农村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的组织与政纲。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提出明显的政纲，并领导他们的阶级斗争，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急要的任务。在南方几省的农民运动已为贫农所领导，必须在这些地方的农民组织中，组织雇农支部，以加强雇农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在已有富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的地方，最好成立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加入农民协会并与县工会发生联系。如不成立独立组织，至少亦须在混合的农民组织中建立强固的雇农支部。手工业雇用工人可以加入雇农工会。在满洲和内蒙的移民当中，亦应加紧工作，因为都是各省无地农民，走到那边去做农业工人的。

（五）妇女在农民运动中之作用

在农民革命运动求得胜利的斗争中，吸收农民妇女群众加入斗争有极大的意义。他们直接参加农村经济，在农民的队伍

中间占重要的部分，而且在农民的生活中有伟大的作用，因此他们必然要参加到运动中间来。过去许多区域中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土地农村革命失败。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的革命组织中来，尤其是农民协会及苏维埃。

（六）青年在农民运动中之作用

在过去斗争阶段中，农民青年对于土地斗争的作用确是很大。在苏维埃区域中，农民游击队伍以及其他农民斗争中，都有大部分的青年农民参加，今后应使这种作用继续增长。在这种农民斗争中，应提出青年农民特殊的利益并助其实现。应吸收青年农民积极参加农协及苏维埃。农协应经过农协中之青年农民部，协助少年先锋队与劳动童子团的工作与发展，在苏维埃区域更应尽量赞助农村青年要求纲领之实现。

（七）宣传土地政纲与部分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的任务是夺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其影响之下，应当尽量的使党的土地政纲通俗化，并使之与各地特殊条件发生连系，在运动薄弱的区域或暂时失败的区域，党应当赞助农民所提出的各种部分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抗捐等），并领导这些运动发展到较高的程度。

（八）农民协会及其他农民组织

一、应尽量扩大并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最近几个月来，在南部与中部的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都有缩小的表现。这是由于农民斗争的方式，已转移到更激烈的游击战争，与广大的群众缺乏亲密的联系。农协在中部与南部各省，为农民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留有很深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于农协的扩大与巩固，团聚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的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的斗争。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乡村，农民协会应当是非法的组织，来领导农民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杀地主豪绅直到准备与领导武装暴动为止。农民协会的组织，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极力纠正以党来委派农协委员的办法，使农协成为真正的群众的组织。

二、农民协会与苏维埃。在暴动当中，农民协会既已成为领导广大群众暴动的执行机关，在暴动胜利后，自然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新政权的中心骨干。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一切乡村的政治的经济的处置都应集中于苏维埃。

三、对付大刀会、红枪会等的策略。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伟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多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的革命的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

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

四、组织农协及其他团体。此外还需继续发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如果农民协会不为群众所拥护的地方，可以组织其他名义或各种临时的组织，或利用农民原有的组织，以便更能适合于地方条件（如反军阀同盟或抗税同盟等）。

（九）游击战争

一、游击战争将成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在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最激烈的地方，每一小的日常生活的斗争，都必须要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游击战争已成为这些地方的主要斗争的方式。所以共产党必须积极的坚决的去领导这些斗争，使其更有组织性和与群众更亲密的联系。

二、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和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等。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第一，当即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杀戮豪绅地主等，建立农民代表会议与农村苏维埃政权），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到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中渐次吸引勇敢的青年，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的队伍中来，使其渐次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如收缴民团、警察的武装等。

三、游击战争的弱点：散漫、缺乏与群众的联系、毁灭城市和乡村、无目的的烧杀倾向。在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不少的弱点和不好的倾向，这些弱点和不好的倾向，都足以妨害游击战争的发展，甚至消灭他。所以必须与这些弱点奋斗。第一，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甚至受豪绅地主的宣传以为是一种土匪的行动。所以以后的游击战争

的发动必须出自于群众的要求，必须在群众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宣传煽动的工作同时进行。第二，毁灭城市与无目的的大杀、大烧、大抢的倾向，这种倾向，更是一种游民无产阶级的心理反映，足以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的发展。所以在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消灭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党所反对的，只是无目的与总的革命任务不相同的烧杀，只是反对“为烧杀的烧杀”，反对不是为革命真正利益的烧杀。第三，散漫而缺乏组织。以后必须有计划的有组织而集中的指导（农民协会）。

四、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时，党必须注意到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用适当的策略来领导。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案指示我们：“各省区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能够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只有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就是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起来。”从过去的经验，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之下，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区域是有可能的。并非游击战争必定要变成地方暴动。必须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真正发动了极广大的农民群众，在群众要真正有建立自己政权的要求，在当地反动势力确在动摇崩溃的时候，然后游击战争必定要发展到地方暴动。所以在游击战争发展到比较广大的区域，有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有转到县市的地方暴动的形势时，党必须注意客观条件及主观力量，有准备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县市工人群众的领导与联络去进行暴动。运用适当的策略，在暴动胜利以后，实现一切群众斗争的口号，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以发展更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尤其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到邻近的区域中去。

五、党对农民自发的暴动，必须领导。现在农民群众生活日益痛苦，所受压迫日益厉害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自发的暴动，党对这种自发的暴动必须切实去领导。尤其要加紧在县城或镇市手工业工人及店员中的工作，使他们明白农民暴动的意义，帮助并领导这种自发的暴动，一直到苏维埃政权的创立与扩大。

（十）对民团土匪的策略

党应在民团土匪中宣传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民团土匪的社会成分，这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有些地方的农民，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民团更多是农民被佣为团丁的。所以党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政纲，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来吸引这些武装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来。

（十一）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

工人阶级在农民中领导的巩固，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与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所以必须加紧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并将无产阶级的分子引入农民运动及其领导机关中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工人组织与农民协会发生经常的关系，必须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宣传工人阶级斗争的意义与目的，使他们觉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解放，并在失业回乡去的工人中工作。

（十二）农村中的党的工作

一、巩固农民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乡村党部主要任务。取得和巩固农民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乡村党部的主要任务和一切实际工作的总方向。在一切农民斗争与农民工作的组织中，党的支部应为自己保证领导的作用。在宣传鼓动的工作中，党的支部应该解释共产党的作用及其现时的任务。

二、共产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分子所构成。共产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应该在农村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先进的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中扩张党的组织。如果吸收农民中一切革命群众加入党的组织，必使党代替了农民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所以革命的农民群众，必须使之团结于农民协会或苏维埃之下。过去以党代替农协代替苏维埃以容纳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倾向，应极力纠正。党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影响农协和苏维埃，更不能直接的命令或指挥群众。

党为实现这些工作起见，必须找到一部分积极分子到农村中去工作，中央与省委的农民委员会尤应加紧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一、五卅后工会的发展及武汉末期中我们工作路线的错误。自一九二五年起，中国工人阶级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引导力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伟大的罢工运动，唤醒了城市及农村之广大的群众，使中国革命运动更成为真正的平民群众运动。工会从罢工运动之中生长出来，罢工委员会逐渐变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或干事会，罢工工人成为工会会员。所有这些运动，在经济的政治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当时，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容易的便战胜了他的竞争者，无产阶级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

北伐开始以来，特别在武汉末期中，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的路线，没有时常依照着无产阶级之阶级的利益出发，反而时常站在“北伐”的利益上，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的利益上，结果使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完全服从着别一阶级的利益。这种策略必不可免的使党的工作路线离开主要的产业工人阶级（如停顿了北方铁路工人中间的工作），渐渐不自觉的堕落到阶级合作的观点上去。

二、工会未曾作为真正的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在形式上取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得广大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但是却没有造成相当的组织上的骨干，没有训练出充分的无产阶级干部。工人阶级看着职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造出来的战斗组织，可以来拥护中国工人利益，可以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职工会在工人群众的心理中，有些地方差不多认为是阶级以外的，是超阶级的。在国民革命及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中，表现着最积极的仅是一部分比较少数的而与群众联系薄弱的先锋队，群众仍然没有充分的动员，在日常工作中，还没有表现着充分的积极。

三、委派制度的遗毒。职工运动的组织，越来越多的应用委派制度。这种不正确的现象，使着党去委派职工会的委员长、书记等等，当时并没有顾及到群众对于这种制度的感想怎样——对于职工会的指导人，几乎完全没有应用民主的选举制度。所有职工运动中的组织，都没有建筑在从下而上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一切都成了相反的现象——是由上而下。没有在下层工作中训练工人群众，挑选他们加入指导机关，党时常派遣许多素日完全不知工人生活状况的学生加入职工会中的机关。因此，所有党与职工会的联系，都建立在不正确的原则之上。于是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得不为之削弱。这是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以前的状况。其后在秘密状态中，党为保存秘密机关起见，有的不得不用委派制，于是群众与党的联系更加隔离起来。

四、白色恐怖对职工运动的打击，今后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使他们围绕党与工会。政变以后，一切反动势力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于：一、杀戮一切革命的先锋队。二、消灭革命的工人组织，或是将他逼到一个非常秘密的状况。三、消灭革命的工人组织之后，若是不能完全将工人压迫下去，则创设他们自己的组织，以管理工人运动。

虽然经过了许多非常残酷的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杀死数万的工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虽然有许多军事上经济上的压迫，以及厂主以工厂管理机关的压迫，虽然有许多反动工会领袖的欺骗，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完全与他的革命组织脱离关系，政府工会仍是不能把持工人运动。但是革命的职工运动之范围，党的影响之渗入工人阶级所必经的门户——却缩小了很多。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因此，现在之基本任务，就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他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这是在职工运动公开存在的时候，所不曾充分解决的任务，现在逼着我们在艰难万倍的条件之下去解决他。这个任务不解决，则中国革命不能够得胜利的。在组织问题上之基本的策略任务是：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一方面促进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另一方面才能保证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民众中间的指导作用。

五、资本进攻。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中外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工人阶级进行很广大的进攻，这都在工人阶级之工资微小、工作时间的长久以及一般恶劣的劳动条件上表现出来。在这斗争中，资产阶级用尽了一切经济进攻的方法，例如：一、关闭工厂；二、大批的应用童工女工来代替普通男工；三、大批开除革命工人。革命工会他的日常工作中，要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证明，这些群众的经济的阶级组织，他不仅是号召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并且也能以拥护无产阶级日常生活中之经济上的利益。革命工会应当要会提出并拥护某种某种工人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条件之下所认为比

一切都迫切的经济要求。贪小利而忘大事的危险，在中国是不大的。中国工人之阶级斗争已经走到了非常严重的形式，因此，工人阶级之广大的经济斗争是一定要转变为政治斗争的。但是，若想政治斗争得着胜利，那就只有用经常的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斗争的方法，动员了组织了广大工人群众之后。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职工会应当发展与巩固自己的下层组织，造成坚定的基础，尽可能的与大企业、中等企业发生密切的联系。

六、正确的罢工策略之重要与命令罢工之错误。在这情形之下，正确的罢工策略，是有格外重大的意义。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决议的经济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必需有一天休息日，工资照付，每年的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禁止十四岁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的六小时工作制，禁止女工的夜班，女工产前产后之休假照付工资，同等劳动同等工资等），在各个罢工中须估计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着的要求。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几个工人阶级所完全明了的基本的要求上。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之最危险的现象，是“从上面”宣布罢工，“命令罢工”，使一部分少数积极分子抛弃工作，对于下层工人群众加以恐骇压迫等等的方法。一切的罢工都需要有非常谨慎的预备，要使一切工人都来讨论这些要求，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分。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的，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工委员会认为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只有如此，然后他们自己的指导机关或代表被捕之后，所有的群众才能起来因此而作坚决的斗争。

七、罢工策略的一般方针——须提出要求之注意点。在白色恐怖及秘密的条件之下，不论什么罢工，都没有以中华全国

总工会或上海总工会等的名义来提出要求的必要。若这样，有时可以将一部分落后的工人骇走，另一方面使反动势力可以得着一个挑衅和进一步施行压迫的借口。罢工必须由该企业或几个企业中的工人宣布，以后就以这些企业中之工人的名义进行。假若有可能，则可以使相当的职工会出来帮助这一次的罢工。为打倒反动工会之立足点起见，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订立条件的时候，不必用职工会的名义，而可以用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现在普及于工人群众而为他们所最了解的要求是：一、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的劳资条件（团体契约），关于工资及工作时间的规定等；二、反对任意开除工人；三、反对强迫仲裁；四、反对包工制；五、恢复工人自己的工会，争得工会的自由权。

提出这些要求时（特别是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所缔结的团体契约），事实上便巩固了斗争中之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系，继续旧时的革命遗传，随后便可以由此而引导这种经济斗争，到旧时的革命旗帜之下来进行。一切阶级斗争是要企图实现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提出来的要求，在职工会的日常工作中却只要提出为一部分工人在当时所最有兴趣的部分的要求。这种为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应当使他与无产阶级之一般的争夺阶级利益的斗争发生联系。

八、反对阶级合作的思想。革命的职工会站在拥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观点上，应当尽量反对一切或明或暗之阶级合作的形式与倾向，反对欺骗工人的“工人团体参加提高生产力”的主张，反对厂家所办工会，反对工人分红的诱惑（这与“赏金”或年底双薪有别）；反对厂家工会创办所谓“工人银行”、“工人储蓄会”、“协作的企业”等，反对一切中外资本家、国民党、反动工会所宣传的思想——阶级利益应服从“全民利

益”、“全国利益”的思想，这种理论，事实上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

九、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工会，都异口同声的向中国工人宣传，说中国华商企业中的劳资条件比较外国洋商企业中要好些。革命工会应当揭破这种欺骗，应当在宣传上在事实上都证明给工人阶级看：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是一样残酷的剥削中国工人群众，都一样是我们阶级的敌人，工人应当同样的向他们进行极严厉的斗争。应当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这种宣传的真实意义，事实上是破坏革命斗争的阴谋，如此的说明与解释，应当是揭破反动工会领袖之卖阶级的一种方法。

十、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对上层的剥削者，同样实行阶级斗争，对非剥削者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应赞助其斗争。为了要与白色恐怖斗争，为了要把处在四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工人阶级，从消沉状态中振作起来的缘故，所以引起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贫民对于工人阶级的同情，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日本干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党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企图阻止这个运动的），如果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积极参加，一定可以创造出许多适当的环境，以恢复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正确的，随机应变的罢工策略，是要能够估计复杂的环境，分化敌人的营垒，要计算怎样才可以给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一个打击，同时在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找着可能的同盟者来帮助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是可以削弱白色恐怖的力量，除去无产阶级中消沉的现象，振作起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而且对于反革命工会的斗争也可以更占优势。但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分为二部分：对雇用劳动的上层的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与对一般资产阶

级一样；对于无雇用劳动的（自己劳动或家庭劳动）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应帮助他们的利益（如赞助废除苛捐杂税等）以取得对于我们的同情与帮助。总之，在这里的最高原则是发展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或阻碍阶级斗争之发展的。

十一、与反动工会机关斗争，同时要能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反动工会有许多在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所造的，这种工会势力之主要的来源，是依靠军事警察机关。但是政府工会存在的这一年中间，特别从去年底，上海的所谓“工人总会”——以后与反革命的“工会统一委员会”合并为“工会整理委员会”——是可以取得一部分落后的工人。他们不仅应用强迫方法，并且也用些改良主义的方法，有时也放任一点罢工，向资本家为一部分工人取得一点很小的让步。因此与反动工会斗争，不仅要战胜军事警察机关的侵犯，并且也要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及对国民党信仰之残余。

十二、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为与反动工会斗争起见，必要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与阶级教育。用个人恐怖的方法来反对反动工会，这不一定对他们有害，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也有害处。单纯的个人恐怖的方法，仅只是使革命者的注意力离开了主要任务，事实上，个人恐怖乃是企图用一种便易的方法——刺杀反动工会中之最坏的领袖——代替那种基本的困难方法——调动与组织工人群众。

应当承认的：恐怖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有他的深厚的基础，在相当条件之下，他是为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为着作自卫的方法）。但是，站在斗争方法的观点上来说，这个方法不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发展群众工作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和阻碍。关于这种行动，我们不仅在反对反动工会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并且在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新起的反帝运动之中，已经有许多城市的职工运动，因此重兴起来（汕头、厦门、杭州、无锡以及芜湖等），而各地党部，不去积极参加这种运动，不去力求争取群众，却又提出是否可以不去参加这种运动，而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几个日本厂主或其他的剥削者。这样便将反帝运动及因此而发生的一切团体，断送给国民党，国民党却是希望消灭他们的。

十三、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许多有工人群众的反动工会，改良工会、行会工会中，如广州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上海几个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政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中，我们是应当到里面去作工的。我们同志并不是要加入政府或国民党所指派的反动工会的上层机关，乃是要在这些工会下面所组织的群众之中工作。若不派遣工作同志到这些工会中去，那就是我们将这一部分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抛弃在反动派的影响之下。无情的揭破反动领袖的卖阶级性，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法西斯蒂的面具，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彻底的破坏反动工会。但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

十四、革命工会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基本的工作。职工会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任何一个工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宗教信仰如何，帮口如何，他都可以加入，只要知道阶级的团结，并接受职工会的章程。章程上必须完全取消足以阻碍工人加入革命工会的一切限制。革命工会首先应当吸收各种基本的产业工人：纺织、铁路、海员、矿工、烟草、五金、市政、邮电等等工人。这一点应当特别注意的，因为最近在革命工作中发生了一种“贪便易”的倾向，客观上只去走反抗力量

最小的道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小企业、手工业工人以及许多其他的散漫的无技术的工人中间去。革命工会应当在所有的中国无产阶级中间工作，但在产业工人中间的工作，却是基本的。减弱了在技术工人中的工作，便是为反动工会所玩弄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许多北方的工业区域（五大铁路、天津、唐山矿区、满洲、淄博等），那里从来没有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职工会的工作。

十五、工厂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工会支部的关系。革命工会应当在大工厂及企业之中有他自己的基础。下层组织的形式，在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工厂委员会以及他对于“工会支部”的工作问题。“工会支部”大多数必定是在秘密状态之中，通常的时候，他的会员只是这个产业中之工人的一小部分。“工会支部”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刻组织成的，特别在现在工人脑中，还以为赤色工会是共产党之附属物的时候。因此在多数的情形之中，我们下层组织之最适合的形式是工厂委员会（不一定要用这个名称，或者用某地的新名词，例如组织厂内委员会、保护工资委员会、视察委员会、保护劳动委员会、交涉团、维持会、代表会等）。这种组织要能代表着一个企业中之全体的或大多数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工会会员。工厂委员会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并不就成为职工会的下层组织。他——工厂委员会，拥护某个工厂之中之工人的最切近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容易了解的利益，他便应成为阶级斗争和阶级训练之最初的形式。我们同志在这种工厂中的任务，是经过工厂委员会，经过由工厂委员会所召集的大会，树立在该工厂中工人群众之间的影响，由反动工会之下夺取其群众；在长期工作的结果，可以组成工厂中之工会支部，这样便可以使这个企业与革命的职工运动发生联系。在中国现在许多企业

中，已有了这种工厂委员会的原始形式，如各车间的代表会议、索薪团等，我们应当使他变为比较巩固的公开的经常的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应当是一个适合环境的组织，在罢工的时候，若他已经取得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则他可以整个的变为罢工委员会（再补充几个由大会选举出来，专为进行罢工的委员），罢工胜利后，便可以很大的增加罢工指导机关在群众之中的影响。假使我们同志加入了这种机关之后，便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在这一工厂之中，公开的或秘密的进行职工会的工作。由工厂委员会到罢工委员会，以至于“工会支部”，这中间按照一般的政治状况的变迁及各企业中之具体的条件的差异，可以有许多过渡的形式。

十六、党的支部、工会支部、工厂委员会之间要有正确关系。必须确定在每个企业中之工厂委员会、党的支部、工会支部中间之正确的关系。现在党的支部及工会时常混合起来，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端有害的。党的支部应当在政治上指导该企业中的工人，能加入党的支部的，仅只是一部分最好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无党工人最有影响的人。另一方面，在现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党的支部与工会支部混合一起，若其中有一个受了打击，则两个组织都被破坏了；由工会支部之干事会或委员会中应该只有两三个秘密党员便足了，其余应当是无党的。仅仅只有这种制度，才可以吸引“非党工人”的革命的干部，来积极的参加工会工作，而保存这个企业中的支部。

十七、干部人才问题要从普通工会会员中提出干部。干部人才的问题，必须特别注意。领导机关与群众中间联系的薄弱，乃中国职工运动的老毛病。中国职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在

数量上、成分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工人分子太少，智识分子太多。创造出“非党工人”的干部来而加以训练，增加其人数，并与大企业发生良好的联系——这就是目前最大的任务。必须吸收参加着生产，与群众有联系，懂得他们的情绪习惯等等的工人，到一切工人的组织中来。他方面，每个工会的工作者，即他不是直接在生产中工作着的，亦必须注意时时与工人发生直接的联系。自下而上一切的工会领导机关中，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止，必须参加青年工人与女工的代表。

十八、工会之中要有女工委员会。女工在中国工业工人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她们所受的压迫最重，剥削的痛苦特别深，同时亦比较落后。革命工会须坚决的主张对妇女劳动的保护，及改良其劳动状况，同时尽量吸收她们到自己队伍中来，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应组织女工委员会，做女工运动工作。

十九、工会之中要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甚至可组织青工小组。青年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有莫大的作用，革命工会除保护青年工人劳动条件以外，必须在一部反对改良青年工人地位的成年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吸收青工加入工会与成工享受同等权利。同时在中国情形之下，青工之中儿童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工会必须尽力设法发展童子团的工作。

为要有计划的在青年工人中工作起见，应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委员会，在各工厂中，可以在工会支部的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小组”。青工小组不能与厂外任何机关发生隶属的关系，亦不能离开工会支部单独行动。在各地县城店员和手工业的学徒和青工，不能按产业工会的组织系统组织时，青年团应辅助党组织这些学徒团体以街道或区域为中心。如该地有职工会的组织，学徒组织应直属于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

二十、失业工人运动，要求政府社会的供给。失业工人的问题须特别注意。失业工人有分散及脱离阶级的危险，并且因为现在资本家利用市面萧条的与经济破坏的状况，尽量的开除共产党员及工会的积极分子，所以失业工人的工作因此更加重要。必须用一切的方法（宣传、煽动、组织以至于示威等）要求政府、市政府及商会等社会团体津贴救济；必须专门设立委员会并维持失业的与在工会会员间的联系；必须利用失业工人去做城市中工会的工作，及在适宜的情形之下，派遣他们到农村中去做农民工作或到军队中去做兵士运动。

二十一、须注意原始团体工作（兄弟团等），领导他们走向赤色工会组织。中国原有许多工人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和斗争组织，如帮口等类的所谓“抱义气”的组织。现在严重反动之后，甚至赤色工会会员也自己退而组织兄弟团、姊妹团等的原始形式的组织——“抱义气”的组织。这些方式，党固然应当要努力去领导和运用——这是群众深处自动发展的斗争方法。但是他的短处，便是复古到小的秘密的结社，而不去创造或巩固赤色工会。党应当经过党团，领导这些组织实行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领导这些组织，使他们合并统一团结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方面上来。

最近由于反帝运动的加强和白色恐怖的相当的缓和，又自然的发生出——尤其在南方——一些行会式的工会来，对于这些工会，必须特别注意。这种原始的结合，现在不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但革命工会不可置之不问，必须领导他们，使他们与赤色工会运动发生联系。但是，再郑重说明一句吧：我们根本的路线，却还是在大企业中组织革命工会。

二十二、工人纠察队工作要成为经常的自卫的组织。党与革命工会，必须严重注意于工人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的教育与学

习，必须把最可靠的同志加入到这种组织里面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武装纠察队在几次最大的阶级斗争中（香港罢工与上海暴动）有非常伟大的作用，同时作为平时的自卫组织，其作用也不下于此（比如保护工人集会，防止反革命者的袭击、罢工时的纠察与工贼斗争等等）。党与革命工会，必须竭力为纠察队的政治的与军事的教育而工作，且力求把纠察队变成党与工会机关领导之下的经常的组织。

二十三、工农联合要在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中国的革命工会必须与农民有密切联系，要使农民拥护工人行动，工人亦拥护农民的行动，各县的中心区域中的“县总工会”一向是全县的组织中心，在将来亦必须使他归做全县的中心，并且尽力扩大其作用。“县总工会”的任务是组织农村中农场工人、挑夫、轿夫、苦力、泥水匠等和手工业的工人，同时被组织起来的团体，必须与农民协会有密切的关系。农村经济工人（雇农），应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可加入农民协会，但须保存其独立的组织。

二十四、党要经过党团指导工会。各省及各大工业中心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乃省总工会或市总工会。中国共产党要经过各总工会中的党团，才能够巩固他对于各地及各中心区域的职工运动的领导。党必须竭力巩固中国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努力巩固及扩大其在工会所已争得的地位。

二十五、全国总工会与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中华全国总工会，必须与太平洋工会书记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必须与其他的国家的革命运动及赤色职工国际发生密切的联系。

二十六、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白色恐怖虽是利害，然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必须利用每个经济上的冲突，每一个罢工，每一个政治事件，以求脱离秘密状况。这中间工作的方

法是非常要随机应变的。此外，又可想法创造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运动会、自修社、丝竹社、戏剧社（票房）、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应照现在的情形力争工会公开（结社自由）和创造出种种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团体来，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之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最主要的实际任务。

二十七、党与工会组织上的界限要分明。在白色恐怖疯狂似的向共产党与革命工会进攻的情形之下，工会与党中间，正确的互相关系就更加要紧了。党对工会的经常不懈的政治的领导，必须和党与工会之间在组织上严格的分工并行的。对工会的领导非经过党团不可，并且只能经过党团，不能再用任何别的领导形式。对工会有任何决议，工会必须实行时，必须经过党团将决议内容提付讨论表决后才施行，切不可直接采取党的决议或所谓“命令”，尤不可将党的决议在工会的报纸上公布。

二十八、口号要切实合于工会及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口气。现在中国全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都必须抱定这个观点去对付。工会虽是永远拥护党的，同时，却不可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工会必须在群众中巧妙的应用口号，必须使一个普通口号都是从工人的日常基础要求中自然而然的喊出来的。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用工会的口号及工人的日常用语去解释给群众听。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对于工会争取群众的工作有害无益。工会在群众面前另有自己的面目，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却并不是说工会必须离开党的政策，而是说工会与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方式是不一样。

二十九、厉行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必须时时记得工会是群众的、民主式的组织，所以他们必须尽力反对工会中的命令制、指挥制和“革命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等等的恶习。

应当严重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只有全党坚决的有系统的在职工会中实行广大的民主主义的办法，和广大的吸引工人中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来。这样，才能够把中国职工运动变成强大的群众组织，而在党的领导之下，完成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

三十、实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决议。党认为必须实行广大的宣传，去解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的决议和大规模的去实行第四次大会的决议。要利用世界职工运动的经验，去发展并巩固中国的工会，这便是最好的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关于党纲的决议*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必须拟出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及早发给各地党部讨论，以便提出第七次大会能够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为最终之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PDG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时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一）准备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一、党在准备暴动时应该遍处建立将来政权的核心。党在准备暴动中的主要任务，在于造成那维持并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先决条件。夺取了某地方的政权以后，党的主要困难，便在维持并巩固这个政权的问题。因此，党在取得群众使之参加暴动以外，应事前采取种种必要办法而组织城市和乡村将来政权之核心，俾此核心能于夺取政权后准备各种必要动作。此核心的组织就要成为夺取政权后的政权机关，其意义列宁在他那《布尔塞维克能否维持政权》一书中已经指出来了。列宁说："如果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把苏维埃建设起来，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会无望。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用旧机关维持政权而新机关又非一下便可建立起来的。

二、中国大概不会有双政权的可能，工农夺得政权后新政权必即时实现。中国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诉我们，要把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种"二元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的局面重现于中国，是少有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将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来的政权核心曾与旧政权对峙，但这是在中国难能的，而且我们预料到过工农暴动夺取政权后，新政权必将即时实现。这就是说，和俄国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事前能够公开存在，不会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便须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事先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另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俾暴动后可以坚决而敏捷的成立政权机关。

三、党应宣传苏维埃的内容、理论和工作，并组织工农积极分子做将来苏维埃的干部。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俾预先准备干部人才，以敏捷的建设政权机关。党应在预定的各暴动区域中，预先普遍的明了的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立苏维埃的可能。除宣传工作外，党还应做组织上的工作。这里可以采上海的旧例，即把民众代表会议于夺取政权前秘密选好。但在中国现在秘密条件下，能否这样选举政权，很难说定。大概适当的条件是不会有的。因此，在每一企业内、每条街道上，党应经过支部，党员个人或可靠的工人须先准备起来，使他们能成为选举苏维埃时的干部，能实现革命委员会和民众间的关联，能参加将来的政府，能充任该区、该企业、该街道上政府的代表者。党应预先拟定将来革命委员会大概的分工计划及最近将来的命令。党应派遣代表往各大乡村实行组织地方政府的工作。这些代表应与农民协会、游击队伍、积极而有威信的农民及一切能帮助实现暴动的组织发生关系，并准备且择定革命而有威信的农民，俾他们能够掌握该区的政权，且加入该区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分子中，必须绝对保证党的影响，以组织革命委员会。

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

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二）夺取政权后的任务

一、党在夺取政权后应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机关。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即在建立足以保证新政权的与其革命政策的实行之政权机关。如果认这个机关只是一种执行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决议案的技术机关，那就错了。这机关的任务与作用，要比一个技术机关广大得多。列宁在他那本书里说："或以为二十四万布尔塞维克党员不能指挥俄国，不能代表穷人利益去反对富人，但这二十四万人已经领导着一百万以上的革命民众……我们国家机关已经有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都是忠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并不是希图每月二十号多领些薪水。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个'神妙的方法'，一举手能把国家机关增大十倍。这方法是资本主义国家自来不曾有过的，也决不能有的。这种'神妙的'事实，就是吸收劳动群众，吸收贫人来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二、党应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者的机关，分配土地衣食等于劳动群众。为要减轻那些空前的困难与战争所留下的贫苦，为要补救那些战争所赐与民众的可怕的疮痕，我们便必须采用革命的民权，必须采用革命的办法，就是要适合贫民利益，分配房屋等。同样，城市和乡村的食粮、衣服、靴鞋、土地等等，也要适合贫民的利益去分配。这样，我们便能立刻吸收千百万人参加国家机关。这样的机关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因为我们这样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完满的同情，所以也只有我们才能建立这样的机关。因为我们有许多觉

悟的、经过资本主义长久教训而纪律化的工人（我们并不是徒然白受资本主义的教训的），这样的工人能够建立工人警卫军（Militia），且渐次扩充为全民的警卫军。觉悟的工人能够吸收真正劳动群众与被压迫群众，并应该领导他们去参加“管理政事的事业”。“最重要的是要使被压迫者和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际上征信他们，使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而且应当起来管理；周密的，有次序的，有组织的，根据贫民的利益，分配面包，分配各种食物、牛奶、衣服、住屋等等。”

这种由劳动者所成立的新政权之最广大的机关，应在苏维埃或委员会的临时政权机关之周围组织起来。

（三）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

暴动参谋部即将来的红军司令部，应隶属于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设法与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召集代表会议（苏维埃）。在正式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未组织以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即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由参加准备暴动的各组织之代表成立之。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便须把革命委员会的和暴动参谋部的职务划分清楚。暴动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迅速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准备动员工人的力量，组织红军的军需和其他需要，以及防卫该区内一般事宜。至革命委员会，应即变成政权机关，应付民众一般的需要。革命委员会在他组织的第一天，应即宣布新政权的成立，并着手准备成立正式的代表会议政权。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府，“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正式政府。革命委员会仿佛是“代表会议”的筹备司令，他应当立即筹备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成立大会，就是正式政府宣告成立。

革命委员会的成分，应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其在军队中或地方民众中有影响之分子，不得不让他们加入革命委员会，加入后他们又不能在革命委员会中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末，从第一天起，我们便须设法使他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革命委员会应采取种种办法和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建立代表会议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定期的召集工农（贫农）兵士代表开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参加这种会议的分子去实行并督促革命委员会决议案之执行。革命委员会并宜在该区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及至建立了经常行动的正式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便可巩固该区政权，获取民众充分的实际拥护，使民众保障代表会议确有革命的成分及革命的政策。

（四）红军的组织

一、以暴动力量作为基本队伍，并召募青年工农组成常备红军。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便须设法组织红军，以暴动的队伍做红军的基础。革命委员会在党的、职工会的和农民协会的帮助之下，必须以暴动的队伍编成常备红军，更召集农民协会和职工会内的革命分子，作为红军将来的干部，作为红军最可靠的柱石。召募军队的办法，应从未婚的青年人着手。红军刚成立的时候，只能召募一般革命分子充当（即党员、团员、职工会或农民协会的会员）及至可靠的中坚分子。成立以后，规定年龄，实行征兵，使之加入红军（这只是对青年人而言）。募齐的军队，应过军队的生活。

二、对游击暴动军的办法同上。现有游击暴动军，也须用同样的方法去召募队伍，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成分须重新改

组，使之成为经常的红军。

（五）军官与政治部职员的成分

一、从工农中创造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才。我们必须从农民、工人和游击暴动队伍中（反对地主的农民，有军事经验的工人）创造出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才。

二、开办军事训练班。革命委员会应该立即设法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以资提高革命工农的军事组织。

三、利用旧式军队中革命的青年军官。我们还可利用旧式军队中富有军事智识的人充当军官，但只宜利用下级的军官，高级的则不能经常的利用，他们的军事智识并不充分，且易叛卖革命。

四、政治部职员及政治委员只有共产党员可以担任。政治部职员尤其是政治委员应有很大的作用，只共产党员才许担任，最好是工人或佃农出身的党员。如果军队中共产主义的影响很弱，政治委员及政治部职员，尤其应该如此派选。

（六）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限于军队以内并应煽动人民及组织地方革命政权。在军队中应组织党的支部和青年团的小组，后者宜直接服从前者。为领导政治工作起见，宜组织政治部。政治的工作不仅限于军队以内以及鼓动人民，并应在战线各区域内组织革命的政权。因此，政治部宜另设政务科。在战线各区域内，他的命令应该是最高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和政治部再准备各该区域内苏维埃的基础。

（七）军队的给养与服务

各区总司令部应协同地方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区集中的军需机关。各处无论在财政方面或物品征收方面，都须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海陆丰苏维埃存在的经验，便是一个最好的集中的模范。为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起见，各区总司令部应协同该地方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区的军需机关，并指定办事人员管理各军供给事宜。没有粮食储藏的地方，尤其要注意供给的地方，供给的权限宜集中于该区司令部之手，须竭力反对利用贫民服役军队。地方革命委员会应布告人民以革命所需要的人伕数目，首先便要征调富农。

（八）反对反革命的斗争

擒贼先擒王，在胜利的暴动中宜先拘捕反革命的领袖做抵押。在城市中应组织特别机关与反革命斗争，在该机关下，应有特别队伍，由工人组织之，宜学习过去在广州恐怖的经验。广州的恐怖虽极剧烈，然带有毫无系统的性质。只杀死了反革命的走狗，而未杀死反革命的头目。在广州之被诛杀者，虽为数甚巨，然广州的军事领袖及反革命势力之领导者却毫发无损。恐怖宜有系统，并应打击反革命的头脑。暴动胜利的第一天，与反革命斗争的机关，便应将地方上资产阶级、地主、军阀、流氓的头目拘捕数十或数百人做抵押。同时并通告全体人民说：这些抵押人应负城市保安之责。在乡村中亦应拘捕些地主、绅士来做抵押人。

对反革命的争斗的机关，应登记人民的枪械，以备意外时

收回。暴动胜利的第一天，便须解除商团、流氓和土匪的武装。私藏军械者概处死刑。对反革命斗争的机关，第一天便应举行人民的登记，统计曾经服务军队或军事机关的人员，因为他们以后还有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之暴动队伍的干部之可能。凡一切地方的、绅士的、大商的、地主的团体都应完全解散、禁止。反动分子组织任何团体的企图，都应予以严重的惩罚。

乡村中与反革命的争斗，应由特别的农民自卫机关执行。农民协会会员，参加暴动者、乡村中可靠的分子，都可加入农民自卫机关（农村警卫军）。其责任维持乡村秩序，镇压土匪，镇压反革命军。

在城市中则须组织平民警卫军，旧警察不许在警卫军内服务。

（九）对于苏维埃政权前的军事团体之关系

宜完全改编，至少须更调其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对于投降革命的军队，应持特别慎重的策略。革命委员会应先解除其武装而改编之，并遣散其不稳的分子。这种工作，革命委员会宜尽力完成。旧军官须更调，但事前在兵士中宜有相当的工作，更调旧军官应在“从兵士升擢新军官”的口号下实现。凡投降革命的军队均应完全改编，决不宜优容不变。这些军队与兵士，宜编插入游击队或红军，如不克立刻做到，便应更动其军官，派政治委员严厉监视之。

（十）对土匪的关系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

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防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十一）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之关系

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神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我们应在民权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于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

（十二）民　　团

开除其军官，把部队送到前线上去作战。只有民团的部队可以利用（因为团丁大半是农民），其长官投降革命后应开除其军籍，全体民团解除武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利用其部队。但无论如何，决不准民团在农民自卫机关（农村警卫队）或城市平民警卫队内插足。民团的部队，该送往前线上作战。

（十三）暴动口号之实现

一、即刻颁布土地法令和其他实际改善工农生活的命令。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天，便该颁布土地命令及改良农工生活的命令，并宜组织专门机关，实现这些命令。这些命令在开始实现时特别重要。革命委员会在第一天便须予工农以实际的利益，如没收富豪的住室衣服，分给工人及一般贫苦群众，资助失业工人等。每区内在颁布法令以前，须详加考虑，务使一般的命令与暴动的总口号相联结。

二、国有银行并没收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之财产。为巩固财源起见，须立即没收城市中地主和军阀的财产。开始便该把银行收归国有，这乃是监督地方财政和市场之强有力的武器。至以新政府之信用制度代替旧银行之信用券，统计该地方资产阶级的资本，财政之监督权完全集中于政府手内，统计银铜等现币总额，禁止现币输出苏维埃区域，违者由肃清反革命斗争的机关须处以严刑。

政府机关应速即设法以充实苏维埃的财政。为达此目的，可对殷实之家施行临时征发，没收反革命者的财产，并实行累进所得税制。苏维埃政权应预先考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反抗的可能性，因此，应预先规定各种办法，如给养之组织、合作社之创立、国家商店之建设等，并由自己监督之。[1]

（十四）劳工监督

一、有劳工监督亦可以公平税则代替没收。实现工人监督的口号意义非常重大，列宁曾在他一篇论文里说过：问题的要

点，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全民的、各方面的来监督资本家及其一切可能的拥护者。仅仅没收那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可说没收的本身并未含有组织的和正确分配计算的成分。我们只要能够防止种种谎报、假造账目、违法作弊的可能，则以公平的税则代替没收并非难事。想要防止这种可能，便只有工人政府的劳工监督才办得到。

二、劳工监督须经过劳动群众的组织来实现。劳工监督须经过职工会、工厂委员会、手工业工人的工会及一切有组织的劳动群众来实现。

三、置经济部管理各业经济。再则，置相当的机关监督该区一切经济事宜，并统计该区经济的财富，这个机关就是国民经济部。该部宜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工作，办事员由大工厂中工人选出担任。国民经济部须统计一切经济富源、工厂企业、作坊，并号召一般工人实行监督这些经济的行动。

（十五）苏维埃的组织

一、苏维埃的组织应站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并保证产业工人的领导作用。地方政权已经巩固，便应组织苏维埃。党委员会应估计当地情形，斟酌组织苏维埃的时机。但在暴动前及暴动实现后，党即应有种种组织苏维埃的准备。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决不是像在广州（实际上只是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海陆丰和一部分在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一个样子，仅仅根据上层组织的代表集合。选举时应由工厂工人、各马路工人和贫民、工会工人、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工人大会，而不是职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学生等执行，并宜包纳各地下层组织、职工会及党代表。代表

成分的分配，应使大多数为直接选举出的工人和贫民。并应随地酌定选举条例，务使苏维埃中革命影响得到保障。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看各地革命的深入程度、政权的巩固程度、阶级的分化程度等等而定。苏维埃中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分的代表。本处驻扎的革命军队的兵士亦应参加苏维埃选举。选举苏维埃与进行苏维埃工作时，产业工人应有特权，以保证其苏维埃中领导的作用。

二、苏维埃的定义。我们应该牢记下面列宁所下的苏维埃的定义："苏维埃乃新的国家机关，他给我们以（一）工农的武装力量，这力量不像旧式军队一样是脱离民众的，而是和民众密切联结的。从军事讲，这力量比以前的军队强大的多；就革命的意义上讲，这力量是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二）这个机关是和群众及大多数人民密切无间的相联系的，容易考验自己的错误，容易恢复意外的创伤，这是从来国家机关所未曾梦见的。（三）这个机关为民意而选出，因民意而撤换，没有官僚主义的空架子，所以比从前的国家机关不知要更民权主义得几多倍。（四）他在各项职业间实现密切的联系，所以没有官僚主义，而能促进种种深入群众的改良。（五）他是先锋队，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因此，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他们的先锋队经由这个机关，可以促进他们的教育，训练并领导他们。（六）他兼有议会主义及直接民权二者之长：人民选举代表，同时有立法及行政之权。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策相较，这种进步，在民权主义的发展上，实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苏维埃只有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以后，才能在真正选举的基础上发展，方能充分扩大他的任务和能力。倘不如此，则苏维埃便毫无长处，成为嫩芽（嫩芽是不能

长久存在的），便流为玩具。二元政权是苏维埃的瘫症。”

列宁这个定义，把苏维埃目前和过去的作用，说得明白已极。至于苏维埃制度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也可以由上面体会出来。

三、苏维埃会员应尽量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议员）应提到苏维埃的工作中，执行苏维埃的决议案，或督察决议案的执行。

四、苏维埃既非群众大会亦非几个领袖的组织。苏维埃的会议不应如上海市民会议的实行经验，具有那样群众大会的性质；更不应如广州苏维埃的实际结果，仅仅只有高级直接指挥的机关。广州苏维埃之所以如此，因为他窄狭了（总共只十四到十六人）。

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应号召广大的劳动群众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中办事人员可能作出的各种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等事。

五、苏维埃为执行各项职务起见分置各部。苏维埃计划当地及全国的主要政策，为更普遍的提高苏维埃会员的效率起见，应分置各部执行各项职务：

（1）军务部（组织防卫队伍及红军）。

（2）财政部（税务、财产的没收及处置等）。

（3）市政部（管理学校、自来水、救助病人等）。

（4）社会保证部（劳动法，分配好房屋给农民工人工作）。

（5）国民经济部。

六、苏维埃中直接的撤回权。苏维埃代表须按期向选举人报告过去工作，选举人有撤回旧代表另换新代表之权。城市苏维埃须包纳近郊农民和全区农民的代表，使他们成为该农区的革命中心。为执行城市的经常工作起见，应选出执行委员会，

包纳该城市或该区重要组织的代表：军队、职工会、镇压反革命并供给必需物品的职员等。执行委员会人数约自十一人至二十七人。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会，这个差不多是该地的实际政府，人数约五人至七人。

七、苏维埃各机关的党团须执行党的指示。这些机关的党团，都须绝对执行党的指示，且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该由该地党委员会批准。

（十六）苏维埃与职工会暴动司令部或革命军等的关系

一、上海市民会议和群众隔绝。苏维埃从成立之日起便要成为真正的政权，于此当铲除前此在斗争过程中成立同样组织时所犯的错误。例如上海一九二七年三月暴动时，市民会议实际上不是政权，仅是死的组织，真正的政权却集中于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部的手里。因此，上海市民会议就和广大的群众隔绝，不能发生经常的活跃的关系。

二、职工会转成新政权的形式，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遂行停顿。这种情形也令职工会感受极有害的影响。职工会于是不复成为职工会，而成了政权，遂丧失了他在工人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通常的连系，而政权因此和贫民及劳动群众隔裂，更为危险。广州暴动胜利时，政权实际上属于职工会的苏维埃，职工会遂不能执行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工作，事实上职工会苏维埃虽代表新政权，但并不曾建设政权的执行机关。

三、对黄色工会或其他劳动组织当打击其首领夺取其群众。对于黄色职工会及其他贫民或劳动群众的组织，我们应采非常审慎的态度。此种组织应分化之，打击其首领而非打击其

群众。当广州暴动宣布黄色工会解散时，我们把他的群众和首领一般看待。这种看待，这种错误，我们以后务须避免。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曾封闭黄色工会，但积极和他的首领斗争，因获得其群众。在中国也该采用同样的策略。我们如果用武力压迫组织内的群众，则他们可以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大力。

四、苏维埃与职工会关系应正确。苏维埃应和职工会建立正确的关系，使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能在苏维埃内占主要的地位。

所有派往苏维埃的代表，关于苏维埃的行为，应对工人之有经常的报告。同时关于工会的行为，亦应在苏维埃中作有系统的报告。凡工会与苏维埃中一切纠纷，应由企业中派代表所举行之特种会议解决之。凡涉及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一切法律和处置，应预先会同该地职工运动之指导机关讨论之。

五、工人纠察队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工人纠察队和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苏维埃应坚决采取各种可能手段，以保障其兵士群众对于军官的作用，并可因此监督红军的一切动作。

（十七）苏维埃和党的关系

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经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种问题的意见。党随时随地都应作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而不应限制自己的影响。不过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党应预先保障其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党须在苏维埃中组织有威望的能工作的党团，以执行党的命令。但

是以当地党部代替党团，那就是一种危险。党团只执行党部的指示。当党团和该地方党部的影响不能保持平衡，而后者的作用较小时，苏维埃常有代替党的危险。苏联革命后最初几年，有些地方上党的作用几乎缩小到极端，这种经验应该顾及。在中国也有以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注意党的组织之行为，毋使其发生软弱的现象。所以在党部工作的同志，不应当较在苏维埃中为弱，党经过苏维埃或其他组织内的同志，应该在一切条件下，应该公开在苏维埃中，在苏维埃工作上增高和巩固党的影响。

（十八）乡村中政权机关的组织

一、党应吸收农民的革命领袖和产业工人进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当乡村中发生暴动时，应在该地组织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组织在暴动前就要由党部规定。在革命委员会中，应吸收农民运动中最坚决的革命领袖，尤其要吸收乡间住的产业工人及出身城市或归自城市的工人。这些产业工人是乡村中党的作用的一个台柱，所以党应该非常审慎的利用每个工人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二、革命委员会须设在广大群众革命运动的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应择具有广大农民运动多量农村工人的地点，这些工人尤能坚决拥护各种革命政策，而为共产党最可靠的基础。在农民协会中，须有革命委员会的基础，更为重要，革命委员会应以农民协会为基础，而成为革命的政权，不应以农民协会为政权（形式上革命委员会应当是农民协会等在将暴动前选举出来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区人民中，尤其在农

民协会的会员中，要尽量通俗化。为避免农民协会及革命委员会的冲突起见，可以把农协的领袖包纳在革命委员会内，并对农民协会全部负责人才，吸收在政府机关内。在革命委员会中，应保障那些积极参加暴动的农民之领导作用。

三、政权一经巩固便应以苏维埃代替革命委员会。当地的政权，尤其是城市中的政权一经巩固，则该区全部劳动农民所选出的苏维埃，应代替革命委员会进行经常工作。农村工人及该区工人或工人分子，应有特殊的较多的代表。

四、常务委员会内应包纳该地主要的领导者。苏维埃选举常务委员会，应包纳该区最主要的领导者，自然更要保障党在常务委员会内的影响。

五、苏维埃的中心地点宜择工农运动最大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行政的中心地点，不一定仍驻原来旧政权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官僚总多），须择足以保障工农革命影响的地点。

小城市内没有工人，便该将该城苏维埃和近郊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使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归于农民。

（十九）农民协会与苏维埃

一、极力避免农民协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冲突。最先要极力避免革命委员会与农民协会间的冲突，然后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并扩大革命委员会，代替农民协会。

二、农协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础。农民协会应该准备苏维埃组织的基础，苏维埃则应执行农民协会的全部作用。

三、没有农协的地方可以直接组织苏维埃。不过对于农民协会要非常审慎。大多数人民尚未深信有组织苏维埃之必要时，不可解散农民协会。惟农民协会变成了上层农民的组织，

则须以农民代表会议和他对立，使农民代表会议成为贫农群众所拥护的机关，使大多数人知道农协招牌已为富农土豪等所把持，而迅速解散之，在没有农协的乡村中应直接组织苏维埃。但若下层的群众要求组织农民协会时，那便不可坚执反对他们的组织，而应主张多开农民的群众大会，尤其是代表会议，使渐变为农民代表会议。

（二十）苏维埃区域中党的工作

一、一般工作要公开，但须留有秘密的基础。在苏维埃的区域中，党自己的工作和大多数的党员，应普遍的公开，只必须留下小的秘密机关处在秘密的状况中；在成分上，党应扩大自己成为群众的组织，但吸收党员，须非常严格。在苏维埃区域内，肃清隐匿起来的富农及奸恶分子，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参加暴动者、工人及乡村工人，入党时应受优待。

二、党应特别注意工农组织准备退却时的必要手段。党应该特别注意贫农和工人的组织，因为他们是农村中拥护党的政策的主要成分。党应该处处准备退却时所应采的手段，保留党的活动力量，交通且须预先建设秘密的党部和工农组织。

（二十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

苏维埃须不断的扩大自己的领土：一、以武力进攻；二、极力帮助邻区武装暴动。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党部及苏维埃，务要尽力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保障。领土的扩大可由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苏维埃当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暴动。因此，红军的进攻，

应当与邻近区域的武装暴动相呼应。苏维埃政权更应派遣全权代表往邻区去，准备和组织该区内的政权核心和暴动。这种种行动要与红军的进行相策应。如果该地工农群众见解狭隘，只图保护本地的苏维埃政权（地方主义），则应用全力打破这些地方的偏见。党应扫除这种偏见，说明不仅自卫，且要进攻，乃是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唯一担保。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在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所载的本决议中，在此段之后还有："三、革命委员会宜置财政部农民工人各部及行政处。革命委员会宜设财政部，置农民部（土地部）以实行土地法，置劳动部及行政处。此等机关初隶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成立即转隶苏维埃。"一段文字。

PDG

中国共产党党章*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通过）

第一章　名　　称

（一）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第二章　党　　员

（二）入党资格：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三）入党手续：新党员入党时，由党支部通过，并须经过市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之批准。

入党的条件分下列数种：

（甲）工厂工人，须经党员一人之介绍，由生产支部通过。

（乙）农民手工业者、智识分子及各机关下级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二人之介绍。

（丙）各机关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三人之介绍。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

PDG

附注：（1）介绍人应对被介绍者负责，如遇有介绍书不确实时，则应受党纪之制裁，以至于开除党籍。（2）在新党员未批准为正式党员时，各相当党部得委任该新党员以某种工作，借以考察其程度及其对于党之了解。（3）共产青年团团员入党时，由团委员会介绍，亦须经上项各相当之手续，由支部党员大会通过或上级党部之批准。（4）在某种特殊情形之下，党的各级委员会均有直接征收或通过新党员之权。

（丁）脱离其他政党（如国民党等）而加入本党者，须经有党籍一年以上之党员三人介绍。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者，则经省委之批准；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者，则须经中央之批准。

（四）组织改变：其他部分的政治组织或整个的政治集团，以及整个的党的组织加入或转入共产党时，必须经中央之决议。

（五）党员迁移：党员由这一个组织迁至别一个组织的工作范围内（区域内）时，应转入其所在地之组织中去，作为这一个组织之一员。党员由这一组织转别一组织及由一国移至他国的一切手续，须按照中央颁布的规例。

（六）开除问题：开除党员须由该支部党员大会通过，须经党的上级委员会之批准，始发生效力。同时，在开除决议还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以前，应即停止被开除者在党内一切工作。不服从开除的决议者，可以上诉至最高的党的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党员有反党行为时，有直接开除其党籍的权利，不过此开除的决议应通知被开除者所加入的下级党部的组织。

第三章 党的组织系统

（七）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如下：

（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

（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

（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该区域的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党员对党内某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

（八）指定指导机关：在秘密环境之下，于必要时党的下级机关得由上级机关指定，且经上级机关之批准，得指定新委员加入党部委员会。

（九）党的地域区分：党以地域原则划分为单位，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于该区域内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所有党员无民族与国界之分，都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十）各级机关执行权：党的组织在共产国际和党的决议范围内，对于地方问题有自由处决权。

（十一）各级党部的高级机关：各级党部之高级机关为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体大会。

（十二）各级执委：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国大会选举其同级党部执行委员会，此执行委员会在前后两大会期间内为指导机关，指导各级相当组织之一切经常工作。

（十三）批准问题：一切新成立的党的组织（支部、县委等等），必须经过其隶属的上级机关的批准。

（十四）本党组织系统如下：

（1）在每个工厂、作坊、商店、街道、乡村、小市镇、军队等中：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干事会。

（2）城区或乡区内：区党员大会或区代表会议——区委员会。

（3）县或市的范围内：县或市代表会议——县或市委员会。

（4）特别区（包括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特别区代表会议——特别区委员会。特别区的组织如有必要时得由省委决议成立之。

（5）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6）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7）为易于指导各党部工作起见，中央委员会得按情势之需要，在数省范围内成立中央执行局或中央特派员。中央执行局和中央特派员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之，并只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十五）党部机关：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党部委员会下各部之组织由中央决定之。

附注：为在其他民族的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起见，于当地的党委员会之下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此少数

民族工作部应在当地党部指导和监督下工作。

第四章　支　　部

（十六）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支部（工厂、矿山、作坊、商店、街道、农村、军队等），所有在该地工作之党员应一律加入支部。如有党员三人之上的地方，得成立新的党的支部组织，但须由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批准之。

（十七）支部特别组织：在有党员一人或二人工作的企业中，这些党员得并入与该企业最接近的生产支部，或与邻近之企业的党员共同组织支部。

在任何企业中工作的党员，如手工业者、个别工人、家庭工作的工人、智识分子等等，按住处的地方为标准，组织街道支部。

如在农村支部中有农村经济企业，如小的矿山或某种农业工人，得按生产关系组织支部。

（十八）支部任务：支部为使与工农联系起来的组织。支部的任务：（1）用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在无党的工农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2）以党的组织的力量积极参加工农的一切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以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讨论他们的要求，组织群众的革命行动，为取得工农的一切革命行动的领导而斗争，努力工作以吸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斗争。（3）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品，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教育的工作。

（十九）支部干事会：以党员人数多寡为标准，支部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以进行日常党务。该干事会进行支部的

工作，分配支部中党员的工作，如宣传、分发印刷品，在工会及农民组织中进行党团工作、妇女工作、与支部发生联系等。支部干事会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执行党员大会或支部会议的决议及上级党部的指示。

第五章　城乡区的组织

（二十）区代表会：在城或乡的分区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或该城区中各支部之代表大会。城乡区的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接受和批准区委之报告，并选举区委员会和出席县市委或特别区及省代表大会之代表。

（二十一）区委：城乡区委员会于前后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期间内指导各区范围内一切党务。城乡区委员会之常会应按秘密条例所许的范围内经常召集，每半月至少一次。区委员会前后会议期间内，工作由区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指导之，常务委员会由区委员会自身委员中选举之。

第六章　县或市的组织

（二十二）县代表大会：一县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县代表大会。县代表大会每三月召集一次。临时县代表大会，或经该县半数以上之组织的要求，或根据省委员会（或特别区委员会）的决议，由县委员会召集之。县代表大会接受县委员会和县审查委员会之报告，并选举县委员会及县审查委员会，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区代表大会或省代表大会之代表。

（二十三）县委：县委员会由县代表大会选举之，于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为该县党的最高机关。县委员会中除应有

县城的代表加入外，该县乡区或各重要乡村党部的代表亦同样须加入。

县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期，可由县委员会自己决定，但至少须每月开会一次。县委员会推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县委员会选举县委书记一人以处理日常工作。县委之书记须得上级党部之批准。

（二十四）县委机关：县委员会应执行县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应尽可能的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宣传鼓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等）以进行各项工作。各部及各委员会主任照例应为县委员会之委员，且受县委员会之指导而工作。县委员会在出版党报时，应指定该党报之编辑。县委员会执行该县范围内之党务，在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对上级党部负责，并对上级党部关于自己的工作应作经常的报告。

（二十五）县委员会所在的城市，不设市委员会，其工作直接由县委员会指导，城市的组织可分为城区，领导城区的工作者为城区委员会。

（二十六）市委的组织如县委，除于其下得分城区外，并得管辖邻近乡区或近郊直属支部。在省委或特别区委所在的城市不另设市委，其工作直接由省委或特委指导。

（二十七）在特别区组织已经成立的地方，特别区按照一切县组织条例而工作。在没有省委的地方，特别区直接与中央发生联系，按照一切省委组织条例而工作。

第七章 省之组织

（二十八）在省范围内省之代表大会是最高级机关。省代

表大会的经常大会每半年召集一次。临时的省代表大会或经该省有半数以上之组织之要求，或依据中央之决议，由省委员会召集之。省代表大会听省委员会及省审查委员会之报告，讨论该省党务和社会工作问题，选举省委员会和省审查委员会及出席全国大会之代表。

（二十九）省委员会由省代表大会选出，在前后省代表大会期间内，省委员会是省之范围内的党的最高机关。省之中心（省会）组织的代表及省内其他重要地方党部的代表均应参加省委员会。

省委员会决定自己开会的时期，但一个半月至少须开会一次。在省委员会前后会议期间内，为工作便利起见，省委员会得从省委员会委员中推举一常务委员会，并为执行日常工作起见，选举书记一人。

（三十）省委员会执行省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省委员会在省之范围内组织党的各种机关，指定该省党报的编辑，在省之范围内支配党的力量和经费，管辖党部的会计处。省委员会指导省内的非党组织中的党团工作。省委员会经常的向中央作工作报告，并经常的把自己的活动通知下级党部。省委员会为研究各重要问题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等等。每部的主任，按照一般通例，应由省委员会之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充任之，并在省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直接指导之下工作。

（三十一）省委凭借城区委员会在其所在地之城市进行工作。因此在省委员会所在地如设县委会仅得在其本县乡区内进行工作。

第八章　党的全国会议

（三十二）党的全国会议，按通常规例一年召集两次。全国会议的成分及选举率（即每若干人选举一代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三十三）党的全国会议的决议案，经过中央委员会审查后才发生效力。

（三十四）党的全国会议开会时如恰当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前，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可以选举参加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代表。

第九章　党的全国大会

（三十五）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之同意后召集之。党的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或由中央委员会自动决定，或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创议，或由出席最后一次的全国大会的代表，代表党员半数以上的组织之要求，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之。但党的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之召集，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批准。党的全国大会只有在出席代表能够代表过半数以上之党员时，始能通过决议案。

党的全国大会的选举率由共产国际执委决定，或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或由党的全国大会之前开会的党的会议决定。

（三十六）党的全国大会。

（1）接受并审查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2）决定党的党纲上的问题。

(3) 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

(4) 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等。

(三十七) 党的全国大会的代表，应由党的省代表大会选举之。但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之下，得共产国际委员会之同意，则代表可由省委员会派遣之。党的全国大会，如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可以党的临时全国大会代替之。

第十章　中央委员会

(三十八) 中央委员会委员之数量，由全国大会规定之。

(三十九) 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前后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发生关系，设立党的各种机关，指导党的一切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指定在他指导和监督之下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编辑。按环境之需要，可派中央特派员于各省党的组织并设立中央执行局，进行含有全党意义的印刷局等事业，分配党的财政和力量，并管理中央会计处等等。

中央委员会应按期召集全体委员会之会议——至少每三月一次。

(四十) 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之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

(四十一) 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部门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例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的任务，是由各该工作部门中依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各项工作。中央委员会指定各部及各委员会主任，这些主任应尽可能的由中央委员会中委员充任之。

（四十二）中央委员会以经济政治之条件为标准而规定各地党部组织活动之范围，依全国之行政区域而划分各种地域的单位。

第十一章　审查委员会

（四十三）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

第十二章　党 的 纪 律

（四十四）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四十五）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党部执行纪律的方法，对于团体的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对于党员个人的是：各种形式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

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查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开除党籍的问题，由本章程第六条所规定之手续决定之。

第十三章 党的财政

（四十六）党部的用费由党费、特别捐、党的印刷机关及上级党部之津贴等充之。

（四十七）入党费和党费的多少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失业和极贫苦的党员可完全不缴党费。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并将此宣布于党员大会。

第十四章 党 团

（四十八）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党团得选举干事及书记进行日常工作。

党团在处决自身内部问题及日常工作有自由权。在党部委员会和党团中发生不同意见时，党部委员会应协同党团代表重新考查问题，并通过决议，该决议党团应即刻执行。如党团有不同意见而上诉时，问题由最近之高级党部解决，但在上诉期间，仍应执行党委之决议。

（四十九）党委员会在讨论与党团有关系的问题时，应使该党团的代表出席党部的委员会之相当会议，有发言权。

（五十）党团选举党团干事会，此干事会应得其所隶属之党部之批准。党团干事会在党团工作上，应对该级党部负责。党部得派自己的委员为代表加入党团干事会之组织，并有权召回任何委员，但同时，将召回的原因通知党团。

（五十一）在党团工作的各组织中，各种职务人员的名单，得当地党部之同意由党团提出，关于调遣党员由这一党团至别个党团的问题，亦同样决定。

（五十二）党团所在组织中各项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先经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之讨论。

凡党团对于每一问题之决议，加入该党团的党员应在该组织之大会上一致拥护和表决。凡破坏此条的党员，应由党部按党章给以党纪上之制裁。

第十五章　与共产青年团的互相关系

（五十三）在党与青年团的各指导机关中（从支部至中央）均应互派代表，交换发言权同表决权。同样，青年团得以自己团员的数量为比例选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切代表大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一　煽　　动

（一）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情形之下的基本任务即为准备新的广大的革命潮流高涨之到来。在此高涨的运动到来时，我们实际任务是组织与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群众之政治训育。

此种任务需要党的宣传工作之根本变动而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工作内容乃向工农群众阐明他们革命争斗之内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反革命的教训以及上海广州等工农暴动的意义，并解释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夺取与建设的经验、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农民协会与工农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在无产阶级与其先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与城市之联合的作用及意义等等。

（二）我党基本政治口号与群众煽动基本内容仍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三）解释与阐明党的基本口号自然应当同劳动群众目前需要紧相连系起来。应当牢记着，只有在自己的地方的具体需要的基础上才能向千百万的工农群众说明广大的政治前途。不能联系因于资本进攻或工人阶级情形恶劣引起的冲突、纷争、反抗与罢工；不能联系因于地主恐怖、捣毁农民组织、军阀苛捐杂税引起的一切愤慨与骚动；不能将此等"琐细"问题与基本政治口号联系起来——那么群众煽动一定是浮面的，一定不能在党的口号之周围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与推动他们参加革命争斗。

（四）同时各省革命的不平衡发展与政治环境之一切变动（争斗加厉、从秘密条件转到公开条件及军队退出等等），需要我党巧妙的能够扩展争斗，需要我党能够依据党的一般口号而提出新的、提高群众积极性的口号（从经济罢工争斗的口号转到政治罢工、示威游行、武装暴动等口号）。很明显的，某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之夺取根本改变了我们煽动之整个性质与内容，而提出一些巩固本地方的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

（五）艰难的秘密工作的条件当然影响到群众煽动的性质。大的群众会议之召集，逐渐成为群众煽动的艰难工作。我们所能做到的乃为召集工人放工以后或当工时的工厂门外的露天大会，利用城市的俱乐部、工人寄宿舍、夜校、同乡平民学校、工人兄弟会及乡村中的市场、节日、神会、山林中的会议、大场上的公众游戏等等。

（六）同时更有一个任务就是改善个别与小组煽动的工作。每个党员应当成为积极的努力的煽动者。这些同志必须在小组与个别谈话中积极煽动，阐明本地不健全问题之政治意义、中国目前政治事件真相及指出解决现时革命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准备群众武装暴动。

（七）应当尽量扩大群众煽动工作的基础，应当利用一切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可能，在工人、苦力、流氓无产阶级、农民、兵士、职员、学徒、小手工艺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与小学教师中间加紧煽动工作。

除此一般的党的口号作为领导方针，此外更应在日常的群众煽动中提出适应各个争斗时期与各种等级人民需要的具体要求。如像为工人与苦力提出的要求，应为提高工资，反对以铜元付工资，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任意处罚与摧残，保护与改善劳动居所，反对包工制，男女同工同酬，产前后休息二月照发工资，减少女童工夜工时间，禁止用童工女工作危险工作等条件；为农民佃农与半佃农的要求，应为反对偿付租金，反对高利借贷者、侵吞公款者与打倒土绅等等；为学徒店员与小手工业者的要求应为反对高度的剥削，反对虐待与恶劣的劳动条件，反对低廉工资与生活昂贵，改良食物，减少学徒期间等等；为兵士的要求应为提高月饷，按时以大洋发给月饷，反对长官侵吞和折扣月饷，组织兵士管理月饷委员会，反对肉刑，反对在战线上枪毙兵士，发给兵士土地，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抚恤士兵家属，反对利用军队压迫工农队伍与阻止兵士投向工农军队等等；为知识分子的要求应为反对不良教授，拥护学生自治，自由集会与游行，反对考试制度，改善教员物质条件等等。

（八）此种广大的群众政治煽动是艰难而又繁杂的，因此须加紧在关于比较进步的工人与最忠实的知识分子中间选择并选就一批宣传员与煽动者，并增加对他们的领导。党部委员会每逢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兴起时，须即召集宣传员会议（几点钟或一天两天），指示他们实施运动的方法、内容与形式及供给必须的材料等等。

（九）由于煽动工作之异常艰难及其含有广大的意义，因此党部宣委成分必须健全有力，以领导全部煽动宣传与工作。

二　宣　　传

（十）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乃为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以及藐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等倾向争斗，并应在精密研究中国与国际革命运动之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党的布尔雪维克化而争斗。同时党应当同孙中山主义及创立第三党称为工农政党的一切企图作坚强理论上的争斗。因此党的宣传工作具有下面两个基本任务：

（1）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

（2）特别应该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

（十一）为实施大规模的党员政治训育起见，必须：

（1）在工厂、街坊、乡村与学校支部之下设立各种秘密小组，而指定有经验的宣传员领导之，并须制定适合此等各种小组与政治认识的训练大纲，特别注意阐明目前政治任务与党的口号。

（2）由于工作秘密条件，缺乏优良指导员与不易吸收大批党员进入小组等等的障碍，进行小组工作极为困难，因此须发展党员自修工作。各党部宣委与专此种工作的同志应以编制大纲、指定参考书籍报章、组织秘密图书馆等方法，尽量帮助自修同志。为减轻此种工作的困难起见，应当发行大批政治书籍，文字内容务求通俗，须适合我党同志的程度。党中对此问题亦应加以最大注意。

(3) 党内尚有一部分不识字的同志，务使此等同志消灭此种现象，一面组织平民学校性质的小组帮助他们或施以个别的训练亦可。党在非党群众中间（工农），应当组织夜校及平民学校，以消灭不识字的现象，并造成此学校作为政治训育工作的基础。

（十二）为增高党积极分子的理论上的认识起见，必须组织速成科（同时保守……一切秘密条件），时间与人数视环境决定之。此等速成科的任务乃为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基本问题与列宁平生及其学说等等。很明显的，要使此等速成获得良好的效果，只有在具有良好的指导员与学生成分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对于供给他们参考书，教课课本等等方面当然应当加以注意的。

从这些党积极分子中间，应当挑选优秀同志继续在其他的情形比较更为静寂的环境之下，发展与加深自己理论上的认识。

（十三）宣传工作基本条件之一即是必须利用各社会团体的图书馆。图书馆在党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可以转为发展吾党在工农、小资产者与知识分子间的影响之公开的方式。很明显的，此种任务并不说明党无须从事于设立自己秘密的图书馆的工作了。

（十四）除掉图书馆，我党机关开办的书铺也是宣传工作公开的形式之一种。

（十五）宣传之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参加这些团体会议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建议以及报告苏联状况等等——这一切，地方党部都必须利用以为扩大自己宣传工作与利用一切公开可能的基础。

三　刊　　物

（十六）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

（十七）扩展群众中间的共产主义影响之基本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必须组织每日出版的销行全中国的工农报纸。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必须组织大规模的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间捐集报纸基金的运动，并应吸引党与少共全体群众参加销行此报的工作。此种报纸对于女工农妇问题应加以注意。

（十八）此外，应当极力设法在工厂、企业与乡村内组织墙报和图报。材料偏重于本地情形的性质，同时极力将地方问题与一般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宣委必须采取一切步趋改善与墙报的连系，帮助组织新的墙报和增加对他们的领导。此外，粉笔队亦是我们宣传利器之一。

（十九）在党各临时政治运动中，应当注意与改善传单、宣言、小册子的内容及印刷。传单有极大的作用与意义，它解释每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应当吸引优秀党员从事于传单宣言等的编制，内容文字极求简单通俗。中央宣委与地方党部组织，对此都须加以注意。

（二十）在党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党报有极大作用。它组织与团结党的广大群众于正确的党的路线之周围，并交换各地方党部工作的经验。

（二十一）因此，现时已有党的定期刊物《布尔塞维克》与《党的生活》，必须极力改善以期真正能够成为领导机关

(关于这两个报纸有具体的指示)。

(二十二)工农通讯员对于改善一般政治报纸与党报有极大的作用。中央宣传委员会与一切地方党部对于此等通讯员的组织、选择与领导，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在秘密工作条件之下，这些通讯员可以表露出工农群众的政治情绪与要求。因此应当尽量扩展一切党机关中的工农通讯员的工作，而工农通讯员对于散播报纸与对报纸表示物质上的帮助等事业方面应当特别出力。

(二十三)在可能条件之下建立灰色通讯社，传播各地工农争斗的消息亦是必要的。

(二十四)不识字的工农自然不能阅报纸及其他通俗政治书报，因应当尽可能的组织诵读这些书报的小组(公开或秘密的)。宣传委员会即应指派一些不仅能够教读而且政治认识清楚的同志担任小组指导员的工作，以便利用这些小组作宣传的工具。

(二十五)由于各种小组、讲班、自修及其他党的各种训育的组织之密布，因此必须组织：

(1)发行并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报章，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语；

(2)发行为中等党员用的比较高深的书籍，如关于中国现时政治生活，党的目前任务，列宁主义、苏联、评孙中山主义及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与左派盲动主义倾向等等问题；

(3)最后的一个任务——时间比较长些——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思、斯达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

(二十六)为真正迅速实现这一切关于刊物方面的步趋起见，必须赶急指定同志从事此种工作，在技术上保证这些著作

的发行、捐集发行基金等等。

（二十七）因为一般与党的刊物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所以此种工作直接由中央指导。

（二十八）因处于秘密条件之下，发行关系极为艰难，所以对组织散布秘密刊物于全国的特别人员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应极力注意改良分散刊物与输送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关于共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一、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指出中国 C. Y. 在最近两年的发展中，积极参加向上发展的工农的革命斗争，在这时期受了很大革命的教育，对于革命的发展有过很显著的作用，中国 C. Y. 已渐渐把自己变成了群众的组织。在北伐及上海暴动期间，“八七”后，广东（海陆丰、琼崖）江苏（宜兴、苏州）以及湘鄂赣等处农村斗争与暴动之中，与武汉、上海等处城市工作，团做了相当的群众工作。在武汉公开时期，在他的指导之下曾创造起有过很大革命作用的儿童运动。中国 C. Y. 常常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劳动群众到革命方面来的最亲近的助手之一。

（二）虽然在这时期，在政治路线与实际工作中 C. Y. 曾犯了许多的错误（如青年工人利益的斗争的缺乏，在工会工作没有找出具体的工作方式，缺乏一般的劳动青年利益要求的纲领，群众宣传工作与团内政治教育薄弱，没有切实注意到兵士运动，未能尽量反抗国民政府和揭穿其假面具），但其伟大的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功绩，便是在革命最紧急关头时与党员群众共同反对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国 C. Y. 在这时所表现的革命性比当时党的指导者要大，所以表明他是中国的伟大政治力量。

可是，因为党对于团的工作没有积极的指导与帮助，及团本身在新的转变当中没有在青年工农群众中找出新的出路，使团内部发现了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与此种倾向相反的在党内与团内（C. Y.）发现了取消派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限制甚至放弃 C. Y. 政治活动而仅作文化工作，使 C. Y. 的年龄由二十三岁降低到十八岁，把 C. Y. 一切工作人员都转交给党。

现在先锋主义倾向在团内已经渐次消灭，但仍须注意与这种余毒奋斗，并且取消主义倾向，在党员与团员之中还时常发现（如广东及湖北等处的下级党部），要根本铲除此种错误倾向，才能够造成党与团中间的健全关系，才能有取得广大青年工农群众的胜利的工作可能。根据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 C. Y. 确实是扩大共产主义者在青年中的影响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并且曾在革命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因此，要吸收广大的青年工农加入革命斗争，其当前任务厥为扩大共产青年团的组织和活动。

共产青年团是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组织，在革命运动中他是党很有力的助手，经过这个组织吸收青年工农加入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把青年工人和被剥削的青年农民、兵士与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与以共产主义训练。只有积极革命斗争和这种斗争同理论上的教育与参加党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才能训练出真正为工人事业而工作的战斗员。

二、今后中国共产青年团的任务

（一）共产青年团在最近时期中的根本任务，在于取得全部青年工人和被剥削的青年农民群众，以保证夺取政权的工农斗争。这个任务，特别因中国青年工人在过去和现在均有显著的作用而更为重要（中国青工在工人阶级中所占的百分比，较其他任何国家为大）。不把青年工人吸收到革命方面来，夺取政权的胜利斗争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与现在的斗争中，青年农民在乡村中的作用不弱过于青年工人在城市中的作用。苏维埃区域的革命队伍中，农民游击队以及其他较大的农民斗争中，都有大部分的农民青年（差不多是大多数）参加。因此，为着乡村的革命胜利，共产青年团必须切实进行农民协会与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工作，把青年农民中的革命部分放在自己影响之下，并须注意领导农村青年特殊利益的斗争。

现时取得广大青年工农群众工作中的根本障碍，就是盲动的情绪，玩弄暴动，不愿在群众中工作，不明了取得广大群众以保证暴动胜利的必要和暴动后群众对于政权维持的必要。这种盲动的倾向，过去团内表现得尤其厉害，党与团的指导机关已经与这些不良倾向宣布斗争（广州暴动与教训及团的任务决议），但是这些不良倾向还未在团员群众中彻底肃清，现在还需要坚决的经常的斗争以反对这些倾向，因为这是在群众中工作的先决条件。

共产青年团的大部分的作用既是在于教育工作，共产青年团既不与共产党一样，是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指导者的组织，而只是青年无产阶级先锋队——指导者的组织，那么，共

产青年团，就应比党是更群众的一个组织。但是，现在的团员数量是赶不上党员数量的，这特别在工业中心区域内表现得厉害。

（二）C.Y.在青年农民中，尤其在苏维埃区域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最近在这些区域内的发展，主要是在农民青年中间（青年农民团员的数目约占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青年工人的成分约占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而青年工人方面的发展却很有限。

尤其在大工业中心的城市中（上海、武汉、天津等处）发展得非常有限。C.Y.之因为广大青年农民加入而发展，乃一重大进步原素，但因此少共在工业中心内扩大及巩固自己组织的任务就更重大了。惟有在巩固了C.Y.的阶级基础以后，才能够实现对C.Y.中农民的领导。

（三）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对青年工人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尤有严重的影响，纺织工业的业主现在谋开除企业中最积极的工人阶级分子——青年工人，同时更加重对童工的剥削。

大会使党及C.Y.注意于尽最高限度的去发展C.Y.团员经济的与工会的斗争的必要。工会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党团必须尽力帮助C.Y.为青年工人的利益而争斗。在不妨碍整个工人运动发展范围内，团并可发动并领导青年工人作本身特殊利益的斗争。在斗争中党部与团部均应竭力向一般工人群众宣传，使之拥护青年工人及童工的利益，并赞助此种青年工人特殊利益的斗争，向工人解释行会思想的有害。至于在我们的党内和工会中的党员中间，更不许有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

根据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创造工会里面的青年组织上独立的工作之决议，应有青工小组的组织。C.Y.必须根据这些工会工作的组织形式，尽力加强他在工会中的活动。

C. Y. 亦必须与党共同的增强夺取黄色工会中青年工人群众的斗争和工作。

（四）再者中国 C. Y. 对反动军队中兵士工作与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亦须严重注意。至于工作方式及军队中党团关系，应根据军事决议案切实执行。

（五）最后，今后团对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工作，则应注意学生本身利益斗争的领导，扩大思想斗争及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宣传与行动。

三、建立正确的党团关系

大会向党的组织指出与 C. Y. 有建立相互的正确关系的必要。

党的组织与 C. Y. 的相互关系应当是 C. Y. 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工作，同时有完全组织上的独立性。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

（一）党的组织必须加紧对于 C. Y. 的政治指导与物质的帮助。

（二）党与 C. Y. 自上级至下级各机关必须互派代表参加。

（三）必须有系统的在党委员会上讨论 C. Y. 问题，如果特别重要的问题，并须提到整个党的组织中去讨论。

（四）党方面一切牵涉到 C. Y. 内部组织的独立性的问题（如调动 C. Y. 工作人员、使团员转党等等），应当与 C. Y. 商议，应当得到 C. Y. 地方委员会的完全同意后方执行。如有不同意见时，可提交党与 C. Y. 的上级机关解决。

（五）在党没有组织的地方，团得自己独立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但须接受党的政治路线之指导和帮助，建立强固党的

组织。

（六）党应经常指导兼团的党员、增强对于团的政治影响。

（七）团应当经常供给党以必须的积极分子。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妇女运动决议*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一）中国共产党与妇女解放运动

一、过去的妇女运动偏重于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党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妇女组织是一般的民族革命运动为其立脚点。其纲领只包含一些普通的妇女要求，如由宗法社会之下解放妇女等问题。但是工农运动的力量与范围的扩大，已经逐渐使运动不能单限于此等要求，当然要提出纯粹无产阶级性的要求了。在这时期内，我们可以与这些组织合作，因为她们赞成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绝不是简单的。因为他们是一般的妇女的组织，是拥护一切的妇女的利益的。但中国共产党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在指导妇女运动中也是机会主义的，每以保障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而在工作上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妇女与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缺乏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

二、“八七”以后没有切实的工作方针和吸收女工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八七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转入新的阶段，虽在组织上政策上均确定了新的方针及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等等，无不表现新的精神，然对于妇女运动工作的标准，并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未明确的指示出来。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既与背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消灭了，别方面对于无产阶级的妇运并未有坚决而明确的计划，别一方面党内在组织上工作上有些取消主义的倾向（取消妇女运动的倾向）。对于女工农妇并未提拔她们参加指导机关，尤是证明党之不注意妇女运动工作。

三、中国革命的阶级分化反映到妇女运动的分裂。当此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组织了反革命的联合战线，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之际，阶级的分化反映到一切的民众中，劳动群众渐渐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成了不能调合的仇敌，妇女群众及妇女运动之中也就有这样分化。所以党的任务是要特别注意于工农妇女之中的群众工作，因为国民党时期的“一般的妇女运动”的“妇女的联合战线”是不可能的了。

四、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能彻底解放妇女，现时中国的民权革命中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彻底的摧毁半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能引导妇女群众到解放的道路。这并不是说党在妇女问题上不主张一般的妇女解放，恰恰相反，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就是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真正能肃清封建余毒对于妇女的束缚和压迫的，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性的彻底的民权革命（在中国现时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才能痛快的最大限度的解放一般妇女的束缚，真正肃清封建余孽的经济基础。

五、对于买办及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要努力反对。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而以和平方法和宣传以解放妇女，这完全是幻想，但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妇女的思想上很有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

第一点。

基督教的妇女运动用各种方式亦如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对于妇女群众由欺骗而进入麻醉的宣传，而历年来几形成了反革命的势力之一，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二点。

国民党政府现在改变刑律，仿佛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权，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上层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些。这种改良主义的妇女运动，引诱和欺骗妇女群众，甚至于无产阶级妇女群众亦有受其影响的可能，这是我们不可不注意的第三点。

以上三种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都是站在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反阶级斗争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阻碍革命的力量，不得不加以防止，在群众中经常的暴露其真情，严厉的加以批评和反对他们。

六、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劳动妇女的群众，同时也应当用各种方式领导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的斗争。中国宗法社会的束缚和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政权之下，党应当领导一切妇女力争他们的真正解放。在这点上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劳动的知识分子，在联合战线时和我们走到一起的），要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引之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因为在革命重要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态度足以决定革命与反革命的胜负。

因此，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组织——如果他们确有些群众的，党便应当尽力吸收其群众，领导他们参加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之某种具体要求的斗争，同时要赞助他们的革命的口号（如女学生反帝国主义、职业平等、经济独立等），在他们中间作宣传工作。在手工业者与劳动的智识分子之中必须作系统的工作，可利用各种方式深入其群众而组织之。

（二）党的任务及对于无产阶级妇女的关系

一、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在现在革命的时期中，大会提出关于取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建设苏维埃等口号。虽然中国的革命是暂时失败了，白色恐怖大批的屠杀工人，大批的开除工人，但是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无疑意的增加了。然而加入党及红色工会的群众日渐减少，组织上与群众的联系削弱了，所以现在党的任务，应取得群众，组织而准备为夺取政权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而斗争，为实现此种任务，首先要组织工人群众，指导他们日常的政治与经济的斗争，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知道夺取政权之必要。

二、首先要注意大城市无产阶级群众与女工群众。革命发展之进步与最后的胜利，要依工人阶级之准备程度而定。工人阶级要成为革命之先锋队，因此党应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于工业中心地。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工人群众集中的地方，另方面是反革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之集中处，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因此党目前应注意怎样组织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中的产业工人。故必须组织其群众中之半数的女工，尤当注意集中女工力量的纱厂与丝厂，才不致使一半的产业工人群众成为消极的，或受反革命之威胁蒙蔽。过去党在各地的妇女部，其工作多由智识分子负责，与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没有组织上的密切联系，现在反革命的营垒中建立联系非常之难，所以要加倍努力，战胜一切困难去组织女工群众。

党应积极指导女工的日常斗争，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大多数觉悟到自己生活的痛苦而团结起来。要求改良参加阶级的经济斗争——要求改良女工与童工经济上的地位，要求

增加工资，增加休息时间，反对折扣工资等等，以锻炼其阶级的战斗力。

三、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有女同志参加，劳动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在统一的党的指导之下。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有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在党与青年团、职工会与农会中，指导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要根据党的一致路线，尤不能令妇运工作成孤立的形势或独立的形势。

党的组织宣传文化等，关于工农妇女群众方面应特别注意，使之易于了解。

党须注意分配女同志工作，尽可能的使其参加各级党部的工作，而得相当的训练。

四、党的妇女运动应群众化与无产阶级化。在党的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尤其注意吸收在群众中积极分子，这样才能使党的基础建筑在工农妇女群众之中，才能真正群众化。

五、党的妇女工作人员应无产阶级化。过去党内女同志多不积极深入群众去工作，此亦是年来不能发展党的妇女运动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后要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使之无产阶级化，以督促其工作。

（三）职工会与妇女工作

一、应提出女工的特殊要求，应使男女工一致行动，提出女工斗争的口号和要求领导其斗争。产业女工中的工作，自然就是职工会的工作，要吸收女工加入职工会。在取得女工参加红色职工运动中，必须提出许多根本的要求，在这些口号上去

统一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儿童及妊妇与哺乳妇作夜工，缩短夜工时间，同等工作应得到同等工资，保护母性，禁止妇女做过度和危险工作，经常的星期休息日及解放幼儿在工厂中工作，组织儿童院和幼稚院等。要特别注意和提出女工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要求，以求达到胜利。但同时须顾及改良主义派的要求程度和各地方的环境，酌量情形决定之。工会更当注意女工要与熟练的男工一致，以取得男女工的互相帮助，才不至于使因男女工的不一致而失败（如香港新新香水厂女工罢工，不得同赤色工会的会员——熟练男工的帮助而失败）。

二、应参加黄色工会，在他们之中起党团作用，取得较大的群众时要实行妇女会议运动。赤色工会在秘密条件之下，只能吸收无产阶级一部分的积极分子，故为扩充工作起见，须利用种种公开的可能，不能放弃了黄色工会。要团结其中的女工群众，组织共产党的党团，在她们中间树立共产党的影响。如共产党的指导已有保障时，即应设法在这些工会中，组织女工会议的运动，特别要注意女工互助会与姊妹团等工作。日常的斗争是争取群众的最好的基础，更设法使之受共产党的影响，使之成为代表会的一种助力，并统一各姊妹团的要求和组织，引导这种组织使他们进而变到赤色工会运动。

要尽量利用各种短期训练班、学校、俱乐部等公开机会作革命的教育宣传工作。

三、工会机关中要有妇女委员会。赤色工会之中应当有妇女委员会，执行调查计划的职务，使工会指导机关，得以尽量领导女工的运动。

（四）农民运动与妇女工作

一、应在农民组织中作有系统的妇女工作。党在乡村中的任务是吸收劳动妇女到革命方面来，因此在农民组织中须有系统的工作，以造成和巩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战线。

二、农妇受压迫最甚，这是引导他们参加革命的基础。农妇之参加农民运动，过去表现了高度的自发状态。在乡村经济中，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

三、农民组织之中要有妇女委员会，妇女必须参加苏维埃政权。为有系统的在农妇中工作起见，必须在农民协会中组织妇女委员会。在苏维埃已成立的区域，必须使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在游击战争的地方，应设法使他们作各种特殊的重要工作。在已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或在苏维埃势力影响之下的区域，已有协作社的运动，则应利用农妇参加建设协作社的工作。

四、农妇斗争的口号和要求，要在乡村中亦进行“妇女会议运动”。在农妇中之宣传与暴动工作，应直接提出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同时注意不要因这些问题而影响到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好感——要注意群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成见。

在现时农妇中工作的口号，最注意要与一般农民的口号相联贯，而为一般农民所同情。这种工作在初期的进行中，应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先召集农妇开会宣传她们。如在共产党影响

之下的区域，可以召集长期的有系统的“农妇代表会”。如可能时，应使革命的女工与附近的农妇联合召集联席会。

五、要组织农村中的女工（雇农或其他女工）于统一的工会或农民协会中，不必组织独立的妇女协会。应吸收一般农妇参加农民协会及吸收一般女雇农到农村的工会中来，并将最觉悟的分子吸入共产党。

在中国的环境中，组织单独的妇女协会是不适合的，所以党不必从事这种工作，如已有这种组织，应使之并入一般的组织。但当执行时，不应因此而失掉了已有的积极分子。

（五）青 年 妇 女

一、应注意青年女工。应注意到青年女工在工厂工人中，是占有很广大的数目，她们是无产阶级妇女中最革命的一部分，青年团对于妇女组织上最主要的任务是夺取这一部分女工。大会认为青年团必须在青年女工中工作，使之在青年团影响之下，因此在青年女工多的地方，青年团应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应与党部的妇女运动委员有密切的关系，由支部直至中央都应如此。

（六）宣传与准备人才

一、革命的报纸上要有妇女的专栏及通信员。共产党应在职工会的以及农会秘密的报纸中设妇女栏或副张，尤其要注意印刷传单、宣言、口号等。这些东西对于知识很少的妇女是最相宜的。若可能时，应有妇女积极分子的投稿通信。

二、要训练妇女运动的人才。在一切党的与一切职工会的

学校、训练班，都应当吸收一定的百分数的妇女，而在他的教育大纲中，须研究妇女问题及工作方法，为工作者认识实际的工作。必须推动劳动妇女去积极工作，在党中、职工会中、农民的组织中，尽力帮助她们的工作。

（七）苏维埃区域中的妇女工作

一、实行解放妇女的口号。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以实现在妇女中宣传的各种口号，使之明了只有苏维埃政府，是能实现他们的利益而能解放他们的政府，并于必要时，可以召集关于妇女的各种讨论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

——铁路工人中工作大纲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

铁路工人是中国最重要产业的无产阶级，它在全国的交通上有重要的位置，它的工作和性质有全国关系的连系，在行动上应与全国有很密切的联络，在组织上有整个统一的组织系统，是全国职工运动重要的中心工作。要巩固党在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土地革命的完成，铁路工作应要加紧与扩大，否则不但是矛盾的表现，而是职工运动的前途受了莫大的损失。

过去各地党部非常忽略铁路工作，所以现在只有河南、直隶、湖南有些基础外，其余各省的工作甚少。铁路赤色工会的组织未有一省建立起来，甚至有些连群众组织也没有，工作尚未开始。

北方铁总的组织，只顾到直隶一省内的铁路工作。

虽然过去铁路工作的错误比城市职工运动尤甚，因此各地党部对铁路工作许多还用旧的方式，没有运用新的策略和方法开始工作与注意，是铁路工作一个极大的缺憾。

现在全总接各省铁路情形和工作的报告绝少，得不着很多实际材料，给各路工作一个具体的工作计划，但是在一般的工作原则上可指出几点：

1. 铁路的机器工人生活比其他部分工人为优，入手比较困难（尤其是广东有机器工会的组织），所以我们没有同志和基础的铁路，应从生活最苦的蓬工（广东称路工）工人入手。，蓬工都是沿路的农民，要与沿路农村党部发生密切关系，由农民同志与蓬工发生关系。由这种线索进而由蓬工打进机器工人群众中，是比较容易而有可能的，但是过去多忽略这点，只有呆板的注意机器工人，而对于蓬工不重视，在铁路蓬工同志绝少甚至没有，所以铁路工作不但不能与沿路农民发生密切关系，如北方连支部也不受所在地党部指挥。这些可以证明过去对蓬工与沿路农民关系的工作了，这种观念应速改变铁路工作才有办法，所以工作没有线索和头绪这是一个极大的原因。

2. 设法派送有些工作活动能力的同志进机器厂作工（有时用钱也可以的），使同志进去以后，能够发生作用，发展党的组织，鼓动工人起来斗争，建立群众组织。打进铁路应用多方面的人手，每一条路的大站，尤其是第一该地农运比较有基础的地方，第二工人革命情绪比较高涨，第三生活较为痛苦，第四与有些把握的工人发生关系，如有这种条件的，应派同志去该地常行负责铁路工作。

3. 铁路工人生活北方比南方为苦，欠薪至九月之多，工人有病也不准请假，做工过数小时也不发补工工资，……等。在一般的说，铁路工人的斗争机会比城市的工厂更多，如军队无票坐车及呕羞司机查票工人，军阀战争强迫工人加开夜工不发工资，要求履行条件，尤其是蓬工工人，因他多数是包工的，他们的工资完全由工头在铁路敛钱以后克扣一部分才发给蓬工的，以及时常打骂开除……等。应用各种工人最迫切要求提出简单口号鼓动工人作日常生活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群众组织，不限秘密工会，如一站或一个工头所管下的蓬工都可以，

扩大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和反国民党（尤其是北方）宣传，同时应宣传打破机器工人轻视蓬工的观念，使他们一块的组织起来。铁路斗争的方法尤应采取多方的方式，不必要有整路行动才去领导，零碎各部的尤为需要，由零碎及各部小的斗争尽量的扩大会合全路的行动。

4. 凡有支部组织的各路各站，同志不甚积极或能力薄弱的，应派一个得力同志去巡视工作和组织群众，如以前的特派员，但形式要与以前的改变，不能兼党支部书记。群众组织起来特派员应即撤销或调往别站或别路工作，否则铁路工作变了特派员专政包办。

右面各点是目前铁路工作的几个方法，当然这几个还是不够的，各地党部应根据各路情形更具体的规定工作计划，开始工作。

现在特规定各省执行下列工作：

1. 凡有支部组织的各路各站在最短期间召集同志大会或活动分子会议详细讨论一路或一站工作计划，将结果情形报告全总，以便随时指示。

2. 未有党的组织的路，省委应规定开始工作计划与方法。

3. 各省指定一个比较明了全省铁路工作的同志与全总发生关系，每月参加省委工委会议最少有一次讨论铁路工作，无间断的作报告。

4. 调查铁路情形在最短期间报告来，规定大纲如下：

（1）工人生活状况，应分机器厂、司机、蓬工、查票……等各部工人。

（2）斗争经过情形，及我们的策略。

（3）组织情形：A. 群众有什么组织；B. 工人的派别；C. 反动派的组织及工人对他的表示，他在群众的影响。

（4）我们过去的策略和工作有甚么困难、缺点、结果，党在群众的影响和力量（同志只写数目便可）。

（5）其他特别情形。

各省委接此通告后一个半月，要将以上各项作书面详细报告全总。

前次发出之四十号通告已经两月之久，但各省还有许多尚未执行，如在一个月以后对于职工运动还是这样忽略，职运费停止发给以示处分。

中　央

七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告苏联境内孙大及其他各校之中国学生（联共、苏联少共、中国少共的正式和候补的党员和团员）书

（一九二八年七月）

亲爱的同志们！

在苏联境内各校中约有一千五百个中国同志，预备在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组织中，将自己锻炼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队伍中的积极战斗员。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要听候着共产国际的号令，预备回到中国去参加为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资本家、封建地主铁链之下解放出来而英勇作战的无产阶级的队伍中的实际工作。

你们知道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为你们的学习准备费下多少的劳力。苏联无产阶级准备着而且实行着，尽其所有力量以保障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及中国工农群众之胜利。苏联无产阶级为完成其国际任务，不仅在精神上表示同情，并且在物质上实行很大的赞助。为完成这种责任起见，在苏联开设了中国劳动大学以及其他各校中之中国学生的政治教育。这一千五百中国同志的学习需要苏联劳动群众的供给及精力，在苏联来教育中国革命者，这件事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

营垒之中，在共产国际及联邦共产党之积极的帮助之下，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中心地，在世界上革命思想、革命事业之最伟大的在冶炉中——中国同志在物质上及政治上，有充分的可能，去深刻底研究革命理论与实际，学习马克斯主义和列宁主义，省察自己党中之过去的经验，估计过去经过道路的错误。中国同志根据联邦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经验，有充分的可能，正确的估计自己党中之过去经验。

这对于中国革命现在所处的阶段中，更是特别重要。中国革命在一九二六——二七年之一个短期的胜利之后，便转变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国民党由一个共产党及青年团合作以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变成为一个与帝国主义合作而反对共产党、反对青年团、反对无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的领袖们，无论是“右派”或“左派”都同样的成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国民党想以空前未有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白色恐怖来消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在国民党的刽子手的刀斧之下，我们牺牲了三十余万的革命工农战士。

在这种条件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仍然继续着自己的英勇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一分钟也没有止息。我们很无疑义的相信，中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的务件，中国阶级互相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结果一定是使中国无产阶级得到胜利。得到这种胜利，必须中国共产党员在原则上完全明了列宁主义的精神，必须努力在工农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工作，必须在自己的党内保持着集中的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并需要造成许多新的中坚分子。一部分新的中坚分子，应当是你们，这些在联邦共产党领导之下在苏联境内学习的同志。由此，可知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些什么任务了。

你们之注意力的中心，应当是研究必要的知识，了解列宁主义的理论。你们应当研究、省察、揣摩一切国际革命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东方与中国之革命运动问题；你们应当研究苏联及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因为你们中间的很多人，是当着中国共产党还在公开条件的时候而来到苏联的，尤其是因为你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完全不明了中国在秘密条件之的工作状况，秘密条件下需要更坚强的理论上及精神上的稳定，需要很多特别的知识和严重的准备；你们应当不要空过一小时的时间来研究群众中的工作及组织群众的经验；你们应当注意研究和取得工农运动的实际方法，党的工作组织原则，学习军事学，因为你们在实现你们党和工人阶级之要求的时候，是要拿着武器而奋斗的；你们应当使一切其他的理由，一切其他的利益，都服从着一个东西："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

同志们！你们应当自己度量一下，你们应当自己承认，你们中间的许多人，离这条道路还是很远的；你们中间的许多人，在不久以前，不但在私人关系上，并且在政治上，都是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我们知道，这一种联系并不是时常可以很容易的消灭的，若要消灭，必需要有坚定的党的意志，这种坚定仅可以在斗争过程中锻炼出来。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之落后，全国盛行的地方主义，对于你们许多人还发生很大的影响，你们在苏联学习及训练之中，你们又不能立刻学会俄文。这种生活条件也相当的助长了这种特点，你们必要起来战胜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是阻碍着你们，使你们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使你们不能服从统一的意志——共产党的意志。

我们必要提起所谓"江浙同乡互助会"的事。这件事是在

各个有中国同志学校中引起了许多纷乱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八月十日之委员会中有中共出席国际六次大会代表团及有几十个中俄同志出席的会议上曾审察了这一问题。事件之发生是由于一九二七年有些中国同志曾经组织过所谓物质上的互助，我们对于□□中间之彼此互助的行动，绝不认为是什么不好或是有害的行动。恰恰相反，我们训练我们党内同志中间之彼此同情的表示，我们鼓励着在我们统一的共产党之中，党员在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之彼此互助。假使这一种的互助是公开的进行（在联邦共产党各级党部之下都有党员互助委员会），受党的监督，自然便完全没有什么不好的意义在里面。但是这件事却完全与这原则相反。同志们以为必须指出这一事件的秘密性及对负教育中国学生之责的同志的惊愕。例如，卢贻松曾写信给周策等人说到“互助会”的组织，说到根据章程第一条须缴纳会员费，说到会里有名誉会员，说到他自己加入这一团体。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卢贻松及其他同志解释说，对于章程和名誉会员等，他们是写着开玩笑的，任何章程都未有过等等。中央监察委员会以为这些同志的错误是把能有严重而且危害的结果的东西当作开玩笑，以开玩笑来掩饰之。这种对党秘密的组织，这种不受党的监督而进行自己工作的组织，可以发生很大危害作用。以派别和同乡等为原则破坏统一的共产主义的政党，给同志们以同乡亲友关系等为原则而形成组织的危害倾向，以行会式的组织来代替以党为原则的组织。在这种秘密组织的同乡会的张力之下，可以养成无原则的或者反党的派别，隐蔽了以党为原则的原则上的派别。这种情形对苏联境内的中国同志尤其危险。对于他们，必须消灭他们之间在前几年按各种原因形成的裂痕，如为私人推荐升学（如军校等）而引起的斗争，如所谓“旅莫支部”的□□以及为着其他以前的

错误所引起的斗争，要消灭参加“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的嫌疑而发生的同志间的互不相信的态度。

党没有证据来确切的断定，现在还有这种性质的有形式的组织，根据党内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说。这些创造过互助会的人与反革命、与军阀、与右派国民党、与第三党（谭平山等）有关系等。但是党根据上述原因对于这种对党秘密的团体之组织，给以坚决的裁判。

同志们！你们应该觉悟到，如果我们允许在自己的队伍中形成，虽然是形式不足的，而是没有通知党，不受党的监督的组织，对于处在现有条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有多大的危险呵！这种组织在其将来的发展上要超出互助范围而有政治性质是有可能的。在苏联境内中国学生的这样复杂的社会成分之下，在他们的无经验及原则上坚决不足的状况之下，这种组织能够把他们吸引上很危险很有害的严重的派别争斗的道路上去。现在中国学生间同志关系的恶化，便是这种危险的事证。联共及中共把这件事情的这种意义指明出来，你们很多人争论的事从此可以得到应有的结论。

我们深信你们用大家的力量来改正这一错误，你们不致于因此事而与联共及中共为难。我们号召你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同志信仰的基础上，在革命理论与实际的准备之中，在巩固党与团的原则之下，友谊的工作。

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不采取党的严格办法，而以为必需采取教育方法。然而，同志们应该了解，如果党的教育方法呈显出不足时，则党对于不通知党而参加在党的机关监督之外，由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们构成的任何派别或组织的同志们，不能不采取最后的组织办法。同志们与这种类似的组织应该公开的作斗争，因为这是为的必要的最高限度的党的统一

而争斗。统一不是派别的，不是家庭式的，不是同乡的，而是党的、阶级的统一。

同志们！在你们面前摆着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而战的伟大的斗争。你们属于在刽子手统治着的白色恐怖的最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此种斗争的民族，但是，你们在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最自由的国家的条件之下受教育，你们无论何时不应该忘记这个区别。你们应该记住，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胜利，正因为在联共的队伍中、在统一和原则坚定的原则之下战胜了一切派别。

你们应当觉悟到，摆在你们面前有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务。

我们号召你们进行这种统一工作，实行最高限度的同志的和党的团结，实行消灭不健全的同志关系，实行取消同志间互不信任的态度。

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党员统一万岁！

手携着手为中国及世界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国际之下的两兄弟党——联共与中共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国际监察委员会
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代表团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全国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

你们的经济地位，虽然一般的较工农兵士为优，但是贫穷的困苦压迫你们，有时竟和他们无异。你们受帝国主义军阀之剥削，豪绅资产阶级之欺凌，应该有革命的需要。你们在几年来中国革命巨潮中，的确也曾跟随无产阶级正确的领导，显示了革命的作用。然而你们不能早些明白：资产阶级之无革命作用，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以及土地革命为完成民主革命所必需的阶段。因此，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国民党四一二屠杀上海工人及去年武汉闹“国共分裂”时，你们竟有大部分受豪绅资产阶级的愚弄，以为自身的痛苦不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大商、买办、豪绅压迫剥削之所致，而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过火”的工农运动所造成。以为自身的出路，还不在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后之民主自由，而在于残酷剥削更痛苦的工农同胞以抵偿自身所受之剥削，因此可以和平苟安。更以为在反共及限制工农运动以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十五期。

后，国民党政治势力之下，民众运动仍可以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亦可在“不过火”的方式之下，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而民众相当的民主自由之获得，苛捐杂税之免除，教育的发展以至一切平民生活的改善，也均可以实现。因为你们的一念之差，竟使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军阀，拿青天白日的旗帜，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使中国革命受了绝大的打击。

一年以来，你们所希望的“国民革命”已埋葬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蒋桂各系军阀争相献媚于帝国主义之前，任帝国主义之屠杀而不敢丝毫反抗，让出山东，以求“中日亲善”；悬英国旗，毁沙基纪念碑，洗净反英标语，以求“中英亲善”；解决宁案交涉，承认美国军舰在南京开炮为不得已之举，兼通缉林祖涵，以求“中美亲善”；以杀戮苏俄领事，对俄绝交，铲除共党为要求一切帝国主义援助之交换条件，而对于民众的反帝运动，则一味压迫制止，北伐后对外宣言，居然“尊重友邦在华之合法利益”，对于不平等条约，特别宣称“以正当手续修改”，以求帝国主义谅解其敷衍民众并不敢实行之苦衷。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封闭民众团体，屠杀工人、农民、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分子，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指派御用的假民众团体，以御用的民众团体为反动派互争的工具。在“反共清党”四字之下，更不知杀了多少的无党的平民青年，甚至使怀疑革命或反对革命的分子也因为他们与当道的豺狼是“异己”而同遭杀戮。集会、结社、说话、走路、通信……等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散一张传单都要砍头，文艺家的刊物略有不平之鸣，也便马上封闭。

至于苛捐杂税，有加无减。一年来江苏一省，搜括一万五千万元，南京政府发国库券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万，江苏、湖北的税收较孙传芳、萧耀南的时代增加一倍。一年来新旧军阀的

混战，无了无休，有唐生智与桂系之战，有李济深与张发奎之战，有蒋冯阎[1]与奉鲁之战。在战争中临时的派饷勒捐，抢掠屠杀奸淫，拉夫封船，一般中小资产阶级所受的流离破产的痛苦，简直难以言喻。北伐后什么经济会议财政会议，无非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勾结以求实现其“增加收入”的目的，其结果也是要将新的负担加到小资产阶级肩上。南京政府在北伐后已经发行煤油库券一千六百万、天津海关库券九百万，北伐军在北方取消了讨赤捐而增加煤油捐、房捐、人口税等更多的捐，打倒了奉军的军用票而代以中央银行纸币和国库券。

对于知识分子及学生群众，则一年以来，战争最多之区如两湖，简直停办一切学校，中小学生及小学教员，大半被赤化之名，非遭杀戮即已逃亡。江浙一带虽学校尚在开办，而教育更腐败官僚化，研究系、国家主义派、江浙学阀都已集合于青天白日旗下，向学生不断地进攻，学费比孙传芳时代还重，学校亦可借防共的名义随时关门。学生会、学联会在旧军阀时代还可由学生群众组织，现在非国民党御用的，即不能存在。学生要求换一教员或小至换一电灯泡，也要被指为共产党而捉将官里去。

在上述一年来与日俱增的战乱、剥削、压迫、恐怖之下，中小资产阶级中大多数已因切身事实的教训而从幸福的幻梦中醒觉过来，因而失望、呻吟、烦闷、摇动、徘徊，想在迷途中找寻出路。于是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之中，有的受了工农革命巨潮的推荡而到处要求加入共产党，有的借文字发泄革命的小说诗歌以寄托思想的不平，更同时有些走到汪精卫、陈公博所摆弄之夹攻派或谭平山等的中华革命党的迷宫之中，企图把已死的国民党还魂过来。

所谓“左打共党，右打西山会议派”的“夹攻派”（包括

夹攻，革命评论，贡献，贯彻，干，前进，青年呼声各种刊物），在理论上，虽以贯彻三民主义、继续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相号召，实则是在国民党失意的政客如汪精卫、陈公博等借以向现在在朝的“忠实同志”讨价的一种骗术。他们反对工农领导革命，反对阶级争斗，完全是站在豪绅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所谓“改组国民党”，无非是说“你们滚开，让我们上台！”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蒋总司令的御用下每月向宋子文领津贴二千元，作施存统、马浚、萧淑宇造党国理论之笔资！换言之，即“夹”在豪绅资产阶级的卵翼下向工农进“攻”！

谭平山等的中华革命党运动，在理论上亦是反对共产党政策，指为超越时代，反对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在客观上是帮助资产阶级，同时因为政争私仇的关系，虽然怎样痛骂现在的国民党，无非是喊出比陈公博较高的估价，结果与夹攻派是一而二，二而一。他们决不能在工农阶级与豪绅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搏斗的巨涛中，找出一条中庸的出路！在阶级争斗的激流中，他们必然要同化于反动！其上层领袖终将在某种形式之下投降国民党，同时其群众（假定他们是有群众）中之先进分子将受工农革命激潮的影响而追随过来。

中国共产党在一年来流血的艰苦争斗中，虽然他的政策是坚决的独立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循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发展，但决不是抛弃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现在是中小资产阶级徘徊于革命反革命阶级血战的激流之中，吟呻而找不出适当的前途之革命的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特竭诚向全国中小资产阶级之一切群众，指示他们之政治的、经济的

出路。

第一，帝国主义对华的积极侵略与国民党卖国政策之相因的发展，成就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数十年所仅见的武装进攻。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南华北各自取得空前优越利益的发展，将使为争夺中国市场之太平洋战祸日益迫近，同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束缚中国整个民族至不能呼吸的惨境。中小资产阶级决不能避免帝国主义进攻之切身的危害，因此，一切中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以至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应一致奋起，与工农群众一致的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反对世界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华进攻！反对卖国媚外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抵制英日仇货，惩办一切奸商！扩大经济绝交的范围！

第二，在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下，一切民众的政治自由皆被剥夺。民众之反帝国主义运动，集会言论自由，或被“党”部把持而成为政府的工具，或被加上“共产党”的红帽子而完全制止。此而不争，将永远沉沦在奴隶政治之下，不能稍有动弹。现在被国民党压迫的民众应一致奋起作“民权自由运动”，打倒反动的国民党！力争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群众自动手的恢复民众运动！反对用任何党部政治部方式来把持或干涉民众运动！

第三，国民党循环不止的军阀混战和穷极征敛的剥削，已将全国工农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命与血汗，牺牲到不能忍受的极度，再若沉默屈服，即是民众的自杀！因此，全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为了切身的利害，应一致起来从事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混战的争斗！拒纳一切捐税！反对国库券及一切无偿币券！

第四，无论是汪精卫派或中华革命党，在主客观上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其一切行动宣传，不是直接反动，即是间接为反动派张目。青年革命分子不应走入他们的迷宫而终于四面碰壁，应立即在自己切身利害上组织起来，向反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向这些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汪精卫派或谭平山派进攻。

第五，中国土地革命必须完成，地租制度必须扫灭，然后三百数十兆农民才能解放，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封建军阀的根基才能够完全铲除。而真正民众的民主政治之发展，则必须一面反对那些什么“军政”、“训政”等的党皇帝的统治制度，一面建设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直接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民主问题必如此向着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渐次解决。现在全国工农革命的高潮为此目的已不断向前激荡。共产党及无数万工农群众的行动已逐渐深入扩大，决非豪绅资产阶级的任何严酷清乡铲共的恐怖工作所能消灭。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民主独裁政权的革命阶段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政治的远景。中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在决定生死的阶级争斗的两大营垒之间，有所中立。你们必须在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之中，有所选择而决定你们的行动！

全国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们！现在是你们对于国民党绝望而找自己的出路的时候，你们在悲痛的事实中得了深切的觉悟，必不愿再走入骗人的错路。中国共产党特依上列之分析敬告你们并提出如左列之口号，愿你们站在本身利害与革命前途的关系上，有切实的选择！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军！

收回山东满洲及一切租界港湾！

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

恢复中俄邦交！

反对秘密外交！

反对压迫民众运动！

反对国民党党部政治部干涉民众运动！

民众自动手恢复民众运动！

反对剥夺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权！

反对新旧苛捐杂税，反对强迫摊派库券、公债、煤油特税、麦粉特税等！

反对新军阀的战争！

推翻卖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

建立工农兵及城市贫民的苏维埃政权！

反对买办、豪绅、大商勾结政府把持全国经济剥削贫苦商人！废除厘金！

反对鸦片公卖，严禁红丹金丸等毒品出售！

启封一切代表民众呼号而被封之团体和刊物！

释放一切争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

减免学生学费，改良学校的课程与设备！

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文化机关！

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一切平等！

拥护土地革命！

拥护保障小商人营业的苏维埃政权！

拥护废除苛捐杂税的苏维埃政权！

拥护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全国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PDG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八月）

江西省委：

×月×日来函收到，得悉毛朱[1]部队已由湘南移据驻赣之宁冈、永新各县并向吉安发展。但因来函内容尚欠详细，中央暂时只能作下列简单的指示。

（一）这次毛朱军队由湘入赣的详细经过虽然不能明了，但必定是被敌军的逼迫而出此是很明显的事实，当此赣西南敌人军事势力空虚的时候所以能够连占要邑，这种发展显然不是群众争斗的结果而是一种单纯的军事上的胜利。

（二）在这种单纯的军事胜利发展情形之下足以引起统治阶级的震恐，加速其崩溃的过程。这或者容易使同志联想到暴动夺取省政权的时机到来，那就是非常错误。目前江西党的任务还是在如何完成赣西南的割据局面，现在应当努力使这一任务能够很圆满的实现。

（三）在这主要任务之下工作的布置应当如下的方针：

1. 朱毛部队首先恢复宁冈、万安、遂川，以主力向赣南发展，占领吉安赣州，更加深入扩大吉安、赣州、泰和、兴国、雩都、南康、信丰、寻乌的暴动，使之联成一气。这几县当朱毛部队未到以前农暴即已发动起来，现在加上朱毛军力，如果更得党的决心和有计划的布置，赣西南的割据局面（在上

次中央对江西工作决议所指示的）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赣南道内重要区域的农民暴动没有胜利形势的发展，则关系反动统治存亡最切的吉安虽被我们占有，亦必难于长久保持，敌必以全力与我们争抗而有被两面敌人（由南昌与赣州）夹击而灭亡之危险。

2. 以游击队帮助安福、莲花、萍乡的农暴，使之与湘东之醴陵等县连络而得更大的发展。

3. 修水、铜鼓、平江区和德安、永修、鄱阳、弋阳以及沿赣江一带，努力发动游击战争，扩大农暴，以声援赣南。

在战略上虽然我们有□千来往枪支的红军，但我们对付敌军主力仍要采用四方八面抄袭的游击作战方法，并且这种作战必须发动广大群众，避免以单纯的军队与敌军主力作决定胜负的战争。这是在暴动未得到较大的优裕地位时所应特别注意的。

（四）我们必须学习湘南与万安受挫的经验与教训。湘南的割据完全由于我们的军队冲锋陷阵所得的结果，并非以群众为主力起来暴动的形式，且在割据区域没有很正确的切实执行土地革命政纲分配土地（因与省委及中央隔离），建立有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尤其是湘南特委烧杀政策运用之错误，完全失掉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同情，所以容易被敌人军队反攻而不能立足。万安失败除没有建立群众政权、切实分配土地外，就是没有建立强大的红军组织，以致不能与敌人军队正式战争而失败。因此在这次赣西南割据局面之下，必须切实按照中央第×及第×号通告之指示，实现分配土地建设苏维埃政权，仅是这样方才能够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同时必须扩大红军组织尤须注意普遍的赤卫队的组织，以实现农民军事教育及训练（采用中央新的军事计划）。在我们割据区域的下层苏维

埃的建立有了相当基础之后即应建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以统一割据区域的政权、军事与财政，这一政府在夺取赣州之后最好设立于赣州城。

（五）省委应即调派一批同志到割据区域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与工作，但是党的发展须求普遍且须注意阶级成分。必须保存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工人、雇农、佃农及手工业者及兵士的党员成分注意培养一批干部去巩固党的下层组织。万安失败后的党部完全崩溃几等于消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只有散漫的发展而没有形成组织形式，缺少农村干部，因之反动一来，上级干部逃散、捕杀，下级党部便随之溃散，这些教训都是值得学习而防其重现的。须知没有强健的党部组织去结合农村中的先进革命分子，则一切割据区域的政权、军事与财政问题均不能得到完善的结果，且有限于受农民意识及行动支配一切的危险倾向！省委除调派一批干部前去工作外须即派一得力同志前去组织党的特委指导割据区域的工作。中央决定派军事工作同志八人（多半是由海陆丰受伤逃来上海之教导团学生及红军中下级军官之湘川豫籍同志，现在伤已告愈），日内即可来赣，省委除选择数人分派重要区域担任军事工作外须即送往朱毛军队中工作。如尚须要军事工作人才望即来信，以便继续派。

（六）全省工作仍应按照最近中央与陆[2]同志规定之计划切实执行，目前尤须注意赣南各县农民斗争大规模的发动，去促成割据局面之完成，切实加紧南浔路一带的工作与反动军队中的士兵运动多方阻碍敌人军队向我们的进攻，广泛宣传西南革命发展的胜利，发动其他各地的斗争以充实将来暴动的政治组织及军事上的准备工作，总之省委要尽自己领导的责任。

（七）你们对于反日帝国主义的提议，中央认为不正确而未能容纳，因为对于日领及侨民烧杀政策的结果只是增加国民

党对于民众的屠杀与压迫，不独不能扩大国民党与日本的冲突，必定是促起他们更一致的对付工农，这种烧杀政策仍然是一种农民意识的盲动表现。关于济案问题，中央已发出两号通告，望按通告所指切实进行，尤其在江西目前局面之下更应使这一运动与反国民党、发动群众争斗等工作连系起来。省委应当特别督促所属党部认真进行这一工作。

在你们接到此信以后，望即做一详细报告寄来，临时的消息与问题须即随时向中央报告至要！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朱德。

〔2〕指陆沉。

PDG

中央通告第一号*

——秋收工作方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去年秋收斗争，正在武汉叛变，南昌暴动初起的时候，反动统治仍在继续动摇崩溃，革命势力，虽然遭受“马变”与武汉“八一罢工”的打击，并未大挫。工农群众因国民党的反动极为愤激，有拼死反抗反动势力的决心。所以当时革命形势仍在继续深入的高潮时期。

现在革命形势：反动势力虽然处在正在继续发展的极大的矛盾与冲突之上，但是尚未到无法维持立刻崩溃的时期，革命的群众——工农与城市贫民虽然对反动统治充分表示不满，已经活跃的开始新的革命斗争（如上海等处的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的复兴），但是继承过去几次大失败，群众组织瓦解崩溃之后，尚在养精蓄锐，尚在继续团结势力的时期。所以今年秋收斗争，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而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时期。

因此党的任务与策略，在去年秋收斗争应该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城市革命斗争汇合作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的政权的全国的总暴动；今年秋收斗争，应该是发动并团聚极广大的群众扫除对国民党改良政策的幻想，更坚决群众推翻地主豪绅阶级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通告按新号排列。

的统治的认识与决心。换句话说，今年秋收工作的总方针是在夺取更广大的群众，准备将来的总暴动，而不是号召秋收的总暴动。

二、自去年秋收暴动以后，农民群众——尤其是南方各省，经过长期与极普遍的斗争，有些地方已发展到极高的形势——没收并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阶级的冲突已经到了极限，土地革命的口号，农民已有深刻的认识与要求，虽然最近各地都受了地主豪绅反攻的打击，但是农民群众决不愿意再受过去半奴隶的待遇而必然起来反抗，决不愿意很驯服的再将自己一年汗血的生产大部分送给地主。尤其是这一年来的白色恐怖与军阀战争，农民最后一粒的生活资料都已被掠夺尽，广大农民群众经济生活的破产与痛苦，比之去年，还要更加厉害。假如今日的生产大部分再被地主掠夺去，必致无法生活。同时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去年以来，受了莫大的损失，必要在今年加倍的取偿于农民，以为报复。除逼缴今年租谷外，如索欠租欠债、勒缴赔款等，都是必然发生的压榨农民的事实，因此更要激起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今年秋收，在客观上决不会平安过去，必然掀起广大的农民斗争。所以党必须以正确的策略有计划的有准备的去领导这种斗争。如果对秋收工作消极，或甚至反对秋收工作，那么在客观上便是放弃农民的领导，放弃革命的领导，这是应当极力纠正的错误的倾向。

三、现在反动的统治阶级——国民党政府，也已经看见农民革命斗争的复兴的不可免，遂想用一种改良的政策——如浙江省政府颁布的“佃租交割条例”（?）湖南“东四佃六”的交租的规定等——来和缓这种革命运动，延长并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这正是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反革命的作用。这种改良政策在客观上亦固然很难实现，因为中国在土地分配

上，中小地主占优势，处在军阀苛捐杂税和货币关系日益发展的条件之下，不更厉害的剥削农民，已无法延长他且将崩溃的途程。所以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遇到这种经济上的限制，很少实现的可能。但是在宣传的作用上仍有欺骗群众的可能。所以党必须提出比较更高的口号，积极领导群众的斗争，然后才能揭破这种“改良政策”的反动性质，肃清其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引导群众向革命的路上走。所以在秋收斗争中的总的口号应该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与“推翻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至于发动群众的口号，在已经过激烈斗争，农民对土地革命已有明确的认识的地方（如湘鄂赣粤等省），应该以“抗租”为号召群众的最适当的口号；在过去农民斗争很少发展的地方亦可以“减租”来发动群众。当然还应该按照当地农民更迫切的要求，提出更实际更能激起群众的口号（如在斗争时反对勒索陈租，反对勒索赔款，反对按亩抽捐等），但是总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必须随时作广大的宣传，使群众深切认识，只有完全没收地主土地，才能彻底免除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只有推翻地主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才能实现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渐次在这两个总的口号之下团结起来。过去党在农村中特别是南方几省曾作过许多英勇的斗争，但在斗争中表现一很大的缺点，就是缺乏宣传工作，甚至不做宣传工作。这样的结果便是使群众不了解我党的策略和口号，不能更广大的发动群众，不能使群众有更大的决战的决心。今后党在乡村中，在发动斗争之前和后，应用种种方法，做广大宣传鼓动工作。

军阀豪绅必然勾结一致的压迫摧残秋收斗争，党的策略，便更有在斗争中努力扩大经济利益不同的农民间的统一战线之

必要。因此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形，于上列秋收直接口号之处，提出反对各种苛捐杂税的口号，以吸取中农和未反动的富农于共同战线之内。

四、农民斗争，在过去的经验上已明白教训我们，每个斗争起来以后，很快的就要发展到武装冲突。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和平斗争的幻想，所以在斗争初起的时候就必须计划到武装冲突，计划到解除敌人的武装。这种计划，决不可以幻想专以“我们的武装来战胜敌人的武装”——因为如此必会偏向于武装的准备而轻视群众的工作，甚至因为武装困难，而不敢发动斗争——而要以英勇的广大的群众的斗争力量与坚强的组织，来克服敌人的武装，来分化敌人的武装，使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如民团、挨户团和军队等，分裂崩溃，甚至投降到农民方面来。只要有可能时，便应当坚决的领导这种斗争一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苏维埃的创立。因为这样才可以发动并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更坚强群众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上面指出的此次秋收斗争，不应该以总暴动为目的，这是指夺取全国全省的政权而言。这并不是说不应该领导武装斗争，而幻想和平的运动。

当然在广大群众没有起来的地方，只凭少数人的杀烧政策或群众尚未认识和要求武装斗争，而命令或强迫群众这样去干，便是很明显的盲动主义。这是应当积极反对的。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农民运动中有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各省委应该竭力与这种倾向奋斗。游击战争在苏维埃区域的胜利之前，必成为农村斗争中武装冲突的主要方式。过去游击战争的缺点是脱离群众、毁灭城市和无目的烧杀主义等反映游民无产阶级的倾向，但如果否认游击战争的作用，那便是因噎废食。因此在秋收斗争的准备，各级党部要根据六次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详

细研究并计划游击战争的方式……等等以指示同志执行。游击队的组织可用赤卫队的名义。

五、在此次秋收斗争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夺取群众组织群众。所以除极力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影响以外，同时必须加紧群众的组织，在过去农民协会有信仰的地方，必须在此次斗争中普遍的恢复并强固起来。在斗争发动前，便应该开始组织，斗争愈发展，组织亦应当随之发展。一切斗争的领导都应当集中在农协组织之下，坚决的反对以党来直接指挥农民，这样便会使党的组织代替了农协的组织，而使党的组织完全松懈。在农协的名义不适用的地方，可组其他各种名义的团体（如抗租同盟、减租会……等），其运用的策略，应该与农协完全相同。

六、在这种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大部分的富农（因为中国富农多半带有半地主性）必然要站在反对的方面，我们当然毫不顾虑的以对付地主的策略一样的去对付他。不过一小部分佃农或自耕农中的富农，仍可以同情于这种运动或表示中立。那么我们应该极力吸引他来参加这种斗争，以加强这种斗争的力量。但是应该切实注意的便是在吸引富农参加斗争的时候，决不可使贫农与雇农的利益，对富农有所让步，尤其要防止富农侵入农协的领导。

七、在此次斗争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此次斗争的机会，同时促进工人运动的工作。在客观上固然不能绝对否认农民斗争可以影响到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策略上尤其应当加紧工人的斗争，援助农民斗争以巩固工人阶级对农民思想上的领导。所以各省委在计划和布置此次工作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工人中的工作，坚决反对在此次斗争中不重视工人或甚至停止工运、集中一切人才于乡村的偏向。这样必然使党的

基本工作——工人运动变成莫大的损失，同时必然使农民斗争因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援助而完全失败。

八、必须同时注意到雇农的利益，提出增加雇农工资、减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口号，使雇农积极参加这次斗争，而加强他在农协中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

九、各苏维埃区域（即从前所称为割据局面）必须充分注意邻近各区的斗争，给他们以思想上的领导，以实力帮助他们来吸引农民群众，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扩大苏维埃区域。各省计划全省工作，必须计划邻近苏维埃区域各县的斗争，如何与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但是这决不可误认做专以苏维埃的区域的武装力量来发动各县的斗争，而是说群众工作的联系。在斗争中有广大群众的发动，游击战争获得较大的胜利，便应该推翻当地豪绅统治建立乡村苏维埃区域。如果在斗争中真正发动了极广大的农民群众，群众中有建立真正自己政权的要求，乡村胜利有较大的区域，士兵工作有相当的基础，城市工人运动足够领导和联络农村革命势力而当地反动势力又在动摇崩溃的时候，那么群众的游击战争，已不限于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有转变到县市地方暴动的形势。党在此时候，便须运用适当的策略和准备地方暴动。但是一省之内中心县市的夺取，客观条件上必须是一省反动势力正在激烈崩溃当中而革命局势发展到了全省总暴动的时候，否则不可贸然尝试。

十、在已经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地方，加紧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并注意正式红军的创立或扩大。必须尽可能的宣传农民加入赤卫队和红军的组织，同时要使群众对赤卫队红军有深切的明确的认识。

十一、各省对此次工作必须有一个整个的计划，尤其要注意与各种工作的联系。尤其是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必须在工

人与兵士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引起他们对农民斗争的同情与援助，使城市与乡村的斗争联系起来，然后可以减少农民孤立的危险而得到更多的成功。

十二、在秋收斗争中恢复、改造、发展乡村中党的组织，是主要任务之一。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基础为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如果吸收农民中一切革命群众加入党的组织，必使党代替了农民群众的组织。党的领导的健全在党员质量改进和干部分子的训练培养而不在数量的扩大，过去以党代替农民协会、代替苏维埃以容纳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倾向，亟应极力纠正。

十三、各省委接到此通告，必须有一详细的讨论，针对当地客观的情形，拟出具体的切实的计划。特别要注重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同时促进工人运动的计划。决不可不顾实际的条件，专一空想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等，因为苏维埃区域不过是斗争的一个前途。现在的任务是在计划如何发展斗争。各省工作计划确定以后必须将内容详细的报告中央，以便分别详细指导。

附 秋收斗争的总口号：

1. 不交租，不还债，不纳一切捐税！
2.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
3. 工人作工八小时，增加工资，青年儿童妇女工资平等！
4. 改善士兵生活，发给士兵土地和工作！
5. 驱逐帝国主义！
6. 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政府！
7. 打倒国民党！
8. 杀豪绅地主肃清一切封建势力！
9. 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10. 工人农民勇敢的起来组织赤卫队和红军！

11. 青年农民加入少年先锋队！

12. 军阀底下的士兵暴动杀死长官跑到农民中来大家没收土地！

13. 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士兵团结起来创造自己的天下！

14. 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二号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

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业已闭幕了，此次大会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极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革命史上有极大的意义。此次大会的环境与时期：在国际形势方面正值第二时期（资本部分稳定时期）转到第三时期——即国际革命形势开始转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国内形势，正值广暴失败之后，旧的革命高潮业已过去，而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时期。大会是当着这样革命转变的关头召集的，所要求于大会解决的任务是何等的伟大而严重呵！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帮助之下，我们大会很顺利的成就了这严重的任务。大会最主要的成功在获得正确的政治的策略的路线及组织的路线，理论上解决了一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估正了过去一切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并给予今后实际的工作方针与方法，现在简括报告如下：

革命性质与前途——这是最主要的根本问题。大会正确的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因为革命当前的主要任务如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消灭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权等，都是开辟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道路，都没有超出资产阶

级革命的范围。但是这一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彻底完成，必须要在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条件之下，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他的历史的任务，完全变成了反革命的动力。大会明白指出中国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已经在此一革命阶段中建立起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同时又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期，必然可以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是已经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苏俄的帮助，更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

根本任务与政纲——因此大会指出现在的根本任务：第一，消灭地主阶级，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第二，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第三，武装暴动推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大会确定本党目前政纲如下：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

八、改善士兵生活——给土地与工作；

九、取消一切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目前情势的估量——要确定目前策略的路线，首先要求对于目前形势之正确的估量。大会充分的分析了这一问题，明显的指出：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

败；现时没有革命高潮，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现时比中国革命力量大，他们间虽有剧烈矛盾，但对于压迫革命是一致的；然反动统治根本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因为凡是引起革命的一切矛盾，没有一个能解决，反动政权根本不能真正集中和统一，长期的经济恐慌很难找到出路；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而不可免要到来，并且已有象征：如罢工斗争之复兴，反帝运动之生长，和各地农民继续不断的斗争，许多小的苏维埃区域的存在等，并且国际革命的新形势也要帮助中国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但对于这些象征，不可过分估量。

目前中心任务和策略——大会指出目前中心任务正是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应变为宣传的口号，夺取千百万群众，以准备新的高潮之到来——即是准备将来武装暴动之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这样策略的转变是与革命形势的转变相适应的。绝不是取消暴动策略，乃是更进一步的准备最后胜利的条件。将来新的高潮到来时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便要成为当前实际的任务。大会认定：现时新的革命高潮还没到来，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所以确定党目前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同时指明自发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必须领导，已存的苏维埃区域必须巩固与扩大，并在这些区域中扩大红军的组织。

土地与农民策略——大会改正“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大会认为平分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幻想。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所拥护时，党在行动上可以帮助农民实现这一口号，但在思想上仍应批评平分主义的幻想。必须坚决的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才有真正平等的可能。大会确定了土地政纲，规定了“土地国

有”为目前宣传的口号。大会确定农民策略的总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不要故意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但决不应抛弃对于富农的半地主性的阶级斗争，注意乡村无产阶级成分之阶级意识的提高和独立组织之形成（雇农工会或在农协中成立雇农部），尤其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

职工运动——大会指明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大会严厉指出过去强迫罢工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大会以为应详细的对于本阶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C. P. 的策略和任务，使工人群众最终的脱离对于国民党的幻想。大会指出制胜虚伪的改良主义的正确策略（绝不是所谓“统一战线”），同时更详明的指出工厂委员会在目前环境中之巨大作用。大会指出在组织上必须极力发展革命工会的组织，纠正过去党与工会混合的状态，在工会中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反对委派制度，同时指出在有群众的反革命工会或黄色工会中都必须加入进去来夺取群众。大会主张十分的加紧领导日常的部分的经济斗争。大会根据武汉时代的经验，规定了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正确策略——即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店东冲突的时候，C. P. 应坚决的站在劳动者方面反对剥削阶级。

反帝反军阀的工作——大会认为应积极的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引起极广泛的工农群众来参加，同时也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在此运动中，无所畏惧的争取群众运动之自由，争取革命工会的公开存在，反抗白色恐怖与一切压迫，提出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等等。

组织路线及精神——大会严格的指出过去组织方面之一切毛病，如机会主义、命令主义、农民意识、极端民主化等等。

大会认为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失而战斗力减低，故现在主要任务在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大会认为党的基础有由工人阶级移到农民的危险，必须坚决努力复建党的基础于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大工业和交通工人之上。大会认为必须坚决铲除由机会主义命令主义所造成的党与本阶级群众之对立的现象，才能改正党与本阶级的关系——即党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之上命令工人或帮助工人的一种特殊势力，党只是工人阶级自己之中最觉悟最先进的一部分。大会坚决反对对于本阶级群众用命令和强迫的办法，应以“说服”去替代这些办法。大会认为必须继续完成党的改造工作，建立与健全工厂支部的基础，大会主张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严厉的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大会严厉的号召肃清党内一切地方主义、小团体倾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个人意气的纠纷和国民党式的残余，大会认这些恶劣的残余，是损害党的统一和减低党的战斗力的敌人。大会认为加紧党内的教育和加紧武装暴动的宣传十分必要。大会认“自己批评”为强固党的武器，同时反对滥用批评，以致削弱党的威信和纪律。大会维持铁的纪律，同时取消不正确的“惩办制度”。

过去经验与教训——第一个问题：机会主义是什么？大会明白答复：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抛弃独立的政治面目和批评，不了解在革命转变时期党的策略与口号的转变，以致使中国革命受着严重的失败。大会又指出革命失败之客观原因：（一）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三）地主阶级领导的军事力量很大；（四）工农革命势力发展不平衡；（五）小资产阶级动摇以至叛逆。大会认为客观上虽然有这些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失败，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实是当时本党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政策。大

会承认国际一切政策和指导之正确，八七和十一月会议反机会主义开始布尔什维克之伟大意义，采用暴动策略之根本正确。大会认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阶段有伟大的世界的历史意义，但他的失败使他成为退兵时的一战。广暴后党没有及时转变策略，反盲动主义未能充分，这由当时对暴动观念的模糊，过分估量革命力量及敌人的崩溃，误用不间断革命的名词等。盲动主义是什么！大会认为是不顾群众轻视敌人的玩弄暴动，他反映农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情绪，而理论上的根据则为对于革命的形势及势力关系估量之不正确。大会坚决的主张肃清盲动主义。大会指明南昌、秋收及广暴都不是盲动，尤其是广暴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纵然准备工作和发动群众还不充分。

倾向之预防——大会不仅纠正了极左的倾向，同时又给可能的右倾的危险以预防和警告。大会主要口号之一是肃清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并认反盲动主义即为反机会主义之继续。大会明白指出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及命令主义。大会指出联合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但同时要知道领导劳动者反对剥削阶级。大会明白指出如果对于这些策略误解，便可发生复活机会主义的危险。大会一面指出农民的不正确的意识（如平产主义、烧杀主义、忽视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等），另面又指出忽视农民革命作用之危险。此外又指出忽视反帝运动之错误。

同志们！以上便是六次大会的总结与精神！大会伟大的成功是我们制胜敌人的起点，大会伟大的成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和达到最后胜利之动力，一切敌人将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完满结果之前发抖！中央受大会之委托，号召全体同志一致的热烈的起来认识、接受、拥护和执行大会一切决议与精神，使大会的成功变为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热诚的向全体同

志高呼下列口号：

一、一致拥护和执行六次大会一切决议与精神！

二、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最后胜利的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三、六次大会的成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和达到最后胜利的动力！

四、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防止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五、完成党的改造工作，建立党的巩固基础于工厂支部之上！

六、加强与提高党的战斗力！

七、铲除党内一切个人意气斗争、国民党残余、小资产阶级倾向！

八、党的巩固和一致万岁！

同志们！

大会各种决议即将发下，各级党部接到以后，务必召集会议加以讨论，并做成决议汇送中央。凡有疑问之处，迅速报告中央要求解释，务使大会的总结和精神深入每个同志的脑中加以深刻的了解和消化，并将此种精神散布于广大的群众中起强大的核心和领导作用，迅速完成大会给与我们的中心任务！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中央通告第三号

——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一）广州暴动使反动势力受着莫大的威吓而团结一致的向革命势力进攻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为创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广州暴动，震惊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威吓了国内一切反动势力团结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企图完全扑灭革命。英国帝国主义与广东的勾结，日本在北方的积极政策，固然是在互相谅解的条件之下进行，即根本政策完全冲突的美国亦有一种默契。同时国民党的四全中会议，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的投降，代表封建阶级的桂系的妥协，而重行拥戴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登台，可见当时反动势力的各派都为要镇压革命起见，暂时放弃内部根本不能调和的矛盾而谋得相当的妥协。遂使当时组织尚未强大、队伍尚未整齐的革命势力遇了这样敌人进攻，而遭受莫大的失败，尤其是城市因为残酷的白色恐怖而有暂时崩溃的现象。

（二）济南事变后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又开始爆发

最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遂利用此机会而采取更急进的政

策，来实现他们独占北方的企图。因此积极出兵山东故意造成济南事变，以为他的侵略政策的借口。这种积极政策当然与在中国无甚势力范围的基础的美国利益根本冲突，同时对于英国在长江的利益也有莫大的威吓，于是三大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因利害的冲突又开始分道扬镳互相暗斗了。恰好不久，所谓北伐军打到北京与南方“共匪”亦被他们残酷的白色恐怖暂时压迫下去了。豪绅资产阶级所认为共同的敌人已经消失，当然他们内部不能妥协矛盾又爆发出来互相攻击，于是各个帝国主义各自找到他的工具，各派军阀也各自找到他的主人，开始他们新的火并的准备，所以“济南事变”与“打到北京”是反革命势力高涨的极峰，同时就是他们火并与崩溃的开始。

（三）济南事变激动革命运动的复兴

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政策，当然使中国群众无可忍受。因此，消沉很久的反帝运动，又开始复兴起来。当时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采取可耻的投降政策，更激起群众的愤怒，不单是工人阶级，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亦开始对反动的统治不满。因此，短期休息了的工人群众，又重行跑到街上来示威了（如上海五卅与六三），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恢复了他们“和平救国”的排货运动，同时工人的经济斗争重复活跃起来，上海从五卅纪念起到现在，已经爆发不止百次的经济斗争。学生群众因对现状不满，亦复活了他们的活动，批评或反抗现在统治的出版物不断的发行。农民斗争始终继续不断的起来，兵士群众的革命化，所以济南事变以后，革命运动又表现开始复兴起来。

（四）豪绅资产阶级的各派对革命运动复兴的不同的政策

革命运动复兴，当然豪绅资产阶级任何一派，都认为是根本的危险，而企图消灭他，不过因为他们相互的利害的冲突和根据于他们阶级的观点不同，而对于消灭革命的政策，也就互异。地主豪绅阶级，主张以更反动的政策完全扑灭。

一、地主阶级主张更反动的政策，所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坚决反对恢复民众运动，蔡元培并主张停止青年运动，反对统一主张分治合作（如政分会问题）。至于提出国民会议，不过是嫌国民党中央还不能纯粹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借国民会议更造成十足的地主阶级政权。

二、资产阶级主张改良政策其实同样的为要消灭革命。而资产阶级，则认得清楚，知道这一更反动的政策不单是不能消灭革命，并且要逼起更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造成革命势力更广大的基础，促起革命更大更快的爆发，并且这一革命必然要直接走到危害他的存在的，所以主张以改良主义的面目来欺骗群众，恢复国民党在群众中已失的信任，缓和革命运动，分裂革命势力。要实现这些目的，必须有比较统一和集中的政权。所以打到北京后，马上召集裁兵、裁厘、财政三大会议。同时对外进行修约运动，在五中全会中更主张恢复民众运动，取消政治分会等，在群众中更故意宣传反帝国主义，实行排货运动，反对封建势力等口号（革命评论派与第三党便是实行他的政策的最好工具）。这一政策，当然与地主豪绅阶级的政策相冲突，然而根本上同样的为要消灭革命。其实他的反帝运动，就是要防止彻底的群众的反帝运动，延长帝国主义的统

治。反对封建势力，就是防止彻底的破坏封建势力，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作用，但是他们这种奸滑的无耻的革命政策，的确使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受了他们的欺骗，又对国民党发生一些新的幻想。

三、改良政策只是有反革命的作用，并且对于革命进展的危险还更利害，甚至影响到我们党内也以为“资产阶级又重行左倾起来”，“重行起革命的作用”，所以这种奸滑的欺骗的改良政策，对于革命进展的危险，比之明显的残暴的反动政策，还要利害千万倍。

（五）豪绅资产阶级各派既互相冲突遂各自勾结一个帝国主义

豪绅资产阶级的各派既相冲突，当然马上要找到一个帝国主义做他的靠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而他侵略的方式更复杂而狡猾，所以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他有利而无害，尤其是为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所以首先与南京政府订约，取得最惠国的待遇。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首要的就是要保护他已得的特权，就是些少改良的修约运动，所以帮助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桂系来打击资产阶级，同时于他在长江的利益有危险的日本，在北方的积极政策，他必须防止，因此桂系一方面在南方排斥蒋介石，另一方面在北方又进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张宗昌。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是继续他的独占北方的政策，又利用北方的残余军阀，作种种的挑衅来做他的侵略的借口。反动势力内部这样复杂的矛盾关系，自然造成纵横阖合明争暗斗的局势。

（六）现在的局势，很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到来

现在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派，因各方面的准备尚未充分，不能不暂时屈服于桂系，因此南京政府必然显露他的更反动凶恶的面目，更增加对群众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必然激起群众的不满而更革命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必然在群众中更提高他们的虚伪宣传，以扩大他在群众中的影响，防止群众的革命化，同时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势力的内部的冲突必然更加激烈，反动的政权，更趋于动摇崩溃的道路。所以现在的局势很明显的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到来。

（七）党的目前主要的任务在争取广大的群众促进革命的高潮更快的到来

就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的分析，新的革命高潮，固然不可避免的到来，但是要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保证在新的高潮中革命彻底胜利，这就要靠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广大群众斗争的力量来定的。以现在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还不能够发动一个革命的高潮。所以争取广大群众——坚决群众革命的意识，动员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的高潮更快的到来，以保证将来革命高潮中革命彻底的胜利，成为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八）实现目前任务的战术，是要肃清群众对国民党幻想残余、肃清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影响而使阶级对抗的形势更加尖锐

为要实现目前的任务，党必须有针对现在客观形势明显的战术的规划。第一要发动群众坚决的革命的意识，必须肃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的残余，使阶级对立的形势，更明显更激烈，同时给群众以将来政治上的出路。所以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为目前主要的宣传口号。第二现在妨害革命势力的团结，阻碍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口号的影响，所以党必须坚决的指出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欺骗与反动性，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揭破他们的假面具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才能使阶级对抗的影响更加尖锐。

（九）目前战术上主要的宣传的口号是，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

如果这一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肃清，必然会使部分群众从革命的战线当中分裂出来、动摇起来，甚至影响广大群众。这是革命发展中的最大的危险，所以现在党内对资产阶级错误的认识与估量（如认资产阶级左倾或估量资产阶级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必须纠正过来，因为这一错误的认识与估量，可以

走向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某派联合的结论，而发生战术上莫大危机，更要影响到不正确的策略的决定。因此完成这一阶级的战术的目前的战略应该如下：

（一）对于复兴民众运动问题：应当反对革命评论派的“要求复兴民众运动”的口号，而提出“反对国民党禁止民众运动”和争取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的口号。因为“要求恢复”，便是引导群众离开革命的斗争，而重新恢复对国民党的幻想。所以我们党必须坚决指出国民党只会禁止压迫或干涉革命的群众运动。革命评论派主张恢复群众运动，不过是要防止群众运动的革命化，所以群众应该自己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禁止群众运动。同时加紧领导群众的部分的经济斗争（工人的加资减时的斗争，农民的减租抗税斗争，城市贫民的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斗争的力量来争取一切的自由。同时在每一个斗争中，都必须宣传党的总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使发动斗争的口号与总的口号联系起来，使群众的斗争愈发展，而愈在党的总的口号之下团结起来。

（二）对于工人运动：必须在群众中坚决的煽动，反对官僚包办工会，反对国民党委派工会职员的办法，提出“工会应该由工人自己来组织”的口号。同时利用种种部分的经济的群众迫切要求的问题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同时必须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坚决反对在工人运动中开始抬头的改良主义（如上海七大工会），反对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强迫仲裁以及分配红利等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和宣传，使工人渐次明白国民党任何一派以及改良主义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坚决的走到我们的革命的口号影响之下来。我们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以引起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工会的幻

想，应普遍的发展工厂委员会（另有通告说明其作用），把在国民党及改良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群众完全夺取到我们方面来。

（三）对于农民运动：必须在群众中，指出所谓“佃租交纳条例”、“东四佃六交租”等的办法，实际上是延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必须坚决的宣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代表会议的政权等的口号，必须引导群众的斗争一直趋向这总的口号之下（详细的战略详——秋收工作方针——通告）。

（四）对反帝国主义运动：必须指出国民党的修约办法，实际上是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宁案解决与放弃济案的交涉，完全是无耻的卖国政策。必须坚决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没收帝国主义的工厂银行”等口号，在群众中宣传，并且要不断的宣传“只有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才能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同时要使群众由和平的排货运动走向反抗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的群众示威运动等。

（五）对战争问题：必须明白指出，将来的蒋桂的战争，不过是争反革命领导的战争，必须揭破资产阶级想利用群众的阴谋，必须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的口号。必须使群众从现在起就渐次团结在二个口号之下，然后到了军阀战争爆发的时候，才能使这二个口号变为群众的直接行动的口号。

（六）对裁厘问题：必须主张即刻废除厘金，同时反对一切变相的厘金捐税，必须号召群众实行来抵制一切捐税，坚决的反对一切变相的厘金。

（七）对裁兵问题：必须提出现在军阀的裁兵，不过是各自整理自己的实力。必须提出“彻底废除军阀制度，实行民众

武装”的口号，同时要在兵士斗争中宣传“要求发清欠饷”、“要解散费”、“要土地”等引起兵士群众的斗争，同时要宣传“只有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兵士群众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八）对国民会议问题：必须提出这一国民会议，完全是军阀的“分赃会议”，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时候，决不会有真正民众的会议，真正的民众政权。要争得真正民众的政权，只有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的统治以后，真正的民众的政权，只有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这些问题的战略，都是实现目前战斗的目的的具体战斗方法。必须按照这些战略的方针去调动群众，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斗争，然后才能肃清一切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的影响，提高群众的阶级的意识，团结在我们党的口号的周围，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实现将来领导群众，力争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

（十）几个战略上的错误的偏向

现在战略上有严重的错误的偏向，都可以妨害党的总的战术的任务，必须充分注意的：

第一、认为现在部分群众的政治意识非常落后，现在党的战略上的口号太高，群众暂时不能接受，所以党应该把政治的口号降低（如主张党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或主张“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对国民会议不根本反对，只反“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而要求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又如对反国民党的动摇等），所以党的政治口号应该看群众接受的程度来决定这一偏向，实在含有莫大的危险，很可恢复到

过去的机会主义。

党的战略上的职任，是要提高群众的阶级的意识，使他渐次与自己有同样的程度。党决不能把自己的程度降低，去迁就群众的意识，党是先锋队，党是自己阶级中最觉悟的一部分，假如党的正确的战略的口号，暂时不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这仅是党的政治宣传和斗争还未深入的暂时现象。党固然要极力去接近群众，但是要取得群众，而不是跟着群众跑，如果跟着群众跑，结果是帮助敌人，断送群众给敌人。所以接近群众的方法，是在多注意群众实际的迫切的要求，而领导他们的斗争，向革命的路上走。部分的要求应隶属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决不能降低政治的口号去俯就部分的要求。党应坚持自己政治的策略的方针，利用种种的机会去说服群众，使群众的意识渐次提高起来，渐次团结到党的口号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

第二、认为现在客观的形势，马上可以发动反帝运动的高潮，所以党应该马上号召群众起来激烈行动，推动这一高潮更快的到来，党的一切的任务，便可以在这一高潮当中实现，或者主张要用反帝运动来拥护阶级斗争的复兴，这一偏向也是很危险的。

反帝运动要成为广大的潮流，必须是要有广大群众的组织力量。如果群众的革命意识尚未坚决，决不能造成一个革命高潮，所以我们只能说反帝运动可以帮助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时必须有阶级斗争广大的发动，才能促进反帝运动的高涨。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是各种斗争的总的汇合（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城市小资产阶级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帝斗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兵士反军官斗争……等），所以我们目前战略上的任务，是要同时促进各种斗争的发展，尤其要

注意各种斗争相互的联系、相互的促进而汇合成为一个总的高潮。所以目前的反帝运动必须与工人经济斗争、乡村的秋收斗争、兵士斗争、城市的反苛捐杂税斗争极力的联系起来，使成为一个总的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决不能偏于反帝运动单方面发展，因为不单是客观不能，并且是一种冒险投机的倾向，结果将要使这一新的革命高潮流产。

第三、等待军阀战争，或者以军阀战争来做兴奋同志工作的吗啡针的错误。每一次军阀的大混战，都必然是反动统治动摇到极点的时候，已经不是发动工作的时期，而是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军阀统治的时期，尤其是将来的蒋桂两系的战争，以他们现在准备的形势，必将要形成长期混战的局面。蒋桂二系异常的奸滑，准备不充分决不轻于发动，所以党的任务要从现在加紧群众的工作领导各种的斗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在军阀战争爆发时来实现领导群众推翻统治的任务。如果怀一种等待的观念，或者军阀战争为发动工作时期的观念，那么我们将要丧失革命爆发时期，而成为一种等待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假如平时不发动各种斗争，群众势力没有充分的强大的基础，军阀战争到临，也要陷于盲动主义的错误。

第四、忽视日常斗争的偏向必须肃清，目前党的总路线不立即布置一省或几省总暴动的局面，而是夺取积聚广大群众，准备将来胜利的暴动之基本条件。必须坚决的恢复城市工作，必须坚决的发动与扩大日常争斗，才能完成这一总任务。

第五、和平发展的偏向亦须预防，因为现在不是总暴动的时期，因为现在是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由此便可发生和平发展的倾向，甚至取消主义的偏向，以为农民的游击战争也不要了，农民自发的暴动也不必去领导了，农军或红军也要解散了，一切都要走上“和平”、“合法”的道路。这种偏向不但

与党的目前总任务不两立，而且与党的生命不两立。

最后占决定意义的问题，便是党的组织问题。在革命严重的失败后，党的组织受了莫大的损失和削弱。现在必须坚决的恢复曾破坏之各大城市的组织，反对将各级指导机关避开城市而移于乡村。只有城市工作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才能迅速恢复与提高党的战斗力。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

自反革命的国民党所谓北伐成功之后，你们的生活不是愈加痛苦，你们的被剥削不是愈加厉害，你们的失望不是愈加证实了吗？

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明白的指出来了：所有国民党的新军阀都是同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一样的吸血鬼，一样的卖国贼，一样的白色恐怖的刽子手。你们试把自己的经验回忆一下，中国共产党哪一句话不是对的？

现在试来统观所谓北伐成功后的现象：工农生活不仅丝毫没有改善，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工会到处只是帮助地主资本家向工农进攻，尤其是上海工整会公开受贿压迫工人；北方工农不仅未获得丝毫好处，国民党军阀到了以后，反而增加了严重的捐税和压迫，武力解散北京工会，逮捕京津一切革命的工人领袖；南京政府恢复绞刑，表示压迫民众运动的决心；苛捐杂税不仅未减轻，京津下后，新发国库券一万二千万元，借裁军为名，还要发至五千万的所谓裁军券；兵士欠饷依然无发，退伍费更是没有；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政治自由，完全被国民党蹂躏剥夺；学校停闭，教育破产（尤其是北京）；白色恐怖，有加无已；济案搁延至今，借所谓“修约”

来转移民众视线，实际进行其卖国的秘密外交；放弃济南惨案不问，与中美中英的宁案的条约，很明显的可耻的投降。冯阎蒋[1]桂积极准备新的大规模的军阀战争；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在所谓五中全会中所演之种种明争暗斗的喜剧，更足证明所谓“和平”、“统一”根本是骗人的鬼话！

所有以上种种情形，足够证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现在与将来：更要加紧民众生活的痛苦与剥削，帝国主义瓜分和新军阀战争的灾祸。一切痛苦、剥削和灾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只有一天天的更加紧更严重起来！

工人、农民、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新工具，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决不能够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国民党是自私自利抢夺地盘的新军阀的大本营，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决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国民党是屠杀民众、压迫民众的专制魔王，不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决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与生命的保障。工人不推翻资本家走狗的国民党，决不能够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与工资增加和待遇的改善；农民不起来推翻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国民党，决不能得到土地；兵士不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新军阀，决不能够消灭军官的压迫与生活的改善；城市的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亦不起来推翻国民党，决不能够扫除苛捐杂税的剥削与痛苦。中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的群众，只有一致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解放。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出路。

中国共产党目前争斗的政纲，就是要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与工厂，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就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消灭新军阀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反对资本家

的残酷的剥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的规定与劳动保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反对压迫兵士群众，造成军阀的征兵制，实行群众的武装组织，分配土地给兵士。现在代表豪绅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新工具国民党的统治，是达到这些目的最主要的障碍。所以要实现这些目的，必须首先以广大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代表豪绅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新工具的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代表会议的真正民众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绝对自信这些政纲，是目前劳苦群众的迫切的要求，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国民党等反革命派如何造谣，说是“杀人放火”、“掳掠残暴”等等。这事实的诬蔑，与古今所无的残暴的白色恐怖的摧残，终不能掩盖他目前革命的政纲与要求在广大群众之中大放光明，终必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团结在这些革命的口号的周围，一致往前奋斗，而达到彻底的完成。

全国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劳苦的群众们，现在反动统治的内部已开始他的抢夺地盘与抢夺政权的斗争。蒋桂两系都在加紧准备他们战争。财政已到绝境，建设徒托空言，很明显表现反动的统治已走上动摇崩溃的道路。另一方面反动统治这样压迫，帝国主义这样进攻，民众生活这样痛苦，必然要使新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现在工人群众的罢工争斗，日见复兴；农民暴动和争斗仍在普遍的向前发展；反帝运动继续生长；广大的兵士群众动摇不满；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愤恨反动卖国和加紧剥削的国民党统治而渐形左倾。凡此种种现象都是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象征。

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只有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实行胜利的武装大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苏维埃中国共和国，才能走上真正解放的

道路。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准备取得彻底胜利的力量，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因此每个革命觉悟者，每个群众的先锋，都应该马上加入群众中去，宣传这些革命的口号，领导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去团聚群众组织群众，使成千成万的广大的群众都一致团结在这些革命口号的周围，一致奋斗而达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迅速起来加紧日常的经济斗争，加紧秋收争斗，加紧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加紧拒绝一切捐税，无所畏惧的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罢工、索薪、索饷、抗租、抗税、抗债之一切公开与自由，在一切斗争中加紧自己的组织，努力促进与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迅速到来，实行彻底胜利的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农群众最后打消对于反动统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之一切幻想，充分相信只有本身和本阶级的力量与争斗，才能解放自己；只有咬紧牙齿团结自己的队伍，发动与扩大自己利益的争斗，才能改善生活地位和抵御反动统治与资本之进攻。

国民党、黄色工会、御用工会改良主义者所散布的一切欺骗工人的迷药，如“阶级和平”、“劳资合作”、“劳资仲裁”等鬼话，你们绝对不要相信呵！

那些表面上装做站在工人利益上说话，不管政治党派，而实际上引导工人跑向国民党的迷宫，散布阶级调和的幻想，如上海七大工会的上层领袖们之所为，这一类的改良主义者正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欺骗群众的比较有效的工具：因为公开欺骗、公开压迫、公开受贿的国民

党及其御用工会（如工统会、工整会），绝对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七大工会的上层人物表面上装做是“工人的工会”免不了要欺骗一部分的群众。中国共产党警告全体工人同志，不要受这种改良主义工会的欺骗。应当坚决的揭破这种表面上装做不管政治党派而实际上做国民党走狗的假面具。

中国共产党诚恳的告诉全国农民：今年秋收争斗的胜利，全靠你们自己能够发动与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势力。今年地主豪绅在国民党新军阀政府帮助之下，将更残酷的向你们进攻，只有发动与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势力，才能制胜你们的敌人！你们绝对不要幻想反动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什么“减租条例”，即使颁布，一定是表面上欺骗你们，而实际上是帮助地主。只有更广大的群众的组织力量是今年秋收争斗胜利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诚恳的告诉全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关你们生死的中国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农民群众的参加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你们也永远得不到出路。无产阶级与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帮助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蹂躏与压迫，领导你们力争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力争民权与自由，力争完全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修约），这是出卖你们于帝国主义的。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专政——训政，这是出卖你们于豪绅地主阶级的（大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平分政权）。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国内和平及所谓裁减军队的骗局，这是出卖你们于更可恨的新军阀战争之陷阱的。你们不要相信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工农运动于你们有任何好处，过去年余的经验教训了你们，这种反共反工农的号召，只是诱惑你们到反革命营垒中去的一个骗局。你们若敌视工农运动，你们永远也得不到好处！所以现在你们对于城市罢工运动和农民秋收争斗都应采取同情援助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更要诚恳的警告你们：不要再受汪精卫、陈公博派的欺骗！这个最无耻的派别——所谓国民党左派，他是去年武汉叛变的主要叛徒，是蒋介石出卖中国革命的罪魁，是屠杀广州暴动工农群众的刽子手。他现在又不害羞的抬出那“左派”的臭招牌、“改组国民党”的臭口号来欺骗你们，实际只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另一工具——用来和缓群众的革命化和阻止新的革命高潮之复兴的最狡猾的工具。这个最无耻的国民党派别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他看见豪绅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消灭不了中国革命；他看见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国民党的信任破产无余；他看见蒋介石派反革命的假面具早已暴露净尽，需要加用别的欺骗民众的工具来巩固其反革命的领导权；他看见无产阶级在他们无耻下流的叛变后真正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他于是想把这早已打落到粪厕中的臭偶像——（三民主义国民党）再来装金，再来欺骗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企图和缓中国革命的火山之再爆发。他们现在喊出一切近似改良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在掩饰他们本阶级——资产阶级的罪恶而进行他的反革命的企图。

又有谭平山、邓演达等所谓第三派的“中华革命党”，也是武汉时代动摇以至叛逆的分子之结晶，客观上同样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另一工具，企图在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中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阻止群众革命化、阻止群众团结到唯一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路。害怕革命武装暴动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代之以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

所有以上那些反革命的国民党派别，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只有准备胜利的武装暴动无情地打倒这些敌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阶级的民权革命才能达到最后

的成功。

只有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者。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应团结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加紧日常的争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一切企业和银行！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军！

自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媚外卖国的修约！

立即收回山东、满洲及一切租界！

联络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与劳动保险！

争得集会、结社、言论、罢工、游行、示威、抗捐、抗税、索薪、索饷之绝对自由！

援助农民秋收争斗！

打倒国民党及其一切派别！

废除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捐税，实行累进所得税！

反对新军阀的战争！

发欠加饷改良待遇！

给被裁兵士土地和工作！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

打倒欺骗工人的改良主义！“反对劳资合作”！

反对白色恐怖，释放政治犯！

推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万岁！

只有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真正

独立统一的中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

PDG

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

——分析政治和指示工运农运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顺直省委：

接到省委扩大会的各种决议及听到潭秋、少奇[1]两同志的口头报告，中央认为整个省扩大会议的各种决议，大体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工农运动规定了许多工作方法。除开对顺直党内自改组会议以来的政治和组织上的错误及其责任，中央另有决议和告顺直同志书单独公布外，对于顺直目前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路线，还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扩大会各种决议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和工农运动策略、党的改造等须遵照全国大会的决议加以修正和补充，因此省委必须迅速地将全国大会决议案传播出去并指出扩大会决议那些地方之不够和不甚正确而须遵照全国大会决议执行。

二、目前全国的政治状况和党的工作任务以及秋收斗争的策略和路线已详中央通告第　号和第　号，顺直省□□□对当地实情讨论执行。国民党军阀间的冲突，虽□□□□烈，然而不如扩大会所估量“行将爆发新军阀战争”。他们□谋暂时的苟安妥协（参看第　号政治通告），因此他们对于工农于我们将更加一致的压迫。然而另一方面全国范围内工农群众因为长

期的压迫和摧残而革命情绪日渐高涨，反革命军队士兵因生活□迫日渐动摇而革命化，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促进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厌恶心理，帝国主义的屠杀压迫，促进了反帝潮流，而国民党军阀间的明争暗斗亦必然的终于不可避免战争，一般的客观条件都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而为新高潮可快到来的象征。在北方军阀统治的薄弱，经济政治的紊乱不可收拾比南方和长江流域更加厉害。工农群众亦已渐次从对国民党的幻想醒悟过来，虽然工农斗争的经验和党的力量比南方要差，然而客观的条件一样是利于革命的发展。顺直党的主要任务便是要忠实的彻底的执行全国扩大会和中央的指示，加紧工农运动、反帝运动、士兵工作和□□□□□以获取千百万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斗争，以促进新的革命高潮。

三、顺直革命的中心力量应当从什么地方创造呢？中央对此，必须很严重的指示。你们要有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战胜一切困难，去从此□□津的产业工人、五矿矿工、京绥京汉津浦京奉路工及海员工人创造革命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中心力量。顺直有这样二十万以上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客观上，不仅是顺直革命力量的中心，而且是北方革命胜利的保障者。然而这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还与我们党隔离着，党对于他们虽然过去也有过工作的历史，甚至对某部分有过英勇的历史（如唐山、开滦），但是到现在这已经是过去的了，所留下的线索是异常微薄而且不尽可靠的了（因为经过长期间党的主观上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聚集他们于党的领导之下，那么，中央可以断言，顺□□□□途，只是一种很远的幻想而已。从党的组织上说，要使顺直的党成为布尔塞维克的党，也

只有从这广大的产业工人中去□立群众的核心（支部），锻炼党的干部，使顺直的党成为这些地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自己的党。过去顺直的党，不仅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先进分子自己的党，而且是根本与他们隔离着，因此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始终不是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现在我们单只分析认识过去的错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错误转到正确的路上——“到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中去”。目前在顺直应当是政治上组织工作上□一重要的口号。

为实现这一指示：（1）省委须把人力和财力比较集中在□□□□方；（2）必须彻底了解全国大会和扩大会关于策略□□□□路线的决议，而具体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上；（3）□□□□特别注重找新的线索和建立新的基础，旧的线索在经过长期□党□错误的影响之下大半积习难换（如改组会议以来的经验），与其□习难换的线索之上去改造而本来又没有什么基础可寻，则宁肯找新的线索建立新的基础；（4）对于这些地方的工作，省委要时常派人去实地指导；（5）党的组织上，在这些地方要尽力在某一区域建立模范支部，以期更迅速训练出干部人才；（6）党的教育训练工作异常迫切，应根据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加紧工作。

四、农民斗争，过去停滞在反军阀的斗争中，阶级的分化异常模糊，因此对农民运动第一要注意从日常斗争中□进其阶级的分化（豪绅地主与农民的两大营垒的对抗），同时□□□□部分的经济利益的口号外要时宣传党的政治口号。经济□可以斟酌实际情况而有差别的提出，以期能发动群众斗争。而政治口号则必须鲜明正□□□□进群众的政治意识，就是经济口号，也必须□□□□政治口号之能够深入群众。如果经济口号足以妨碍群众政治认识的发展，则应当改正，如扩大

会农民运动纲领，提出积极的“佃农有永久耕种权”则有承认地主土地权的毛病，不如改为消极的“反对地主退佃”尤之不可提“东四佃六”而有时可提□□□□租口号一样。“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土地”的口号足以模糊农民阶级意识而应当改变，则已详全国大会决议案。又农村苏维埃的成立必须是农民暴动后而在暴动前组织革命委员会指挥，亦须遵照大会决议改正。

五、扩大会议选举之省委，中央批准并拟加派得力同志补参加常□□□□。

一切都已详大会决议和新中央通告，此地只指示这几点□□□□，深望能综合地切实执行。至盼！

中　央

九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陈潭秋、刘少奇。

PDG

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湖北省委：

接到你们秋暴总计划及少猷[1]同志报告湖北党务概况，中央对于湖北工作有下述的指示。

你们对于湖北今年秋收斗争的前途及总方针——几个局部的割据，估量得过高而且不正确。自然，如果斗争的发展与扩大能做到几个苏维埃区域的建立，我们当然要领导，但据你们自己主观的检查，最有希望的要算监利、江陵这一区，然而顶好的监利，也不过几百个同志，千余个农会会员，且偏于一隅，而没有斗争。顶好的区域，组织力量尚如此薄弱，其他可想而知，尤其是城市工作完全没有，武汉三镇及铁路工作久已塌台，外县城市工作，更是各级党部在农民意识支配之下，久已根本放弃。这样在革命势力的配合上没有城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么，纵令农村中有点基础，农民暴动仍是很难胜利的，偶然胜利也是没有保障的，何况就从农村说，不仅组织的基础薄弱，并且很少群众的斗争。农民的武装，更是散乱的没有加以组织和训练，成了流寇的生活。你们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区域，未免近于空想，而且你们标出割据的前途，这足以使一般同志容易走到军事冒险的盲动路上去而忽略了或者忘却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主要工

作。你们总计划中分析反动统治者中的各种冲突虽然是事突，但决不能做我们秋收斗争的重要根据，因为蒋桂两系现正在互谋妥协、各自准备实力的期间，裁兵即是整理武装，他们之间的大破裂，决不是目前的事。至于鄂桂的冲突，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不会激烈的爆发。桂系对于杂色军队一定同时采取羁縻与消灭两种政策，将来或者不免有小冲突的发生，但也不足为我们秋收斗争的根据。其次，如果你们根据农民希望C. P.去领导他们，希望红军早到，希望清乡军队走了与豪绅算账，以及神兵红枪会与军队鏖战的事实，认为湖北农民普遍的革命化，这是错误的。须知道神兵红枪会与军队鏖战，并不知群众革命情绪的表现而仅是豪绅阶级中自己利害冲突的表现。至一般农民迫切的希望我们去领导，更证明群众只有革命的要求没有革命的力量，有报复的心理而无报复的勇气，但这并不是群众的落后而是我们的群众工作落后。至于党的组织迭遭破坏，领导力量异常削弱，这尤其是主观的重大缺点。

因此湖北今年的秋收斗争的前途与总方针应根本改变，不是什么几个局部的暴动割据而是要在此斗争中发动并团聚广大的群众，领导其作广大的抗租、抗债、抗税等斗争，从斗争中建立群众巩固的组织基础，坚强群众推翻地主豪绅阶级统治的认识与决心，促进革命走向高潮，同时各地党部要在秋收斗争中恢复起来、扩大起来。这是湖北今年秋收斗争的总方针与总前途。再者你们总计划中在斗争的布置上有用乡村包围城市的企图（如以监利、沔阳、石首等县包围沙市，以秭归、宜都、长阳、枝江等县包围宜昌，以及各区向武汉发展），这种倾向，是极危险的，在客观上不啻暗示一般同志轻视或放弃城市工作。省委应当很严重的注意各大城市工作，同时严格纠正这种危险的倾向。

关于秋收斗争问题，中央已拟发了第六十三号通告（秋收工作方针），省委应根据此通告的指示按照湖北各地实际情形及此信的指示，重新拟一总计划，一面送中央查核，一面发给各级党部切实讨论与执行，原有秋暴总计划，应即废止。

关于湖北党的一般工作方针，中央有下述的意见望切实讨论执行。

从少猷及逸群[2]同志之报告，湖北的党显然到了极严重的关头. 武汉三镇根本被破坏而塌台，外县城市工作则已根本放弃，党内没有无产阶级成分，中上级指导机关全为知识分子，下级指导则为农民，整个的成了农民与知识分子合作的小资产阶级的党，实际则为农民意识支配的党。外县同志大半充满了地方主义，不要城市，不要组织，杀人放火的流寇行动盲动主义。而省委自恢复以来，还没有把党的新的政治路线组织和工作路线经过巡视员传下去一直到最下层组织。因此最近以来，虽发生了许多县份的组织上的关系，但下层组织的政治的工作的路线，并没有改变而仍是继续沉溺在从前的错误中，或则消沉起来。省委报告虽然说得如何乐观，实际只是上层表面的观察，不合实际（譬如说监利很好，但是据逸群同志报告则该县并没有群众斗争，县委因钱多而浪费，政治的工作的路线更不正确）。如果长此下去，那么湖北的党，不是根本消灭，便只有完全走到非无产阶级的路上去。因此中央严重的指出湖北省委目前的中心任务，便是要坚决的纠正上面的错误和缺点，将全国大会决议及中央的指示传播到各级党部，经过热烈的讨论而执行，以纠正一切错误（这里惟有实行省县巡视员制度才能办得到），战胜一切困难恢复城市工作，重新创造组织上政治上无产阶级的基础。在农村中纠正流寇盲动的积习，发动群众的组织和斗争，组织和训练游击队和红军，开始士兵运动，从

艰苦的群众工作汇合起来创造革命的高潮。

湖北在非常的白色恐怖之下，各地党的组织破坏殆尽。湖北党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努力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尤其是重要城市的党，更要马上建立起来。但这里所谓恢复决不是仅仅去找回旧同志、恢复旧有的组织，而是要特别注意新的发展，建立新的基础。专靠找旧的线索，上次汉口市委的被破获，已经是我们极好的教训。党的组织的恢复与建立，只有在群众的斗争中才有更多的可能，因此党必须特别注意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加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基础。

艰苦的，在武汉建立党的新基础，是湖北党的首要工作。武汉的党不能建立起来，全省便失了重心，党内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更加减少，这是湖北党的根本危机。省委应当坚决的设法克服一切困难，在各产业工人、交通工人、市政工人中建立党的支部，使党在工人中树立强固的基础。

宜昌、沙市党的组织应迅速恢复与发展，发动两市工人的日常斗争使与鄂西各县农民的秋收斗争亲密的联系起来，为鄂西斗争的中心力量。

有许多县，党的组织和武装虽仍旧保存一部分，但完全与群众脱离了关系——如黄冈、黄安、沔阳等地。这种流寇式的党一方面使群众对党的认识更加矇糊，一方面党的自身也失掉了组织的意义与作用，甚至可以不自觉的变成了真正的流寇。省委必须马上派人同他们接头，切实纠正这种现象，务使党的组织重新深入到群众中去。武装不应困守山上，而应指示他们实行游击战争，纠正过去毁灭城市与烧毁政策的错误。

武汉职工运动应设法复兴起来，抓住工人群众日常的迫切要求，不断的向群众宣传煽动，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斗争

中去建立并扩大工人的组织基础，深入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教育。宜昌、沙市、大冶各工人区亦应同样的进行工作，建立湖北的职工运动基础。工人组织的形式不必拘定要工会的名义，用储蓄会、救国团互助团、职业研究会等均可。武汉应特别注意兵工厂工人、纱厂京粤汉路工以及市政工人、重要交通工人，其他各县城市则须注意手工业工人及苦力之组织与斗争。

过去湖北各县的农民斗争都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的群众在党或党员的号召与强迫之下起来的，所以一经失败群众马上瓦解，对于党不但没有好的印象反发生恶劣的观念，以后应严重纠正此种错误。群众的组织应在斗争中建立起来，而且要与斗争同样的发展。在发动斗争之前，必须有普遍的宣传煽动工作，使群众都能了解斗争的意义与必要。党不能强迫群众斗争，也不能提出群众所不需要的要求或过高的口号。过去党在群众中所遗留下的不好的印象，必须向群众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扫除群众对党的恶劣观念。农民的组织仍用农协名义或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有相当的群众时即须组织雇农部以代表雇农的利益。在苏维埃区域必须组织雇农工会，如果雇农数多时[3]。

神兵与红枪会一类的组织，完全是豪绅所领导的，我们对于这种组织不要存任何幻想，只应宣传其群众提高阶级意识，使其脱离反革命的领袖，走到农民方面来，加厚农民方面的武装力量。

士兵运动在湖北应即开始提出士兵迫切要求的口号，煽动他们作经济斗争，并且在士兵中进行士兵的和党的组织，加以政治的教育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在湖北应特别加紧，省委应有很好的宣传计划，

指挥各地的宣传工作，并须筹备出版一种党的刊物，为经常的宣传机关。

巡视工作省委应切实执行，经常应有三个或四个巡视员巡视各地工作。巡视员最好找有能力的工农同志担任。

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案已经翻印好不日寄来，各种工作的方针与方法均须遵照决议案酌量当地情形切实执行。

中　央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猷。

〔2〕即周逸群。

〔3〕原文如此。

PDG

中华全国总工会
给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信

——关于铁路工作策略与方法的错误及今后的工作策略路线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铁总：

全总听了少奇[1]同志的报告，对于铁总今后的工作有如下的意见和指示：

铁路工人在连年国内战乱之下，既经过奉系军阀的严厉的压迫与剥削，复受国民党军阀的欺骗与摧残，各派军阀如桂系、冯玉祥、岳维峻等在京汉路指使其走狗工贼组织御用或警察工会以钳制工人，欺骗和剥削工人。军阀混战的结果，一般的积欠工资甚至于十八个月之多（如京绥路）。因此工人痛苦日深一日，而其斗争的情绪则适随着这些痛苦而逐渐提高。譬如天津工人自动的捆绑工贼，送公安局监禁；长辛店工贼工会成立，工人非常反对，他们说老工会好；南口工人因国民党工会成立以后，天天“清共”拿人，对工人一些利益都没有，因此工人非常愤激；张家口工人反对裁员，以怠工方式要求清发欠薪。这些都明显的表现铁路工人的斗争的情绪正在向前发展，同时亦就证明中国产业工人在生产经济急速的崩溃中，只

有革命的斗争是他们必然的出路。

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又加以我们过去工作的影响，铁总在群众中的信仰，而铁总的工作却没有很好的发展，群众的斗争都是脱离了我们的领导而是自发的。这都证明过去工作策略与方法的错误，使党落在群众的后面，不能担负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使命。

大抵过去铁路工作，完全依靠党去做，未曾建立工会的系统工作，而过去党在旧的组织底下，只是用旧的方法来应付繁重的有广大群众的铁路工作，工作是浅薄的、非深入的，而自视是浮诞的、夸大的。所以反动政治的压迫、摧残、欺骗、玩弄，铁路工作的同志，消极的消极，反叛的反叛，铁路工作就完全塌台。因此我们要恢复铁路职工运动在中国革命中位置的重要，了解铁路工人在现经济环境下群众斗争的必然性，大的汹涌的斗争波潮的可能与趋势，认识过去工作的错误，坚决的放弃从前已走不通的旧路线，找出工作的中心对象，很刻苦的重新创造铁路工作。一切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我们的影响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切斗争都要使群众认识其意义而成为真正的群众自己的行动，就连领袖亦要是群众行动中锻炼提拔的。总之，一切都要群众的，摒斥过去浅薄、浮夸、主观的工作方法。这样，铁路工作才能走向新的方向，展开一个新的局面，才能担负并执行下列的工作任务，而树立铁路工作的牢固的雄厚的基础。

反帝运动的鼓励和扩大：反日运动与职工运动相联系，职工运动必须从反日的高潮中恢复起来，中央对于此点，早有通告。现在反日运动须加紧进行，深入群众鼓动铁路工人的反日斗争热情，组织反日大同盟、外交后援会、雪耻会……等，尽可能的召集群众反日大会，公开的讨论反日运动的工作，提出

不运日贷、没收日货以维持失业工人生活的口号，尤其是在日军横行的胶济、津浦路，更须提出不运日兵去打自己家乡的口号，以激发群众的热情。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时候，即应提出工人本身迫切的经济要求，如清发欠薪（京绥路）、按月发薪（京汉、陇海等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使工人在反帝工作中得着本身的经济利益。这样，才使其革命情绪愈益高涨和持久，我们更能深入群众，扩大群众的组织。

积极的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斗争：铁路工人自发的斗争，有数处都已起来，已如上述。我们必须积极的深入群众中去，领导他们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群众组织，并加以宣传和教育。即如京绥路欠薪积至十八个月，索薪已成工人迫切的要求，京汉、陇海等路，不按月发薪，而改为四十天或五十天一发，这些都是工人切身的要求。清发欠薪问题，是反动政府所不能彻底解决的，而正是工人非常迫切的要求，铁总应将这一问题作为经常工作，领导继续不断的斗争，得到一点欠饷，就是一点胜利，而这胜利便可成为工作的推进力。此外即很细的斗争，亦须领导，大的斗争是由小的斗争起来的，没有小的斗争只幻想大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斗争不一定是罢工，如怠工（张家口已实行）、包围工厂路局等，都可以的。在斗争中必须加紧巩固组织与宣传训练。每一斗争的结束，不论胜利或失败，都要向工人解释其意义，提出新的要求与口号，以鼓励工人再来斗争的勇气。

下层基础组织的建立：下层基础组织，必是在斗争中建立。现在丰台、长辛店、南口、张家口、大同以至包头各站都有关系，应速派人去把他们联络起来，设法找出新的分子开始工作；同时给他们新的策略和方法，把受我们影响的群众加紧宣传和鼓动，积极发动工人日常生活的斗争，在斗争中巩固和

扩大基础组织，再由这些小组织的汇合做到成立全路的总工会。在没有同志的地方，亦应速派人去进行工作，注意发动斗争。在反动势力薄弱的地方（如张家口），可以公开号召群众组织工会，选举职员，通过各种要求启发斗争。公开成立以后，比秘密工作容易发展。在目前的形势来一个斗争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应努力的去实行。假如斗争起来以后即使被国民党压迫，更使群众对国民党的认识，以后工作也容易进行。工会公开的建立，同时应加紧巩固下层的组织，即使压迫到来，工作仍然可以进行，这是应注意的。

加紧反国民党宣传的工作：铁路工人厌恶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欺骗与剥削工人的工会，已是普遍的现象。南口工人不但消极不参加反动工会的开会，且有积极的加入工会去捣乱的表示；张家口工人，二十多人到国民党去，他们马上关门，说是共产党来了。工人群众已认识国民党不是东西。但是，工人的反对国民党，并不是彻底的认识他是豪绅资产阶级的集团，更不能认为是明了和同情本党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政治观念，一般是模糊的，假如国民党施一些小恩惠的欺骗政策，他们是会受迷惑的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反国民党的宣传。国民党军阀在全国屠杀工人和农民及一切革命民众，并取消工人在“共产时代”争得的条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屈服，济南惨案，说是北伐要伐，应加镇静隐患。现在北伐是成功了，国民党军阀替代奉系军阀在北京的地位，还是连屁都不敢放，任日本横行。国民党政府实际投降帝国主义，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奴才，把“不平等条约”加一层保障无期延长下去，所以他嚷着“修约”的好听名词来欺骗民众，掩饰他卖国的罪恶了。这些都是反国民党宣传的材料，应深入群众，扩大宣传，使工人群众彻底认识国民党的丑态，取消其在群众中的影响。

一方面更须积极宣传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意义，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在张家口国民党力量薄弱得可怜的地方，更可以号召群众向他示威，即殴打驱逐他们也是可以的。

反“改良主义”与反动工会的斗争：在铁路中，改良主义不足为工作的阻碍，因为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但是“改良主义”的影子（非实质的）对于冯玉祥犹存幻想，也足以冲溃工人斗争的情绪。铁总必须根据工人的经济利害观点暴露冯玉祥的欺骗，提高工人的要求，以打破冯玉祥的手段。同样在北方铁路中亦没有黄色工会存在的可能，假使不是赤色的，便是反动政治的御用官僚警察流氓工贼工会，铁总也必有经常的宣传深入于群众的认识中，这样才不至使群众受工会的欺骗而一般的厌恶工会运动。

健全铁总机关的组织：铁总过去在群众中是有信仰的，即现在仍是有信仰，甚至工人同志不愿与党接头而愿与铁总接头的现象。因此，健全铁总组织来号召并组织广大的铁路工人群众是必要的。铁总的组织，以五人组织常委，常任工作三人，即由少奇、纪六、昆弟[2]（如昆如不能去则由宗义[3]），巡视二人，另候补委员七人。北京、张家口、大同至包头、京汉、津浦及胶济各一人，常驻各该地工作，由各该地提拔积极工人分子参加，不必要同志。其余工人或出巡视，或留机关工作，则由铁总酌量调遣。但巡视员名义，在未有组织的地方，可以用巡视员名义工作，一有组织，这名义即应取消，以免形成铁总包办的形式，这是要注意的。

铁总的工作，虽然已有许久的历史，但现在又回复最原始的工作阶段。在这一时候，全总只能为一般原则上的指示，铁总应该这一决定而切实执行，能于最短时间获得工作上的新开展。现在客观的环境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工作的开展是非常

有望的。以后铁总工作应按月报告到中央和全总，并能够在下月报告中见到铁路工作具体的切实的工作成就。

铁总要坚决执行新的工作路线，应速与山东、河南、满洲、江苏四省铁路工作发生密切关系，并在各方面找出新的积极的分子参加铁总工作和负责巡视员。

全 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奇。
〔2〕即曾纪六、张昆弟。
〔3〕即孙哲一。

PDG

中共中央给毛泽东等的指示信

（一九二八年）

润之兄转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

中央前有一长信给你们，由湘赣两省委转，想已收到。湘省委过去对于你们的指导，虽然有不少的缺点，但是关于改造红军、发动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向湘南发展等项，都非常正确，中央完全同意。最近湘省委机关破坏，以致与你们的关系又重新中断，在工作上是莫大的损失。

本党六次大会，在列宁国际的指导之下举行，确实得到了伟大的成功，领导吾党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正轨（决议案已由江西设法送给你们），你们应当毫不犹疑的接受大会的决议，依照新的政治路线转变你们的工作路线。

你们数月来英勇的斗争，确实发动了赣西及边界的无数万工农群众，并且成为未来的湘赣两省暴动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央对于诸死难同志，表示万分的哀悼与致意！兹将国际状况与国内情形及你们目前应采取的路线，作下列的指示：

Ⅰ．国际形势

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开始了。自一九二三年德国的七月革

命失败之后，将世界革命的第一时期结束，接着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稳定资本对工人的进攻，另一方面更加使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的主要矛盾日益增加，以致于有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危机。总合这些极剧烈的矛盾，便是世界第二时期的完结，第三时期的开端。

世界革命第三期的主要特征。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第一、工人阶级的左倾和革命化，重新开始工人对资本的公开的决胜负的激烈斗争；第二、东方殖民地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倍的剧烈，一直发展的群众的暴动；第三、苏联更加成为动摇资本主义稳定与推进世界革命的重要动力，同时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武装战争有爆发的危险。阶级斗争的激烈发展，殖民地的暴动，反苏联的战争的酝酿以及帝国主义的大战的酝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年内确实经过暂时的局部的稳定，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但是这种稳定一方面固然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上面，另一方面不能不使国际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剧烈的增高起来。这种危险的表现是：

美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1. 美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欧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由欧洲移到美洲，美国的生产额占全世界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世界金子的贮蓄量的过半归美国所有。美国资本主义这种畸形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使资本主义诸国在经济上产生了极严重的困难，另一方面在美国内部发生生产过剩与失业恐慌。

英国资本主义的没落。2. 英国资本主义的没落。在英在欧战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变成一巨大的寄生虫。英国的输出工业——从矿业起，日益低落，国内发生长期慢性的失业。英

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利润，不是出自本国产业的发展，而是依靠于殖民地原料（橡皮，茶叶，石油……）的贩卖。英国在世界上的市场上的一天一天的缩小，在大陆与殖民地都遇着强大的敌人（如美德）。

德国资本主义的复兴。3. 自道威斯计划实行后，德国资本主义得到了相当的稳定，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已格外的强大，而且工业的技术特发展，但是同样在德国显出一种极显然的危机，即是凡尔塞条约对德的极度剥削，使德国资本主义真正的复兴是困难的不可能的。

欧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 欧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建筑在对工人阶级的极高度的榨取（工资的减低，八小时工作制的破坏）与严酷的白色恐怖上面（意大利波兰的法西斯蒂政府，英国法西斯蒂主义的萌芽），使欧洲工人阶级必然要挽回从前的颓势而奋起进行一种左倾化与革命化的运动。如选举将革命领袖的票数的增加，革命工会势力的增大（德法意），无产阶级不断的斗争（英国大罢工，欧洲工人对惨杀萨樊的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和进步。

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烽起。5. 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烽起。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市场的重新分割，问题极度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殖民地方面表示的更加明显。最近殖民地所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叙利亚埃及的反帝运动，摩拉哥的独立运动，荷领印度的大暴动，印度的不断罢工与纷扰，中国的革命等，都表示世界资本主义的大矛盾集中于殖民地。

苏联经济的发展。6. 苏联经济的发展。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现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已明显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与电气工业，工人生活的水平，更是逐渐提高。私人经济虽然也有发展，但是比之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发展相距极

远，所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很明显的战胜私人经济。因此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权已经更加巩固。

世界第二次大战的临头。7. 在最近期间，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剧烈，特别是美国与欧洲诸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列强与苏联的矛盾，帝国主义重新分配殖民地的矛盾。总合这矛盾，必然的会有第二次大战的临头。

国际的革命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目前的世界革命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利的，“拥护中国革命”已成为无数万工人阶级的职任。

Ⅱ. 国内形势与党的策略

广州暴动失败后反动势力的团结。广州暴动给反动势力以极大的恐吓，使他们暂时放弃内部的冲突，而结合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国民党第四次全中会议，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完全投降，代表豪绅地主的桂系让步，而拥护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上台，以镇压工农的暴动。

北伐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企图。蒋介石登台不久，便开始向奉张[1]进攻，资产阶级企图扩充自己的势力于中国。但是北伐一开始，即遇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桂系军阀的从中活动，使资产阶级这种企图完全失败。北伐期间所举行的财政、裁兵、裁厘的三大会议，因为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一件都不能解决。

资产阶级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失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在五中全会极力提出统一财政，实行裁兵，取消政治分会，恢复民众运动的议案，想给桂系军阀以政治上的严重打击，但是这些计划都因为桂系的反对失败了。但蒋介石还没有

力量与桂系马上破裂，只好又要“辞职”了。

目前蒋介石屈服于桂系而与之妥协，豪绅的反动势力会为增加。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因为各方面的准备尚未充分，还没有战胜桂系的可能，遂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忠告，暂时向桂系屈服而与妥协。最近国民政府的改组，完全成为豪绅地主代表的势力所统治，蒋介石仅仅是一个无实权的空主席。

国民党的政权永世不能稳定，蒋桂两系的大战必不可免的会要爆发。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的割据局面，很明显的划为四大势力范围（蒋、桂、冯、阎[2]），实际上冯阎两系的势力都非常薄弱，各依附于蒋桂两系以存在。并且在一派势力范围内，又杂有另一派的势力，明争暗斗无法避免，未来的混战必然要爆发，国民党的政权是永远不能稳定，统一更是绝对无望的。

豪绅资产阶级各自勾结一派帝国主义做靠山。豪绅资产阶级冲突的靠山是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是非常狡猾聪明，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他是有利无害，特别要打击英日帝国主义，必须利用中国的资产阶级，美国帝国主义便找到蒋介石做他的工具。英帝国主义则帮助封建地主的桂系以打击美国的工具——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同时在北方向日本进攻。

豪绅地主的继续反动。豪绅地主的得势，继续以更反动的政策来扑灭工农暴动，建立中国式的法西斯政权。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坚持反对恢复民众运动的主张，蔡元培并主张停止青年运动，反对统一，主张分治合作（不主张取消政治分会）。

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其目的与豪绅地主的政策相同。资产阶级极力要提高“党权”，在五中会议主张恢复民众运动，

取消政治分会等，在群众中故意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进行和平的排货运动。这种政策，自然与豪绅地主的政策相冲突，其用意则在以改良主义的面目，欺骗群众，和缓革命运动，分散革命势力，蒙蔽群众的意识，并拿群众以打击桂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工具。第三党及陈公博派在北伐期间非常活动，出版《突击》、《革命评论》等杂志，专门散布许多蒙蔽群众的迷药。这种似是而非的主张，确能动摇一部落后的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豪绅地主的反动政策对革命的危险更大。第三党和陈公博派已经变为蒋介石的最好工具。

国民党的政权愈加走到反动崩溃的道路。南京政府的组织，豪绅地主的得胜，必然更加显露出反动的凶恶面目，使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可以完全消灭。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改良的欺骗宣传，必然要更加提高，妨碍群众的革命化，并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同时反动势力内部的冲突，必然愈剧烈，国民党的政权要愈加走上反动崩溃的道路。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数月前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山东，采更急进的进攻政策，其目的在实现独占北方的企图。这是帝国主义者重新企图瓜分中国的开始。这种积极政策的实行，与美国的在华利益发生冲突，对英国的长江利益亦有莫大的威吓，于是三大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因利害的冲突，又开始暗斗了。

美国帝国主义仍旧采取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美帝国主义为要打击英日的势力，首先与南京政府订约，而得最惠的待遇，对于修约的运动，亦可相当的让步。美国并找到蒋介石做他的工具，实行他的经济侵略。

英日的对华政策是一样的。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策，就是要首先保护他的特权，就是和平的修约运动，都与他们不利。因此，英日还继续以往的政策，各自扶植一派强大的封建地主的军阀——英国勾结桂系，日本勾结奉张。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剧烈，还是太平洋大战爆发的导火线，但是帝国主义营垒之中虽然是有极大的矛盾，可是帝国主义现在中国的力量仍旧非常强大，因政治的经济的威力，用利诱、贿买、炮舰等政策，以达到侵略的目的。日本对于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革命运动在济南事变后有复兴的现象。日本出兵济南的残暴政策，使群众的反帝运动又重新开展，国民党则采取可耻的投降政策，更激动群众的愤恶。不仅是工人阶级，就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群众，亦开始对反动的统治不满，恢复了以前的“和平救国”的排货运动，并且有许多反对现在统治的灰色刊物，不断的发生。

城市工作最近有活跃的现象。被反动统治镇压下去的城市工作，在济南事变又有活跃的现象。上海工人又重新跑上街来示威（五卅，六三）。从五卅纪念起到现在，已经爆发了不止一百次的经济斗争。各地重要城市的工人群众（如天津、杭州）对国民党的幻想日渐减低，并开始组织与斗争了。

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快要到来。帝国主义冲突的日益剧烈，反动势力内部矛盾的无法解决，蒋桂两系对民众的加紧剥削，这些都可以助长革命运动发展，使群众愈趋于革命化，斗争的形式愈趋于尖锐化。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会要到来。农民的游击战争与反动军阀的兵变，还是向上发展，更要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分。

六次大会的重要决议。六次大会很明显的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有转变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前途。现在革命的形势是旧的高潮已经过去（自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新的高潮尚未到来——逐渐的是向高潮。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同盟者是无数万的农民群众。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民权独裁制。

目前党的主要路线是争取广大的群众。现在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还非常薄弱。虽然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上看来，革命的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会要到来，我们要促进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必须争取广大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坚决群众的革命意识，发展群众的革命组织，动员群众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围绕在党的主要的政治口号的周围。因此，争取群众是目前工作的总路线。

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是目前战术上主要的宣传口号。要实行党争取群众的任务，目前的主要战术是要发展群众的革命意识，肃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揭破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欺骗与反动性，指出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是革命的唯一出路，即是目前战术上的主要宣传口号。

盲动主义、机会主义是妨害党的争取群众的工作。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危险在于使党脱离广大的群众，甚至于有消灭革命的可能；因此，要执行新的任务，在党内必须纠正极左倾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坚决的反对命令群众的余毒。

Ⅲ．四军目前的出路与战略问题

四军现在确实处于最危险的关头，甚至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蒋桂两系的妥协，缓和了战争爆发的速度，桂系要准备对蒋的未来的战争，必先肃清自己领域内（湘、鄂、粤）的革命势力，特别用全力“围剿”朱毛[3]，如果现在我们的战略错误，甚至于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红军的可能。

过去我们战略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不发动群众，不深入斗争，保守与流寇观念。你们过去在湘南的错误，主要的在于没有决心发动广大的群众，实现土地革命的任务，在赣西没有被敌人消灭，在于你们能纠正以前的错误，能坚决的发动群众，实现土地革命的任务。但是目前保守与流寇的观点在你们中间还是极大的余毒，必须使之完全肃清，才能执行新的战略。

保守观念的错误。保守观念的根本出发点，完全代表落后的农民意识，并且误解了罗霄山脉为中心的意义。现在只有积极向外发展，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使红军在广大的成千成万的群众的保卫之下，才能存在，在长期的不断的农民游击之中，才能改造并扩大红军，保守是没有出路的。

目前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红军的集中在一处是会失败的。目前革命的形势还没有到高潮的时期，不需要红军集中在一处，准备向敌人作决死战的进攻。现在红军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动更广大的区域的群众。集中一处是错误的，如此有在政治上更增加敌人的注意，使敌人有机会容易集中力量“围剿”

红军。红军完全处于孤立的局面，容易被敌人消灭。

保守罗霄山脉，红军绝对不能找到出路。单独的保守罗霄山脉，绝对没有办法能解决目前的一切困难——经济问题、食粮问题、枪弹问题、改造问题等。这些困难只有向外发展可以解决，保守是没有出路。数月来你们已身经过了许多的困难，应该对这点有深切的了解。

流寇观念的错误。流寇观念的出发点，是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由于不了解发动群众，深入斗争的重要，对进攻与退守的决定，不建筑在群众力量上面，仅仅是单看到军事的一方面，只是向敌人的空虚处进攻，而不顾计主观的力量，结果红军变为单纯的流寇，极容易被敌人消灭。

郴州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湘省委上次决定红军由赣西向湘南发展的战略是对的，但是你们的运用就发生了错误。到湘南后没有注意发动广大的群众扩大游击战争深入群众斗争，一开始即乘郴州的空虚而进攻，结果因为主观力量的薄弱与战略的错误而失败，以至于重新退回赣西，都是流寇观念的结果。

红军目前的出路，只有积极的向外发展。在这样危机的时期，你们应当毫不犹疑的纠正保守的流寇的倾向的错误，积极的向外发展，扩大苏维埃区域，强健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是目前工作的总路线。

向外发展是不是放弃罗霄山脉的政权？不是的！向外发展并不是说要放弃罗霄山脉的政权，而是要保障罗霄山脉的政权。因此，第一步的任务，应当是尽可能的发动罗霄山脉周围各县的群众——宁冈、永新、莲花、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深入这几县的斗争，帮助工农增加武装的训练，推进工农的斗争与组织力量，扩大苏维埃的区域，这些工

作都应当建筑在当地的工农群众的力量上面，打破依赖红军的错误倾向，这样才能真正的巩固罗霄山脉的政权。

今后发展的方向？赣南呢？湘东呢？还是湘南呢？如果你们能照着以上的指示工作，经过较短的准备期间，红军的大部分便可向外发展，以解敌人的企图包围形势。但是目前发展的方向是哪里？有些同志主张到赣南去，这是错误的。

赣南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赣南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没有较健全的党部组织，占领赣南极容易受敌人四方八面的包围，到赣南是死路一条。

向湘东发展在目前不是时期。湘省委第二通告，命令红军占据萍安，向湘东发展，在目前不是时期，因为占据萍安，向湘东发展，可以根本动摇长沙的统治，这是湖南全省总暴动的前夜的发动，在目前是会失败的。

现在发展的区域应当是向着湘南的边界各县。目前向外发展最适当的区域，中央认为是湘南的边界各县——茶陵、攸县、酃县、桂东、汝城、资兴、永兴一带，在这几县有广大的群众的基础，并且过去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豪绅地主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红军向着几县发展，容易得到群众的接助。

向湘南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向湘南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要更加发动所到地的广大的工农群众，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他之深入，使之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区域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

扩大并更加巩固红军是目前极重要的任务。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广大的红军，是没有希望的。红军的创立，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有可能而且必要。这一任务的完成，可以成为湖南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动力——这一动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之一。

要艰苦的加紧湘南各重要城市的工作，同时反对军事冒险的进攻县城。联系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工人的阶级斗争是决定暴动胜负的条件。向湘南发展，必须有决心有计划，而且要长期的艰苦的加紧重要城市的工作，反对单纯的军事冒险的进攻县城，特别对于郴州、衡阳不得作此轻意的尝试。

在战争上应当以游击战术为主要的形式。红军的战术应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很好的学习过去游击战争的经验。对于大批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不应当作决死战的拼命，而应当不断的多方面的向敌人袭击与混战，使敌人的势力困难侵入到苏维埃区域，总之，凡没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应与敌军作正面的作殊死战。

反对无目的乱烧乱杀主义。乱烧乱杀的政策，十分妨害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并且可以吓跑参加斗争的群众，这种政策充分的代表流民无产阶级与一部觉得无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过去湘南的失败，事实已教训我们。因此，此次红军向湘南发展，应当坚决的纠正无目的乱烧乱杀政策。

力求红军的群众化、工农化。总之，中央决定红军向湘南发展的意义，主要的为是要使红军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能深入更广大的区域，能群众化与工农化，如此，便可以在广大区域的群众保卫之下而存在而发展以至于巩固。

向湘南发展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此次向湘南发展应当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应当估计赣西的情形，留多少部队驻守，应精密的估量湖南敌人的力量以及自身的情形，决定向湘南发展的部队数目与驻扎前份[4]。如果还是与以前一样，无组织、无计划、无准备的向湘南发展，等于是自己去送死。

军事的组织与指挥并须统一。向湘南发展，首先须注意军事的组织与指挥的统一，部队的分布区域与部队之间的联络与指挥必须有相呼应相联绪的行动。因此，红军须有一健全的军事委员会，担任这种任务。军委的主席中央指定润之同志担任，玉阶、文才[5]诸同志均须参加。

改造红军是目前的重要任务。改造红军是目前的重要任务。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分子充任之，在过渡期间，可用自愿制，对于动摇不断的军官，尽可能的撤换，用自己的可靠同志担任。红军的兵士无论征兵制或自愿制，均须规定服役期间。红军军官应力求工人化，就近在自己的部队中，选择最积极最可靠的工人兵士，加以短期训练，担任军官。采用苏联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会与政治部制度——将现有的政治部加以改造，多参加工人同志。

在政治上争取敌人兵士并派人到敌军中去。红军在湖南军队中有很多类似“左中信”的传说，敌军兵士对红军有很大的信仰，特别在目前“裁兵”期间更容易促进兵士群众倾向到红军方面来。因此，你们必须有计划的开始对敌军的工作，特别要注意在政治上取得敌军的兵士——围攻你们的敌军兵士。有可能时，派一部分有训练的徒手去到敌军去，亦是破坏敌军的必要工作。

红军是未来革命高潮的重要动力。在未来革命高潮中，红军是主要动力之一。你们必须执行上列的指示，才能保存并□□现有的势力！

Ⅳ. 湘赣边与湘南工作问题

摆到你们面前的两种不同的任务。湘赣边及湘南在目前显

然划为两种不同的区域：赣西各县是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党的主要任务是要积极的深入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的工作。湘南的政权还在豪绅资产阶级手里，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极广大的群众，准备夺取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政权的群众暴动——这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任务。

努力执行六次大会关于苏维埃区域任务的决议。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很明显的指出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必须努力执行！“……照抄决议案”。

扩大赣西苏维埃区域，并须将基础建筑在群众上面。数月来赣西的斗争，确实能发动了广大的群众．你们在湘省委指导之下，很快的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群众斗争的力量与组织的数量还是不够，苏维埃区域的范围仍旧是非常缩小（仅仅宁冈一县的政权完全在我们手里），尤其危险的是群众过于依赖红军，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党必须认清这种危险，努力纠正这种错误，必须要使赣西苏维埃区域的基础在群众上面，并须扩大苏维埃区域于邻近各县。

苏维埃应当是群众的组织，反对委派与命令主义（应须民主化）！过去赣西各县的苏维埃，大部分是由上而下的委派制度，许多地方的群众还是不能“自动手”的分配土地，必须要等公事来（永新）。这样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断送苏维埃政权的生命。苏维埃应当是群众的组织，应当建筑在劳动群众由下而上的选举的基础上面，纠正委派制度与命令主义的余毒。苏维埃应当吸收一般群众参加工作，并号召广大的群众监督苏维埃工作，反对苏维埃中工作人员可能的作出的许多的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用职权等等。

组织赣西红军并扩大赤卫队。经过这样长期的斗争，并且已经是在苏维埃的政权之下还没有能组织起赣西当地的红军，

如此可使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得不到保障，同时亦即是群众依赖四军的原因。党必须指导赣西苏维埃立即开始赣西红军的组织，号召一般革命的分子充当红军（即党员、团员、工会和农会的积极分子），从四军中征调一部分可靠的分子担任赣西红军的干部，并供给一部分枪支。四军必搜集数月来的经验以训练赣西红军，特别是关于游击战术的训练。各村区苏维埃应组织赤卫队，并将原有的组织扩大，其责任在于维持乡村秩序，镇压土匪，镇压反革命。

湘赣边特委必须与赣西特委发生密切联系，发展以吉安为中心的城市工作，并须不断的扩张自己的领土于邻近各县。

无产阶级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城市是乡村的领导者，湘赣边特委必须与赣西特委发生密切的联系，发展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各县及县苏维埃区域内的反动城市的工作。这样工作必须是长期的有计划的艰困工作，必须发动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中的大多数于赤色工会之中，并须积极的领导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军阀的运动，使与工人的经济斗争相推进。赣西苏维埃并须有决心有准备的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保障苏维埃存在的根本条件。扩张领土的方式有二：一方面苏维埃可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的暴动。促进红军的进攻必须当地的武装暴动相呼应，单纯的军事进攻是非常危险而且是错误的，对于过去的单纯的军事进攻，须纠正之。

在苏维埃区域的党的组织与党和苏维埃的关系。在苏维埃区域内，党的政治宣传和工作，应当是公开的，但须有秘密机关。党应处处准备退却时所应采取的手段，以保留党的活动力量，建设秘密的党部和交通。在苏维埃区域，党应当是苏维埃的思想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的工作，纠正过去党代

替苏维埃的错误，同时严防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在苏联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有些地方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在湘边各县须开始群众的组织与恢复党的工作。中央所决定向湘南发展的政策，你们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派遣一部分湘南的同志，回湘南去，恢复党的组织并开始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工作。现在正是秋收的时候，并且年关又快到了，这个时机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最好时机，不应当将它放了过去。

恢复发展并巩固湘南的党，而且应当增加工人党员的成分。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上的缩小，在党的成分上和党的领导上的缩小有形成农民的严重危机。湘南的党自经几次失败之后，大部分已经瓦解，而且因为湘省委的破坏，更使工作的恢复感觉到异常的困难。望即在四军中抽调同志到湘南去恢复党的工作，发展并巩固党，同时在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党的基础必须建筑在支部上面。没有能在群众中起核心的支部，党便不能争取几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为执行这种任务，立即组织一以郴州为中心的特委到湘南工作，所属的县份如下：桂东，汝城，郴州，宜章，永兴，资兴。特委名单由润之与湘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袁德生共同决定，以后报告湘省委批准。此特委与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发生密切的关系，此点可暂设资兴。

恢复工农的群众组织，领导日常的经济斗争。湘南工作的主要路线，是要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准备与四军相呼应的斗争，一直到一县或数县的暴动，推翻敌人的统治，建设苏维埃政权。党必须立即在乡村中恢复农民协会的组织，组织广泛的农民群众于农协之内，并保持贫苦农民在农协的领导地位。城市中进行赤色工会的组织——特别注意产业工人。党应当领导

工农日常的斗争，以发动广大的群众，以造成暴动的有组织的斗争的群众力量。

农村工作的总路线，是农民反地主阶级的斗争。目前地主阶级是一般农民（包括富农、中农、小农、半小农）的主要敌人，党应当吸收农民全体反对地主豪绅压迫与封建式的剥削，使农村阶级对垒的形势更加明显尖锐化。在总的策略上——反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应当联合富农。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如此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同时削弱了农民反地主阶级的力量。据此目前农村主要斗争的口号应当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是与总的策略有害的。但是党绝对不应当因为在总的策略上要联合富农，便抛弃贫农对于富农的阶级斗争，这亦即绝对的错误。在贫农反富农的阶级斗争上，党无疑义的须站在贫农一边，反对富农。农村斗争的主力是贫农，同盟者是中农，这点党应当深切的了解而加以执行。

在城市中反帝反军阀的运动，应与工人的经济斗争相推进。“五卅”惨案以后，全国范围内反帝运动有复兴之势，党必须积极的领导反帝运动，注意反帝的宣传与工作，但是反帝运动必须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并须与工人的斗争与城市工作相联系起来。对军阀战争反苛捐杂税……等斗争，是一般小资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党应领导发动这类的斗争以推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并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

* * *

中央仅仅在湘省委报告中得知你们的状况，此外，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供中央的讨论，因此，未能作更详细的指示，希

望你们以后与中央发生密切的关系为要！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张作霖。
〔2〕指冯玉祥、阎锡山。
〔3〕指朱德、毛泽东。
〔4〕原文如此。
〔5〕即朱德、袁文才。

PDG

中共中央工作计划大纲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一、根据六次大会关于过去中央工作的批评及今后党的主要任务——夺取成千成万的群众于党的周围走向革命高潮，中央工作计划应以强健中央的指导、树立政治上组织上布尔塞维克的正确的路线为主要目的。

二、中央应切守无产阶级化和秘密党的条件为一切工作原则。

三、中央工作计划应确立工作中心。不论在经常会议中、全国指导上、工作布置上、宣传任务上以及预算分配上等等，中央都应有扼要的中心工作计划，使他与党的主要任务相适应与工作原则相切合。

四、加强政治的指导，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线，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是目前中央中心工作之一。实施的主要方法有：

1. 中央要时有对全国以及重要区域去政治上组织上关于原则和实施方案的指示，并督促各级党部对于大会决议案热烈的讨论。

2. 中央党报要注重于理论政策的宣传和讨论。

3. 党内政治通信要立即开始关于一切原则的争辩和讨论。

4. 工厂小报要努力从试验中求其实现。

5. 督促驻莫代表开始中共党纲的分类研究和编译书籍的

供给。

五、督促各级党部建立产业支部，整理地方党部，经过党团发展群众组织和斗争，引进下级工人干部参加党的上级指导机关以树立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这是目前中央最迫切的中心工作。实施的主要方法有：

1. 集中工作人才于主要产业区域。

2. 中央直接参加帮助重要产业支部和重要省区党部的工作。

3. 督促各级党部坚决的实行从下而上的党的改造，限期开各级代表会议。

4. 严密的考查重要省区党部关于六次大会决议案实施和宣传的以及了解的程度，这便是中央巡视员的主要工作。

5. 用全力计划并实施发行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

六、坚决的领导全党从启发政治上原则上的争斗找出路，以促进党的进步，以消减充满党内小资产阶级无原则的个人的攻讦和纠纷。

七、坚决的执行党员职业化尤其是深入工农群众中的职业化的原则，以肃清党内雇佣劳动化的危险存在。

八、为使中央的政治指导加强复不悖于秘密党的组织原则，中央各部各委的分工应努力于理论上、原则上、工作方法上的加深切实而不在事务的分立。

九、为使中央工作能在秘密状态中得以进行无阻，必须切守下列的原则：

1. 中央每次开会必须保留一二人在外。

2. 每次开会时间必须经济。

3. 中央工作人员须少而精。

4. 中央机关必须职业化，必须相互秘密。

十、中央应以全力建立全国重要区域的交通网。

十一、全国预算应以重要产业区域党务宣传工作、交通工作为主要开支部分，中央人员机关费用不得超过全预算额十分之一。

十二、中央技术工作要力求合于保存秘密，党存在的条件并须计算作每一工作真能有益于各级党部而□拘形式而不切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四号

——关于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各级党部：

六次大会给党目前中心任务是争取与积聚广大群众势力，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为要完成此任务，要求党根本改变过去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与方式，因此大会通过一宣传工作决议，详细指出关于此项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当此革命转变关头，广大群众对于反动统治日益不满，日益革命化，城市罢工争斗和反帝运动日见复兴，农村争斗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另面国民党虚伪的民族改良主义，汪精卫、陈公博派，谭平山、邓演达的第三党，以及上海七大工会改良主义的领袖们，莫不加紧其各色各样的蒙蔽群众意识，阻止群众革命化，并企图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于工人阶级之中。在这样情形之下，很明显的要求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高高的举起自己的旗帜，无限制的加紧与扩大自己的政治宣传，同时加紧日常争斗的鼓动，去发动与组织各种各色的部分争斗，普遍的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肃清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改良派及一切叛徒在群众所散布的一切幻想与影响，使工农兵及广大的城市贫苦群众都团结到本党的周围。因此各级党部务必十分注

意加紧扩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加紧日常部分争斗的鼓动工作，很迅速的反对国民党各派之虚伪的反革命的宣传，而揭破其假面具与骗术。只有如此才能完成目前的中心任务而催促新的革命高潮之迅速到来。

为根本改变过去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与方式，首先须指出过去所犯之缺点和错误：

1. 日常争斗实际问题的鼓动与政治路线不相联系。如在日常争斗中，回避宣传党的根本政策和政治口号，以致日常的鼓动与政治宣传划分为二，不发生相当的联系。政治宣传的形式至多止于发宣言散传单，不知在日常实际争斗中引导群众去认识本党政策和提高其政治意识，而只知凭空去做政治宣传，以致使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深入群众并不能取得群众。

2. 宣传鼓动混淆起来，没有中心的鼓动口号。政治宣传与日常鼓动划分为二而不发生联系固然是错误，同时使鼓动与宣传完全混淆起来，以致每一争斗到来不知提出鼓动的中心口号去发动群众争斗而并行的提出一列政治的宣传口号，这也是错误的。须知鼓动的口号是临时的具体的，鼓动口号是发动群众争斗的动力与目标，一个鼓动口号出去便要能发动群众到一个具体的争斗目标上来；若是临时的鼓动口号与经常的政治宣传口号完全混淆起来，便容易使群众认不清目前争斗的目标，而迟疑或降低其立即争斗的情绪。

3. 宣传与鼓动对立起来，甚至降低政治路线去迁就日常争斗的鼓动口号。部分的要求应当隶属于终极的目标，这是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与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之一。假若政治宣传与日常鼓动对立起来，或降低政治路线去迁就临时的鼓动，甚至以为降低自已的政治口号于敌党

的水平之下，由此可与敌党争取群众，结果一定要驱使群众于敌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而自己丧失一切。这样将不是一种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

4. 不了解具体情状和群众情绪的转变而转变鼓动的口号。无论在一个工厂里或一个农村里，争斗的情状和群众的情绪是时常转变的，假若不能瞄准这种转变而转变鼓动的口号（或是转变得不正确或是转变得太迟缓），结果必致使这一争斗流产或失败。一个争斗（无论小的大的）的能否发展扩大以至于胜利，与鼓动口号之正确的运用与转变有直接的关系。要在转变中特别的显出党的领导作用，同志们须特别在这种转变中去学习与获得领导作用。

5. 反应敌党的宣传非常迟缓，甚至忽视敌党的宣传。

6. 过去因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强迫罢工、个人恐怖等错误，常常用“强迫”、“命令”去代替宣传鼓动的工作，以致造成党与群众对立的危险状况，不知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取得群众。只有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命令”的关系，共产党必须坚决肃清这种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传染病，才能真正取得千百万群众。

7. 自有党以来，没有建立起经常的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前一切文字、刊物、传单、口头等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的无常的，而且是偏于从上而下，没有深入群众的。所以现在党的主要缺点之一，不仅是没有在组织上去巩固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而且在党对于群众的政治影响并没有深入和普遍，现在就是万分的要求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之深入和普遍。

8. 党的根本缺点在理论的和政治的水平线太低，太幼稚，不能及时的正确的了解环境与策略的转变，不能及时的改进其

领导力量的本质以及在群众中的指导工作方法。过去宣传鼓动工作之所以异常薄弱与不长进，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要改正以上种种缺点，完成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首先就要求提高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

因此，中央对于目前宣传鼓动工作方针，按照六次大会决议采取下列决定：

关于党内的：

1. 从上至下（从中央以至支部）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并强健各级党部的宣传机关（上级党部设宣传部，下级党部设宣传科或宣传干事）。

2. 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发展政策和理论的讨论，上级党部须经常的注意指导下级党部及同志的这种讨论（中央及省委有专供党内讨论的出版物及上级党部的巡视员特别注意于政策理论的指导等）。

3. 建立党的理论的中心，改《布尔塞维克》为中央理论机关报。

4. 有计划的编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小册子等。

5. 必要时，斟酌情形，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

6. 使支部成为党内以及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使支部日常工作的讨论与政治的理论的讨论发生联系，使支部的每个同志都善于在群众中作宣传鼓动工作，善于提出发动和领导争斗的口号。

7. 上级党部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须相当参加所在地工厂支部的会议与讨论，随时改进宣传鼓动工作的质量与方法。

关于一般政治的与文化的：

1. 创立中央日报及某几个大城市的（如广东、武汉、天津等）地方小日报，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及加强对于敌党的政治反应之速度。目前尤其特别注意于揭破民族资产阶级各派（蒋派、汪陈派、第三党等）的反革命假面具，加紧宣传党的政纲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统治之必要，加紧反军阀、反帝、抗租、抗税、反白色恐怖及争取一切民众运动之自由的鼓动与宣传。

2. 在各大城市发展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小刊物，驱逐民族资产阶级各派（蒋派、汪陈派、第三党等）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小商人等）中的影响。

3. 用种种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有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

关于工运的：

1. 加紧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认识，无限制的发展党在本阶级中的政治影响，消灭一切敌人的影响，取得最大多数的主要生产部门的群众。

2. 集中火线攻击正在企图抬头的改良主义（如上海七大工会的领袖们）和国民党的欺骗与压迫，最后的肃清对于国民党的残余幻想。

3. 建立工厂小报（他的性质、作用和内容，中宣将有详细解释，并将拟一“模范的工厂小报”发于各地）。

4. 改良我们领导的工会之机关报。

5. 加紧日常部分争斗的鼓动。

6. 加紧工会（我们领导的）中的宣传工作，并吸引工人活动分子来参加此项工作。

7. 工会对于活动分子，必要时亦可办短期训练班。

8. 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夜校。

关于农村及苏维埃区域的：

1. 更进一步的扩大与深入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消灭地主阶级，武装暴动推翻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宣传。

2. 巩固农民对于工农联合和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观念。

3. 提高乡村无产阶级（雇农）的阶级意识。

4. 宣传土地国有的口号，批评小资产阶级平产主义（虽然在行动上帮助他们）的幻想，解释只有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农民才能得到最后解放。

5.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扩大帮助红军的宣传。

6. 无情的打破农村一切封建宗法反动的思想，尤其在苏维埃区域。

7. 农民画报与壁报，农协须注意经常的宣传工作。

8. 苏维埃区域尤其要注意多做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如代表大会，群众大会，政治讲演，学校，训练班，报纸等）。

9. 目前特别加紧秋收斗争的鼓动。

10. 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

关于反帝、反军阀及兵士的：

1. 加紧反帝鼓动。向广大群众解释“只有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只有打倒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真正统一中国，获得和平”、“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存在，中国永远得不到统一与和平”。应在一切反帝争斗之前，向广大群众高举本党的旗帜——“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没收外国一切企业和银行”、“驱逐一切驻华海陆军”、“民众

自动手收回一切租界及占领地”、“民众自动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去揭破国民党各派民族改良主义的假面具。

2. 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不停的向广大群众说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存在，军阀战争的灾祸永远不得止息，只有准备胜利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才能永远肃清军阀战争的灾祸。

3. 加紧对于兵士群众的鼓动与宣传。深入本党政治影响于兵士群众，不停的宣传“改良兵士生活、发欠加饷、反抗阶级服从的军事纪律，给土地和工作予退伍兵士”及“只有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兵士才能开始走上解放的道路。”

因此，在组织上中央采取下列决定，以期各级党部迅速改进与加紧扩大宣传鼓动工作：

1. 建立与健强中央宣传部的组织。

2. 各省委应立即建立宣传部，大的省委如江苏、广东等，至少要选择二个以上有相当理论经验的同志经常担任宣传部的工作。

3. 省委以下的党部如县委、市委、区委等皆应迅速设立宣传科，支部设宣传干事，经常有一人以上担任宣传工作。

4. 支部——尤其是工厂支部应立即指定一个负责同志担任经常的宣传指导工作。在支部中还缺乏能够担负此工作的人才时，上级党部应立即办一短期训练班，以养成此项人才。

5. 上级党部应直接的密切的指导与帮助工厂支部的宣传鼓动工作之建立。

6. 在本党领导下的工会农协皆应迅速设立宣传机关，扩大与加紧此项工作。

7. 每个省委接到此通告后，应立即提出讨论，并根据过去经验与现在需要，作一切实的宣传计划，寄交中央，并将过去宣传工作状况详细报告，是为至要。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

江西省委：

关于四军的活动范围，中央历次决定须在赣西和湘南，往赣南实为死路。最近中央详加讨论仍然没有变更前议。而兄处始终不注意中央的决议要调往赣南，实为严重错误，如已通知四军望即迅予改正。至于四军调动，中央曾付权于湘省委，在中央未改变以前，兄处无权决定四军行动，只能向中央提出意见。对四军策略，中央最近有信致朱毛[1]，将分由湘赣两省委转去，此地不赘述，除另电外。特此通知。

中　央

十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毛泽东。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工作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决定）

Ⅰ．湖南工农斗争的总形势

（一）湖南工农暴动的浪潮继广州暴动而失败

本党六次大会，指出自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了。湖南工农暴动的浪潮，在唐[1]系军阀与西征军混战的期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是一个孤立的局面，结果便继广州暴动而失败。当时反动势力的各派（湘、桂、唐系军阀）为要镇压湘东湘南的暴动，暂时联合一致的向工农及共产党进攻，工农的斗争遇着如此强大的敌人的袭击，遂遭受莫大的失败，形成一时的崩溃的退守现象。

（二）工农革命的要求与革命的情绪并未减低

湖南工农的斗争，虽然经过这样严重的失败，但是群众一般的革命要求与革命情绪并未减低，已成为“潜伏待发”的局面，酝酿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湘东湘南的游击战争始终没有停止（如耒阳、资兴、平江、浏阳），湘西亦复如此（常德、石门……），兵士群众摇动崩溃的速度，比较任何省份都要明显（如独立第五师的“背叛”），自发的工人经济斗争（如株萍路工人的闹饷驱刘运动，醴陵人力车夫的经济罢

工），有活跃的现象，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日渐减低甚至于消灭，这些都是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象征。

（三）党对于这些高潮的象征不宜有过分的估量

湖南的城市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至今没有恢复起来，“五三”以来之反帝运动，在湖南完全没有表现，党更没有注意。农村的游击战争还多是单纯的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参加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并且是无组织的散漫状态。继续不断的兵士“背叛”完全是自发的行动，并没有经过党的组织，也不是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行动。总之，工农兵士的斗争，在目前还没有适当的配合，群众的革命的组织力量异常薄弱，元气尚未完全恢复，目前反革命的力量还超过工农。

（四）现在的局势很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

现在湘系军阀，完全屈服于桂系之下，封建买办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必然使国民党在湖南的政权，更加显露其反动的凶恶面目，对群众的压迫、剥削与屠杀日益剧烈，因此更加增高群众的愤怒，使群众更趋于革命化。另一方面，湘桂两系在湖南的冲突，仍旧是继续发展，冲突的实质是蒋[2]桂的战争，因此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欺骗的宣传，在湖南必然发展。反动势力在湖南的冲突，将日益剧烈，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更加走上动摇崩溃的道路。这种局势很明显的是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

Ⅱ. 党在湖南工作的主要路线

（五）武装暴动还只是宣传的口号

六次大会指出目前全国的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在湖南目前亦不是高潮的时期，因此必须立即转变以前直接行动的武装暴动的口号为宣传口号。这在战术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将宣传的口号与行动的口号相混合，那是危险的，甚至于有致命之伤的，也和过早或过晚的暴动一样的危险。

（六）湖南全省还是暴动的前途

“将来革命的新高潮必然到来，更加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湖南在目前虽然不是暴动的时期，但暴动的前途仍旧存在，只有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才能促进新的高潮的到来。这是推翻国民党在湖南的政权，建立湖南全省苏维埃政权的唯一出路。

（七）团结广大的群众于党的四围

现在湖南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广大的群众，将他们团结在党的四围。必须有计划的艰苦的长期工作，一切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以争取群众为前提。新的革命高潮的动力，完全建筑在群众的斗争与组织力量上面，没有强大的群众组织，没有战胜反革命势力的革命力量，绝对不能保障在新的高潮中革命彻底的胜利。湖南的党应当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争取群众的决

议，这是党目前工作的总路线。

（八）打破依赖红军的观点，艰苦的加紧对群众的组织教育工作

湖南党内特别是下级党部，还保留着极浓厚的依赖军事力量的投机观念，如安源及湘南党部的等待红军。这显然是不耐心去做群众的组织教育工作，而幻想以红军力量去发动群众，并在群众中造成“不自己动手而等待红军”的心理。党必须坚决的与这种倾向奋斗，打破对红军的依赖观念，积极的耐心去做群众的工作。

（九）纠正单独完成湘赣边境割据局面的幻想

从群众及党的基础以及红军的力量来说，沿湘赣边境从平江以至湘南，事实上成为湘赣特别是湖南总暴动布置的枢纽，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这一区域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建立，必然与全省总暴动联系在一块，至少要在全省总暴动的前夜，不然则是一种幻想。省委过去有此一幻想，欲亟于完成这一区域的“割据”，因而在工作的布置上也就偏重这一区域，不自觉的忽略了其他区域，以及城市工作……等等，甚至不自觉的以红军为中心。这是严重的错误，应当深刻的断然的纠正过来。

（十）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坚强群众的革命意识

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宣传，足以妨害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目前在湖南一切反动派宣传共产党专门杀人放火，以及改良的欺骗的宣传确实能蒙蔽一部分的群众。因此党必须扩大自己的政治宣传，指出资产阶级的欺骗与反动性，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肃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使阶级对垒的

形势更加明显而剧烈。如此才能团结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的四围，并加强组织与斗争的力量。

（十一）工农兵士运动的平衡发展与适当配合，并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与无配合，使资产阶级豪绅军阀的反动更容易执行自己的任务。过去湘南湘东的农民暴动达到从来未有的高潮，但是城市工作与工人斗争并未能与农民暴动发生密切的联系与配合，兵士的自发暴动亦没有联系，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湖南党必须促进工农兵士运动的平衡发展，并且在斗争的布置要注意到配合，特别要加强无产阶级在一切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十二）建立党的工作基础是革命高潮到来的先决条件

过去湖南一切斗争的失败，固然有客观上的许多困难，然而主要的原因，在于党的组织力量太薄弱。工人党员的成分非常之少，使农民的意识影响到党的指导。因此目前建立党的工人基础，吸收新的积极的工人入党，是准备革命高潮的中心任务。

Ⅲ. 各种工作的具体方针

A. 党 的 组 织

（十三）恢复被破坏的各级组织，积极的注意新的发展

湖南的党部不断的被敌人摧残，党必须利用各种可能，努

力去恢复已被破坏的各级组织，特别是粤汉、株萍、水口山、锡矿山、炭塘子等大生产大工厂中及湘中各县（湘乡、宝庆、益阳、宁乡、湘阴、岳州）党的组织，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但是组织的基础，应当建筑在新的发展上面，党必须不断的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十四）继续省委过去的组织路线，努力保证指导机关的工人化

省委三月来的组织路线是非常正确，现在必须继续奋斗，引进积极工人同志，加入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保证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省委必须深入群众，从多方面的新的工人同志中找出积极的分子，纠正以前偏重安源的缺点。

（十五）纠正组织上的命令主义，发展党内的讨论

组织上的命令主义，在湖南党内有很深的余毒。指导机关对于党员群众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党内的讨论异常缩小，这是组织上最大的缺点。省委必须坚决的与组织上的命令主义奋斗，在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讨论，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问题，以增进同志对党的兴趣，并实际参加党的生活，是强固党的重要条件。

（十六）健全地方党部的组织，加强省委特委对地方党部的指导

过去上级指导机关的组织，都比较健全，地方党部除少数县份外，均不健全，以后必须设法健全地方党部的组织，吸收当地各种重要区域的同志参加地方党部的指导机关，特别注意引进当地的工人同志。省委特委继续以前的巡视制度，规定经

常的巡视员到各地工作，并注意找出新的积极的工人同志担任巡视工作。巡视员必须深入党的群众中去，极力避免巡视员的机关化与官僚化。

（十七）建设发展并强固支部的组织，是巩固党的基本任务

支部的组织异常不健全，甚至有许多地方仅有同志而无支部的组织，或者只有指导机关而无下级党部。现在巩固党的基本任务，是建设发展并强固支部的注意，特别要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六次大会及党的各种决议应当经过支部会议的讨论而传达于一般同志，支部要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每个同志必须是党的一个组织员和宣传员。

（十八）自首政策在数量上不能削弱党的组织，在质量上反而可以加强党的力量

反革命的自首政策，确实在短期间使党的组织动摇，是敌人破坏本党最有效力的方法，但是客观上清洗一部分动摇的犹疑的分子出党。要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省委必须号召全党同志，发展巩固新的基础，同时以群众的力量对付叛党的自首分子——他们不仅是本党的叛徒，而且是工人阶级公开的敌人。

B. 职 工 运 动

（十九）继续省委职工运动工作路线，努力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并使群众的组织与斗争并进

省委过去坚决的反对不组织工人，不发动日常斗争，强迫

群众暴动策略是绝对的正确。株萍路工人的斗争，是在这种正确的路线上面做起来的。省委必须继续以前的路线，领导工人的日常生活斗争，在斗争中要团结群众，注意组织力量与斗争的同时并进。

（二十）要有耐心的长期的艰苦工作，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党的方面来

在极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杀死了无数的工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一切的工厂（如水口山、第一纱厂）规定了极严格的条件，禁止活动的工人入厂与一切的斗争，使工人阶级受着极严重的挫折，工人阶级的斗争比农民运动要减低许多，并且加倍的困难，这是湖南的工人斗争非常困难的地方。党必须有耐心的有计划的难艰的进行此项工作，由宣传煽动的方法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并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组织革命工会，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党的方面来，如此才能促进湖南的新的革命高潮，并保证无产阶级在农民兵士中的领导作用。

（二十一）职工运动的中心工作应当建筑在交通工人、矿工与重要城市上面

湖南的职工运动，应当以交通工人——粤汉株萍铁路，汽车工人，海员——矿工——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炭塘子——为中心工作。同时对于许多重要城市的工作——长沙、衡阳、湘潭、岳州、常德、宝庆、澧县——必须有计划恢复起来，对于这些工作应当艰难的去开始，首先要设法打入群众中去，求速效是无益的。

（二十二）恢复革命工会，组织工人群众于革命工会的四围

党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努力，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面，努力的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职工会的工作。党应当立即分派许多得力的活动同志，到重要产业工人区域工作。

（二十三）反对阶级合作的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

党及革命的职工会，应当站在拥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观点上，反对一切阶级合作的形式与倾向，反对欺骗工人的“工人参加提高生产主张”——如安源萍矿工人监督委员会。党过去在安源没有能有决心的反对此种欺骗工人的组织，是绝大的错误，同时对于反动派所宣传的一切阶级合作的思想——“全民利益”、“全国利益”和“劳资调和”等，这些都是欺骗工人阶级的宣传。为执行上列任务，应当用湖南全省总工会的名义，出版一种周刊，努力肃清一切阶级合作的思想与对国民党的幻想，并给群众指出政治上的出路。

（二十四）健全职委的组织

省委必须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定专人负责，经济完全独立，并由党指定有能力的同志，担任职工运动工作，对于职运同志党不能任意调动并兼任党的工作。

C. 农民运动

（二十五）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并且散漫无组织

几月许多县份的农民斗争与游击战争，证明农民斗争，还

是走向高潮，但是发展的地带，则遍于湘赣边界各县。政治中心的湘中各县（长沙、湘潭、湘阴、益阳、岳州、宝庆、湘乡……）的农民斗争，尚未发动，豪绅地主的武装日益扩充，使农民斗争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各县的农民斗争还是散漫而缺乏组织，彼此之间亦无好的联系。

（二十六）应尽量扩大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

湖南的农村斗争，在过去大半是单纯的军事的游击战争。在农民暴动极高潮的时候（二月间），农民协会的组织亦没有发展，甚至许多地方从马变后即已停止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农民协会在湖南农民中是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有很深的影响。党应立即开始在各县恢复农协的组织使之更加扩大而巩固，团结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十七）农民协会应当是广大的群众组织，纠正党对农协的包办与委派制度

“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的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但是农协的基础与指导机关必须建筑在贫农身上，党对于农协应当起核心作用，保证农协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纠正以前的委派与包办制度。农村的一切斗争，应当经过农协的组织去发动，并在斗争中促进农协的组织。

（二十八）游击战仍旧是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但必须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纠正无目的的杀烧倾向

湖南农村的斗争已到极剧烈的阶段，各种日常的小的斗

争，大都变为武装冲突。为要保证土地革命的发展，游击战争仍旧是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但是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的行动，必须出自于群众的要求，必须在农协的组织与领导之下，纠正过去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的错误。另一方面，党必须努力纠正以前游击战争中所发现的大烧大杀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是代表游民无产阶级的意识，妨害党在一般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并且吓跑广大的群众。

（二十九）领导农民的日常经济斗争，不要放过任何问题与时机

过去各级党部，对于农民日常的经济斗争，很少注意领导，这是极大的错误，亦即不能取得农民群众、组织农民群众的主要原因。以后各级党部，必须拿住各种时机（如秋收与年关），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抗粮、抗债的日常斗争起一直到准备并领导武装暴动为止。

（三十）农村的暴动并须与无产阶级的城市斗争相联系起来

农民的斗争与游击战争会变为农村暴动，但是这种暴动必须是一般群众的要求，是要建筑在广大农民群众的上面，并且要在当地的反动势力确实动摇崩溃的时候才能举行，纠正过去党命令群众与单纯的少数武装力量的军事冒险——少数党员的拼命主义。另一方面必须与城市工人有密切的联系，必须保证农村暴动的胜利。暴动胜利之后，必须立即实现农民的一切要求，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尤其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于邻近区域。

（三十一）组织红军是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

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建设红军。湖南的红军只有从游击战争中才能产生出来。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湖南全省如果没有健全有力能与敌人作战的红军，是非常难胜利的。因此，在游击战争中必须渐次吸收忠实勇敢的青年，特别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队中来，使之能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

（三十二）正确的执行六次大会关于农运的战术路线，扩大土地政纲的宣传

六次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战术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及半地主的阶级斗争。"湖南党必须正确的执行这样的路线。对于六次大会决定的土地政纲要普遍在农民中宣传，使得到普遍农民的了解。

（三十三）健全党在农村中的组织

湖南的农村的党的组织，许多地方都不健全，不能起"核心"作用。党必须在农村中吸收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入党，并须建立和巩固农村支部的组织，每一支部须训练若干干部为党及群众的中坚。为执行上列的任务，党应当派许多得力的工人同志到农村中工作。

D. 兵士运动

（三十四）破坏敌人军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湖南军队的动摇崩溃比较任何省份都明显，省委在过去没有能有计划的进行工作，是极大的错误。为要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破坏敌军的工作，亦是本党的主要任务。

（三十五）兵士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兵士的阶级觉悟，吸收兵士到革命的方面来，兵变仅仅是斗争的一种

湖南兵士的主要成分，多数是脱离生产不久的土著工农。党在兵士运动中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兵士的组织，提高兵士的阶级觉悟，引起兵士对军官斗争与冲突，准备新的革命潮流到来。兵士群众多数站到革命方面来，促进敌军的根本瓦解。兵变仅仅是一种斗争的方式，过去将兵变当作兵士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绝对的错误。

（三十六）兵士运动必须与一般工农的斗争相联结，一切的口号须与总的任务相联结

兵士运动应当是工农斗争的一部分工作，必须与工农斗争有亲密的联系，并且只有在工农革命高潮的时候，兵士群众更容易转向到革命的方面来。另一方面，党不仅应当提出兵士一般的要求口号，而且要使这些口号与总的任务相联系，使党在政治上更容易夺取敌人的军队。

（三十七）建立兵营支部，强健军委兵委组织

为执行以上的任务，党必须派送得力工农同志加入敌人军队中工作，并清查已经加入军队的同志，建立兵营支部。省委须有军委组织，指定专人负责，按照清乡区域，分区成立兵委。军委并须经常的分散煽动兵士的传单，最好能出版一定期刊物。

（三十八）裁兵时期是煽动兵士的最好机会

现在是裁兵士的时期，党应当煽动兵士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指出只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才有出路。对于围攻朱毛及彭[3]部的军队应当极力煽动兵变，倒戈到红军中去。

E. 反帝反军阀斗争

（三十九）注意反帝运动，并使之与一般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

“五三”惨案而后，全国范围内反帝运动有复兴之势，但在湖南因为党完全没有注意，所以寂然无闻。反帝运动当然要以工农阶级为中心领导者才能起来，但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可以互相推动，互相影响，因此要注意使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特别是与一般城市工作联系起来。

（四十）反对苛捐杂税等是推进小资产阶级的工作

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战争以及军阀战争所加于人民的一切剥削，对于小资产阶级特别需要，党应当领导发动这类斗争以推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

（四十一）学生运动仍有相当的重要

学生群众对反帝反军阀和争自由的斗争，仍有重要作用. 湖南学生群众在历史上比较其他各省更有革命性，领导他们加入这种斗争是很有可能的。党应当指导，并帮助 C. Y. 恢复学生群众中的工作。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唐生智。
〔2〕指蒋介石。
〔3〕指朱德、毛泽东、彭德怀。

PDG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毛　泽　东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1]桂冯[2]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

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方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

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

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

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才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才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才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才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才——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冯玉祥。

PDG

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选）*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边界特委是最近四个月才产生的，在此短短的期间内，虽然曾领导工农红军作过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及给旧社会以伟大的破坏等工作。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攸县的党到现在还未建立。其他各县党的影响亦只及各该县之大部或一部，并未建立坚实的中心区域及普遍发展到四处的广大群众中去。故建立攸县的党和各县的坚实中心区域，及普遍建立各县党的基础，同样是边界党部今后的重要责任。

（一）过去党的错误

1. 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遗毒太深，依靠军队而不领导群众做独立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2. 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向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

---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的第二部分。

PDG

其他各县，如宁、酃、莲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作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组织上很严重的错误。

3. 过去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领导及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真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错误。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紧急会议中虽然很严重的指出了这种错误，特委经常有三个常委驻会指示工作，但各科及秘书等机关，因人才缺乏之故，仍然还是无法建立，加之特委工作人员病者很多。政治时生变化，各县委与特委的关系不能密切，故特委本身反对各级总部的指示，仍然还是没有尽量执行紧急会议之决定。

4. 指导机关，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对于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缺乏注意。

5. 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6. 过去党没有注意基本组织——支部。

7. 过去党的工作方式不对，党的一切问题应该集权到常委会，组织科、宣传科……等不过是常委会的技术机关。但是边界的党，不但没有集权到常委会，甚至连组织科都没有，而仅是书记一人的独裁。紧急会议后，特委本身及永新县委比较好点（由常委会决定各项工作），但特委以下之各级党部，仍然还是犯同样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正。

8.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员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在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

9. 过去工作，上级与下级隔开，上级对下级也没有很好

的巡视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

10. 过去党太少注意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

11. 过去特委只注意军事范围的布置，如宁冈、永新两县工作。没有顾及全部，以致成为军队附属品，如军队打下某县，就注意某县的工作，军队没有到某县，某县的工作就不注意了。

12. 过去党太不注意团的工作，甚至有取消团的倾向。

（二）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

1. 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领导。

2. 特委县委都需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

3. 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提拔工农分子，特别要注意教育的意义。

4. 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各科都是技术机关。

5. 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6. 党应该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

7. 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

8. 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

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基础。

9. 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同时要特别注意城市支部工作，并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在乡村中的党员，须选出先进分子，加以特别训练，以培养成党的中坚。

10. 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应当极力注意秘密工作，反对依靠军事政治势力去组织党，应在敌人范围内秘密组织党，反对逃跑和“打埋伏”。

11. 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攸县县委应马上建设，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

12. “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三）各县工作问题

各县工作详细计划由特委负责讨论。

（四）农村斗争问题

1. 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的错误。

2. 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并没有施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莲花、茶陵比较好点）。

3. 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大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4.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5. 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骨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五）工人运动问题

1. 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

2.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工人，我们党须用大的力量去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由零碎经济斗争进而武装暴动，纠正过去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

3. 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

（六）士兵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所以主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必须将工农兵三种力量很好配合起来，然后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尚未实现，故军阀豪绅买办阶级得以运用封建关系愚弄工农雇用之。因为保护

他们的工具，故现在的士兵有大多数尚安心在敌对阶级指挥之下过饥寒交迫（敌军有几年未发过饷的）的生活。但在国民党未叛变之前，国民革命军相当的都受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宣传。至于事变以后，投入军营的（农协或工会的办事人）当然更有觉悟。这些觉悟分子在反动军官高压防范的严密下，而又苦于找不着领导者，故不敢轻易在反动军营中作宣传组织工作，实则他们的革命情绪，反水志愿是很丰富的，这可以证明在客观上的士兵运动的可能性，实在已经具备了。而且此运动的成功，在湖南、广东等省，已有事实可据。现在反动势力的屏障，完全是靠几百万尚未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我们士兵运动做的好，则反动统治很迅速的便要倒台，反之，我们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门做农民工作，则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

边界各级党部向来少注意士兵工作，而只顾农民运动（有些党部还仅只有农民工作）。须知我们过去许多失败的经验，主要原因是没有士兵运动参加暴动（去年广东的年关暴动，湖南屡次的暴动失败……）。现在如再不注意，则将来的失败便有预言。很明显的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力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级党部必须努力进行士兵运动，莫忘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要将工农兵三种势力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

1. 士兵运动此时与工农运动同样重要，各县应有计划有组织的选派大批工农同志去反动军队内当兵、当伕、当伙头……在敌兵内部起作用。尤其是永新、茶陵、遂川等大部敌兵汇集的县份，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2. 加紧对敌兵的宣传工作。

3. 派人到敌人内部去组织党，不要组织士兵委员会，以

免组织复杂而易于惹起敌军官之发觉。

4. 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作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

5. 造谣、恐怖煽动，以动摇敌军人心，由动摇而瓦解。

（七）宣传问题

1.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

2. 特委县委宣传科，应设法使之健全，每周标语宣传大纲，都须按时发出，每日壁报亦应发给各级党部缮写张贴。各游击队出发游击，都须有很好的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宣传队、个别宣传）。

3. 以后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工作报告，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阅。特委、县委每周应有宣传大纲发给各下级党部。

4.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应极力分析军阀内部的冲突，注意反对军阀混战的宣传工作，同时应极力宣传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说明军阀混战其结果必被工农暴动所消灭。

5. 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

6. 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

7. 此时我们应对同志和群众，详细分析统治阶级与政治上经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

动的势力，打破恢复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门依靠军队的等待观点（自然我们不否认军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

（八）训练问题

1. 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2. 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教材，计划每周训练工作。

3. 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才。

4. 各级党部的会议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训练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才。

5. 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6. 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做认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

（九）苏维埃问题

1. 过去苏维埃政治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协会的变形，所以它的工作，是秘书长和主席包办，甚至有些政府还是富农当权，成为知事衙门。这些所谓苏维埃政府，应一律改组。

2. 由特委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应一律照组织法组织之。

3. 苏维埃必须以工人贫农革命兵士为主要力量，反对富农秘书长把持，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4. 湘赣边界政府重新彻底改造。

5. 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

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十）土地问题。接受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通告，交特委讨论，作最后决定。

（十一）C.Y. 问题

1. 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组织。过去边界各级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级党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取消团。

2. 目前边界各县应当是建设团的工作，但是团的本身力量薄弱，很难单独担负起这个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划出一部分力量，经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的建设团的支部，扩大团的组织，健全团的指导机关。

3. 团的经费应该独立，以便团在工作上能够措置如意，避免团在经费上依赖党的观念。

4. 注意团的工作，是各级党部应有的责任。今后各级党部向上级报告中，必须有“团工作”的一项。上级巡视员在检查各级工作中，亦须留心团的工作。

5. 各级党部、团部多不明了党与团的关系，以致发生各干各的倾向。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刊印。

论口号的转变*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刘 少 奇

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如果争斗的形势已经改变，口号不及时地随之而改变，群众即没有一致的目标，将使争斗不能继续前进，无力而至于溃散。不仅全国革命争斗的口号是如此，即在一个工厂或乡村中小争斗的口号亦是如此。

我们每每因不能明确观察当时争斗的形势转变并据以转变我们的口号，所以发生了许多错误。大之如资产阶级叛变后代表我们许多错误政策的口号，小之如工厂及农村中许多或左或右的错误口号，都是因我们没有依争斗的形势来恰如其时地转变口号，发动争斗，以致脱离群众或使争斗紊乱、无力而溃散。

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在群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一期。

众中是无力的，不起作用的，根本不能号召群众的。

我们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应该采取许多真实的材料，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绝不可单凭某一部分群众一时特殊的表示及几个领袖一时激愤或悲观的报告，就认定全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是如此，而规定或转变我们的口号。过去我们的许多错误，大半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的缘故。

口号有不同的性质。有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最后就变成指令。凡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总是要经过从宣传到鼓动到行动的步骤。例如“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打倒帝国主义”等，又如某些工厂中的“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八小时工作”等。这些口号从普遍的宣传解释，使群众了解接受，到造成实行这些口号的坚定而忠实的执行者和群众基础，其性质还是宣传的性质。当实现这些口号的时机已经成熟，应争取广大的群众到这些口号之下并组织他们预备去实现这些口号，造成实现这些口号的群众力量时，这些口号就变成鼓动的性质。在群众力量的准备已经充分，可以推动群众运用实力直接行动去实现这些口号时，这些口号就变成了行动的口号。最后调集群众，分配任务，配置各种力量，坚决彻底地去执行这些口号，这些口号就变成当时的实际指令了。

一个重要的口号，总是要经过这些转变，经过在实际争斗中对于群众的宣传与训练，才能变成行动的口号，使群众自愿地为实现这个口号来争斗。过去我们分不清口号的性质，将宣传鼓动的口号与行动的口号及指令混淆，如是就发生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去争斗、去暴动、去执行这些口号的现象；或者群众已经接受这些口号，已经直接用自己的行动实际上执行这些口

号，而我们却不将这些口号变成行动的口号及指令去领导群众，致使群众的争斗紊乱而至溃散。

在每个工厂、作坊及乡村群众小的争斗中，口号的应用也是如此。我们要懂得当时革命的总的战术与策略，要明确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与心理，要充分搜求群众普遍的及特殊的痛苦之所在，而按期规定这个工厂、作坊及乡村的要求大纲或行动大纲，就是将群众的痛苦与要求变成简明的口号，作经常普遍的宣传鼓动，使群众渐渐在这些口号之下团结起来，活跃起来。

我们要找机会来发动群众的争斗，来实现这些口号之某一部分或全部。我们要用极敏锐的眼和耳去搜求工厂及乡村中发生的临时问题，如打人骂人、开除人处罚人以及减少工资、延长工时、欠饷、勒索、逼债等，拿来讨论分析，根据行动大纲规定对每个临时问题的简明口号，到群众中宣传鼓动。固然不是每个临时问题都能发动群众争斗，但每个问题上都有我们的宣传鼓动为好。在群众最气愤、利害关系最大最普遍的问题上，会爆发群众的争斗，我们就要善于领导这种争斗，正确地运用及转变我们的口号，使争斗一直发展下去，使群众的争斗情绪发挥尽致。

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过早了，群众不能接受或产生惊疑，甚至将群众吓退。不可过迟，过迟了，群众的气势会低落，或群众自动干起来使行动不能一致而至紊乱。有时，甚至只有十分钟是转变旧口号及提出新口号的最好时机。

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有些行动口号适用的时间愈短就愈有效力。口号太多了，太长了，叫得不顺口，意思不明显，不切

合群众的要求和心理，叫得太久而至于厌烦，引不起注意，都不适合作为群众行动的口号。

各种小争斗中的口号之规定及转换，应努力使之一步一步地与当时总的口号——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相接近。

在群众退却的行动中，及时地转变我们的口号尤其必要，尤须特别慎重规定。它的目的是使群众不致气馁，不致溃散，保存群众的组织，指示群众的出路，激发下一次继续争斗的情绪和决心。

在争斗结束时，应该有争斗后的口号，提示在争斗后的中心任务，引导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完成这些中心任务，并激发继续争斗的情绪，准备下一次更广大深入的争斗，同时记取过去争斗的经验。

在群众的各种小争斗中，应该特别注意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提高群众对于我们各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的认识，指示群众争斗的最终目的，争取群众到我们各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之下来。这就是说，宣传的口号应该与行动的口号及群众目前的要求分开，但不是在群众的争斗中放弃我们各种主要政治经济口号的宣传。恰恰相反，在群众的争斗中，应该加紧宣传我们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去争取群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PDG

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

（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

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显然欲利用今年辛亥革命纪念日做一番大规模的宣传，以欺骗全国民众。他们不仅宣传辛亥革命事业已由他们完成，中国统一业已成功，他们还要宣传豪绅资产阶级专政之必要（而所谓训政时期开始），还要在广大民众之前玩弄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黄色改良主义等欺骗的宣传。因此本党的任务，就在乘此时机向全国民众揭破统治阶级国民党之假面具，消灭群众对国民党之一切残余幻想，提高群众之革命的政治意识，深切向群众解释只有准备胜利的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辛亥革命才能完成，中国才能独立与统一，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才有出路。因此，我们宣传的主要点如下：

民族资产阶级背叛辛亥革命

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开始，就表现出他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遂致革命受了挫折，于是怎样继续辛亥事业，成为往后革命运动之主题。彼时资产阶级中还有革命作用的一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他的本身找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一直到世界革命开始、俄国十月革

命成功、中国无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才使辛亥事业复兴起来。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之发展，的的确确使中国革命接近了最后胜利的前途——即中国独立统一的前途。可是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就是在这样的重要关头背叛革命、出卖革命，而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的联合战线来反对农民土地革命，屠杀彻底革命的先锋军——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战士，以致中国革命受了现在这样严重的失败。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配纪念辛亥革命，打倒背叛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辛亥革命的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借着国民党做工具，更残酷的统治现在的中国，所以辛亥革命的客观任务——如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建立真正独立统一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等——一个也没有完成。所以客观上的辛亥革命运动，仍要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不会中止而且也不会消沉。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辛亥革命，完成辛亥革命者只有工农！

往后的辛亥革命加多一个根本任务
——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成为反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所以往后的辛亥革命运动与以前的区别，就在于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地主之外还要加上反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一任务是新的

而且是根本的。只有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真正独立统一的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

国民党统治下绝对没有中国的独立

往日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叛变后的国民党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举出一年来各种背叛投降、勾结帝国主义的事实）。现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机关，这样的卖国政府，只有日益增加中国对于国际帝国主义的隶属性，只有日益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他所揭出的“条约”运动，就是要替帝国主义永久维持不平等条约（不过换一形式），他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摧残，就是要替帝国主义压灭中国的革命动力。绝对不要梦想卖国的国民政府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民党统治下，绝对没有中国的独立，只有在工农民主独裁制之下才能达到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国民党统治下绝对没有中国的统一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便一天也不会统一。各帝国主义各自在中国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国民党各派军阀各自勾结一帝国主义。这便是说明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统一中国的可能。所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才是中国统一之前提！

国民党统治下绝对没有自由

反革命的国民党现在完全成为反民权主义反政治自由的恶魔。表面用所谓三民主义来遮盖其阶级性，实际完全暴露其资产阶级专政的丑态——所谓训政时期。本来孙中山这些狡猾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老早就提出什么五权或党权来预先限制将来的民权，提出什么军政训政来预先否认民众的政治自由。现在反革命的南京政府正是厉行这种反民权主义反政治自由的白色恐怖政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制度。国民党的统治就是豪绅资产阶级的专政，与真正的民权主义和政治自由不能两立。以前的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的专制，往后的辛亥革命是推翻国民党的专制，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国民党存在便要继续辛亥以后的军阀战争

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互相之间以及每一阶级的各派之间，对于共同反对革命虽是一致，然决不会消灭他们互相间的利益冲突，反而只有不断的爆发武装战争。现在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完全与辛亥后各派军阀的地位没有两样，都各自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各自企图伸张其爪牙与势力。国民党存在，便必然要继续并扩大辛亥以后的混战状况，这已成为不用解说的真理。只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各派军阀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而获得和平，在国民党统治下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和平！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国民党各派军阀利用“革命战争”的名义来遮掩军阀战争！

国民党存在，苛捐杂税只有增加

国民党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自非常之需要牺牲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须计算国民党统治一年以来所增加捐税之种类与额数，便可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与任何军阀时代没有区别。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废除一切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

国民党是反土地革命的刽子手

国民党的叛逆，是正当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是正当中国革命的基本群众——农民为夺取地主阶级土地而猛烈参加革命的当头，所以革命发展到这一阶段，国民党就根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反革命党。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实际就是农民革命，要求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及驱逐帝国主义，只有土地革命彻底深入与扩大，中国这一革命才能达到成功。国民党就在这一革命深入的开始背叛了革命，出卖革命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所以国民党是中国农民的死敌，也就是国民革命的死敌！

无产阶级是辛亥革命唯一的完成者与领导者

资产阶级背叛土地革命，客观上更利于无产阶级取得农民——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因为不仅是大资产阶级叛变，就是自命为“左派”的小资产阶级上层（汪精卫派）也随着完全反革命，一九二七年的历史是铁一般的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领导者。

民族改良主义是帮助帝国主义进攻的工具

广州暴动是革命对于反革命的一个回答，同时也就是革命深入到苏维埃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革命的深入之前发抖，同时使他觉到单是白色恐怖不能消灭革命，于是企图采用民族改良主义来暂时和缓群众的革命化，尤其在济案后，这一企图是明显。他的具体形式的表露，在“朝”者如号召“修约”，在“野”者（汪精卫、陈公博派以及第三党）号召“改组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注重工农利益”、“阶级合作”以及所谓“民生主义”等等。

凡此等等无非是资产阶级企图消灭革命的另一方法，并且是帝国主义进攻的工具，因为帝国主义正需要在此遮掩之下来加紧其对于中国的统治。只有不停的在广大群众之前揭破此改良主义的反革命假面具，才能打破一部分落后群众对于反革命政党之幻想。

劳资合作是资本进攻的工具

反革命的国民党用种种方法帮助地主进攻农民，帮助资本家进攻工人。他于政治的压迫和白色恐怖的屠杀手段之外，又企图散布资产阶级的影响于工人运动中，用黄色改良主义的邪说和口号来蒙蔽工人阶级意识，如“阶级和平”、“劳资合作”、“强迫仲裁”、“分红制度”等等。这些邪说无非是资本进攻的利器，无非是企图在工人的血管中注射毒气。

三民主义现在成为反辛亥革命的旗帜

三民主义曾经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口号，现在完全变成为反辛亥革命的旗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好是代表不彻底的薄弱的狡猾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本性。中国资产阶级是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难产出来的，故一面与二者冲突（不彻底的革命性之来源），同时又与二者有密切的关系（彻底的反革命性之来源），所孙中山一开始号召革命，同时即预备了反革命的理论基础。他的民族主义原本是富强主义，与任何帝国主义可以妥协的；他的民权主义加上军政训政的限制，结果只是反民权的党权主义即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他的民生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防止社会革命的，他的平均地权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与中国共产党及国际无产阶级合作时代，提高了不少的革命性，蒋派汪派整个国民党背叛以后，就同着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消失其革命作用而成为反革命的旗帜。现在只有不停的在群众面前撕破这反革命旗帜，才能达到辛亥事业之最后的完成。

有国民党便没有民主共和

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的高贵口号，可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直到现在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所以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任务的最后完成只有推翻现在资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用豪绅资产阶级的党权来取消民权，用豪绅资产阶级的专制来取消民众的政治自由。所以很明显的证明：有国民党便没有民主共和。假若说“民主共

和"在袁世凯以至张作霖时代为假招牌，那么现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更是欺骗民众的假招牌。民主共和的真意义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众专政，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保障工农民众的自由。所以往后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便是要建立工农兵以及城市平民的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打倒国民党专制！打倒国民党党权！争取民权自由！建设真正民主共和的苏维埃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最低政纲是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

1.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2. 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3. 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4. 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5.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6.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7.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
8. 改良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9.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特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10. 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政府的主要口号，也就是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

十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央通告第五号*

——巡视条例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一、为什么要巡视？

为使上级党部之一切策略、工作计划和指导能正确的被下级党部（直至支部）接受和执行；为直接帮助下级党部确定正确的政治、组织、工作的路线和一切工作的方法；为彻底的改造党的组织。总之为使六次大会的各种决议能够彻底的传到下级党部以至每个同志的脑中，并且正确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上去。

二、中央、省委、县委、特委都须设专门巡视员。依目前的工作精神，中央须有巡视员五人以上，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六人以上，江西、河南、直隶、山东、浙江、四川四人，其他各省三人，至少二人，特委县委两人至四人。

三、巡视员之人选由派出之党部常委会议决定之，该党部之委员或非委员都可，最好由委员轮流充当。但必须是政治观念比较健全，一切工作和组织的路线比较正确而有相当实际工作经验，真能执行六次大会各种决议者。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

四、巡视员每次巡视期间不能过长，以免与派出他之党部之指导脱离联系。中央巡视员每次巡视期间限最多二个月，省委最多四十天，特委三个星期，县委两个星期。每一个巡视员在每一区域之巡视不能连续到二次以上。

五、巡视员非在非常时机并得到派出党部之许可，不能参加下级党部之委员会为委员。

六、巡视员到达巡视之区域，不仅要帮助这一区域最高党部确定全般的政治任务和各种工作路线、工作方法，以至于指导机关的日常工作方式都须加以注意，并且要选定这一区域内的重要的党部特别是工人区域和大的工人支部，会同当地指导机关之负责人亲去巡视。

七、巡视员达到一地，可以因工作之需要，经过当地指导机关召集各种会议。巡视员不仅可以召集各种会议，并且要参加各种机关的各种会议和各种工作的决定，很细心的去了解当地党部的实际情形和党员群众的意识，如此才能充实并正确自己的指导，而不致蹈于虚浮不切实的毛病。

八、巡视员要注意引进积极的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并指导帮助其工作。

九、巡视员在得到派出他之党部之委托和批准得改组巡视区域之最高党部。在巡视区域内，除开最高党部以外，巡视员有权改组以下各级党部，但须得最高党部之同意。但在巡视过程中，如发现当地指导机关被破坏，或因故完全不能尽其指导责任时，巡视员得一面着手改组新的指导机关，一面征求该党部上级指导机关之同意。关于工作人员之调动亦如上之手续。

十、巡视员在巡视区域内如发现党内纠纷时，须详细考察纠纷的原因加以批评。如经过批评仍不能解决，则提出解决的

意见，征求该党部上级指导机关的同意，予以解决。

十一、巡视员在出发前须在派出他之指导机关内，关于整个的政治任务、工作组织路线和出巡的具体任务经过详细的讨论。同时指导机关须供给巡视员以党内各种材料以便参考。

十二、巡视员出去巡视时须随时将工作情形报告派出他之党部，同时派出他之党部关于政治和工作的策略有新的决定时，亦须随时通知巡视员。

十三、巡视员对巡视区域内之政治、经济、社会及党务的各种材料须注意详细收集，于巡视结束后向派出他之党部作有系统的报告和讨论。

十四、各级党部巡视员为该级党部组织会议之当然出席者，同时可以参加该党部之各部会议。

十五、巡视员须附带的指导青年团工作，并考察青年团的情状报告上级团部。

中　央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策略与工作路线给陕西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陕西省委：

你们报告中，既没有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更没有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详细情形，关于各种运动，亦看不出一点材料。党的政治路线如何？策略如何？工作方法如何？更谈不上。在□□同志的口头报告也是一样。使中央无法指导，实在是莫大的缺点与错误。现在先就你们报告中的几个技术问题，作一具体答复，再说到陕西党的目前工作路线。

一、交通问题。以后可以接受你们的提议，每月由你们派一交通直来上海。每月津贴一百元。

二、以后中央每接你们一次报告，必作详细具体的指示。但是你们的报告，也必须详细具体。政治经济状况如何？群众的生活状况与斗争情绪如何？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工作方法如何？组织状况如何？从支部到省委的工作如何？尤其是工运农运情形，必须分别详细报告。然后中央能了解陕西客观的环境与主观的力量，才能作正确的详细的指示。

三、干部人才问题。这是必须在工作中，尤其是斗争中去训练出来。工作愈发展，斗争愈前进，新的干部人才也就愈多。如果要靠中央派人，这就反证陕西工作必异常松懈。不但

现在中央很少可派的人，就是有派了人来，多系外省同志，既不熟悉陕西情形，更无法深入群众，对陕西工作一定难有大的帮助。至于指导的人才，中央觅得适当的以后，即当派来。

四、甘肃工作情形，中央全不知道。陕西既不能兼，中央可即派人前往主持，不过目前尚无人可派。

五、全国代表大会业已开完。大会议决定即发来。

六、陕甘新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中央决定派一巡视员来，巡视三省工作，期间当不能决定。陕西全省代表大会定期以后，即通知中央，巡视员当可如期赶到。

七、以前派人来上海的经费，中央不能补发，省委可在经常费内支出。

八、九月份以前经费，除由邮汇上一千元外，其余均由蒲[1]同志带上。

九、陕西自四月份起的经费，中央因未接到妥当地址，无法汇寄。因经费困难而影响到工作的，甚行，当然是事实，但是决不能完全诿之于经费困难，尤其不能有没经费便无法工作的观念。我们应该认识，工作的发展与否完全在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和党的组织是否健全。如果没有健全的党，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那么经费愈多，只有增加负责同志的腐化，而更加无法推动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来。省委现在应该鼓励一般同志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单是可以节省经费，并且必须如此才能接近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发展党的工作。“没有经费，便无法工作”的观念，应完全肃清。

十、以后预算还只能照旧支付，决不能增加，因为陕西比皖赣川各省已经是优裕得多，而工作上则远不及各省。

陕西目前的策略与工作路线：

陕西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就中央的观察与推测，是很有利于革命斗争发展的局面。第一，陕西是极贫乏的省份，而冯[2]系军阀，为争夺地盘起见，养军仍是很多，苛捐杂税，必须是非常的繁重。城乡贫苦群众，必然更趋于破产。据说陕西有些自耕农愿意放弃土地去做佃农。这就是很明显的例证。第二，陕西是十足的封建政治，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必然有加无已。并且货币经济的发展，已深入农村，必更促成高利贷资本的活跃。农民受这样重重的压迫，自然是更加穷困不能生活。第三，军阀内部并未完全统一，岳维峻军阀仍有很多潜伏的势力，一旦关外战争爆发，关内亦必开始混战，而使反动的政权走上动摇的道路。第四，一般工农贫苦群众因生活的痛苦没有出路，革命的要求自然是很利害。上面这些客观的情形都证明是很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却是十二分的薄弱。第一，群众的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有些地方的农民虽有些神秘性的组织，领导权完全在豪绅富农的手里。第二，我们的政治影响，并未在群众中发展，甚至可说除少数农民中有些不正确的宣传外几乎全无影响，这样当然无法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第三，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在群众中毫无基础，不能领导群众。因为革命主观上的这些弱点，所以客观上虽极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而广大的群众斗争仍是不能起来。因此陕西目前的工作总的路线就是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的革命的情绪，建立群众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来加强革命的主观的力量。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因为不单是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并且可以损害革命的力量。

所以目前的工作方针：第一，须从很小的范围起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最好找很能艰苦工作的同志去做工，去做雇农，

去当兵，到这些群众中去，发展他们的日常迫切的要求，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渐渐组织起来。必须如此才能真正发展群众的组织。第二，建立党的强固的基础。党必须在群众中有强固的基础，然后才能真正领导群众。所以“党员职业化”成为目前迫切的口号。必须每个党员都找到社会上的职业，然后才能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吸收明白勇敢的分子，来建立党的组织基础，发展党的组织。第三，必须找到群众的具体的迫切的要求，做成各种煽动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的斗争，从继续不断的小斗争，来发展成为大的斗争。必须每一个小的机会、小的运动都不放松，都领导群众向斗争的路上走，然后群众的斗争的情绪才能高涨起来。第四，在斗争中去发展党的总的政治口号的宣传下——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民主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等。必须党的总的政治口号普遍的深入群众，然后才能坚定群众革命的意识，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团结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上面几点是陕西目前团聚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来加强革命主观力量的切实的工作方针。必须艰苦的执行这些工作，然后才能使陕西工作建立基础，渐次的发展起来。假如不去这样做，只去幻想武装，幻想暴动，一味盲动，结果必致使党的工作无法建立起来，这是要省委切实注意的。

此外还有几项重要的问题，要你们切实注意和执行的。

一、六次大会决议案，是目前党的一切工作的准绳，省委必加以详细的讨论，并根据决议案的精神和陕西实际的状况做成详细的工作计划，切实执行。同时必须把决议案印发下去，使下级干部的同志，都能深切了解。

二、你们的工作计划，首先当然要注意工人运动。虽然陕

西产业工人极少，但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仍是要比其他的群众进步些，仍是党的主要的基础，革命的主要的力量。同时对农民运动、兵士运动，也必须有详细的计划（具体的工作方法，与煽动和宣传的主要的口号都必须规定），以及健全党的组织和教育宣传工作等。省委决定这一详细计划以后，必须马上送一份到中央来，以便详细指导。

三、省委接到此信，必须马上加以讨论，并即做一详细报告来。详述陕西政治经济状况，群众生活与斗争情形，党的组织和工作等，以便中央根据这些报告来指导陕西详细的工作方法与策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蒲克敏。
〔2〕指冯玉祥。

PDG

中共中央给云南临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云南临委：

（关于报费宣传品翻印及中央与你们的交通诸问题均已另函。又你们来之照片技术不好，未洗即现，望严重注意。）

中央很久就盼望你们的详细报告，至今未得到，因此，中央也就无法给你们以详细的指导。今天因为接到你们关于反日工作和迤南秋斗计划的报告，觉得应向你们提出以下的意见。虽然是很简单的，至于更切实指导，则希望你们先有更切实的工作报告寄来。

（一）党的第六次大会已经完毕，所有决议案，正在设法寄给你们。第六次大会很明确的指示我们，中国第一次革命的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但是新的高潮的象征已见，如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农民的自发暴动和日常的经济斗争还是继续不已，工农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在消灭；士兵群众日益革命化；反帝国主义运动正在生长，且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另一方面因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而帝国主义、豪绅军阀间内部的冲突根本不能妥协，将来的混战必然不可避免，皆足以助长革命的发展，不过我们在目前不

可过分的估量这种新的形势，全国总暴动，现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党的总路线，是要用一切力量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同时加紧士兵运动和反帝运动，推动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帝反军阀斗争，使各方面群众的革命力量以无产阶级为中心团聚于党的周围，汇合联系而造成革命的高潮。自然要实现这一任务，则在政治上和策略上要坚决的继续肃清机会主义，反对一切使党脱离群众的许多错误，如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恐怖政策……等。而一切工作方法都要适合于取得广大群众的原则，尤其是党的无产阶级化，如实行真正的民主集权制，党内无产成分的增加，健强支部特别是工人支部，使支部真能成为群众的核心……等等——这是大会所指示我们的前途和总的路线。每一个党部接到大会的各种决议，应该经过热烈的讨论，在大会决议案之下，把过去的经验[1]起而加以正确的批判，以大会之指示为根据，把目前的工作重新拿来计划. 如此才能正确的接受大会决议，而可以保证未来工作的进步。

（二）根据你们的报告，反日运动你们终于没有能够做起来，在这里你们应当很警觉的得到三个最严重的教训：第一，反帝运动固然可以影响推动其他工作，扩而言之，工农经济政治斗争，反帝运动，小资产阶级的反军阀斗争士兵运动都可以互相影响互为推动，但是反帝运动的真正起来，必然凭靠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为中心领导者——城市为工人，乡村为贫农，整个的说则为工人阶级。不然，反帝运动是不能单独起来的。你们在城市上一点基础没有，特别是工人运动。因此你们做反帝运动便要靠学生，甚至靠商会，最后乃靠济难会为中心力

量。这种国民党式的反帝运动，就是能够起来，也决不能彻底（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何况连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也没有我们的基础，焉得而不失败!？第二，凡要发动广大群众运动，必须党在群众中有基础，特别是主要阶级的群众中，并且我们的支部必须能起群众的核心作用，才能达到目的。你们在这次运动中（事实上没有运动），显然看出党是毫没有作用的：“工人活动分子会一次也召集不成”，“学生同志畏怯，连消息的报告都很迟”，临委没有到下层去指导，只秘密的坐在机关里发命令，这样的党还希望能够发动群众么!？第三，至于临委政策的本身，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如不敢用党的名义发表宣言传单，“口号中的最高一个便是反对和平外交”，这可见你们不敢公开的把党的主张向群众宣布，“使群众团聚在党的主要口号之周围”，不敢向群众揭破国民党军阀卖国压民的罪恶，即不敢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如此群众如何能认识我们与国民党有何区别，所以“客观上五月二十八日反动政府命令罢市一日开群众大会表示反日以后，我们便动也不能动了。”这岂是“客观上”的障碍？乃是主观的错误啊！这是你们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深切认识的一个重大教训！

（三）根据这次的教训，云南的党应唤起全体同志尽一切力量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从斗争中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从斗争中给工人群众以阶级的政治教育和斗争的训练。如果我们不能获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并且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伟大的战斗力而团聚在自己（党）口号之下，那么，不仅彻底的反帝运动不能起来，根本就谈不到革命高潮的创造。如果在这些重要城市没有在业工人或没有工作同志，临委应当选择学生同志之积极分子设法介绍到工厂中学习手艺取得生产地位（同志职业化）或派做职工运

动，但如果能找到工人同志则必须选择积极的分子去负工运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极艰难的下层基本工作，开始要想种种方法去与群众接近，向他们宣传，组织他们，在其中建立支部创立党的基础。这种工作须要耐心的切实的做，绝不能浮夸。再则对于学生的争自由和改良教育运动和小商人的反军阀斗争都要注意领导，并且推动他们到反帝运动的路上。第二，便是力求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化，主要的路线是党的基础建立在工人成分之上，努力引进积极的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每个同志要能成为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支部不仅要能按期开会缴纳月费而且必须做到讨论工作分配工作，每个同志在党的指挥之下工作，使每个同志在群众生活中学习斗争和工作的方法。党员的数量不求如何扩大，而质量则必须如此严格，才能使支部起核心作用，才能造成布尔塞维克的党。一切旧的游击动摇不积极的分子经过严格训练后，仍然不改变过来则断然的洗刷出党，新的基础大半要建立在新的成分上。同时上级机关必须力求民主化，一切指导须切实而正确。第三，党的宣传须力求扩大，每一次斗争须提出党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使党的主张深入群众而被群众接受（详见大会宣传决议和中央宣传工作通告）。

（四）秋收斗争的前途和主要路线已详中央秋收斗争通告。你们对迤南的计划，中央大体同意。但中央还要你注意执行下列几点：

1. 秋收斗争应不仅在迤南举行，还要普遍其他各县，凡是有党的组织的地方。

2. 斗争时不仅要各区域的互相呼应，如你们所见到的，凡秋收斗争□□的区域必须更加紧城市工作和士兵运动，必须工人经济斗争和士兵运动与秋收斗争联系起来，才可以更加促

进并保障斗争的发展。

3. 秋收斗争如能得到发展，有广大群众起来时必然走到武装冲突。因此在斗争中，要注意农民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尽可能武装穷苦青年农民组织游击队，使成为群众游击战争的先锋，亦即将来红军的基础。这种工作是异常重要的。

4. 在斗争前和斗争中要发动广大的宣传鼓动，普遍的激发群众的斗争情绪。

5. 在口号中须加上"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夺取一切反动武装武装农民"、"不还债"、"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等，尤其是首末两个是指示农民革命的前途，须不断的在群众宣传。

（五）大会特别提示中国革命非有广大的革命士兵参加很难胜利，因此在一般的意义上以后要把士兵运动看同工农运动一样的重要。反革命军队的士兵虽然脱离生产已久，但在阶级性上，可以说是一种武装农民，但他们的出路就是农民革命的出路，所以士兵之参加土地革命是可能的。士兵运动的目的，便是要领导其日常生活的斗争，在其中发展革命士兵组织（革命士兵联合会之类）和支部，使革命士兵的力量与工农力量能够汇合而走向革命的高潮以至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平时不可轻易发动兵变，兵变的发动必须是有革命的必要，如当广大的工农斗争高潮时，在其范围内举行兵变足以帮助斗争更扩大的发展；或是不得已时，如当敌人发现我们的组织必须先发制人，或当反动长官命令屠杀工农必须倒戈相向。如果轻易发动兵变而没有上列的意义，那么等于盲动足以妨害士兵工作之发展。再则士兵运动机关须与党的其他机关独立，士兵中党的组织也须不归党的组织部直接管理，以免容易泄漏秘密

致牵涉党的整个机关（详见中央从前士兵运动大纲及大会军事决议案）。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应缺字。

PDG

中央通告第七号

——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一、过去和现在党的组织状况

“五卅”以前，党的成分最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那时党还是很小的，他的生活好像研究团体一样，虽然有支部的生活，但是很机械的，整个党的组织带有家长制的习气。经过“五卅”怒潮以至一九二七年上期，民族革命走到最高潮。这时期特别在南方各省，党在数量上有突飞的发展，工人的数量固然增多，特别是农民的成分突然在党内占重要地位，同时许多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也被农民革命怒潮涌到党内来了。然而我们没有能在这时期把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起来，整个的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手里，一切活动分子差不多完全脱离了社会职业。旧的机械的支部生活，在这革命的高潮中，因为阶级基础不强而变为散漫无羁了。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批评精神和集体的讨论，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训练——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也就是国民党反动而后党的组织所以随着破碎塌台的主要原因。国民党背叛而后，党

的组织很显然的是：所有公开时代的活动分子（大半为智识分子）都成为党内的失业者或者脱离了党；一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小资产的动摇分子保留在党内，给政治上工作上不好的影响；城市的支部大部分溃散，许多工人的干部因为找不着党而无形脱离组织，党的发展由城市转向乡村，由大企业转向小工厂和手工业，党部逐渐脱离开群众而秘密守住屋子里来。总之，整个的党已经溃散不堪。

“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组织上的任务，应当积极发展党内讨论，引进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改组各级党部。中央曾经极力督促各级党部执行这一任务，并规定了各级党部的工农成分，通告执行。然而各级党部能够执行这一任务的异常之少，并且在执行中对于引进工农分子也大半是虚有其名的使之在执行机关挂一个名，并不帮他实际做指导工作，因此有些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而后，反感觉得不安或则仍要做他的下层工作。只有广州暴动后的广东，今年五月后的湖南，广州暴动而后二月大摧残以前的武汉，比较的能够正确的执行了右述的任务，然而中央在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见到党的组织上须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这是很大的缺点。当然各级指导机关的改组在当时是异常重要的，但如果不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根基即永远不能建立，同时党的指导机关，也就无从改造得好。

现在党的组织显然有离开无产阶级的危险，其主要的表现是：

1. 党的工人成分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以上，工人支部差不多半数是失业工人（如上海）；

2. 党的指导机关极少工人的积极分子参加，仍然保有不

少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在党内和指导机关；

3. 有广大产业工人群众的区域工作完全塌台，如武汉、广州、天津、安源；或则没有工作或只有极少的工作，如唐山、满洲、无锡各铁路矿山。上海的组织只有形式——与群众隔离的形式；

4. 一般的城市工作差不多等于零；

5. 党员大部分失掉了职业，与群众隔离，靠党生活，并且形成雇佣劳动性；

6. 乡村中差不多没有支部生活，城市支部则隔离了群众；

7. 一方面家长制的习气尚未洗除，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已发生，下级对上级不信任，甚至有以个人意气在下级鼓动反上级的现象（如顺直）；

8. 没有群众的核心作用，只有个人的英雄主义的蛮干——站在群众的前面，拼命或强迫命令群众，甚至把赤色恐怖当作发动群众的主要路线；

9. 农民意识与游民意识、小资产意识结合而构成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10. 地方党部多不健全，各级指导机关更不集体化；

11. 可耻的自首叛党的现象日益蔓延。

这十一大现象充分表证了党的非无产阶级化。因此现时党的前途应当是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新的前途及其可能的条件

六次大会指示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到来，同时所确定的党的政治任务和各种工作决议都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不能保证大会决议的执行，更其不能保证

革命高潮的迅速的到来的。

只有创造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才能保障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怎样创造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呢？就是以最大力量建立产业支部，在一般的城市和乡村中，把党的基础建立在手工业工人、苦力和贫农的成分上。

新的组织前途，其可能的条件有三：第一，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和罢工运动有复兴的现象，农村斗争继续不断的勃起；第二，党的政治任务，是要获得广大的劳苦群众，特别是要夺取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众，这足以保障党的组织上的发展；第三，党内还保留有小部分的工人干部，这些干部都是从多次斗争中磨炼出来的积极分子，但是在过去错误的组织路线之下被沉没在下面，只要各级指导机关有决心去引进这些分子，是能够来担负这新前途的创造的。湖南省委在三个月内找到近三十个积极的工人干部，就是实例。

虽然有这些条件保障其可能，但须各级指导机关有最大的决心来实现，如果没有真正的决心来创造这一前途，那么这一前途仍然不能实现的。

三、工作中心及党的力量的集中
（主要路线之一）

在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意义上，我们便要选择工作的中心，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应当如此，我们主观力量上也不够普遍发展。所谓工作中心，主要的是指产业区域和重要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是上海、武汉、天津、唐山、香港、广州，以省而言则为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直隶、满洲、山东、

河南。在一省份内：江苏则为上海、南京、无锡、徐州、镇江、蚌埠、苏州、南通、常州等；在广东则为香港、广州、佛山、江门、石龙、汕头等；湖南为长沙、安源、锡矿山、水口山、常德、衡阳、岳阳、湘潭；湖北为三镇、大冶、孝感、宜、沙等；江西为南昌、九江、乐平、景德镇、赣州等；直隶为天津、唐山、北京、长辛店、石家庄、张家口等；满洲为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山东为济南、青岛、淄博、枣庄、德州等；河南为开封、郑州、信阳、许昌、卫辉、焦作、六河沟、彰德等；四川为成都、重庆、自流井等；福建为厦门、福州、漳州等；安徽为芜湖、安庆、荻港及宣城、繁昌（矿工）等；浙江为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山西为太原、井陉等；陕西为西安、潼关等；云南为昆明、个旧等（各省的中心，不过是举其最重要者为例）。

从产业而言，则为铁路，矿山，海员，五金工人，市政工人，兵工厂，纱厂，电汽，邮务，码头工人。其次为苦力、手工业工人。

如此指出工作的中心，绝对不是说便可以忽略非中心区域的工作，而是说党要把人力财力相当集中在这些中心区域，农民运动亦然。因为这些工人中心，同时即是政治中心，只有在这些工人中心，才能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只有这些中心区域的工作做出基础，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上的领导。

中央对于全国范围内的产业中心和政治中心，应当有一总的计划去布置工作，并且要时时注意帮助这些区域的工作。省委对于一省之内工人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工作，也应如此。

四、新的基础之创造与旧的基础之改造

党的组织上旧的基础，毫无疑义的是很不健全的，因此我

们便不能幻想单靠拿旧的基础来整理一下，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党。因此，我们必须坚决的从群众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一切新的积极的党员，都应坚决的引进到指导机关学习工作，如此才可以改变党的颓废、散漫、怠惰一切坏的精神而走向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但是旧的基础之不健全，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党员成分，就是上海也一样的不健全，实际乃是由组织路线的错误和委派命令的遗毒所致。我们相信旧的基础中仍然有一部分积极的分子，党不仅不要拒绝他们，而且要收集他们给他们工作。因此，对于旧的基础，党应当把六次大会的各种决议，详细告诉同志们，发展同志们的讨论并且指导他们讨论——与当地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如果经过这样教育训练的工作，而仍有不接受新精神或者口头接受而不执行的，那么无论他是指导机关负责人或普通的同志，党应坚决的将他们洗刷出去。

如此，明确的认定党的无产阶级化要建筑在新的基础上，而同时对于旧的基础，则从积极的教育训练工作中加以清洗，乃是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第二个主要路线。

五、党员职业化，党的产业化是党无产阶级化的主要条件（主要路线之三）

“党还不是工人群众自己的”，革命群众始终把 C. P. 看作他们以外的东西，为什么原故呢？在组织上分析，由于过去党的习惯，是由群众外派人去包办群众工作，而不是经过组织的核心作用，由群众自动起来奋斗，从奋斗中产生群众自己的领

袖，因此群众总认为C. P. 是他们以外的东西。在革命高潮时候，他们（群众）依赖C. P.，一旦高潮过去，白色恐怖严重时，这些没有生产地位（没有职业）的C. P. 代表便都站不住脚而要退回党里面来。于是党与群众隔离了，所有党内的活动分子都依靠党生活，动摇的分子终至脱党叛党，勇敢的分子也只能跑到群众前面去拼命而无法伏在群众中领导群众，消极的便坐在屋子里。如此党一方面不能深入群众，一方面也就无以战胜白色恐怖之进攻。

现在党内许多没有工作的同志，他们主观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请求派工作或维持生活，说是“以身许党，别无生路”，有时派到某地工作因为白色恐怖的严厉又回转来。结果派来派去，群众的工作和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并不能建立起来。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错误所遗留下来的难题，我们应当深深觉悟党的出路。只有每个同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去。各级党部要对同志详细解释这种意义，并帮助同志找职业。真有决心的同志，尤其应当打入产业中去工作，从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

六、支部是党的政治达到群众的枢纽，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党的基础（主要路线之四）

“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我们党的支部怎么样呢？“农村支部是易得而易

失的”，根本很少有支部生活可言。城市支部特别拿工人支部来说，工人生活本来是比较固定的，应当可以建立健全的支部，但我们的支部则不然。一般的支部多半不能按期开会，大部分要上级党部召集，开会永远不能到齐，到会只是少数人，或断或续的敷衍，党员纳费是绝无仅有的事。书记多半是委派的，或则是推选“大哥”充当。平日很少有工作的讨论，更没有工作的分配。上级党部的通告，机械的读一遍，上级出席人也只是机械的做报告。好的同志亦只是机械的服从，不能自觉的接受。如此，支部便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连“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也谈不到，甚至工农同志及一般下级党部党员不把党看成他们自己的。因此，一旦有斗争，上级机关临时命令支部书记，书记命令几个比较积极的分子去英雄式的拼命，一失败便只有怨党或更脱离党，否则便向党要生活要工作，整个支部常常以是而瓦解。工人群众新的积极分子，在来党前的 C. P. 是神圣，一旦吸收入党，不仅得不到好的训练，反而接受许多不好的影响，一样的消极，怕工作，甚至其生活亦逐渐与群众隔离。所谓“勇敢的工人，到党里来便坏了”。如此，党员没有支部生活，党即永远没有基础，同时“夺取广大群众”也自然而然成了空话。

另一方面，支部数量的统计，工会支部占少数，产业支部更是微乎其微。铁路，海员，五金工人，兵工厂，全国举不出几个支部。就上海而论，手工业店员支部占大多数，产业支部一般的有名无实，因此许多产业工人的经济斗争我们无法去领导。至于大企业的中心支部则完全没有。一部分大工人区完全塌台（武汉、广州、天津、安源）一般的城市最大部分没有党，甚至主观上不要城市工作。

由上述两种情形，党在城市和产业区可以说没有一个可以

起群众核心作用的支部，因此，也就不能发动和领导广大的群众，而且不成形的工人支部还逐渐减少，这是何等的危机啊！

真有决心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必须：第一，建立城市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支部；第二，支部生活不仅做到按期到会纳费，还要做到自动的讨论政治、讨论工作分配工作，自我批评，每个同志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和宣传员，上级党部只是指导者和帮助者，不是命令者；第三，整个的支部埋伏在群众里面去宣传群众（支部应为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机关）组织群众，有组织的领导群众斗争，而不是去包办群众或命令同志离开群众去英雄式的拼命；第四，同志的数量不求多，质量则必须健全，不能实行右述支部生活的，宁肯让其出去而团聚于党之周围；第五，在产业区域中建立大企业大工厂的中心支部（模范支部）；第六，须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支部干事会）管理支部工作；第七，极力建立群众独立组织，强健支部组织，改变过去支部与群众组织混合在一块的错误，支部书记须由支部会议自觉的选举在业同志担任。

一般的城市支部（学生、店员）和士兵支部须求其发展，其支部生活与上述者相同。农村支部比较难于严格，但必须尽可能的执行，尤其要注意干部的训练，其方法就是于每个支部范围内选择最积极勇敢最觉悟的分子加以特别训练，如开训练班使其学习担任重要工作等以造就党的中坚分子。

七、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
（主要路线之五）

党员的政治水平线本来很低，自“八七”会议以后从中央

以至地方党部差不多都忽略了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八七”会议与中央虽然要各级党部发展党内讨论，但一般的积极分子，在不断的激烈的斗争中差不多一致的形成一种“只准干不要讨论”的风气，尤其是政治讨论在党员中绝少表现。以此，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常常做出许多错误而不自觉。有些同志还不能自拔于机会主义的遗毒，有些则又走向盲动主义，有些则因不了解革命的前途和我们的策略而烦闷消极。有时政治上工作上不同的意见因为没有辩论的机会而变成个人意气之争，或则对于不同的意见无判别能力而盲从。因此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在一般同志中很难进步，甚至同志们犯了错误，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党内教育训练工作乃异常之重要，主要方法如下：

（1）发展党内讨论，特别是支部的讨论，使支部成为党员教育训练的中心。

（2）上级党部注意供给下级党部之教育训练材料。

（3）中央及各省须创办专门登载教育训练材料及党内讨论的刊物。

（4）省市县委不断的举办训练班，训练教育宣传人才及党的干部。

八、建立地方党部并健全地方党部的工作（主要路线之六）

现在党内的组织，根本上固然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同时各级地方党部，也极少健全的组织，特别是指导人员的缺乏、不健全，因而地方党部多破碎不完，指导能力薄弱甚至不正确，自然根本要能健全支部的生活才能养成好的干部以充实地

方党部。然而在此过渡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在下层组织中先选择积极的分子到地方党部，并且必须坚决的到下面去找，不可天天向上级党部要求派人。大会组织决议关于地方党部的建立和其工作，已有详细的规定，各地党部须切实执行。

九、指导机关之改造与工作方式
（主要路线之七）

（1）各地党部的组织，须遵照六次大会党章改变。

（2）各级指导机关，须尽可能实行选举制。

（3）各级党部的执行机关须有与执行委员会同样数量或超过半数的候补委员，有候补书记、候补常委。支部有候补干事、候补书记。整个的候补组织的意义是预备在非常时期，可以代替正式组织。在平时不正式参加工作，如遇正式委员或干事缺席，可临时补充。省市县候补委员，最好担任巡视工作。

（4）省市县于组织部之下成立组织会议，以组织部主任为主席，巡视员，同级C. Y. 组织部主任，同级工农会负责人当然出席，经常开会讨论组织工作，并常要临时指定重要支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听其报告，提出实际问题。

（5）凡不能彻底执行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必须坚决的令其退出指导机关。

（6）引进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工农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必须实际的工作（到会，发表意见，接头，出席，巡视，写决议或信等），绝对打破挂名的恶习。

（7）省市县委委员及其他重要工作人员，须尽可能各参加一个工人支部指导支部工作。

(8) 中央以至省市县委的技术工作须尽可能由工人同志担任，增加指导机关生活的无产阶级精神。

(9) 尽可能实行民主化，注意启发并接收下级同志的意见，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分工，打破家长制、命令制的遗习，另一方面则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发生。

(10) 省市县须建立有力的出版物发行机关，区委支部须有专人负责管理刊物的分发。

(11) 一切技术工作须力求敏捷，彻底扫除官僚习气。

(12) 各级党的经费收支须有预算决算，组织委员会审查。

(13) 注意日常工作的秘密方法，打破浪漫的习惯。

(14) 上级党部须经常的向下级党部作工作报告，并经常考核下级工作，下级对上级一切指导须虚心讨论执行，同时向上级发表关于一切工作的意见。

十、巡视制度是保证上级党部正确指导的主要方法（主要路线之八）

为了解下级党部的生活和群众工作的实际，使上级指导能正确而且合于实际，能密切的传到下级党部，那么只有经常的派人巡视才有可能。各级地方党部，须遵照中央巡视条例切实执行。

十一、党团的组织

过去各级党部对党团的工作多不注意，或没有党团的组

织，或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则党团与支部混淆，或则混乱了党的组织系统（如上级机关党团直接指挥下级机关党团），或则妨害了民众组织的独立。凡此一切错误和缺点，大会决议已详细指出，并且已指出以后党团组织之原则和工作方法，各级党部须遵照执行。

十二、自首政策

自首政策是国民党进攻我党最毒辣的方法，这种政策之所以能够蔓延，是我们的党有弱点可乘。根本的办法是加强党的基本组织，提高党的教育训练，同时把自首政策的内容详细向党员解释，防止党员之自首。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号召党内外群众共起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则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十三、党团的关系

党和团的关系不仅要做到各级党团部互派代表出席会议，党部对团的工作须尽力指导，并尽可能给以各种帮助，同时各级团部还应经常向同级党部经常作书面的工作报告。

十四、组织报告

自“八七”以来，过去各级党部对上级党部没有组织报告，因此上级党部对于组织工作亦缺乏经常的指导。以后省委应督促各级党部做组织报告，每月整理向中央作单独组织报告一次（报告纲要另布）。

注意此通告专为党内组织工作而发，根本精神根据六次大会决议。党外组织路线，大会决议已有详细的决定，同时中央对于支部工作方法及群众组织工作准备收集各地经验，作更详细的指示。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中央通告第八号

——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的运用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一、对六次大会决定的路线可以发生的两个极端偏向的解释

第六次大会决定目前党的总的任务是夺取广大的群众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准备在将来的革命高潮中以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彻底完成革命。这是党在目前绝对正确的路线，这是党在目前重大的任务（参阅通告第三号）。但是这一路线的解释与运用，可以发生两个极端的偏向。

（一）公开主义

第一以为要夺取广大群众只有在公开工作中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应当极力找到公开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宣传应该力求灰色，群众斗争应当采用合法的形式（请愿与请求仲裁……等）。这一偏向在政治上可以走上完全放弃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放弃反国民党的任务，在组织上可以走上取消秘密工作。结果是引导群众走上合法运动的幻想，完全帮助资产阶级。

（二）排斥一切公开工作

第二个偏向以为既然夺取群众，是在准备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那末一切工作都只能采取秘密的方式，一切公开方式都势必要走上抛弃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引导群众走向合法的幻想而完全排斥。这一偏向可以使党减少接近群众的机会，完全离开群众，缩小党的政治影响，客观上也是帮助资产阶级。第一个偏向只注意到如何组织群众，而没有注意到要夺取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以准备将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第二个偏向，注意到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没有注意到如何夺取群众，这都是与党的目前的总的路线相违反的。

二、正确的解释与运用

所以这路线的正确的运用是要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来扩大党的政治的宣传，决不能放弃党的政治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要领导群众一切斗争，在斗争中更要加紧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现在指出下面几个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来解释这一原则：

（一）请 愿 问 题

党决不是领导群众作请愿运动，但要利用请愿运动变成示威运动。

群众斗争起来以后，马上去向国民党或政府请愿，希望国民党或政府来仲裁或承认，这是很明显的合法运动。所以党决不能主张或领导群众的请愿运动，因为这一请愿的方式很易增加群众对国民党的或政府的幻想。但是决不是群众要去请愿，

马上认为这些群众还没有觉悟便“自标高洁”的不管群众。这样无论这一请愿的结果如何，群众都要离开我们。正确办法是当群众主张请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指出国民党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党，请愿决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同时仍要参加这一请愿运动，把请愿运动变成示威运动。如主张群众去而反对代表去，在群众当中鼓动坚持条件，反对领袖的妥协……等。这样失败了，使群众更加认识我们，而走到我们影响之下，胜利了使群众认识是由于斗争的力量得来，而不是出于国民党或政府的恩惠。也可以增加群众斗争的勇气，认识我们党主张的正确。

（二）仲 裁 问 题

要在群众中反对仲裁制度，但在被压迫时可接受仲裁。

群众斗争，要由党部或政府来仲裁，这完全是一种阶级调协的办法。党必须坚决在群众中宣传反对，必须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豪绅资产阶级欺骗群众、压迫群众、剥削群众的狡计，而主张直接谈判。但是如果到了遭受政府压迫，不接受仲裁便要失败的时候，也可以接受仲裁，使群众不致因完全失败而瓦解。同时可以增加群众对国民党和政府的愤激与仇视，否则必会因压迫失败而怨恨我们。这就是说在宣传上一定要反对到底，在行动上到不得已时可以接受仲裁，宁可受压迫而接受仲裁，绝对不能赞成仲裁。

（三）群众组织的登记问题

必须在被压迫时方能接受登记。

每一个群众组织，都必须到国民党部或政府登记，当然是豪绅资产阶级破坏和限制群众组织的阴谋。我们必须在群众中

坚决的指出这一阴谋来打破群众合法的幻想，同时要领导群众不管甚么“条例”、“登记”等自动的公开的组织起来（当然同时还要有秘密组织）。但是到了政府压迫，如果不登记，便要完全解散时，也可以接受登记来保存组织。因为这样不单是使群众不会发生合法的幻想，并且还可以使群众对政府愤激与仇视。至于现在国民党的“整理制度”当然要反对到底，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是由国民党委派的组织而不是由群众产生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完全没有群众的意义，完全失掉了群众的作用。

（四）对国民党召集的群众运动的策略

应该参加进去来宣传我们的口号。

国民党号召的群众运动，只要是有群众参加（不管是群众愿意与否），我们必须参加进去，提出我们的口号来扩大反国民党的宣传，使群众渐次走向我们影响之下来。如果不参加便是离开群众，断送群众给国民党。假设参加进去而不提出我们的口号，当然便是帮助了国民党。但是最大部分的群众已经反国民党，已经到了我们影响之下的时候，那末国民党召集的群众运动，便不应该号召群众去参加而是要求由我们自己号召另一群众大会去和他对抗，或者号召群众抵制。

（五）对反动或黄色的工农群众组织的策略

应该参加进去扩大我们的影响渐次夺取其群众。

对反动或黄色工农群众的组织，只要他有群众便应该参加进去来扩大我们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要坚决的主张群众的民主制度来反对国民党或政府的委派干涉或领袖包办的办法，同时当然要提出群众迫切的要求来号召群众的斗争。就是反动或

黄色群众组织中的指导机关，只要是群众选举出来的，也应该参加进去。因为到了指导机关，更易于提出我们的主张，扩大我们的影响。但是这个机关是由国民党或政府委派的，便不应该参加。因为我们要彻底反对这种委派制度。

上面提出的这些实际问题的策略，都是党的目前总的政治路线的正确的运用，其他各种类似的问题，当然也是一样。总之一切可以公开向群众宣传或组织群众的机会，都不应当放弃。如果“自标高洁”，惟恐稍一公开，便要走上政治的堕落，必然使党无法接近群众，深入群众中去扩大我们的影响来夺取群众，便是很明显的左倾的幼稚病。如果只求公开，不惜放弃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必然要将群众断送给资产阶级，便很明显的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危险在目前党内虽然还没有明显的系统的形成，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上常常表现这样左倾右倾的错误，这都是与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不相容的。各级党部对此必须有详细的讨论与了解。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七十二号

——关于济难会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一、济难会的任务

济难会决不是一个慈善机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救济机关，虽然名字是“济难会”。济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革命斗争的发展，分开来说，他的任务有三：

（1）给被难的革命者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救济，以安慰其痛苦而鼓舞其对革命斗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2）组织广大的革命群众和其同情者，到革命互济的路上。

（3）经过“济难”的名义和实际工作，打入广大工农群众，促进其革命的觉悟和团结，并引其走到党的周围。

（4）在社会上灰色的态度，根据许多事实，以广大的“反白色恐怖”的宣传，引起社会上对反动压迫的厌恶——人道运动。

因此，济难会工作的方式虽与党不同，然而他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路线应当与党一致，他应当是党的辅车。

二、过去济难会工作的估量

整个的说，过去济难会的工作，对于（2）（3）两个主要的任务根本没有涉及，因为他事实上成了极端秘密的机关工

作，与群众毫没有关系。就是对于（1）的任务也没有做好，如许多被难者得不到救济，而对于某一部分则实行过量的救济（如对于少数家属，对于找上济难之门的逃难者）。本来济难会的工作愈成为秘密的机关生活，自然连简单的救济工作也不能做好的。

三、现时党的任务和济难工作的方针

目前正当革命的潮流开始走向高潮，党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夺取千百万群众于自己领导之下。一切工作的路线和组织路线都要随这一政治路线转变而成群众化——适合于夺取广大群众。今日以前济难会工作的路线完全与此相反，今日起，应当彻底改变过来：从机关里面的秘密生活转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公开工作。目前的工作方针应当如下：

（1）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从群众内面建立济难工作，使群众认识济难事业是他们自己在革命战线上对于牺牲的伙伴应尽的责任，而共同建立济难的组织和工作，并在工农斗争中扩大各业群众的互助精神和行为。

（2）深入到社会各层，特别是容易同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争取济难会的朋友或同志以扩大济难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

（3）在此严重白色恐怖的状态中，应当发动广大的反白色恐怖的宣传，以人道主义争取社会上一切同情革命者、怀疑反动阶级者的人们，以种种方式来发动此一宣传。

（4）经过济难会工作，在党的领导的群众中促进他们斗争的决心和团结力，在无组织的群众中更加要引导他到党的周围。

（5）改造济难会本身的组织、宣传和工作的方式，使之适合于达到上列的目的。

四、组 织 问 题

为得完成上列的任务，济难会组织的改造，乃为目前急迫的问题，兹提出下面的原则：

（1）济难会和工农会一样须有其独立的并且有系统的组织和工作，党只能经过党团起作用，绝对禁止党部代办济难会和包办济难会的形式。

（2）在每个群众团体或群众单位中发展济难的组织，名义不一定要叫济难会（已经赤色了），叫互济会、互助会、友义会……都可。这种群众的组织应公开的存在，由群众自己推举在业的伙伴做负责人，由群众自己经常捐助济难基金，济难会只经常的指导帮助他们工作。

（3）全国的组织至省市县的组织仍叫济难会（市县为更便利工作起见不叫济难会而叫人道会、慈善会等亦可），县市的组织须尽可能做到半公开的地位。这几级组织的执行机关须尽可能找到多数有社会地位的非同志参加。

（4）工农群众中的组织，必须由群众自己推举在业的伙伴担任工作。全国及省市县的组织必须有工人或农民分子参加，特别是到群众中工作的人员须为工农分子或有工农运动经验的其他分子。

（5）在工农斗争中固然要尽可能举行各业群众的互助行为，但各群众组织的济难基金，须由该组织自己保管，不要集中到上级机关。

（6）各级济难组织须成立党团受当地党部指导，并经常向

党部做工作报告和经济报告。

（7）为实现上列的组织计划，现有各级济难组织须加以正确的改造。

五、救济原则

（1）救济的次序，最要为被捕者，其次为受伤者死者，再次为死伤在狱之家属，最次乃为不得不救济之逃亡者。

（2）死伤在狱者之家属以一次救济同时帮助其找职业为原则，现在受济难会救济之家属，统希按照此原则解决。

（3）在某种可能条件之下，经过中央党部之同意，对被难者的子女的入学可设特别办法。

（4）群众中的救济须尽可能做到由群众自己捐款。上级济难会的募款须为发展工作之用，及在广大激烈斗争之时特别救济（如被难者过多群众组织力量不够救济时给以补助）。党及团及济难会之专门工作人员被难时由济难会（市县以上）救济。

六、宣传方法

群众济难组织不需要经常的刊物，但需要小册子、画报与宣单等临时宣传品和口头宣传鼓起群众革命互助的精神，特别在群众斗争的时候须要。上级组织之宣传品须以灰色而内容充实能普及社会，博取社会对工农群众同情而对统治阶级资本家、豪绅地主厌恶为原则（宣传刊物不必署济难会之名）。

七、各级党部之工作

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须详细讨论以济难会工作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执行，同时将工作计划和执行情形报告中央。现有各级济难组织限于十一月十五日根据上面之原则改组。

中　央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山西省委：

中央听到王鸿钧同志报告后，对于山西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一）山西的工作环境和我们的党

山西工作之重要——山西是阎锡山军阀的根据地，阎在占据京津以后，成为北方豪绅、资产阶级、卖国官僚之有力代表者，故推倒阎锡山的统治成为北方斗争的主要口号，而只有山西群众起来，才可以根本推翻他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势力。

山西的统治阶级还比较稳定——因为阎锡山有长期的布置，用欺骗小资产阶级的假的开明政策，战胜了其他的豪绅派别，建立了二州三县的豪绅的优越的统一的势力，又利用地势的偏僻与隔绝，不曾被外省军阀侵入。一般工农群众因为山西没有直接受战争影响，比较邻近的河南直隶为优，亦存着苟安的心理而少阶级斗争的情绪。阎之军队可以向外发展，生活亦比较其他的北方军队为优，并没有发生可以注意的动摇。阎的纸币不兑现政策吸收不少的现金，其军械由过去的积蓄和近来从天津移去兵工厂机械的扩张计划，也是日益充足，所以目前

军阀间的斗争及阶级间的斗争，都还不能使阎锡山所领袖的山西的反动政权，即时崩倒。

阎锡山的统治因为各种矛盾渐渐发展而摇动——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稳定已经达到最高度，各种矛盾渐渐发展，因此政权渐向动摇方面走。因为阎系豪绅势力的扩张，而向外发展，进取京津，惹起了与外省军阀特别是冯玉祥的重大矛盾；同时因为军事上的需要而加重对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财政也因而竭蹶，兵士生活也日趋恶化，欠饷至三个月或半年不发，一般工农兵群众以及小商人知识分子都渐渐怨恨起来。阎锡山的压迫群众尚不凶猛是由于群众没有斗争。农民对他有幻想，是由于我党没有提高农民群众的要求。这都还说不上改良政策，因为他实在没有能力实行改良主义。加之豪绅资产阶级内部也有反阎系的萌芽，这是因为山西的渐渐工业化以及国民党蒋介石派的影响，使山西的知识分子微微地民族资产阶级化，和阎系的二州三县的豪绅势力斗争，表现于山西国民党与政府的冲突。不过这一反对派的势力还差得远，且还算不得“形成了”。由此看来，山西的局面，已不能再继续“苟安”，而只有日趋动摇的。

革命的环境很好，但群众运动的基础过于薄弱——由上所述看来，革命的环境是很好的。但是工人方面，过去斗争过的只有太原、榆次、祁县、汾阳、晋城，其余如正太路、如阳泉、如盐池、如大同等地从来没有斗争历史。至于过去的工会组织也只有前述有斗争的几处，其余有组织的都是毫无群众。农民如赵城、安邑、猗氏、洪洞、临汾、介休、霍州、祁县、定襄、离石、晋城、屯留等县虽然也有过大小的斗争，但是要农协的组织只有赵城、安邑、介休、祁县几处稍有成绩，其余则虽有机关而无会员，虽有会员而无工作，甚至农民要来组织

农协而同志不去领导。兵士运动向未开始。而且这些工作，大半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陈迹。这一年来党在初期既没有脱离机会主义的路线，在后期，又因组织大破坏而无工作，事实上久已停止了工农运动，工会农会的组织久已无形消灭。群众固然是同情我们，过去工作的线索固然存在，但这一点儿基础是太薄弱了。

山西党的组织完全坍台——山西省临委既由七人星散而剩两人，现在一人赴沪，只剩一人，可说“省委”等于不存在。至于各县组织，只有汾阳、霍州、安邑、夏县、赵城数处还稍稍保存党的生活，但省委散伙以后，恐怕也是名存实亡。其余各县，虽原有同志仍在，而事实上或互不接头，或没有工作，或退缩消极，怀疑摇动，更是没有党的组织之可言。目前山西党的组织，已经完全坍台了。

党过去的遗产不能算好——山西的党虽然坍台，但是他却有比较丰富的遗产。中路、西南、东南、正太线各区，从前都有许多的县份有组织，西路北路也有几县有组织。现在虽然经过白色恐怖，逮捕了二百余同志，但工农分子毫无损伤。各地同志还能和党发生关系的，约在二百六十人以上，还可以找着的也有五六百人之多。但是这些遗产不能算好。工人同志虽不很少，但产业工人则寥寥无几。有些同志喜军事投机，以为非到军队中蓄养势力便不能革命；有些同志胆怯不敢领导斗争，或说本地不能工作，或说要到外省去干；或则挂名党籍，不起作用。知识分子同志不自信党的主张，不敢去找工农同志接洽；农民同志又有指工作是学生的事的。这是因为从前缺乏正确的工作路线，近来更毫无工作，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毒——北伐战后平遥的反国民党斗争，我们跟随小厂主行会的领导，在厂主与国民党冲突之间，

做了厂主方面的走狗，这是比机会主义还坏的滑稽工作（这一段不是如此事实，但有些同志却是这种心理）。太原斗争中的打杀主义以及××同志抛掷炸弹的匹夫之勇，是比盲动主义还不如的。安邑抗捐时负责同志动摇。介休工人逮捕反动厂长，而负责同志因恐怕人说过激，无条件命令放去。太原工会领导宣布“明日罢工候太总命令”，而自己散伙再无回信。这都表现出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毒。霍州会议虽然高唱反机会主义，但是仅仅在组织上实行引进工农分子的原则，而在政冶上在工作上并没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各地同志消极的动摇的不在少数。这也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潜伏的现象。不过因为山西没有广大的斗争，所以这些错误的倾向，最近无从表现。

新的路线上还没有开步走——去年八七会议后中国党的新精神是朝着布尔塞维克化的路上走，虽然以后也发生了些偏向，但一般的看来是已经在前进中的。但是山西的党直到今年二月霍州会议才开始这一奋斗，而会议的成绩还非常的不够。不幸会议以后，又随即遭了大的破坏，并没有按照新的路线开始工作。

山西党过去的优点是没有派别的纷争——山西党过去的优点，就是没有染了顺直的病，没有私人感情用事的派别争斗，因此党在群众中相当的威信仍然存在。

党的威信并不甚高——但是党的威信并不甚高。例如前文所述工农领导同志在斗争中的动摇，以及工作路线上的种种错误，都是可以丧失党的威信的。安邑的农民说：“他们光跑”，是不是看不起党呢？还有些同志，是在群众中有信仰的，但是群众只信仰个人（如说老邓[1]哪里去了！），而不信仰共产党，这当然还不能说党在群众中有威信。不过一般工农对我们没有反感，且表同情，对今后工作也有些动力。

山西工作无成绩之原因——山西工作之无成绩，并不全由于同志之不努力。山西的确还有一部分非常肯吃苦工作的干部同志，经常的在那儿奋斗。可是因为过去脱离了中央的指导，又受了北方局坏的政治影响，没有走上正确的工作路线。军事投机、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在大范围内或小范围内常常表现，甚至以个人恐怖为良好的精神，以拥护厂主为反国民党斗争的策略。致使少数好的同志只知无计划的无组织的蛮干，多数是意气消沉，不积极工作。加之经济困难，指导人才也感缺乏，又遭白色恐怖的严重打击。所以半年以来组织溃散，连错误的工作也没有了，现在完全是消沉了瓦解了。

（二）今后工作的布置

健全省委恢复组织——山西的党，现在需要重新创造，不过这个创造还是有丰富的旧的材料做基础的。目前第一着便是要把省委健全起来，纠正过去个人指导的现象，必须经常的开会，有计划的指导各地工作。省委应设在太原，直接指导太原的工作，同时必须实行巡视制度，经常的轮流巡视各地工作。但各地的特委不应设立。省委组织好，即须着手恢复各地的组织。

从斗争中改造党并组织群众——恢复组织不仅要找旧的线索，还要找新的线索，因为旧的不尽可靠。尤其要于恢复组织的时候，发动群众的小斗争，从斗争中改造党，洗刷动摇的分子，吸收新的党员，强健支部及以上各级党部的组织。过去以小学教员领导农民的形式应当改变，要在斗争中引进新的领袖。同时要把群众的组织恢复并扩大起来，应用秘密的以及各种公开的形式。但须取消工农会的委派制度，使群众认识自己

的组织，不仅表示同情而已。

发动斗争的主要口号——工人斗争的口号主要的应当是：减少工作时间，放假日不扣工资，反对减少工资，反对任意开除工人，要求救济失业，实行劳动保险，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工人自己组织自己的工会、自己选举办事人，反对阎锡山及国民党委派工会。农民斗争的口号，应当是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村长剥削和村长算账，反对差徭局等，反对重利盘剥，反对加粮，反对国民党的剥削，反对加租，农民有组织农会的自由，要求救济旱灾等。要求钞票兑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口号。兵士斗争也要开始发动，其口号应当是发清欠饷，反对长官打骂，兵士不是长官的家奴，兵士不打工农，要求教育及看报通信谈话之自由等。

不要忘记了总的政治口号的宣传——过去党的主张完全不为群众所了解，如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等，简直还没有听过，这是由于没有政治宣传。以后无论在什么小的斗争中，以及一切的宣传机会中，都不要忘记了总的政治口号的宣传，如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打倒国民党，打倒阎锡山，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工农兵武装暴动等等。在知识分子中，反第三党的宣传也要开始。

特别注意产业区域及有佃农的区域——过去党在产业工人中太没有基础，以后要特别注意太原正太路及阳泉大同煤矿区等处的工作，把基础建立起来。同时要注意南路绛州一带地主较多的区域以及河东盐池的工作。但对于这些中心区域的注意，并不要遗忘其他各地的工作。

斗争的方式不拘定，总要以取得群众为原则——斗争的方式，或是直接谈判包围长官（兵士），或是怠工或是罢工、抗租、抗债、抗税、抗粮、罢操（兵士）、包围厂主，或是群众

的□□斗争，都可以使用，总以不离开群众且能取得群众为原则。请愿的方式在宣传上应反对，但如果群众定要请愿，也可以参加。将请愿变成示威，至于过去“绑手请愿”的方式，当然要坚决反对。国民党所召集的群众大会，也可以参加，但须借此扩大党的宣传。还有仲裁等等问题，都可以参照中央最近通告去作。

工农兵的工作同样重要——山西的武装，很少留在豪绅直接指挥的保卫团手里，差不多统统集中于军队中。所以武装暴动如要实现，兵士工作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山西今后要开始这一工作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对于那种“专靠兵运”的观念也要竭力反对，须知工农运动如没有成绩，则工农的政治影响不能使兵士革命化，单纯的兵运至多不过形成新的武力主义。

妇女青年及济难工作——妇女运动应当向女工及农妇中开始发展。C. Y. 工作应当和 C. Y. 中央接洽，恢复独立的组织。济难工作在目前白色恐怖的当中，尤迫切需要，应当按照中央最近通告开始工作。

结论——以上所述，非常简单。山西同志应按照这个路线，仔细运用六次大会的决议，恢复党的组织及群众工作。必须实现了这一初步，才可以谈到进一步的工作。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邓国栋。

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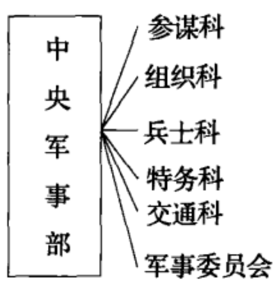
——关于军事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各级党部军事部组织大纲

1. 中央根据六次大会决议为集中一切军事工作，在中央常委之下设立中央军事部。

2. 中央军事部的组织，除设军事委员会为讨论及建议机关外，并设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科执行一切工作，其组织系统如下：



3. 中央军事部设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一切工作，秘书一人辅助部长处理日常一切工作，可酌用技术书记若干人。

4. 军事委员会以军事部长，中央常委一人，工委农委书记团中央代表一人，及军事专门家若干人组织之，专为讨论及建议机关。每二周开会一次，由军事部长负责召集。

5. 参谋科设科长一人，参谋若干人，参谋科的工作：调查和统计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搜集和制定军事地图，计划本党的一切军事工作，编制和训练本党一切武装力量，编译各种关于军事的小册子，详细计划由该科另定之。

6. 组织科以科长一人与干事若干人组织之，负责本党军事人员的统计登记和分配及一切招待工作，详细计划由该科另订之。

7. 兵士科以科长一人及干事若干人组织之，管理兵士群众运动问题，详细计划由该科另订之。

8. 特务科以科长一人、干事若干人组织，管理一切收买军器及秘密运输等问题。

9. 交通科以科长一人及干事若干人组织之（本科俟军事工作发展，须要一单独军事交通网时，再设立之）。

10. 各省省委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大的及军运特别发展之省份，军委下可以设立如中央军事部同样之各科，但兵士科应改为兵士运动委员会；小的及军运不发展之省份则设一军委书及一秘书即够。

11. 各县县委下设军事科及兵士运动委员会。

12. 有军事工作之区，可设军事干事及兵士运动专员。

13. 民团土匪一类的运动，可包括在兵士运动委员会之内。

14. 大的军队或特殊的情形时军部或各地军委，可派出特派员。

15. 军队中党的组织与党部的关系，经常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均受当地党部的指挥，但区除自己做的军事运动外，不要与普通军事发生关系。

16. 在特殊情形时某区域内之特派员可发介绍信等，但必

通知省委。

17. 在军队时常移防时，各重要城市可设立一军事接洽处，但只是经过或没有必要时，则绝对的不要每个接洽处都去接洽。

18. 各地军事委员会及兵士运动委员会，当地团均可派代表一人参加，建议和讨论对团的一切军事工作的意见。

（二）军事工作计划大纲

1. 中央军事部应从速建立起各机关，找齐各工作人员，开始有计划的工作。

2. 从速建立各省军事委员会，已有军科的省份，即将军科改组，加以扩充与健全。

3. 中央军部及各省军委即应有系统的进行本党军事人员的登记和统计。

4. 应有计划的分配各军事工作人员，从广东及各地失败来中央的军事同志，应有计划的招待训练及分配他们的工作，或帮他们找工作。

5. 中央军部及各省军委，应开始有计划的调查和统计反革命及革命的武装，中央军部应即制定各种调查表和统计表。

6. 中央军部应搜集各种军事地图，有必要时并须制定各种军事地图。

7. 中央军部应翻译及编辑各种军事技术及武装暴动技术一类的小册子。

8. 中央军部及各省军委应负责训练工人纠察、农民自卫军及本党同志的一切军事技术及理论。

9. 对兵士工作，中央军部及各省军委应调查及统计各军

士兵的成分、士兵的生活、士兵的革命情绪及对长官的态度等等。

10. 中央军部应制定各种士兵的调查及统计表式。

11. 根据各种调查的实际材料定出对各军不同的具体办法。

12. 中央军部应制定对兵士宣传及煽动的口号。

13. 应适合环境的组织各种兵士团体，如兵士俱乐部、兄弟团之类，以便向他们接近及宣传。

14. 对民团土匪等工作亦须根据实际调查，定出具体办法，大概与对兵士工作略同。

15. 各省军委均建立起后，中央军部应建立一单独的军事交通网。

16. 各军中应安置秘密的军事通讯员。

17. 中央军部应找出各收买武器的线索，定出秘密运输的方法。

18. 在各个军阀系统下的军队，如桂系、蒋[1]系、冯[2]系、阎[3]系应订一整个的计划，使各系下的工作，能联系起来。

中　央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冯玉祥。

〔3〕指阎锡山。

PDG

中共中央给贺龙的信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

龙兄：

中央对于你们在那方孤军奋斗与牺牲的精神，首先表示十分的敬意。不过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起程前来中央是为至要。

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现时的形式及本党总的政治路线，均有很明确的新的估计与规定。大会明白指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现时革命高潮没有到来，不过这高潮是快要到来的，因此党在目前总的路线是争取群众、宣传武装暴动的口号，准备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实行武装暴动任务。党的军事工作，自然亦不能离开这个路线。目前军事工作的任务，除在军阀军队中积极的作破坏工作、在政治上夺取整千整万的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外，另一方面应积极准备我们本身力量，如党员军事化，工人群众的军事组织和准备，农民群众游击运动的准备以及建立红军，都是本党目前严重的

任务。

你们那方面的工作，自然亦是军事工作之一部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农民的游击战争。在目前农民群众生活日益痛苦、所受压迫日益厉害的时候，乡村游击战争自然很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但是游击战争最重要的，必须出于群众的要求，必须在群众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必须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必须有计划的有组织而集中的指导。过去游击战争有散漫、缺乏与群众的联系、毁灭城市和乡村、无目的的烧杀的倾向，这些错误的倾向，必须严厉的加以纠正。

六次大会指出游击战争的主要的任务：第一位，即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杀戮土豪劣绅地主等，建立农民代表会议及农村苏维埃政权），发展农民更广大的群众到革命争斗的战线上来；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勇敢的青年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队伍中来，使其渐次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第三，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如收缴民团警察的武装等。

由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必须注意到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用适当的策略去领导。即是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真正发动了极广大的农民群众，在群众中要建立真正自己政权的要求，在当地反动势力确在动摇崩溃的时候，然后游击战争才能发展到地方暴动。同时必须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县市工人群众的领导与联系去进行，必须立即实现一切群众斗争的口号，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以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尤其是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到邻近的区域中去。

至于民团土匪，他们的社会成分，多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我们在民团土匪中应宣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来。

以上这些问题，均是六次大会所明白指出的，因为这些与你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特此慎重的提出，使你们特别注意，并想方法要使群众了解。

你们目前在大的敌人包围之下，欲图大规模的发展恐甚困难。此时宜竭力避免与敌人的主要力量直接冲突，以免被敌人消灭。同时你们到某地应极力帮助发展群众，使群众起来成为斗争的主力，你们的武装只有在广大群众当中才能生存而发展。这是你们主要的任务。

关于政治路线及工作路线已详前信，六次大会决议案可向鄂西特委索阅，接到时须在全体同志中讨论执行，同时龙兄来时关于所部工作的种种实际问题可与鄂西特委商决。

谨致

C 的敬礼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

一

在第六十六号通告内对于政治局势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的勾结和英美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指出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必然日益加紧，指出国民政府的政策必然趋于反动和资产阶级改良口号的宣传必然继续发展，指出反动统治是走向崩溃的前途和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以及党的工作路线等。这两个月来的发展，证明是异常正确的。

现在反动的统治很明显的是地主、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地主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南京政府已成为桂系、西山会议派等的大本营（当然还包容一些资产阶级右倾的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派和粤方委员等，都只有暂时匿迹消声，所以南京政府的策略更加反动。对外中日交涉，比以前宁案尤为可耻的投降，关税自主将变为各国单独协定，这是表面上的自主，实际上的束缚并未解除，而更加一层

* 本文原载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

条约的保障。对内则取消民众运动，已开始实行第一步的取消各团体的组织（即各省县市的总的组织）。第二步必然的变工会为劳资合组的振兴工业的工会，变农会为振兴农业的东佃合组的农会，甚至完全取消（这种旨趣不仅见于新任民众训练部常委缪斌的谈话，并且在告工人书中，已明显的宣传出来）。恢复新闻检查、邮电检查，钳制言论自由日益加紧，苛捐杂税日益繁兴，裁厘更成画饼。这样当然使广大群众痛苦日深，而对现在的统治更加不满，造成我们夺取群众更有利的条件。同时资产阶级的屈伏，只是暂时的，尤其是看见地主阶级这种积薪自焚的危险，当然更要加紧准备夺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所以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不但不会消灭，并且只有更加加紧，因此反动政权很明显的是走向动摇崩溃的道路。但对这种形势决不能有过分的估量，因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都只在准备冲突的时期，当他们准备没有充分以前，是有种暂时相持的局面，不过这局面是酝酿着更激烈广大的爆发，尤其是他们战争没有爆发以前，必然要提出许多裁兵裁厘、建设地方自治等的口号（训政宣言中的四大政策）来欺骗群众，来掩盖他们的裂痕，增加群众的幻想。对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相安一时的心理，是可以发生相当的影响的。同时资产阶级为要夺取反革命的领导权，为防止革命，决不会放弃他的夺取群众的工作（改良口号的宣传），这些都是妨害革命往前发展的重大的敌人。

总括上面的分析，总的局面仍然是走向革命高潮的形势，但是现在是暂时相持的局面，并且这一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要决定于革命主观上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只有揭破反动派的欺骗，推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才能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所以目前的策略，应该是艰苦的耐心去做群众工作，深

入群众中去发展党的政治的影响，树立群众的基础，领导群众的斗争，扩大群众的组织，来促进革命高潮，来准备革命高潮到来的彻底的胜利。只有加倍的努力群众工作，才能易为看见胜利的光明，没有群众的工作，更将难走到革命高潮，就算革命的高潮爆发了，亦将成为散漫零碎、此兴彼落的形势，决不能领导彻底的革命的胜利。

群众工作的对象，最主要的当然是城市的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没有城市的领导，乡村斗争很少胜利的可能。没有工人的领导，农民革命很少成功的希望。所以建立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运动，成为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更就目前主观的形势看，工会的组织已缩小到极小的范围，城市党的组织更是零离破碎，在全国找不出健全的产业工人支部，这样怎能争取群众，怎样能促进革命高潮？所以更要加十倍的努力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运动。现在中央决定集中很大的力量，注意全国的几个产业中心与政治中心，如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香港、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地。在各省亦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注意全省重要的政治中心与工业中心，如江苏的上海、南京、无锡、南通、镇江、苏州、徐州等；广东的香港、广州、佛山、江门、汕头、石龙、肇庆、北海等……。只有这些城市工作有了相当的基础，然后革命的胜利才更有可能，只有城市斗争兴起，乡村斗争才更易发动。这是各级党部和全党的同志应该特别注意的。但决不应该走向极端的方面去，完全放弃乡村工作，专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当然要与城市工作同时加紧，决不能稍有忽略，不过比较起来，要用更大的力量于城市工作。

二

目前有几种极不正确的观念，足以妨害党的正确路线，足以松懈同志的工作，应该特别提示出来。

第一，离开阶级观点的政治形势的估量。就是观察客观的政治形势，不注意根本的阶级关系，只看各派军阀的利害冲突，地盘冲突，互相勾结的形势（这是以前向导式的分析的残余），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估量。目前全国的形势中，是两个阶级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蒋介石派与桂系，其他各小派军阀间的冲突，完全要附属在两大派之下而不能独立的。如广东陈铭枢要反对李济深，就要投降到蒋系之下，江西王均要反对朱培德便要投到桂系之下，就是冯阎[1]的冲突，也就要联蒋或联桂，甚至交通阻隔的四川，也要多少受些影响，因为这些小军阀如果没有大军阀的扶持，决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如这两个根本阶级间的冲突，还没有到爆发战争的时候，那么，这些小军阀间的斗争，必然不敢发动。如果不了解这一总的原则，常常要得到过分的估量和不正确的结论。如广东以前几次估量的陈李的冲突马上就要爆发，结果总没有打起来，最近湖南因裁兵引起湘系对桂系的冲突，也有即须爆发的形势，过一向湘系终于投降，都是因这两大阶级还没有到爆发战争时期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看这些小军阀间的冲突，因为一省的小军阀间的冲突，的确对于一省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应该特别注意阶级关系的分析（就是一省间的各小军阀也都有不同的阶级背景），与全国的总的形势。

第二，离开实际的革命高潮马上就要爆发的幻想。六次大会的决议，现在已经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但是有些同志还没

有从实际上深刻的去认识他，还在幻想反动统治马上就会崩溃，革命高潮马上就会爆发，因此在策略上仍是不自觉的只是计划如何造成割据局面，如何夺取城市，而把目前最严重的任务，很艰苦的耐心的群众工作，不自觉的忘记了，这是对于坚决执行党的目前总的任务的莫大的危险。在客观总的形势上，固然反动统治是走向崩溃的道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但是这形势爆发的迟早，完全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以现在群众运动的缩小，党的基础的薄弱，决不能推动革命的高潮。所以只有艰苦的耐心的群众工作，才能推进革命的高潮。所以这种离开实际的幻想，是与党的目前总的任务绝对不相容的。

最后还有误认这一“暂时相持的局面”，以为反动统治已经开始稳定，而在策略上便发生“和平发展”的倾向，以为现在是经常宣传组织工作时期，避免斗争，甚至惧怕斗争。这是于目前争取群众来准备暴动的总任务不两立，这是一种极庸俗的机会主义者的偏向。要争取群众，必须要加紧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群众的组织只有在斗争上才能发展，尤其要使群众在斗争上坚定他的推翻现在统治的认识，锻炼他的准备暴动的勇气与决心。只有如是才能推进革命的高潮，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

以上指出三种错误的认识与偏向，都是党的目前的战术莫大的危险，各级党部必须加以严厉的纠正或预防。

中　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阎锡山。

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各级党部并转全体同志们！

一

本党第六次大会，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路线是争取群众，很艰苦的有耐心的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团结千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这样去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推翻反动的统治，完成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的两大任务。

消灭封建势力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口号是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企业和银行。因为必须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根本推翻，他们的统治才能完全打倒。这两大任务，一则肃清地主阶级封建的剥削，一则扫除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开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目前革命的阶段，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现在阶段上已

* 本文第四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经建立起来，所以他的发展的前途，将要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目前资产阶级的各派从蒋介石派、革命评论派以至中华革命党，都只想消灭工人农民的革命暴动，宁肯和帝国主义及封建豪绅妥协，甚至联盟。他们提出的口号，如对农民只提减租和田赋政策，对反帝运动只提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是要缓和工农的阶级斗争，分裂革命势力，只是一种延长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民权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干，对于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应当一律给以无情的打击。

革命既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干，革命政权当然不能要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的形式。因此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苏维埃政权，是彻底的民权制度，是一切生产者直接管理政权的最好的方式。他的形式虽然很便利于无产阶级的独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阶段，还应该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而不能马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就是工农联合的政权而不是单纯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一年以来，党的政治总方针，即为建立这种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广大群众推翻现在统治的武装暴动，即为建立这种政权的前提。

但是武装暴动并不可以玩弄的，必须在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反动统治急剧的动摇崩溃，革命力量有了广大的组织的时期，才可以号召武装暴动。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所以六次大会规定武装暴动暂时在全国范围的意义上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不是取消暴动的总方针，而是实际的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现在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

二

同志们！第六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目前决定一切策略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的运用。现在同志中发现许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的意义，都足以妨害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的任务：

第一，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以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资产阶级还有革命的作用，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因此而发生不正确的策略，主张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主张我们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完全是帮助资产阶级，完全不了解“争取群众”的意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反革命的动力，在政府中极力主张改良的政策，在群众中极力宣传改良的口号，只是一种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的作用，正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的口号，不单是不能与他相同，并要一定要不同，然后才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才能使群众团结到我们党的口号的周围。

第二，就是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观念，以为大会既经决定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的时候而不是直接号召暴动的时候，那么应该以合法的方法来发展组织，要取消一切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一切斗争行动，都要力求合法。这种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更不了解乡村中英勇的烧杀政策和盲动主义，固然应该严厉的反对，但是在许多乡村，阶级斗争已经到了极高度，每一斗争，都要走向武装斗争方面

去，所以真正是广大群众要求和参加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等，我们必须领导，然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同时还有一种危险倾向，即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现在不知不觉的在党内有了些萌芽。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在群众工作中惧怕甚至避免斗争，只做些组织工作和不激烈的宣传工作，采取了“先组织而后斗争”的机会主义原则。殊不知党和群众的力量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扩大，革命浪潮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发展出来，党与群众的正确的关系也只有从斗争中能够建立起来，不要斗争，永远不能真正获得群众，永远不要梦想革命高潮。这种倾向发生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白色恐怖和工作困难的反应，主观上则是不了解盲动主义，因而“反盲动主义”成了“不动主义”。这种倾向正与六次大会“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完全相反，其发展必然成为极庸俗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全党之内应当严重防止这一倾向之发生和发展。

第三，是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大会看到过去城市工作的消沉，特别指出职工运动的重要。但因此而发生一种思想，以为那些散漫的农村斗争可以暂时置之不理。要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的群众，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中，为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如果丢开了农民群众，无产阶级便成孤立，决不能够战胜敌人。过去的高潮，农民斗争不能与工人平衡的发展，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

第四，但还有与上述思想正相反对的危险，则更为严重。这就是农民意识笼罩一切。一年来农村斗争特别发展，党的组织又有十之七八是农民成分，因此农民意识反映到党的内面。例如主张平分田地、平分财产等均产主义的思想，主张焚烧城市及乡村中无目的的烧杀等流寇的观念，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

意识。共产党认农民是革命的同盟者，同时明白农民是小私有财产者，不能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保守的观念特别重，更缺欠组织的能力，所以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果不极力去纠正这种农民意识的危险，将使革命完全消灭，党亦趋于死亡。再有过于重视农民斗争，放弃城市工作，专一注意乡村，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对于党对于革命都有莫大的危险。

第五，轻视反帝运动和偏重反帝运动的危险，这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的土地革命就是反帝运动，此外别无反帝工作。后一种以为只要造成反帝高潮，便可发动一切工作，甚至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是不了解怎样去促进革命高潮，都不了解各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意义。没有工人农民强有力的基础，决没有反帝的高潮；同时反帝运动也的确可以推动工人农民的斗争。所以工农斗争与反帝运动，应该同时发展，同时并进。

第六，轻视或偏重兵士运动的倾向，这也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兵士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积极的革命的作用，所以在策略上形成“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制造兵变。后一种，以为兵士运动可以发展工农运动，只有兵士运动发展，工农运动才有办法，因此在策略上也主张多做兵变。这两种观念，都是极不正确的。兵士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的农民”，决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所以决不能说没有积极革命的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无产阶级当然更是这一联合势力当中的领导

力量。所以兵士运动的目的是夺取广大的兵士群众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而成为将来的总的暴动。但是兵士运动，必须有工农斗争的影响，没有工农斗争，兵士运动决不能够发展，所以偏重兵士运动，更是一种根本的错误。所以这两个观念，根本上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是在策略上都成为“兵变主义”。

第七，反对一切公开运动的偏向，以为凡属一切公开的组织，合法的斗争都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都与推翻现在统治阶级的目标相矛盾，而不知道这是在我们党领导群众的策略正确与否。党的口号与策略如果正确，不单是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并且可以揭破统治阶级的假面具，增加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来发动群众，宣传我们的口号，但是不能降低我们的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

最后一种，就是只幻想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而不艰苦忍耐的去做群众工作。这一种幻想，是与目前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绝对不相容的。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的规定的明显的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的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如果群众力量增高，的确可以促进高潮更快的到来，如果群众的力量薄弱，或许革命还要走向暂时的消沉。所以我们只有很艰苦的、有耐心的去做群众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然后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若是只幻想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而不去做艰苦的群众的工作，这在客观上便是妨害革命，所以我们更应该严厉的打破这种幻想。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偏向，都是犯了右倾或左倾的危险，我们必须严厉的纠正这些错误，才能正确的运用大会的决议与精神，才能走上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的路线。

三

同志们！要贯彻六次大会的精神，实行六次大会的路线，更要肃清过去的许多政治上的偏向，因为这些偏向都是与六次大会的根本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第一，便是机会主义。不相信群众本身的力量，而倚赖单纯的军事力量，到了斗争紧要关头，即发生动摇，为要迁就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离开自己阶级的立场，牺牲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取消批评同盟者的权利，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只顾拉拢上层的领袖，不惜阻止千百万下层群众的斗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投机取巧的思想。现在客观的情形与党的路线虽久已变迁，但机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去净。如上面指出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认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等都是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二，是盲动主义。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只凭少数人的英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潮流中，大家只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岂知群众斗争还没有发展，听着暴动都要害怕，自然就不会来参加，遂使暴动成了少数人的烧杀行动。到了暴动失败，使群众因反动势力的高压，连日常斗争都要消沉，其妨害群众斗争，和机会主义没有两样。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上面指出的只幻想革命高潮，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和“兵变主义”等，也是很明显的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三，是命令主义。如命令暴动、强迫罢工等。不去说服群众，鼓动群众自动的斗争，而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以及群众中的委派制度，都是这个精神。这是不了解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党放在群众之上，把群众看在属从的地位，不了解党仅是阶级的先锋队，而以为党权可以高于一切。这样必然使群众对党发生反感，或则把革命斗争认作共产党的事，他们只是服役的人，或则把党看成救世主，而不相信群众本身力量。这就是使党脱离群众，绝对不能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党的口号，使党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群众只感觉党的主张好，在党领导之下起来斗争，而不觉得是由于党的命令，这才是争取群众的正确的方法。

同志们！现在党内许多不正确的观念，都是上面指出的三种错误思想的残余。要实现第六次大会的精神，必须与这三种错误的观念坚决的斗争。

四

同志们，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塞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国民党只是一个官僚政客的集团，此外则别无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都钻进我们党内来；尤其在国共合作时代，更加进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所以革命一经转变，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八七”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般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

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走向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但是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成分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那么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所以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

第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机械的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域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的肃清。

第二，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攻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

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

第三，是个人的意气之争。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有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气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

第四，是小组织的倾向。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例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

第五，是工学界限。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的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

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

第八，是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负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求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九，是把党看成救济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的机关，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一党部工作。加之同志们如果继续不断的脱离了社会的职业，便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关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

第十，是消极怠工。许多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的党，只要全党同志们坚决的一致的奋斗，少数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的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中央受六次大会的委托，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与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当的倾向，继续猛烈奋斗，尤其在组织上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的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同志们！中央有决心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的排除，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们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一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中央指出下面的路线为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标准：

第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首先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增加党的工人的成分，集中注意于全国产业区域的党的组织的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主要的道路。

第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

第三，是党员的职业化。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同志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中去，把党的影响到群众中去扩大，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识正确的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第四，是支部生活的改进。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

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定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久没有接近的时候。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最后中央提出下列的口号，要求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

拥护第六次大会的精神

详细研究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

坚决执行第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

反对机会主义的残余

坚决的与盲动主义斗争

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

到产业工人中去

党员职业化

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

发展党的理论的教育

健全支部生活

继续改造党的组织

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闹个人意气的滚出党去

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做艰苦的群众工作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争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
促进革命的高潮
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

——关于职工运动的策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六次大会职工运动决议案，是党目前职工运动的新路线。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精神是获得了过去一切宝贵的教训，明确的规定了目前的基本任务和群众组织的主要路线——民主集中制与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严重指出命令主义和委派制度脱离群众的危险政策，及今后工作的方针。在目前党的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之下，职工运动是党争夺群众主要工作之一。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领导作用，都只有积极的和正确的来运用和实现职运的一切策略和决定，彻底的改正过去一切工作路线。因此，中央为使各级党部和负职运工作同志，对于主要策略有正确的执行与活泼的运用起见，根据这数月来工作的经验，更具体的指示如下：

A. 斗争策略和战术的运用

一、发动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是争取群众的最好的方法

中外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经济剥削，更是一天天的加厉起

来，反动的国民党现在更巧妙的利用民族利益的口号来制止工人经济的要求，工人对于生活改良已成为最迫切的要求。自“五三”反帝运动复兴以后，工人运动已成活跃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工人经济斗争不断发生。虽然这种现象只表现于上海，而其他各省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多蕴藏未发，最重要的原因是各省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不能发动起来。总之，工人经济斗争，已成为目前工人运动中最主要问题，切合于工人的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有计划的发动，是最能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组织。因此对于工人日常生活斗争的发动，不仅使工人阶级对于斗争的易于了解，而且提高了斗争的情绪。这种斗争的发展不但打破了目前工人运动寂寞状态，并且推进了广大的经济斗争发展。在目前政治环境之下，广大的经济斗争发展，是很快的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所以目前发动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是争取群众主要的策略。

二、正确的罢工策略的运用是保障斗争的胜利与扩大斗争发展的主要战术

在目前严重斗争形式之下，正确的罢工策略的运用是目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罢工策略，斗争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因为目前工人阶级对于罢工失败的恐怖尚未完全消灭，很容易受罢工失败的影响降低他的斗争情绪。因此在每一罢工时对于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与适宜，主观力量是否具备，罢工的条件是否切合于群众的要求，罢工时间的决定，罢工组织与群众关系，都要有正确的估定，然后这个罢工才有胜利的保障。这不仅是提高工人群众斗争情绪，并且是推进工人斗争的广大发展，领导斗争到胜利的路上，是阶级斗争的最初形式的

主要途径。在严重白色恐怖不断摧残更应采取的策略。这个胜利的条件，要用极客观的观察为标准，如在敌人严厉进攻与群众斗争情绪下降，这种情势之下，微少的胜利也应当结束，甚至条件没有也应如此。只能积极准备第二次的斗争，断不能凭主观上硬将他坚持下去，这样必归失败的。过去我们做了不少这种的错误，这是极大的教训。

三、发动日常斗争的方法

要发动工人日常生活的斗争，首先要经常了解工人实际生活的状况，然后抓住群众最主要的迫切要求。换言之，是工人阶级在生活中最感觉迫切而必要的要求。有计划的向群众宣传和鼓动，要使群众了解这种要求和斗争的意义，然后才能择某一机会来发动（如扣罚工资、打骂工人等等）。没有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没有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有了机会不是不能发动就是这种斗争虽然发动起来，是不能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斗争的，不能将这个斗争形成群众的斗争。反之，不会利用适当的机会，不是不能发动，就是发动起来也要失败。总之，发动群众日常斗争，要与群众日常工作相紧连，否则日常斗争只成空话。

在日常工作与发动日常斗争中，应注意到大的问题的联系。在每个斗争中——大的与日常的，不但要规定最低限度的目标，同时要注意到最高限度的估量与关联，才能使日常工作与日常斗争与目前工人阶级总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相连一气，才表现在策略上有伸缩活泼的运用。不顾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只偏重于日常斗争的注意，与忽略日常斗争只一味鼓动大的斗争是同样的错误。同时每一个斗争胜利的决定，必须是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和群众的组织，增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与觉悟，这才是无产阶级斗争胜利的唯一条件，绝不是单求罢工本身的胜利为成绩。

四、肃清命令主义的残余，是目前动员群众起来积极参加斗争的先决条件

命令主义是强迫群众的行动，是阻碍工人阶级对于本身的阶级组织——工会及党——的正确认识，是减削群众斗争的情绪，换言之，就是脱离群众。因此，在每一斗争和每一个要求提出时，不仅使群众了解，而且要使群众自动起来拥护这个斗争和要求。这就要在每个斗争发动之前，必须将一切要求经过群众的热烈讨论与决定，然后交于群众选出的指导机关去执行。在讨论与决定斗争问题时，群众有不了解的，应当详细的来解释和说明，使群众彻底了解。用这种精神来说服群众，然后斗争发动起来，使广大群众真正起来参加这个斗争，拥护这个斗争要求。只有彻底的肃清命令主义的一切残余方式，才能造成群众行动的斗争。

五、正确的斗争口号是发动斗争的主要条件

正确的斗争口号是最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口号太高可使群众脱离斗争的危险，很难使斗争得到胜利，太低是不能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因此，正确的斗争口号的择定，必定是群众最主要的最迫切的要求，而且是大部分群众最感觉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口号不在多，而在是否是群众所最迫切需要的问题，就是一二个都是好的。同时平时宣传口号与发动斗争的口号应该有分别，不能混合起来，并且要注意到如何将平时宣传的口号转变为行动的口号。在每次斗争的胜利，即是第二次斗争的宣传和组织与行动的准备。

六、在斗争中动员群众是胜利的保障

在斗争中特别注意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在斗争周围，必须尽量使每个工友都能参加斗争中各种工作（如宣传队、调查队、交通队、纠察队等等），使群众与斗争发生密切关系，才能坚持斗争的胜利，不至有溃散的现象发生。同时在我们领导的组织使他们互派代表参加群众大会和慰问工作的互相鼓动，并且时常要很明显的指出群众在斗争的前途一切危险和障碍（如国民党欺骗政策与领袖变节等），加以极诚恳的告诉与其正确的出路，要使每个群众都能认识，这个工作能够做到。斗争无论失败与胜利，使群众更加认清我们的主张和受我们的影响，尤其是黄色工会的群众斗争必须采取这个策略，方能争取他的群众到我们影响之下。在这个互相鼓动中，积极发动其他斗争来互相呼应，不致孤立无援，更加重要。

七、反对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和阶级合作的思想，工人思想上的胜利是阶级斗争胜利的前提

目前资产阶级消灭工人运动主要方法是在思想上用“全民利益”、“劳资合作”、“分红的诱惑”、“工人银行”等等来消灭工人阶级的意识，以合法运动来限制阶级斗争的行动，如“仲裁”、“调解纠纷”、“工会登记”。这都是引导工人运动走上改良道路，应该经常来反对这种思想的宣传。关于这些的问题，应依照中央之第七十号通告所指示去运用，在此再不赘述。

八、斗争的纲领和运用

全国工人总斗争的目标，应照第六次大会职运决议及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所决定的总要求为纲领。

在总的纲领之下，必要找出群众更迫切的具体的要求，使每个斗争与总纲领相联系，经济斗争和反帝运动发生密切联系，至于怎样去联系他，便须注意领导工人斗争向前一步一步的发展（如由反对加时再进一步减时或加薪，如改良待遇等）。在每个斗争的转变，提出更恰切适合群众的口号，使鼓动的口号变为行动的目标，而这些口号又须与宣传口号相联系（尤其是党的根本口号）。

除总的纲领及群众临时的注意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不应看作与普通口号一样。它与反帝运动、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曾经有过伟大的斗争，因此须将这一口号特别的提出，使将来促成工人阶级为这一口号而成为极大的斗争浪潮，必须时刻在宣传上和行动上将这一口号实现。

B. 群众组织的形式和运用

一、工厂委员会的运用

（一）工厂委员会是目前团结广大群众最好的组织形式

在目前职工运动的组织路线是团结所有的工人群众在工会组织内，造成群众的阶级的斗争组织。工厂委员会在目前环境是最能团结全厂的群众、动员全体群众斗争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在反动工会及其他有派别的工人群众中最能团结一切群众一致斗争的组织形式。

（二）工厂委员会的作用

工厂委员会过去我们以统一战线的口号来解释工厂委员会的作用，自然是错误的估量（因为中国反动工会情形与西欧大

异），不过同时并不能因为中国工人还没有很明显的组织上的政治派别，因此便否认工厂委员会的建立视为毫无意义。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大部分尚在不很明了。他们虽然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可是也没有很明确的政治出路的认识，又加以白色恐怖的镇压，所以争取这些大多数“无党”工人群众，是工厂委员会的中心任务。

工厂委员会的任务是保护工人日常利益，拥护某工厂工人最切近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容易了解的利益，应成为阶级斗争和阶级训练的最初形式。工人遇有被欺侮被侵犯等，工厂委员会应加以一体防卫，所以他的组织是从每一个斗争产生的，不是在和平组织去等候领导斗争。同时如果误认他只是在反动政治下的一种灰色的和平的组织，那就完全不对了。工厂委员会除从事保卫工人利益的日常斗争外，在赤色工会不能公开的时候，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教育体育，调解工人间的争论，均为其应做之事。

（三）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形式

工厂委员会既然是一种号召斗争、团结全厂工人群众的组织，所以他应该采取简单的组织形式，没有章程，不收会费，包括全厂工人，不管工人间的帮派，政治派别，是不是加入工会，一体可以无条件的加入。工厂委员会的组织不仅在产业工厂中建立，并且适用于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及店员等等。

（四）工厂委员会的运用

工厂委员会本身的组织应该是与群众息息相通。委员会的选举，是由工人群众直接选举的（人数按实际情形决定），委员不称职时，群众得要撤换之。

工厂委员会在运用时是一个活泼的组织，在罢工时，可变为罢工委员会，罢工胜利后，可变为赤色工会支部、但是要按

照环境有大多数的群众都对于工会的认识有相当的了解和拥护的表示方能转，否则还要经过不断斗争的领导，达到上述的条件方能转变，不能凭主观上将他转变，是模糊他的作用。工厂委员会是要求公开的组织，他要将现在工人中流行的原始性的狭隘的组织（如兄弟团等）洗刷其散漫的意识，改正为比较确定的公开的阶级的组织。

（五）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的区别

因为工厂委员会还不是赤色工会的支部，所以工会不能直接指导他，只能由党团形式去影响他，不如此，将失去其原有作用。

二、赤色工会的工作

（一）赤色工会的意义

赤色工会是无产阶级的正式的革命阶级斗争的最强固的组织，是无产阶级作战最有力的一支杠棍。

（二）赤色工会力求公开是增加战斗力量

反动的统治对赤色工会残酷的摧残，使赤色工会不得不趋入于秘密工作的状态。为抵御白色恐怖的袭来，秘密工作成为异常的必要，但是赤色工会公开的自由，仍然是应该时刻争求的。每一公开的可能，应该尽量的利用，当然在公开的活动期间内，秘密工作亦仍然不应抛却。只有这样才是领导群众为本身组织的利益与反动派不断的斗争，在斗争中得到他们的认识，使更能容易促进组织的发展。现在同志往往有这个观念，以为反动派将工会封闭了，不甚要紧，去组织秘密工会，这是不正确的。不尽量求公开，只是秘密去组织，结果只能团结极少数的进步分子罢了。

（三）赤色工会是在斗争中来发展的

赤色工会组织的发展，应该不能脱离斗争的关系，因此，机械的和平发展，一组一组的，或一个一个的，或规定时间与数目的，这种发展赤色工会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同时单方面这样去发展更是不正确。应要在斗争中去给某部分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或将小的组织转变为赤色工会的支部，这样才是发展的方式。

（四）在反动工会内的组织形式

在黄色工会与反动工会是有群众的组织，过去很多是单纯建立秘密组织，往往做成阶级分裂的营垒，使一部群众生长受反动领袖的欺骗仇恨我们，和在我们这些群众，同时别方面这种的组织，不能有广大群众，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参加，因他恐被领袖知道，说他是破坏工会组织的危险，所以这些路线都是走不通的。正确的方法应是尽量的公开建立下层的组织（如支部小组等），在我们领导的群众将他分散到各种小组织去活动，将这个活动渐渐将他扩大和影响，如在比较采用民主制的工会（如上海邮务工会等）更容易实现这个办法，因为他本身已有这种组织，只是怎样在这种组织内活动，但是在不是民主制的工会怎样呢？一方面是要求成立这种组织，不必一定叫支部小组，或研究班……等都可以，另一方面公开组织各种小团体，以能够接近落后的群众为标准，在各种组织加紧教育和宣传工作，这样才可以扩大其活动范围。同时不但要将这种小组织能在我们领导，假如有相当力量进一步去夺取公开机关，虽然这不是根本工作，但是绝对放弃是使缩小活动范围，尤其注意不应随便将这种组织（还没有可能的）加以一个赤色的头衔，结果反使群众一知道便害怕起来，是应当注意的。

三、怎样实现民主集中制

（一）民主集中制是使群众与其阶级组织紧密配合，增强阶级的战斗力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而能战斗的最好的形式，只有这种组织制度上才能使工会的组织真正能够反映出多数群众的意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使工人们的一般生活能够受工会组织的影响，吸引工人中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来。这样工会组织，才不致脱离了群众，工会机关，才不是一个空洞的衙门，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战斗的组织。

（二）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办法

为实现工会的民主集中精神，我们应采取下列几个必要的办法：

1. 工会机关（工会，工厂委员会）负责人员须是群众选举出来的。纵然因环境不能完全公开开大会选举，也应该是由代表复选。这样工会执行机关，才是群众负责性的，群众才能拥护他，服从他的领导。

2. 工会执行机关人员，须有群众之日常监督，如有违背公意时，得由群众召回而改选之。

3. 机关负责人员，须按时报告其工作情形于工人群众，尽可能的召集群众会议，或代表会议，搜求群众意见，讨论进行方略。

4. 在工厂里面只有工会或工厂委员会的执行机关，还不能密切的与工人群众联络，所以在工厂中应按时举行工厂代表会议（每星期一次或二次），代表会的代表是由各工作部门选举出来的（他的人数按实际情形而定），这些代表各提出所属该部分工人的意见贡献于工会或工厂委员会，以便一般群众的

意思完全无阻挡的表现出来，同时各种事务，使他们更深切的了解，知道他们的指导机关所做的是什么。

5. 工会或工厂委员会的指导机关负责人员（包含被选举出来及被雇的），如果将一切事件通通揽在手里去办，是最容易形成包办的形势。负责人员应该常常号召多数在厂内工作的工人，使他们尽量参加各部分的工作，养成他们办事的兴趣及能力，使大多数的群众都能过工会的生活。必定要在每个工厂里面经常有多数的积极活动分子，才能保证民主集中制的真正效能，应可养成非党群众的干部人才。

6. 在组织人数很少的工厂中民主制的运用更为容易，尽量使全部分子积极参加都是应该的。

（三）肃清委派制度的残余才能实现民主集中制

委派制度是使工人群众对于工会组织认为阶级以外的组织，是使群众对于工会关系不十分紧密，不能吸引工人中多数的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减削工人阶级的战斗力。这种制度的残余，在各省工作中尚保存一些形式，应该彻底的来肃清。工会职员尽量的在群众中举行民主式的选举，即或在职运初期发展的地方，工会的组织员也只能作为过渡的媒介，一有组织发生以后，应即撤销。

C. 宣传和鼓动工作

一、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

现在群众对于国民党是不满和愤恨的，许多地方都听见群众自动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呼声，但是他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很模糊的，即是说还没有团结在党的根本口号周围。同时现在

PDG

资产阶级极力用改良主义宣传和缓与欺骗群众的斗争（如蒋介石所谓合法运动、劳资仲裁、调解工商纠纷等），并更进一步利用在群众中有些影响的团体（如上海七大工会等），企图做成欺骗群众的领袖组织。所以现在忽略这一工作，一定要使群众有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可能。因此目前宣传的主要任务是：肃清资产阶级在群众中的改良欺骗影响和群众对国民党的残余幻想，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党在目前争取广大群众，是使群众团结在党的根本口号周围，单纯只去组织群众而忽略了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无异帮助了资产阶级的工作。

对于反动派其他一切的反动宣传，均应很快的提出适应的口号与之对抗（尤其经济的口号），以免敌人方面坏的影响之扩大。过去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只是机械的主观的宣传，全不顾及敌人所散布之影响怎样，这是很受损失的。

二、宣传与鼓动方法要适合于当时环境与群众心理

宣传工作的改良亦为目前重要的工作。口号太高，群众不能接受，形式太机械了，虽然是好的口号，群众亦不容易受感动的。至于有的时候群众情绪怯弱，遽然提出极高的口号将他们吓退也是常有的事。改进宣传方法：第一是客观的去研究群众情绪，不要凭主观或少数接近的人的意思，拿他当群众的意见。对于所欲提出的口号，务必是客观的存在工人群众心目中欲说未说出来的话，估量他一定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第二，虽然提出了好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还没成为群众坚决相信的，如果只是发一个宣言，做一张传单，或者开一个群众会议还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方面的根据事实的材料，用很通俗的语句，个别的或群众的向工人解释，使他们的确能了然。第三，在斗争未起或刚开始群众表示畏缩的时候，不仅不

应拿大话去吓他，随意发散党的传单宣言，还应在宣传中顾全他们的恐惧心理。群众不愿看宣传刊物，就应该多用口头的向他们解释，群众畏缩着出席会议，就应该利用一切谈话、访问、散步、茶会的时候个别的勤恳的与他们解释，从他们生活的痛苦点着想，站在他们的地位说话，他们是很不难接受的。

三、利用一切会议形式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

在目前工人自己集会很少自由的时候，第一是要利用一切的机会自我们领导的集会以至工人自发的集会，甚至反动派召集的会议，只要有群众，便应该参加进去，提出群众迫切要求影响群众；第二便是充分发挥飞行集会的作用，利用上工、下工、吃饭等空余的极短的时间，作种种简单的集会。

四、宣传工作不是机关式的工作

宣传工作也不能看做他只是工会机关的工作，不只是指导机关的发动，而一般群众的马马虎虎信从。务在使广大群众彻底了解，使很多人了解之后，他们自己复在群众中自动的做宣传鼓动。这样才是群众的行动，不是机关“通告”、“告示”式的办法。

五、宣传刊物的改良

工会机关报应尽力的改良。目前各地积极进行工厂日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第一要编辑通俗，完全用本地俗语、俚语，反对一切主观的抄袭的敷衍文字，注重图画，增加读者兴趣；第二要印刷装订便于携带，不使人增厌；第三要编辑与读者力求发生密切关系，多多采用读者稿件；第四，对于有些工会发表左倾的文件时应斟酌转载或翻印散发。

六、注意分配刊物工作可扩大宣传力量

目前在严重压迫之下，分配工作是宣传的主要工作，如果没有好的技术和分配，是不能深入群众的，各地党部应看他是一个严重问题。

中　央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另附

（甲）关于政治的：

1. 反对帝国主义；

2. 驱逐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

3.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工厂、银行、一切企业；

4.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5. 收回租界；

6. 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资产阶级、地主、豪绅、新军阀、贪官、污吏、买办、流氓、工贼、农贼的刮民党，刮民政府！

7. 为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8. 帮助农民暴动！实行土地革命！

9. 开会、结社、说话、出版、罢工等绝对自由！

10. 反对军事管理产业，反对军阀压迫工人做工！

11. 反对捉拿工人，释放被捕工友及一切政治犯！

12. 拥护中华全国总工会！

13. 反对劳资妥协、阶级调合的一切欺骗工人的改良主义！

（乙）关于经济的：

1.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2. 强迫政府与资本家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

3. 按物价增加工资；

4. 反对减工（反对三日班、五日班等）；

5. 反对开除工人；

6. 反对取消保障工人利益的条件；

7. 发清欠薪；

8. 工钱一律发现洋——不要低折纸币及库券；

9. 同等工作，同样工资；

10. 规定起码工资的数量，每月不得少过十五元；

11. 由政府、资本家建筑工人宿舍、饭堂；

12. 反对压迫工人的一切劳资仲裁机关，由工人与雇主直接交涉。

（丙）关于改良待遇的：

1. 反对减少工人加重工作；

2. 反对打骂工人；

3. 改良工人一切待遇；

4. 改良工厂卫生；

5. 反对虐待工人的工头监工；

6. 工人疾病由资本家供给药费，工资照发。

（丁）关于童工女工的：

1. 反对虐待童工女工；

2. 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发；

3. 童工不得做过重工作及夜工；

4. 童工工作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七小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

*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支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部队

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

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湖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

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

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支，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1]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

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

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

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

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支，莲花保存一支，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支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支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支，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支。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

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才，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

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

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

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

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拼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

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

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

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

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定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仗，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

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

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支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

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

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半年来反动政治在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下和反动阶级内部矛盾中变动着。日本出兵满洲、山东以及济案发生，英国对日采取相当的协调。盖日本之行动一则可以转移二年来华人仇英运动，一则可以给在政治军事上声势渐张之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以打击，因此英国有暂时对日协调之必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必须扶助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蒋介石（当时是南京政府之唯一支配者）于济案后，转而勾结美帝国主义，这是客观的必然。这正当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前，其时，南京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这时期是民族资产阶级很活跃的时期，全国财政会议、裁兵会议、交通会议、裁厘会议，都在这一时期召集的，同时还向民众作了许多改良欺骗的宣传。但五中会议因为地主买办阶级占着优势，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取消政治分会、财政统一等）不能通过。接着，国民政府也不能不改组。现在的局势是：胡汉民、戴季陶占住了中央党部，南京政府成了地主买办阶级（西山会议派、桂系）与民族资产阶级（蒋系）相持的政权，而地主买办阶级占着优势。英国在南京政府中比力美国起来，暂时占着优势。但这决不是说，美国或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了消极退让，恰恰相反，美

帝国主义正在极力扶助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客观上的需要，也逼得地主买办阶级对美帝国主义的投资不能不垂涎（伍朝枢使美、孙科在美进行借款）。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冲突虽根本不能消除，然而美帝国主义势力已一步迫进一步地伸入中国，极力以财政资本引诱中国资产阶级甚至买办豪绅，好发展他的垄断政策给日英在中国的特权以严重的打击。为共同对美，更联系到世界问题上，英日对华外交上已采取了调协的策略。日帝国主义表面上对南京政府没有直接命令的权力，但在国际关系上以及满洲山东的占领、直隶的包围，日本并没有减低他与英美共同支配中国局势的地位。无疑的日本必然继续开展其在北方的特权，在北方军阀中寻找扶持更强有力的工具（阎[1]已亲日，冯玉祥逐渐亲日），以达到其直接命令中央政府的目的。在如此国际帝国主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互相竞争冲突的中央政权之下，地方政权被各派新旧军阀所割据，新的军阀战争，以地主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为骨干而剧烈的酝酿着，后面隐藏着帝国主义英日与美国的两大对垒的操纵，因此（上述种种）反动统治不能走向统一稳定而必然走向分裂崩溃。

资产阶级需要争取群众，尤其是为要消磨革命、分散革命力量和打击豪绅地主阶级。其争取群众的策略是“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实行的方式，第一为宣传，如革命评论派与第三党的种种宣传，这是从政治上取得群众，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也有些影响（《革命评论》每期曾销行到五万份）。第二便是组织上争取群众，经过党部指导（指导委员）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反日会等，主要的是以统治阶级的法律范围（合法）群众的行动（请愿、调解、仲裁、劳资合作等）消灭群众革命斗争，这在江浙各省也养成不少工人群

众的合法观念。资产阶级仍在这样的继续努力着，并渐有相当影响到其他各省。

在严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工人经济斗争有复兴之趋势，大小城市都陆续有部分的工人斗争发生，对国民党的欺骗逐渐打破。湘鄂赣粤的农暴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有几处（如赣西朱毛[2]区域）斗争比前更为深入；北方几省的农民反苛杂运动也不断发生；湘鄂桂豫陕甘晋鲁等省普遍的天灾必然成为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火线，斗争区域农民群众对于党的信仰大部分很好。几个月来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因为生活痛苦而动摇，零碎的逃兵和哗变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小资产阶级从“五三”以来即从国民党的怀里动摇起来。城市的反日抵货运动还继续着。但是这些现象，只能算作新的高潮必不可免要到来的薄弱的象征，因为有下面的严重的弱点：（1）党的主要的口号还没有深入群众，多数群众虽然不满意国民党，然而其政治意识还是模糊动摇（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仍在活动，以他的动摇的政治影响群众）；（2）群众本身组织力量非常薄弱（工会的组织少而弱，许多斗争的乡村，群众自身没有组织）；（3）工农士兵群众的斗争大半是自发的零碎的随起随落；（4）一般城市工作没有做起来，大工人区域如武汉、天津、广州都已破碎不堪；（5）反帝运动（反日）被资产阶级领导去而不能发展（工人阶级无力领导）；（6）根本的原因由于党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不能把党的政治传到群众，组织群众，争取多数群众于党的周围。

然而客观的环境和群众的革命情绪告诉我们革命有向前发展的可能，主要的是要无产阶级政党有正确的策略和工作路线以推进革命的微波走向高潮。中央忠实的在国际第九次扩大会决议和第六次全国大会决议之下工作，主要的是肃清盲动主义

与机会主义之残余，在一切劳苦群众前面扩大党的宣传揭破统治阶级的罪恶特别与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宣传奋斗，参加一切在反动领导下有群众的组织以夺取其群众；目前对于群众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策略是从小斗争的胜利中求扩大，纠正只注意扩大的盲动精神；建立群众独立组织，纠正过去组织上的错误（如委派命令等制度）；注意各种群众工作互相影响推进而有配合的发展——这些是党争取群众的主要策略。下级党部对于这些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执行，多难得正确：有些地方盲动主义尚未能肃清，有些地方则又有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有的拒绝参加一切反动派领导的组织，有的却走上合法运动；对于群众斗争，有的只顾扩大，有的却忽略各部分的联系；对反帝运动或则根本忽视或则不认识职工运动为反帝运动的基本及反帝运动与一般群众工作的联系，而幻想反帝运动单独走向高潮甚至误认反帝运动为工人运动的前提；对士兵运动或则根本忽视，或则把士兵运动看做中心工作而发生士兵运动的盲动主义。因此中央又须在争取群众的策略上和工作路线上不断的纠正各地党部或左或右的倾向和种种错误。

同时党的组织上的弱点，更是党目前的严重问题：第一，党的工人成分缩小。全党工人成分最高数量不过四千人：江苏一千五百（上海一千三百），广东一千二百（香港六百），直隶二百四十（唐山一百、天津二十），湖北八十，河南一百，山东一百五十，江西六十，满洲九十七，浙江三十，福建六十，山西八十，四川四十，云南二十，陕西十，广西二十，南洋四百；第二，没有能起核心作用的产业支部；第三，城市支部固然非常之少而弱，乡村支部则大多数散漫无组织。因此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常常成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

执行的障碍。因此中央在组织任务上，要坚决的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力求“党产化”、“党员职业化”，同时在积极的政治教育和工作路线上与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并改正组织上许多非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残余。

几个主要的地方党部的现象也可简略的叙述一点：（一）江苏——几个月来政治上尚没有大的错误，但党的宣传没有深入群众。上海工人群众虽多厌恶国民党，但也多不敢接受我们的主张，三个月来比较热烈的工人经济斗争，在我们影响或领导之下的只有一部分店员或手工业工人，几次纱厂罢工（沪西）和最近邮务罢工，我们都无力领导。反帝运动，因为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事实上被资产阶级领导去了。党和群众的组织路线，还在开始改变。外县工作，渐次纠正了盲动主义，而注意了群众的日常斗争和组织工作。（二）广东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还继续总暴策略，在国际九次扩大会决议案到中国后，省委还决定夏收总暴动，虽经中央极力批驳，当时仍未立即改正。但事实上暴不起来，省委此时的政治路线又转变到“取消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如事实上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如以反帝运动、农民运动为工人运动的前提，如群众运动之合法倾向及注意经济斗争而放松政治宣传等等，别一方面对士兵运动却坚持“兵变主义”。经过中央历次的说服并派巡视员指导，最近已逐渐改变过来。广州几次破获所余无几。香港群众工作和党的基础都很弱，外县重要区域都遭极大的摧残。不过非暴动区域的工作都有新的发展。（三）湖北——武汉三镇屡次被破坏，现仅汉阳有百余同志的组织，武昌群众工作刚起来，又被摧残下去。外县尚有六千党员，三十五个县委，农村群众斗争有复兴的现象，群众组织却极少。同时党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及小资产阶级意识所表现的恶

现象，都足以妨碍新的政治工作路线之执行，而亟需积极的予以纠正。（四）直隶——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3]同志到北方巡视以至六次大会前，省委经过两次改组，但顺直的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药，在政治上极端的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打青白旗欢迎冯玉祥）的主张同时存在于指导机关与同志脑中。组织上则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因此群众工作多被放弃。省委对下级党部又失信仰，对外县多失联系，保南则自立省委与省委对抗。中央对二月改组会的工作曾有告顺直同志书给以纠正，但省委并未接受，而对上面种种不好现象省委及和森同志都未使中央知道，一直到六次大会中，中央巡视员到北方才知道此种情形而召集扩大会而予以纠正并改组省委。新中央接受巡视员和省委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召集和森同志讨论后，给以更正确的指导，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整理顺直党部创立无产阶级基础，积极工作深入群众以与一切的错误倾向奋斗，并派巡视员帮助顺直工作。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4]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要求中央全体会追认。现在顺直工作内部纠纷仍未刷清，而新的工作人员及中央巡视员又多犯有取消命令等严重错误，中央正在努力给以纠正。（五）湖南——三月大破坏后曾停顿两个月，五月中央派人恢复省委，全省关系渐次恢复，并引进了许多工人分子担负各级党部指导工作，朱毛处也给了许多指导，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安源工作复兴起来，正在可以开始争取广大群众的工作，七月底又被大破坏（省委以至特委及重要县委），现在方在恢复关系中。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

命确实深入了群众，再则浏阳、平江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始终未被摧残下去。

中央回国后三个月中，各部各委组织已渐次建立起来。政治上已有五次通告，主要的是指示争取群众的策略和方法，纠正同志中各种或左或右的倾向。中央发了告同志书指出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积极的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唤起全体同志团结于六次大会精神之下。此外组织、职工、宣传工作、士兵运动、济难工作、秋收斗争、年关斗争，都有极详细的通告。中央理论机关报（布报）已出一期，鼓动报（《红旗》）已出二期，党内训练教育刊物正在编辑，宣传部对各省宣传鼓动工作，依据实际材料，不断的给以指导。工委正在准备召集全总扩大会议。中央回国已与江苏省委及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直隶、河南、浙江、满洲、山西、广西、福建等省委代表讨论过各省工作计划。对于全国工作的布置特别注意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青岛、满洲等产业中心尽可能予以直接的指导和帮助，因此中央首先派人巡视顺直和广东，现在已开始上海巡视工作。中央委员及健全工作人员都参加重要支部，中央对重要省份的指导，尽可能实行巡视制度。各省代表会渐次召集，重要省份中央派人出席指导。中央准备于今年内召集中央全体会议。

（这一报告是很简略的，但已包括有各种事实，下月当有一系统的分类的长篇报告寄上）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2〕指朱德、毛泽东。

〔3〕即蔡和森。

〔4〕即王藻文、王仲一。

PDG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

——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党的反帝与争取群众策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一）

一、在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中发展着彼此间的矛盾

两年来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形势，自一九二七年三月炮击南京起便猛进的开始了压迫中国革命、降服中国资产阶级的联合策略。这一猛进的联合进攻，在中国革命历次的失败中，特别是在广州暴动失败的前后更表现出他显著的成绩。因此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在帝国主义直接的指示和帮助之下便结成了他们对于压迫革命的一致，最后更助成了第三次北伐[1]的反动战争。

但在这压迫革命的联合策略中，各个帝国主义却因其自身资本主义新的矛盾〔注一〕[2]之不可能避免，都需要加紧剥削殖民地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出路。在这里各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矛盾便因之发展。所以在二次北伐[3]前反动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既一致地压迫革命屠杀工农，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的爆发宁汉战争、粤桂战争，后面便隐着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中国的尝试〔注二〕。三次北伐后，济案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既为露骨地武力

瓜分中国的实行，于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冲突和矛盾也就日益暴露，而显著于中国统治阶级各派的阶级关系中。

二、三次北伐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美帝国主义的企图

国民党三次北伐无疑地是一个反革命战争。在这个战争里，中国资产阶级却含有一个和平统一发展产业的愿望，自然这个愿望是与美帝国主义输入财政资本发展中国商场的算盘相合，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如要达到这一愿望，也只有密接于美国资本成为美国财政托辣斯的代理人，才能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所以美帝国主义为欲达到他以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企图，他必然要赞助国民党的北伐成功，援助中国资产阶级的愿望，高唱关税自主，反对武力干涉，力主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以打击英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已得的特权和势力范围。

三、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瓜分政策在北方的猛进和收获

但这一如意算盘，紧跟着（必然地）就遇着极大的困难和阻力。日本帝国主义首先给这个中国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企图以济南出兵的重大打击，北京虽终打下，但日帝国主义在北方的势力并不因奉张的失败而根本动摇，并且他的满蒙积极政策和山东占据进行的更加坚决。满洲铁路网化政策，从吉会线签字做起以发展向五路完成〔注三〕。知关税修改协定将不可避免，乃以承认一切既得特权、久占山东、保障一切债款为交换条件的留难〔注四〕。奉张失败关内，张褚[4]复被缴械，日本在关内所能勾结的武力除胶东一带匪军外，冯阎[5]两军阀均为其向所注意之人，而冯与阎任何一派不与日本结好条件，也万难在直鲁兵多匪多，金融商业又大半操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地方站稳地盘〔注五〕。全国抵制日货因得英美帝国主义

暗助在买办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但实际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为日本在满洲的急进不仅未受着什么大的损失，反而使日本对华贸易在满洲得到更大的收获〔注六〕。这显然是日帝国主义欲完全殖民地化了满洲的结果。

四、日美利害冲突前的英日矛盾

日美的矛盾如此，英国的政策又如何呢？在存在的历史上说，英日帝国主义在华的商品竞争是较任何他国严重，尤其是欧战中，特别是“五卅”后英国对华贸易受着日本商品竞争的严重打击。近两年日本对华贸易因出口超过入口从中国榨压去的财富几快与英国相等，所以日本对于长江流域的威吓。英国在反张胜利后，首先便扶助桂系打倒日本所勾结的唐生智，以恢复他在长江上流一年来所失去的地位。因为要巩固他在南华和长江流域的优越地位，因为要取得日本对这些地方的英国特权的承认，英国帝国主义所以在北伐开始、济案发生一直到北京打下始终持着旁观和默认的态度〔注七〕。但是奉张退出关外，南北的形式统一后，的确又开展了一个新的形势。这一新的形势便是给中国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以新的希望。在这时美国首先在实际上承认南京政府，企图扶助蒋系军阀以统一中国的财力，实行道威斯计划，以财政资本殖民地化了中国。

五、英美争南京政权更严于英日在经济上的冲突

日本在相反的方面实行武力殖民地化了山东满蒙和胁迫直隶的一贯政策，以企图割据整个的北方。在这时英国固一方面遣派桂系大将白崇禧屯兵直东，解决张褚溃兵以抵制日本势力之独霸，但是另一方面他所更严重看待的还是与美国结合的中国资产阶级和蒋系军阀打击代表豪绅买办的桂系军阀的企图。

这一企图在北京攻下后便已开始布置。蒋系军阀的裁兵、裁厘、财政、交通四大会议，国民党五中全会中的取消政治分会实行中央集权的主张，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的拥护之下进行的。很明显的英国知道这一企图如果成功，将使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全部动摇，而日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另一侵略形式承继，这一危害将较日本在长江流域和他的商品竞争严重得不知好多倍。因为美国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企图如果实现，不仅动摇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并将影响到印度，动摇太平洋沿岸英国全部的统治，并且更牵连到整个的未来世界大战。英国在这点上看得非常真切，所以桂系军阀的动员备战，国民党五中全会的破裂，西山会议派元老的示威，胡汉民、孙科受着英国的资本的命令的急遽回国〔注八〕，港督金文泰赞成政治分会的露骨表示，全表示着英国帝国主义与代表豪绅买办的桂系军阀、西山会议派向南京政府的积极进攻，果然中国资产阶级和现在在中国主观上尚需要经过一个和平发展阶段的美帝国主义，虽在蒋介石主观的主战意志下，终因准备不及不能不向英帝国主义作暂时的让步了（但这并不是说在世界大战的准备中，英日联合排挤美国的环境中，美国帝国主义便没有主战的决心，而且正因为反美的帝国主义联合一天天发展，使得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平发展迫不及待而终必出于武力发展之一途）。于是豪绅买办遂加入了南京政府而且占了优势，变为目前豪绅资产阶级相持的局面。这不但南京如此，便在全中国也是如此，骨子里便是英日美三帝国主义相持的局面。

六、相持局面下准备新的冲突

然而这个相持的局面不是永久可以如此下去的。相持的里

面正各在准备新的冲突，同时又常因准备不够而推延这个冲突〔注九〕。中国资产阶级蒋系军阀在美帝国主义引诱之下，在政权上既保有相当的势力〔注十〕，且正企图着开展这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局面：汰弱留强的裁编军队，集中其所能指挥的省份的财政，妥协了一部分豪绅买办〔注十一〕。在改良主义的欺骗口号之下诱取群众，并防止其革命化。修约运动、抵制日货也都是在美国资本的引诱之下来打击英日资本的。相反的桂系军阀、买办、豪绅、西山会议派，便在英帝国主义的怀抱之中，一方进行西南五省的军事同盟〔注十二〕，巩固南华和长江上游的割据地位，一方便拼命在南京政府中求发展，企图包办国民党三次代表大会予资产阶级蒋系军阀以更大的打击〔注十三〕。同时奸猾的英帝国主义也知关税问题他应有相当的改变，使七级差等税率成为变相的协定，另外再从投资与商品的竞争中〔注十四〕加强长江下游的特权地位。英美的准备如此，日本在北方便毫不放松的向前猛进，挟制张学良扰乱胶济，并以中国须承认日本一切既得特权及保证一切债务为接受七级差等税率协定的留难条件以抵制美国的企图。

七、日美冲突是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中矛盾的中心

在这三个帝国主义的三角矛盾中，日美冲突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即在太平洋的全部问题上都表现出他是太平洋未来大战的根源。目前他们——日美在中国问题的矛盾中，仅只能推延这种冲突（如日本在美国募集公债引诱美国资本经过他的在华特权向满洲投资，日本外交家内田康哉在美国作诋毁中国的宣传，美国亦同样以非战公约推延太平洋上的武装冲突，并无法减少这种冲突）。自然就两国目前军备的估量上说，日帝国主义希望目前与美帝国主义来一个武装冲突之心或更高过他要延

缓这个武装冲突之心〔注十五〕。所以田中内阁的武力积极政策始终不愿放弃，而且近来更有加强的形势〔注十六〕。

八、英日的商务冲突终不敌美国垄断中国的企图足以动摇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且更联结到英美争全世界的冲突

在日美的冲突前面，英帝国主义究取何种态度呢？这要先看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冲突的中心——英美问题如何演进为标准。英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争夺中很显然的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英法海军协定，据秘密传出的内容，以及美总统在国际休战日对此协定不满的宣言〔注十七〕，明白的表现了英帝国主义宁可在欧洲大陆上放弃其历来袒德反法的态度，对法让步以取得一致对美的协调。虽说这一协定未必便能束缚法国，还可转脸向美国表示好感，但英法在大陆上一致对付苏联和压迫德国已得了保障，英国自可多用心于海洋上英美的竞争了。同样的策略运用在中国，英日虽在商场的竞争上有利害的冲突，但终不敌美国垄断的企图，足以动摇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且更联结到英美在全世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所以英日帝国主义在他们与中国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关系上，还有默认彼此瓜分南北共同对美，日占蒙古英入新疆共同对俄的可能前途，并且英日两国也正在采取这一共同的行动〔注十八〕。而英美在争夺南京的政权上则不仅现在已演着激烈的冲突，将来必更要加紧这个冲突。

九、帝国主义与统治各阶级间虽还存在着矛盾但敌不过他们结合的需要

但这并不是说英日便可没有冲突了。在桂系军阀统治区

域，一切民众运动都被禁止，独反日抵货在英帝国主义报复的暗示下（这是英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所受损失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回报）猛烈进行，明显的表现英日在华利益的冲突。同样，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各阶级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存在，但当着帝国主义相互间、中国统治各阶级相互间有更大的矛盾存在，和准备着更大的冲突时，便掩盖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结合间的矛盾，显明的例如张学良与日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利益上本有冲突，但当着他们共同抵制南京政府保持满洲独立时，张学良便宁可倒在日帝国主义怀中出卖满洲于日本了。

十、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虽说占了一时优势但美国财政资本的潜伏势力更不可轻视

再则在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的相互关系中也不是绝对的不可变迁的，在阶级的关系上说，中国豪绅地主受着经济环境的支配，他必然有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注十九〕。虽说这一前途是他主观上所极不愿意，是在不能彻底实行民权革命的条件所很难达到，而且发展起来必为帝国主义经济所束缚所限制，但经过商业资本经过买办制度，我们总不能不看见这一迂回曲折的困苦前途。在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了中国的积极政策上说，美国财政资本在中国已具有一种不可轻视的潜伏势力，他这种势力不仅必然的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为他发展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并且他也会饵诱豪绅买办走上他们更驯服的被奴隶的道路。更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关系上说，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现在总不能垄断中国的中央政府。越是中央，帝国主义彼此间的竞争越烈，且这一垄断的企图只能靠着战争来解决。因此，现时的南京政权，虽说是英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势，但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潜伏势力更不可轻视。他不但与中国资产

阶级蒋系军阀紧相结合，便连代表豪绅买办的孙科、伍朝枢被他饵诱着也不得不倾向于美国资本〔注二十〕。这样便可以看出，南京政权在帝国主义的相持中，日接近于短兵相接的冲突局面了。

十一、法意比等帝国主义必然而不可避免的要在英日反美的两方战线上决定他们各自的地位

除了英日美的相互竞争外，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还有法意比等国，这些国家侵略政策的路线，自然更不会离开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利益势力范围，以及在争夺世界问题中的国际关系，因此在英日反美的两方战线上，他们必然要决定他们最后的隶属关系。这不仅对于争夺中国的态度要如此，即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也必须如此的〔注二十一〕。

十二、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矛盾存在、冲突加紧中间不要忽视了他们现在的结合力量还比革命大，压迫革命还是一致

在帝国主义彼此间、在中国统治各阶级彼此间矛盾虽然存在，冲突虽然加紧，未来的大战虽然必不可避免，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合的力量，现在还是比革命力量（工农兵士贫民）大，他们对革命的压迫和摧残现在还是一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夺取成千万的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中国无产阶级不能强健起他的革命领导，工农兵士群众不能在无产阶级很正确的政策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则中国统治各阶级的混战，帝国主义争中国的大战，便是爆发，也不会于中国革命有多大助益，反而会加增中国工农贫民群众更深的痛苦，造成中国更大的黑暗。中国

革命自从去年（一九二七）失败以后，革命群众同着革命的党因为缺乏上述的各项条件，所以虽经过国内各军阀的几次混战（特别显著的是济南惨案、北伐战争），始终不能掀起革命高潮。远之如过去的大战（一九一四——一八）在客观上的确是一个发展革命的最好环境，但当时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停顿在机会主义领导下，只有俄国多数党能从机会主义深渊中振拔出来，所以才能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从帝国主义矛盾爆发的最大罅隙（大战）中成就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

十三、共产党针对着加重革命危机的敌人矛盾要有正确的政策争取群众准备在革命高潮来到时的伟大胜利

因此，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要看清了敌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将要到来，并且更应针对着这一加重革命危机的矛盾，执行争取群众加紧群众斗争团结的正确而更有效的策略，以准备并促进这一革命高潮来到时的伟大胜利。

（二）

自济案发生，日帝国主义采取露骨的武力瓜分中国政策，激起了全中国劳苦民众的愤慨，在客观上颇有掀起反帝高潮之可能，近海以及长江流域各口岸抵制日货的行动甚为普遍，但当时党内对于这一反帝运动颇有几种极不正确的倾向：

一、反帝运动党中几种极不正确的倾向

一、以为反日乃是帮助了国民党〔注二十二〕。

二、以为可利用此反日高潮举行暴动〔注二十三〕。

三、认反日运动可在学生群众的领导和拥护之下进行工人斗争〔注二十四〕。

四、未曾将反日运动与整个反帝运动联结，尤其忽视了美帝国主义以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企图的更大危险。

因为有了这些不正确的倾向，于是各地反日运动我们乃不能很正确的从中领导，坐使这一运动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去：一方面停止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筹救国基金等和平运动上，另一方面更倚靠到英美帝国主义怀中去做反日抵货运动。豪绅资产阶级利用这一运动的面目以影响群众以缓和阶级斗争。他们提出为民族利益牺牲阶级利益的口号，实际上他们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好来压迫工人阶级，勾结英美帝国主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更便利的买卖而出卖民族利益。

二、反日运动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去为英美帝国主义所利用

同时英美帝国主义，亦正利用这个反日口号暗中扩大他们自己的在华利益，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更隐藏在和平发展、关税自主等骗人口号之下，准备吮吸中国劳苦群众的最后血液。一般的民众受着日帝国主义狰狞可畏的面目的反感，以为美帝国主义面目姣好和平可亲，殊不知道他的财政资本垄断全中国的道威斯计划，正是制中国民族死命的最后魔王，不仅这样，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更以关税自主、盐税独立、收回领事裁判权、修改条约等问题，在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进行他们重复承认一次帝国主义特权的秘密协定〔注二十五〕。所以反帝运动自从无产阶级失去领导为豪绅资产阶级所领去，为英美帝国主义所利用以抵制日货以来，不仅混淆了中国劳苦群众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并且使革命的反帝运动变成了反革命的作用。

三、反日运动党中错误倾向的根本来源

因为有了这样严重的损失，故本年以来一般民众的反帝情绪虽尚高涨，但各地反帝运动总是时起时伏，不能连合成一反帝的高潮。现在我们从各地反日运动停顿在这一和平运动和我们党在反日运动中软弱无能的状态看来，党更需要指出过去错误倾向和现在软弱无能的两个根本来源，也就是根本的错误观念所在。

四、各级党部根本忽略了争取群众的工作

第一，各级党部根本忽略了争取群众的工作。自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虽已从坚决的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建立起来，但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中便没有了争夺群众的斗争，革命的领导权落在无产阶级身上不靠斗争天然的便会强健起来。很显然的过去同志中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已经建立起来，农民及城市贫民天然的要跟着无产阶级走，而忘掉中国资产阶级也要群众，他可以用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夺取群众。党没有正确的政策领导农民斗争，党没有防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在群众中的影响，自然反日运动一起，我们党不能领导起广大群众，坐使资产阶级领导反日运动，于是我们便以为反日是帮助国民党，或更不顾一切的妄想造一个暴动局面以掩盖这一失败。殊不知群众活动不是死板的机械的，他决不因失了无产阶级正确的领导便停止在那里不动，也同样可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欺骗的影响，更可以由此影响将整个的反帝观念模糊起来，只知道日帝国主义凶横可厌，忘掉了美帝国主义的阴毒为尤可怕，而竟跟着资产阶级于不知不觉之中做了

美帝国主义在华发展的工具。

五、党内颇有将反帝运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斗争

第二，党内颇有将反帝运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斗争，拿他与工人运动、农民斗争对立着分离着看。这一错误观念显然是不明白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的相互关系和与工人阶级是反帝运动的领导者，所以反日运动掀起了半年有余。我们既不从工人阶级中、从工人的日常斗争中建立起反帝运动的主力和密结此日常斗争到反帝运动，我们亦不从打破豪绅资产阶级改良欺骗出卖革命的影响入手以取得一切劳苦群众团结到革命的反帝口号之下，而只想在反日运动的本身做文章。因为没有群众领导便幻想出以学生做反帝的掩护而进行工人斗争，或更无耻的想降低反帝口号而先从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反对起以打算避免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注二十六〕。或者看着各地反日团体全是在国民党手中，变成了机关式的反日抵制，以为他既无群众，我们又何必领导工人加入。殊不知豪绅资产阶级的反日，正因为他们看准了群众的反日情绪，特意的将群众拉向和平欺骗的道路。我们如不领导工人阶级打进这一反日运动，举起革命的反帝口号来争取一切劳苦群众，则群众便没有实际加入国民党的反日抵货团体，也将因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而必然要受国民党和平欺骗的反日运动的不良影响。

六、反帝运动的根本策略和工作方针

根据前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分析，根据各地过去反日运动的经验，我们应得出下列的结论和反帝运动的根本策略以及工作方针：

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群众的斗争仍然需要

第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群众的斗争，不但在革命成功前要靠着这一工作促进革命的大潮，便在革命成功后（不论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或是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存在一天，这工作仍不能停止一天。

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巩固的

第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巩固的，农民劳苦群众不是天然就跟着无产阶级跑的，这要靠正确的政策和不断的斗争来决定。

九、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口号是我们夺取群众的死敌

第三，资产阶级的改良口号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死敌，他不但可以欺骗农民和城市贫民，并可动摇无产阶级的主力。

十、美帝国主义隐藏在反帝口号、反日口号后的阴谋

第四，帝国主义（显明是美帝国主义）也可以隐藏在关税自主、收回租界等反帝口号后面，经过中国资产阶级南京政府反日号召下，实施他的财政资本垄断中国的阴谋计划，以蒙蔽群众。

十一、反帝运动必须与工农斗争反军阀战争联结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

第五，反帝运动必须与工人斗争、土地革命、反军阀战争联结起来，必须树立工人阶级强健的领导，才能走向革命的反帝高潮。

十二、反日运动必须与整个反帝运动联结

第六，反日运动必须与整个反帝运动相联，必须从反日运动中揭穿豪绅资产阶级和平抵货的自私阴谋，国民党和缓民众反日革命情绪的毒计，必须指明英美帝国主义利用反日的更大阴谋。

十三、加入各地反日团体以革命的口号争取群众反对国民党

第七，各地的反日团体，不论其为资产阶级领导或豪绅买办领导，我们必须领导群众加入活动，提出我们革命的反帝口号，指出和平抵货不彻底，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利用抵货的阴谋，联结到反国民党运动，以夺取广大群众，这一运动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加入。如我们确有广大的群众可以领导，亦可与国民党争公开的对立的反日运动，显明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即是另组织反日团体以号召群众。

十四、反帝运动中要力争工会的存在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

第八，应根据六次大会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切策略坚决执行，尤其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无所畏惧的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的实行这种自由”。

中　央

注一：资本主义新的矛盾，便是因为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加以生产合

理化，于是各国商品堆积，工人失业，重复发生国内经济危机，不得不加紧剥削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特别是瓜分中国以求出路。

注二：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中国的政策，不一定单纯的采取直接的武力行动，有时常唆使两派军阀为争夺地盘的混战以进行他们各自的瓜分政策，所以帝国主义的武力瓜分中国，必然要引起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与国内军阀战争。

注三：吉会铁路条约的签字已成为事实，张学良近且公开的承认这一事实。其他五路为吉会线（敦化至图们江）、长大线（长春至大赉）、洮索线（洮南至索伦）、延海线（延吉至海林）、吉常线（吉林至五常）、新新线（新印至新台子），共长八百余英里。

注四：日本森外交次官在十一月向外宣言“关于七种差等税率全无反对之意”，在北平日外交官频向各使馆游说反对七级差等税率，请各国先行拒绝，并不得已时订互惠协定后须承认日本既得特权与一切债务的整理与担保。日本内田康哉在美宣传“吾人所望于中国者为担保日本之既得权及条约权利”。日本在野党民政党滨口总裁在大阪党中集会（十一月十九日）说“用合法的方法保护在华利益”。不满意田中外交的币原外交官，对于关税问题也主张当局速议适当政策。日本在奉天的活动，则以完成五路商租权、撤消领事裁判权以实行中日杂居为主要条件。从这些消息上，可见日帝国主义只要与他的特权有利而且能够扩张，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变过面孔来接受关税自主、撤消领事裁判权的名义——这便是帝国主义的遮眼法，不但美国会玩，顽强的日帝国主义也会学着玩这个把戏。

注五：三次北伐前冯玉祥与日本久有秘密外交的往来，当时蒋介石亦进行这项工作。所以北伐一开始，冯玉祥很巧妙的

让蒋介石先去济南碰一个钉子，而自己预备坐守其成于后。现在山东问题尚未解决，但冯玉祥已迫不及待的需要解决，在这一需要上，冯玉祥必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否则，他在山东便休想坐稳。

注六：日本对华输出，在今年一月至八月八个月中为二亿四千九百三十五万九千金元，较去年同期增三千一百二十五万五千金元。其中对东三省输出较去年同期增至七百七十三万九千金元，华中则增至三千一百万零八千金元（华中则因为去年同期整个长江上游对外贸易低落，故显得今年特别发达），华南华北都减少得有限，共约五百多万金元。

注七：在济案发生后，英帝国主义不仅没有反对这一行动，并且外相张伯伦在国会演说还承认这一行动是需要的。国际联盟拒绝这一事件的过问，更显明出英帝国主义的态度。

注八：胡孙回国前在英的经济财政代表团，王宠惠、孙科、施密斯，曾与英国制造厂家商借一千五百万金磅借款，并与一企业联合会进行建筑江浙铁路的借款。

注九：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延期，党员特种登记法的修正，全表示这个冲突的推延。

注十：蒋系对桂系的让步，只是在让他们侵入南京政府，承认政治分会存在，暂时的牺牲了一帮效忠于蒋系的左派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至对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他还是极力保持并且日谋发展。所以宋子文、王伯群、孔祥熙舅子部长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仍然留在南京政府，并掌握着江浙皖等省的政权。

注十一：张静江是显著的买办地主的代表，但他之当浙省政府主席，并不是豪绅买办掌握了浙省政权，而是资产阶级妥协了一部分豪绅买办来支持浙省政权。

注十二：五省军事同盟，为粤桂滇黔鄂五省。五省军事代表在广州开过两次秘密会议，由粤省主盟，主要条件在供给军火、发达交通，以便实施攻守同盟。

注十三：国民党三次大会的指派代表办法、党员特种登记条例、登记延期办法，全是予蒋系国民党以不利的打击。

注十四：英国资本家与中国经济财政代表团的投资交涉虽未完成，但英方这一企图并未停止，最近且有数家纺织业会社欲移资到中国来发达纺织工业以便与日美竞争。

注十五：就目前日美两国武备上说，日本利于速战，美国利于缓战，其原因美国现时军舰的速度尚不及日本，太平洋上的军港尚不足抵抗日本军舰的袭击，如依美国军舰建造计划，则四年后美国一切困难均将打破，到那时日本便难与美国争衡了。

注十六：最近日本久原递相对华外交的硬化政策，已相当的取得优势，日内阁政友会中反对派的软化外交界中英日同盟复活的高唱，便是明证。

注十七：英法海军协定的秘密内容，据苏联消息为：一、规定太平洋及地中海方面之两国的势力范围，并规定以敌视国际联盟之一切国家为积极的军事行动之对象（苏联当为其主要敌人之一）；二、对付东方各国军事的设施，英法二国完全采一致之行动；三、英法对于东方各国之情报事宜，亦采取共同行动（此项规定与一九一三年英法对德的特别协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四、英法协定对于莱茵撤兵及赔款问题采取一致行动；五、英法协定对于巴尔干半岛及苏联采取共同政策。其他关于海军者，则英允法不限制小型潜艇，法允英仅限制万吨或万吨以下装有六寸以上至八寸口径炮位之巡舰。关于陆军者则英允在陆军后备兵上予以便利。

美总统在国际休战日公开地说这一协定将引起大有害于国家经济的海军竞争之复作，所以他主张美国要有“较他国为多的军舰”。

注十八：胡汉民劝白崇禧赴新疆与白崇禧所提出的修筑铁路的主张，显然是英国的主谋，与日本的满蒙积极政策正在遥相适应。

在日本出版的英报曾劝说日本对于中国关税自主问题，应与英国采取共同应付策略。英外相张伯伦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复出现于国会时，首先便承认英日共同行动的非正式协定。在日本方面，则英日同盟的呼声更为高涨。最近英日法关于盐税问题的共同声明便是基于张伯伦所承认的非正式协定而成立的。

注十九：南方的买办商业资本、北方的军阀官僚资本，均逐渐的向着工业发展的前途前进，显著的例：东三省的地主军阀现已成为大工厂主了。

注二十：伍朝枢做驻美公使，孙科进行美国借款，显见得美帝国主义势力在南京是加紧一层进攻了。

注二十一：英法在欧洲问题上既已取了一致行动，则在太平洋问题上，他们必更易于协调。意大利的态度，现尚在摇动中，在欧洲问题上，他必须反法，在欧美问题上，他也可反美，所以意国的资产阶级，一方恐惧英法海军协定，一方又主张欧洲应一致结成反美战线，反对美国海军的扩张。

注二十二：湘方党部有这一倾向。

注二十三：江西等省委有此计划。

注二十四：广东省委有此主张。

注二十五：关税自主的好名词，变成了七种差等税率的束缚协定。盐税独立，还须承认各种有关系债款的担保，而盐务稽核所则从实际上已取消了之后又复变相的恢复起来。

注二十六：山东省委曾有先反对日本御用机关济南维持会，而暂避免用直接的反日口号的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的国民党军与张作霖之间的战争。
〔2〕文中的注一至注二十六，均本文原注。
〔3〕二次北伐，可能是“三次北伐”之误。
〔4〕指张宗昌、褚玉璞。
〔5〕指冯玉祥、阎锡山。

PDG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武汉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由半公开的组织走入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党在组织上遂起了个严重的变动——不适宜于秘密党的生活的非无产阶级化的分子逐渐地脱离了党的组织。在这一变动中，党员自首与叛变革命的事实遂也在党内不断发生，特别是近一年来更成为党的组织上的严重问题。这一事实的造成原因约有数端：

一、过去党员成分工人同志并不占大多数，且不占大多数的工人同志在组织上并没有成为党的基本力量。农民党员数量虽多，但乡村组织不严，没有领导中心（城市党部的领导），来去无常，在党内一向不起组织上的作用，所以他的斗争情绪在近一年来虽极高涨，但终限于乡村一隅并不能及于城市几多。更不能影响到通都大邑重要的工商业的城市党部，即是领导的党部。因此，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党的干部分子，不仅他的成分、他的出身尚多是非无产阶级化的智识分子，且这些指导机关与干部分子的生活也多是隔离群众不能反映群众新的斗争意识。离开了群众斗争意识的指导机关和干部分子自然不但他的政治指导和工作方法要发生问题，便连他的党员立场阶级意识也会根本动摇起来。所以党没有稳固的无产阶级基础，党

员没有无产阶级的生活意识，是党员自首叛变特别是干部分子为多的主要原因。

二、党没有稳固的无产阶级基础，党的指导机关没有能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意识，党的政治指导遂不易取得党员对于工作上坚固的信心，党员对党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和坚固的信心，于是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宣传、第三党假冒革命的空谈便动摇了这般党员对于革命的信念。有了这种动摇的观念于先，阶级意识便一天一天淡薄，等到严厉残酷的白色恐怖一来，抵抗牺牲的决心遂终敌不过已经动摇的信念了。所以过去各级党部缺少正确的政治指导和训练，敌人离间革命、分散革命的反宣传是助成党员大批自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过去的中国党始终没有正确的党的生活，没有建立党的生活的基本组织——党的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仅只是一句口号，实际上党员为党工作多半不属党的支部支配，而且党员对于为党工作的范围的认识也多是极其错误，以为必定是由上级机关委派他做某一种事务工作而在党内或党所领导的团体内领生活费才算是为党工作，而不明白每一个党员在支部领导之下参加实际斗争，到会缴费，讨论党的政策和本身工作，读党报，散宣传品，吸收同志才是为党工作的根本条件。因为为党工作的范围认识错了，于是支部生活便根本不能造成。党员与支部既失了极重要的工作联锁，大多数党员遂脱离了支部的极密切关系，支部不能监督同志和了解同志而党员彼此也失了党的关联和同志间的深切认识。少数的所谓党的干部和活动分子多半是从机关中事务工作中与党的指导机关发生联系，并不是从斗争中从阶级意识上结成深切的信任。因此整个党的干部和活动分子多还是建筑在没有基本组织生活、没有下层工作训练的动摇基础上，故经不住党的工作范围的变动（由半公开

的党走到地下党）和敌人的袭击。所以党没有正确的支部生活、党员没有正确的工作路线也是助成党员大批自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党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尤其是武汉时期，党员的数量激增。在这一发展当中自然有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国民党反动以后许多投机分子固已离开了党，但还有些存留在党内各级机关中的没有退出，且还有已离开党又因不为国民党所容纳而转回到党来混入各级机关工作的。这些都是党内自首和叛变的危险的导火线，也是敌人所最易收买最易击破的部分。各级党部常常因为这种分子的自首和叛变而联及党部机关的破获负责同志的被捕。所以党内投机分子的混入与未肃清亦是造成党员自首与叛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客观上助成党员自首与叛变数量的发展的还有敌人白色恐怖的严厉，拷打刑具的残酷，诱骗方法的厉害（如向被捕同志中做离间自疑的宣传，引出各人相互指摘的供词），叛变党员线索牵引敌人的奸细混入党内等等。但这些外来的客观原因，虽极值得注意然决不能因此便减少了党内缺点的分量。

……

中央现在站在党的组织转变的严重关头，号召全党同志起来注意这一严重问题！号召全党同志认清这一批自首叛党的分子予以群众的制裁！号召全党同志更从积极方面努力消灭造成这种现象的党内原因！

关于消灭造成这种现象的党内原因的积极方面，中央指出下列八项的具体工作为主要出路：

一、党必须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指导每个党员俱能从群众生活中、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健强他的阶级意识和对革命的信念，使党真能生长在群众中而不是架空和脱离群众的

组织。

二、努力发展产业工人同志，增加党的无产阶级成分，稳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意识的反映。

三、创造党的支部生活，使每个同志的训练指导与生活关系全都有支部负责和了解。以后党内干部分子渐都能从支部的斗争生活与下层工作中不断的涌现出来。

四、各级党部应指示出党员为党工作的正确路线——每个党员最低限度必须做的工作：参加斗争，到支部会，缴党费，讨论党的政策及本身工作，读党报，散宣传品，吸收同志。从这些工作中训练党员，训练每个党员的阶级认识。

五、各级党部应从实际工作中、从深入群众的实际指示中指出党员到工厂中去、到农村中去的迫切需要，使每个党员都能打入生产机关实行职业化的口号，以肃清雇佣劳动化的不正确观念和危险。

六、各级党部必须加紧对于党员的政治训练，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使一般党员在党的政策上都能有热烈的讨论与正确的了解，以坚强他对于党、对于革命的阶级信念。同时并应注意党报宣传品在党员中间的分配和宣读，以加紧政治训练。

七、各级党部应加紧改造党的工作，在工作和斗争的过程中改造党，在教育的意义上改造党。每一改造必须注意于无产阶级基础的扩大（注意吸收产业工人同志）与无产阶级意识的提高（吸收积极的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在这过程中不容情的肃清一切动摇投机的分子。

八、整个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党的存在条件的遵守，非政治的或非必要的党内事虽负责同志亦不必互相询问，这并不是表示同志间互不信任，而是每一个党员在秘密党的条件下对党应负的责任。党的机关地址非必要须去的人虽主要负

责同志亦不必多所知道。

在这八项的具体工作前面，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的遵守，坚决的执行！中央更号召全党同志注意：任何一个党员在他被敌人捕去以后，不管是有无证据，他对于革命、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便是不吐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联，不指出任何同志！

以后各地党部对于自首叛变的分子的姓名必须向全党公布，号召全党同志认识这一叛徒，防范这一叛徒，断绝这一叛徒在一切活动中的生命！

中　央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反日保路运动给满洲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满洲省委：

接你们十一月十二号的来信（关于此次反日运动的策略的报告），因种种原因，今日才答复你们。虽然时间性已过去，但是本信所指出之各点，对于省委以后工作的路线，还有很重大的教训与意义，省委决不要因为失去时效而忽视之。

一、此次反日保路运动在客观上的确有很重大的革命意义。因为满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以后，在日本财政资本统治之下（还有其他各国的投资），产业有很多的发展，形成广大的无产阶级，同时买办官僚羡慕工业利润之高亦开始投资开办工厂，形成微弱的“民族资本”。这些“民族资本”虽然异常微弱，几乎是帝国主义资本的附庸，但是他的确与日本资本是有很大的矛盾，只有渐次排斥日本资本的势力，才能渐次生长发育起来，尤其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及工农群众，客观上都需要反对日本在满洲的经济统治，这就是满洲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满洲的民族资本主多半兼当军阀、官僚、买办的事业，不愿脱离日本奴属地位，因此，这一革命的使命，绝不能在这种半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去完

成。将来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只有被压迫的广大产业无产阶级、农民及贫苦的小资产阶级。此次反日保路运动，在客观上当然是这一经济矛盾的反映；在大商买办资产阶级发动此次运动的主观上不过是想利用群众的势力，减少一些奴属的苛待，和取得一些比较优裕的条件。但是因为这一客观的经济矛盾的存在，同时受了已过去的全国革命高潮的推动，同时此次国民党的北伐，民族资产阶级改良的企图，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运动一发动，便向着很激烈的群众行动的方向发展。可惜广大的劳苦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很好的组织，我们党的政治影响还没有在群众中扩大，党的组织上的群众基础尤为薄弱，所以这一运动仅掀动了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稍经打击便崩溃，而不能继续的前进。所以这一运动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在群众方面也是革命的行动，但是发动这一运动的大商买办阶级，却是半点的革命意识也没有。

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有重大的革命意义，但是很困难马上发动广大的革命浪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广大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没有强大的组织基础。所以我们对此运动的策略，最主要的就是要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尤其是要乘此机会把广大产业工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扩大他们的斗争，使渐次成为满洲一般群众运动的中心骨干，然后才渐次把满洲革命运动的领导从大商买办的手里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中。可是从省委的此次的报告中，对此次运动的估量上策略上都发现很多的缺点，所以省委在此次工作中一定难收到很多的成绩。

第一，省委认为“此次运动是满洲革命高潮的起点”，这一估量是很错误的。一个革命的高潮到来，决不是突然的爆发

的，而是要广大的群众从比较长期的斗争才能渐次促进起来。五卅革命高潮的爆发，便是从沙面罢工、一月纱厂大罢工、青岛纱厂罢工、国民会议运动、五案运动等汇合而成的。因为客观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但是革命主观力量尤其中心骨干的工人阶级，如果不经过比较长期的斗争，决难造成广大的群众组织和强固的斗争力量。满洲在此次反日运动以前很少革命的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连小规模的经济斗争都是很少，一点组织没有，斗争的经验尤其是缺乏，这样如何能促进领导一个革命的高潮。

第二，因为这一估量的不正确，当然在策略上要发生很大的错误。你们以为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来，而忽略了促进革命高潮的中心力量——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所以你们只是普遍的去注意一般群众的宣传鼓动（把工人阶级也包括在一般群众之内），而没有认清加紧工人群众中的工作是我们在此次运动中的最主要的任务。你们虽然说“要由商人、学生、市民、省议会的反日运动变而为工农爆发的发动”，“要将奉系军阀国民党欺骗政策所领导的反日运动，要将官僚商人所领导的反日运动转变广大工农参加的反日运动，能变为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反日运动”，但是在你们的宣传鼓动大纲上和行动大纲上，并没有特别指出中心工作——如何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只是告诉同志普遍宣传煽动的口号，普遍的群众工作。不告诉特别注意——集中力量去注意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工人群众如何能发动起来？工人群众不发动起来，不能在此次运动中积极的斗争，“转变领导”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尤其错误的是向商人宣传“欢迎工农群众参加”来“引起他们对工农的同情”，这简直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幻想。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在全国资产阶级叛变后的现在，会欢迎工农起来吗？会同情工农群众

吗？发动工人群众完全要靠我们的努力和工人群众自己斗争的力量，我们不去特加紧工人群众中的工作，而幻想商人对工农的欢迎，这是一万年也不会做到的。同志们，要革命高潮到来，必须有中心骨干的工人力量要发动工人的斗争，就在我们的特别的努力，所以我们在此次斗争的策略，主要的方向应该集中力量发动工人群众起来，然后才能达到转变的目的。在宣传大纲虽然说了一句要工农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但仅仅是一句普泛的空话，并没有特别注意指出工人群众工作的重要与方法。

第三，“农工商学反日联合会”完全是以前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时期的办法与口号，在资产阶级叛变以后，资产阶级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还有什么“工商”联合反帝的可言。满洲虽然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但是阶级的分化是全国的，满洲决不能例外，并且从满洲商人的许多行动上也已经充分表现他的反革命，所以省委这一决定是绝对错误的。正确的策略，是极力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此次斗争，同时在斗争过程中，极力揭破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然后才能使此次反日运动不只被资产阶级领到反革命路上去，才能成为真正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在鼓动上当然要特别加重反日的口号，但是在宣传上必须明白的指出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如果要完成反帝运动必须打倒奉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革命的正确的出路。你们一方面提出了打倒奉系军阀打倒国民党，但同时又不马上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那末群众会想打倒了奉系军阀、国民党之后怎么办呢？用什么政府去代替他呢？所以消极方面的“打倒！”口号与积极方面的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必须同时提出，不应该是第二步。并且所谓第二步，实际上就是现

在不提出，这完全是避免宣传苏维埃的办法。你们似乎觉得现在还是联合战线的时期，第二步阶级分化了才是宣传苏维埃的时期，这是绝对错误的。满洲虽然还没有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意识的对抗，已在全国阶级斗争的影响之下明显的形成了，这决不是我们避免阶级分化的宣传或者“联合”的宣传可以把时代拉回去的。但这并不是说马上就把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到处高喊起来（因为群众尚未起来，直接去高喊苏维埃，当然是极幼稚的吓走群众的办法），而是说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极力解释只有推翻现在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府，建立工农劳苦群众的政府，才有出路。使他们渐次明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最后你们以为这个广大深入的反日高潮，是工农活动及抬头的“唯一”机会，是我党争取广大群众的“唯一”关头，这种“唯一”的观念是非常危险的。假如在此次运动中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马上使一般同志灰心丧气，以为这个“唯一机会”都没有做起来，以后还有什么办法？这样的观念或许现在同志中已经发生了。其实满洲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反帝革命经济的基础是一天一天的扩大的，反帝的群众运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问题只在我们的群众基础如何？领导势力——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如何？如果我们的基础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了，工人阶级斗争发展，团成有力的组织了，随时都有推动一个反帝革命高潮的可能。如果我们的群众基础还是与现在一样的薄弱，工人团结力量还是现在一样的弱小，那就无论如何不能推动一个革命的高潮。所以省委应该告诉同志，客观的反帝革命运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只是我们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太薄弱了，所以不能推动。此次反日运动应当是发动群众更易为的机会，我们决不可以放过，要加紧

到工人中去尤其是产业工人中去，发动他们的斗争，扩大他们的组织，领导他们参加反日运动。只有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影响，在整个斗争中扩大起来，才能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权，使反日运动得到最后的胜利。

满洲有五十万产业工人，这是革命的主要基础，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如果这广大的无产阶级没有起来，决不能推动和领导革命的高潮。要发动广大的无产阶级就是要靠我们党的艰苦的群众工作。所以省委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到产业工人中去，艰苦的工作，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从日常斗争中，扩大他们的组织，扩大党的基础，尤其是抓住发动群众的机会，很深入的从群众中发动出来，然后才能使革命运动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一直进到革命的高潮。如果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去艰苦的去建立群众的基础，只幻想利用机会来爆发革命高潮，结果革命高潮决难到来，终竟还是幻想而已。

现在满洲如大连、哈尔滨、奉天、抚顺……等，都是极重要的产业区域，这是党的中心工作的地方。党必须用全力去注意这几个地方的工作，极力打入产业工人群众中去，一个一个支部建立起来，很小很小工会组织起来，然后才能使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渐次扩大，然后才能使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渐次扩大。从省委委员起以及各级负责的同志，都必须编入工厂支部，经常的做支部工作，做工人群众的工作，才能使党的影响扩大起来。过去满洲工作其所以不能发展，就是没有这样艰苦的去做群众工作。省委必须切实认清这一点，坚决的执行，同时号召全体同志都一致的向这条路上奋斗，那么满洲党必定很快的发展起来，满洲革命运动也就可以很快的推动起来。至于反日运动当然是党的经常的工作，必须在经常的工人运动中经

常的宣传反帝，使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互相推动起来，决不可有一时的放弃。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

（一九二八年）

顺直省委并转全体同志：

一

顺直是全国重要产业区域之一，产业无产阶级在数量上，除上海外，比任何一省都多。在斗争的历史上，天津、唐山、长辛店都是全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二七以前，北方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是当时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我们的党，便在这样无产阶级激烈斗争的时期，产生发展起来，而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唯一的领导者。二七以后，顺直党在政治上组织上逐渐犯了严重的错误，使顺直党的政治方向不定，使党的组织堕落涣散，使工人阶级的斗争停滞消沉，以致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顺直党不能领导革命势力与南方平衡发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现在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统治阶级更利害的压榨，广大群众的生活日益痛苦，工农斗争已有复活的趋势，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不能调协，更残酷的新的军阀战争将必然爆发。如此等等，都充分证明反动统治没有稳定的可能，新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是怎样促进新的高潮，怎样能在新的革命高潮当中，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那就决定

于广大群众斗争的力量，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的力量。中央依据第六次大会的精神与决议，考察现在革命客观主观的形势、党的组织状况，认为必须有难苦的深入群众的工作，坚决的发展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肃清过去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然后才能正确的领导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完成革命的使命。因此，决定目前中心的任务，是建立城市工作，尤其是产业区域；发展工农群众的觉悟斗争与组织，尤其是产业工人。顺直既然是全国主要产业区域之一，当然在革命的进展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如果顺直工作不能有配合的平衡的发展，不单是影响于北方，而且使全国的革命都很少胜利的可能。所以顺直党负有极重大的任务，所以中央在全国布置当中，极注意顺直的工作。可是审查现在顺直党的情形，因历史上不断的错误，已使党在群众中的信任，异常堕落，党的组织，更是凋零破碎，在政治与组织的观念都充满了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个人意气与感情派别纠纷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意识几乎不能反映到党内来，一切工作都陷于停滞的状态。这样如何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如何能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如何能担负这样重大的使命？这不仅是顺直，而且是全国革命中极严重的问题。中央号召顺直全体同志，站在第六次大会精神上，站在无产阶级意识上，站在发展顺直工作的观点上，很积极的从工作中很迅速的、很坚决的、很正确的与一切错误的观念奋斗，与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来领导革命斗争的进展，来夺取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

二

中央认为要使顺直同志能正确的与一切错误观念奋斗，必须切实分析这些错误观念的历史来源，尤其要指出以后正确的工作路线。

顺直党在二七失败以后，已开始走入机会主义的危险。虽然在五卅前后，工人斗争经过一度的复兴，党的工作有过相当的发展，但并未能挽救党的危机。尤其是在第五次大会后，因袭着过去停止日常斗争等待北伐军来的机会主义观点，完全使党陷入消沉状态。及彭述之同志到顺直工作后，更加使党加重机会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完全是等待主义，避免斗争，不要斗争，关起门来讲训练教育的工作。使一切工作都归停顿，使党的影响在群众中低落，甚至完全脱离群众，使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使党的组织日益缩小，使先进的勇敢工人分子都更加离开党，使同志的观点日益落后，较落后的群众还要落后。在组织上完全是家长式的命令主义，学院式的训练，法律式的纪律，便是当时的组织路线。同志只有绝对的服从，毫无正确的党的生活。不要同志讨论政治及党内问题，对党的指导机关稍有怀疑与批评，便是违犯了纪律，即于惩罚开除。使党员群众变成机械木偶，使党员的政治观念无法提高，使党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无从纠正，使许多积极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因此脱党，使党内造成工学的界限，使党内发展个人意气感情的争执，使党内造成派别的纠纷。这样极端庸俗的机会主义，不只破坏了顺直当时的工作，而且种下了现在党内恶劣现象的种子。

三

八七会议接受国际的指导，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决定党的新的政治路线，坚决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家长式的命令主义，实行改造党的组织，从下而上的改造党部，引进下层的积极的工人分子到指导机关实行党内民主主义，开始党的政策下层的讨论，使全党渐次脱离机会主义的深渊，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当时中央临时政治局特派荷波、和森[1]等同志组织北方局，指导北方党部，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与决议，去纠正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可是和森同志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既不正确，且开始走上另一偏向——尤其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一月改组会更把这一偏向走到极端。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犯了莫大的错误，成为现在顺直党的一切危险现象的直接原因。第一，改组会完全忘记了政治问题，没有政治议决案，以致以后没有一致的政治路线，不是盲动，便是不动，时而左倾，时而右倾，使顺直同志无所适从。第二，改组会反对机会主义是对的，但是把反机会主义专门去反对个人。没有在政策上工作上检查一般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是指斥哪几个人是机会主义者，把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完全对人的斗争。以致机会主义本身并没有受致命的打击，仍然在党内继续发展，所以以后发生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做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的极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同时发展了同志中的派别的观念，而造成党内互相疑忌、互相冲突的无穷的纠纷。第三，改组会反对家长式的命令主义也是对的，但是正确的民主化——党的指导机关集体化的指导，党的政策在党内群众中的讨论，下级党部的改组与整顿，指导机关与党内群众在巡视工作与活动分子会议中的密切联系

等等，并没有执行，反而走入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的错误。结果，只是发展了同志中的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党的组织与纪律完全破坏，形成党内的绝对自由。以致省委及各级党部完全不能工作，同志可以不执行省委的决议，下级党部的决议倒反要省委执行。甚至不要党去领导群众，反而要群众来指谪党、监督党。第四，否认过去一切。以为过去都是机会主义，一切都要不得，同时又没有指示以后积极的路线，以致影响同志。只是消极的骂党骂过去，而不去积极的发展工作，结果仍旧停滞在过去坏的现象上，不能使党的工作有一点发展。第五，为纠正过去轻视工人同志的观念，不在积极方面多领导知识分子同志以难苦的工作，加强工人同志的指导能力，加紧工人同志的干部训练，而常注重消极的批评，因之反加深了党内的工学界限，以致影响同志中发生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是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观念。第六，改组会给同志一个不正确的经济观念，以为“闹经济问题和向党做经济斗争，都是由于党忽略了救济工作”。以后省委甚至拿钱收买旧同志回党，党员到支部会都要津贴他的工钱，以致影响同志中发生做工作便要钱，不拿钱便不做工作，甚至假造报告骗钱，没有钱便叛党，造成党内不可解决的经济问题。第七，最后还有和森同志带有很严重的个人意气和反中央的感情，在改组会议及以后工作上都充分表现出来了，更加助长顺直同志中个人感情的冲突与派别的纠纷。总之改组会议及会后工作并没有正确的去反对机会主义，同时又走到另一极端，为反对过去家长式的组织，而走到极端民主化；反对脱离群众的秘密工作，而走到不要秘密工作；反对过去用到机关上，而走到滥给津贴，养成同志的雇佣劳动的观念；反对过去不信用工人同志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反对过去机械的使用纪律，而

走到根本不要纪律；反对过去不管失业同志，而走到要党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过去许多工作中的错误，而走到否认过去一切；尤其最严重、最主要的就是改组会根本不讨论政治问题，没有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规定积极工作的方针，没有领导同志从积极方面去找出路，以致暗示同志专门从消极的方面闹问题。这是以后顺直党内发生一切恶劣现象的总原因。在改组会议前，反机会主义的口号确实把顺直同志的精神提出来了，对改组会抱了很大的希望来奋斗，且都有改造党肃清机会主义的决心，可惜指导的不好，走错了路，走入比过去更错误、更恶劣的倾向方面去了。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顺直改组会议以后，即发现改组会议本身的严重的错误，特别发一告顺直同志书，很正确的纠正这些错误，并且从积极的方面指示工作的出路。但是当时省委为个人意气与反中央的成见所笼罩，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并未领导同志加以积极的注意与讨论，以致这些极不正确的倾向，不能很迅速的纠正，而且继续在党内发展，造成今日党的支离破碎、纠纷不止的现象。

四

改组会议后，党内充满了不正确的倾向，个人感情派别的纠纷日益发展，尤其是北伐军到了京津以后，党不单是不能领导当时客观上正在要求发展的革命斗争，而且堕入更深的机会主义（欢迎国民党），甚至多数同志叛党而使党的组织瓦解。但是群众斗争的情绪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是要要求党的领导，自然反映到党的内面来，而推动党的改造。七月扩大会议便是代表这种客观的无产阶级的意识与要求，而执行改造党的工作。所以扩大会反对旧的机会主义，反对北方局以来的盲动

主义，肃清改组会以后新发生的各种错误，重新确定党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针，的确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扩大会的决议上仍然发现一些缺点，没有如六次大会这样明确的路线，但是的确正确的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的意识。如果扩大会产生的新的省委，能够坚决的正确的执行扩大会议的路线，必然可以把顺直党从过去的一切错误中挽救出来，而开辟顺直党的新的现象与新的精神。可惜新的省委开始工作以后，虽然没有明显的违反扩大会的决议，但是的确没有积极执行扩大会所付予的任务与工作，的确没有能继续扩大会的精神，尤其没有将扩大会的精神深入到群众中去，且仍旧保留了过去遗留下来一些错误的观念，以致党不能有很迅速的改造，工作仍是不能发展，仍旧不能执行广大群众所要求的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所以党内的纠纷还是继续，同志中不正确的观念也无法肃清，结果遂又发生京东四县的问题。

京东四县问题，在客观上仍然是代表群众不满意现状，要求改进党的意识，但是在参加此次问题的同志的主观方面，都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并且还继续以前许多不正确的观念。第一，违犯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没有在上级机关指导之下，竟自行召集各地的会议，组织对抗省委的团体（护党请愿团、京东代表团），这是很明显的破坏党的组织系统、违反党的纪律的行动。第二，因持极不正确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为扩大会产生的省委未用投票选举，便是少数人包办捣乱，甚至主张以后选举“要由每地派一代表，以各地党员数量分别票数”。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办法，也就是资产阶级操纵选举的把戏（如股份公司）。真正无产阶级的民主化，主要的是要同志普遍讨论党内的政治问题，要有最群众化的各级代表大会讨论党的政策工作，少数服从多数，产生各级指导机关赋

予执行一切政策工作的全权而不是什么票选或非票选。且在组织上更要坚决的反对这种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办法，而要在上级机关（代表大会——指导机关）指导之下去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权制。第三，完全否认扩大会的意义，完全不了解扩大会的很正确的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决定政治路线与工作方针都是比较正确的。而因为不正确的极端民主化的观念，以为扩大会没有实行票选，便否认扩大会的一切。还有许多个人意气感情以及小资产阶级意识，如认扩大会完全是少数人“把持包办”、“政变”等观念，更是绝对的错误。京东同志不满意现状，要求党的改进，这是很正确的，但是在观念上在行动上都犯了极重大的错误，都不合于布尔塞维克党的原则。这是中央要特别严重的指出，要求京东同志要切实起来纠正，而正确的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五

在七月扩大会议后，潭秋[2]同志回中央，少奇[3]同志亦代表顺直省委来中央报告，中央经过极详细的讨论，认为扩大会的精神非常的正确，扩大会的各种决议案虽有一些小的缺点，但是在总的路线是与第六次大会没有矛盾的。因此作一最后的解决，除成立决议案外，并发布一告顺直同志书，唤起同志在第六次大会和顺直扩大会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潭秋、少奇两同志在中央讨论结束以后，即去顺直，确好发生京东的问题。没有经过详细的讨论与考察，便确定解决京东问题的方法，停止省委及京东四县的职权与活动，已经很错误的。后来中央得到潭秋、少奇同志的书面与口头报告，便发现了两同志根本观念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发展，对于顺直前途是有莫大的危险。

第一，对组织上发生取消观念，以为“顺直党内从前和工人阶级同路参加革命的分子，到现在是落伍了，现在顺直党就建筑在这种落伍的基础上”。固然现在顺直党内仍然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尤其是在一部分干部分子中，但是并不能以为这就是顺直党的基础，因而根本否认顺直党的基础。顺直党在客观上有广大无产阶级的基础，在主观上固然在产业工人中的基础异常薄弱，但仍然有不少的从工人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分子。在一月改组会议中反机会主义的精神，七月扩大会中反一切错误倾向的斗争，很明显的证明无产阶级的意识还能反映到党里面来，所以顺直党的基础虽然异常的薄弱，并不是根本要不得。第二，因此遂以为在改造党的路线上要超过旧的基础去建立新的基础，这样，旧基础与新基础对立的观念，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走到把旧基础完全取消，新基础会更难建立起来。新基础应在旧基础当中生长改造扩大起来，决不应不按实际的想超过旧基础去建立新基础。这就是说要在党内从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渐次发展无产阶级意识，来使小资产阶级意识渐次肃清，并不是把现在反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基础完全不要，另外便会立刻找到新基础，便可立刻正确的反映无产阶级意识了。第三，因此在工作方法上更发生严重的命令主义，为反对极端民主化又复活了机械的纪律。如解决京东问题先缺乏从积极工作的领导中给群众一个新的路线的指示，同时亦缺乏很明确详细的批评。京东代表团组织的根本错误，指示给群众看，使群众深切了解，一致起来，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纠正少数同志的错误，反而很机械的命令停止一切活动——这在组织上也还不需要这种处置。这样更使群众不明白，而易于受到许多坏的影响，就是机械的服从了。因工作停顿也会发生不好结果，群众仍然是莫名其妙。在解决纠纷上，尤其是在党的教育的意义上，是没有

益处的。党的纪律是要使群众能从这一教训中学得更有益的东西，然后才有积极教育的意义。第四，否认扩大会的精神，以为“扩大会的无产阶级意识异常薄弱，完全在小资产阶级意识拥护之下成功的”。现在仔细审查扩大会的一切决议案，在总的路线上都是很正确的，很明显的是反映当时客观上的无产阶级的意识与要求，并不能因到会的代表来深切注意或会后新省委未努力执行，便根本否认他的意义。最后要“痛快解决”、“爽切办法”的观念也是很错误的，因为这一错误的执行，在客观上一定要把党的旧的组织完全取消，同时并不能解决党的纠纷，只有更增加党的纠纷。要改造党，必须极艰苦的深入党的群众中去，从积极的工作和实际的指导中影响群众说服群众，使无产阶级的意识渐次增长，小资产阶级意识才能渐次肃清，决不是“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可以便宜解决的。中央发现潭秋、少奇两同志这些根本观念的错误以后，认为更加要危险顺直党的前途，特别加以严重的纠正与批评。现在潭秋、少奇两同志已完全明白自己观念的错误而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

中央在指出顺直党历史上的不断错误偏向以后，要特别唤起全体同志注意：现在顺直党一切恶劣的现象，固然是历史上的错误所造成，但是这些错误的来源，根本原因还在顺直党没有群众的工作，党与群众脱离，尤其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因此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很困难反映到党内来。历次指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固然要负莫大的责任，但是顺直党的纠纷，并不是处罚了几个当时负责的同志，便可消灭，而最主要的是要从积极的方面深入群众中去，发展群众的工作，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然后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渐次强固起来，这是挽救顺直党的根本的路线。

六

顺直党既然在历史上造成这样许多恶劣的倾向，危害顺直工作，破坏顺直组织，顺直同志必然是深恶痛切而要坚决的起来和他奋斗，彻底肃清，这也就是中央要坚决唤起顺直同志注意的。不过奋斗的路线与方法，必须非常正确，才能完成这一奋斗的目的，而不致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因此中央要在原则上指出与这些错误倾向奋斗的正确路线。第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是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反映到党里面来，表现各种政策的路线上面。所以固执机会主义观念的人我们固然要坚决反对，但是主要的是要检查我们过去政治路线上哪些是机会主义，哪些是盲动主义，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来与这些路线奋斗，才可以彻底扫除。如果专门反对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或者排除了，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仍然存在，甚至自己重复滚入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还不知道。再要检查党的组织上的弱点，为甚么不正确的意识可以反映到党里面来？这必然是由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异常薄弱，所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能战胜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加紧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扩大无产阶级的基础；坚决的继续的改造党的组织，引进积极的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然后阶级的意识才能强固起来，不正确的倾向才没有复活的可能。在我们根据这一路线的积极工作过程当中，如果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来妨害这一路线的进展，当然要与他作坚决的斗争，彻底肃清他。第二，要反对家长式的命令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就要先指出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使同志们了解，同时要解释甚么是命令主义与极端民主化。必须正确的民主集中制渐次的建立起来，然后才

能肃清命令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第三，要肃清个人感情派别的纠纷和“包办”、“捣鬼”的把戏，尤其不是专从消极方面的反对可以肃清他的，必须积极的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一般同志政治的认识。只有唤起同志从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方面去认识同志批评同志，才能得到正确估量。如果离开政治去专谈“包办”、“捣鬼”，结果只有使同志中互相疑忌，更加模糊了同志的意识，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演。同志们！固然要坚决的反对这些个人感情派别的纠纷，但是我们一定要深切的了解，只有无产阶级意识强固起来，才能根本肃清这些个人感情派别的纠纷。总之，我们要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专在消极的方面批评反对是不够的，而要从积极的方面去找出路。如果不然，你反对机会主义，他还不知道甚么才是机会主义，必然走到盲动主义去，或者口里天天高喊反机会的口号，实际上天天还在做机会主义的工作。所以只有在建立积极的正确的路线的过程中去反对这些不正确的倾向，然后才能真正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七

同志们！顺直的革命斗争，将要走到一个新的时期，广大的工人群众正在不断的爆发自发的斗争。他们以前等待北伐军，等待国民党，现在国民党给与他们的，只有更厉害的榨压，更残酷的摧残。他们正在渴望着我们的领导呵！同志们！我们如果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使命，不愿意做革命的落伍者，便应该积极的工作起来，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的斗争，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负起革命的使命，才是真正群众的领导者。也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党

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彻底消灭党内不正确的倾向与纠纷。同志们！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虽然正在开展，但是我们主观实在太薄弱呵！尤其是不断的历史的错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是异常堕落呵！这是全靠同志们在党的总的路线之下，一致的奋斗，十二分艰苦的工作，才能补偿这些历史上的缺陷，才能确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

同志们！中央号召你们在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精神之下，在中央总的路线之下一致斗争！

中央号召你们积极的工作起来，到群众中去，到产业工人中去，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

中央号召你们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积极工作的过程当中，坚决的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彻底肃清他！

中央号召你们从工作过程当中去研究一切历史的教训，根据第六次大会的决议和中央历次的通告，讨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提高政治的认识，很快的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同志们！这就是挽救顺直党的危机，发展顺直党的工作，完成顺直党的使命的唯一的正确的出路！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王荷波、蔡和森。
〔2〕即陈潭秋。
〔3〕即刘少奇。

井冈山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一）茶山[1]、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二）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三）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 百分之十五；2. 百分之十；3. 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二）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三）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

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2]：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茶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2〕这个按语是毛泽东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写的。